

学校的理想装备

电子图书·学校专集

校园网上的最佳资源

# 上将风云录 (二)

 **eBOOK**  
内部资料 非卖品

## 前言

1997年8月1日，是中国人民解放军70周年华诞。为隆重庆祝这个盛大节日，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首批推出《将帅风云录》系列丛书六集，即：《十元帅风云录》、《大将风云录》、《上将风云录》（一、二集）和《中将风云录》（一、二集）。

这部丛书，所收录的人物，除极个别走向反面之外，都是为新中国的诞生而披荆斩棘、不屈不挠、浴血奋战过的我军高级将领。当中，有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有功勋卓著、驰名中外的战将，也有卓越的政治工作者、杰出的后勤工作者。他们在战火纷飞和白色恐怖的年代，南征北战、出生入死、前赴后继、英勇奋斗，为推翻反动统治，为民族的独立和解放建立了不朽的功勋。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他们又肩负起巩固国防、抵抗侵略、保卫祖国的重任。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又为人民军队的革命化、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呕心沥血，殚精竭力，作出了巨大的贡献。他们是人民的功臣、后辈的楷模，是党和军队的宝贵财富。然而，本丛书并不是着重反映他们戎马一生的历史传记，而是针对人物的特点，从一个侧面撷取他们在漫长的革命战争时期和社会主义建设年代最为闪光的、富有传奇特色的轶事和风采。俗话说，“一叶知秋”、“滴水映海”。轶事和风采同样能让人们感悟到，革命前辈们为中华民族的振兴，为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用鲜血与生命谱写的一曲曲感人肺腑的绚丽乐章。

革命的事业是英雄的事业。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全国人民的支持下，人民解放军走过了70个春秋，经历了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从胜利走向胜利的光辉里程，创造了千古不朽的辉煌。70年如一日昭昭于世。在这场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中，值得我们崇敬的革命老前辈们，为世人留下了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贵精神财富。概括起来，即坚定的政治信念，顽强的革命意志，高尚的人生情操，强烈的使命感，高度的责任感，严谨求实的作风，认真科学的态度，无私奉献的精神……。这些，不正是人民军队战无不胜，坚不可摧的基础所在，不正是中华民族威武不屈，富贵不淫，永远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基础所在，不正是今天一代一代革命继承者永志不忘，躬亲实践的精神准则吗！

基于上述思考，在建军70周年的喜庆日子里，我们把这部丛书奉献给广大读者，希望能得到广大群众特别是青少年的喜爱，若诚能如此，我们将感到无比欣慰。

编者

一九九七年七月一日

## 上将风云录

## 王平两度入朝统大军

窦孝鹏

王平（1907～ ）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907年10月12日生于湖北省阳新县。1930年5月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历任连政治指导员，团政治处干事，师教导大队政治委员，团政治处主任、政治委员。参加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和长征。抗日战争时期历任师政治部副主任、军政治委员、八路军政治部组织部科长、中共晋察冀临时省委军事部部长、阜平县县长。后任晋察冀军区第3军分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和中共地委书记、冀中军区政治委员、冀晋军区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和区党委书记。解放战争时期，任北岳军区第二政治委员兼纵队政治委员。后任北岳军区司令员、察哈尔军区司令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干部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动员部部长。1953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政治委员。后任志愿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曾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自由独立勋章。1958年回国，任军事学院政治委员。1975年后，任炮兵政治委员、武汉军区第一政治委员、总后勤部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常务委员、副秘书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曾当选为中共第十一届中央委员。1982、1987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常务委员。1988年7月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

\* \* \* \* \*

### 出任志愿军第20兵团政委

1953年4月，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

首都北京掩映在一片桃红柳绿之中。故宫的红墙被青翠的柏枝陪衬得格外鲜亮。护城河边的柳枝轻拂着粼粼水波，一群鸭子在河中嬉戏。中山公园里的大小花坛，各色花竞相开放，姹紫嫣红，分外娇美。儿童游乐园里，天真活泼的小朋友在尽情地玩耍。在远处的建设工地上，更是一派有序的繁忙景象。年轻的共和国，欣欣向荣，蒸蒸日上。

这是一个天气晴和的上午，华北军区干部部长王平坐着一辆小车，匆匆向位于北海旁边的一座大楼赶去，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彭德怀正等在那里有要事召见他。

1950年10月，彭德怀率中国人民志愿军入朝参加抗美援朝战争，最近战局稍缓，他回国主持中央军委工作，并继续兼任志愿军司令员和政治委员。

到了彭总办公室，王平看到石家庄第二高级步兵学校校长杨勇也在那里。

说起来，他们三人是老上下级关系了。1930年王平刚参加红军，就在彭总领导的红3军团当兵，杨勇也在那一年参加红军。长征途中，他俩都是彭总领导下的团级指挥员，有着同生死共命运的经历；在烽火连天的抗日战场，他们在华北前线和敌后，带领部队与日本侵略者浴血奋战，又共同经历了血与火的考验。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不久，美帝国主义又把侵略战火燃至鸭绿江边。为保家卫国彭总率志愿军抗美援朝去了朝鲜，王平有几年没见到老首长了。

如今，刚从朝鲜前线归来的彭总，虽然脸上又多了一些皱纹，却显得更加睿智和深沉。简单的寒暄过后，彭总便开门见山地说：“召你们来，有件要事同你们商量：经研究，中央军委决定调你们到志愿军第20兵团去工作，杨勇任司令员，王平任政治委员。想听听你们的意见。”

接着，彭德怀简单地分析了一下朝鲜战争的形势说：“现在，双方又恢复了停战谈判，仗不会打很久了。你们再不去，见世见世，怕没有机会了。作为一名高级指挥员，应该接受现代战争的洗礼，积累一点现代战争的经验。20兵团司令员杨成武已调任回国，现在由郑维山在那里代理司令员，张南生政委也另有任用，你们俩去接替他们。”

听了彭老总的谈话，王平和杨勇都非常激动兴奋。作为一名战将，谁不愿意到前线去与敌人拼杀呢！

尤其是王平，他曾经有过一次赴朝参战的机会而未能成为现实。那是1951年4月间，抗美援朝战争正处于紧张阶段，时任察哈尔军区司令员兼察哈尔省人民政府第一副主席的王平，被中央军委任命为东北军区空军政治委员。同时被任命的东北空军司令员是刘震。他们的主要任务是指挥我空军部队入朝作战，夺回我们的制空权，保护我军的交通运输线和后方的安全。华北军区司令员聂荣臻和政委薄一波得知这一任命后，向中央军委反映：华北地区原有的老干部现在或南下，或入朝作战，剩下熟悉情况的人不多了，为了照顾各方面的需要，三平还是留在华北为宜。

军委接受聂、薄的意见，改任王平为华北军区副参谋长兼干部部部长。于是，王平就只好留在了华北，承担了抗美援朝大后方的工作。如今，从彭总那里得知赴朝的任命，真的要上前线了，他简直是喜出望外。像当年接受战斗任务一样，他当即表示：坚决完成中央军委赋予的任务，尽快赶到朝鲜前线去报到。

王平回到军区交代完工作后，于5月3日同杨勇一起到中南海去向彭德怀道别，并请他作指示。彭德怀沉思着说：“没什么新的指示，朝鲜的情况你们自己去了解，不给你们带框框。当前虽说停战谈判已经恢复，但并不是说就此和平了，仗还是要打的，我们什么时候都不能放松警惕。你们20兵团那个地方离前线近，又多是山路，朝鲜的道路状况比较糟，再加上美国飞机经常轰炸，路上很不好走。要选一个有经验的好司机，就相对安全一些。”王平非常感谢彭总对他们的关照，又谈了一时。彭老总和夫人浦安修留他们吃饭，说：“我们有几年不见了，难得一聚。也没什么好东西招待，随便吃一顿午饭，也算是为你们饯行吧！”

5月9日，王平他们乘火车来到鸭绿江畔的安东（今丹东）市。这里是通往朝鲜的咽喉要地，市内大街上人来人往，汽车穿梭，各种待运的军需物资堆得像小山一样。抗美援朝战争爆发以后，这里已成为我志愿军各种战备物资的转运地和补给地。参战部队、支前民工及各种军需补给品，从这里源源不断运往朝鲜前线。这座边陲小城，已成为世人瞩目的英雄城市。

一踏入朝鲜的土地，已经让人感受到浓烈的战争气氛，祖国各地和首都北京那祥和明媚的春天气息在这里丝毫感受不到。美丽的朝鲜三千里江山到处是废墟，很难看到一座较完整的房舍、一条较平坦的公路。

王平坐在吉普车里，紧紧地皱着眉头。吉普车颠颠簸簸地沿着坑洼不平的公路行驶，他的脑子里翻想着这场战争的爆发和发展……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国际形势发生了巨大变化，世界上形成了帝国主

义和社会主义两大阵营，民族民主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运动已成为不可抗拒的历史潮流。妄图称霸世界的美帝国主义极端敌视社会主义国家和人民民主国家，千方百计地进行干涉和破坏，不惜利用一切手段扶植各国反动势力，疯狂颠覆和镇压民族民主革命运动。

与中国和苏联毗邻的朝鲜半岛，具有十分重要的战略地位。为了把这里变成自己的殖民地和进一步进行侵略扩张的桥头堡，美帝国主义背弃了二战中关于使朝鲜自由独立和成立统一的朝鲜政府的协议，于1948年8月在朝鲜南部将李承晚集团扶植上台，成立了“大韩民国政府”，大搞分裂活动和武力扩张。1950年6月25日，朝鲜内战终于爆发。两天后，美国总统杜鲁门发表声明，公开宣布武装入侵朝鲜，并命令其海军第七舰队侵入台湾海峡，霸占我国领土台湾。

接着，美国又进一步大耍花招，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通过非法决议，给美国和其他国家的侵朝军队披上了“联合国军”的外衣，全面发动了侵朝战争。

朝鲜人民和军队在金日成首相的领导和指挥下，不屈服军事大国的压力，英勇奋战，给侵略者以有力的回击，到8月中旬即解放了南朝鲜百分之九十的地区，将美伪军压缩到洛东江以东的狭小地域。美帝国主义为挽回危局，于9月中旬乘朝鲜人民军后方空虚之际，投入7万兵力，在260余艘舰艇和近500架飞机的配合下，在朝鲜西海岸仁川登陆。朝鲜人民军面临腹背受敌的不利形势，被迫转入战略退却。美伪军乘机越过“三八线”，疯狂向中朝边境进犯，并公然频繁出动飞机，轰炸我国东北边境的城市和乡村。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面临危机，我国安全也受到严重威胁。

为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保卫世界和平，应朝鲜政府和人民的请求，党中央和毛主席毅然决定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作战。

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10月19日彭德怀司令员率志愿军入朝，与朝鲜人民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中朝两国军队以运动战形式实施战略反击，连续进行了五次战役，将美李伪军赶回“三八线”附近，迫使美国侵略军接受停战谈判。从1951年6月中旬开始，形成了敌我相持、边打边谈、打打谈谈的局面……王平正想着，忽然路旁“叭叭”传来两声清脆的枪响。司机说，这是防空哨的警报，预示敌人的飞机要来了。他边说边把车开进附近的一个汽车掩体隐蔽起来。

不多时，十几架敌机呼啸着飞了过来，顺着公路嗒嗒嗒地一阵疯狂扫射，投下的炸弹炸得周围腾起一股股烟柱。志愿军的高射炮毫不客气地朝野蛮轰炸的敌机射击。那炮弹出膛如一条火绳飞旋着追向敌机，一架敌机被打中，拖着浓浓的黑烟栽了下去，远远的便是一团火球飞升，其他敌机即仓皇遁逃。

王平走出掩体一看，不远处两栋房舍被炸起了火，一个受伤的朝鲜小女孩伏在躺卧着两个大人身上悲凄地哭喊，那是她刚被炸死的父母亲，那女孩的哭声撕心裂肺。王平在心里牢牢记下了美军欠下的又一笔血债。

傍晚，王平和杨勇赶到了志愿军司令部驻地桧仓。这里，是平壤市西边的一个小镇，与东西海岸差不多是等距。邓华代司令员、杨得志副司令员及政治部李志民主任，对他们的到任表示了热情的欢迎。邓华代司令员告诉他们：“最近——也就是4月26日，中断了一段时间的停战谈判又恢复了。两军代表虽然已坐在停战桌旁，但是，敌人仍叫嚣要在军事上取得全面胜利。为了配合板门店的谈判，促使停战的实现，我军决定反击敌人的叫嚣和疯狂挑衅，对其发起一次夏季反攻作战，你们来得正是时候啊！”

王平当即表示：“我们一定精心组织打好这一仗，作为对朝鲜人民、对全体志愿军指战员的献礼！”

在桧仓住了一天，王平和杨勇即前往20兵团司令部所在地台日里。台日里在桧仓东南方向的淮阳。为了安全和不暴露目标，他们是天黑以后出发，汽车也不开灯，百余公里的距离几乎颠簸开行了一夜。

第20兵团的代司令员郑维山、政委兼政治部主任张南生、参谋长肖文玖、副参谋长赵冠英等领导人，对新任司令员和政委的到来非常高兴，表示了热烈的欢迎，并热情地向他们介绍了部队的情况——第20兵团现在指挥5个军16个师：第67军，军长邱蔚、政委旷伏兆，辖199师、200师、201师；第68军，军长陈仿仁、政委李呈瑞，辖202师、203师、204师；第60军，军长张祖谅、副军长王诚汉，辖179师、180师、181师；第54军，军长丁盛、政委谢明，辖130师、134师、135师；第21军，军长吴咏湘、政委谢福林，辖61师、62师、63师。另外，还有33师。

这5个军中，第67军、68军和第60军是1951年入朝，已有许多在朝作战的经历；第54军和第21军是新近入朝，还未参加过大的战斗。目前，这些部队的指战员的战斗情绪均十分高涨，都盼着能打几个漂亮的胜仗，向祖国人民汇报。

王平听了20兵团的情况介绍，对未来的工作充满了信心。

### 参加夏季反击战

1953年夏季反击战是志愿军转入阵地防御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对敌坚固阵地进攻的战役。双方投入的兵力敌军为18个师，我志愿军为10个军，朝鲜人民军为两个军团。中朝军队发起这次战役的主要目的是配合停战谈判，即争取在对我有利的情况下实现停战。

王平到20兵团以后，原兵团政委张南生已调任志愿军政治部副主任。所以王平立即着手了解战役的政治工作情况。他首先学习了毛泽东主席为夏季反击战确定的方针：“争取停，准备拖。而军队方面则应作拖的打算，只管打，不管谈，不要松劲，一切仍按原计划进行”。

对照毛主席确定的指导方针，王平感到部队中有两个口号提得不够妥当。

一个是“打好最后一仗”。王平认为：现在我们还在谈判，结果如何尚难预料。这个口号有悖于毛主席“应作拖的打算”的指示精神，同时也有一定副作用。一部分干部战士可能会认为这最后一仗，千万可别给自己带来什么不测，争取活着回国。这样对部队作战不利，有消极影响。

另一个口号是“学习黄继光堵枪眼”。王平认为，黄继光堵枪眼是在当时找不到更有效的办法的情况下，为了掩护战友取得战斗胜利，才不惜牺牲自己的生命扑上敌人的枪眼。我们学习黄继光应该强调学习他的不怕牺牲的精神，应该把这精神和钻研战术技术结合起来，把消灭敌人同保存自己结合起来，做一名大智大勇的革命战士。

王平就这两个口号的问题，与有关领导同志和政治部的同志交换了意见，统一了认识，遂向部队发出了纠正的通知。经兵团党委研究确定，以“坚决打，争取停”的指导思想来统一全兵团的行动，使部队弄清打和谈的关系，明确作战部队战斗的胜败直接影响着谈判桌上美方的态度和我方代表说话的

分量，从而把部队关心谈判、渴望和平的心情，转化为积极投入战役行动的动力。

这次反击作战，按中央军委和志愿军司令部的方针，共分三个步骤进行。从1953年5月中旬到6月下旬，20兵团按照志愿军总部“稳扎狠打”、“由小到大”的精神，先后组织两个阶段的进攻作战。

第一阶段作战主要攻占敌前沿的支撑点，以歼灭敌人连以下目标为主。参加这次作战的除第9兵团的23军、24军外，第20兵团的67军和60军作为主力投入了战斗。王平在组织部队进行战斗时，看到有些部队使出了“抓一把”的战术。其主要做法是，突击消灭敌人的一些据点后马上撤兵。王平感到，这样的战斗虽然也消灭了一些敌人，但据点很快又会被敌人抢占回去，成为威胁我们的“钉子”。而且突击分队在回撤途中，往往遭敌炮火轰击，损失很大。这样的打法得不偿失。

王平当即与杨勇司令员研究确定：突击队打下敌人的据点后均须守住，而后派增援部队上去巩固阵地，倘敌人来争夺就坚决消灭他。

当时前来20兵团参观指导的志愿军第3兵团司令员兼东海岸指挥部司令员许世友很赞成这个打法，认为是积极的战法。这一战术在部队推广后，第一阶段作战中取得了较好的效果。5月13~26日，67军和60军共进行了19次反击作战，毙伤和俘敌3000多人。

第二阶段为反击作战。6月1日，志愿军首长决定，这一阶段将原定的以打击美军及其他侵略军为重点的作战计划改为以打击李承晚伪军为主。

根据这一指示，杨勇和王平共同主持召开第20兵团的作战会议，对反击作战计划重新进行研究部署，决定集中力量打击位于北汉江两侧的李伪军第8和第5两个师，诱使敌人从纵深机动两个师以上的兵力进行反扑，继而将其歼灭之。

第20兵团的计划得到了志愿军总部的批准，为了配合他们的作战，总部特别抽调炮兵第7师第20团转隶第60军，炮兵第2师第29团加强第67军。

王平和杨勇在指挥部里密切关注着战局进展情况。

第60军的进攻重点选择在北汉江以东的883.7高地一线。6月10日晚，在王诚汉副军长的指挥下，259门火炮齐发，爆炸的火光映红了整个山头，震得大地似乎都在颤抖。进攻部队的三个团采取多路多梯队的方式，从东、北两个方向发起进攻。战士们呼喊朝山上冲去，以甩出的手榴弹开路，接近敌人就拼刺刀，经过50分钟的激战，全歼守敌一个团。他们首创了自阵地战以来一次攻坚就消灭敌人一个整团的范例。

敌人不甘心失败，先后派出李伪军第5师和预备队伪第3师进行反扑。从6月11~14日共反扑190余次，每每遭败绩被击退。14日晚，我军60军在第68军一个团的配合下，主动出击，向西南949.2高地和水洞里等地发起猛烈进攻，至15日上午8时，占领了李伪第5师两个团的阵地，消灭了阵地上大部分敌人。第60军在这次反击作战中共毙伤俘敌约1.5万人，取得了很大的胜利。

第20兵团的另一个军第67军，于6月12日晚，受命以3个团的兵力，由300门火炮、8辆坦克支援，向李伪第8师第21团据守的被称为“首都高地”和“京畿堡垒”的“模范阵地”座首洞南山（十字架山）发起进攻。

这个被敌人吹嘘得神乎其神的“模范阵地”实在是一只不堪一击的纸老虎。67军发起进攻后，经过一个半小时的激战，即全部占领了敌表面阵地，



歼敌大部。剩下的一部分敌人龟缩进了坑道，我志愿军正好来个“堵洞捉鼠。”战士们逐洞扫除，这帮残敌只得一个个举枪投降。到 13 日上午战斗全部结束。接着，他们又连续击退李伪第 8 师第二梯队的 50 多次反扑。14 日，我第 67 军又乘机扩大战果，全部占领了李伪第 8 师龙虎洞以北阵地，共毙伤俘敌 1.35 万余人。

在第二阶段的反击作战中，20 兵团连同兄弟部队，在北汉江两侧占领了敌人 3 个团的正面 12 公里、纵深 3~6 公里的防御阵地，给停战谈判的我方以强有力的支持，迫使美方不得不坐下来，拿出点儿诚意。

### 取得金城战役的胜利

正当停战谈判全部达成协议准备签字之际，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在美国唆使纵容下，竟公然破坏协议，以“就地释放”为名，强迫扣留了朝鲜人民军被俘人员 2.7 万余人，严重违反关于战俘遣返的协议，狂妄地叫嚣“反对朝鲜停战”，不知死活地甚至想“单独干”和“向北进攻，统一全国”等，企图阻挠停战的实现。

李承晚集团的这一公然破坏遣俘协议的行为，激起了中朝人民和世界爱好和平人民的极大愤慨。

王平气忿地说：“我看他们还是欠揍！”

鉴于这一形势，6 月 19 日，毛泽东主席指出：“我们必须在行动上有重大的表示方能配合形势，给敌人以充分压力，使类似事件不再发生，并便于我方掌握主动。”这时，彭德怀已从国内返回朝鲜，他根据毛主席的指示，于 6 月 20 日晚向毛主席发电、建议推迟停战协议签字的时间，以便再给李伪军以严厉打击，消灭他一万五千人。毛主席同意了这一建议，并指出：“再歼灭伪军万余人极为必要”。志愿军首长很快向各兵团传达了毛主席的这一指示，并决定立即组织夏季反击战的第三次行动——金城战役。

当时，在我第 20 兵团正面的金城以南，西起金化，东至北汉江有李伪军 4 个师的防御阵地向北突进我方防线，若不消灭这个突出部的敌人，将给我军留下隐患。从敌我态势来看，敌原在北汉江两侧的防御体系经我两次打击，已被破坏殆尽，敌阵地已处于我三面包围之中，形势对我极为有利。第 20 兵团的 4 个军已集结于金城地区，并配有近 400 门山野炮，兵力上占有优势。为此，第 20 兵团党委经反复研究，于 6 月 23 日作出决定，以本兵团的 5 个军为主发起金城战役，歼灭金城以南的敌军，迫使敌方在停战桌上就范。

6 月 25 日，志愿军首长批准了第 20 兵团的这一计划，并指示 20 兵团放手作战，倘反击成功，情况有利时，可继续向敌纵深作有限度的扩张。同时指示，其他正面各军，在此期间只作进攻准备，基本采取守势，若敌进攻即坚决歼灭之。

杨勇和王平接受任务后，立即动员部队进行战役准备。志愿军总部为了保证这一作战的胜利，特地给第 20 兵团加强配属，拨炮兵第 2 师 28 团及 30 团的一个营、火箭炮兵第 201 团、高射炮兵第 601 团、反坦克炮兵 3 个连、工程兵 4 个营参加战役，使金城正面我军各种地面火炮达到 1100 余门。

志愿军后勤司令部派吴先恩副司令组成前方指挥所，调集 10 个汽车团赶运 1.5 万余吨的作战物资至前线，其中炮弹 70 万发、炸药 124 吨。为了使后勤供应及时畅通，第 20 兵团还派出 13 个步兵团，赶修了战场运输道路。

6月22日，王平主持召开了兵团党委会议，统一作战指导思想，研究战役部署，7月上旬，他又主持召开了全兵团师以上干部会议。王平在会上着重讲了金城反击作战的目的和意义。他说：“抗美援朝战争我们已经打了近三年，敌人现在面临彻底失败的命运，但是他们又不甘心自己的失败。所以现在只有狠狠地打，他们才能俯首在停战协议上签字。这次，我们着力打击的主要目标，就是李承晚集团叫嚷要‘单独干’最凶的顽固派第2军团的第6师、第8师、第3师和伪首都师。这几个师密集地摆在我正面的突出部位。此外，在我们周围如抱川、华川和春川等地还有敌预备队美军第2师、空降第187团和李伪军第11师。敌人在其空军基地和航空母舰上还有千余架飞机，可能随时出动。所以我们不可掉以轻心。”

接着王平分析了我方的有利和不利条件，指出：“我军的进攻地带全是山地，有的地方山势陡峭，敌人占有居高临下的优势；中间还有北汉江和金城川两条河流，水流湍急，于我前进很不利。再加上敌人的阵地前沿大都设了三道乃至十几道的铁丝网，网前还埋设了大量地雷，这给我们进攻均造成很多困难。特别是现在正逢炎热多雨季节，宜守不宜攻，这些都是对我们不利的。但是，从兵力和火力上看，敌我兵力的对比为1：3，火力对比为1：1.7，我们占有绝对优势。只要我们认真组织，密切协同，发扬勇敢顽强、不怕牺牲的精神，我们一定能取得完全的胜利。”

王平政委讲完后，杨勇司令员讲了这次战役的具体方案。

第20兵团拟以5个军组成西、中、东3个作战集团，从三个方向上突破敌人的防御。

西集团以第68军(欠202师)和第54军130师组成，加强炮兵16个营、高射炮兵1个团两个营和坦克、工程兵分队，由外也洞、灰古介地段突破敌人防御，向月峰山和梨实洞方向发展进攻。

中集团由第67军、第54军135师、第68军202师组成，加强炮兵12个营、高射炮兵1个团4个营和坦克、工程兵分队，从轿岩山和官垈里地段突破敌人防御，向梨船洞方向发展进攻。

东集团由第60军和第21军组成，加强炮兵3个营，高射炮兵两个营和工程兵分队，第60军在松室里等地突破敌人防御，向广大洞、细岷里方向发展进攻；第21军以巩固北汉江以东阵地为主，并有选择地对敌阵地发起进攻，以牵制当面之敌，不使其西调增援，保障主力左翼安全。

以第54军一个师为兵团预备队。

王平布置完战斗任务后，即带着几个人到参战部队去检查工作，看到的情形使他很满意。各参战部队以这次战役的意义和目的为内容，进行了深入的思想动员。指战员们纷纷表决心，写请战书，表示一定按上级的部署打好这一仗。指战员争先恐后地要求上第一线，当突击队员，连一些女医务人员也纷纷要求到火线上杀敌和抢救伤病员。各部队的战旗上签满了战士们名字，人人宣誓要发扬不怕牺牲的精神，为打败美、李伪军，为中朝人民的胜利战斗到最后。

各部队在政治动员的基础上，广泛开展了军事民主，发动广大指战员“提困难，想办法”，“出情况，想对策”，并针对敌人的阵地防御情况进行模拟演练，不断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战士们决心做到：打则必歼，攻则必克，守则必固，定获全胜！

7月13日黄昏以后，天空浓云密布，响了几声闷雷，像是山雨欲来。在

第 20 兵团指挥部里，人们焦急地等待着总攻的命令。杨勇司令员和王平政委对了一下手表，21 点，然后一声令下：“开始！”

霎时，在第 20 兵团 25 公里宽的正面，千余门大炮齐声怒吼，犹如山崩地裂，一串串仇恨的炮弹裹着火花划破漆黑的夜空，冰雹似地砸在敌人阵地上；火箭炮的齐射，更如雷电当空，顿时使敌人的阵地变成一片火海。第 20 兵团 3 个集团第一梯队的勇士们呐喊着向敌阵地冲去，如摧枯拉朽之势，仅用一个小时即将敌前沿阵地突破，并向纵深推进。

敌人在我军的突然打击下，惊惶失措，指挥瘫痪，部队失去控制，争先恐后向南逃窜。我突击部队乘胜追击，向敌纵深勇猛穿插。

中集团突破敌阵地后，向轿岩山的李伪军第 199 师展开进攻，经过 12 个多小时的激战，终于把红旗插到了主峰 768.7 高地。我第 200 师歼灭了官垌里西南高地敌一个营后，沿金城至华川的公路追击，于 14 日 6 时占领了龙渊里、东山里，威胁轿岩山和烽火山两侧敌后，敌人发生动摇。

西集团第 203 师兵分八路，向栗洞和直木洞南山及 522.1 高地以北无名高地同时发起冲击。歼敌一个营后，师主力即向芳通里方向发起进攻。该师担任穿插任务的第 609 团 1 营在副团长赵仁虎的率领下，于 14 日 2 时沿公路直插二青洞附近。其先头分队是配属的第 607 团侦察排一个班。他们在副排长杨育才指挥下，化装成李伪军，出敌不意打入其核心部位，消灭了伪首都师第 1 团（即白虎团）团部，击毙敌团长以下 54 人，活捉 19 人，缴获了“白虎团”团旗。战后杨育才荣立特等功，并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这就是人们熟知的革命现代京剧及电影《奇袭白虎团》的原型。由于敌团部被消灭，其部队则争相溃逃，均被歼灭；我部趁夜色的掩护，又消灭了敌团部附近的美军第 555 榴炮营大部 and 乘车来援的李伪首都师机甲团一个营，击毙敌团长陆根洙。至 14 日 6 时，我第 203 师已占领了芳通里、梨实洞、北亭岭、下榛岫一线以北地区。第 204 师兵分五路突破敌前沿后，三面包围了 552.8 高地。他们打得很机智，先用炮兵对敌阵地进行了三次急袭，然后突然向前伸延，步兵佯装冲击，喊“杀”声四起。敌以为我步兵已冲上来，慌忙爬出工事，此时我炮兵即转向敌群轰击，迅速歼其一个营。第 204 师第 601 团又在月峰山歼敌一个连，生擒了李伪首都师副师长林益淳。我第 130 师在攻占 424.2 高地和烽火山后，西集团遂转为防御，打敌增援反扑。

东集团因准备时间不足，进攻正面窄狭，又是横越山脊进攻，突破后进展较慢，至 14 日 6 时仅占领北汉江以西文里至 472.3 高地一线。

到 14 日拂晓，我军在正面的西段和中段已突破了李伪首都师与 6 师左翼的基本阵地。敌人为堵塞缺口，急调美第 3 师到岫峰、三天峰布防，并向我实施反扑，同时还以美空军第 178 团接替李伪第 9 师部分阵地，使其防务向东延伸。

杨勇和王平等第 20 兵团领导鉴于金城以西的敌基本阵地已被我突破，遂命西集团向月峰山进攻，中集团坚决拿下轿岩山，东集团迅速占领 585.2 高地和细岫里。

14 日这天，天降大雨，敌空军不能出动，我军乘此有利时机，不停顿地发动进攻。

中集团第 200 师向南疾进，由龙渊里、东山里分路涉过金城川，乘敌混乱撤退之际占领了梨船洞。第 199 师于 10 时许全部占领轿岩山，歼敌大部。在攻占轿岩山的战斗中，该师第 595 团 1 连战士李家发以负伤七处的身躯堵

住敌机枪工事的射孔，为部队打开了冲锋道路。谱写了又一曲黄继光式的英雄篇章，战后被授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英雄称号。

西集团于 17 时许先后占领了烽火山和月峰山。

东集团于 12 时占领 585.2 高地。继而一部西渡金城川，在梨船洞与中集团会合；另一部攻占了金城川与北汉江汇合处的 461.9 高地。

至此，战役的第一步任务已全部完成。

志愿军首长鉴于战役的第一步发展顺利，为贯彻“稳扎狠打”的指导方针，巩固既得阵地，于 14 日 17 时电令第 20 兵团：以主力控制现占领线，迅速构筑工事，修通道路，抢运弹药等物资，推进炮兵阵地，准备粉碎敌之反扑；再以若干有力支队，乘敌混乱之际，分别向南发展。

根据电令，杨勇、王平遂命各集团尽速肃清周围残敌，巩固已占阵地，以有力支队（不少于一个团）继续扩张战果，向南占领有利阵地。

接到命令后，东集团于 14 日夜即以第 180 师南渡金城川，向南发展，至 16 日相继占领了黑云吐岭、1118 高地、白岩山以及东至北汉江一线的阵地，将我军阵地向南推进了 8 公里，对李伪第 2 兵团防区构成严重威胁。中集团于 14 日夜以第 135 师向前发展，于 15 日占领了 602.2 高地以南无名高地及后洞里。西集团和第 24 军于 15 日击退美第 3 师及李伪首都师残部两个营在 20 多辆战车、130 余架次飞机和强大炮火配合下的 21 次反扑后，也将阵地推进到新木洞、间榛岫公路北侧。至此，我军完成了全部的进攻任务。

这时，由于连日大雨不止，道路泥泞，河水暴涨，金城川的桥梁又全部被敌机炸毁，运输供应受阻，炮兵部队前运遇到很大困难，加之敌战役预备队李伪第 11 师、第 7 师已调近战场，第 20 兵团遂决定转入防御，准备抗击敌人反扑，在反击中予敌人以更大的杀伤和毁灭性打击。

各部队接到第 20 兵团领导的指示后，立即动员机关人员和朝鲜群众一起，冒着敌机的轰炸和扫射，不顾一切，不分昼夜，抢修被炸坏和被冲坏的道路桥梁。河川里尽是淤泥，车辆难于开进，抢修人员便在泥水中边垫石头边推车，终于抢在敌人反扑之前，将大炮和“卡秋莎”火箭炮及大量弹药运到了前线。

敌人在遭我沉重打击后，上下一片慌乱。14 日，美第 8 集团军司令泰勒和李承晚集团国防部部长孙连一慌忙赶到前线督战。16 日，“联合国军”司令克拉克也从日本东京飞到金城前线，召集各军师头目进行策划。他气急败坏地叫嚷，要“发动两年来最大的反攻”，以夺回金城以南的失地。当晚，克拉克又窜到汉城会见李承晚，互相指责金城作战不利。第二天，李承晚便亲自出马，来到金城前线为他的残兵败将撑腰打气。

随即，敌人纠集了美军第 3 师与李伪军第 5、第 7、第 9、第 11 师，加之原第 3、第 6、第 8 师的残部，共约 6 个师的兵力，向我反扑。

17 日，敌人集中 6 个团的兵力，在百余架次飞机和炮兵的支援下，向第 20 兵团东集团防地发起猛攻。志愿军勇士们依托阵地，与敌激战竟日，毙伤敌 3000 余人。除 867 高地失守外，其余阵地岿然不动。

几乎在同时，美第 2 师约一个团的兵力，在强大炮火及 20 余辆坦克和 121 架次飞机的配合下，向西集团月峰山阵地展开猛烈反扑。守卫月峰山的第 610 团的勇士们发扬英勇奋战，不怕牺牲的精神顽强抗击，反复冲杀，歼敌 920 余名，击毁坦克两辆，打退了敌人的进攻。

从 18 日起，敌人反扑的重点转向中集团正面的 602.2 高地和巨里室北山一线阵地。敌先后以 1~3 个团的兵力，在 480 多架次飞机和 30 多辆坦克与猛烈炮火的掩护下，连续发动猛攻。我军依托有利地形和既设阵地，步炮密切协同，给予敌人以极大杀伤，终于打退了敌人的反扑。

此后，敌人虽仍有多次反扑进攻，但在英雄的志愿军面前，终未得逞。到 7 月 27 日我共击退敌人从一个连到两个团的反扑达千余次，给予敌人沉重打击，胜利结束了金城战役。

金城反击战役，历时 15 天。我志愿军共毙伤敌 7.8 万余人，其中第 20 兵团歼敌 5.288 万人，击毁击伤敌机 250 余架，缴获坦克 45 辆、汽车 279 辆、飞机 1 架、各种火炮 423 门，枪 6600 余支，收复土地 178 平方公里。

### 迫使敌人接受停战

我军作战的胜利，迫使敌人向我方作出了实施停战协定的具体保证。7 月 22 日，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国务卿杜勒斯和南朝鲜的李承晚相继发表声明，表示愿意接受停战。

7 月 27 日 10 时，敌我双方代表在板门店正式签署了停战协定，朝鲜人民军最高司令官金日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彭德怀和“联合国军”总司令、美国的克拉克分别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宣布从当日 22 时起朝鲜全线停火。至此，进行了将近三年的抗美援朝战争胜利结束。而金城反击战役果真成了抗美援朝战争的最后一场恶仗。

板门店停战协定签字以后，王平去志愿军司令部专门向彭德怀司令员汇报了第 20 兵团参加金城反击战役的详细情况。彭老总很高兴地说：“这一仗打得很好，取得了很大的胜利。要是能多抓点俘虏就更好了。”

侵朝美军总司令克拉克上将则发出了这样的哀叹：“在执行我国政府的训令中，我获得了一个不值得羡慕的声誉，那就是我成了美国历史上第一个在没有胜利的停战协议上签字的司令官。我感到一种失望的痛苦。”就连美军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布雷德利也不得不承认，同中国进行的这场战争，“是在错误的时间和错误的地点进行的一场错误的战争。”

有人说，第 20 兵团在金城反击战役中取得的胜利，是杨勇和王平在志愿军的任职上，为新中国和祖国人民献上的一份厚礼。王平摇头说：“这场战役的胜利，完全是党中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英明领导和决策的结果，是志愿军首长和彭总正确指挥的结果。是祖国人民和朝鲜人民全力支援、中朝两国人民并肩战斗所取得的；是参战部队广大指战员不怕流血牺牲、英勇奋战所取得的。我自己只做了一点具体的工作，而且做得很不够。今后要不断进行学习 and 总结，以便把工作做得更好。”

王平说的是心里话。

### 组建总参动员部

1955 年 3 月下旬，王平从朝鲜回国参加中国共产党全国代表大会。这次会议非常重要。会议讨论和通过了《关于我国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草案）的决议》、《关于高岗、饶漱石反党联盟的决议》和《关于成立党的中央和地方监察委员会的决议》等。

党代会结束后，总政治部通知王平先不要急于回朝鲜。接着，总政治部主任罗荣桓找他谈话，准备调他到总参动员部任部长。

原来，军委最近决定将总参人民武装部更名为总参动员部，负责武装力量的动员工作，组织训练预备役兵员，领导兵役机关和人民武装工作。此外，由总参军务部和人民武装部各抽两个业务处作基础，成立总参队列部，负责兵员的征集、补充、复员等工作。

军人以服从命令为天职。5月6日王平即至总参谋部报到，总参谋长粟裕跟他谈了话，原人民武装部部长傅秋涛改任总参队列部部长，他与王平进行了交接，向他介绍了有关情况。

动员部是总参谋部新成立的一个部门，没有现成的业务程序、工作制度和经验可借鉴，对王平来说，一切都得从头抓起。

武装力量的动员，需要制定和实施多项计划，其中有动员扩充计划、兵员及运输工具和牵引力的补充计划、军队的物资保障计划等等。动员部门要根据国家的战略方针、对敌情的判断和未来的作战意图，制定出符合我国国情与军情的武装力量动员计划及其保证落实的措施。一旦战争爆发，保证军队在原有基础上按照预定计划，迅速转变为战时编制与组织，并新建起足以保证战争需要的兵团、部队和领率机关。这便是成立动员部的初始考虑。

动员部成立以后，王平即着手筹备召开全军动员工作会议，以便把这项工作很快推开会。

1955年9月19日至10月11日，全军动员工作会议在北京召开。各军区、各军兵种司令部的动员处长、统计科长，各省（自治区）兵役局局长、统计科长及总直有关方面人员共119人参加了会议。粟裕总参谋长和张爱萍副参谋长讲了话，王平作工作报告，总干部部和训练总监部的领导分别作关于预备役军官工作和预备役训练工作问题的报告。

这次会议是我军建军以来第一次专门研究动员工作的会议，它为做好我军现代化建设中的动员工作奠定了初步基础。

为了使武装力量动员工作形成比较完整的章法和制度，需要借鉴外国的先进经验。于是，党中央和国务院决定，派一个由地方和军队人员组成的代表团去苏联参观学习。

1955年10月中旬，代表团组成出发。国家计划委员会副主任顾卓新任团长，副团长是王平、邱会作与安东，代表团成员除军队代表外，还有国务院有关部委的同志。

代表团到苏联后，先在苏军总参谋部参观学习了一个月，由苏联有关方面的领导分别授课，然后到总参谋部属下的兵役部门以及莫斯科、列宁格勒、斯大林格勒、加里宁格勒、乌拉尔、伊利亚等地参观学习。

经过这次参观学习，总的认识是，苏联的武装力量动员工作搞得较为出色，在反法西斯卫国战争的艰苦环境中经受了严峻的考验。战后经进一步总结完善，形成了一整套完备的行之有效的规章制度。这项工作总的由苏联国防部领导，国防部内主要由总参谋部负责。总参谋部内担负动员工作的部门有：组织编制部、装备计划部、动员部、军事交通部。苏军的其他各总部，如总干部部、总政治部、总后勤部、总财务部，都专设有动员工作的领导机构。苏联政府各部，除外交部、司法部外，也都设有动员工作机构。他们在兵役工作方面投入较大的力量，兵役部门组织健全，权力也很大。

经过两个月的参观学习，王平大开眼界，学到了许多东西，受到很大启

发。从苏联回来后，他向军委和总部的有关领导汇报了参观学习的情况，并谈了自己的想法。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指示：要及早建立起我军的动员工作制度，争取在 1957 年拟制出第一个全国武装力量动员计划。

根据军委领导的指示，参照苏联动员工作的经验，王平组织人员草拟了《国务院关于地方各级国家行政机关兵役委员会的组织和任务的规定》，经国务院全体会议讨论通过，颁发全国、全军执行。继而，他又组织拟定了《动员工作条例（草稿）》、《兵役工作条例（草稿）》、《预备役军士和兵登记、统计暂行办法（草案）》、《运输工具和工程建筑机械动员征购条例（草稿）》等等。还研究制定了《总参动员部工作职责（草案）》、《军区率领机关在动员工作方面的任务和各军兵种司令部动员处工作职责（草案）》、《省兵役局工作职责（草案）》等等。这些基本法规和制度的建立，解决了动员工作于什么和怎么干的问题，使动员工作初步走上了轨道。

制定了编制体制和工作制度以后，下一个重要问题就是训练培养作动员工作的干部，尽快提高他们的素质与工作能力，使其成为这方面的内行。

为此，在王平的建议和筹划下，总参谋部于 1956 年 6 月，采取以会代训的办法，用一个月时间，对全军的动员干部进行集训。参加人员主要有各大单位的动员处长、装备计划处长，各省市的兵役局长及各省市自治区、各军区兵役局组织动员科长、牵引力统计动员科长等共 188 人。王平在集训会上介绍了在苏联参观学习这方面工作的情况与体会，作“关于我国武装力量动员工作的几个问题”的报告，并领导参会人员研究讨论对几个工作条例的修改意见，布置了今后的工作任务。

总部的集训结束以后，受训人员回到各单位，也都根据本单位的具体情况，分别开办各种类型的动员工作干部和兵役工作干部集训班，使从事这项工作的干部素质与工作能力有了普遍提高，为搞好动员工作打下了比较牢固的基础。

## 二次入朝

1957 年春节刚过，北方大地覆盖着厚厚的积雪，这正是一年中最冷的季节。王平接到调令再次入朝，担任志愿军领导工作。自北京出发前，总政领导找他谈话说：“军委研究决定，调志愿军政治委员李志民同志回国，任高等军事学院政治委员，由你去接替李志民的职务。”

就这样，王平在回国两年之后，第二次踏上朝鲜的土地。李志民离任返国后，王平继任中国人民志愿军政治委员，这是志愿军的第四任，也是最后一任政治委员（首任由彭德怀司令员兼，第二任由邓华司令员兼，第三任由李志民）。志愿军司令员是他的老搭档、老战友杨勇。

在朝鲜停战以后，许多志愿军部队在胜利完成自己的战斗任务后，已陆续奉命离朝回国。现仍留在朝鲜的志愿军还有 5 个军、两个兵团的架子。第 9 兵团副司令员先为曾思玉，后为张天云，辖第 16 军、第 23 军；第 20 兵团副司令员是孙继光，参谋长欧阳家祥，辖第 21 军、第 54 军；另有第 1 军，直属志愿军总部领导。

朝鲜停战以后，志愿军总的任务可以概括为两条：一是加强战备，提高警惕，坚决维护朝鲜停战协定，随时准备粉碎敌人可能发动的突然袭击和侵犯，保卫和平，保卫中朝两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二是协助朝鲜人民进行经

济恢复和建设工作的，为朝鲜人民重建家园贡献力量，不断增强两国人民的战斗友谊。

呈现在王平眼前的，是他熟悉的山，熟悉的水。他和他的战友们曾为这块土地流过汗，洒过血。这里的一切他都感到分外亲切。如今，战争的硝烟已经渐渐退去，人民群众正在战争过后的废墟上营造自己的生活。尽管此时大雪和严寒正笼罩着朝鲜的三千里江山，但王平感到一切都正在复苏之中，已经可以听到春天轻轻的脚步声。人民向往和平，热爱和平，厌恶战争，尤其憎恨侵略战争。和平对勤劳善良的人民太珍贵了，它具有强大的无限的生命力。而侵略者在它的侵略称霸野心未能实现以前，永远不会甘心自动退出历史舞台，总是伺机妄动，向人民大众寻衅，炫耀武力。

朝鲜停战以后，在停战协议上签了字的美国，仍然在不断制造紧张局势，违反停战协定的事件屡屡发生。美方制造种种障碍，反对协商从朝鲜撤退一切外国军队，反对和平解决朝鲜问题，妄图继续霸占朝鲜，使这里成为它扩张侵略的基地。美方不断从空中和地面越过军事分界线，对中朝方面进行挑衅活动。据统计，从1953年7月27日正式停战后的五年间，这种挑衅活动达792起。

对美方这种违反和破坏停战协定的行为，中朝方面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一方面，不断从政治上、舆论上揭露美方的侵略野心和本质，把它破坏停战，制造事端的野蛮行径暴露在世界爱好和平的人民面前；另一方面，在军事上提高警惕，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对付美李伪军的一切军事挑衅行动。

王平以为在战场上指挥拼杀的担子重；停战以后，维护和平工作的担子更沉。这是几千万朝鲜人民和上百万志愿军战士经过数载浴血奋战换来的和平局面啊，绝不能让侵略者再给它涂上血腥的印记。为此，他在严密注视敌方动静的时候，指示、督促各部队严加戒备，修筑好阵地前的堑壕、坑道等各种防御工事，教育部队绝不能产生任何麻痹大意的思想。据后来的统计，在志愿军撤军前仅修筑的坑道就达1250公里，挖各种堑壕和交通沟6240公里，所修的10万地堡出土6000多万立方米。如果将这些被挖出的土堆成宽高各1米的长堤，可以绕地球一圈半。人们把这宏伟的防御工事称为“当代地下长城”。

正是由于我们作了两手准备，进行了不断的斗争，加上世界爱好和平的各国人民的支持，才使朝鲜停战保持了相对稳定的局面。

作为志愿军的主要领导人，王平在协助杨勇司令员指挥部队加强战备、维护和严格履行停战协定的同时，还把帮助朝鲜人民医治战争创伤、重建民主朝鲜当作自己义不容辞的责任，领导部队以强烈的责任心和高涨的热情，积极投入了朝鲜的各项建设工作之中。

在接近前沿的地区，敌人曾经埋下许多地雷、定时炸弹等隐蔽爆炸物，时不时炸伤因战争逃离，而今返乡的老百姓。为此，他们部署志愿军的工兵部队组成排雷队，逐个清除这些危险物，然后帮助朝鲜老百姓平整土地、修盖房舍，使他们尽快恢复生产，安居乐业。志愿军战士们把驻地当成自己的第二家乡，提出了“保证不荒一亩田”的口号，帮助朝鲜人民耕地、插秧、送粪、锄草、收割，实行“包种、包收、包运、包藏”的一条龙服务。在去过弹坑累累的土地上，很快长出了绿油油的禾苗，黄灿灿的稻谷。

战争期间，敌人十分惧怕志愿军那“打不断、炸不烂的钢铁运输线”，日夜派飞机对我方的铁路和公路运输线进行狂轰滥炸，使朝鲜的交通设施遭



到极大的破坏。现在，朝鲜人民要进行和平建设，作为经济建设的“先行官”的交通就显得尤为重要。为此，杨勇、王平安排志愿军的铁道部队和工兵部队，全力帮助朝鲜人民修复铁路公路设施，前后重建和新建铁路桥梁 300 多座、公路桥梁 3000 多座，迅速恢复了朝鲜北方的铁路公路运输。

他们应朝鲜政府的要求，派出工程兵和其他部队，投入了对平壤、咸兴、元山等重要城市的重建工作，担负了各种办公大楼、邮电通信、医院、学校等重点工程的大规模建设。战士们用满腔热情忘我劳动，为这几个城市增光添彩，描绿画红，受到了朝鲜各级领导和人民群众的普遍赞扬。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朝鲜是以生产水稻为主的国家，离了水农业生产将受到严重影响。农民家庭出身的杨勇、王平深深懂得这一点。为此，他们组织志愿军指战员，派出工程技术人员，帮助朝鲜人民突击修复了被敌人破坏的见龙、泰川等八个水库，还修建了平南灌溉工程、胜湖里灌溉工程等大型水利设施，使干涸的农田得到及时浇灌，农业生产很快得到恢复。据统计，在停战后的五年多时间里，志愿军帮助朝鲜人民修建的各种堤坝共 4096 条，长达 430 公里；修筑的大小水渠 2595 条，长达 1200 多公里，为农业生产的恢复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三年抗美援朝，饱受战乱创伤的朝鲜人民大多流离失所，疾患丛生；医疗卫生机构和设施也遭到极大破坏，朝鲜人民缺医少药达到了极为严重的程度。为尽速改变这种情况，志愿军首长决定派出部队医务人员，深入到广大群众之中，为他们送医送药，医伤治病，预防疫情。几年来，志愿军的白衣战士共为朝鲜群众治病 188 万多人次。有的人把自己的鲜血献给了病重的异国兄弟姊妹，有的人在茅草屋里安全接生了新一代朝鲜公民，有的人把自己舍不得吃的来自祖国的慰问品送给了需要营养的朝鲜百姓。

走出山洞的难民需要住房，被炸成废墟的村庄需要恢复，志愿军首长便派出部队，伐木割草，打坯烧砖，帮助朝鲜老乡盖起民房 4.5 万多间，植树 3600 多万棵，昔日被炸弹炸秃的道路两旁，村前屋后，又有了片片绿荫。

朝鲜人民不愧为英雄的人民，他们在朝鲜劳动党和金日成首相的领导下，全力以赴地投入了恢复家园、重建共和国的战斗，到处是一片繁忙的景象。王平到各部队检查工作时看到，一些城市已按照新的规划，修起了宽阔整齐的街道，街道两旁商店林立，各种建筑群错落有致，工厂里马达轰鸣，街市上人头涌动，人人都在争分夺秒地忙碌着；昔日田野里的弹坑已经不见了，经过农民们勤劳的双手，片片良田一眼望不到边。王平高兴地对随同的朝鲜同志说：“咱们一手拿枪，一手拿镐，能打败美国侵略者，也一定能建设好我们共同的家园！”

### 抓好停战后的政治思想工作

王平参加革命以后，长期从事部队政治工作，先后担任过团级、师级、军级、兵团级的政治委员，所以对政治工作有着特别的执著与经验。第二次入朝后，他敏锐的发现，面对变化了的客观环境，部队的政治思想出现了一些新的情况。

停战以前，指战员一切为了打仗，一心想的是如何消灭敌人，思想比较单纯。停战以后，各方面的条件有了改善，在和平气氛的包围中，有些指战员放松了思想上紧绷的“弦”，出现了思想上的自由主义苗头和生活上追求

享乐的倾向，考虑自己的问题多了，工作的积极性受到了影响。

部队长期在国外执行作战和战备任务，并且头戴胜利者的光环，在这种情况下，如何对待朝鲜的党政军领导，如何处理与朝鲜人民军的关系，如何看待我们对朝鲜的援助，如何看待我们所取得的胜利等等，对这些极为重要的问题若认识不清，处理不当，就会影响到中朝两党、两国和两国军队之间的关系。而且也有些事实证明，部分干部战士对这些问题确实认识模糊，做法欠妥。

还有些部队对纪律的要求有所放松，认为“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在国外的环境中应有所不同，因而出现了一些问题的苗头。

有一次，有人向王平反映，志愿军有大国主义的思想表现。他举例说，1956年志愿军团以上干部集中到平壤市进行授衔仪式，结果千余辆小车开进城里，堵塞了市内的交通。全平壤市的交通警察也指挥不灵了，有的人根本不听朝鲜交警的指挥。最后不得不调来戴着红袖标的志愿军指挥，才疏通了堵塞的道路。当时有人就说：“志愿军把平壤市军管了！”影响很不好。朝鲜同志虽然采取了克制的态度，但此事造成的不良影响我们却不能小视。

不久，又接连发生了几件事，使王平感到震惊。

一次，朝鲜政府的几位领导同志外出视察检查工作，路过一处风景名胜区，想顺便进去看一下。但这个风景名胜区当时在中国人民志愿军某部的警戒区内，结果那几位朝鲜领导被站岗的志愿军哨兵挡住，没有去成。

王平接到报告后，极为惊诧不安，深觉自愧。这是朝鲜的国土啊，怎么能够因为是我们的临时警戒区，而拒绝朝鲜的国家领导人前往呢？我们的哨兵大缺乏政治头脑了。但这责任应由我们领导来负，对部队的国际主义教育不深入，不能责怪战士，他感到自己的责任更大。

为了处理好这件事，王平严肃地批评了驻当地志愿军的领导，并亲自去向朝鲜政府有关领导赔礼道歉，并作了自我批评。朝鲜政府领导同志姿态很高，很通情达理，他们说：“这件事我们事先没有进行联系，志愿军战士严格执行警戒规定是对的，不要批评他们！”但作为志愿军政治委员的王平却想得更深：倘若是中国领导人来此，哨兵敢有那样的行为吗？说到底，还是大国主义思想在作祟。这种思想对在国外执行任务的志愿军来说，是危害极大的，必须彻底清除。

接着，又发生了一件更叫人震惊的事，使志愿军的形象受到严重的伤害。某部一个排长胆大妄为，生活腐化，乘人不注意，污辱了一位朝鲜妇女，而这位朝鲜妇女竟是朝鲜政府一位副部长级干部的夫人。

对这件事大家议论纷纷。有的说：这个排长道德败坏，不顾国际影响，给志愿军脸上抹黑，极大地损害了志愿军的声誉，必须从严处理。有的说：这样的排长像是李自成的农民军，战场上还是那么回事。仗不打了，却经不起和平环境的考验，是个腐化堕落分子。

军法无情，按军纪，这个排长必得被正法。

这件事被金日成首相知道了，他找到王平政委说：“还是不要枪毙吧。我知道你们的纪律，但希望你接受我的意见，志愿军在朝鲜已经牺牲了那么多人，就别再处死他了。那位领导干部的工作由我们去做！”

金日成首相这样做，主要是从维护中朝两国人民友谊的角度考虑，顾全大局。后来，志愿军还是尊重金日成首相的意见，把这个排长遣送回国处理。

以上这些情况的出现，引起了王平的严重关注，也给志愿军的政治思想

工作敲起了警钟，提出了更高的要求。王平专门主持党委扩大会，对如何加强部队思想工作进行了认真研究。他在会上说：“我们的军队，是无产阶级领导的军队，是人民的子弟兵。它既不同于任何资产阶级的军队，也不同于李自成式的农民起义军，全心全意为无产阶级政治服务，为人民服务，是我们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为了保持我们军队的纯洁性，清除一些人的非无产阶级思想，我们必须加强党对军队的绝对领导，加强政治思想工作，使我们的军队成为党的忠实工具，成为一支威武之师，文明之师！”

大家根据毛泽东主席、周恩来总理和中央军委的指示，参照志愿军入朝以来的一些规定，结合当前部队中出现的一些问题，经过充分讨论，就如何做好部队的政治思想工作和当前政治思想工作的主要内容，提出了10条必须严重注意的事项和严格遵守的纪律：

一、尊重朝鲜劳动党、国家、政府和领导人；遵守朝鲜的政策法令（特别是货币政策）；爱护兄弟国家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尊重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严禁调戏妇女。

二、不准干涉朝鲜内政，不准批评朝鲜领导人或议论是非，不得探知朝鲜党和国家的内部情况，禁止单独去做社会调查。

三、不准擅自划禁区，必要时应通过朝鲜国家政府，由政府作出规定。

四、对部队个别人员违法乱纪行为的处理，涉及当地人民的应征求朝鲜政府的意见，按朝鲜国家法律处理，必要时直接送交朝鲜国家政府惩处。

五、对朝鲜群众中个别盗窃我军物资的人，一般应当面劝告了事，严重的应送请朝鲜国家政府处理，禁止私自扣留、打骂或开枪伤人。

六、采取有效措施防止意外事故发生，特别要防止枪支走火、车祸伤人。

七、除紧急情况外，对群众进行助耕生产、发放救济物品等，应事先与当地政府协商，并通过政府办理，不要直接自行办理。

八、要特别注意尊重朝鲜的民族自尊心，在一切接触中，要多讲朝鲜对我们的援助，少讲我们对朝鲜的援助，坚决反对以恩人自居的思想。

九、对部队要经常地、具体地进行国际主义和爱国主义教育，时时警惕大国主义思想。

十、在国内行之有效的群众纪律，在国外更应严格遵守，而且要做得更好。

王平要求领导干部把这10条作为志愿军政治思想工作的重要内容，经常对部队进行教育和检查，发现苗头立即采取措施加以解决。

他还狠抓了各级领导和总部机关的模范作用问题，要求领导干部和机关从自身做起，作出表率，带头尊重朝鲜党和政府，重大问题要及时和朝鲜政府通气洽商，交往中不能有丝毫的大国主义思想，我们的援助是真诚的无产阶级国际主义援助，是无私的。我们援助朝鲜抗击美国侵略，同时也是为了保卫我们自己的国家。不能以恩人的姿态出现，不能搞“施恩图报”那一套。

在实际工作中，王平和杨勇司令员总是率先垂范，经常向朝鲜金日成首相报告和请示有关工作的问题，定期拜会当地党政军的有关领导，征求他们对志愿军的意见，双方保持了亲密友好的关系。

在下部队了解情况和检查工作时，王平总是着重谈朝鲜党和政府及广大人民群众对我们的支援和帮助，教育广大指战员把自己的位置摆正，像对待祖国的父老乡亲一样对待朝鲜的人民群众。他特别向大家讲了周恩来总理的两个例子：

一次，金日成首相在与周恩来总理的谈话中，说到中国对朝鲜的援助很大，并一再表示感谢。周总理对金日成首相说：“我们的援助都是互相的。中国对朝鲜的援助，量大但时间短；朝鲜对中国的援助，量虽小但时间长。从中国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起，一直到抗日战争，朝鲜的许多同志、包括金日成首相在内，都曾经在中国与中国同志并肩战斗过。总的看，是朝鲜对中国的援助多，要说感谢，首先应该感谢朝鲜人民。”党和国家领导人的这种国际主义精神和伟大的谦虚态度，不但使朝鲜同志深受感动，而且深深感动了听到此事的每一个中国人。

还有一次，王平等志愿军领导陪同周恩来总理观看志愿军文工团的演出。节目中有一个是反映中朝人民战斗友谊的内容的。舞台上扮演朝鲜阿妈妮、老大爷的角色有句道白：志愿军是我们的救命恩人，我们永远忘不了……周总理看后当即指出：“不要这么演。我们的功绩朝鲜同志讲可以，但我们不能强加于人。朝鲜同志愿意怎么讲就怎么讲，我们不加干预。但是我们这样演，朝鲜同志看了听了会不高兴的。”周总理处处严格要求我们自己，谨慎地处理与兄弟党和邻国关系的言行，为我们树立了光辉的榜样。

为了进一步解决少部分同志思想中存在的大国主义和居功自傲的倾向，王平与杨勇司令员商量决定：抽出各军、师、团的主要负责同志，加上英雄模范人物共百余人，组织了一个“志愿军学习团”，由杨勇司令员亲自带队，深入到朝鲜各地和人民军驻地进行参观访问，学习朝鲜党政军民的好作风、好品质。

“学习团”每到一地，都请当地的支前模范、战斗英雄以及为了使志愿军战士吃饱饭而宁可带领全家人啃野菜根的朝鲜老大爷、为了救护志愿军伤员而牺牲自己亲人的朝鲜妇女作报告，讲述他们的事迹，讲述他们对志愿军的深厚感情，使“学习团”的人员深受感动。

“学习团”还访问了朝鲜人民军守防的阵地。他们看到，有的高地被敌人猛烈的炮火与轰炸弹削去了一两米，激战的痕迹至今犹存；有的人民军在阵地前曾数百次击退美李伪军的进攻反扑，其战斗的残酷程度不亚于上甘岭战役。……

“学习团”还特别参观访问了设在地下掩体里的学校，这个学校里的学生都是在战争中丧失父母的孤儿。面对孩子们忠诚的目光，大家的心都在微微地颤抖。

当时随团采访的记者杜心在一篇文章中曾这样写道：

“开始有的同志对组织这个学习团不以为然，谁是英雄？向谁学习？可是，跟着杨司令员到处跑了一圈后，服气了，你不是觉得自己打了很多仗了不起吗？那就看看人家朝鲜同志打了多少仗，又是在什么条件下打的；你不是觉得自己援助了朝鲜同志有功吗？那就看看朝鲜人民是如何支援我们的；为了这种支援人家付出了多大的牺牲……这样一来，许多同志被朝鲜人民和军队的英雄主义、爱国主义感动了，认识到没有朝鲜人民的大力支援，没有人民军的并肩作战，哪会有我们的胜利！”

“学习团”的同志回来以后，每个人都成了宣传员，他们一个个结合自己的所见所闻和亲身感受，向周围的同志宣传党中央和毛泽东主席提出的尊重朝鲜政府、反对大国主义的原则和深刻意义，很快在全军掀起了向朝鲜人

民学习，每个人为朝鲜人民做一件好事的活动。通过这些活动，部队的思想作风很快端正了过来。这次组织的“学习团”，在志愿军中引起很大反响，取得了很好的效果。

朝鲜政府为了加强同志愿军的联络，帮助志愿军解决各种困难，责成朝鲜人民军总政治部统一向志愿军师以上单位派驻一个政治联络部。王平特别要求：各级领导机关一定要尊重联络部的朝鲜同志，召开有关的会议时要请他们参加，听取他们的意见；涉及到有关朝鲜政府工作的问题，要事先向联络部的同志了解朝鲜政府的政策法规、朝鲜人民的风俗习惯和社会情况等。这样做的结果，使双方更进一步结成了亲密无间的兄弟情谊。

## 从朝鲜撤军

1958年2月14日，周恩来总理率中国政府代表团访问朝鲜。杨勇司令员和王平政委接到通知，一同到机场去迎接。

代表团副团长有副总理兼外长陈毅元帅，副外长张闻天和总参谋长粟裕大将。中国代表团访朝的目的，是就中国人民志愿军从朝鲜撤出问题同朝鲜政府进行磋商。代表团到达平壤时，受到金日成首相、金一副首相、南日副首相兼外相等朝鲜领导人和各界人民群众的热烈而盛大的欢迎。

1957年11月，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在莫斯科开会时，毛泽东主席和金日成首相就谈到从朝鲜撤出中国人民志愿军的问题。毛主席说：“鉴于朝鲜的局势已经稳定，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使命已经完成，可以全部撤出朝鲜了。朝鲜人民可以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来解决民族内部事务。”金日成首相同意了毛主席的意见。

随后，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政府于1958年2月5日发表声明，主张撤出在朝鲜境内的一切外国军队，通过南北朝鲜协商，实现朝鲜的和平统一。中国政府于2月7日亦发表声明，完全赞同和支持朝鲜政府的声明，并对此作出了应有的安排。

来访的中国政府代表团同朝鲜领导人经过诚挚友好的会谈，于2月19日，由两国政府发表了联合声明，宣布：

中国政府本着一贯积极促进朝鲜和平统一的立场，除了在1958年2月7日的声明中完全支持朝鲜政府的各项建议外，现在同朝鲜政府协商后，又向中国人民志愿军提出了主动撤出朝鲜的建议。中国人民志愿军完全同意中国政府的这一建议，并且决定在1958年年底以前全部撤出朝鲜，第一批将在1958年4月30日以前撤完。”

声明还针对美国政府指出：“现在正是严重的考验美国和参加联合国军的其他国家的时刻。如果它们对于和平解决朝鲜问题有丝毫的诚意，它们就应同样全部撤出它们的军队。”

志愿军总部于两国联合声明之后的2月22日，即发表了完全赞同并热烈支持中朝两国政府声明的声明。声明中说：

“自从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950年10月25日进入朝鲜，同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抵抗美帝国主义侵略者以来，到现在已经七年零三个多月了。中国人民是热爱和平的，只是在美国政府发动了侵略战争，同时又侵占了我国领土台湾，而且无视中国人民和中国政府的一再警告，悍然越过三八线，严重威胁我国安全的时候，中国人民忍无可忍，发动了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

的运动，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开赴朝鲜，配合朝鲜人民军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我们的斗争和努力，对于制止侵略、保卫和平作出了应有的贡献。这是中国人民的光荣，也是我军全体官兵的光荣。”声明重申了完全赞同和支持中朝两国政府的联合声明，坚决按时将中国人民志愿军撤出朝鲜，希望朝鲜早日实现和平统一的愿望。

周总理和中国代表团的其他领导成员在繁忙的访问中，看望和视察了志愿军总部。总理与陈毅、张闻天、粟裕一起接见了部队领导同志，并听取了对撤军的具体意见，最后他语重心长地告诫大家：“那么，大家回国后是不是要腾云驾雾地骄傲起来呢，决不能这样。”

王平代表全军将士表示：“请党中央、军委和总理放心，我们一定做好工作，教育全军指战员戒骄戒躁，回国后虚心向人民群众学习，努力把工作做得更好。”

杨勇司令员说：“我们的一些官兵感到有点压力，生怕回国后跟不上祖国日新月异的前进步伐，有一点思想包袱。”

陈毅元帅说：“我们为了和平和友谊，连生命都可以牺牲，还有什么思想包袱不可以丢掉呢！”

周总理接着说：“你们在朝鲜是最可爱的人，回国后也要永远做最可爱的人。”他要求全体官兵要善始善终，安全圆满地回到祖国。

在杨勇、王平和梁必业的陪同下，周总理、陈毅、张闻天、粟裕等领导同志，还冒着纷纷扬扬的大雪到志愿军烈士陵园献了花圈，瞻仰了烈士陵园。他们向这些把鲜血洒在异国土地、为保家卫国献出生命的忠勇将士默默致哀，心里在默念：安息吧，祖国的好儿女！党和人民永远不会忘记你们！在毛泽东主席的长子毛岸英烈士的陵墓前，周总理沉思良久，才慢慢地离开。人们看见，他的眼眶里噙着泪花。这时，正赶上1958年的春节来临。按照中国人民的习俗，周恩来总理邀请朝鲜政府的有关领导同志，来到志愿军总部，和大家一起欢度了一个非常有意义的除夕之夜，他们举杯共同庆祝抗美援朝战争取得的伟大胜利，祝愿中朝人民用鲜血凝成的战斗友谊日益增进，万古长存！

送别中央代表团以后，杨勇、王平等便着手进行撤军的动员准备工作。在志愿军党委会上，王平说：“从朝鲜撤军，部队行动复杂，涉及的问题面广，必将引起国际的广泛关注，稍有疏忽便会造成不容挽回的影响。所以我们一定要统一思想，统一行动，做到认真、仔细、周到、圆满。”

他们以志愿军党委的名义，向全军指战员发出了“不骄不傲、善始善终，军队撤出，友谊长存”的号召，要求部队做到“交好，走好，到好”。交好，就是除了武器装备和个人随身携带的物品以外，其余东西一律交给朝鲜人民军；走好，就是要圆满安全的撤出；到好，就是回到祖国后不居功骄傲，服从祖国需要和安排。

志愿军党委还作出决定，把二月份定为“中朝友好月”，号召全军指战员热烈开展各种活动，进一步增进中朝两国人民的友谊。志愿军政治部发出了《关于我军撤出朝鲜的政治工作指示》，制定了《撤军政治工作三十条》，要求部队进行深入的思想教育，使全体同志明了撤军的意义和要求，积极主动地做好一切准备工作。

随之，各部队都按总部的部署和要求，积极行动起来。

在“多流一把汗，多留一份友谊”的口号下，广大指战员利用归国前的

宝贵时间，更加努力地帮助朝鲜群众进行建设家园的劳动。修渠、筑坝、打井、盖房、造桥、修路、植树、平田，当地群众需要什么，部队就干什么。为了给朝鲜的社会主义建设多增砖添瓦，在助民劳动中不少部队提早上班，晚收工，脏活累活抢着干，无须指挥即冲锋在前。志愿军总部曾提出一个“出工百万个，为朝鲜人民兴修水利盖学校”的倡议，结果由于部队热情高、干劲大，到9月份就出工160万个，大大超额完成了任务。

各部队充分利用时间，对前沿阵地的坑道、战壕、掩体和所有各种工事、道路，均进行了彻底的整修、清扫和加固，并组织力量把一切未完成的工事全部突击修好完成，然后认真仔细地向朝鲜人民军进行移交，把地形、敌情、工事设施和作战方案都交待得一清二楚。

各部队根据总部的规定，把营房、营具、医院的成套设备和大量物资，都造册登记，无偿地移交给朝鲜人民军。移交前对营房普遍进行整修和粉刷，修理了门窗桌椅，并美化环境，平整操场，维修体育器材，整修营区道路。有的单位还新修了花坛、养鱼池和友谊亭，精心布置了礼堂和俱乐部，使人民军战友一进驻，马上就能开展各种活动。

部队对各种仓库的各类物资，进行整理和清点，完整无损地作了移交。各单位饲养的猪、羊、鸡、鸭以及自种的粮食蔬菜，节约的煤炭等，全部都移赠人民军或当地群众。

各部队广泛开展了向朝鲜人民和朝鲜人民军学习的活动，大力宣扬朝鲜党政军民对志愿军的全力支援和无微不至的关怀以及舍生忘死救助志愿军伤病员的模范事迹和高尚品质；学习朝鲜人民忘我的革命精神和艰苦奋斗的优良作风，邀请驻地朝鲜党政机关负责人和人民群众进行座谈，征询意见，做到件件事情有着落，不留一点影响双方关系的问题。

杨勇司令员和王平政委一方面指导、检查各部队的撤军准备和移交工作，一方面频频与朝鲜党政军领导洽谈协商，解决各种问题，忙得不可开交。

朝鲜政府和人民把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撤军作为一件大事，进行了精心的安排。

1958年2月27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内阁作出了“永久纪念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伟大业绩”和欢送志愿军的决定。决定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战争中和战后时期在朝鲜留下的不朽功勋和光辉业绩，将永远留在朝鲜人民的记忆中，将同朝鲜国家的繁荣发展一同放射光芒。”

朝鲜内阁还作出决定：

向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志愿军致由全体朝鲜人民签名的感谢信；

向参加朝鲜战争的全体志愿军官兵授予解放战争纪念章；

修建中国人民志愿军烈士陵园和烈士纪念塔，并采取永久性保护措施；

规定志愿军人朝作战八周年的1958年10月为“朝中友好月”；

命名在战争中同中国人民志愿军有深切关系的黄海北道沙里院市的中央大街为“中国志愿军街”。

朝鲜政府还成立了以内阁副首相郑一龙为首的中央欢送志愿军委员会；各道、布、郡也成立了欢送委员会。各地热情组成各种慰问团、艺术团，来到志愿军驻地，进行慰问和演出。

朝鲜各地的群众自动组织起来整修了志愿军撤军必经的大小道路。他们还在沿途设立了数以千计的欢送站。

总之，朝鲜举国上下几百万人民群众，与朝鲜的党和政府有着一个共同

的心愿，就是要以最热烈、最隆重的形式，欢送中国人民志愿军胜利归国。

## 依依惜别

根据中央军委的安排，志愿军的撤军共分三批进行。从1958年3月15日到4月15日，第9兵团的6个师作为第一批陆续归国。

3月11日，王平政委及杨勇司令员和我国驻朝鲜大使乔晓光，陪同金日成、崔庸健、李钟玉等朝鲜党政领导人到第9兵团驻地看望即将离朝的志愿军指战员，并举行了欢送大会。金日成首相在大会上发表送别讲话，热情称颂了中朝两国人民结下的战斗友谊和志愿军指战员的功绩，向部队官兵颁发了“朝中友谊纪念章”和“朝鲜祖国解放战争纪念章”，并同第9兵团副司令员张天云等领导同志及战斗英雄合影留念。

开过欢送大会之后，部队集中在火车站准备启程。从各地赶来欢送的朝鲜群众，穿着节日的盛装，载歌载舞，锣鼓喧天。群众拉着志愿军官兵跳起了秧歌舞和朝鲜舞，并把他们准备的一件件纪念品送到战士手上。这些纪念品有锦旗，有“光荣袋”、“胜利鞋”，还有赶制出来的各种工艺品。特别使王平感动的是有一位60多岁的老“阿妈妮”，送给志愿军一个她在战乱中精心保存下来的特制包袱皮。这个包袱皮是她出嫁时用30多户人家送的不同颜色的布条缝制成的。按照朝鲜的风俗，这个包袱皮只能留给至亲的后代。

“阿妈妮”说志愿军就是她最亲的人，她一定要中国的亲人收下它。女青年边贞周在战乱中曾被美国飞机炸成重伤。一家人都被炸死了，她是被志愿军战士救下的孤儿。今天，她特意用蓝布包了一撮土送给志愿军，流着泪水说：“这是朝鲜的土，是你们洒下自己鲜血保卫的我们祖国的土，希望你们永远不要忘了它！”

火车在沸腾的人群的拥动中徐徐启动，欢送的人群久久地久久地摇着手，泪水在他们的面颊上扑簌簌地流下。表达了朝鲜人民对志愿军依依惜别的深情。

火车路过平壤时，站台上早就拥满了等待欢送的人群。张天云副司令员由朝鲜副首相金一陪同走入欢送的会场进行答谢。归国的志愿军一走下火车，热情的群众就急匆匆地跑上前，给每人胸前戴上一朵大红花，金日成首相的女儿金敬姬还向志愿军献了银杯。朝鲜劳动党平壤市委员会委员长郭松云代表平壤人民向张天云副司令员献了锦旗和致敬信……

火车离开平壤路过定州郡和新义州时，也都受到了成千上万的朝鲜群众依依不舍的欢送。

第二批归国部队，是第20兵团的6个师，从7月11日开始撤离。朝鲜内务省代表团、朝鲜人民军代表团和以金一副首相为首的朝鲜中央代表团，分别到部队驻地展开热烈的送别活动。部队驻地周围的朝鲜人民群众，就像送别远行的儿女一样，难分难舍。曾写下《谁是最可爱的人》的著名作家魏巍，有一篇专门描写朝鲜人民与志愿军告别的散文《依依惜别的深情》，文中写道：

“志愿军的行期，仍然是一天天地迫近了。朝鲜父老们，他们白天做活也淡淡的没有情趣，夜里也不能安静地睡眠……一听见汽车声响，就要推开门窗来，张望一回。如果哪个战士到了他们家里，阿妈妮们就会端出一铜碗一铜碗的栗子，再不就从鸡窝里慌张地抓出发热的鸡蛋，向你怀里乱塞。他



们还把战士请到家里，杀鸡，买酒，眼看着你吃到肚里，仿佛才能宽舒一下他们的离情。”

“离别的日子，终于不顾人们深重的离情来临了。”“这一夜，有多少朝鲜人家没有合眼，有多少人家午夜三点就亮起了灯，他们再一次整理好花束，把礼物放进竹篮，坐等着集合号就要响起的拂晓。”

“部队集合了，妇女们打开竹篮，分赠着礼物。孩子们爬上大炮，把红叶插上炮口。小吉普也被无数的彩纸条和成串的纸花缠成了花车。阿妈妮们、孩子们、姑娘们，他们做这些事的时候统统没有哭。昨天晚上，战士们就告诉他们不要哭，里（村）干部们也告诉说，为了不使志愿军难过，让他们不要哭……”

可是，当车子终于开动的时候，“战士们简直是在朝鲜人民送行的泪雨中行进，这不是哪一个人在哭，这是全朝鲜民族在捧着赤心送着他们至亲至爱的友人！”

6月26日和7月1日，平壤市各界人民和朝鲜中央代表团分别在平壤市举行了欢送志愿军第二批归国部队大会。金日成首相在讲话中说道：“由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和毛主席教育下的你们，是真正的人民军队。你们建立的功勋，将和我们美丽的江山一起，永远放射着光芒。你们同朝鲜人民结成的友谊，将永远留在朝鲜人民子子孙孙的心中。”

第三批，也是最后一批志愿军归国部队，主要包括第1军的3个师、炮兵部队、后勤部队和总部的直属队，从9月25日开始撤离。

这时，欢送志愿军归国的活动达到了高潮。

王平在自己的回忆录里详细叙述了这些活动。

以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为首的朝鲜党政代表团来到志愿军总部的后勤部队和炮兵部队，向志愿军官兵表示热烈的欢送。

朝鲜684万有人在给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和中国人民的感谢信上签了名。信中写道：

“当送别在硝烟弹雨中生死与共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的时候，我们情不自禁地对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和兄弟般的中国人民表示最大的感谢。在朝鲜人民面临最艰苦的考验的时候，中国人民派遣了由自己的宝贵儿女组成的中国人民志愿军，以鲜血援助了我们。”“硝烟已经消散的我国山峰和平原、城市和村庄、无名小河和树木，都记载着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同朝鲜人民军官兵一道为守卫每一寸土地进行战斗而建立的功勋，无论是什么地方，都像传奇一样流传着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的高贵道德品质的各种故事。这将同流在两国边境上的鸭绿江水一起长流不息；上甘岭的峰峦将作为一个铭刻着和平战士辉煌的功勋的纪念塔而世代代耸立在那里。”

礼尚往来是中国人民的传统美德。王平也指示志愿军政治部起草了一封最后由全体志愿军官兵签名的致朝鲜人民的告别信。他们在告别信中满怀深情地说：

“亲爱的朝鲜党和国家的领导同志们，亲爱的朝鲜父老兄弟姐妹们，我们就要同你们分别了，但是我的心永远不会离开你们。金日成元帅对我们的亲切勉励，共和国政府给予我们的崇高的荣誉，千千万万志愿军妈妈和父老兄弟姐妹们对我们的热爱，以及亲爱的人民军战友坚守在东方和平前哨的雄姿，是如此深刻地印在我们心中。这一切，我们将连同朝鲜人民和战友塞在我们口袋里的那从共同战斗过的阵地上拾起来的带有弹片的泥土，连同朝

鲜农业社员们装在我们水壶里的从那共同抢修起来的水库里汲上来的清澈的泉水，连同朝鲜矿工们送来的那从战争时期一起生活过的矿井里新挖出来的灿烂的矿石，连同朝鲜老大娘戴在我们手上的古老的戒指，连同朝鲜小姑娘系在我们颈上的鲜红的红领巾，连同一切表示着永志不忘的礼品，一起带给鸭绿江那边的六亿祖国人民，传给我们的子孙后代！”

10月16日，以金光侠大将为为首的朝鲜人民军代表团，来到志愿军总部所在地桧仓，为总部的同志举行了隆重的欢送会。杨勇、王平热情接待了人民军代表团的同志。同时，志愿军也派出十个代表团，分别到各地向朝鲜党政机关和人民群众道别。

10月17日，杨勇和金光侠分别代表中国人民志愿军总部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民族保卫省签署了联合公报，双方交接工作顺利完成。同时，志愿军总部举行了向桧仓人民告别的隆重而热烈的大会。

10月21日，志愿军总部的全体同志在杨勇司令员和王平政委率领下，来到志愿军烈士陵园，向长眠在这里的烈士们作最后的告别和悼念。守墓老人李守昌对两位将军说：“请你们转告烈士们的亲人，他们的儿女为了我们朝鲜献出了宝贵的生命，只要朝鲜人民在，烈士们的坟墓也同在！”

10月22日，杨勇、王平率志愿军总部人员告别桧仓来到了平壤。第二天，他们在平壤举行了盛大告别会。金日成首相等朝鲜党政军领导人出席了大会。

10月24日上午，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在平壤隆重举行授勋仪式，授予中国人民志愿军司令员杨勇上将、政治委员王平上将以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授予志愿军副政治委员梁必业中将等高级指挥员以二级国旗勋章。

同日下午，平壤市各界人民隆重举行欢送志愿军总部大会。金日成首相出席大会，金一副首相致欢送词。他说：“我以朝鲜人民、劳动党和共和国政府的名义，向光荣地完成了抗美援朝任务的你们表示衷心的感谢！”“兄弟的中国人民志愿军官兵在我们祖国土地上留下的丰功伟绩，将永远长存在我国人民的心里！”会上，朝鲜劳动党中央委员会副委员长朴正爱把朝鲜各界684万多人签名的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中国人民的感谢信及签名册交给了前来参加“朝中友好月”活动的我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郭沫若和杨勇；王平政委把志愿军全体官兵签名的致朝鲜人民的告别信和签名册交给了朝鲜最高人民会议常任委员会委员长崔庸健。

晚上，金日成首相举行盛大国宴，欢送志愿军总部的同志。杨通、王平等450多人应邀出席了宴会。会上，金日成首相致词说：“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朝鲜所建立的伟大功勋，是无产阶级国际主义的榜样，它将永远记载在进步人类的史册上。”

10月25日，平壤市30万人麇集车站广场，热烈欢送最后一批志愿军回国。其场面感人至深，令人难忘。《人民日报》这样报道：“鲜花成林热情送别，人群似海依依惜别。”有的阿妈妮是赶了200多里路来送别的，她们抱着志愿军战士的肩膀热泪盈盈，难分难舍。

12时整，列车在杨勇司令员致告别词后，徐徐启动。

车站上响起了雄壮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战歌》。志愿军指战员们手里挥舞鲜花，伸出窗口，向欢送的人群告别：

再见，亲爱的朝鲜父老兄弟姐妹！

再见，亲爱的朝鲜战友！  
再见，英雄的朝鲜土地！

## 回到祖国

带着满身的征尘，带着朝鲜人民的深情厚谊，英雄的志愿军回来了！

越过鸭绿江大桥，穿过五彩缤纷的“凯旋门”，祖国的优秀儿女回来了！

10月26日中午，志愿军归国的最后一趟列车驶进了边城丹东车站。顿时，车站锣鼓喧天，鞭炮齐鸣，彩旗花束挥舞，欢呼的口号响彻云霄。祖国人民以最隆重的形式欢迎凯旋的英雄儿女。指战员们一走下火车，就被人们拥抱起来，不少战士还被人们抬起来抛向天空……

杨勇司令员和王平政委走出车厢，同专程从北京赶来的以廖承志为团长的中国人民欢迎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和丹东市的党政军领导同志热烈握手，亲切拥抱。

当日，志愿军总部发表撤军公报，向世界宣布：中国人民志愿军已全部撤离朝鲜。留在朝鲜军事停战委员会内的志愿军代表，仍将同朝鲜人民军一道，继续执行监督朝鲜停战协议实施的任务。

27日上午，中国人民欢迎志愿军归国代表团在丹东市召开万人大会。廖承志在大会上致欢迎词，他说：“我代表祖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向我们最可爱的人——劳苦功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们，致以最崇高的敬意，最热烈的欢迎和最亲切的慰问！”

欢迎会结束后，按照中央的安排，下午王平和杨勇即率领150人的志愿军代表团和一个200多人的文工团，在廖承志等人的陪同下，赶往首都北京，去向党中央、毛主席和全国人民汇报。

10月28日下午3时，列车驶进北京车站。周恩来总理和彭真、陈毅、郭沫若、李济深、程潜、张治中等领导人，亲自到车站迎接。同来的还有一大批驻京部队将领。

周总理紧紧握着杨勇和王平的手，高兴地说：“我代表党中央和毛主席，热烈欢迎你们——胜利归来的英雄们！”

几百名少年儿童向代表团成员献了鲜花，他们被淹没在鲜花和彩旗的海洋中。

走出车站，他们受到了首都20万人的夹道欢迎。人人都想争先一睹志愿军代表们的风采。

下午5时，首都各界在北京体育馆举行万人欢迎大会。党和国家领导人周恩来、朱德、陈云、彭真、陈毅、郭沫若等出席了大会。当杨勇和王平带领志愿军代表走进会场时，雷鸣般的掌声和“欢迎！欢迎！热烈欢迎”的口号声持续了20多分钟。此时，王平和许多志愿军代表的眼里噙满了激动的泪花。

郭沫若和彭真分别致词和讲话。郭沫若在致词中说：“让我们的大会，代表祖国六亿五千万人民，向祖国的英雄儿女——中国人民志愿军全体指战员，向中国人民志愿军代表团的同志们，表示最热烈的欢迎，最崇高的敬意和最衷心的感谢！”彭真和郭沫若代表全国人民把一面巨幅锦旗献给杨勇和王平。锦旗上写着：“你们打败了敌人，帮助了朋友，保卫了祖国，拯救了和平。你们的勋名万古存！”

第二天，即10月29日下午，毛泽东主席及党和国家的其他领导人周恩来、朱德、彭真、陈毅、李富春、薄一波等，在中南海怀仁堂接见了志愿军代表团。

毛主席兴致勃勃，满面笑容，第一句话就问：“都回来了吗？”

杨勇和王平齐声回答：“志愿军全部回到祖国！”

毛主席高兴地说：“好，好，热烈欢迎你们！”他招呼杨勇和王平坐在他的左右两边。王平简要地向毛主席汇报了朝鲜人民热烈欢送志愿军的情况。毛主席听后说：“好！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志愿军同志一定要谦虚谨慎，戒骄戒躁，不断为人民立新功噢！”

随后，毛主席等中央领导和志愿军代表团的全体同志一起合影留念。

同日晚，全国人大常委会、政协全国委员会、中国人民抗美援朝总会和北京市人民委员会等联合举行盛大宴会，招待志愿军代表团的同志。周恩来、朱德、陈毅、郭沫若以及首都各界的人士与代表团全体同志欢聚一堂。周总理在宴会上祝词说：“今天一千多人的宴会，代表着全国六亿五千万人民的感情。我们要永远学习志愿军的榜样。”

10月30日下午，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和政协全国委员会常委会联席会议上，杨勇司令员代表志愿军作了《中国人民志愿军八年来抗美援朝工作报告》。会议通过了《关于中国人民志愿军八年来抗美援朝工作报告的决议》。

决议对中国人民志愿军的业绩作出了全面的评价。指出：“中国人民志愿军卓越地完成了祖国人民所赋予的光荣任务。”“中国人民志愿军在抗美援朝、保家卫国和拯救和平的崇高事业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将永远与日月同辉。中国人民志愿军不愧为伟大中国人民的优秀儿女。在抗美援朝的战斗中献出宝贵生命的烈士们永垂不朽！”

## 苏振华与海军装备建设

杨肇林

苏振华（1912～1979）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原名苏七生。湖南省平江县人。1928年参加平江农民暴动。1929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30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3军团第1师排长、连政治委员，第1师经理处政治委员，第4师第10团总支书记，第5师第13团政治委员，第4师第12团政治委员。参加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1934年获三等红星奖章。抗日战争时期，任抗日军政大学大队长，八路军第115师第343旅政治委员，教导第3旅政治委员，鲁西军区政治委员，八路军第2纵队政治委员，冀鲁豫军区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平原分局党校校长，冀鲁豫军区（与冀南军区合并）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野战军第1纵队政治委员，第二野战军第5兵团政治委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贵州军区政治委员，贵州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中共贵州省委书记，海军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海军政治委员，海军第一副司令员，海军第一政治委员，中央军委副秘书长，中共上海市委第一书记。1955年被授予海军上将军衔，获二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届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政治局委员。1979年2月7日在北京病逝。

\* \* \* \* \*

### 高屋建瓴浓墨重彩绘蓝图

1956年6月，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召开第一次党代表大会。海军副政治委员、海军党委副书记苏振华代表党委向大会作工作报告，总结了海军组建7年来的经验，指出：“在正确的海军建军方针的指导下，我们已经建立了一支以空、潜、快为主的海上战斗力量。”“今后海军建设的基本问题，是在现有基础上提高一步，这就要求我们集中力量培养各种专业干部，加强部队的战斗训练和有计划地进行基地工程以及各方面的建设。”这次大会标志着海军由初创时期向成长发展时期转变，海军建设迎来了历史性的转折。

17日深夜，苏振华还在准备明天大会结束时的讲话稿。他写累了，来到住房外面的走廊透透空气。

这是一座解放前修建在一个土阜高坡上的两层楼房，从走廊上可以俯看整个海军领导机关驻地。

海军领导机关所在位置，原是北京西郊一片墓地，荒凉空阔，有一些零星的树木，散落着几处有钱人家的坟家。当年看坟人的房屋，如今作了苏振华等领导人的住屋。在废弃的坟地上，已经修建了一座六层的办公楼，有中国式的大屋顶，环抱有粗大的廊檐柱，室内则采取了实用的西式格局，很符合“民族的形式、科学的内容”这一要求。还有四栋与之相配套的军官宿舍楼。都是建筑学家梁思成先生设计的很具中国特色的建筑，外表看去，似庙宇，似殿堂。在当时的西郊，可称得是巍峨耸立，高屋建瓴，气势恢宏。老百姓戏谑地称这里是“龙王庙”。

龙王，在中国老百姓心中，是保卫国家海宴河清的神！苏振华深感人民对海军的重托和期望。他又不由得想起几天前，6月11日下午，毛泽东在中南海接见海军党代会代表时的情形。

毛泽东在与代表们合影前，意味深长地向大家问道：“你们学了十条方针没有？”

毛主席说的十条方针就是不久前，4月25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的《论十大关系》的讲话，他论述了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的十大关系，其中一条专讲经济建设和国防建设的关系，说：“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指原子弹等）。怎么办呢？可靠的办法就是把军政费用降到一个适当的比例，增加经济建设费用。只有经济建设发展得更快了，国防建设才能有更大的进步。”

苏振华回答毛泽东说：“学了。这次党代表大会就是以十条方针为中心指导思想召开的。”

毛泽东又问：“你们都赞成吗？”

同志们齐声回答说：“我们都赞成。”

毛泽东却笑笑说：“不一定。你们军队有些同志对十条中九条赞成，其中一条不赞成。你们说是哪一条？”

苏振华理解毛泽东的担心，回答说：“假如有的话，就是第三条，关于国防建设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的问题。”

毛泽东说：“就是这一条，军队的同志恐怕不容易通。”

许多人又一齐说：“会通的。”

毛泽东说：“能通就好。陆海空三军中，你们海军能通就很好。”

毛泽东接着语重心长地说：“目前，国际形势有利于和平，有利于我们争取时间进行经济建设。现在我们要注意一点，就是不要被杜勒斯那样的人所作的战争叫嚣所吓住。帝国主义想要我们把钱都花在国防上，让我们的国家工业化搞不成，人民生活得不到改善，把宝贵的时间都耽搁了。一旦帝国主义真的动手了，我们却处在没有准备的情况下。我们要下决心精简，集中人力、物力来搞经济建设。”

毛泽东还诙谐地对代表们说：“我想，我们海军恐怕没有人不同意搞先进的鱼雷，没有人不同意用导弹来代替过时的海岸炮吧？如果真想要这些东西，不是假想，而且是想得很，你们现在就减少一些军费。这样办，到第二个五年计划之后，我们军队就能用现代化武器装备起来了。”

最后，毛泽东特别叮嘱苏振华和萧劲光司令员：“世界各国海军装备和技术都在日新月异地发展，你们要早抓，抓紧。我们这些人，懂得科学技术太少，又缺乏经验，容易犯错误。我们要兢兢业业地学习和工作，不要骄傲，不要停步，以免犯错误。”

想到这些，苏振华在心里感慨：毛主席洞察国际风云。他的讲话，见常人之所未见，想常人之所未想，高屋建瓴，为海军指明了新的航向！明天闭幕式的讲话中应当强调，海军同志要很好领会毛主席的教诲，海军不要辜负党中央和毛主席的期望和要求！海军要按毛主席的要求，赶紧抓科学技术和装备的研究和发展，而且一定要抓紧、抓好。

早在1950年8月，海军初建时，由萧劲光主持海军党委会议研究建军方针，就提出了“从长期建设着眼，由当前情况出发，建设一支现代化的、富有攻防能力的、近海的、轻型的海上战斗力量。首先组织利用和发挥现有有力

量，在现有力量的基础上，发展鱼雷快艇、潜水艇和海空军等新的力量，以逐步建设一支坚强的国家海军。”也即重点发展“空、潜、快”的思想。无疑，这符合中国实际情况，适应世界各国海军发展潮流，是一个正确的指导方针，在实践中已经取得了成效。就在这次党代会上，苏振华代表海军党委作工作报告，肯定了这一方针。他强调：“我们海军建设，必须建立在我国工业发展的基础上，没有国家工业的发展，海军的发展是不可能的。”他以生动的事例说明道：“我国工业建设已经为海军建设展示了一个远大的前途，在211个新建的项目中，专为海军设置的制造厂就有17个，在国家主要工厂中为海军生产装备器材的制造厂在50个以上。”进而强调：“在海军建设与国家经济建设的关系上，必须服从国家建设的方针；在海军建设与整个国防建设的关系上，必须服从以发展空军和防空军为重点并相应地发展海军的方针；在海军建设内部关系上，必须服从以发展空、潜、快为主并相应发展其他兵种的方针。”“进一步解决人与技术的矛盾，依然是今后海军建设的基本问题，这就要求我们集中力量培养各种专业干部。”同时强调，应当按照国家《1956年至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提出的“重点发展，迎头赶上”和“以任务带学科”的方针，加快步伐，有重点地加强海军技术装备建设。

第二天大会上，苏振华向所有参加大会的代表详细地传达了毛主席接见时的讲话。会场上沸腾了，同志们热情激荡。海军建设的新阶段开始了。

主管装备工作的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和海军舰船修造部部长林真、副部长薛宗华组织拟订了《海军科学技术和装备建设发展规划》，提出要立足国内，提高舰艇战斗性能，研制新型动力装置，加强水鱼雷、导航、水声等新课题的研究。海军党委讨论通过了这一规划。苏振华更提出，必须立即着手建立有关海军科学研究基础和比较完整的造船工业体系，把军事科学研究、工业生产和训练使用三者构成有机整体，互相促进。

苏振华深知，军队的基础在士兵。为避免将来“有了装备拿不起来”，必须进一步解决人与技术的矛盾。他力主在海军部队开展培养“海军技术能手”的运动，掀起学习技术的高潮，切实有效地提高了训练水平，加强了战斗力。海军司令部、政治部制订和颁布了奖励技术能手、先进工作者、优秀学员的办法和规定，推动运动持续开展。

1957年2月25日，海军积极分子代表大会在北京召开。毛主席听了汇报，欣然同意接见全体代表。3月6日下午，在中南海怀仁堂前的草坪，来自四海的海军积极分子列队等候。毛泽东由贺龙等人陪同走过来，挥动手臂向大家致意，全场欢声雷动。苏振华不由得想起毛泽东在1953年春节同水兵们一起航行时发出的号召：“为了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我们一定要建立强大的海军。”毛泽东更叮嘱大家要“爱舰、爱岛、爱海洋。”他和同志们一起热烈鼓掌，表示对毛主席号召的拥护。

3月9日，苏振华在大会总结报告中，要求代表们把毛泽东、党中央对群众运动的支持和大会精神传到四海，带动全体同志积极投入学习技术、苦练精兵的热潮。海军领导机关又进一步完善了奖励标准和办法，推动运动深入、广泛、健康地发展。

在这以前，2月7日，苏振华已经被任命为海军政委，他以中共“八大”制定的路线和毛泽东的号召为指针，研究了我国海防的历史和现状，注意到各国海军装备日新月异的发展，主张中国海军建设一定要坚持独立自主和自

力更生的原则，借鉴和消化外国先进技术，设计、制造自己的新型舰艇，建设海上战斗力量。他亲自过问选调优秀干部，主持组建造船、水中兵器、水声、航海、工程等5个科学技术研究所。

1958年5月27日到7月22日，中央军委召开扩大会议。全军有千余名高级干部参加。会议总结建国8年多来的工作，针对当时形势，讨论国防建设问题。海军萧劲光司令员在会上讲了加强海军建设的意见。海军副司令员刘道生在会上发言，主张经过10~15年时间，海军逐步发展舰船XX万吨，在反对外来侵略时，用海上力量在海上阻止敌人，把敌人消灭在海岸、岛屿附近；平时用海军保障和支持国家和平利用海洋，将来还要到南极去。

刘道生是我军年轻的将领，红军时期就是很有作为的指挥员，参加了人民海军的初建，在苏联伏罗希洛夫海军学院毕业，回国被任命为海军副司令员。他的发言，既从实际可能出发，又考虑到未来发展的需要，反映了海军广大指战员的心声，令人鼓舞。但是，有些同志持不同意见，有的甚至说这是“大海军主义”。

6月21日，毛泽东在会议上就这一问题说：“我是始终主张建立一支强大海军的，但要随着国民经济的发展而发展。刘道生的发言，可能急了点，但要保护他的积极性，他主张的数字并不大嘛。打个比方，蒋介石的海军像个蚊子，风一吹就吹跑了。我们要建设强大海军。”

毛泽东还指示说：“我们除了继续加强陆军和空军的建设外，必须大搞造船工业，大力造船，建立‘海上铁路’，以便在今后若干年内建立强大的海上战斗力量。”

苏振华和所有出席会议的海军同志大受鼓舞。

6月22日下午，苏振华参加了毛泽东主持召集的军委扩大会议小组组长会议。毛泽东和大家一起讨论，在同志们汇报时频频插话，十分活泼而生动。苏振华联想到战争年代同毛泽东的接触，知道毛泽东说出的话，无不经过深思熟虑，有感而发，有着极强的针对性。毛泽东谈及海军建设时，苏振华更加聚精会神，一字一句地仔细记录。

毛泽东面带笑容说：“海军提出保卫海防，不让敌人上岸。中国海岸线一万几千里，都不让上岸，是不是能够办到？可不可以考虑一下，一万公里不让上，有几千里让他上；上来后好捉活的，不让跑掉。完全不让上，我看靠不住。就是有些地方准备好了让他上来，把他困住，消灭掉。这是不也是一种打法呢？”

苏振华感到毛泽东讲的是一个重大的方针问题，就是从实际出发，积极防御，而不是分兵把口。晚清末年，西方帝国主义从海上入侵，中国海防一触即溃，政治腐败是根本原因，而分兵把口的防御方法，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只听毛泽东又接着说：“几年以后，形势会有改变，将来钢生产出来了，工厂搞起来了，要造什么样的飞机，什么样的军舰呀？”毛泽东举目问道：“海军需要多少钢？”

苏振华慎重答道：“造150条潜艇，大约要30多万吨钢。”

毛泽东摇头说：“太少了。还可以多搞些。”

彭德怀插话说：“可以再多搞些潜艇。”

黄克诚也兴奋地说：“还可以搞航空母舰。”

苏振华也接着说：“我们现在如果要出国访问，连一条像样的军舰也没有。将来自己可以造军舰了，太平洋的局势就要改观。”



许多元帅和将军们都兴致勃勃地表示，支持建设强大的海军。

毛泽东等大家议论了一阵后，说道：“军队，特别是海军、空军，现在要赶快抓技术，抓设计，抓科学研究。现在不搞，将来就来不及，赶不上了。五年，十年以后，还可设想一些新问题。”

苏振华趁势说道：“海军刘道生副司令员写了个关于海军建设的材料，其中有一些新的提法。”

毛泽东很感兴趣，说道：“材料在哪里？我要看一看。”

苏振华回答说：“我这里有一份。”

毛泽东伸出手来，苏振华便把刘道生写的关于海军发展设想的材料递了过去。

毛泽东三番五次地强调海军要赶快抓技术，抓科研，抓设计，苏振华和海军的同志们都坐不住了，感到重任在肩，刻不容缓。

美国早在1951年8月，就开工建造第一艘核动力试验潜艇“鳐鱼号”，1954年1月下水，1955年5月，开始从新伦敦到圣胡安水下航行试验。另一艘核动力试验潜艇也在建造。

1957年10月4日，苏联发射了世界上第一颗地球人造卫星。美国人认为只有迅速发展核潜艇，才能对付苏联强大的潜艇舰队，加快了导弹核潜艇的研制。

1958年，苏联已经在“列宁号”破冰船上使用了核动力装置，并开始建造核潜艇。

英国、法国也都在致力于核潜艇的研制。

潜艇核动力装置，使潜艇成为真正能够长时间潜伏海底的战斗力量。核反应堆里的铀原子通过裂变产生巨大能量，推动舰艇航行。它没有内燃过程，无需像常规潜艇那样，定期浮出水面。而且，热能经过冷却后又返回核反应堆，循环往复，不停地工作，可以使核潜艇无需补充燃料，也能航行到地球的任何一处海洋。

1958年5月14日，苏振华就和萧劲光、罗舜初联名向中央军委报告：在现代条件下，我国海军也应该以火箭、导弹为主要武器。

海军新建立的研究所提出了发展军用核动力装置和研制导弹核潜艇的建议。

这时，苏振华受毛泽东6月21日、6月22日讲话的鼓舞，更加思绪如潮。他是一个勤于学习的人，长征后进保安红军大学第一期学习，曾被毛泽东称赞为工农分子知识化的典型。今天，面对世界各国海军科技发展，他越发迫切地感到需要学习，需要迎头赶上。他想起清人魏源在《海运全策》里说的话：“海道未通，海氛未靖，海商船舶未备，虽欲藉海，用海无舟”。“非海难人，而人难海”。没有船，没有军舰，何谈利用海洋？不从世界造船最新发展起步，何谈赶上先进？

发展和加强海军建设，正面临一个历史机遇。

6月24日，苏振华和海军副司令员罗舜初邀请中国科学院副院长张劲夫、五院院长钱学森和一机部、二机部的领导同志开会，向他们通报了海军向党中央建议研制核潜艇的报告，说道：“你们都是专家，请你们来审查，看是不是可行？如果可行，我们代表海军几十万指战员，请求你们支持，支持中国人民实现百年来的心愿，建设起强大的海军，使中华民族再也不受外人的欺负！”

苏振华的诚意，苏振华的热切希望，使这些原本就对海军建设情有独钟的同志们，也热血沸腾。他们以科学家的严谨，更以科学家的胆识，支持海军的建议，主张着手独立研制核潜艇。

海军向聂荣臻副总理作了报告，聂荣臻再次召集有关同志，听取了海军的详细汇报。聂总十分高兴，肯定了这一主张，指示海军综合各方面的意见，重新修订请示报告，把需要和可能，成功的把握和预期的困难，客观地、如实地向党中央报告。聂总反复仔细地审核海军重新修订的报告，由他于6月27日署名向党中央报告：我国原子能反应堆已开始运转，这就提出了原子能的和平利用和原子能动力用于国防的问题……为此，曾邀集有关同志进行了研究，根据现有力量，考虑国防需要，本着自力更生的方针，首先自行设计和试制能够发射导弹的原子潜艇。

周恩来总理一直关注着这一工程。他接到报告后，第二天，6月28日便批示：请小平同志审阅后提请中央常委批准。

6月29日，邓小平就在报告上批示：拟同意。他高兴地特别加注说：是好事！

报告送到了毛泽东的案头，他看了很高兴。海军同志有此雄心，应予支持。他欣然在报告上圈阅，表示赞同并批准了这个报告。

中国核潜艇工程起动了。

军委扩大会议结束时，毛泽东在讲话中，再次强调：大搞民兵，大搞特种武器。

大搞特种武器！毛泽东发出了加速进程的命令。

1958年11月，为加强对科研工作的领导和协调，苏振华又力主成立海军科学技术研究部，选调老大学生于笑虹担任部长。瞄准世界各国海军新技术的发展，着手追赶。我军历史上从来没有设过这样的机构，当时，也唯有海军设立了这一部门，得到了中央军委的支持、批准。

### 与苏周旋有理、有利亦有节

正在这关键时刻，1958年夏，苏联要求在中国建立长波发信台、远程收信台以及在中国建立潜艇基地和“联合舰队”，这是涉及维护中国主权和尊严的严重问题。

4月18日，苏联国防部长马利诺夫斯基致函我国国防部长彭德怀，提出由中、苏两国在中国华南地区合建大功率的长波电台。6月间，苏联政府送交中国政府一份由他们草拟的协议（草案），公然提出，为了“苏联国防部的需要”，在中国境内，两国共同建设长波电台，所需费用，苏方负担70%（技术设备和材料），中方投资30%（土建）。建成后长波台的使用按“投资比例划分”。而且，急切要求6月上旬便派苏方人员前来勘察建台地址。

海军分析，苏方的要求如此紧迫，可能是已经组成了能够携带导弹的潜艇舰队，将在印度洋，以及通往美国海岸的太平洋区域活动，很想在中国有利地区建立长波台，以便沟通与舰队的联系。

海军把对苏联意图的分析和草拟的谈判的意见，向中央军委报告，由彭德怀转报党中央、毛泽东。

毛泽东仔细审阅了所有材料，于6月7日在彭德怀所拟的谈判稿中加写了一段，对其中的一些话，特别加了着重点：这个无线电中心的投资，应当

由中国方面负担，中国责无旁贷。建成后可以共同使用，应当由两国政府签订正式协定。

7月21日，苏联驻中国大使尤金求见毛泽东，转达了苏联方面的要求：共同建设和共同使用长波电台，在中国建立潜艇基地；中苏建立“共同舰队”。尤金说：苏联的黑海“容易被敌人封锁”，北方的海面“更不宽阔”，东面的海上“不能算安全”，支支吾吾，不敢吐露真实意图。

毛泽东严正要求尤金讲清楚，尤金无言以对。毛泽东说：“你讲不清楚，请赫鲁晓夫同志来讲。”

尤金向莫斯科作了紧急报告，奉命再次求见毛泽东，又一次提出建立“共同舰队”的要求，说是为了对付美国第7舰队。

于是，赫鲁晓夫在7月31日秘密访问中国。

毛泽东仍然礼节性地到南苑机场迎接赫鲁晓夫，然后各自乘车直驶中南海颐年堂，立即进行会谈。

互致问候，各自坐下后，毛泽东开门见山说：“尤金向我谈了你们那么个意思，但没有说你们究竟出于什么考虑。你自己来了，这很好。我们一起谈谈好。”

赫鲁晓夫打着手势，以恩赐和索取报偿的态度打他的如愿算盘，要求在中国得到潜艇基地，共建长波电台。他越讲越兴奋，越讲越得意，一如他后来回忆录中所说：“我们已经答应了毛的要求愿意帮助他建造潜艇。我记得我们已经把设计图纸交给了中国人，还派出专家帮助他们选择建造潜艇的地点。因此，当我们提出要在他们领土上建立无线电台的时候，我们满以为中国人是会给予合作的。”

毛泽东打断他的话，说道：“你讲了很长时间，还没说到正题。”

赫鲁晓夫十分尴尬。

毛泽东直戳要害质问道：“请你告诉我，什么叫做‘共同舰队’？”

赫鲁晓夫十分圆滑，支吾其词，喋喋不休地重复建立潜艇基地、长波电台的必要性。

毛泽东动怒了，愤然起身，指着赫鲁晓夫说：“我问你，什么叫‘联合舰队’！”

赫鲁晓夫仍然一味搪塞，说道：“我们不过是同你们共同商量商量……”

毛泽东愤怒地说：“什么共同商量，我们还有没有主权了？”

陪同赫鲁晓夫的费德林是一个汉学专家，他用俄语提醒赫鲁晓夫说：“毛泽东可真动火了。”

赫鲁晓夫仍然不死心，说道：“毛泽东同志，我们能不能达成某种协议，让我们的潜艇在你们国家有个基地，以便加油、修理，短期停留？”毛泽东断然说：“不行！我不想再听到这件事。”

毛泽东始终坚持中国独立出资建设长波台，断然拒绝赫鲁晓夫建立潜艇基地和建立“共同舰队”的要求。

1958年8月3日，中国、苏联政府正式签订关于中国大功率长波无线电发信台和远距离无线电收信中心的协定。协定规定由中国自建，苏方提供技术援助，所需费用全部由中方负担。建成后中、苏双方共同使用，使用方法，另行商定。

赫鲁晓夫后来在回忆录中如此写道：

我们刚开始生产内燃机潜艇和核动力潜艇的时候，我们的海军就向我们提出建议，要求中国政府允许我们在中国建立一个无线电台，以便我们能同在太平洋的苏联潜艇舰队保持通讯联络……

结果呢，中国人就是不合作。他们的反应既愤怒又激烈。当我们驻北京的大使尤金向中国领导人提出这个建议的时候，毛叫嚷了起来，说：“你怎么敢提出这样的建议，这种建议是对我们民族尊严和主权的侮辱！”尤金向中央委员会发来了一封吓人的电报，描述了毛的愤怒的反应。

我们领导班子讨论了这件事，根据中央委员会主席团的指示，决定由我乘飞机到中国去一趟。由于我们是去讨论军事方面的事情，陪同我去的有马利诺夫斯基，还有库兹涅佐夫。这是一次秘密访问，我们微服而行。我们要求中国同志接待我们，他们同意了……

关于我们要求建立无线电台的事，我向毛道歉说，我们根本没有想到要侵犯中国的主权，干涉中国的内政，影响中国的经济，或者伤害它的民族尊严。

作为回答，毛提出了一个反建议：“给我们必要贷款，我们自己来建这个电台。”

“很好，”我说，“这是一个很好的解决办法。我们会把图纸、设备和技术顾问都给你们送来，还会给你们必要的贷款。”

“行，”毛说：“我同意。”

这个问题谈了这么多。另外还有一件事。我们的海军希望在中国沿海港口能为我们的潜水艇加油，让艇上人员上岸休假。当我向毛提出这个想法的时候，他又斩钉截铁地当场拒绝了。

“毛同志，”我说，“我们简直不能理解你。我们使用你们的港口，这对我双方都是有利的嘛。”

“话不能这么说。”他回答说，“我们正在建设自己的潜艇舰队。如果苏联潜艇可以进出我国港口，那不成了侵犯我国主权了吗？”

“好吧。那么也许你会同意一种互惠的安排：我们有权使用你们太平洋的港口，作为交换条件，你们可以在苏联北冰洋沿岸建立潜水艇基地，你看怎么样？”

“不行，”毛说，“也不能同意。每个国家的武装部队只应驻扎在自己本国领土上，而不应驻扎到任何别的国家中去。”

“那好，我们不坚持原来的建议了。我们就用自己现有的设施凑合好了，用我们自己在远东的港口作为太平洋潜艇舰队的基地。”

对于毛的回答我不能反对得太强烈了。我们当时提出在中国建立潜艇基地这件事，也许做得急了点。他们显然猜疑我们为将来的入侵活动取得立足点。

赫鲁晓夫离开后，毛泽东即去南方视察。9月19日晚7时，他在蒙蒙细雨中从裕溪口渡过长江，来到安徽芜湖造船厂，夜宿在造船厂的招待所里。第二天，9月20日下午，他和张治中、罗瑞卿等视察正在建造的鱼雷快艇。

工厂的同志知道毛泽东来到了他们工厂，早早地在工厂道路和造船用的横移滑道旁等候。

毛泽东来了，人们热烈鼓掌欢迎。

天还下着雨，而且雨滴很大，安徽省的领导同志对毛泽东说：“天下雨，请主席去看车间吧。”

毛泽东看着道路两旁，防波墙上，直至树上，都是人群，他笑笑说：“我先到那边去一下，再去看车间。”

毛泽东走到人群面前，人们争相伸出手来同他握手，有人情不自禁地喊道：“毛主席万岁！”“中国共产党万岁！”毛泽东举手答礼。

毛泽东在车间看到许多大马力鼓风机，惊喜地问道：“你们能制造大型炼钢设备吗？”

十分急切，殷殷期待。

毛泽东视察了船台上正在建造的“02”型鱼雷快艇，又在车间看到4艘已经装配好的快艇，问道：“这是什么艇？”

驻厂海军军代表王玉璋回答说：“远航鱼雷快艇。”

毛泽东问：“是铁的吗？”

“木制的，主要是红松、柏木和落叶松木料。”

毛泽东又问：“不用铁吗？”

“用得很少。”

毛泽东看到涂成深色的快艇尾部，问道：“那也不是铁吗？”

“那是铜的。”

毛泽东“哦”了一声，问道：“这艇多重？”

“标准排水量62吨。”

毛泽东仍然没有忘记钢铁，再次问道：“你们能不能制造大型炼钢设备？可不可以制造潜水艇？”造船厂的同志回答说：“能够制造。”

毛泽东看了看他，说道：“那很好。”

王玉璋大胆地提出请求说：“主席，我们想请您乘坐我们制造的鱼雷快艇。”

毛泽东高兴地说：“好哇。”又谦虚地问道：“可以让我们坐吗？”王玉璋说：“特意请您坐！”

毛泽东说：“你们十分钟能准备好了吗？”

227艇的指战员立即上艇准备，只用了5分钟，便做好了出航准备。

14点50分，毛泽东登上227号鱼雷快艇指挥台。

中队长操纵鱼雷快艇离开码头，向大小梁山方向的宽阔江面驶去。

快艇以20节的速度飞驰，艇首翘起，江水迎面奔涌而来。毛泽东转头问操纵快艇的中队长：“能再快些吗？”

“能。”

鱼雷快艇增速到30节。风声、水声在耳边呼啸。

毛泽东又问：“还能不能再快？”

鱼雷快艇加大时速到35节，快艇似乎要在水面上飞起来了。江面上三、四级风浪，鱼雷艇高速航行，乘风破浪，冲刺疾进。尽管不时在浪上跳跃，艇身剧烈颠簸，毛泽东却显得十分惬意，说道：“这艇很好，跟坐在小汽车里差不多嘛，很稳当。”王玉璋对毛泽东说：“艇身是木壳的，木制材料韧性好，有减冲减震的作用。”

毛泽东满意地点点头，又向他问及鱼雷艇的构造、性能，王玉璋一一作了回答。

前方已经到了四会山江面，鱼雷艇施放了液体烟幕。艇尾托出一条白色的长龙，继而烟雾散开，江面上顿时扯起了一张雾幔，如同涌起一道乳白色的云墙。

毛泽东兴奋地问道：“烟幕用什么材料，都有什么成分？”

王玉璋又一作了回答。

鱼雷快艇返航，轻盈地靠上码头。毛泽东从驾驶台下来，走向每个战位。他来到鱼雷发射管旁边，对鱼雷班长刘述记说：“鱼雷是怎样发射出去的？”

刘述记作了简要说明，把鱼雷发射管后盖打开请毛泽东看。毛泽东俯下身，仔细察看发射管内部。

从鱼雷艇下来，毛泽东又走到码头上两条操雷旁边，兴犹未尽地仔细端详，对鱼雷班长说：“请你给我讲讲，鱼雷是怎样在水中航行的？”

鱼雷班长作了回答。

毛泽东又问：“一条鱼雷装多少炸药？怎么爆炸？”

毛泽东专注地听着鱼雷班长的介绍，非常满意，用双手比划着，风趣地问道：“鱼雷打中了，能把敌人军舰炸一个大洞吗？”

“能，能炸一个很大的洞。”鱼雷班长和水兵们抢着回答。

毛泽东笑了，说道：“好，那好得很啊！”

苏振华深深感激毛泽东对海军建设的关心。毛泽东已不止一次视察海军造船工程了。1956年1月，毛泽东在陈毅元帅陪同下，视察了上海江南造船厂正在建造的第一艘“03”型潜艇。从毛泽东的问话中，特别是他一再提到钢铁生产，苏振华深深体会到毛泽东要尽快建设强大海军的心情。想到毛泽东去南方前同赫鲁晓夫的会面，他那坚定的态度，犀利的语言，使赫鲁晓夫不得不放弃在中国建立潜艇基地的打算，但也一定使毛泽东痛感中国需要钢铁，中国需要自己制造军舰，中国需要强大！

苏振华要求把毛泽东视察快艇建造的情况，通报海军各单位，激励人们牢固树立起自力更生，加强海军装备建设的思想和信心。

为了力争苏联技术援助，党中央决定派以苏振华为团长，由海军、有关工业部门和科研单位负责人方强、张连奎、刘杰、刘秉彦、王士光、林真等组成中国政府代表团，去苏联商谈海军技术协定。

行前，周恩来总理、彭德怀国防部长和黄克诚总参谋长指示，谈判一方面要适可而止，一方面要争取尽可能扩大商谈成果，志在必得新式装备及全部技术资料 and 转让制造权利。苏振华预计谈判将是困难的，出国前必须做好充分准备。经过反复斟酌，决定选调一批有实际才能，有相当技术基础的中年、青年科技人员参加代表团，通过访问、参观、谈判，得到锻炼，并尽可能多而深入地了解科技发展情况和相关信息。

从1958年11月到1959年2月，经过三个多月艰苦谈判，双方达成协议：苏联卖给中国常规导弹潜艇、中型鱼雷潜艇、导弹快艇、水翼鱼雷艇和潜对地弹道导弹、舰对舰飞航式导弹及制造特许权。这有助于提高我国造船工业水平，帮助我们缩短海军装备技术与世界先进水平的差距。

但是，关于核动力装备的技术，苏联方面称，目前还没有准备好提供这方面的装备和技术援助，导弹驱逐舰方面也不可能给予援助。我方“抛砖引玉”地提出咨询，苏方也避而不答。

苏振华向国内汇报了谈判情况，邓小平当即明确指示：不要再提了。代表团决定按照原定方针，适可而止。

1959年1月29日，毛泽东审阅了协定草案，圈阅同意。于是，苏振华代表中国政府在2月4日同苏方签订了关于苏联对中国海军舰艇制造方面提供技术援助的协定。中国以有限的经费，争取到苏联以比较优惠的条件卖给5种型号的舰艇、导弹技术资料以及样品和转让制造权。

代表团回国了，参加访问、谈判的中、青年技术人员，后来都成了中国

造船工业的骨干。

在此以前，1953年6月4日，由罗舜初等经过长时间艰苦谈判，曾与苏联政府签订一项海军协定，协议三年内中国向苏联购买143艘小型战斗舰艇，其中10艘成品，其余为半成品，由中国自行组装，同时还购买辅助舰艇84艘、飞机260架、海岸炮108门；协议苏方提供有关技术资料并派遣专家来中国帮助培训技术人员。所有这些由苏联提供的技术援助，对提高我国造船工业技术，增强我国制造海军舰艇的能力，起了积极作用。在西方对中国实行严密封锁下，这种援助是十分宝贵的，中国人民永远不会忘记。

### 造核潜艇历尽坎坷志不渝

为了加强海军装备建设，苏振华明确指出：“大力开展科学研究设计工作，是建立造船工业的基础和突破尖端技术、自力更生的极重要的先行环节。”经海军党委讨论决定，着重抓紧导弹驱逐舰、护卫舰、核潜艇的设计制造。并按党中央的要求，选派方强、赵启民、边疆等海军高级干部到有关工业部门担任领导工作。

50年代，举国上下，意气风发，神州大地，激荡着摆脱落后，力争上游的热情。苏振华时时有一种重任在肩的历史使命感。

回顾历史，古代中国，是一个举世公认的海洋强国。

“见窾木浮而知浮舟”。“剡木为舟，剡木为楫”。古代中国人和古腓尼基人、埃及人一样早地利用舟楫“以利不通”。

早在春秋时，吴、楚等国就建立了“舟师”。秦、汉时，农业、医药、天文、历算等科学技术进步，促成了中国造船的第一个高峰。汉武帝时，即有千人巨舶，航行于“海上丝瓷之路”之上。中国人最早使用帆，而且懂得利用多帆，充分发挥风力作用。三国时成书的《南洲异物志》载：有一种船“其四帆不正向前，皆使邪依相聚，以取风吹……放行不避迅风激波，所以能疾。”中国人最早使用橹和舵，“一橹三桨”，橹的摇动，不间断地产生推动力，比桨更具优越性；舵的使用，使得巨舶能够顺利航行，这是了不起的科学技术进步。祖冲之曾经造“千里船”，可“日行百余里”。特别有意义的是东晋《拾遗记》中就曾大胆设想一种“沉行海底，而水不浸”的“沧波舟”。这可能是人类最早提出的水下潜航的设想。

在封建盛世的唐朝、五代和宋朝，中国海船著称于世。阿拉伯人苏莱曼在公元851年所著《印度——中国游记》里写道：“中国唐代的海船特别巨大，抗风的能力强，能够在波斯海里畅行无阻。”在宋代，指南针普遍用于航海。公元1119年，北宋《萍洲可谈》载：“舟师识地理，夜则观星，昼则观日，阴晦则观指南针。”这是对人类的重大贡献。唐代建造了“车轮舟”，“挟二轮踏之，翔风鼓浪，疾若挂帆席”。这是机械推动船舶的第一步。

元、明时，中国造船业达到极盛。元世祖忽必烈第一次派900艘战船、4万人东征日本，第二次派3500艘战船、10万人东征日本，可见水师的强大。明代举世无双的郑和宝船舰队，扬威海上，结好亚洲、非洲。明正德七年，公元1512年，水师使用“水老鸦”作战，“藏药及火于炮，水中发之……以啄钻船，而机发之，以自运转，转透船沉。”这可以说是世界上最早的鱼雷。这时还出现了“火龙出水”多级火箭，能在水面飞行二三里，攻击敌船。

古代中国，有过建造战船的辉煌时期，只是随着封建王朝的没落、腐败，

外国帝国主义入侵，中国落后了。今天，要迎头赶上，我们一定要建成中国的核潜艇。

苏振华向专家请教过，也请有关部门收集资料，深知建造核潜艇的艰难。他注意到世界各国都把制造核潜艇的技术，作为最高机密严加保守，尤其对中国实行封锁，这就格外增加了我们研制核潜艇的困难。

1939年德国人奥托·哈恩、弗里茨·斯特拉斯曼成功地分裂了铀原子核以后，美国海军科学家认为有可能把核动力用于舰艇。1946年8月，美国总统杜鲁门批准进行研究。1948年任命海军四星上将里科弗为海军研究部核动力处处长，开始了发展核动力装置的工作。他们走到这一步用了近十年的时间，后又用6年时间，到1954年1月，才有“鳐鱼号”试验核潜艇下水；同年12月启堆进行系泊试验；1955年开始航行试验，耗资10亿美元以上。以美国雄厚的经济实力和先进的科学技术，犹如此费力、费时，可见这不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苏振华从亲身经历中，从与苏联谈判引进新型装备技术的艰难中，从苏方拒而不谈核潜艇、核动力问题，深刻认识到中国人民只能依靠自己，自力更生，知难而进，除此之外别无他途。

1959年6月15日，海军党委的同志们聚集在大连，举行海军党委六次全会，重温毛泽东的指示，研究海军装备建设方针。苏振华特意邀请著名科学家钱学森、钱令希等到会讲授导弹、力学等现代科学知识，分析核动力和导弹武器出现后海上作战前景。经过会议研究，海军党委向中央军委报告：导弹武器和原子动力在世界海军技术装备上引起重大变化，我国海军建设有必要进入新的发展阶段，有必要对空、潜、快为主建设海上轻型兵力的方针加以补充和发展。今后10年应以发展原子动力和导弹武器为主与改进常规武器相结合，加强海军技术装备建设。

海军坚定地沿着毛泽东指示的航向继续前进。

就在这时候，1959年6月，苏联单方面废除了1957年开始生效的中苏关于原子合作的协议。后来，赫鲁晓夫在他的回忆录《最后的遗言》中，作了这样的描述：

我们的专家建议我们给中国人一枚原子弹样品。他们把样品组装起来并装了箱，随时可以送往中国……我们专门开了一次会，决定该怎么办。我们知道，如果我们不给中国送去原子弹，中国人一定会指责我们违背协议，撕毁条约，等等。另一方面，他们已经开展诽谤我们的运动，并且还开始提出各种各样令人难以置信的领土要求。我们不希望他们获得这样的印象，好像我们是他们驯服的奴隶，他们要什么，我们就给什么，而不管他们如何侮辱我们。最后，我们决定推迟给他们送去样品的时间。

从中可以看出，赫鲁晓夫把两党分歧扩大到两国关系，背信弃义撕毁了已经达成的协议，向中国施加压力。

1959年9月30日，赫鲁晓夫飞到北京参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10周年庆典。他正因访问美国与艾森豪威尔会谈，推出了所谓“戴维营精神”而洋洋自得，对中国的事情，横加指责，出言不逊，引起陈毅等激烈驳斥。第二天，10月1日，在天安门城楼上，赫鲁晓夫突然向毛泽东冷冷地说：“关于这个生产原子弹，我们是不是把他们撤回去？”



撤走专家，废除技术援助协议，本是意料中事，而赫鲁晓夫竟选择这样的场合和时机提出来，令人愤慨。但毛泽东平静地，也冷冷地回答说：“我们需要是需要，不过撤回去也没什么大关系。如果技术上能帮助一下更好，不能帮助就是你们考虑决定的事情了。我们可以自己试试，这对我们也是一个锻炼。”

针对外国封锁，毛泽东断然提出：“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

周恩来指定苏振华担任核潜艇研制领导小组组长。

苏振华立即着手组建工作机构，动员全国力量投入这一工程，组织核动力开发研究。毛泽东指示：“自力更生，大力协作，办好这件事。”

毛泽东的召唤，激励人们积极投入核潜艇研制工程，努力实现百年愿望，丢掉落后帽子，重振海洋大国雄风，苏振华鼓励同志们为中国人民争气，努力建造出“争气艇”！

1960年6月，在布加勒斯特举行了世界各国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的预备会，中国代表团坚持独立自主的原则。会后，苏联在7月10日突然照会中国，单方面决定撤走所有专家，1959年2月4日协定中规定供应的舰艇与导弹的资料和部件也不再供应，使正在建造的舰艇陷于困难境地，有半途而废的危险。我们不得不集中国内技术力量，优先解决这项生产中的技术难点。

中国人不信邪，有志气，中国核潜艇研制工作仍然继续进行。1960年6月，由彭士禄主持，北京原子动力所提出了《潜艇核动力方案设计(草案)》。

遵照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的决定和指示，苏振华力主把分散的科研力量集中起来，形成拳头，加强组织领导，充实科研队伍，加快科研设施建设，逐步形成较完整的造船科学研究体系，为自行研制新型舰艇打下基础。经中央军委批准，于1961年组建舰艇研究院，调得力干部刘华清、于笑虹和戴润生担任领导。

1962年，由于巨大的天灾，加上工作失误，国民经济十分困难。赫鲁晓夫施加压力，更是火上加油。中国许多建设项目被迫下马，核潜艇研制工作也面临难以前进的困难。一方面是人力、财力困难；另一方面，通过几年实践，对于制造核潜艇的艰巨性、复杂性、长期性有了进一步的深刻认识。一般西方国家都是在第一次核爆炸后，经过大约10~12年才研究、设计成功动力堆。我们原来设想在几年内很快走完这一过程是不现实的。核潜艇工程势将暂时停止。

苏振华心有不甘，十分焦虑。他找来许多同志和专家探讨，究竟如何办好？一种意见认为制造常规潜艇尚且困难，何必搞核潜艇；另一种意见坚持进行研制，但要调整计划，推迟原定完成时间。经过反复研究，海军党委于7月20日向聂荣臻报告，请求适当保留必要的骨干，不中断对一些技术复杂、周期长的项目的研究，为将来重新上马创造条件。

中国的元帅们对此极为关切。

聂荣臻接到报告后，反复考虑了20多天，终于在8月13日批示：拟同意。请瑞卿同志审阅后报军委常委并报中央。

10月间，罗荣桓、贺龙元帅圈阅，同意聂帅的意见。

刘伯承元帅批示：素无研究，只觉得集中力量先解决关键问题，如解决核爆炸之类是对的，但为保留核动力研究成果深钻，似应保留少而精的骨干以发展成果。

叶剑英元帅批示：请考虑：既然先要核爆炸过关以后，何不先集中力量

搞核爆炸？

徐向前元帅批示：如不妨碍集中力量搞一般的情况下，还要保留一部分人力继续研究一些必要的项目，因为科学研究是个长时间的问题，不然将来一旦需要，再搞就来不及了。

陈毅元帅热情激荡地写道：我不赞成这方面的缩减，而赞成继续进行钻研，不管要八年、十年或二十年才能成功，都应加紧进行。

朱德元帅批示：酌留一些人研究。

十位元帅，除彭德怀因受到错误批判不再有权过问，林彪不知何故没有表示态度，其他八位元帅都表示了坚持研制核潜艇的热心。

党中央总书记邓小平圈阅同意。

毛泽东最后圈阅同意。

1963年3月，周恩来主持会议，部署留下少量的技术人员继续研究，由海军具体组织实施。苏振华坚决贯彻执行，尽可能多地保留必要的骨干。

在渤海边，一个叫望海寺的地方，有几排平房，大风起时，海滩上的石头被刮得满地乱滚。留下来继续研制核潜艇的人们在这里安营扎寨，一个人担起了几个人的担子。虽然没有规定完成任务的期限，但人人都在抢时间加紧工作。

天寒地冻，没有煤火取暖；粮食奇缺，定量供应的口粮不能支持一个人正常的需要。人们忍饥挨冻工作到深夜，甚至通宵达旦。人们喝一碗开水，压下空腹的咕咕鸣叫，继续埋头工作。他们坚信，核潜艇一定会开航！

### 十年艰辛群英高唱“争气歌”

1964年10月16日，中国西部浩瀚的沙漠上空，升起了原子弹爆炸的蘑菇云，驱散了笼罩中国三年的“晦气”。苏振华日夜不能忘怀的核潜艇研制工程，这时便又提到了他思考的重要位置。

1965年6月8日，苏振华重病住院，经军委批准，将进行剖腹探查。这是一个大手术，术前要求安静休息和认真准备。这时候，钱学森主动提出要来海军谈导弹发展方向问题。苏振华听了，十分高兴。多年来，苏振华同许多著名的科学家、核动力专家、导弹专家、电子专家有着深厚的友谊。他特别尊重知识分子，从他们那里得到教益和帮助，并力主让许多老大学生，如林真、于笑虹、罗钰如等担负海军科技部门的主要领导工作。苏振华还和其他海军领导同志亲自到全国一些高等院校登门求教，请求支援，请他们开设专业课程，帮助培育海军建设亟需的人才。这次钱学森一定有十分重要、十分迫切的建议，苏振华在病榻上写信给萧劲光建议萧司令员能尽快请钱学森来海军，及时听取他的意见。6月10日，苏振华抱病同海军其他领导同志一起，认真听取了钱学森的建议。他诚恳地感谢钱学森和所有科学家对海军建设的支持。

1965年8月19日，中央专门委员会批准核潜艇研制重新上马，核潜艇研制再度开航！

海军副司令员方强被任命担任代号为“09”核潜艇研制工程领导小组组长，他来到望海寺，向同志们说：“‘09’任务和两弹同样重要，是党中央、毛主席交给我们的重要的政治任务。中央军委确定指导思想是：一，抓大力协作，国防科委、国防工办、中国科学院、一机部、二机部、四机部、六机

部、七机部、冶金部、化工部、高教部、海军和许多省市、许多高等学校都参加这一工程；二，立足国内，从现实出发，先研制反潜鱼雷核动力潜艇，缩短战线，争取时间；三，既是试验艇，也是战斗艇，二者结合，多快好省。”

人们激动得流下了热泪。从那个叫人伤心落泪的时刻，人们整整盼望了近 900 个日日夜夜，终于盼到了重新上马这一天。

在这荒僻的海滩，连续召开了研制核潜艇的专业会议。人们像过节一样兴奋，要把耽误了的时间抢回来，尽早把核潜艇送下水。

1965 年 10 月，在苏联撤走专家，不再按照协议提供技术资料和装备的情况下，我国邮电部、三机部、广播事业局的专家们和海军通力合作攻关，建成了中国第一座大功率长波发信台和远程收信台，而且，又开工建造了第二座长波无线电台。这将保证中国舰队和潜艇，无论行驶在地球上哪一处海洋上，都可以通过无线电波同祖国紧密相连。

1966 年 12 月，“文化大革命”席卷全国，许多重要军工生产面临困境。遵照聂荣臻指示，由已经担任国防科委副主任的刘华清主持，在北京饭店集中了一批专家，会审“09”总体方案。会议决定加快核潜艇研制进度。

1967 年 1 月，林彪操纵李作鹏等人篡夺了海军领导权，苏振华被“打倒”了，他不为个人安危着急，但为海军建设担忧，为核潜艇研制担心，为所有新型舰艇的研制担心。他忧心忡忡，但束手无策，徒唤奈何。

“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使核潜艇研制的许多项目无法落实，核潜艇研制有搁浅的危险，聂荣臻毅然批准在北京召开“09”工程第三次协调会议，强调要求所有接到通知参加会议的人员，即使正在被批斗的也必须按时到会。

聂荣臻不顾自己的困难处境，出席会议鼓励 300 多位与会的厂长、所长、党委书记、技术专家，他语重心长他说：“毛主席早就讲了，核潜艇，一万年也要搞出来。1965 年，党中央、毛主席批准了重新研制、建造核潜艇。这项工程工作量很大，协作面很广，一环扣一环，紧密相关。每一部分工作都要从大局出发，只能提前，不能拖后，不要因为自己的部分，影响整个进程。一定要千方百计克服困难，一定要努力按时完成任务，为加强我国国防做出新的贡献。”

许多单位承担的研制项目能够进行了，但是，一些两派闹得厉害的单位仍然无法进行工作。“09”工程办公室主任陈右铭十分焦急。他原是海军一支快艇部队的支队长，有志于建造舰艇，还曾经根据实战经验，提出过自行设计快艇的设想。苏振华等领导同志在部队检查工作时发现了他的才能，将其选调到海军领导机关工作，担任舰艇研究院副院长。这时，陈右铭深感核潜艇研制工作的任何一个环节都必须协调运转，不能停顿。他思来想去，提议由中央军委发出一个“特别公函”，派专人去各有关研究所、工厂传达，或许能够奏效。当时，一些人正高声喊叫“砸烂修正主义的管、卡、压”，“反对以生产压革命”，这“公函”要冒逆潮流而动的危险。但他们还是要试一试，起草了“特别公函”的草稿。刘华清看后，大胆地签署，提请聂荣臻批准。7 月 30 日，聂荣臻在阅审这公函的当天，即予以签发。“09”办公室的同志持“特别公函”跑向全国。每到一处，召开大会，大讲毛泽东亲自批准建造核潜艇，任何人都不准冲击、干扰。这一道特殊情况下的“特别通行证”，使“09”工程畅通无阻。在当时武斗、派仗十分严重的情况下，许多生产都停顿了，唯有担负核动力装置研制的 60 多个工厂、研究所的同志们

始终抖擞精神，坚持工作。

毛泽东关注核潜艇研制，针对核潜艇建造工作受阻，在关键时刻，连续几次亲笔批示，加快了核潜艇研制的进程。

1968年11月23日，“09—1”核潜艇开工建设。

1970年12月26日，中国第一艘核潜艇胜利下水。

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原因，1969年12月，林彪的亲信李作鹏曾取代方强，担任过核潜艇研制领导小组组长。林彪叛逃坠机暴死后，有人竟说核潜艇研制是“黑工程”。在此时刻，毛泽东于1972年8月12日亲自签发电报，批准第一艘核潜艇扩大航行试验，为“09—1”首艇解缆出航。“09—1”先后出海20多次，进行了200多个项目试验。

一万年太久，中国第一艘核潜艇从提出方案设计到完成试验，仅10多年，其中还有两年被迫停顿。这速度是快的。中国第一艘核潜艇打破美国第一艘核潜艇“鳐鱼号”连续潜航84天的纪录，通过最大自给力试验，最大下潜深度也超过“鳐鱼号”的纪录，充分显示了良好的适航性、隐蔽性、机动性和可靠的核动力系统。

试验结果评定：“我国第一艘核潜艇设计、制造是成功的。”

在建造反潜鱼雷核动力潜艇的同时，1967年3月18日，刘华清主持讨论研制导弹核潜艇的初步设想，钱学森等专家们亦主张立即进行研制。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一设想。同年6月，能够在全球海洋航行的导弹核潜艇研制工作开始进行。

与此同时，又一项战略工程，保障中国洲际弹道导弹全程试验的“718工程”，经毛泽东批准也在1968年启动了。

### 承认差距急起直追世界惊

粉碎了林彪反革命集团后，苏振华重新回到海军领导岗位。1973年3月1日，中央军委任命苏振华为海军第一政委，并担任海军党委第一书记。他一如既往，关注海军装备建设，他为核潜艇的胜利建成而高兴。他调查和总结核潜艇研制工作的成功经验，力主定型生产，针对某些同志的犹豫，他指出：定型了今后也还要改进，科学是不断发展的。

1973年9月21日，渤海辽东湾，《东方红》的乐曲声随着黎明响起。

太阳升起来了，“09—1”型鱼雷攻击核潜艇、“051”型导弹驱逐舰、“053”型导弹护卫舰、常规潜艇、“037”型猎潜艇以及导弹快艇、高速护卫艇、扫雷舰的甲板上，同时升起了国旗。

水兵们在甲板上站坡，以海军的隆重礼节，迎接党中央、中央军委首长检阅。

集结在这里的是60年代以来，中国自己研究、设计和建造的海军第一代主战舰艇。这是几十年间海军指战员、科研、造船部门和全国各方面专家、工人奋斗的成果，是近代中国人民百年愿望的体现。

军委副主席叶剑英，军委、各总部、国防工办及有关工业部的领导同志，由海军领导同志陪同来到军舰上。

海上西南风三级，水波粼粼。军舰启航，将要进行导弹实射，请首长检阅。

14时20分，军舰进入战斗航向。

14时30分，战斗信号旗升上桅顶。

舰长发出口令：“前右管导弹发射！”

前发射架右管在右舷109度14分，顺利发射一枚导弹。

导弹带着桔红色的尾焰，贴着海面疾飞。一会儿，传来命中目标的报告。

15时30分，后发射架右管在右舷67度14分，又顺利发射一枚导弹，同样击中目标。

第二天，12时25分，军舰在预定海区，又齐射两枚导弹，都准确命中目标。

叶剑英元帅十分高兴，向所有参加建造工作的同志和水兵祝贺，并鼓励大家：“核潜艇、导弹驱逐舰都造出来了，人民感谢你们！全国各地、各方面努力贯彻毛主席指示，自力更生，大力协同，实行三结合，建成了这些新型舰艇，加强了我们的国防力量。”“你们要来个猛进，要赶上去。猛进才能赶上。你们要努力，赶上和超过敌人。”

叶剑英向苏振华等指示说：“今天看到的几型舰艇，证明了我们科研人员、工厂职工、使用部门三结合方向是正确的。苏振华在这里留两三天，准备研究一下以后的做法。各工业部的同志要参加研究。昨天晚上，我请示总理同意，要做到第一生产不断线；第二全国配套，协力不散伙；第三定点不要变。希望大家努力协作，按照毛主席的指示，为建设强大的海军而努力奋斗。”

当此之时，苏振华回顾近百年来，中国人民建造军舰的历程。

从1864年上海江南制造局开办，特别是1865年开办马尾造船厂以来，多少仁人志士发奋图强，一心想制造出中国自己的军舰。他们深深懂得“海疆非此，兵不能强，民不能富”。“必使中国水师可以使楼船于海外，可以战夷船于海中，庶几有备无患。”19世纪80年代，马尾船政学堂第一届毕业生魏翰等人根据英国图纸，制造出中国第一艘巡洋舰“开济号”。随后又建造了“镜清号”、“寰泰号”巡洋舰。与当时从外国购买的军舰比，更为坚利灵快。1866~1907年的40年间，马尾造船厂，仿制和自行设计建造了44艘军舰和商船。

中国最大的造船厂，上海江南造船厂在1914年曾建造了排水量800吨的“永建号”、“永绩号”炮舰，1927~1937年的10年间，也建造了“逸仙号”护卫舰、“平海号”巡洋舰等。可是，抗日战争胜利后，除修理舰船外，却几乎没有建造过一艘舰艇。

人民海军建立之初，只有国民党海军起义和我军缴获的舰船183艘，约4.3万吨，加上其他接收、征用、打捞、购买的旧船223艘，约9万吨。这些中小型舰船，多由美国、日本、英国、法国、德国、加拿大、荷兰、澳大利亚等国家建造，而且都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和大战前制造的，有的还是清朝末年我国江南造船厂建造的，都早已超过了规定的服役期限。

海军亟需新的舰艇！

50年代，苏联给了我们宝贵的援助，提供了一些小型舰艇装备和技术资料，派遣专家来华帮助仿造，促进了我国舰艇制造水平的提高。

毛泽东一直鼓励人们自力更生，建造自己的军舰，1952年2月14日，毛泽东来到海军司令部，同萧劲光、刘道生、罗舜初等商量，压缩原定给海军购买装备的外汇，先满足空军解决抗美援朝战争的急需，海军同志服从大局，完全同意。刘道生向毛泽东汇报说，青岛和上海的造船厂都在自力更生

试制小型炮艇，而且取得进展。毛泽东听了十分高兴，说道：“买点材料，自己造，先造小的，为将来发展打基础。”

1952年9月，海军建立舰船修造部，由总设计师徐振骥主持，自行设计，在江南造船厂等工厂建造50吨、75吨的第一代、第二代巡逻艇等，到1955年共建造了236艘，满足了当时沿海护渔、护航和解放沿海岛屿战斗的需要。苏振华很尊重像徐振骥这样的专家。徐振骥1925年马尾飞潜学校第二期毕业，30年代被国民党海军派往国外监造订购军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他和许多中国造船专家一道，参加人民海军的建设。1952年被任命为舰船修造部设计室主任、总设计师。60年代，协助指导设计中型、大型水面舰船，做出了积极贡献。

从1960年起，海军设计、试制排水量100吨的第三代巡逻艇，取得成功。

1959年开始设计、建造适应中国海区作战需要的排水量300吨的猎潜艇，经过几年努力，达到了建造小型舰艇的先进水平。

1960年，开始研制、建造小型登陆艇。70年代，研制具有先进技术水平的大型登陆舰。

早在1960年，海军就开始了导弹驱逐舰的研制，但因国民经济的暂时困难而下马。1965年，随着核潜艇研制重新上马，为了适应未来远程运载火箭试验时护航的需要，导弹驱逐舰的研制也重新上马。1968年12月开始建造第一艘“051”型导弹驱逐舰，1972年12月编入海军序列。

1969年5月，开始自行设计、研制和建造具有远航能力的常规动力潜艇，取得成功。

1960年，组建海军专用飞机研究机构，开始研制海军专用飞机，试制适应中国海洋特点的“水轰—5”型水上巡逻轰炸机。

1968年，自行研制导弹护卫舰。

苏振华想起那些为海军装备建设，特别是为建成核潜艇、导弹驱逐舰做出贡献的专家们，他坐不住了。他找到“09”核潜艇的总设计师黄旭华。这个上海交通大学的毕业生，地下党员，解放战争期间留在学校搞学生运动，上海解放后，参与接收工厂，转入造船工作。多年来，他默默地从事核潜艇的研制，“文化大革命”中受到冲击。苏振华见黄旭华已是满头白发，感慨不已。他清楚地记得黄的年纪不大，那头发是为核潜艇“熬”白的。当外国人对我国实行严密的技术封锁，我们没有可资借鉴的资料时，同志们偶然得到一个国外的玩具潜水艇，也如获至宝，拿来研究一番，希冀得到一点启示。正是在这种情况下，黄旭华带领同志们努力攻关，攻克研制中的五大技术难关，创造性地提出解决办法，成为核潜艇研制中的“五朵金花”。即使在他被关进牛棚的时候，也暗暗地为核潜艇建造出谋划策，帮助年轻同志进行研究也毫不懈怠。

苏振华诚恳地向黄旭华请教，他也坦诚地讲述自己的意见。

另一个比较年轻的同志许君烈，是当年研制工作下马时保留的骨干，如今已是核潜艇研制工作的主力。后来，他继黄旭华之后，担任了核潜艇研究所所长。他是新中国自己培养的大学生。被挑选参加核潜艇研制，这在当时是一项绝对需要保密的工作，他们甚至连挑选终身伴侣也不能那么“自由”。为了国家的需要，许君烈就曾忍痛断绝了同相互爱慕的姑娘的交往。苏振华很敬佩和爱惜这样的同志。

苏振华还想到力学专家钱令希。当“051”型导弹驱逐舰试航时，主机加

大转速，突然产生强烈震颤。海军悄悄去求教钱令希。尽管他正在被批斗，被管制，但还是不顾个人安危，随舰出海，趴在机舱里仔细观察、分析，找到症结所在，提出了切实可行的解决办法。

苏振华也想到那些舰长和水兵们。“051”型首舰首任舰长刘子庚和全舰干部、战士，同造船厂的同志一起参加建造军舰。他们更冒着八九级风浪，在各种复杂海区，进行危险性很大的试航，取得必要的、可靠的成千上万个数据，为改进、完善军舰的设计和建造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苏振华更想到多年来一直为海军装备建设做出很大贡献的干部。从海军初建时起，就有一个很好的传统做法，总是由主管装备工作的副司令员牵头抓总，从罗舜初副司令员起，到后来的赵启民、周希汉、杨国宇副司令员，都起了关键作用，做出了大贡献。担任舰船修造部部长的林真，是30年代投身抗日救亡斗争的燕京大学学生，后来担任海军副参谋长，对海军舰船发展方针的制定、舰船设计研制、海军工厂建设起到了重要作用。于笑虹也是早就投身革命的老大学生，担任海军科学技术部部长、海防导弹学院院长，也对海军装备建设有大贡献。刘华清被选调来担任海军舰艇研究院院长、海军副参谋长，后来转任国防科学技术委员会副主任，特别是在“文化大革命”中，在多数同志无法工作的情况下，他在周总理领导下，坚持工作，做出了贡献。

苏振华一方面为已经制成核潜艇、导弹驱逐舰等新型舰艇的成就而高兴，一方面又痛感耽误了许多无法追回的宝贵时间，必须急起直追。

中国的导弹发展迅速。“东风五号”洲际弹道导弹需要做全程飞行试验，由中国本土发射，溅落南太平洋某一海区。选定试验靶区，发射时进行海上测量，落区警戒，回收试验数据舱，需要一支庞大的专用船队和强有力的护航舰队。

主测船、远洋调查船、拖船、打捞船、油水补给舰，都需要加紧建造。

“09—1”型核潜艇、“051”型导弹驱逐舰需要定型，投入批量生产。

苏振华按照周总理、叶剑英元帅的指示，同有关部门和专家们研究确定，采取有力措施，加快“09”、“718工程”进度，很快收到了成效。

1974年，为加强“09”、“718”工程的领导，中央决定，苏振华担任领导小组组长，余秋里、周希汉、方强、钱学森任副组长，陈右铭为办公室主任。苏振华总结核潜艇研制成功经验，反复强调加强统一领导，坚持大协作，改善科研、生产、使用的三结合。两项工程的进度加快，进展顺利。

1974年8月1日，海军萧劲光司令员宣布中央军委命令：第一艘核潜艇，编入人民海军序列，命名为“长征一号”。

“051”型导弹驱逐舰、“053H”型导弹护卫舰、测量船、各种辅助舰船陆续建造成功。

苏振华仍然清醒地认识到，海军经过20多年的奋斗，由仿制到自行设计、研制，取得了可喜的进步，建造了适应今后一个时期的主战舰艇，但同世界先进水平比，无论是数量、技术性能，都还有相当大的差距。

1975年5月3日，毛泽东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他同每一个到会的政治局委员握手交谈。他握着苏振华的手，语重心长地说：“我们的海军要使敌人怕。”说着，又不无遗憾地用小拇指比划着，“我们的海军只有这么大！”他又鼓励地说道：“海军要靠你呀！”

苏振华深感责任重大，深感海军建设离毛主席的期望，离人民的要求还

有很大距离。他立即向海军领导同志传达了毛泽东的指示，但没有传达最后一句话。他说：“这是毛主席对我们全体海军同志的厚望。我们怎么办？我们要拿出实际行动来落实毛主席的要求和指示。”

毛泽东的话传达给全体海军官兵，振奋了海军精神。海军党委组织专家、科技人员，日夜研究、论证，提出了一个新的海军发展十年规划，报告毛泽东。

毛泽东审阅了规划，于5月23日批示：努力奋斗，十年达到目标。

人民海军，经过几十年奋斗，结束了中国百年来有海无防的历史。打破了帝国主义、霸权主义从海上对我国的遏制，有效地保卫了祖国海防，维护了中国海洋权益。

1980年5月，人民海军和国防科委、国家海洋局、交通部共同组织由6艘导弹驱逐舰及测量船、补给舰、调查船、拖船等共18艘舰船，总吨位17万4千吨，组成“580编队”，载着5316名干部、战士和技术人员，分三批从舟山群岛集结地出发，由编队指挥员兼政委、海军副司令员刘道生率领，驶出领海，跨越赤道，向南纬6度44分、东经170度40分南太平洋海域驶去，以保障我国远程运载火箭全程试验。这是一次和平的战斗航行。

自1405年郑和宝船舰队航行在大洋上的500多年之后，中国的庞大舰队又重新跨海越洋。

人民海军舰队第一次跨出岛链，第一次越过赤道，第一次作如此长距离的远航，中途不停靠任何国家港口，其油水和生活物资全靠自己实行海上补给，而且是执行如此敏感的任务，引起全世界注目。

5月9日，新华社受权公告，中华人民共和国将从中国本土向以太平洋南纬7度0分、东经171度33分为中心，以70公里为半径的圆形公海海域进行发射运载火箭试验。

5月18日运载火箭发射，准确溅落预定海区。3分钟内，海军航空兵舰载直升机飞临数据舱溅落点上空，放下潜水员打捞。潜水员仅用了5分20秒便将数据舱安全捞起返回飞机。

一直等待在附近海域的美国飞机，匆匆赶来。中国人早已将数据舱捞起，他们只看到被染色剂染绿了的海水，便也舀上一桶回去复命。

1988年9月15日13时57分，一枚弹道导弹由中国核潜艇从水下发射，飞出海面，准确地飞向预定目标海域。

全世界都注意到这一则电讯：

新华社北京9月27日电：我核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成功！核潜艇为中国自行研制，火箭准确溅落在预定海域，整个试验获得圆满成功。

自1982年10月12日，中国从潜艇水下发射运载火箭成功后，英国路透社就曾报道说：

西方观察家认为，中国制成潜艇上发射的弹道导弹，将使中国拥有在受到一次核攻击后进行第二次打击的能力。这意味着中国已经制成一个核武器系统。有了这个武器系统，甚至在它已经成了核袭击的目标之后，它也能对任何侵略者进行还击。

日本《读卖新闻》说：

由于试验成功，中国继美、苏、英、法之后，肯定已成为世界第五个拥有装载弹道导弹的核潜艇，并且能从核潜艇上发射这种导弹的国家。



英国《金融时报》报道说：

这次弹道导弹发射……反映了中国比较向外看的政策，其中包括急剧扩大其世界范围的商业航运活动，并大力发展贸易。同时，中国人还意识到随着近海油田的发展，需要有一支更强大的海军来保护这种商业利益。

美国评论说：

中国导弹核潜艇的出现，不管对苏联来说，还是对美国来说，显然都是一件意义十分重大的事件。

中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搞出了导弹潜艇，水下发射弹道导弹，这本身就是一件了不起的事情，因为我们知道搞导弹核潜艇，是很复杂、很困难的事。

中国核潜艇，作为保卫祖国、维护世界和平的核威慑力量受到人们重视。中国潜艇被认为居美国、俄罗斯之后的世界第三位。核动力导弹潜艇可以对全球大部分目标构成直接威胁，成为当今世界核遏制力量中不可忽视的因素。

中国的导弹驱逐舰引人注目。在当今各国导弹驱逐舰中，我国建造的导弹驱逐舰在性能和数量上都占有相当分量。装备先进、技术密集的新型导弹护卫舰已经服役。导弹攻击快艇群更以灵活、威猛见长。

海军航空兵的歼击机、轰炸机、强击机和舰载直升机技术精良，机载空舰导弹性能优异。

海军岸防导弹部队、海岸炮兵扼守战略要地。

海军陆战队被誉为“军中精锐”。

海军强有力的后勤保障系统，大大增强了舰艇远航作战半径和能力。

人民海军舰队远航南太平洋，警戒我国远程运载火箭全程试验；核潜艇水下发射弹道导弹；人民海军参加南极考察和建设长城站，是对人民海军前30年建设的检验，也是对海军装备建设的考核。苏振华和其他海军领导同志一道，殚精竭虑，为海军装备建设打下了坚实基础，开拓了广阔的新的航程。

## 李达司令员战斗在太行

王晓建

李达（1905～1993）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原名李德三。陕西省眉县横渠乡人。1926年入西北军第二军官学校学习，毕业后任排长、连长。1931年参加宁都起义加入红军，1932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5军团连长，湘赣独立第1师参谋长、团长，红8军参谋长，红17师参谋长兼团长，红6军团参谋长。参加湘赣苏区反“围剿”，1933年获二等红星奖章。1934年后调任红2军团参谋长，红二方面军参谋长，援西军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29师参谋处长、参谋长，太行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冀鲁豫军区参谋长，中原军区参谋长，第二野战军参谋长兼特种兵纵队司令员、政治委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1951年兼云南军区司令员，1953年任中国人民志愿军参谋长，归国后任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计划和监察部部长，国防部副部长。在“反教条主义运动”中受到错误批判，改任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副主任兼国防体育协会主任。“文革”遭诬陷迫害。1972年平反复出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80年任中央军委顾问。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是第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十、十一届中央委员，1982年当选为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93年病逝。

\* \* \* \* \*

在李达上将的一生中，先后在贺龙、刘伯承、徐向前、陈毅、叶剑英五位元帅麾下，担任过从师、军团、方面军、大军区、野战军到总部的十多个参谋长职务，向以“好参谋长”著称。其实，李达担任主官指挥作战也可谓战果辉煌。抗日战争中后期，他担任太行军区司令员两年，指挥太行军区部队痛击日伪军，取得了突出战绩。本文主要记述的就是李达这一时期的战斗生活。

### 受命指挥林南战役

1937年11月，李达随八路军第129师师部进抵太行山区。到1943年8月，他任师参谋长已在太行山战斗、生活了近6个年头。作为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的助手，太行山区的一山一水、一草一木，他几乎是了如指掌，甚至哪里有一眼水井，哪里有一条地图上未标出的小路，他也能随口道出。

近几个月来，李达一直关注着太南国民党军队和日本军队的动向。太南，指太行山以南的晋南、豫北地区，驻有国民党第24集团军。1943年5月以前，第24集团军虽与八路军搞些摩擦，总还是能在抗日的大目标下有些遮掩。可是到5月以后，情况发生了突变。

日本侵略军大本营鉴于太平洋战争吃紧，决定从中国华北战场抽调3个师团，南下太平洋战场作战。动作之前，为确保占领区的治安，日军出动万余人，对太行山区的中国军队进行了一次大规模的“毁灭性扫荡”。国民党第24集团军很快就被日军击溃，集团军总司令兼河北省主席、冀察战区总司

令、第40军军长庞炳勋，以及新5军军长孙殿英、师长刘月亭等，均在战败后向日军屈膝投降。日军旋即将这些投降的部队改编成伪军，给了他们一个“和平剿共军暂编第二十四集团军”的番号，下辖暂编第5、第6、第7军，以及太行保安队等部。

庞炳勋、孙殿英将溃散的部队集中起来，遂调转枪口配合日军向太行山区的八路军进攻。7月，伪暂第5军军长刘月亭被任命为“前敌总指挥”，率本部及伪暂第6军、暂7军共2万余人，在日军第35师团3个步兵大队的支援下，侵占了八路军太行根据地的林县城及周围地区，使太行军区面临的局势骤然变得严峻。

7月下旬，八路军总部发来命令，要求太行军区在冀南军区部队的配合下发起林南战役（又称豫北战役或第一次豫北战役），坚决反击庞、孙所部伪军的进攻，保卫和扩大根据地。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商议后，决定由李达负责指挥这次战役。刘师长和邓政委对李达说：还是那句话，五个指头按五个跳蚤，一个也按不死。用兵一定要有重点，这次作战重点就是要打击伪军。要以优势兵力，首先分割包围、各个歼灭林县城及周围据点的伪军主力。对日军，则以少数兵力进行牵制，切断他们与伪军的联系。倘战役进展顺利，再扩大战果，相机拔除日军据点。

李达根据八路军总部的命令和刘邓首长的指示，精心制定了《林南战役纲要》，向刘邓首长汇报后，又进行了补充，并得到批准。

李达马上召集作战会议，向与会的机关和各部队领导同志传达了总部命令、刘邓首长的指示和《林南战役纲要》。大家听说要打庞炳勋和孙殿英，都感到好象有一鼓劲儿往上涌，早就憋着气想收拾他们，有的讲：“当初日本鬼子刚向24集团军进攻时，刘月亭还是师长，挡不住了就带着他的残兵败将跑到我们这里来避难，我们还当友军招待了他。现在他投靠了鬼子，当上了伪军的军长，却立时掉过头来进攻我们，真是狼心狗肺！”有的讲：“听说庞炳勋在新乡向鬼子表了忠心，吹嘘什么‘共军好比老鼠，日军好像狗。不管狗多厉害，对于动作敏捷的老鼠也无能为力。我可以像猫那样，巧妙地捕捉老鼠。’我们就是要打他个落花流水，看他怎么向日本主子交账……”李达分析说：“庞、孙投敌不得人心，连重庆方面也不敢公开支持他们。最近情报部门有一份材料说，孙殿英请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发往重庆一份电报，声称自己的投降是打入日、汪内部，作地下工作。连蒋介石侍从室的军统头目唐纵也认为孙殿英不能自圆其说，是‘当了婊子，还想立贞节牌坊。’原24集团军所属的27军，大部未随庞、孙投敌，即使追随庞、孙投敌的部队中，也有一些并不服从其调动。庞、孙伪军目前是兵不满额、军心涣散、士气低落。但是，庞、孙的总兵力是我军兵力的3倍，加之他们已在太南驻防多年，部队中本地人不少，又实施‘修筑碉堡，固守村落’战略，进行‘打八路求生存’的欺骗教育和反游击战训练，所以我们决不能轻敌。”

停顿片刻，李达走到作战地图前，指点着敌人的布防说：“对伪军，我们必须集中兵力造成相对优势，先歼灭其一部再逐次各个击破；对日军，我们要用小而有力的部队进行钳制和围困，使其不能与伪军互相呼应。一旦日军出动救援伪军，就要阻滞他们的行动，坚决打！”

接下来，李达将部队划分成东集团和西集团。东集团由第1、10、13、34、771团和警备第2团组成，以徐深吉、皮定均、高扬为指挥，任务是向

林县城北的姚村、城东的横水、城东南的东姚进攻；西集团由第 2、3、20、32 和第 769 团组成，以黄新友和何柱成为指挥，任务是向林县城和城西南的合涧镇、原康等地进攻。李达还部署第 129 师特务营和太行军区第五军分区部队组成汤安支队，由李景良、李少清指挥，在水冶、观台一线设置防线，阻击安阳可能出援的日伪军，以抗大第 6 分校师生组成武工队，在东姚、临淇、原康地区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袭扰敌人。李达最后强调说：“对这次作战的要求，请同志们牢记一句话：‘兵贵神速’！”他象是还不大放心，又加重语气重复了一遍：兵贵神速！

战役打响前，接到太岳军区发来的电报：为策应太行军区的战役行动，太岳军区部队已向驻守白（圭镇）晋（城）路的日伪军发动了攻势，袭击日伪军据点、破坏敌人控制的交通线。这个消息进一步增强了李达的信心。

8 月 18 日零点 30 分，林南战役打响，李达率指挥部随西集团行动。

打响第一枪的是西集团的第 769 团。据守林县城西郊的伪军作梦也没有想到八路军会在这半夜三更的时候突然进攻，被打得手忙脚乱，怎么也组织不起有效的抵抗。第 769 团进展顺利，打到西擅和西家庄时，一个伪军团长带领 300 多个伪军顽抗，被第 769 团包围，第 1 营向伪军喊话，命令他们放下武器反正。伪军团长派人出来，要求八路军去一位干部谈判。第 1 营长李德生不顾个人安危，毅然只身前往伪军团部，向伪军团长阐明了八路军的政策。伪军团长原本还有些顾虑，听说面前的来人就是八路军的营长李德生，大为感动，终于下决心率部投诚。

西集团其他部队的攻势也很凌厉，第 3 团和第 20 团拂晓前已从南面、东面、西面攻进林县城。第 32 团拔掉了伪军在北郊的据点。与据守林县城北关的敌人激战，争夺北门。

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同时告急，使伪暂编 24 集团军前敌指挥部弄不清八路军的主攻方向，只好派部队四出反扑，结果因力量分散，均被八路军击退。日军在头道营和城南关驻有 230 联队所属的伊藤大队，被第 769 团一个营和第 20 团一个连分隔开。伊藤大队数度出击，伤亡甚众被迫退回，再不敢贸然出离据点去援救伪军，只能眼睁睁地看着伪军在八路军的严厉打击下一股一股被歼。

东集团部队采取的战法：打破常规，不与敌人的前哨据点纠缠，只以小部队监视他们，而以主力出其不意地插入敌人纵深，从东、西两面同时进击林县城东北，包围了伪军的南北陵阳、蒋里、东西夏城等据点。这一大胆的行动完全出乎敌人意料，伪暂 5 军第 4 师、独立旅等部陷入一片混乱。

8 月 18 日中午，西集团部队已将敌人压缩至伪暂编 24 集团军前敌指挥部。李达要求尽快拿下这个首脑机关，使敌人群龙无首、失去指挥。伪暂第 5 军军长、“前敌总指挥”刘月亭督率伪军凭借核心阵地顽抗，被我军集中火力击伤，他不敢再打下去，丢下部队化装潜逃。他一跑，敌人军心更乱，我第 20 团第 4 连勇猛地打进了敌人的指挥部。第 4 班长赵德忠踢开敌指挥部的大门，一连扔进去好几枚手榴弹，炸得敌人鬼哭狼嚎。他立即率全班冲了进去，没被炸死的伪军官都当了俘虏。

失去统一指挥的敌人彻底崩溃了。到 8 月 18 日下午，林县城内的伪军已全部被歼，只有头道营和南关据点的日军还在据守。李达决定先打头道营的日军。考虑到日军火力猛、我军装备差，为减少伤亡，李达叮嘱指挥员入夜再战。

8月19日零点，西集团的第20团，在第769团一个营、第32团三个连的配合下，向头道营日军据点发起进攻。日军火力点喷出道道火舌，使进攻部队受阻。这时，战前准备的爆破组出动了。他们利用夜暗和日军射击死角，把炸药包迅速运送到日军的碉堡前，将这些火力点一一炸飞。日军支撑不住了，拆开一段围墙逃往城南关据点。我西集团部队随即将其再次围困。

8月19日全天，日军出动飞机助战。李达指挥东、西集团部队冒着敌机轰炸的危险，指挥部队与鬼子兵激战。东集团部队攻克了南北陵阳、曲山、姚村等据点，将伪暂第5军第4师师部及第10团、伪暂第5军独立旅全歼。西集团部队在继续围困城南关日军的同时，攻克了马圈、西坛等伪军据点。

战至此时，林县城及其周围地区除城南关日军据点外，已基本上被八路军控制。指挥部里，有人建议一鼓作气将城南关的日军据点打下来。李达没有马上做出决断。刘伯承师长总是强调作战时指挥员要深入前沿实地观察，李达多年来身体力行，已经习惯成自然，每次战前都要到前沿阵地上观察一番。这次也不例外，他亲往城南关阵地，冒着敌人时断时续的射击，仔细察看了日军据点的虚实。

李达认为：这里的地形易守难攻，工事掩体坚固，加之日军兵力有一个大队，火力很强；而我军攻坚手段差，火力不足，硬攻难以奏效，只会徒增伤亡。李达指挥作战深受刘伯承影响，刘伯承向来不主张死打硬拼，讲求以小的代价换取大的胜利。有把握取胜才打，没把握打胜就撤，再另外捕捉战机，绝不作无谓的牺牲。他思索了一阵，决定不攻城南关。

回到指挥部，李达面对地图审时度势，下一步作战的方案已成竹在胸。他命令东、西集团同时南下，乘胜扩大战果。

8月20日，各部队南下。庞、孙伪军在八路军战士的猛烈攻击下，兵败如山倒，非逃即降。仅两三天时间，东集团部队即攻占东姚集、李家厂，横扫鹤壁集、西鹿楼以西地区，前锋已进至汤阴。西集团部队兵出临淇，收复合涧、原康，攻克西平罗和南平罗。

庞、孙伪军在此沉重打击下一再哀求日军驰援。8月24日，鬼子兵分两路出动。安阳千余名日军西进，辉县400多个鬼子北向，企图形成钳形攻势夹击八路军，以挽回败局。

李达命第769团沿途阻击，迟滞了日军的行进速度。两天后，两股日军才得以会合，他们没有钳击到八路军，于是改变北攻合涧的计划，突然西进，扑向连家坡。

此时，李达率指挥部驻扎在连家坡一带的小庄。日军突然改变攻击方向，给指挥部带来了极大的威胁。当时，李达周围只有一个尚不满员的警卫连，处境十分危险。

李达指挥若定，他命令警卫连进入正面阵地阻击敌人，又令情报科长梁军带领机关全体人员向村后的山沟里转移，他自己仍留在村中指挥。危急时刻，东集团34团的两个连队路过小庄，李达命令他们留下来，立即抢占庄后的两个山头制高点，以火力压制进攻的日军。

不多时，警卫连势单力薄，未能顶住日军进攻的势头，从村外退了下來，尾追的日军发现了李达的临时指挥所，密集的子弹雨点般倾射过来。李达为了争取时间掩护机关撤退，指挥警卫连顽强抗击敌人，第34团的两个连也加入战斗向敌人猛烈开火，压下了日军的嚣张气焰。

突然，敌人背后枪声和喊杀声大作，原来是太行军区第五军分区部队和

西集团的第 769 团一部，听到指挥部方向响起密集的枪声，便主动赶来增援。嘹亮的冲锋号响过以后，战士们枪上刺刀，勇猛地向日军冲击。日军指挥官见势不妙，赶紧收兵撤退。

第 5 军分区司令员皮定均疾速来见李达，看到李达和指挥部机关安然无恙，心里的一块石头才算落了地。

从硝烟中走出来的李达面不改色，他看见皮定均手中的望远镜被打碎了一个镜片，关切地询问了部队的伤亡情况。这时，769 团的一位营长也赶到了，李达当场决定：第 769 团与正向坡底村疾进的第 2 团合兵追击撤退的日军。

见八路军紧追不舍，日军更加慌乱，天黑以后也不敢宿营，连夜渡淇河向林县撤退。恰巧这时秋雨连绵，山洪暴发，渡河的日军被洪水吞没了百余人。第 769 团和第 2 团原计划继续追击，因河水暴涨，给部队渡河造成困难而停了下来。历时 9 天的林南战役就此结束。

林南战役共攻克敌据点 80 余处，歼灭日伪军 7000 余人，缴获山炮 1 门、迫击炮 20 门、轻机枪 83 挺、步枪 3118 支，还击落日军飞机 1 架。另外，此役收复了林（县）南、辉（县）北数千平方公里的国土，解放人口 40 万，使太行根据地的面积达到 3.5 万余平方公里，处于东可切断平汉路、南可控制黄河渡口的有利态势。我军付出的代价是伤亡近 800 人。

李这回到涉县赤岸村，向刘伯承师长、邓小平政委报告了战役经过和战果。刘邓首长都表示满意。李达却心情沉重地说：“仗虽说打胜了，可 3 团团长周凯东同志英勇牺牲了，他是 1931 年入伍、1932 年入党的老同志，才 28 岁，真让人痛心啊。”

## 带领军民生产抗灾

林南战役结束不久，刘伯承师长接到中共中央通知，要他赴延安参加党的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和整风。

9 月里的一天，刘师长夫妇离开涉县，动身去延安。李达自 1937 年 2 月援西军组建时起，就一直在刘伯承左右参赞军机。6 年多来，他与刘伯承建立了深厚的感情，他依依不舍地送刘伯承和夫人汪荣华上了路。

1943 年 10 月 6 日，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决定：中共太行分局与中共中央北方局合并，由邓小平任北方局代理书记主持工作，第 129 师师部与八路军总部合并，仍保留第 129 师番号。同时，1940 年成立之后一直由第 129 师兼代的太行军区与第 129 师分开，与太岳军区、冀南军区、冀鲁豫军区一道，成为八路军总部直辖的二级军区。李达被任命为太行军区司令员。

上任伊始，李达面临的一个迫切任务，是生产抗灾。

自 1942 年春季开始，太行山区就遇到严重的旱灾。进入 1943 年，灾情更加严重，持续干旱使庄稼的收成只有往年的三成，耕地干得不能下种。入秋后好不容易盼来了雨，却又是倾盆暴雨不断，酿成了水灾。再就是接踵而来的罕见的蝗灾，铺天盖地的蝗虫打破自古“蝗不过黄（河）”的常规，从豫北方向成群地飞来，一落地，几十亩、上百亩庄稼霎时间就被啃食得一干二净。太行根据地本已严重缺粮，有 35 万灾民面临饥饿，偏又在这时从豫北、冀西敌占区和黄河以南的国民党统治区陆续逃来十几万灾民，急需安置与赈济……

刘邓首长多次召集会议，商讨如何度过灾荒的问题。刘师长临动身去延安之前还说：“看来，我们不但要指挥千军万马和敌人作战，还要率领部队同自然灾害，同蝗虫作战。今天摆在我们面前的这个新困难，也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事。同在二万五千里长征中，我们遭遇到的艰难，那简直是没法儿比的呀！那时，许多部队差不多过了十四个月雪山草地的生活，很少的粮食吃完了，一切能够吃的野菜、草根都吃了。后来就捉鱼，甚至煮鼓皮、皮带、皮鞋充饥。然而，在党的正确领导下，我们以无比的英勇顽强，坚韧不拔的刻苦精神，终于走过来了。……我坚信，有党的正确领导，依靠全体同志对革命的无限忠诚和努力，一定能把这个大灾荒度过去。”

刘伯承走后，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和第129师师部联合召开了生产动员大会。邓小平政委在大会上讲话说：“毛泽东同志早就提出了战争、生产、教育为敌后工作的三大任务。这三大任务哪一个都不能忽视。部队只有枪而没有饭吃，就不能打仗。如果我们不帮助群众搞生产，人民没有饭吃，人民就会反对我们，我们就会弄到既无饭吃又无群众的地步。”

根据刘邓首长的指示，李达把抗灾生产自救作为中心任务，在太行军区扎扎实实地抓了节约和生产。

在节约方面，首先从减少干部战士的粮食定量着手。自1943年11月至1944年3月，每人每天的定量标准，战斗部队由1斤5两减至1斤3两，县区游击队由1斤3两减至1斤1两，后方机关由1斤2两减至1斤。自1944年4月至麦收，人日定量再次缩减，战斗部队为1斤，县区游击队为15两，后方机关为13两。（注：当时的计量单位为1斤合16两）。

其次是节约经费。干部战士每个月的津贴费——师、旅级每人5元，团、营级每人4元，连级3元，排级2元，士兵1元，均暂时停发；原有的每人每日1角2分的菜金、每个连队每月近100元的办公费和杂支费，也一律停发，由各单位从生产收益中自行设法解决。省下来的粮食和经费，全部交予边区政府赈济灾民。

上述措施节约的幅度已经不小，但李达觉得，还可以在这个基础上再紧缩一些。他召集司令部机关的干部、战士，开了一个军人大会。会上作出了决议：鉴于目前灾荒严重，人民生活困苦，全体司令部人员一致通过，将已经减少的粮食定量标准，每人每日再减少3两。

李达还决定从自己做起，撤销军区首长的小灶。他和太行区党委书记兼太行军区政委李雪峰商定，跟机关干部战士们一起吃大灶。当时他们最常吃的是野菜和小米熬的稀粥，高粱面、玉米面、黑豆面、糠、树叶掺在一起蒸出来的馍。由于这种馍又黑又硬，被大家称作“砖头”。

为吃“砖头”，还闹出过误会。由于太行军区是晋察冀、山东、华中等根据地通往延安的必经之路，来往路过的干部比较多。李达虽指示军区有关部门预备一些细粮招待过往客人，但毕竟是连年遭灾物力有限，难免不让客人也跟着吃几顿“砖头”。一些客人因此产生不满和误解，认为太行军区不好客、不热情、不尽人情，有的人到延安以后向刘伯承提了意见。刘伯承自然知道李达的难处，一边向这些同志道歉，一边做了解释，这才挽回了“影响”。被怠慢了客人们不但体谅了太行军区的困难，而且为太行军区领导干部与群众同甘共苦的精神所感动。

有一次李达患病，炊事员给他做了一碗白面掺豆面的杂面条，当作病号饭端给他。他却执意不肯吃，硬是坚持和大家一起吃“砖头”。

又有一次，李达和李雪峰到边区政府开会，因为会散得很晚回来迟了。炊事员以为首长们会在边区政府吃饭，也就没有给他们留饭，眼见司令员和政委还没有吃饭，饭却一点不剩，紧张自责的炊事员赶忙张罗着要给他们另做。李达在伙房里转了转，发现一个盆里还有上顿剩的饭，就高兴地大喊道：“雪峰，雪峰快来哟，这里有饭！”说罢，告诉炊事员不要再做，与李雪峰把那点儿剩饭分着吃了事。

李达心里很清楚，光节约还不能完全度过目前的灾荒，根本的出路在于大力发展生产，一是帮助群众生产，二是组织部队自己生产。太行军区发出通知，要求所属各旅、军分区、团设立指导和帮助群众耕地的组织，连成立助耕队，排以下设助耕小组，并提出“不荒一亩地”的口号。李达要求在通知中添上一句话：助耕部队要严守群众纪律，不准吃受助群众的饭食，不准遗失损坏农具。组织部队生产，主要是开垦荒地，种粮种菜，青黄不接时采摘野菜和树叶。

无论帮助群众生产还是部队自行组织生产，都是在频繁的战斗环境中进行的。1944年春天第769团开荒时，与来犯的敌军作战20多次；32团开荒时，一周内就与日伪军打了6仗，真正做到了“一手拿枪，一手拿镢，一边战斗，一边生产”。

李达非常重视以身作则，要求部队做到的，他自己一定首先做到。1943~1945年，他带领军区司令部机关人员帮助群众从修筑清漳河、浊漳河水渠，加固堤坝，到平整河滩地、运肥送粪……不仅解决了群众的实际困难，而且增强了边区人民战胜灾荒的信心，还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

1943年秋，太行军区要求每个机关干部采摘5斤花椒叶。花椒叶晒干后可以磨成粉，掺在粮食里吃。军区所在地涉县虽是个盛产花椒的地方，但在荒年中，近处地上的花椒叶早已被人们采摘光了，只有远处山上还能采摘到。李达在指挥战斗和紧张工作之余，也挎着小篮子上山，同志们劝他说：“李司令员，你工作忙，身体又不怎么好，就不要上山了，你那一份，我们大家一人多摘一把就出来了。”李达摇摇头，认真地说：“那可不行，你们多摘是你们的，我自己的生产任务，应该自己完成，怎么能让别人代干呢？”李达利用每天早饭前和晚饭后的时间，坚持上山采摘花椒叶，总计上交了8斤，超额完成了任务。

1943年秋和1944年春，李达与李雪峰一起，参加了太行军区机关和太行区党委机关组成的联合开荒队，连续许多天上山抡镢头开荒地。在他们带动下，军区和区党委两个机关的同志们都完成了每人开荒地1亩的任务。

李达还组织太行军区部队捕蝗灭蝗，为扑灭蝗灾起了积极的带头作用。

1943年秋蝗灾初起时，农民们还有一种迷信说法，把蝗虫看作“神虫”，认为“神虫”千万不能打，打了小的来大的，越打越多。而且打蝗还会触怒老佛爷，降罪惩罚百姓，只有到庙里拜佛烧香，求老佛爷把“神虫”再收回去。边区政府提出“打破迷信、人力胜天”的口号，号召群众大力灭蝗，可群众还是心存顾虑、不敢动手。

针对这种情况，太行军区成立了“打蝗司令部”，要求各部队指战员把捕蝗灭蝗当作战斗任务来完成，除值勤、值班人员外，机关、部队要全体出动，哪里蝗虫多、蝗灾重就到哪里去。就这样，太行军区部队紧急行动起来，采取扑打、火烧、置水盆诱杀、挖掘蝗虫卵等等办法灭蝗，很见成效。

群众眼见“神虫”既没有越打越多，老佛爷也没有降下什么罪来，这才



打消了顾虑，家家户户、男女老少一齐动手灭蝗。后来，有人试着尝了尝被烧死的蝗虫，觉得味道还相当不错。《新华日报》（太行版）得到这个信息，及时作了“蝗虫好吃”的报道，于是，蝗虫又成了食物，有煮着吃的，有烤着吃的，还有磨成粉掺到玉米面里、掺到糠里吃的，还真解决了一部分吃的问题。

到1944年9月，前前后后6批蝗虫被彻底剿灭，战胜了为害一年的蝗灾。

根据地的灭蝗工作取得了决定性的战果，李达指示临近敌占蝗灾区的军分区，派出部队到那里去帮助群众灭蝗。几个军分区部队的指战员们开赴敌占区，全力以赴打蝗，并向当地群众传授打蝗方法。一些据点的日军出动小股部队骚扰打蝗，遭我警戒部队痛击，又缩回据点。敌占区的群众拉着八路军战士的手感动地说：“都估摸着八路军不会撇下这边的老百姓不管，果不其然，你们打蝗打到鬼子炮楼底下来，真给我们解决大问题啦！”敌占区的民心更加向着八路军。

1943年10月30日，中共太行军区司令部支部召开全体共产党员大会，总结秋季生产工作。会上大家经过讨论通过一项决议，要求全体党员从四个方面学习李达同志艰苦奋斗，战胜困难的模范作风。即：1.坚决贯彻执行党的号召，在生产节约整风学习中，处处以身作则；2.生活严肃紧张、战斗化、大众化、没有任何不良嗜好；3.对工作积极负责，细致耐心，有秩序、有条理，贯彻始终；4.爱护群众利益，遵守法令，关心战士生活。看了这个决议的内容，也就可以明白，李达在指挥部队作战和作群众工作所取得的成绩及工作作风得到刘邓首长的肯定，受到129师和太行军区指战员的爱戴，在他们当中有根高的威望。

战斗生活十分艰苦，但是上至领导机关，下至战斗部队，仍洋溢着革命乐观主义精神。

当时食油奇缺，战士们吃的菜里，有时连一点油星儿都没有。一次，供给部门千方百计想办法，好不容易搞到了一点油，大家真是高兴，只是在该怎么吃这个问题上有些议论。有的说，弄这么点儿油不容易，省着点儿慢慢吃；有的说，干脆来它一顿解解馋。李达也主张细水长流，每天吃一点儿，邓小平政委却支持后一种意见，爽快地说：“吃油，李参谋长是主张一点点吃，我就主张要吃就一次吃个痛快。”邓政委的话使大家都笑了起来。

李达还与李雪峰、杨立三老同志在机关的小院里种了些花草和树木，找不到养花的花盆，就用几块瓦片摞成个“花盆”来代替，大大小小错落有致，居然也养活了菊花、西番莲、夹竹桃等花木，把个小院整得生机勃勃。

到1944年秋后，太行军区部队平均每人开荒3亩以上，还办起了煤窑、毛巾厂、酒坊、醋坊、酱坊、豆油坊、粉坊、木匠铺等，已能自给两三个月的粮食和全年的蔬菜。太行区的粮食增产30万担，群众的生活也得到了改善。太行军民度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 局部反攻捷报频传

1943年12月，李达为太行军区起草了《1944年的战争指导问题》的文件，提出1944年太行军区的总任务是：“高度发展真正普遍而坚强的群众性的游击战争，而辅之部分有力的运动战，打破敌人各种进攻，并主动进击敌人，以保卫壮丁、保卫粮食、保卫生产、保卫根据地，积蓄力量，准备反攻。”

1944年初,日军华北方面军开始从所辖的11个师团、7个独立混成旅团、1个骑兵旅团中,陆续抽调部队支援太平洋战场和参加打通“大陆交通线”作战。几个月时间竟调走了9个师团,留下来的部队多是担任守备的新编成步兵旅团,战斗力明显减弱。太行军区周围的日军主力师团也大部调走,新编成的步兵旅团兵力不够,只得将许多重要据点交给伪军守备。

李达认为:日伪军的部署变更,给了我们一个可资利用的机会。他与太行军区政委李雪峰、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黄镇、政治部副主任袁子钦等领导同志讨论研究后,制定了一个局部反攻的作战计划。即:1.继续夺取与逼退某些距敌占区较远、兵力薄弱的据点;2.向东发展,尽可能多地俘虏伪军,缴获其装备,扩充我军,扩大解放区。中共中央北方局和邓小平政委等经过研究批准了这个作战计划。

这样,李达指挥太行军区部队对日伪军的局部反攻,自1944年初春即开始实施。进攻的目标是:伸入根据地内及边沿区孤立、突出的日伪军据点。

春节刚过,太行军区第3军分区部队即向蟠(龙)武(乡)线的日伪军出击。乘其不备,突然袭击,于2月28日攻下了已被我军围困8个月的蟠龙镇。李达命令第3军分区部队发扬连续作战的精神,立即由第2军分区部队配合向榆(社)武(乡)线进击。榆社城的日伪军在两个军分区部队的夹击下,抵挡不住,弃城而逃,溃逃中又被我军歼灭一部。3月29日我军收复榆社城,第2军分区部队并一度袭入太谷城。

2月下旬,太行军区第7军分区部队在地方游击队武装配合下,加强了对驻守临淇据点日伪军的袭扰,使其补给困难,于3月1日放弃临淇撤走。

4月1日,太行军区第5、第7军分区部队3个团在辉县民兵配合下,向盘踞林(县)水(冶)公路沿线的伪暂第5军发动进攻。部队首先打击由林县外出抢粮之敌。而后一一拔除林县城外围的据点,并切断了林水公路。驻守林县城的伪第六方面军3个团待援不至,补给又断,只得于4月14日弃城东逃。两个军分区的部队歼灭伪军900余人,收复林县城。

5月下旬,李达调集太行军区第4、第7、第8军分区部队围困陵川城,数千群众闻讯赶来助战。浩大的声势使陵川城内的日伪军胆战心惊,不断呼救。5月29日,平城日军松山小队和小山小队、伪剿共第2师一个团沿公路来陵川解围,在郎持岗、杨碧地区遭我打援部队伏击,被全歼。李达指示参战部队尚不需急于攻取陵川城,要继续在打援上作文章,尤其不能放过敌人运送补给的部队。参战部队依计而行,连续截获敌人的粮弹物资,毙伤许多护送物资日伪军士兵。

就在太行军区部队的局部反攻捷报频频的时候,传来了国民党军队在豫中会战中溃败的消息。4月中旬,日军为了破坏盟军在中国建立的空军基地,并打通一条从朝鲜釜山经中国平汉、粤汉、湘桂铁路到东南亚的“大陆交通线”,调集4个步兵师团、1个战车师团、2个独立混成旅团和1个骑兵旅团共五六万人,开始实施其“一号作战”计划。日军主力渡过黄河后,攻占郑州、新郑、密县、许昌、登封、漯河;另一路日军攻陷浉池、灵宝、陕县、洛阳。国民党军40多个师的所谓抵抗部队有的屡战屡败,有的望风而逃,使日军如入无兵之境,大片国土沦丧,无辜人民遭涂炭。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蒋鼎文,寻了条小毛驴遁走;副司令长官汤恩伯,化装成伙夫逃出河南……

国民党军队竟然在37天时间里连续丢失了38座县城!这使李达十分愤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各个战场都取得了节节胜利,独在中国,国民党军

队却不堪一击，师溃地失，真是中国军人的奇耻大辱！

这时，主持中共中央北方局工作的邓小平政委传达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指示，要求太行军区和太岳军区迅速向河南发展，以一部兵力开辟豫西根据地。

李达等太行军区领导人根据中央指示精神，迅速抽调两个团，组成豫西抗日游击支队（第1支队），由皮定均、徐子荣分任司令员、政委。李达考虑得很细致，为减少部队开辟新根据地的困难，同时尽量减轻豫西人民的负担，他决定把军区历年积蓄的银元拿出一部分，给独立支队带去做经费。这支千余人的部队于9月初从林县出发，下旬击退伪河防部队的拦截渡过黄河。继而击破日伪军的围攻，进入嵩山、箕山地区，在国民党军丢弃的国土上建立了偃师、巩县、伊川、登封、荥阳、密县、洛阳等十余个县的抗日民主政府，打开了豫西的局面。

日军击败国民党军、打通平汉铁路南段以后，马上调回部分兵力“扫荡”晋冀鲁豫各抗日根据地。李达认为：日军集中抽调部队“扫荡”我根据地，后方据点和交通线兵力必然薄弱，再加上其不可一世的骄横而疏于防备，我军正可采取刘伯承师长惯用的战法——敌进我进，突入敌之纵深。

李达遂指挥太行军区部队向敌占城镇和交通线推进。在日军刚刚打通的平汉铁路线上，太行军区部队趁虚袭击了石家庄、内丘和邢台车站；在正太铁路线上，袭击了寿阳西南的马首、上湖车站，获鹿以西的微水车站，还一度袭入和顺城。

各军分区部队也同时行动，取得了可喜的战果。第1军分区主力在地方游击队武装配合下，向临（城）内（丘）段敌封锁线出击，拔除日伪军据点14个；第2、第3军分区部队围困辽县（今左权县），攻克七里店等据点；第4、第7、第8军分区部队围困陵川，痛击增援陵川的日伪军；第6军分区部队攻克敌号称“最坚固”的功德旺据点；第7军分区主力攻克薄壁镇等据点，开辟了新（乡）辉（县）抗日根据地。

1944年，李达指挥的太行军区部队共作战4048次，攻克、逼退日伪军据点和碉堡364个，解放国土4748平方公里，解放人口57万余人，毙伤日军2440名、伪军7339名，俘虏日军16名、伪军3346名，另有日军4人、伪军402人投诚或反正。我军的伤亡为3000余人。

1944年12月30日，《新华日报》（太行版）发表李达的新年贺词，提出了太行军区1945年的作战目标：“坚决粉碎敌人的大小

‘扫荡’，积极向敌人进攻，夺取敌人在我们周围的某些据点，以‘巩固根据地，缩小敌占区’，保卫根据地的人力财力，保存与积蓄力量，准备直接投入反攻，把日寇从大城市与交通要道驱逐出去。”李达还主持制定了军区的作战计划，主要是：继续开辟豫北、晋南根据地，巩固发展豫东和豫西解放区，打通华北与华中的联系，围困拔除深入根据地内的日伪军据点。

1945年1月，为开辟道口镇（今河南滑县城）至清化镇（今河南博爱县城）一线以南地区，加强太行军区与豫西新区的联系，李达指挥太行军区第7、第8军分区部队以及平原党校警卫团，共4个团另3个独立营，在豫北发动了道清战役。

刘伯承师长常说：“五行不定，输得干干净净”。所谓“五行”，是他概括的对作战行动最有影响的五个要素，即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刘伯承“五行术”的核心，就是要求准确地掌握这五个要素，运用于战场。

道清战役打响前，李达运用刘伯承的“五行术”，做了精心而充分的准备。战役进程基本上是按照李达的筹划发展。

道清战役第一阶段，由地方武装和民兵袭扰日伪军控制的城镇据点及交通线，第7、第8军分区部队于1月21日夜间突然从修武以北的九里山地区南下，越过道清铁路，远程奔袭小东镇和宁郭镇，歼灭守敌伪兴亚巡抚军和伪保安大队一部，攻克了两镇。继而又攻下平汉路以西武阁寨、程风、徐营镇、中和镇等日伪军据点16处。日军第117师团第390大队800余人分三路出动，企图合击我军。李达根据“重点主义”的用兵原则，也就是集中兵力于主要方向的原则，集中3个团在樊庄设伏，以绝对优势兵力打三路日军中兵力最薄弱的一路——第390大队大队长有角光率领的一个中队。结果战斗速战速决，一个中队的日军被全歼，仅有角光只身一人逃走。另两路敌军闻有角大队长失利，均无心再战，灰溜溜撤回焦作。

战役第二阶段，参战部队主力事先全部后撤到根据地纵深辉县以北的南平罗地区，迷惑道清路以北的日伪军，以为我军已无力再战。见敌军已松懈下来，李达决心拔除道清路以北的日伪军据点。他仍然根据“重点主义”的用兵原则，调来第三军分区的第769团参战。2月20日战斗打响，3个团进攻庞炳勋所部伪独立第14旅旅部五里源，2个团进攻五里源外围据点陆村。陆村和马坊、焦庄等据点先后被攻克，五里源之敌也在我军数次猛攻之下动摇，放弃据点开东门逃跑。可惜我担负堵截任务的部队疏乎大意，使五里源守军大部侥幸逃脱。“乱弹琴！”李达严肃地批评了该部队指挥员，他平素从不对下属发火，“乱弹琴”三个字，就是他最严厉的责备了。他并要求各部队都吸取教训。随后，他命令各团抓住敌人军心动摇的机会，立即东进辉县地区扩大战果。各团迅速行动，其势如破竹相继攻克赵固、峪河、百泉等据点，摧毁敌碉堡59座。3月6日，部队一度攻入辉县城甫关和西关，李达见敌守军兵力尚有一定实力，城防工事坚固，加之新乡日军出动增援，我军恋战将不利，遂命令部队撤出辉县城。

战役第三阶段，是在敌人预料不到的时间、地点发起。敌人判断我军可能会进击东北方向的辉县、获嘉、修武，故而急忙收缩兵力，加强对这三城的防务。李达发现敌人调整部署以后，造成北起新乡、西至郑州、东至开封这个三角地带相对空虚，便决心兵出东南方向的原武、阳武（今原阳）地区作战。3月22日夜，第7军分区主力在武工队配合下越过平汉路，突然袭击原武外围的王村、盐店、葛庄等据点。原武同驻有重兵的新乡、开封、郑州均相距不远，日伪守军无论如何想不到八路军能打到这里来，因此疏于防范，我军就是利用他们的这种麻痹心理，打它一个措手不及，逐一拔除原武外围各据点。原武城郊据点的日伪军闻讯，惊慌失措纷纷缩回城内，使原武城失去拱卫，我军两度乘隙楔入城中，歼敌一部后再撤出，更增加了日伪军，特别是伪军的恐慌。伪保安大队300余人在军官带领下反正。我军越过老黄河，兵锋已逼近当时的河南省会开封城郊。敌伪河南省当局惶惶不可终日，一度下令关闭开封城门，以防八路军突袭。在第7军分区部队横扫原武、阳武地区的同时，第8军分区部队南渡沁河，西进温县、孟县地区，也打了敌人一个晕头转向，部队一度攻入温县城，造成很大震动。

4月1日，道清战役结束，我军共歼灭日伪军2500余人，解放国土2000多平方公里，解放人口75万；还建立了4个县级抗日民主政府，打通了太行根据地与新开辟的豫西根据地之间的联系。

在道清战役发起之前，李达还部署太行军区的其他部队向敌占区出击，以使敌人顾此失彼。各军分区部队英勇奋战，有力地策应了道清战役，均取得了可喜战果。第3军分区部队于2月20日攻入襄垣城，歼敌100多人；第2军分区部队3月5日奇袭日军马坊据点，全歼日军一个小队，活捉小队队长北岗；第3、第5军分区部队联合作战，3月16日向安阳以西敌伪据点发动进攻，攻克伦掌、东艾口等6个据点，歼灭伪剿共第1路军所属第3团大部。

道清战役是一次成功的运动战战役。战役结束后10天，1945年4月11日，中央军委在致新四军、八路军南下支队和东江纵队领导人的电报中，肯定了这次战役的经验。电报指出：确实弄清敌情，实行“重点主义”的兵力部署，采取不规律的闪击行动，并加强伪军工作和开展地方工作等，是战役获得成功的重要因素。

对道清战役得心应手的部署和指挥，显露出李达深谙刘伯承军事思想的精髓，在军事指挥艺术方面已相当成熟。中央军委的电报，无疑也是对他的褒奖。

道清战役结束后，李达并未歇脚，疾速赶回太行军区所在地涉县赤岸，部署和指挥了太行军区第2、第3军分区部队与八路军总部警卫团的一次联合作战行动。4月6日，上述三部分队伍开始行动，向白（圭镇）晋（城）路、同（大同）蒲（州）路沿线的日伪军发动进攻。在与祁县、太谷、平遥的敌人激战后，拿下了十几个据点，并乘胜袭入祁县城。这次作战破毁敌人控制的铁路多段，歼灭日伪军280多人。

太行军区部队联合行动，英勇作战，攻城拔寨、连战皆捷。国民党军队丧师失地、屡战屡败。日本军方也不得不承认：“太行军区的共军一向被称为该边区军区中的最精锐部队”。可以说，正是包括太行军区在内的八路军、新四军部队的浴血奋战，沦陷的国土得以收复，饱受战乱、遭敌寇涂炭的人民重获自由解放，并有力地支援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取得最后胜利。

## 安阳战役战绩辉煌

1945年5月8日，希特勒德国军队向盟军投降。最初发动战争、荼毒世界的三个法西斯轴心国，只剩下日本还在垂死挣扎。

八路军总部于5月29日发出指示，要求华北八路军各部队对敌展开更积极的攻势，“在主力兵团中确立正确作战观念，发扬顽强与攻坚精神”，在以消灭伪军为主的作战方针指导下，组织大规模的战役战斗，锻炼提高指挥员对正规战的组织指挥能力和部队的战术技术水平。

李达坚决贯彻八路军总部的指示，在指挥太行军区部队收复日伪军占领的陵川、辽县、晋城、和顺4座县城的作战后，又与太行军区的几位领导同志一起研究制定了夏季攻势作战计划，经北方局批准，李达又拟定了实现这一计划的实施细节，称作《夏季攻势作战实施纲要》于6月17日签发部队执行。

6月11日，在延安召开的中国共产党第七次全国代表大会闭幕。邓小平政委被选为中央委员。随后，中央通知邓政委到延安出席七届一中全会。

正在筹备安阳战役的李达从部队赶来为邓政委送行。他向邓政委详细汇报了安阳战役的战前准备工作情况。邓政委说：“要通过这一仗提高部队打运动战和攻坚战的水平。多年来，我们习惯了打游击战，可是要获得最后胜

利，光靠打游击战不行，还必须学会打正规战。无论是太行军区还是太岳、冀南、冀鲁豫军区，都要搞好由分散的游击战向集中兵力打正规战过渡。”邓政委思索片刻又说：“日本鬼子的日子不长了，我们的眼光还要再看远一点。”

6月29日，邓政委上路去延安，李达没能去送行。此时，太行军区大规模的安阳战役打响在即，李达和李雪峰已率军区战斗司令部奔赴前线。

几年来，日伪军一直在安阳以西地区修筑据点和碉堡，构成了一条针对太行军区的封锁线。这条封锁线阻碍着我山区同平原地区的联系，阻碍着我军的行动和发展，早已是太行军民切齿痛恨的眼中钉，必欲除之。

这次安阳战役，目的就是要彻底摧毁这条封锁线。战役的作战对象，是驻扎在平汉铁路西侧的日军独立第1混成旅团一部和大汉奸李英的伪剿共第1路军两个旅、孙殿英的伪第六方面军暂第9师等，大约7000余人。

李达将打击的重点放在死心塌地的汉奸李英头上。李英是号称“东方佛朗哥”的伪皇协军第1军军长李福和的侄子。1938年8月，李福和与日军长谷川少将、中峰大佐、植田大佐、小川少佐等，同时被反正的皇协军军官徐靖远、黄宇宙等击毙。李英一再向日军表示效忠，从而取得日军的信任，将李福和的伪军部队全数交给李英统领。李英自恃有日本鬼子撑腰，骄横跋扈，帮助鬼子扫荡，处处与八路军和抗日群众为敌，作恶多端，还经常口出狂言，不可一世。自太行军区部队展开反攻后，李英的部属们心虚得很，惶惶不可终日，李英给他们打气说：“八路军没什么了不起，他们打据点，是‘行不行，两点钟’，只要你能挺过两个钟头，他们就没咒念了。”

对这样丧心病狂死心踏地为日本鬼子卖命的民族败类，我人民群众和部队官兵早就想狠狠地收拾他们了。

李达集中了太行军区第3、第4、第5、第7、第8等5个军分区共9个团的兵力。另外，还调集了林县、安阳、安汤、林北、磁武、涉县6个县的6900名民兵和25000名自卫队员。参战部队分成3个支队，第1支队由第1团、第43团、第2团和3个县的独立营组成，黄新友、张廷发、高扬任指挥；第2支队由第32团、第34团、义勇军第5团和两个县的独立营组成，韦杰、陶鲁笏、马忠全任指挥；第3支队由第769团、第14团和八路军总部警卫团组成，鲁瑞林、王一伦任指挥。第1支队和第2支队担任主攻，第3支队为预备队。

第3支队中的第769团，是太行军区中能打善战、英勇顽强的一支队伍，历次战役战斗多承担最艰难、最重要的任务，可这次战役却被安排担任预备队，有些同志想不通，感到“英雄无用武之地”。李达抓住这个思想苗头，对第3支队指挥员鲁瑞林说：“求战心切，想打头阵，本来是一种积极的思想情绪，但因为作了预备队就产生怨气，就泄气，这就不好了。这样会影响战斗准备工作，影响战斗胜利。其实，让你们作预备队，是把你们当一个拳头来使。如果不是一个打，一个准备打，把两个拳头一齐打出去，遇到意想不到的情况怎么办？你们要把这些道理给干部战士讲清楚，不是不让你们上，是等到关键时候再打出去。不是说好钢用在刀刃上嘛？告诉大家，特别是769团的同志们，要准备好打硬仗、打恶仗。要时刻把打硬仗这根弦绷紧，把劲儿鼓得足足的！”鲁瑞林按照李达的指示精神，再次对第3支队进行动员，指战员们个个精神抖擞，紧紧握住准备适时打出去的一拳。

在向各支队负责人布置任务时，李达强调了这次战役与过去战役不同：

安阳战役主要是打运动战和攻坚战，以游击战为辅。要有意识地锻炼部队的攻坚能力，为即将到来的全面反攻作准备，为大部队联合作战积累经验。为打好这一仗，李达花费了几个晚上的时间，结合1945年上半年对敌攻势作战的经验教训，撰写了《关于进攻作战的一些问题》，指出部队现存的5个带有共性的薄弱环节和5条改进措施。这篇文章作为给参战部队的指示下发后，在安阳战役中发挥了重要的指导作用。

战前的准备工作相当充分，李达要求营以上指挥员和突击队的连排干部，都要到准备攻打的敌军据点前观察敌情，做到胸中有数。他自己也带领3个支队的指挥员到距离敌人只有500多米的阵地前沿，观察地形和敌军的布防情况。所有参战部队都按要求进行了10天的攻坚和村落战斗训练，各团还针对本部队的任务，进行了夜间袭击、野战动作、土工作业等演习。3个支队均不间断地派出侦察人员，到敌据点左近与敌占区侦察，随时掌握敌情变化。

为分散敌人注意力，使其摸不清我军的主攻方向，李达商请冀鲁豫军区协同作战。冀鲁豫军区部队应约于6月30日至7月3日在平汉路东侧发动攻势作战，以6个团和5支游击队插入安阳与成安之间的日伪军纵深，攻克据点20多个，歼灭日伪军1500余人，使安阳敌军从北面受到严重威胁。

另外，李达还命令未参加此次战役的太行军区第1军分区和第2军分区，以其主力在元氏、获鹿、赞皇地区先期发动攻势；第6军分区在武安、沙河方向破击平汉路。第1、第2军分区部队攻克仙翁寨、南佐、同冶镇等10多处据点，袭入赞皇城，歼日伪军500余人；第6军分区部队攻克石门、中关等据点，炸翻敌人火车一列。这一系列行动，果然把日伪军搅得晕头转向，战役发起前，一直没有察觉我军即将在安阳发起较大战役的意图；战役已进行了一两天，仍未判明我军的主攻方向究竟在哪里。

6月29日凌晨2时，安阳战役第一阶段的战幕拉开。一支队率先行动，他们在夜暗中强行军30公里，以突然的勇猛动作向驻曲沟集的伪剿共第一路军第3旅旅部发动袭击。

这是李达采取的“掏心战术”，一交手就先打敌人的指挥中枢，而暂时置敌人的战斗部队于不顾。

由于是在夜间，天又下着雨，敌人作梦也没想到八路军会在这样的時候突然进攻，顿时陷入混乱中。经5个小时战斗，伪第3旅旅部即被攻占，旅长杜有桢被俘。打掉了旅部，伪军部队群龙无首、失去统一指挥，伪第3旅所属第6团也很快被歼灭。

第2支队攻打驻水冶镇的伪第2旅旅部，战斗于30日1时40分打响。水冶镇据点堡墙高大，部队连续两次架起3丈多长的云梯登墙均未获成功。但战士们毫不气馁，改用连续爆破结合冲击的战法，终于第三次架起云梯，登上堡墙打进据点。伪军旅部被解决后，只剩下一个日军碉堡还在负隅顽抗，碉堡里驻有日军一个“指导班”。跟随第2支队作战的日本解放同盟盟员野村匍匐凑到碉堡近前喊话，劝他们放下武器投降。但碉堡里的日军冥顽不化，决心为天皇的“圣战”坚持到底，并向野村射击。战士们气愤地说，非得好好教训教训这帮鬼子兵不可，决心端掉这个野堡。晚9点，我军工兵在迫击炮掩护下，用炸药包炸飞了碉堡，“指导班”的鬼子全被炸得粉身碎骨。

这时，李达接到报告：安阳城内的日军已经出援，正向曲沟集运动。他马上命令预备队第3支队担负打援任务。第3支队于29日凌晨3时半到达距

安阳 10 公里的北曲沟设伏。

1 个半小时后，果然等到了敌人。驻安阳的日军独立第 1 混成旅团第 74 大队大队长大泽，率领日军士官训练队百余人、伪军 60 多人出动，他们带着一门山炮、一挺九二式重机关枪，分乘 6 辆汽车，前未增援驻曲沟集的伪第 3 旅。我第 3 支队候个正着，立即截断大泽部队的退路。上午 10 时第 3 支队发起攻击，大泽部队被压缩到北流寺村中。

大泽是一名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他率部从安阳出发前，曾对伪军头目李英说：“你看好门，我去对付八路军。”陷入重围后，骄横的大泽率日伪军连续反扑 5 次，企图突围，都被我英勇善战的八路军战士打退。

李达从设在北曲沟的战斗司令部里给第 3 支队打来电话，询问了战斗进展情况后说：士官训练队成员是日军中的骨干，装备好、战斗力强，但现在他们没有坚固工事做依托，正是歼灭它的好机会。把这股敌人打掉，会在日伪军中引起强烈震动，一定要全歼！

下午，第 3 支队打进北流寺村中，战士们与敌人逐屋争夺，一登上屋顶，就把成筐的手榴弹运上去，一枚一枚地投向顽抗的日军。经数小时激战，百多名日军官兵除 5 名被生俘、5 名自杀外，全部被击毙。不可一世的大泽大队长也丧了命。

大泽部队带有一部电台，在覆灭之前，他们曾一再向安阳呼救，安阳日军果然又出动百人来援救大泽。已攻克曲沟集腾出手来的第 1 支队承担了截击安阳第二股援军的任务。第 1 支队在王家邵村截住了这股援军，毙伤 30 人，击毁汽车 2 辆。其余敌人见势不妙，掉转车头仓皇逃回安阳。

7 月 1 日，战役进入第二阶段，按照李达的部署，第 1 支队向南夺取北当山、九龙山、东善应等伪军据点；第 2 支队向北进攻石官、东鲁仙等据点；第 3 支队向众乐、李家岗等据点进攻。经过两昼夜激战，3 个支队将安阳城以西、观台镇以南、鹤壁集以北地区内的日伪军据点尽数拔除。

第二阶段的作战对象主要是伪军，各部队都加强了政治攻势，效果很明显。据守东善应和石官的伪军，在我军的军事进攻和政治攻势下，集体缴械投降。第 2 支队攻打东鲁仙时，伪第 2 旅第 4 团的一个营部和两个连依仗日本工程师设计的坚固碉堡和三层工事顽抗，已投降的伪第 2 旅第 4 团团长达大崐和部分伪军家属去喊话劝降，他们也不理睬。这时，我军用迫击炮连续平射，准确地命中了目标，这才震慑了伪军营长，派出副官来“谈判”。经团长蒋克诚讲清我军政策并限定在 15 分钟内作出答复，据守东鲁仙的伪军终于在我军强大的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下举起白旗，走出碉堡放下武器向人民投降。

在第二阶段作战中，美军驻太行军区观察组应我军要求，呼叫了西安机场的美军飞机前来助战。于是两架美军轰炸机从西安机场起飞，飞临安阳城上空投弹轰炸了日伪军。这次轰炸的规模虽不大，却使日伪军大为震惊，因为多少年来都是日军飞机对抗日军民施虐狂轰滥炸，想不到如今八路军竟也有效地进行了空中支援。美国空军配合八路军作战，这是历史上少有的一次。这是太行军区与美军观察组建立良好关系的结果。太平洋战争爆发后，美军开始利用设在中国的军用机场起降美航空兵的援华飞机袭击轰炸日军目标。一些美军轰炸机遭击伤或击毁时，跳伞的飞行员被太行地区军民陆续搭救了数十名。后来，美国方面提出：为了营救飞行员和观测气象，希望在八路军控制的太行山根据地设立观察组。经中共中央同意后，美军观察组于 1944



年底来到太行军区。这时候，太行军区虽已渡过了荒年，但生产、生活还没有完全得到恢复，物质上仍有许多困难。尽管如此，李达等太行军区首长还是决定：在生活上尽量照顾美军观察组，想方设法给他们提供一些肉、奶、蛋。有一次，美军观察组的一位军官前来拜访李达，正巧赶上李达吃饭，美国军官看到李达司令员吃的是粗粮，菜也是素菜，根本没有肉，非常惊讶，回到观察组说起他们亲眼见到的情景，美军方人员都很感动，他们此后表示愿意协助八路军做一些事。也就是从这时开始，我党和八路军的高级干部从延安到前方来，或从前方回延安，均可以搭乘美军的便机。安阳战役中，美军飞机轰炸日伪军，为八路军助战，也是美军驻太行军区观察组促成的。

第三阶段作战于7月4日开始。部队经过前一阶段的连续作战虽有些疲劳，但士气仍高昂。第1支队向南扩展战果，挺进至汤阳县境内。7月5日支队主力强攻鹤壁集，全歼了伪第六方面军暂第9师第26团。继而又乘胜攻下曹家、鹤塔等据点。第1支队一部奉命东进，在3天时间里攻下了赖家河、黑塔、北唐仲、时丰、大湖、鹿楼集等伪军据点。平均每天都能打下它两三个据点，而并不付出怎样大的伤亡代价。这主要是因为该部注重军事打击与政治攻势相结合，争取了伪军两个连反正。第一支队的胜利进军，使平汉路以西的一大片平原地区的人民群众获得自由解放。

观（台）丰（乐）铁路一直被侵华日军用来运输六河沟煤矿生产的煤，这对日军的侵略行动有着至关重要的经济价值。李达命令第2、第3支队破击观丰铁路，断其经济后路。近万名民兵、自卫队员配合第2、第3支队官兵拆除、搬走铁轨，烧掉枕木，连路基也给铲平，把观丰铁路变成了一条支离破碎的死蛇。李达也来到破路现场，鼓励战士、民兵、自卫队员尽量多拆除铁轨。因为这些铁轨运回太行山以后，可以再行锻造，制成枪炮打击侵略者，或制些农具帮助农民恢复生产。

观丰铁路沿线的西保障、东保障、王安等伪军据点，被第2、第3支队悉数拔除。驻防伪军或被歼灭，或逃往观台、丰乐。驻守丰乐车站的日伪军出动600多人救援铁路沿线伪军，刚进至丰乐以西的张显屯即遭第3支队阻击，遂又缩了回去。

观丰铁路被彻底破坏后，李达和李雪峰于7月7日命令各支队停止作战行动。7月9日，安阳战役结束。李达原先预计整个战役需要17~20天时间，实际只进行了10天。

安阳战役取得了辉煌的战绩：共毙、伤、俘日伪军3300余人。其中包括：大泽大队长等百余名日军官兵，俘虏或迫使投诚、反正的日伪军2500余人，李英的伪军被歼灭三分之二，伪军将级军官3名、校级军官22名、尉级军官169名被俘或反正。另外，还击溃伪军900余人，攻克据点30余处，收复国土1500余平方公里，解放人口35万。

安阳战役的胜利鼓舞了抗日根据地的广大军民。人民群众兴高彩烈敲锣打鼓为部队庆功，不少村镇的父老乡亲送来猪肉、羊肉、烧酒、纸烟慰问部队。边区政府决定：参加安阳战役的部队一律免除三个月的粮食生产任务，每个指战员奖给10斤粮食。这在当时已是很了不起的奖励措施了。

《新华日报》（太行版）的记者采访了李达，请他谈了安阳战役的经过和战果。延安《解放日报》也迅速报道了这次战役的详细战况，并转载了李达与《新华日报》（太行版）记者的谈话。李达指出：“这次战役中，我军士气旺盛，动作神勇，组织非常周密，在精神上、物质上完全压倒了敌人。

我军的攻坚精神和作战的持续性，使敌伪大为震惊，……我军从游击战、麻雀战进入进攻的野战范围，获得了许多新的作战经验。”

太行军区部队经过 8 天休整，于 7 月 18 日召开了隆重的祝捷大会。李达、李雪峰、戎伍胜（即戎子和，时任晋冀鲁豫边区政府副主席）、袁子钦等同志检阅了精神抖擞、士气高昂的部队。在欢庆胜利的锣鼓声中，李达在大会上讲话说：安阳战役，这只是大战前的演习，新的更大更艰巨的战斗任务正等待着我们。

### 揭开上党战役序幕

1945 年 8 月 6 日、9 日，美国向日本广岛、长崎投掷了两枚原子弹；8 月 8 日，苏联政府对日宣战；9 日，苏联红军出兵东北进攻日本关东军。日本帝国主义四面楚歌，最后崩溃的日子到来了。

毛泽东主席于 8 月 9 日发表《对日寇的最后一战》的声明，号召“八路军新四军及其他人民军队，应在一切可能条件下，对于一切不愿投降的侵略者及其走狗实行广泛的进攻，歼灭这些敌人的有生力量，夺取其武器与资财，猛烈地扩大解放区，缩小沦陷区。”

8 月 10 日晚上，李达正在军用地图前考虑太行军区部队的进军方向，作战参谋来报告：美军驻太行军区观察组的李翻译收听到国外英语广播，日本政府已经向同盟国发出乞降照会。稍后，新华日报记者组也收听到了新华社播发的消息，以及朱德总司令发布的大反攻一号命令。记者组将朱德总司令的命令记录下来，急送李达。命令要求：解放区武装部队向其附近城镇交通要道的日伪军发出通牒，限期向我军投降，如遇拒降抵抗，即予坚决消灭。

李达抑制不住激动的心情，当天夜里即通过电话，向太行军区所属的 8 个军分区一一传达了朱总司令的命令，并根据各军分区的实际情况，提出了一些具体要求。

8 月 11 日，李达收到了在延安的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发来的电报指示。指示说：“日本可能继续抵抗，亦可能投降。我应迅速准备夺取城市。”指示要求太行军区：1. 集中主力与太岳军区主力共同开赴沁源以北地区，保障晋西北部队夺取太原；2. 太行第二军分区部队以全力相机夺取榆次、太谷，并向太原前进；3. 积极破坏铁路，并注意对道清路及黄河沿岸的控制。

收到刘、邓、滕电报指示，李达与太行军区其他领导同志会商后，于当天晚上 7 点，颁发了太行军区第一号命令：“我们所有武装部队及人民武装，应遵照朱总司令本月 10 日第一号命令，迅即全力出动，向当面敌伪发出最后通牒，限期使敌军缴出全部武装，使伪军伪组织投诚反正，否则坚决消灭之。我民兵及自卫队尤应紧急动员，积极参加此最后胜利的行动，保卫与扩大解放区，收复沦陷区。”

8 月 12 日，李达、李雪峰向太行军区周围的日军和伪军发出最后通牒。通牒要求：

一、所有日军部队于接获本通牒后，应立即停止抵抗行为，并于一定时间就地指派代表，与各地驻防之我军接洽投降事宜。

二、所有日军部队应在原地听候处理，不得移动，全副武装应立即缴出，不得缴予八路军以外之部队，否则本军概不负责。

三、不得武装居民，其已武装者，应立即缴械。

四、不得破坏武器、仓库、资财、交通、企业以及一切公共建筑等，或转卖与第三国人员。

五、不得虐杀盟国俘虏与中国人民。

凡日军部队遵守上述条款者，本军当根据优待俘虏条例给予生命之保护，倘有意违者，即坚决消灭之，或按战争罪犯予以严惩。

李达在通牒的末尾郑重地签署了自己的名字。此刻，他心潮澎湃难以平复，他和他的战友们以及英勇不屈的中国人民，为把蹂躏我神圣国土的万恶侵略者赶出我们的美丽家园，同他们浴血奋战已整整8年。胜利的一天终于来到了。

同日，太行军区各部队开始行动。第2军分区部队向榆次、太谷挺进；第3、第4军分区部队攻占了潞城和白晋线上的许多日伪据点；第1、第5、第6军分区部队攻克了赞皇、昔阳两城和日伪据点50多处；第7、第8军分区主力8个团组成道清支队，向道清路新乡至博爱段进击，数天时间即克复博爱、辉县、获嘉三座县城。

8月13日，太行军区组成了以李达为首的野战司令部，拟以各军分区主力8个团组织一支西进部队。李达要求列入西进部队的8个团迅速从各军分区赶到武乡、蟠龙、洪水等地集结，合编为第3、第4支队，以便尽快西进长治（古称上党）地区。

李达已经意识到扩军的紧迫性，几次与太行区党委、边区政府负责同志会商。在各方面的努力下，太行区各县掀起了参军热潮，在短短的1个月内，便有青壮年3万多人参军。这使李达深受感动，他后来不止一次地感叹说：“太行人民真是太好了，为民族解放，为革命付出得太多了！”

8月15日，日本政府宣布无条件投降。但就在这一天，蒋介石却给日本驻中国的派遣军总司令冈村宁次发去电报，要他维持占领区秩序，等待国民党军队受降，不准向八路军、新四军投降和交出地区及物资。冈村宁次有恃无恐，立即通知所属日军各部，只向蒋介石的军队投降，不向其他军队缴械。他还命令日军：除蒋介石有命令外，对中国其他方面的要求“不仅应坚决拒绝，而且应根据情况，毫不踌躇地行使自卫的权力。”

蒋、日的这种态度，使已被蒋介石指定为“第二战区受降主官”的阎锡山受到鼓舞，他命令阎系第八集团军副总司令兼第19军军长史泽波率4个师和1个挺进纵队（相当于师），立即抢占上党。史泽波率部于8月18日从临汾、浮山、翼城出发，兼程向上党地区扑来。我军地方部队在史泽波所率阎军与原驻上党地区日伪军的夹击下，撤出了战斗。史泽波抢占了太行军区部队从日伪军手中解放的襄垣、潞城，以及已被我军包围的长治、长子、壶关、屯留。阎锡山打着以上党为基地继续推进，分割我太行、太岳根据地，占领整个晋东南的如意算盘。。

急剧变化的形势摆在了李达面前，他反复考虑利弊得失后决定：已经集结完毕的西进部队暂时停止前进，先占领长治北面的沁县城和武乡县新县城（即段村），控制住一段白晋线。如此，既可以为包围歼灭进犯上党6城的阎军创造条件，又可以给进军太原、阻击阎军北上的我军部队以有力掩护。后来的战斗进程表明，李达的这一抉择是正确的，是一步好棋。

8月22日，李达指挥西进部队逼近沁县城，城内日军拒绝投降，李达命令攻城。眼看部队已攻入沁县城，敌人即将就歼，此时，由长治向太原北撤的日军第14旅团原泉部却赶了来。李达决定不与敌人拼消耗，下令撤出沁县

城，改变部署为围攻武乡新城段村镇。

段村镇原本不是武乡县城，1940年，日军侵占了位于武乡腹地的段村镇，在镇内建立了伪县政权。经几年经营，段村镇构筑了城郊外围据点、环城外壕、高7米的城墙，及数十个既可据守又可巷战的碉堡火力点。李达率部包围段村镇时，守敌有日军1个指导小队、段炳昌的伪绥靖军第2师第2团和1个伪警备中队，共

2000多人。段炳昌原系阎锡山骑兵军的副师长，投敌后被日军任命为师长，也是一个恶贯满盈的铁杆汉奸。

李达把指挥部设在下城红河台，迅速将作战方案考虑成熟，具体部署是：以决死第3纵队第9团从城东主攻；第31团、第769团分别由城西、城北助攻；黎城、左权、武西等县民兵在城郊北山佯攻；第13团、八路军总部警卫团及武乡各区民兵在长街、松村等地打援。

部队正在按部署进入作战位置，李达接到刘邓首长从延安发来的电报，要求李达所部“应立即行动，消灭阎顽东进部队，求得适时夺取长治。”

李达考虑：目前我军既要继续向日伪军反攻；又要控制平汉路 and 同蒲路，阻击北上的国民党军队；还要对付进犯上党的阎锡山军队。战略任务重，战役规模大，情况复杂。需要动用的部队，已涉及大岳、冀南、冀鲁豫等兄弟军区，自己难以胜任指挥之责。遂致电延安，请刘邓首长回太行组织大军与指挥强大野战军作战。

在发出请刘邓首长回太行的电报后，李达没有坐等，而是为即将到来的大战积极做好各项准备工作。经过深思熟虑，他又致电留守涉县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主席杨秀峰、太行区党委书记兼太行军区政委李雪峰和太行军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黄镇：

“我拟完成武乡作战后立即挥师南下，请速准备下列各项：一、彻底撤退长治周围居民，搬出粮食，深入空室清野工作。二、发动组织长治周围强有力的游击战争，配合政治攻势，压缩敌伪于城内，并给任何出扰之敌伪以有力打击。三、将潞城、长子、壶关独立营立即扩组成团，各充实到一百五十至二百人，并给以必要的训练。四、将潞城平顺之（电）线延伸至黄碾南垂等地，以便作战使用；并彻底查清长治周围情况，望不断电合并作成地图、材料送来。五、请令四分区迅即准备三万个手榴弹。其余各分区，尤其五、六、七、八分区应经常准备两万手榴弹，以便随时调用；并继续制造大量迫击炮弹及炸药。”

8月24日，李达接到太行军区转来的中央电报，得知中央已决定成立晋冀鲁豫中央局和晋冀鲁豫军区。邓小平为晋冀鲁豫中央局书记，薄一波为副书记；晋冀鲁豫军区下辖太行、太岳、冀南、冀鲁豫4个军区，刘伯承任司令员，邓小平为政委，滕代远、王宏坤为副司令员，薄一波为副政委，张际春为副政委兼政治部主任，李达为参谋长。

当天晚上，李达又接到刘邓首长发来电报，告知他们将乘美军运输机次日从延安返回太行，在黎城的长凝简易机场降落。

刘邓首长在此关键时刻赶回坐阵指挥，这个消息使李达欣喜万分。至于黎城的长凝简易机场，李达对其安全系数是有把握的。那里原本是一片开阔地，被太行军区营救的美军飞行员见那里平坦异常，还以为是个秘密机场，曾询问过李达。这倒提醒了李达，他想：我军迟早也会有飞机的，也必需机场，何不先打个基础？他便命令部队有意识地到那里跑步、出操、队列训练，

把那片开阔地踏得平平展展、结结实实。后来，美军建议在太行山区修建一个简易机场，作为飞往延安的中转站，八路军总部同意了这项建议。李达随即组织部队和附近群众按机场的要求进行了施工，建成了跑道长1公里的简易机场。到1945年8月，长凝机场已经起降飞机数十架次，从未出过闪失。往返延安太行只需几小时就能完成，而无须艰难跋涉1个多月的旱路，缩短了中央与太行晋察冀的距离。因此，李达才在前几天发往延安的电报中，建议刘邓首长乘飞机返回太行。

李达原想自己到长凝机场迎候，但攻打段村的战斗几小时后就要打响，自己实在分不开身，于是他打电话给驻涉县赤岸的太行军区司令部，要军区明天派人带骑兵排去机场迎接刘邓首长等。

8月24日夜，指挥部发出了进攻的信号，各部队开始行动，当夜即将敌人设置在段村镇外围的据点大部扫除。主攻部队决死第9团还一度攻上了东城墙，可惜由于敌人点燃浇了煤油的被子，我军攻城的云梯被烧断，进攻受挫。为减少伤亡，李达命令白天停止攻城，夜间再继续打。

8月25日，晋冀鲁豫军区首长刘伯承、邓小平、滕代远、薄一波、张际春，太岳、太行、冀南、冀鲁豫军区部队领导人陈康、陈锡联、陈再道、杨得志、王近山，以及全国各大战略区的首长、部队负责同志林彪、陈毅、萧劲光、邓华、宋时轮、李天佑、傅秋涛、聂鹤亭、江华等21人，同乘一架美军道格拉斯DC—9运输机在长凝机场着陆。

刘邓首长下了飞机，就直奔赤岸村，马上要通了李达的电话。李达向他们扼要地汇报了近日的战况，以及自己下一步的打算——先攻下武乡新城段村镇，再把作战目标转向史泽波，打阎军从我军手中夺去的襄垣城。

刘邓首长肯定了李达的设想。邓政委说：“根本问题是抗战胜利果实落到谁手里的问题，蒋介石、阎锡山伸手来抢，决不能让他们得逞。我们已决定打上党！”刘司令员说：“蒋介石的军队沿五条铁路开进，五个爪子伸开向我们扑来了。他们的足球向我们华北解放区的大门踢了过来，我们要守住大门，保卫华北解放区，掩护我东北解放军作战战略展开。平汉、同蒲是我们作战的主要方向，现在阎锡山侵占了我上党6城，无疑是在我们背上插一把刀子，芒刺在背，脊梁骨发凉，不拔掉这把刀子，心腹之患不除，怎么放得下心分兵在平汉、同蒲去守大门呢？所以要坚决打下襄垣，在北面打开一个缺口，并就地集结太行军区部队的主力，以便会合太岳军区、冀南军区部队进行上党作战。”

刘邓首长的指示，使李达备受鼓舞。对下一步如何作战，也更加胸有成竹了。

8月25日夜，李达指挥部队继续攻打段村镇。决死第9团成功地打进了城内，歼灭了伪绥靖军第2团团部，伪师长段炳昌见大势已去，带领20多名亲随从地道逃走。巷战中，部队进攻的道路被城东南角一座古塔上的重机枪封锁，决死第9团请求调炮轰击那座古塔。李达没有把炮调给他们，而是派人告诉决死第9团的指挥员，不要用炮轰击古塔，要保护古迹，尽可能劝降。战士龚全来和张顺从塔后摸进塔内，高举手榴弹，迫使躲在塔内的敌人重机枪班投降。这座高13层的千佛塔得以保存了下来，至今仍屹立武乡县城内。

至8月26日，城内只剩下日军的指导小队还在城东北角的炮楼中顽抗。决死第9团将其团团包围，因缺乏重武器而难以接近。李达将安阳战役中缴获的那门山炮调了去，我军炮手抵近射击，一炮就将敌炮楼的顶盖掀上了天。

战士们乘着硝烟未散冲上去，紧贴着炮楼向枪眼里塞手榴弹。日军起初还拼命向外射击，但随着手榴弹的一声声爆炸，炮楼里的枪声逐渐停息了。战士们冲进去一看，几十名鬼子全被炸死。段村镇内的战斗结束了。

负责打援的第13团固守长街，与沁县来援的日伪军进行了浴血苦战。8月25日一天，沁县日军2个中队、伪军1个团共千余人向长街阵地冲击十余次，都被第13团打退。8月26日凌晨，段村镇守敌行将覆灭，沁县援敌的攻势更加凶猛，阵地几乎被突破。第13团指战员用刺刀、铁锹、铡刀与敌人拼死搏斗，终于又将敌人压了下去。此后不多时，援敌得知段村镇守敌已被全歼，灰溜溜地撤回沁县。

段村战斗毙、伤、俘敌千余人，另有伪军千余人在伪师参谋主任张效翰率领下投诚。

战斗结束后，李达考虑到下一步上党战役打响在即，急需屯兵之地，便硬着心指示部队连夜挥师南下围攻襄垣。

襄垣是上党6城之一，位于长治以北25公里，是长治通向太原的咽喉。据守襄垣城的，是史泽波所部阎军汾东第1支队、6纵队干训队（相当于营），和史泽波新收编的日伪襄垣警备队、屯留警备队共千余人。虽是杂牌军，仍有阎军善守的特点。

李达指挥大行军区部队第769团、第14团、决死第3纵队第9团，起义的杨虎城将军旧部第17师，及襄垣独立营等地方部队，围城数日扫清了外围，于9月1日拂晓用大量黄色炸药炸毁南城门，打开了突破口。黄昏时分部队发起总攻，突进城后又经巷战，午夜12时战斗结束，毙敌350余人、俘敌450余人。阎军少将、襄垣守军总指挥翟大昌，汾东第1支队队长孙士林，日伪襄垣县长张公度，阎军任命的襄垣县长闻家言等均被我军俘虏。

攻占襄垣，截断了太原阎锡山总部与史泽波之间的联系，揭开了上党战役的序幕。

襄垣解放后，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张际春副政委都来到襄垣。李达安排他们住进县署东边的寅畏堂。李达怀着激动而又兴奋的心情与他们见了面。他同刘伯承已分别两年，与邓小平也有两个多月未见面了。他向刘邓首长敬了一个标准的军人举手礼。

从这时开始，李达不再兼任太行军区司令员职务，又回到刘邓部队参谋长的老职位上，重新开始尽心竭力地赞襄军机。

李达向刘伯承、邓小平、张际春详细汇报了段村战斗、襄垣战斗的经过和经验教训，特别是襄垣战斗的一些教训。如：战前侦察不够充分；战斗器材准备不足；战斗发起时隐蔽性差，失去突然性；用兵拥挤、招致伤亡增加，等等。李达认为有必要下发一个指示，提醒各部队在下一阶段的攻坚作战中注意改进。

刘伯承很重视李达所谈情况，亲自起草了《晋冀鲁豫军区关于上党战役某些战术问题的指示》，于9月5日下发各部队。

9月7日，刘伯承、邓小平下达了《晋冀鲁豫军区作战字第一号命令》。三天后，上党战役正式开始。李达作为刘邓首长的参谋长掌握全面情况，又兼任太行纵队司令员，与刚从延安回来的陈锡联一起，指挥由太行军区各军分区部队合编的太行纵队作战。我军先攻克长治外围的屯留、潞城、壶关、长子，再围打阎锡山派来的彭毓斌部8个师援军，最后追歼了从长治出逃的史泽波部。至10月12日，上党战役胜利结束，共歼灭阎军13个师、3.5万

人，有力地声援了毛泽东主席在重庆与国民党、蒋介石的谈判。

李达在协助刘邓指挥上党战役中曾数度亲临一线带兵作战，为战役取得全胜作出了突出贡献。李达曾说：“我是一个参谋长的材料，我能根据任务、敌情、我情、地形、时间设计出四种、五种打法，但最后一拳头，究竟按哪一种打法办，还是要由主官来下决心。”这是他的自谦之词。他任太行军区司令员期间，指挥部队多次打胜仗，就充分说明：他既是一位好参谋长，也是一位好司令员。

## 李志民在东征与西征中

王金陵

李志民（1906～1987）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原名李凤瑞，又名李明阶。湖南省浏阳县人。1925年开始从事农民运动，曾被选为乡农民协会副委员长。1927年参加中国共产党。1928年3月，在高坪区组建游击队，并任党代表。在湘赣边区的长坑、丙子岭一带山区集聚革命力量，开展游击活动。同年冬，调入中国工农红军第5军工作。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先后任中队党代表，大队、团政治委员，红2师政治部主任，红3军团教导营政治委员，参加中央苏区反“围剿”和长征。到达陕北后，参加直罗镇战斗和东征、西征。后任第81师政治部主任。抗日战争时期，1937年起，任第27军政治部主任，抗日军政大学队长兼政治教员。后任冀中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解放战争时期，任晋察冀野战军纵队政治委员，兵团政治部主任，政治委员，参加察绥、平津、太原、兰州、宁夏等战役。1950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19兵团政治委员，志愿军政治部主任、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等职。曾四次荣获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级国旗勋章，两次荣获一级自由独立勋章。1957年10月回国，任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等军事学院副政治委员、政治委员。1972年任福州军区政治委员。1980年，任中央军委顾问。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荣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1987年11月16日于北京病逝。

\* \* \* \* \*

李志民同志戎马一生，长期担任部队的政治领导工作，积累了丰富的政治工作经验。他牢记毛泽东同志关于军队政治工作要做到“官兵一致，军民一致，瓦解敌军”的三项基本原则，并身体力行，带领部队去完成各项战斗任务。在半个多世纪的军旅生活中，他身经百战，历经许多苦战、鏖战几天几夜甚至几十个昼夜才取胜的战役、战斗，也打过一些不费一枪一弹，不伤一人一骑的传奇式的胜仗。本篇仅就其“百战谱”中采撷1936年的东征、西征战役中几场奇特的政治仗，以飨读者。

### 东征战役中的政治仗

1935年12月25日，中共中央在陕北瓦窑堡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分析了当时的政治形势和国内阶级关系的新变化。会议认为，日本帝国主义继“九一八”事变侵占我国东北三省之后，进一步向华北发动新的侵略，企图吞并华北五省。而国民党蒋介石政府仍坚持其“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政策，对日本帝国主义步步紧逼的侵略行径不予揭露进行抵抗，反图我红一方面军经过艰苦长征刚抵达陕北立足未稳之时，将红军就地歼灭。蒋介石的倒行逆施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极大义愤。北平学生在党的领导下发起“一二九”运动，喊出的“反对华北自治运动”、“打倒日本帝国主义”、“停止内战一致对外”等口号，获得了全国人民热烈的支持和声援，掀起了全国抗日救国的新高潮。在这个新形势下，会议通过了《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规定了党在新形势下的策略路线：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提出“建



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任务。在军事方面，确定红军的发展方向应当向东，“准备直接对日作战”，“把国内战争同民族战争结合起来”，并指出了游击战争在战略上的重大作用。这时，红一方面军万名指战员刚刚经过忍饥受寒、艰苦跋涉长征二万五千里到达陕北，看到的是一望无际的黄土高原，许多山头还寸草不生，与四季常青的南方老革命根据地实在相差很远。大家心想，陕北这样荒凉的山沟本来就穷困，突然增加了我们一万红军，今后怎么生存，如何发展，怎样战斗？正在大家迷茫之际，瓦窑堡会议的决议似灯塔，如北斗，照亮了大家的心，指明了前进的方向。担任第4师第11团政治委员的李志民心里也有了底，立即召开各种会议，兴奋地反复深入地向大家传达瓦窑堡会议决议精神，把全团官兵的心火火地鼓动起来。

为推动“一二九”运动在全国掀起抗日救亡高潮，准备对日直接作战，1936年2月，中央决定以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主力组成中国人民抗日先锋队东渡黄河，挺进山西，奔赴抗日第一线。

抗日先锋队由彭德怀任司令员，毛泽东任政治委员，叶剑英任参谋长，王稼祥（后为杨尚昆）任政治部主任。由第1军团组成右路军，下辖第1师、第2师、第4师和第81师；由第15军团组成左路军，下辖第73师、第75师、第78师；由第30军组成中路军，下辖第30军、第15军团第224团和第81师一个营。李志民与团长罗开桂一起率第4师第11团参加右路军的东征行列。

2月19日前后，抗日先锋队右路军在毛泽东、彭德怀的直接指挥下，先后集结于陕西省吴堡以南的沟口一带，准备东渡黄河。此时，国民党太原绥靖公署主任、山西军阀阎锡山已将其兵力25个旅作了二线部署，以其第71师的三个旅在黄河东岸沿黑峪口至禹门口300多公里的正面构筑工事作一线防御；其余各旅分布于临汾、长治、晋城、太原和浑源、大同等地区作为二线机动；同时，还以其占据在黄河西岸的吴堡、义合和神木、府谷等地区的第101师四个旅牵制我军兵力，以阻止我军渡河。彭德怀为保证部队顺利渡河，亲自带领参谋人员到渡口察看地形，选择渡口，组织动员皮筏子、木船等，做好充分的渡河准备工作。李志民看到彭老总（红3军团官兵从上到下都是这样亲切地称呼彭德怀同志）又一次亲自摸黑沿河岸察看地形，崇敬和钦佩之情油然而生。自从1928年冬李志民调到第5军以来，一直在彭老总直接指挥下战斗、工作。每次战斗，彭老总在战前都要亲自一遍遍地察看地形，观察敌情，做到心中有数，然后再制定作战方案，真正做到了“知己知彼”，“不打无准备之仗，不打无把握之仗”，保证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李志民逐渐从彭老总身上学会指挥打仗，也逐渐体会到这才是真正的爱兵，最大的爱兵！

2月20日（农历正月二十八日）晚，毛泽东、彭德怀亲率右路军利用夜幕的掩护，乘敌人不备强渡黄河，一鼓作气冲破敌人防线，迅速占领山西省中阳县的留誉镇、三交镇一线。与此同时，左路军亦从陕西省清涧县的河口强渡，并迅速占领了山西省石楼县的义牒镇、塘马镇一线。至23日，抗日先锋队已控制了黄河东岸南北50余公里、东西35公里的地区，站稳了脚跟。

阎锡山见我红军已渡河，马上将其黄河西岸的4个旅调到东岸的离石、中阳地区，协同担任河防的第71师牵制我军东进；同时，调动太原、临汾、大同、长治的部队向我渡河部队反扑。面对多路前来围攻的敌人，毛泽东、彭德怀仍采取集中兵力打敌一路至两路的战法。继2月25日左路军于石楼与

隰县之间歼敌第 69 师先头旅的两个营之后，26 日，右路军又在中阳、隰县、石楼、孝义四县交界处的关上村歼敌独立第 2 旅一个团，控制了这一作战枢纽地带。

阎锡山在丢失关上村这个要点后，立即组织 14 个旅进行反击。我抗日先锋队又集中左、右两路军主力在孝义县大麦郊地区的兑九峪击溃敌第 66 师、第 68 师，粉碎了阎锡山组织的第一次反击。与此同时，守卫陕北根据地的第 28 军也乘敌第 101 师的 4 个旅由黄河西岸调往黄河东岸的空隙，夺取西岸的吴堡、葭（佳）县、神木、府谷地区，巩固和扩大了陕北根据地。

蒋介石得知我抗日先锋队已东渡黄河，3 月上旬，急令陈诚率 9 个师增援阎锡山，阻止我军东进开赴抗日前线。我抗日先锋队为了扩大战果，决心在蒋介石军队进入山西之前，向南向北发展胜利。3 月 16 日，我军自兑九峪沿汾河、同蒲铁路南下，19 日，右路军到达霍县，左路军也进抵灵石附近掩护右路军作战。此时，阎锡山已集中了 12 个旅的兵力在中阳、石楼、隰县、孝义地区企图寻找红军主力作战。毛泽东、彭德怀即利用此时晋东南敌军减弱的时机，留下中路军在这一地区与阎锡山的 12 个旅周旋，箝制敌军主力。3 月 18 日，左路军从灵石北进，经文水、交城、晋祠，威逼太原。李志民率红 4 师第 11 团随右路军继续南下，占领曲沃、襄陵、洪洞、赵城、临汾、霍城等 6 个县的广大农村，破坏敌铁路百余公里，并积极开展群众工作。

当时，由于红军刚刚结束长征不久，部队指战员的体力尚未很好恢复，武器装备也大不如阎锡山的部队。所以，彭老总在团以上干部会议上反复强调，红军指战员大多是经过长征锻炼考验的骨干，为了保存红军的实力，在战斗中主要应采取袭击的手段，一般不采取攻坚战，不与敌人拚消耗，以减少伤亡，争取以最小的代价换取最大的胜利。李志民政委和罗开桂团长率第 4 师第 11 团自霍县南下后，首先与兄弟团队一起攻打赵城。那天晚上，第 11 团担任主攻任务，但赵城这座县城很小，配合第 11 团攻城的炮兵营瞄准要打东门，结果稍一误差，炮弹飞到西门外去了，闹了个笑话。由于赵城城墙坚固，敌人集中兵力固守，第 4 师打了一个晚上，未能攻破，黎明时分便撤兵了。接着，第 11 团又配合第 10 团攻打洪洞县城，仍未奏效，即转移到洪洞县城附近的曲亭镇，在这一带农村开展抗日宣传活动，进行扩大红军的工作。

李志民带领部队在曲亭镇一带农村开展抗日宣传活动中首先遇到一个所谓“主张公道团”（简称“公道团”）的反动组织问题。原来，我红一方面军到达陕北后，陕北红色根据地逐渐扩大，红军在群众中的影响也日益增强。这样，与陕北仅一水之隔的山西土皇帝阎锡山便坐卧不宁，想出诸多“防共反共”的花招，有什么“军事防共”、“政治防共”、“经济防共”、“思想防共”和“民众防共”等等。他亲自策划组织的“主张公道团”即是所谓“民众防共”的一手措施。

为了揭开“公道团”的底细，李志民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得知这个所谓“公道团”实际上是以地主、富农为核心的有一定社会基础的群众性组织，是阎锡山“自强救国同志会”反动骨干操纵下的外围组织之一。他们在太原成立“公道团”总团部，阎锡山自任总团长，并在各县、区、村成立各级团部。太原总团部派出经过专门训练的骨干到各县、区“公道团”担任正、副团长，并由各县“公道团”挑选、训练村团长，层层控制，组织十分严密。

“公道团”又称“好人团”。阎锡山把这个反动组织冠以“主张公道”的名字，欺骗群众说：“共产党有共产主义，我们也有主义，我们的主义是

‘公道主义’；共产党有组织，我们也有组织，我们的组织是‘好人团体’。这是我们组织的宗旨。”他还欺骗群众说：“共产主义不公道”，诬蔑共产党和工农群众是“坏人”。他说：“今天我们组织‘主张公道团’，就是教你们拿出力气制裁坏人，消除社会不平，建立社会公道，消灭共祸。”他这个“公道团”的反共目的昭然若揭。

阎锡山为了欺骗群众，曾亲自编了六首“防共歌”，普遍印发各村，强迫“公道团”团员和群众学唱，在限期内不会唱者便被当众辱骂、罚跪、顶砖头，因而有许多人不愿受辱而远避之，不去学唱。他编造的“防共歌”胡说什么“共产党共产共妻”、“共产党杀人如割草”、“土地革命是先甜后辣”等等，使不明真相的群众对红军产生恐惧心理，不敢同红军接近，少数群众甚至躲进了山沟。李志民根据了解的这些情况分析：“公道团”虽然是阎锡山一手策划组织的反共组织，但除了极少数反动的核心人物外，大部分群众是被欺骗被裹胁参加的，他们仍然是我们的基本群众，应该教育争取。所以，他一面向上级如实反映情况，一面带领部队积极开展群众工作，以实际行动揭破敌人的谣言。第11团官兵都分散住在各村老百姓家，通过教育大家明白所谓“公道团”的性质，懂得应该用什么道理和行动去宣传教育群众。大家更自觉地严格执行三大纪律八项注意，帮助老乡挑水、扫地、推磨拉碾，为群众治病、理发，有的还帮助穷苦群众修补窑洞，以严明的军纪和良好的作风说明我们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同时，他们还积极宣传红军的宗旨，宣传共产党的抗日主张和民族统一战线政策，揭露蒋介石、阎锡山勾结日寇、出卖主权，阻挠我军东进抗日的罪行。

李志民对群众说：“阎锡山说他主张公道，你们看，阎锡山在山西称王称霸，横行无忌，苛捐杂税和各种差役多如牛毛；他公开贩卖鸦片，百般盘剥百姓，搜刮民脂民膏；他的军队到处抢劫财物，敲诈勒索，滥杀无辜；地主恶霸横行乡里，地租高利贷象条条绳索捆绑着贫苦农民，这些都公道吗？”

又说：“我们红军积极东进抗日，辛辛苦苦渡过黄河，经过山西，所到之处秋毫无犯，公买公卖，与老百姓亲如一家，谁见过红军‘杀人如割草’呢？阎锡山才真正是杀人不眨眼的刽子手。现在，他还在大肆搜捕抗日爱国志士，甚至搞什么杀人竞赛，多杀者有奖，少杀者受罚，并且通令各县，捕杀一个共产党员或红军侦察员者，赏大洋百元。各县为了邀功领赏，在各要道口设关立卡，把他们认为的嫌疑人抓去严刑拷打，而后杀害，这两个月以来，有的县遭害的无辜百姓已有五六十人……”

李志民和红军指战员坚持摆事实、讲道理，群众听了都口服心服，称赞红军是“仁义之师”，是老百姓自己的队伍。阎锡山制造的谣言被粉碎了，他苦心经营的“公道团”也随之土崩瓦解。在各地军爱民，民拥军的氛围中，不仅在外躲藏的人陆续归家，而且许多年轻人还踊跃参加红军，红军的名声到处传扬。

3月下旬，第11团奉命继续南下，攻打浮山县城，筹布筹款，以供军需。

浮山县城四周已为红军包围，成为一座孤城，但县城墙又高又厚，易守难攻。李志民政委和罗开桂团长接受了攻城任务后，正抵近城墙观察地形，选择突破口，第4师政治委员彭雪枫也赶到前沿。他传达彭老总的指示说：“近日从有关情报获悉，蒋介石调集的20万兵力已陆续进入山西，妄图配合阎锡山将我们消灭在黄河以东、同蒲铁路以西地区，我们随时都可能转移。现在看来浮山城墙坚固，我们攻城的火力不足，时间又紧迫，所以，我们不

能强攻，只可智取。”

李志民是彭雪枫政委的老部下，一向钦佩彭政委的足智多谋。彭政委提出的智取方略与李志民不谋而合。他赞同地说：“政委，智取的办法很好。这样既可以避免攻坚的伤亡，保存战斗骨干，又能达到宣传群众、筹布筹款的目的。我们可以先从思想上、物质上做好武力攻城准备，同时，积极开展政治攻势，主攻其心，使敌人惊慌，可不战而胜。”

李志民又和团长罗开桂仔细地作了研究和分工。罗团长带领部队赶挖地道，准备爆破城墙，并扎制几丈长的云梯，做攀登城墙用。同时，加紧进行攻城、爆破演习，制造攻城的战斗气氛。李志民则和宣传队员抄写布告和标语，在城外四周村寨张贴、散发，并组织群众会、演讲会，唱歌、跳舞、演活报剧，吸引更多观众，向城郊农村广大群众宣传红军的抗日主张和政策，号召群众支援我军攻克浮山城，大造攻城舆论。夜晚，则利用夜深人静时对城内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喊话，用弓箭发射给国民党县长的“公开信”，发出攻城的“最后通牒”。

在红军兵临城下和强大的政治攻势面前，国民党县长和城内的土豪劣绅个个胆战心惊，生怕城破之日丢了性命，财产被没收，经过一番争吵，最后公推县长出面谈判。县长不得不拖着颤抖的身子亲自爬到城楼上乞求不要攻城。

彭雪枫和李志民两个政委只见那县长战战兢兢地在城楼上向他俩作揖，有气无力地乞求道：“红军长官，莫动干戈，有事好商量，鄙人愿为贵军效劳。”

彭雪枫政委站在城下严肃地大声问道：“你是什么人？”

县长怯懦地回答：“长官，卑职是浮山县县长。”

彭政委说：“你是县长？那好。你既然愿意为红军效劳，就要答应我们两个条件。”

县长马上点头哈腰地回答：“请长官吩咐，鄙人一定照办！”

这时，李志民政委从容不迫地代表第11团提出事先研究好的条件。他习惯地挺了挺胸，整了整衣领和腰皮带，再用双手拉了拉虽已破旧但仍洗补得十分整洁的军装，让胸部显得更挺更壮实一些；他那瘦弱然而高大的身躯，那清瘦而俊秀的脸庞上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闪亮，显得格外严肃、庄重，像一位严正的法官宣读“判决书”似地亮开嗓门对城楼上喊道：“县长先生，你听好了！我们红军的条件很简单：第一，从今天起，限你们三天之内，为我们红军抗日先锋军筹款现大洋5000元，土布300匹；第二，所筹的银洋、布疋只能在富豪商贾中筹集，不准分摊在小商贩和贫苦居民身上，否则，将加倍处罚！”提完了条件，他又提高嗓门严肃地警告说：“倘你们不能实现以上两个条件，三天后即要攻城！”

县长连声应诺。果然，不到三天就将筹集好的银洋和布疋如数从城楼上用绳索坠下交给第11团。第11团不费一枪一弹，既向浮山城内的富豪商贾筹集了布、款，又在城外广大农村发动群众，扩充新兵六七百人，胜利地完成任任务，满载而归。这种攻城办法在当时红军中还属一种创举。城内外的老百姓为此拍手称快，当李志民政委率部撤离浮山县时，城外的群众都依依不舍，热情送别。

4月初，蒋介石和阎锡山的部队15个旅已先后由隰县、介休、霍县、运城等地向抗日先锋军右路军推进。毛泽东、彭德怀决定左、右路军向中间靠

拢，逐步收缩兵力，待机破敌。4月4日，右路军开始向西北方向转移，经襄汾的汾城、古城，9日到达河津以北地区，15日攻占吉县，全歼守敌，俘敌300余人。接着，又先后扫除了大宁、永和以及永和平渡关至清水关40余公里的黄河沿岸堡垒，继续开展宣传发动群众的工作。

4月中旬，蒋介石、阎锡山纠集25个旅从北、东、南三面包围，企图歼灭红军于黄河东岸；在陕西的国民党东北军和西北军也奉蒋介石之命进至宜川、韩城一带，从西面封锁黄河。在敌人前堵后迫的情况下，红军东进抗日前线已相当困难。为了避免全面内战的爆发，保存抗日力量，争取国民党政府共同抗日，促进实现广泛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5月1日，中共中央决定抗日先锋军回师陕北。

5月2日，抗日先锋军开始西撤，第11团奉命在黄河东岸永和关扣山的东面担任后卫任务，掩护部队西渡黄河。5月5日凌晨1时许，李志民政委突然接到电话，说毛泽东主席就在离第11团驻地十余华里的山顶大庙里，要他马上赶到那里去接受任务。

他向罗开桂团长简短地交代几句，请罗团长掌握好部队，加强观察、警戒，随时准备阻击敌人，掩护全军安全渡河，而后带了几个警卫战士一起策马直奔山顶大庙。在马背上他心想，现在部队绝大部分已经过了河，敌人的追兵也快赶上来了，毛主席为什么还没有走呢？现在已过半夜，毛主席会有什么急事需要找我当面交代呢？他感到有些不安，真为主席的安危而揪心啊！

当李志民赶到大庙厢房的时候，只见毛主席身边的秘书、参谋还在忙着收拾文件和摆在炕上的书籍、铺盖，毛主席安然地站在一张长方桌前，聚精会神地看着军用地图，正在思考着什么。那魁伟的身躯，沉着冷静的神态，显得那么从容不迫，李志民见到这情景，心也平静了些。他在门口喊了一声：“报告！”向主席敬了个军礼，主席抬起头来和蔼地对他笑了笑，招呼他进屋坐下。

毛主席看了看表，大约下半夜两点左右，轻轻地嘘了口气，亲切地对李志民说：“我们的主力部队已经过河，估计敌人要到早晨八九点钟才能赶到这里。现在还有点时间，你们后卫团过河之前，要在沿途行军路上，仔细检查一下前头各部队执行纪律的情况，借的东西还了没有，房子打扫干净没有，门板上好了没有，损坏的东西或踏坏的青苗赔偿了没有，买的东西给钱了没有？要真正做到秋毫无犯。同时，还要检查一下，在村庄里，在行军路上，有没有丢下东西，留下路标？发现破布、碎纸、纸烟头、破草鞋等等，都要统统销毁掉，不要留下任何痕迹。我们长征过金沙江的时候，敌人还捡了我们一只破草鞋，这次过黄河，任何东西也不要给敌人捡去。”

李志民理解毛主席的意思，认识到这次东征是我们红军到达陕北后第一次入晋，纪律的好坏，直接体现了红军的性质，关系着红军的声誉。所以，他告别主席后，一刻也不敢耽误，鞭打快马三点钟返回驻地。马上召集各连干部和各级纪律检查小组成员开会，传达毛主席的指示，并进行简短的政治动员和组织分工。天刚破晓，部队出发。他带领各级政工干部和纪律检查小组成员，沿途分头到村庄、田野和山间小道，认真检查部队遵守群众纪律情况，该付钱的付钱，该赔偿的赔偿，该清扫的清扫，把一切破烂东西和路标都收拾销毁，一路之上，如同未曾经过大部队一样。

上午8点多钟，当全团撤离永和关，李志民政委带领的最后3条渡船刚

刚划到河心，敌人的先头部队已赶到永和关的山上。他们用机枪扫、迫击炮轰，炮弹和子弹纷纷落入河中，激起一股股水柱。本来渡船划到河心由于风急浪大就颠簸得厉害，渡船一会儿被推上波峰，一个大浪打来，又被压进浪谷，已经险象丛生，加上敌人的炮轰弹击，渡船不得不躲着枪弹左冲右突，更是险上加险。先头渡河的第4师师长陈光、政委彭雪枫都为他们的安危捏一把汗，命令西岸后防警戒部队的火力压制敌人。第11团的指战员个个勇敢沉着，很快地冲破敌人的火力封锁，胜利地回到了西岸。当渡船靠上岸时，师首长已在岸边迎接他们。陈师长、彭政委热情地握住李志民的手，表扬第11团指战员任务完成得很好。

后来他们听说，第11团走后，敌人闯进了东岸的村庄，抓丁拉夫，派粮派款，奸淫妇女，翻箱倒柜抢劫财物，闹得鸡飞狗跳，老百姓怨声载道。两种军队两种作风，谁好谁坏，谁“公道”谁不“公道”，人民群众心中有一面镜，泾渭自然分明，形成了强烈对比，从而为以后我军在山西开辟抗日根据地创造了一个好的条件。

这次东征战役，历时75天，红军抗日先锋军共歼灭敌人7个团，俘敌4000余人，缴枪4000余支，炮20余门，在山西20几个县做了大量的宣传发动工作，扩大红军8000人，既增强了红军的战斗力，巩固和发展了陕北根据地，又进一步扩大了红军的影响，推动了全国的抗日救亡运动。

### 西征中安边“围城打援”

1936年5月14日，中共中央在陕北延川县大相寺村召开了团以上干部会议（即“大相寺会议”），总结抗日先锋军“东征战役”的经验。同时，为了巩固陕甘根据地，向西发展，扩大红军和抗日根据地，并向南打通同红四方面军和红二方面军的联系，实现红军三大主力会师。5月18日，中革军委根据当时的政治、军事形势，决定以红一方面军第1、第15军团和第28军、第29军、第81师以及骑兵团共15000余人，组成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聂鹤亭任参谋长，刘晓任政治部主任，率部西征，向甘肃、宁夏进军。

5月下旬，李志民刚参加“大相寺会议”返回第4师第11团不几天，就接到军委调他任第81师政治部主任、参加西征的命令。第81师系原坚持陕甘根据地斗争的第27军缩编而成，部队成员大多是陕北的翻身农民，政治觉悟比较高，而且经过几次反“围剿”斗争的锻炼，有较强的吃苦耐劳精神，并具有一定的战斗力。师长贺晋年同志、政治部主任李宗贵都是陕北人；政治委员张明先是原第15军团的干部。西征前夕，贺晋年、张明先都调抗日红军大学学习，李宗贵继任政治委员。为了加强对第81师的领导，军委先后从第一方面军抽调了文年生、李寿轩和李志民等人，以及几个团级干部到第81师工作。文年生任师长，李寿轩任参谋长，李志民任政治部主任。

李志民接到调令时，第81师已同第15军团、骑兵团合编为右路军，随西方野战军指挥部从延川到新城堡集结。李志民、文年生一道连忙追赶部队。他们刚到新城堡，李宗贵政委即热情地向他们介绍情况，并亲自主持召开全师欢迎大会。文年生师长和李志民主任在会上讲话，整个会场充满着团结战斗的气氛。这大会也可以说是一次西征的动员大会。

5月27日，右路军第15军团主力从新城堡出发。28日，第73师袭占宁

条梁（今梁镇）；第75师攻击安边未克，继续西进，由第78师围困安边。这时，李志民刚到新城堡不几天，第81师又随野战军指挥部进驻宁条梁待命。李志民历来注重部队的教育训练，把它作为提高部队军政素质、增强部队战斗力的重要方法。所以，部队一住下，他就向文年生师长、李宗贵政委建议利用这个时机开展战备训练，并对部队进行形势任务教育，反复阐明西征的重大意义，鼓舞士气。在教育中，李志民根据安边、定边地区系回族同胞聚居的地方这个特点，以及长征途中经过回民区时的工作经验，着重对部队进行民族政策和群众纪律的教育，重申“禁止驻扎清真寺，禁止在回民家中吃大荤，禁止在回民中打土豪”等“禁令”；要求部队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特别是要尊重回族同胞的信仰和风俗习惯，例如：不准在回民面前说“猪”字，不准借用回民的炊具、餐具，不准带猪肉进入回民的家等等。部队经过教育训练，斗志更加昂扬。

6月10日，西方野战军根据军委指示，决定右路军主力第15军团（暂缺第78师）继续向西南推进，夺占小台子、萌城、豫旺县城及其以北地区，并以一部分兵力进占同心城。另由第28军同第81师以及骑兵团组成中路军（又称北路军），担任夺取安边、定边、堆子梁等地，在南至薛壕口、小河畔，西至定边、盐池，北至绥远（今内蒙）地界，东与老根据地连接这一广大地区内进行“赤化”工作的任务，并准备消灭敌人的增援部队。为加强中路军实力，军委决定第81师接替第78师围困安边、打击援敌的任务，令第78师暂配属中路军向西发展，待完成夺取定边、盐池的任务后，再回归第15军团建制。

6月16日凌晨，第78师乘敌不备，一举袭占定边城，全歼马鸿逵部守敌；后又乘胜前进，21日3时在骑兵团配合下，攻占盐池，全歼马鸿逵部守敌两个骑兵连和民团共200多人，缴枪200多支，战马200多匹，给反共顽固派马鸿逵以有力的打击。在此期间，红81师再次攻击安边仍未奏效。

安边位于陕北的西部，与宁夏、绥远地区为邻，它北紧靠长城，西近定边，是我西征军与陕北老根据地往来交通的必经之地，地理位置十分重要。但安边城很小，城墙坚固，守敌国民党第86师高双成部约一个团，兵力充足；而红81师只有第242团、第243团两个团（第241团调给红30军），兵力仅千人左右，又缺攻坚火器。而且安边城四周都是沙漠，地域开阔，不能构筑工事。所以，安边虽小，却是一块“硬骨头”，非常难啃。第75师和第81师先后两次攻击均未克。后来，野战军指挥部根据实际情况改令第81师“围城打援”。

6月24日，国民党第86师高双成部驻陕北横山的一个团，奉命向西推进，企图解安边之围，以控制红军这条交通线。横山距安边不过200多公里，按一般行军速度，四五天就可以赶到。但高双成部是一支地方杂牌军，军事素质差；而且当时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魔爪已经伸向华北，危及西北地区的安全，国民党军队中一些稍有爱国心的官兵，对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的反动方针已感不满，对打内战产生厌倦情绪，所以，这个团在途中磨蹭了近二十天，7月13日才到了安边城外。

敌援姗姗来迟，第81师以逸待劳。战前，李志民布置对全师进行充分的政治动员，提出具体的战斗口号。围城部队要：“勇敢坚定，不让敌人突围”；打援部队要：“沉着应战，坚决把敌人打回去”、“坚守阵地，一枪消灭一个敌人”。各党支部、党小组也召开会议，保证发挥模范带头作用，带领群

众完成战斗任务。经过战前动员，全师上下求战情绪十分迫切，均表示要争取战场立功。

当时，安边城四周虽是一片沙漠，无法构筑工事，但从安边城北转向东南方向延伸的古长城，经过千百年的风沙侵蚀，已残破不堪，但其遗迹仍依稀可辨，宛如一条长蛇蜿蜒起伏于沙漠之中，尚勉强可作为红军防御的依托。战斗打响前，第81师领导干部开会研究，大家认为，倘安边守敌突围，与援敌互相配合，第81师将陷入“腹背受敌”的困境。因此，决定部署小部分兵力，配置数挺轻、重机枪封锁安边城门，防止守敌突围，而以大部分兵力占据古长城一线，抗击来援之敌。

高双成部开始发起攻击时，其势汹汹，从东往西进攻，企图一举冲垮第81师防线，与安边守敌会合。他们先以猛烈的火力向红81师阵地射击，继而，被驱赶的士兵嘶叫着“冲啊”、“杀啊”蜂拥着向我红军阵地冲来。第81师占领有利地形，居高临下，敌军在沙漠中的一举一动完全暴露在红军指战员的视线和射界之内。文年生师长平时老成持重，对人和气，很受战士们爱戴；打起仗来非常冷静、沉着，经常亲临第一线，灵活、果断地指挥，表现十分英勇。李宗贵政委是从连队锻炼成长的干部，平时练就一手好枪法，打仗时边指挥边参加战斗，经常拿过警卫员手中的步枪，亲自消灭敌人的指挥官和机枪手等重要目标，很有一股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李志民主任和文师长、李政委、李参谋长等师首长都在阵地上指挥。李主任坚定地站在第一线上同战士并肩守卫阵地，还适时提出一些鼓动口号，激励斗志。表面看来，敌人火力虽猛，喊“杀”声也大，但大多或疲惫厌战，或贪生怕死，“雷声大、雨点小”，前进速度十分缓慢。当他们接近第81师阵地时，红军指战员便以突然而又猛烈的火力还击，他们马上掉头往后跑。就这样，第81师从上午到傍晚，打退了援敌几次进攻，安边城内的敌人也不敢出城。晚上，援敌怕遭到红军偷袭，便悄悄地退回堆子梁去了。

击退援敌之后不几日，李志民接到驻在定边的西方野战军政治部刘晓主任的“速来定边议事”的来电，他毫不迟疑，忙催马赶到定边城。刘晓主任告诉李志民，红军西方野战军攻克定边、盐池后，在这一带宣传抗日救国，政治影响很大。西北民族委员会蒙族工作部高岗部长在绥远地区蒙族首领中开展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工作，已取得成效。现在，蒙族首领派人来联络，要同红军结盟，联合抗日。这是一个很好的机会，今后第81师可能进入绥远地区，开展“赤化”工作，所以特地请李志民到定边，一起商议同蒙族代表结盟的事。

蒙族同胞长年过着游牧生活，使他们的胸怀，犹如那无边的草原博大坦荡、豪放，性格坚强不畏冰雪、不惧风暴。蒙族的结盟同汉族“拜把子”的性质有些类似，一旦结为兄弟，便同甘共苦，真诚相助，生死相依。不过，汉族的“拜把子”一般都是几个情投意合的朋友结拜为异姓兄弟，大多带有个人行为的性质；而蒙族同胞的结盟，不仅是个人的行为，每个人还代表着自己的部落、群体，带有集体结为同盟的性质，因此他们极为看重这种行为，仪式亦相当隆重。这次结盟，红军方面有刘晓、李志民和高岗；蒙族同胞方面有蒙族首领的四名代表。

结盟仪式是按蒙族风俗隆重举行的。首先每个人报出自己的生辰，然后按生辰年月排列，年长者为兄，年幼者为弟。当时一位蒙族同胞年纪最大，尊为大哥；李志民年纪最小，排行老七。仪式开始后，由“小弟”李志民用



铜脸盆端来一盆清水，送到大哥面前，大哥从长袍里掏出一块银元，轻轻地投入盆中，然后在铜盘中洗手。接着，从老二到老六依次洗手，但不再投入银元。最后轮到“小弟”洗完手，又端着铜盆到大门口，把那块银元捞上来，揣进怀里（银元归“小弟”所有），再把洗手的水泼到院墙上。大家都洗完手，表示身心洁净，永结同心。

仪式完毕，摆上酒宴，尽情痛饮同心酒。这酒宴十分丰盛，牛羊肉自然不可或缺，另有海参、鱼翅之类的海产佳肴，海参等高级海味是从马鸿逵部队中缴获的胜利品。李志民第一次尝到海参、鱼翅的滋味，觉得特别鲜美；喝了几口白酒，脸就通红。而蒙族兄弟酒量之大确实惊人，每人一两斤白酒不在话下，边喝边唱，手舞足蹈，似醉非醉，越唱兴致越高，显露出蒙胞豪放不羁的草原牧马人性格。

这次结盟是红军西方野战军统战工作的成果。只可惜不多日，第81师即奉命调往甜水堡待命，李志民未能继续与蒙族同胞联系。此后，更是戎马倥偬，转战南北，失去了联系。1948年9月，他率部进军绥远、解放包头时，曾任包头市军管会主任，在包头驻扎一个月有余，也曾请人打听这几位结盟的蒙族同胞的下落，但因事隔十余年，连他们的名字也记不清了，便亦无从查寻。

### 和平解放李旺堡

1936年7月下旬，红81师奉命将围困安边的任务移交第28军，而后西进至甘肃、宁夏交界的甜水堡休整待命，准备迎接第二、四方面军会师。甜水堡，顾名思义自然是这地方有甜水喽！事实也是如此。在黄土高原地区，许多地方山沟里流出来的水，看起来清澈晶莹，十分喜人，可是一喝，苦涩之极，还带有一股硝磺味，根本不能入口；勉强喝几口，过一会就拉肚子。所以当地老百姓全靠挖水坑在雨季时积存一点雨水、雪水吃用一年，真是滴水贵如油。李志民熟悉这一带的情况，从爱民的观点出发，要求部队驻扎在这些地区，一定不能与群众争水，要派公差到远处的山沟去找积水坑，舀点甜水回来做饭。现在进驻甜水堡，有了甜水，李志民和部队的情绪特别高涨。

李志民一贯重视开展部队的文化体育活动，以活跃部队的情绪。这次进驻甜水堡，客观条件比较好，而且部队正处在休整待命时机，又恰逢建军九周年纪念日即将到来。所以，在李志民提议下，师党委大力支持，各连队经过动员和准备。8月1日，第81师在甜水堡开了一个热热闹闹的庆祝建军九周年体育运动会。这一天，有各连之间的拔河比赛，有跳高、跳远等田径比赛，有武装赛跑、射击、投弹、刺杀等军事体育比赛；还有红军自己创造的“时事、政治问答和识字算术赛跑”，即运动员先跑完100米，再解答几道时事、政治题或写几个生字、做几道算术题，最后再跑100米到达终点，把学习政治、文化与体育活动巧妙地结合起来。运动员们在竞赛场上，如同在战场上一样奋勇争先，虽然场地不好，一些竞赛规则也不那么严格，但大家表现出来的那种虎虎生气，确是一次部队战斗力的检阅。

8月份，第81师在甜水堡边整训边开展群众工作。8月31日，野战军指挥部发出了继续向西发展的命令。9月上旬，第81师从甜水堡出发，向宁夏豫旺堡西南的李旺堡进军。

李旺堡位于清水河西岸，当时清水河正是枯水季节，河水很浅，河滩开

阔；李旺堡的城墙又比较高，驻守在城内的国民党马鸿宾部第35师一个骑兵团，居高临下守住这座小城。红军要攻城就必须通过几百米的河滩开阔地，才能涉水接近城垣。所以第81师的领导干部察看了地形之后，一致认为：李旺堡敌人城坚兵力足，地形有利，而我军处不利地位，且缺少攻坚武器，只宜智取，不宜强攻。

在作战会议上，李志民详细谈了智取的意见。他说：“《孙子兵法》指出：‘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意思是不战而使敌人屈服，才算得上高明中最高明的。所以，我认为智取才是上策。因为马鸿宾虽然听命于蒋介石，反动立场顽固，但大多数回族官兵的民族自尊心较强，倾向于抗日，不愿当亡国奴；而且，在我西征军刚进入宁夏时，马鸿宾部曾在环县、曲子镇一带遭到过我红一方面军的打击，见我红军还心有余悸。加之，他们现在困守孤城，孤立无援，惶恐不安，在这种情况下，正如彭德怀司令员提出的‘一句口号抵10颗子弹’。只要我们遵照中央关于开展敌军工作的指示，积极宣传抗日救国的道理，做好统一战线工作，是可以化敌为友，争取和平解放李旺堡的。”

师党委研究同意李志民的建议。随后，他将第242团政治委员谭冠三、总支书记王学礼，第243团政治委员罗元炘、总支书记李汉生和师宣传科长胡保顺、破坏科长（即敌工科科长）袁林召集到一起，传达了师党委智取李旺堡的决定，要求两个团的领导回去广泛发动群众，积极开展对敌政治攻势。

李志民一向相信群众路线，执行群众路线，“三个臭皮匠，顶个诸葛亮”是他的口头禅。从红军初创时期他当中队党代表时开始，打仗前只要有时间都要召开群众性的“诸葛亮会议”，把战斗任务、困难等问题摆在群众面前，发动大家讨论，动脑筋，提出办法，然后集思广益，提炼出几种切实可行的克服困难的办法。战场上，他提倡开展群众性的战场鼓动工作，在准许讲话的条件下，他提出口号，也号召基层干部、骨干提出鼓动口号，人人开口，三言两语，互相鼓动，从而激励斗志，鼓励士气；在不准许讲话的情况下，也尽可能用耳语、传话或写纸条子进行鼓动，要求不打“哑吧仗”。战后总结庆功，也是强调走群众路线，评功摆好亦谈不足，通过总结胜利的成功经验和失利的教训，提高认识，达到打一仗进一步的目的。所以，这次对李旺堡开展政治攻势，他再一次特别强调干部要发动群众，走群众路线，保证完成任务。

群众发动起来，办法就多了。一时间全师上下齐动手，有的做纸话筒、雕弓箭；有的扎风筝、糊“孔明灯”：有的写标语、印传单，真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一两天时间便做好了政治攻势的准备工作。战士们扎好风筝，把传单捆在风筝尾巴上，然后点上香火，当风筝顺风飞到李旺堡上空时，香火按预计时间烧断了捆传单的细绳子，五颜六色的传单便“天女散花”似地飘落到李旺堡城内。不过，开始放风筝时由于经验不足，计算不准确，香火太短，有的风筝还没有飞到李旺堡上空便中途散落了。第二天，李志民亲自去察看传单飘落的情况，根据风向、地形的不同，指导各连队改进操作，这种“政治炮弹”很快就几乎百发百中了。

更有趣的是放“孔明灯”。相传三国后期诸葛亮在祁山前线病危，临终前唯恐自己死后“帅星”殒落，被魏国大将司马懿发觉，乘机前来进攻，就派人用竹篾扎个直径三尺左右的圆圈，再做个六七尺高封了顶的纸筒子糊在竹圈上，竹圈正中用铁丝捆上一团破布，沾上油，然后点着火，利用油烟的

上升力，使纸灯飞上夜空，就象天空中仍飘着一颗“帅星”一样。这就是传说中的“孔明灯”，民间在中秋之夜燃放“孔明灯”的习俗各地都有。战士们便利用“孔明灯”作为政治攻势的工具，顺风放到李旺堡城内去，马鸿宾部的官兵仰望夜空观赏“孔明灯”，也就能拣到飘撒下来的传单了。

李志民还通过师宣传队带动各连队宣传组，白天深入周围村庄宣传抗日，夜深入静时，则在武装掩护下抵近李旺堡城外的清水河滩，对城内守军喊话：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枪口对外，联合抗日！”

喊一会儿话，又唱几首抗日歌曲。宣传队员刘占荣等都是些十四五岁的“红小鬼”，唱起歌来特别动听。城内守军屏息静听，句句拨动了他们的心弦，引起了强烈的共鸣。有时宣传队还把传单、信件扎在没有箭镞的箭杆上，射上城头。

突然，城堞上传下话来：“狗来了！”接着，就“叭、叭”响几声清脆的枪声，打破了深夜的静寂。宣传队员们知道，国民党特务机关为了加强对非嫡系部队的控制，每个团都要派几个“蓝衣社”特务监视。下层官兵对这帮特务十分痛恨，背地里都叫他们“走狗”。所以，当特务出来巡视时，城堞上的马鸿宾士兵就这样向红军报警。宣传队接到警报后，马上暂停宣传，就地隐蔽，待城堞上又通知：“狗跑了，再唱个吧！”宣传队才又接着宣传，直至拂晓。

第81师宣传队、组接连宣传了几天。开始时，城内的守军只有当兵的悄悄地听宣传、看传单，后来下层军官和营、团长也来听，越听越感到红军讲的话在理，对红军的态度也越来越友好了。

李志民将情况向师党委汇报，大家都认为：是火候了。便由他执笔写了一封致敌骑兵团马团长和全团官兵的“公开信”，并交代破坏科长袁林派人将这封信送出去，再带上几头羊作为礼物。第二天傍晚，袁科长派人牵了几头肥羊，带着“公开信”送到清水河滩上，把拴羊绳压在一块大石头下，再用一块小石头把信压在大石头上，就返回我们的阵地。

李志民写的这封“公开信”大意是：日寇猖獗，生灵涂炭，中国人民正处于亡国灭种的紧急关头。我军奉命西进，宣传发动群众一致抗日，希望马军以“兄弟阋于墙外御其侮”的精神，不要听命于蒋介石打抗日的红军，而应同红军一道联合抗日。同时指出：李旺堡已在我抗日军民的包围之中，要求马军自动退出李旺堡，返回原驻地，我军保证其官兵的人身安全，并将热烈欢送。“公开信”说理透彻，言词真诚、恳切，句句触动敌人的心。果然，不多时李旺堡守军就派人涉水过河滩来牵走了羊，带回了“公开信”，第二天马上派了代表过河同破坏科长袁林谈判，同意撤离李旺堡。

马鸿宾部骑兵团撤走的那日早晨，天空格外晴朗，初升的太阳映照着清水河和宽阔的沙滩，河水波光粼粼，河滩星光闪闪，使清水河两岸更显得宁静、平和。李志民察看了清水河两岸的动静，没有发现异常现象，便派出一部分部队徒手列队在清水河东岸的沙滩上（另大部分部队仍作好应付突然事变的准备），同时，将各团、营、连的号目、司号员全部集中起来，临时组成一支鼓号队，由号长带领，列队在迎送队伍的前面，以壮军威。当李旺堡守军骑兵团大开城门整队出城，沿着河西岸向南撤走时，第81师军乐队立即在河东岸吹起了友好、庄重的礼号，列队的战士们敲锣打鼓、呼口号，表示

热烈的欢送，希望“再见，到抗日前线再见！”骑兵团的官兵见我红军真诚相待，很受感动，走出很远还驻马回头向红军频频挥手告别。

第81师送走马鸿宾的骑兵团后，马上集合队伍踏着整齐、坚定的步伐，吹吹打打开进了李旺堡城。他们奉命驻扎在这里休整待命，并利用这个时机，深入市镇和附近村庄，放手发动群众，扩大红军。9月下旬，塞外已是深秋季节，秋风瑟瑟，气温日降，一天比一天冷，到了应给部队准备越冬被服的时候了。黄土高原虽不产棉花，但盛产羊毛。师领导根据野战军指挥部的指示，就地取材，发动全师指战员捻毛线，织毛衣、毛袜、毛手套。战士们大多是陕北的庄稼汉出身，按旧的传统观念，纺纱捻线是婆娘们干的活，所以，开始动员时都不愿意干；而且拿惯了锄把、枪杆的手，干捻线织毛衣的活也确实有点儿别扭，笨手笨脚的，捻线粗细不匀，织毛衣针法混乱，实在难为这些小伙子了。所以，干起活来摔纺锭、折毛针，骂骂咧咧的现象普遍存在。李志民了解这些情况后，并不严词指责干部、战士，而是召开各种会议反复说服教育，使大家明白捻线织毛衣、毛袜、毛手套，暖暖和和过冬，保证大家身体健康，也是为了抗日，为了革命。大家思想通了，干劲大了。他又积极组织互相观摩，互教互学，还开展革命竞赛，使大家很快地掌握了要领，越干越熟练，越干情绪越高，进度也大大加快了。这时，第81师的同志们得悉红二、四方面军已从西康甘孜北上甘南向宁夏挺进，将要与红一方面军会师的消息，都很高兴，酝酿着用什麼礼物送给兄弟部队。李志民因势利导，启发大家讨论：现在红二、四方面军的战友们最需要什麼？大家在讨论中都设身处地为兄弟部队的战友着想，一致认为，红二、四方面军的战友们长途跋涉，历尽艰辛，现在寒冬将至，一定缺少御寒的衣物，我们大家多打几件毛衣，多织几双手套、毛袜，送给战友们不是最好的礼物吗！大家的意见与野战军政治部的通知精神不谋而合，马上又掀起一股织毛衣、毛袜、毛手套迎战友，为三大主力会师准备见面礼的热潮。

10月9日，红一、四方面军在甘肃会宁会师，不几日，第81师即派人给红四方面军的第4军送去一批毛衣、毛袜、毛手套，表示慰劳。当寒冬刚临，第4军的同志穿上毛衣、毛袜，戴上毛手套御寒时，都从心里感念红一方面军战友的阶级深情。

10月22日，红二方面军到达甘肃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红一方面军会师。至此，我红军三大主力胜利会师于西北，给予全国人民极大的鼓舞，对蒋介石反共的反动方针是个沉重的打击。

### 奇特的阻击战

1936年10月，红军三大主力会师，蒋介石气急败坏，调兵遣将向我陕甘宁根据地进攻，并亲自飞往西安临潼督战，妄图趁红军主力立足未稳之时，一举消灭。

中央军委为打破敌人进攻，巩固陕甘宁根据地，决定集中兵力歼灭敌军中最顽固的蒋介石嫡系胡宗南部第78师。此时，第81师则奉命在李旺堡附近、清水河东岸待命，准备阻击、迟滞东北军的增援，以便主力更好地围歼敌人。

11月22日，兄弟部队胜利攻克山城堡，歼灭敌胡宗南部第78师一个多旅，给了猖狂一时的胡宗南当头一棒，迫使他停止对我红军的进攻。

早在 1936 年 4 月 9 日，周恩来副主席就开始与东北军司令官张学良将军在陕北肤施（即延安）接触、进行联合抗日的秘密会谈。9 月 22 日，毛泽东主席、张学良将军分别代表红军和东北军签署了《抗日救国协定》。但是，这些极秘密的行动当时只有中共中央领导同志和东北军极少数高级将领知道。李志民和第 81 师的首长仅学习过毛泽东、周恩来、朱德、彭德怀等 21 位中央领导同志和红军高级将领公开发布的《红军为愿意同东北军联合抗日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和 1936 年 6 月 20 日中共中央《关于东北军工作的指导原则》等有关文件的精神，明确“争取东北军到抗日战线上来是我们的基本方针”，争取东北军的方法“主要的是依靠我们耐心的说服与解释的政治工作。”

1936 年 12 月初的一天，李志民正领导师直机关干部在学习“红军三大主力会师后的形势”和“争取东北军一致抗日”的有关文件材料，听着干部们热烈讨论、争论的时候，突然接到野战军指挥部的通报：东北军工以哲部第 129 师正从西往东向我李旺堡方向推进，要求第 81 师做好阻击、迟滞东北军前进的行动准备。

第 81 师的领导干部紧急开会研究，分析当前的形势，一致认为：10 月 21 日我红军主力发动山城堡战役，进攻蒋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第 78 师时，东北军按兵不动，现在山城堡已被我攻克一个月了，东北军才姗姗前来，目的可能不在争夺山城堡，而是蒋介石逼迫他们向红军进攻，夺回红军西征以来“赤化”的豫旺堡、环县、庆阳一带地区。

这一仗怎样打？根据党中央的指示精神，主要是打政治仗，在政治上争取东北军联合抗日，不打内战。同时，做好阻击的战斗准备，以防不测，并将战斗情况及时报告指挥部。

当时第 81 师扼守在李旺堡东南十多公里的山地一带。这里的一道道山梁都是南北走向，第 81 师要从西往东边打边撤，山梁便自然地成为他们的一道道屏障，便于设防，不利于攻击。所以，第 81 师接到命令后，一方面由文年生师长、李宗贵政委和李寿轩参谋长组织部队在山头上构筑防御工事，准备阻击，并派人动员群众把粮食坚壁起来，防备粮食被买（或抢）走，这样也给东北军的给养造成一些困难，以免他们弹足粮丰，长驱直进。另一方面，由李志民重点抓政治攻势这场“重头戏”。广大指战员已有了对李旺堡进行政治攻势的经验，一经李主任动员，干劲特别大，有的准备写标语的颜料和写标语，有的抄抗日歌曲，刻印党中央《致东北军全体将士书》等传单。大凡能写上字的地方，不论墙壁、石崖、树干，都写上标语或贴上传单和大大小小的歌纸，使东北军所到之处，举目就可以看到标语，随处都可以拣到、看到传单、歌纸，造成一种动员东北军团结抗日的浓烈气氛。

大约在 12 月 6 日左右，东北军第 129 师的先头部队开始接近第 81 师阵地。文师长立即部署 4 个连的兵力据守 4 个山头，两侧还派出小分队作侦察、警戒；其余连队为后备队，由李志民负责，边待命边制作宣传品，防御正面比较宽。

两军开始接触时，双方都很谨慎。东北军打了一阵枪后，才慢慢地向第 81 师的阵地接近；而第 81 师一般不打枪，待东北军靠近阵地时，才对空放几枪，并大声喊话：

“东北军的弟兄们，不要替蒋介石打内战！”

“中国人不打中国人！”

“枪口对外，打回老家去，把日本鬼子赶出中国，收复东北失地！”

不一会，东北军便退走了。李寿轩参谋长要各团清点一下人数，发现东北军虽然打了不少枪，但大多是朝天放或往地下打，我方无一伤亡。当天傍晚，第81师奉命后撤七八公里。在撤离阵地前，李志民又布置各连在阵地上留下许多标语、传单和歌纸。

当时，李志民派出宣传队到东北军前沿开展政治攻势。夜深人静，万籁俱寂。宣传队员们唱起了《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歌曲，悲壮、哀怨的歌声在东北军的阵地上空回荡……

当东北军官兵听到“爹娘啊，爹娘啊！什么时候，才能够回到我那可爱的家乡？什么时候，才能欢聚在一堂”的歌声时，有的伤心落泪，有的还呜呜咽咽地痛哭起来。

第二天，东北军打的枪少了。他们“冲”到红军阵地前，红军战士又喊话：

“东北军弟兄们！蒋介石出卖了东北，现在又要出卖华北，有良心的中国人能答应吗？”

“东北军弟兄们！你们的父母兄弟、妻子儿女现在在哪里？打回老家去，拯救你们的父母兄弟和妻儿老小吧！”

“东北3000万同胞正处在日寇的铁蹄下，挣扎在水深火热之中，等待我们去拯救。东北军和红军联合起来，打回老家去！”

红军喊的话，言简意赅，字字如惊雷，句句如炸弹，震撼着东北军广大官兵的心！他们不打枪了，都匍匐在阵地前听红军用纸话筒喊话。李志民布置好的几个骨干趁这个短暂静寂的时机对他们说：“我们还有许多话要当面谈一谈，今晚请到我们这边来做客，喝杯酒，‘打打牙祭’好不好？”

“好，晚上见！”他们欣然答应。

这天下午，第81师又后撤了十几公里。因为晚上东北军可能会来联欢，李志民便布置破坏科长袁林、宣传科长胡保顺做好准备工作。他们交代副官（管理员）买来猪肉、黄豆、白酒，把半山坳里一座破庙收拾干净，借了几张条凳，就作为联欢交谈的会场。黄昏以后，东北军四五个士兵果然践约而来。袁林、胡保顺带两个干事和几个做勤务工作的战士同东北军士兵交谈。他们用事实揭露日本帝国主义的侵略野心和蒋介石的卖国罪行；谈到东北3000万同胞在日寇铁蹄的蹂躏下生活悲惨；历数蒋介石一贯排斥异己，把东北军当炮灰，驱使东北军打内战，使东北军和红军互相残杀，他坐山观虎斗，两败俱伤，以收渔人之利的阴谋。劝说东北军弟兄千万不要上当，要联合红军一致抗日，打回老家去！

红军战士晓以大义，东北军士兵深表赞同。有的说：“我们谁也不愿意放着日本人不打而来打红军；只有那些王八羔子，才愿意打内战！”

有的说：“你们不打，我们也不打了，谁打枪，背什么枪挨什么‘枪子儿’（即子弹）。”这是当时东北军中流行的一句最厉害的咒语。

临走时，他们表示明天再邀几个长官也来参加联欢。当时已是农历10月下旬，“大雪”的节令已过，夜晚朔风凛冽，细碎的雪花飘飞。袁科长和副官因为经验不足，炒的猪肉之类的菜肴肥油太多，一冻都成了一块块猪油疙瘩，很不好吃，幸好还炒了点黄豆，勉强可以下酒。李志民听了袁科长的汇报，交代他们好好总结经验，把联欢座谈谈搞得更好一些。

第三天晚上，来第81师联欢的东北军增加到十几个人，其中还有两个连

排长、一个副官。这晚上袁科长接受教训，多炒了一些黄豆，还炒了几盘鸡肉、瘦猪肉，卤了几盘牛羊肉，下酒的菜肴丰盛多了。东北军见红军招待他们这样好，也掏出了几包“三炮台”好香烟作为回敬，双方谈得挺亲热。临别前，他们要求袁科长转告红军首长说：“红军弟兄写标语要求东北军要爱护老百姓，我们不敢随便拿老百姓的柴草烤火，小村庄又住不下多少人，露宿村外实在太冷。明天红军弟兄们转移时，最好能让出一两个大一点的村庄给我们宿营。”

袁科长应承着，并向他们建议说：“今天你们打的枪太少，枪声不很激烈，你们的上司向蒋介石交不了差。”

东北军官兵没料到红军还替他们考虑得这样周到，感激地说：“对，对！我们每个团都设政训处，蒋介石派来的特务都是一些走狗，他们会向蒋介石告密，给我们的上司为难。”

果然，第4天开“仗”，东北军打枪打得特别激烈，连水机关枪（重机枪）也用上去了，“噔噔噔”脆生生地打得挺欢。可仔细观察，重机枪简直成了高射机枪了。从远处听，枪声一阵紧过一阵，好象是一场激战，而且每天都有前进了多少公里的“战果”上报，蒋介石还真以为这里战果辉煌哩！

这天下午，第81师真的如约撤出了十几公里，留下两个大村庄让东北军宿营。当时，李志民又考虑到联欢在村外破庙或破窑洞进行，天气太冷，所以，让袁科长约东北军到红军驻地的村庄来联欢，还邀他们多来一些人。

这一晚，东北军来了20多个人，其中还有个别校级军官。袁科长把他们分散安排在几户老百姓的窑洞里座谈。在老百姓家中兵士们坐在热炕头儿，酒菜也不凉，边喝酒边谈话劲头更大。有的老乡在一旁也插插话，象拉家常似地问东北军官兵多大年纪，家里还有什么人？一谈到家，东北军官兵就伤心落泪，有的还诉说家破人亡、妻离子散的惨景，边诉说边呜咽地哭起来。

有的老乡还向东北军官兵说：“红军是咱老百姓的队伍，专打日本鬼子的，当官的咋叫你们还来打红军呢？”

东北军官兵马上表白：“我们不愿意打红军，我们东北军大部分长官也不愿意打内战，是蒋介石这个老小子下命令硬逼着我们打的……”

这样无拘无束地随便交谈，气氛更加融洽，教育作用更大。因为东北军担任第一线“进攻”的部队每天都有轮换，所以每晚到第81师参加联欢座谈的官兵也都有变化，他们回去后就把联欢的情况广为传播，无形中就把政治工作做到东北军官兵的心窝里去了。这几天，每晚李志民都在师指挥所静候袁科长的请示、汇报，解决急需解决的问题。待座谈结束后，又要与宣传队的同志一起总结交流经验，布置第二天的工作，经常熬到深夜，甚至通宵不眠，真比指挥一场真枪实弹的阻击战更细致，更劳累。这样，第81师同东北军第129师白天“打仗”，夜晚联欢，“激战”五六天，双方无一伤亡，真是一场奇特的阻击战。

12月13日清晨，红81师前沿阵地发现东北军第129师已经全部撤走，阵地上留下许多“红军弟兄们，再见！”“红军弟兄们，抗日前线再见！”的字条。不久，第81师就接到指挥部来电，得悉张学良、杨虎城将军于12日发动了“西安事变”，扣留了内战祸首、卖国贼蒋介石以及40多名国民党军政要员的好消息。全师指战员个个精神振奋，营区内外欢声雷动，比打胜一场歼灭战更加令人欢欣鼓舞，心花怒放。

“西安事变”发生后，国民党内亲日派何应钦在日本帝国主义的支持下，

借口“讨伐叛逆”，调动大批军队，从东、西两个方面向西安推进，企图扩大内战，并乘机夺占蒋介石的统治地位。中共中央为了支援东北军和西北军粉碎何应钦的进攻，争取“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决定红军主力第1、第15军团和第2、第6军团等部队由定边、环县地区南下，拟经长武、咸阳、兴平进到蓝田、商县以南地区，协同东北军、西北军突击敌东路集团军刘峙部左翼，力求歼其大部或一部；以第28军、32军和陕甘宁独立师留在环县附近钳制敌西路集团军的第1军；以第29军、30军在定边、盐池、吴起警戒宁夏之敌；调红81师开往延安地区机动。

12月26日，当我红军主力进到庆阳、正宁地区时，蒋介石已被释放，敌东路集团军由潼关东撤，主力即在原地休整待命。但蒋介石被释放以后，又背信弃义，令东面10个师、西面和北面15个师向西安对进。红军主力奉命进到西安以北的淳北、三原、耀县地区，第15军团进到西安东南的商县，第28军、32军进至崇信、灵台地区。第81师则进驻洛川，准备支援东北军、西北军作战。1937年1月，中共中央、中革军委也从保安迁到了延安。

由于红军和东北军、西北军作了对付蒋介石“讨伐军”进攻的准备，加之全国人民同声谴责蒋介石，反对内战，“西安事变”终于和平解决，从而为国共两党第二次合作、共同抗日创造了一个必要的前提。此时，第81师与关中红1团、陕北红1团合编为第27军，贺晋年任军长，李宗贵任政治委员（后王平继任），李寿轩任参谋长，李志民任政治部主任。将关中红1团编为第1团；原第81师第242团、243团改为第2、第3团，全军3个团，共1125人（陕北红1团分别编入3个团中）。部队整编后即在洛川地区休整待命。不久，周恩来副主席从延安去西安，途经甘泉的劳山遭到土匪袭击。幸亏警卫人员英勇阻击，掩护周副主席迅速撤到附近隐蔽起来才未出意外，张云逸同志来不及隐蔽受了点轻伤，副官陈友才同志不幸牺牲，警卫人员也有些伤亡。土匪一看打劫了军车，未等我附近驻军赶到就慌忙逃走了。事后，第27军即奉命移防宜川县东北的秋林镇，边训练边清剿宜川、延长、甘泉之间的土匪。

宜川、延长、甘泉三县交界的三角地带本是个无人居住的地区。方圆有二三百平方公里，后来解放区的大生产运动就是首先从这一带的南泥湾开始搞起来的。那时，东北军有一股散兵游勇跑到这里当土匪，陕北一个兵站叛变也沦为土匪。这两股土匪与这一带的地痞流氓和无业游民纠集在一起，四出流窜，打家劫舍，拦路抢劫，主要是抢劫来往于延安和西安之间的客商与商车，这样就危及了延安至西安的交通，破坏了社会秩序，因此，中央决心剿灭这两股土匪。

第27军接受任务之后，开会研究分析土匪出没地区的地形地貌以及土匪活动的特点和规律，普遍认为这一带塬峁遍布，沟壑纵横，草莽丛生，人烟稀少，便于土匪活动。阳春之后，草木复苏，更便于土匪出没藏身，必须争取时间及早剿灭。在这样的地形地貌上尽早剿匪，难度确实很大。但是，李志民从政治角度辩证地分析认为，此地的地形地貌虽给我们剿匪带来很大困难，但经过我政治机关初步调查看，这两股土匪还是有分化瓦解的可能。因为这两股土匪中虽是以兵痞流氓为骨干凑合在一起的，但其中不少是为生活所迫、跟着匪首挺而走险的农民，还属于经济土匪之类。他们伏击周副主席的行动，可能是把我们红军的军车误认为商车，想发洋财而盲目行动的，不是有政治目的的预谋行动。所以，还是采取军事打击与政治瓦解相结合的办



法解决好。大家一致同意李志民的意见，当即研究制定了剿匪方案，立即行动。

第 27 军开始采取以军事打击为主、政治攻势力辅的“七分军事、三分政治”的方针，重点在公路两侧设伏，打土匪一个措手不及，重创外出抢劫的土匪，把土匪的猖狂气焰压下去。接着，当土匪受挫、活动减少，逐渐退居老窝藏匿，妄图待机卷土重来的时候，第 27 军又改为以政治攻势为主，军事打击为辅的“七分政治，三分军事”的方针。部队把土匪经常活动的地区包围起来，然后由李志民负责部署展开强有力的政治攻势。当时李志民分析认为，从东北军拉出来的那一股土匪人数较多，作战能力相对较强。而且，他们利用群众迷信、落后的思想，组织“哥老会”来拉拢、蒙骗士兵和当地农民参加土匪队伍，从根本上说仍是一群乌合之众。所以，就以东北军拉出来的那一股土匪为打击重点：一方面发动宣传攻势，宣传红军抗日救国的纲领和“宽待俘虏”的政策，号召东北军投诚起义，一起抗日，打回老家去；另一方面，充分利用土匪之间的矛盾和争斗，做分化瓦解工作，孤立和打击极少数顽固分子。陕北籍的干部、战士中有些同志在参加红军前曾加入过“哥老会”，懂得土匪一些暗语和规矩，李志民就个别摸底，交待任务，通过各种关系打入土匪内部，做土匪的工作。同时，他还组织一些土匪家属对土匪喊话，宣传党的政策，使土匪感到“四面楚歌”，完全孤立。不久，土匪头目之间发生内哄，匪首被杀，有百多人在临镇向我投诚，这一股土匪很快覆灭；另一股土匪也就投诚的投诚，逃跑的逃跑，作鸟兽散。到 7 月初，这一带的土匪基本被肃清，消除了延安至西安一线的隐患，保障了来往车辆和人员的安全。事后，王平政委评价说：“在宜川剿匪中，李志民同志在政治上起了重要作用。”

第 27 军进驻洛川和宜川秋林镇这段时间，为了同驻地周围的国民党东北军搞好统战工作，剿灭土匪，共同维护延安至西安的交通安全，军的领导同志经常走访东北军驻军长官，李志民有时还带着宣传队去慰问东北军官兵，为他们演出，宣传共产党团结抗日的主张，双方关系日益密切。红军与东北军联欢演出，当地老百姓都赶来看热闹，国民党东北军着装整齐，队列动作也挺麻利；而红军穿的棉衣有的破得棉絮都露在外头，而且脸有菜色，感到不那么“精神”。但东北军出不了什么节目，而第 27 军宣传队训练有素，都很活跃，唱歌、跳舞、演活报剧等节目，个个获得满堂彩；参加联欢的连队也是训练有素，唱歌整齐划一，歌声嘹亮，啦啦队拉唱歌，更是把全场的情绪鼓动得火爆！相比之下，样样都比东北军强。所以当地老百姓评论说：“国民党军队中看不中用，共产党军队不中看可中用！”

“团结友军”的政策很有成效。东北军驻军长官也常有回访。有一次，驻宜川县城的东北军派代表来到第 27 军驻地，慰问该军指战员，并向贺晋年军长献旗，锦旗上写着：“献给工农红军第二十七军军长贺公晋年。”当时第 27 军的领导干部都很年轻，贺晋年军长仅 26 岁，王平政委年纪稍长，也只 29 岁，李志民主任和李寿轩参谋长年纪最大，才刚满 30 岁。东北军尊称贺晋年军长为“贺公”，当然是旧军队官场上的客气话，但也使第 27 军这些年轻的“将军们”不知所然，一时传为美谈。

1937 年 6 月，宜川一带的土匪基本消灭后，军委命令第 27 军划归陕甘宁留守兵团指挥，并要求派一个团到洛川担任警戒任务。经军党委研究，分工李志民带一个团回到洛川。此时，许多部队干部奉调经洛川到延安抗日军

政大学学习；许多进步人士和青年学生也纷纷通过洛川奔赴延安工作和学习。他带着部队除担负警戒任务外，就是负责安排这川流不息的人群的食宿，这使他多年来要求学习的夙愿油然而生。有一天，他到延安向留守兵团政治部张际春主任汇报工作。在谈话时，他见张际春主任和蔼可亲，对人诚恳热情，便将自己蕴藏在心底多年的愿望向张主任吐露说：“我参加革命十几年，一直没有机会进学校学习。过去在中央苏区时曾经向彭老总提出过要求，但每一次彭老总部半开玩笑半认真地对我说‘你这个知识分子还进学校干什么？’其实我才高小毕业，虽然当过几年小学教员，但文化程度并不高，也没有系统地学过马列主义，算什么知识分子呢？所以我很想到抗大去学习。”张际春主任很支持他的要求，当天下午便带着他一起会见毛泽东主席。毛主席赞扬了他要求学习的热切心情，当即批准他入抗大第三期学习。此后五年多，李志民一直在抗大总校和第2分校学习、工作和战斗。

## 李克农早期革命活动纪实

双林

李克农（1899～1962）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1899年9月15日生于安徽省巢县。192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28年到上海，在中共中央特科领导下从事秘密工作。1931年冬到中央革命根据地，任中华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国家政治保卫局执行部部长，中国工农红军第一方面军政治保卫局局长、红军工作部部长。长征到陕北后，任中共中央联络局局长。1937年“七七”事变后，先后任八路军驻上海、南京、桂林办事处处长，八路军总部秘书长，中共中央长江局秘书长。1941年起，任中共中央社会部副部长。抗日战争胜利后，任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秘书长。后主持中共中央社会部的工作。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外交部副部长、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情报部部长。1953年起，任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中共中央调查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曾当选为中共第八届中央委员。1962年2月9日在北京病逝。

\* \* \* \* \*

### 自古英雄出少年

李克农（又名曼梓、稼轩、泽田、峡公、震中、钟和等），1899年出生于安徽省巢县（今巢湖市）一个小康家庭，很早便随父母来到芜湖，住在芜湖鸡窝街。他的少年时代，主要是在芜湖度过的。在这里，他结识了后来成为著名文学家、戏剧家和近代文学史家的阿英，并成为终身挚友。据阿英回忆，当他们还是10岁左右的小孩子的时候，就相伴在一个小学里读书。芜湖不仅是著名的文化名城和历代兵家必争之地，在近代也是一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摇篮，素有“梁山水泊”之称。当时李克农和阿英就读的小学，即有许多老师是辛亥革命的前辈，他们经常在课堂上宣传反帝反封建的进步思想。李克农就读的中学——安徽公学，更是一个革命党活动的基地。近代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家赵声、章太炎、苏曼殊、陈独秀、刘师培及安徽籍革命党人卢伯苏、王肖山等都曾在这里教过书。而李克农的伯叔兄弟中，也有几个人同与革命党有联系。早年的教育，环境的熏陶，使他很早便接受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

然而，就李克农个人的才质而论，倘不是时势所逼，他更可能成为一个著名的文学家、艺术家，而不是一个职业革命家。自古江南多才子。李克农少年时代与阿英一样，聪明灵慧，博艺多才，还在读小学时，他就曾写过一篇以鸭场为背景的短篇小说，发表在上海的一个进步刊物上。走上革命道路后，尽管环境恶劣，但其周身的艺术细胞仍不时在躁动，创作欲望勃然而出。在中央苏区，在长征路上，在朝鲜前线，为了活跃战士们的生活，他曾多次亲自动笔编写剧本、亲自导演，有时甚至粉墨登场，上台表演，无论是一举一动，一颦一笑，都演得唯妙唯肖，一次次博得战友们的喝彩。即使在平时，他也经常妙语连珠，逗得战友们开怀大笑。

芜湖不仅很早便弥漫着民主革命思想，而且在新文化运动中也得风气之先。《新青年》、《湘江评论》、《每周评论》等进步书刊广泛流传，受到

广大青年的欢迎，特别是早期共产党人高语罕（后来堕落成为叛徒）、蒋光慈所在的芜湖五中，几成当地新思潮的发源地，被人称之为“北大”。

1919年北京学生的爱国救亡运动爆发后，消息迅速传到芜湖，芜湖各界顿时沸腾起来。5月7日上午，芜湖各校学生冲破重重阻力，到镇守使署请愿，要求支持运动，电请北京政府惩办卖国贼，释放被捕学生，拒绝在巴黎和会上签字。后来，为进一步开展工作，加强团结，以芜湖五中为主，组织了芜湖学生联合会，随后还创办了《芜湖学生会旬刊》，分别刊登评论、译著、著述和国内要闻、本省要闻、本会消息等。

芜湖学生联合会成立后曾领导各校学生响应北京学联发出的号召，举行罢课，并抵制、检查日货，促成了芜湖市产业工人罢工和商人罢市，支援了北京的学生运动，壮大了“五四”运动的声势。

在这场新与旧、爱国与卖国的斗争中，李克农作为安徽公学的一名学生领袖，始终战斗在第一线。他广泛阅读了各种新的报刊、书籍，亲自聆听了陶行知先生的课程，并结识了蒋光赤（即蒋光慈）、恽代英等。他送给好友阿英许多新书，他们经常在一起读书、学习、讨论。正是在新文化运动的濡染下，在如火如荼的斗争中，李克农的思想开始发生根本的变化，用阿英的话来说，“我们的认识都有了很大的变化”，“总之，我们的思想，是愈来愈倾向无产阶级革命了。”

如果说在“五四”运动中，李克农还是一个接受新思潮影响的进步学生，那么，在1925年芜湖教会学校学潮中，他则崭露头角，表现出了非凡的领导才能。

自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西方各国列强除对中国进行经济掠夺和政治控制外，还借助所谓“条约制度”的保护，在华兴办教会学校，对中国人民进行奴化教育，进行文化侵略。据1922年中国基督教之音调查会的报告材料，当时耶稣教在中国所设的教会学校有7000余所，学生20.5万余人；天主教所办学校的学生总数为14.43万余人，两类计约35万人。芜湖在近现代史上是一个教会学校比较集中的地方，仅中等教会学校就有四所，即狮子山圣雅各中学、石桥巷圣雅各初中（又称圣公会学校）、凤凰山萃文中学和福音堂育才中学。在这些学校里，除了设置一些自然科学、文化知识的课程和英语外，都把《圣经》作为必修课，不论教徒或非教徒，每星期日都必须做礼拜，此外每天早晚和三餐前都必须做祷告。刚入学时，学生还觉得新奇，但时间一久，厌恶之心便日益增长起来。特别是每天中午饭前，饥肠辘辘的学生们要等祷告完毕才能吃饭，非常反感。而教会学校的校规又极其森严，除寒暑假外，住校生不许外出，学校同学生家长都有联系，学生思想上稍有进步倾向，立即函告家长，促其管教。校方更不许学生参加社会活动，尤其不许学生参加反帝爱国政治运动，稍有违反，便受到包括体罚在内的各种惩罚，直至开除学籍。当芜湖学生运动如火如荼之时，各教会学校由于校方严密控制，却是空气沉闷，成为芜湖学生运动的“死角”。当然这只是暂时现象，随着形势的变化，各教会学校学生中长期以来积压的对校方的不满和反抗情绪愈来愈强烈。

1925年3月12日，伟大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孙中山先生在北京逝世，消息传出后，举国为之哀悼。中国国民党和中国共产党联合发动各界举行追悼会。教会学校最初毫无声息，学生们强烈要求举行追悼活动，遭到校方的阻挠，后几经斗争、交涉，学校才答应广大同学的要求：以学校为范围举行追

悼会。4月24日，芜湖各界在湖南会馆会场举行追悼孙中山先生大会，各教会学校学生积极参加，会后全体列队游行。为了指导芜湖的追悼活动，中共中央委员恽代英还以国民党上海执行部代表的名义，专程到芜湖来，并发表了长篇演说，痛陈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中国、军阀腐败统治的种种事实，并指出：帝国主义在中国办学不怀好意，教会学校是搞奴化教育，宗教是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这些话，在芜湖各教会学校的学生中引起极大反响。

5月9日是国耻纪念日，芜湖各校学生一律停课一日，以志不忘。当天，以学生为主体，同时有商界参加，四五千举行了声势浩大的游行示威。

芜湖一系列反帝反封建斗争的高潮，促使教会学校的学生们觉醒，一场酝酿已久的收回教育权、反对奴化教育的爱国学潮迅速兴起。

从5月11日起，以石桥巷圣雅各初中学生为先导，一浪高过一浪的学潮在教会学校中掀起。学生们以不参加祷告、罢课、退学、请愿、示威游行等方式进行斗争。

他们的斗争不仅得到了本埠各界的支持，而且得到外埠各界的声援。安徽省学联、安庆圣保罗学校和上海非基督教同盟均派代表赴芜湖，表示声援和慰问，苏州非基督教同盟也来函，对退学学生的转学问题表示关心，共产党员薛卓汉也以安徽非基督教同盟代表的名义，由安庆前来慰问和指导。

5月26日，芜湖教会学校学生求学维持会的代表和圣雅各、萃文两校的学生代表，离开芜湖前往省府安庆，向教育厅请愿，要求解决退学学生的转学问题。赴省代表向教育厅送交了退学学生一览表，其中圣雅各高中退学学生133人，初中退学85人，萃文中学退学学生140多人。经过多方交涉，教育厅终于同意发给转学证书。后来成为中国共产党主要领导人的王稼祥当时是圣雅各中学学生推举的代表，交涉成功后，他曾于5月29日给圣雅各中学全体同学写信，报告胜利的消息，并与同学互相勉励。

圣雅各中学是这次学潮的发源地和大本营，校方当然要处心积虑地进行破坏。5月27日，校方宣布自即日起全校停课，学生们不得离开学校。29日，该校宣布将退学学生除名。学生们既已下定决心斗争到底，再加上各方的声援，因而也就无所畏惧，他们在得知校方将他们除名的消息后，在当时芜湖的主要报刊《工商日报》上刊登一则声明，全文如下：

“芜湖狮子山圣雅各高级中学、石桥巷圣雅各初级中学学生已全体宣誓：永远与圣雅各脱离关系，请各界注意。”

平心而论，这次教会学校学潮，最初是在新思潮和爱国主义思想影响下自发的，但后来之所以能够沿着正确的方向发展，并最终取得胜利，与中国共产党的直接领导紧密相关，其中作为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李克农、宫乔岩和阿英等人，在当时起了重要的作用。当然，由于特殊的环境和斗争，决定了他们主要是在幕后指挥，在前台负责直接领导的是各教会学校的进步学生王稼祥等。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芜湖“二五”学潮刚刚取得初步胜利，“五卅”惨案的消息又震动了芜湖。

在安徽，各界爱国人士在6月4日率先组织了“安徽国民外交后援会”，举行各种活动，声援沪案交涉。稍后，又成立“五卅惨案安徽后援会”，发表函电，声讨奉系军阀封闭上海爱国团体的逆行，组织募捐，以实际行动支援上海人民的反帝斗争。

在芜湖，当安庆的“安徽国民外交后援会”成立不久，“芜湖国民外交

后援会”也宣告成立。该后援会是“五卅”运动期间芜湖成立的一个有广泛基础的反帝爱国组织，其下设会计、执行、庶务、编辑等组，李克农、阿英、宫乔岩等均为该组织的主要负责人。以后，芜湖也曾成立“芜湖‘五卅’惨案后援会”，李克农、阿英、宫乔岩等亦均为主要负责人。

“二五”学潮取得了初步胜利，声援“五卅”惨案的运动也搞得轰轰烈烈。但随着新学期的到来，一个非常现实的问题摆到了李克农等人的面前，即从教会学校退学的广大爱国学生如何复学？

前面提到过，早在5月26日，芜湖教会学校学生代表曾前往省府安庆向教育厅请愿，要求解决退学学生的转学问题。这一倡议虽然得到了原二农学校教师、当时在省教育厅任职的沈子修先生的赞助，在不长的时间内便为退学的学生颁发了转学证书，证明其过去的学历，但并未解决实质性问题。当时芜湖仅有省立五中一所，农、工专科学校各一所。省立五中在“五四”运动前后非常活跃，但此时掌权的是国家主义派，凡持证书前往应考者，无一录取。因此，失学青年急待就读，成为当时芜湖教育界的一大难题。

在这艰难的时刻，李克农、宫乔岩和阿英等人，受中国共产党、中国社会主义青年团芜湖地方组织和当地教育界的重托，在赭山之麓、大观山之颠，面临滚滚东去的长江，选定了一所校舍，毅然创办起一座崭新的中等学校——民生中学。民生中学的校名，显然取自孙中山先生“民生主义”之“民生”二字，具有意义深远的办学目的。从此，在大观山上飘扬起一面红底白字的民生中学校旗。

当时芜湖有四所教会中学，在“二五”学潮中退学的学生多达400余人，而民生中学的规模有限，仅能招收120名学生，计初中一、二、三年级各40名，无法满足广大退学青年的需求。因此，在民生中学创办的同时，由芜湖教育界胡法川、余小军等在距芜湖约五六里的鲁港镇创办了另一所中学——新民中学，共收学生240名，计高中一、二、三年级和初中一、二、三年级各40名。在“二五”学潮中摆脱了奴化教育的退学学生，绝大部分进入了这两所学校。同时也有些学生考入了外地学校，如王稼祥考入上海大学附中，另一些人考入了南京大学附中。继续留在教会学校的人数极少，教会学校教育陷入了困境。

民生中学的创办经费除很少一部分是由“安徽‘五卅’惨案后援会”拨发和爱国人士捐募外，大部分靠李克农、宫乔岩、阿英等人筹集和亲戚朋友的支持。虽然经费问题始终是民生中学的一个极为棘手的问题，但经过李克农等人的艰苦努力，仍维持了好几年。更为可贵的是，民生中学从它诞生的那一天起，就以崭新的面貌出现在芜湖地区，受到广大爱国青年学生的拥护和支持。学校首任校长是宫乔岩（兼训育主任），二任校长是李克农（兼事务主任），三任校长是王伟侠（兼教务主任）。李克农始终担负着学校实际工作的艰巨任务。

当时民生中学周围有广大的农村，附近建有裕中纱厂，临近江岸有产业工人和码头工人。因此学生们面向着广大的工农群众。此时的李克农等人，虽然在组织上尚未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因受过“五四”新文化的洗礼，加之周围共产党员、社会主义青年团员的言传身教，现实的政治斗争已使他们认识到工农的力量，因此，他们经常组织学生到民间去，为工农群众举办夜校，帮助他们识字、学文化，讲形势，讲爱国革命的道理，每逢假期或节日，还公演话剧或活报剧。凡此时，不乏艺术细胞的李克农便按捺不住本能的创作

欲望，经常亲自导演。据当时民生中学的学生甘野陶（当时名甘天沐，为学生领袖之一，解放后曾任驻马达加斯加大使）回忆，当时他们在李克农的导演下曾演过《李克用卖国》、《春闺梦里人》等剧目。

在李克农等人的组织、教育和督促下，民生中学很快便形成了它独特的校风，全校上下，团结友爱，艰苦朴素，实事求是。学生们均能自觉遵守学校的纪律，把学习和劳动、理论和实践结合起来。李克农为了加强学生们的体育锻炼和军事教育，专门请来一位行伍出身的王振武担任体育教师，从班排教练、劈刺、投掷手榴弹等基本动作做起。全校分为三个大队，学生们身着灰色制服，整齐划一，精神抖擞，显得格外英武。

1926年秋，北伐军攻克武汉，11月，国民政府正式迁都武汉。在此之前，阿英在反帝反封建的伟大斗争中，接触认识了许多共产党员，政治上受到很大影响。伟大的共产主义理想有力地吸引着他，他满怀热情地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此时，他受上海党组织派遣，秘密潜回芜湖，组织发动武装起义，以迎接北伐军。阿英回到芜湖后，首先在民生中学潜伏下来。1926年冬，由杨士彬、余昌炯（准）介绍，李克农光荣地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民生中学成为中国共产党芜湖地区党组织的一个重要据点，为中国革命培养了大批人才。

在党组织的领导下，阿英和李克农等人迅速行动起来，他们在戴述清的客栈里找到一间空房，悄悄地准备着起义军的旗帜、宣传品等，只是由于北伐军进军神速，驻守安徽省的孙传芳的军官们纷纷在前线倒戈，使北伐军中路军兵不血刃便占领了安庆、芜湖。

1927年春，以程潜为军长、林伯渠为政治部主任的国民革命军第六军到达芜湖，革命形势迅速发展。李克农和阿英等人在党组织的领导下，召开了全市群众大会，宣布成立芜湖市、县国民党党部。同时，工、农、青、妇、学等群众团体相继建立。当时实行国共合作，许多共产党员受党组织的派遣，加入国民党，参加国民党政权的建设工作。阿英和李克农当时均在国民党芜湖县党部任职，其中李克农任县党部委员，兼农民部长；阿英任县党部主任委员，兼工人部长。同时，芜湖市学联的领导职务绝大多数也由民生中学同学出任，会址设在因畏惧革命而远逃外地的大土豪孙泽的住宅内。学联的领导曾在此召开全市各校学生代表大会，并与国民党右派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在这段日子里，李克农心情极为舒畅，工作积极认真，他不仅领导农民协会组织了斗争土豪劣绅丁世凯的行动，而且团结各方面力量，特别是以民生中学为基础，广泛团结全市进步学生，把芜湖的各项革命活动搞得轰轰烈烈。

## 下关脱险

当北伐军于1926年迅速推进到长江流域时，帝国主义在中国的代理人吴佩孚、孙传芳等反动军阀纷纷溃败，上海、湖南、江西、安徽等地的工农运动不断高涨，所有这些，极大地动摇了帝国主义在中国的统治基础。在这种情况下，英、美帝国主义不惜亲自出面，干涉中国革命。1926年秋，当北伐军进抵武昌时，英帝国主义不仅帮助吴佩孚直接炮击北伐军，还派军舰驶入广州省河，占领省港码头，收缴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的枪支。继而又先后制造了“万县惨案”和“南京惨案”。

曾经以左派面目出现欺骗世人的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对帝国主义干涉

中国革命的罪恶行动，不仅不敢进行反击，反而和帝国主义、封建军阀勾结，加速进行反共反工农革命的罪恶活动，逐渐暴露了其反革命的真面目。从1927年初起，蒋介石仅在江西就制造了赣州、吉安、抚州、上饶、都昌、永修、丰城、永新等惨案及南浔事件。3月20日，蒋介石到达安庆后，即收买青红帮流氓打手，捣毁了国民党安庆市党部和总工会，并打伤6人，制造了“安庆惨案”。之后，蒋介石又扣留了武汉中央关于组织安徽省政务委员会的命令，自行委任了28名安徽省政务委员会委员，其中大部分是军阀、安福系、西山会议派余孽及流氓恶棍头目。

芜湖和安庆近在咫尺，“安庆惨案”更使芜湖地区的国民党右派、土豪劣绅和地痞流氓得意忘形。当时芜湖有一个青帮头子叫马玉伯，是蒋介石收买的主要地方势力之一。此辈自恃后台牢稳，势力强大，经常惹事生非，制造事端。当时由于蒋介石的军事力量尚未到达芜湖，政权还控制在中国共产党和国民党左派手中，因此，马玉伯虽然猖狂，却也不得有所顾忌，他仍在动摇观望。为了掌握这支力量，并随时观察马玉伯的动向，经过党组织研究，决定派与马玉伯有间接关系的李克农及其好友阿英打入敌人内部。

江南的三月，虽然春天已悄然而至，但晚上仍是“乍暖还寒”。一日夜，李克农和阿英来到马玉伯家，因李克农与马家原来就有联系，且已经中间人事先谈清，所以略加寒暄后便转入正题。根据马玉伯的“指导”，李克农和阿英分别在马家供奉的“先生”灵前，烧纸行礼，表示报帖入门，马玉伯则在一旁代表“先生”答礼。待所有应行礼事完毕，马玉伯才请李克农和阿英坐下来斟酒畅谈，以示祝贺。直至深夜，李克农和阿英才离开马家。

李克农和阿英双双打入芜湖地区青帮之内，两人情同手足，互相合作，经过一段时间的工作，局面稍有打开。就在此时，形势又陡然发生变化，4月18日，芜湖发生“反革命政变”，许多共产党员和工农积极分子遭到逮捕。由于单志伊事先派人通风报信，李克农和阿英才在敌人来逮捕前半小时逃离虎口。

单志伊，安徽滁县人，1904~1914年留学日本。在东瀛求学期间他结识了当时正在日本为革命奔走的孙中山先生，并曾当过孙中山先生的秘书兼日文翻译。回国后，他先在安庆兴办造纸厂和肥皂厂，企图借实业救国，以后又移居芜湖。1927年初，芜湖市警察局长喻为樵聘请单志伊为警察局顾问。由于单志伊多年在外奔波，见多识广，且为人谦和，所以喻为樵无事时便经常到单家来抽烟、聊天，两人相处甚好。“四·一八”事变发生前的一天晚上，喻为樵又到单家，进门之后二话没说，便拿出一封信给单志伊看，说蒋介石有手谕，要捉芜湖大观山民生中学的几名师生。单志伊接过这信一看，不免大惊失色。原来要捉的人中有他的老管家李培友的亲戚李克农，此外还有阿英等人。是单志伊看着李克农一点点长大，深知李克农的为人，而且他自己也是民生中学的校董，二女婿马景长还是该校校长，与李克农、阿英和宫乔岩等人相交甚深。他深知，如果没有李克农等人，也就不会有民生中学的今天，这层关系，喻为樵固然不知道。他略一稳定情绪心想，对李克农等人，无论从哪个角度想，都必须设法救助。但怎样才能稳住喻为樵呢！正在这时，喻为樵指着手谕对单志伊说：

“你是顾问，特地告诉你，你说怎么办？”

单志伊略一思考，便斩钉截铁地说：“抓，执行上面的命令。”

先稳住喻为樵，然后单志伊佯作去拿水果，在这瞬间他偷偷叫夫人汪九



芝立即通知两个人：一是李培友，让他马上到民生中学去告诉李克农等，立即转移到芜湖江对岸的裕溪口去；另一个人是自己的保镖邢志远，要他马上拿钱送往裕溪口交给李克农等，以供途中之用。李克农和阿英等因此才得以逃脱魔掌，单志伊却因此而丢掉了警察局顾问的差使。

后来单志伊全家迁居上海，当时李克农、宫乔岩等均在上海从事党的地下工作。每当他们急需活动经费时，单志伊无不解囊相助，最后直至将住所的家具和西服变卖，来贴补革命的需要。

1937年，李克农任八路军驻上海办事处处长时，单志伊曾应李克农的要求，将家从原住址搬至福熙路多福里21号（今延安中路504弄），与李克农一家合住在办事处的楼上，支持革命工作。两个月后，他又根据李克农的指示，将家搬至贝勒路（今黄陂南路）148号。这是一座单间三层临街小楼，底层由单志伊的儿子单惠民开设诊所作掩护，二楼家居，三楼由李克农安排设立了秘密电台，报务员李白（即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中的主人公李侠的原型）。当李白初次来到单家时，单惠民对家里人说：“他（即李白）是我们的远亲，来上海补习无线电，晚上要读书，你们不要去影响他。”李白把收发报机装在两只皮箱内，白天放在二楼，和单家的皮箱混在一起，晚上11点后再拎上三楼，紧闭门窗，挂上双层深色窗帘，换上五瓦灯泡，灯泡周围再蒙一块黑布。机器打开后，再在电键头上插入一张薄纸片，以减小“嘀嘀嗒嗒”的发报声。就这样，单家冒着生命危险，掩护李白在靠近霞飞路闹市地段的法租界嵩山巡捕房附近，设立了李白到上海后的第一部电台。后来因情况有变，李克农才指挥李白另迁别处。

李克农等人自1927年4月18日得到单志伊的通风报信后，离开民生中学，来到芜湖对江的裕溪口。他们仅在此呆了两天，便被迫再次逃离。4月20日夜，当他们正在裕溪口的一个村庄里聊天时，突然李克农的妻子赵瑛来了，她一身泥污，满脸惊慌。一问，原来李克农等人开会的地方已经被敌人的暗探侦知，并派出火轮船前来抓捕他们。李克农的妻子得知这个消息后，顾不得重病在身和连续下了一个星期的雨，凭着对丈夫的一片忠心和对革命事业负责的精神，硬是只身一人冒雨划小船横渡长江，上岸后又走了七八里没膝的烂泥埂，摔倒了，爬起来，再摔倒，再爬起来，虽然累得上气不接下气，弄得满身满脸都是污泥，但她终于抢在敌人抓捕之前见到了李克农。

得到这一重要情报后，李克农和阿英等人经过短暂的讨论，便换上草鞋，把不太重要的文件烧掉，匆匆跳上系在屋后小湖旁的小船，再次逃亡。因是深夜，无法远行，他们决定先转移到离裕溪口五里的吴庄。吴庄位于圩中心，是一个非常秘密的地方。他们除了各人一床行李、一个箱子和几件极重要的公文外，别的东西都未带。

乡村的夜晚甚是静寂，此时雨已停住，明月在乌云中微微露出光芒。李克农一行8人，沿湖划行了大约一个小时，来到吴庄。

吴庄四面环水，庄上遍植垂柳，高愈数丈。明月的光辉透过丛树，沐浴着庄里的茅屋，景色亦十分动人。从来居住在城市的他们，骤入此景，虽在逃亡之中，也不免心醉。

上岸后，他们来到一吴姓人家，受到了主人的热情欢迎和殷勤款待，洗脚、吃饭、休息。因没有床，他们在地上铺了许多稻草，以地当床；被子不够，于是大家一律头向外躺成一个圆圈，将被子盖在中间。躺下来后，大家并未入睡，而是商议今后的计划。由于手头拮据，一时不可能到湖北去投奔

武汉国民革命政府，遂决定先到李克农的老家——巢县夏阁，他的叔父还住在那里——然后着手回乡取款，待经费筹足，形势略明后再决定行止。此外，他们还商定途中均改用假名，并确定了几个人的相互关系，然后才渐渐入睡。

次日凌晨4时，他们又上了吴家的小船，离开吴庄，前往巢县。途中经过雍家镇、运槽，于深夜10时到达巢县。当时，巢县的政治形势还没有发生变化，执掌政权的还是李克农等人的朋友、共产党员万辛斋等人。22日，李克农和阿英相伴进城，找到万辛斋，向他通报了最近政治形势的变化，要他提防小心。万要求李克农和阿英进城工作。两人考虑到已被芜湖国民党当局通缉，抛头露面，难免会出问题，为不致影响巢县的革命工作，他们婉言谢绝了。但他们在县署预制了几张通行证，并带了几张空白的以备急用。

离城之后，他们来到了李克农叔父家。这里离夏阁镇约三里，在岱峰脚下，三面环山，狮子山当前，黄山在后，岱峰居左，右为巢湖，景物秀丽，虽在江北，却颇有江南风味。晚饭前他们在林间举行一次会议，详细总结了过去的错误和失败的原因，并商定了今后的办法。

他们的住地风景极佳，李克农的叔父和婶娘也照顾得极为周到，但他们住下不久，便觉消息不灵，无法了解外界的形势变化。为解决这一问题，他们秘密派两位同志回到巢县城中，一个在县署任书记，一个当门房，为了避免不必要的损失，这一切都没有告诉在巢县的其他同志。

4月26日，李克农的父亲曾专程从芜湖回老家一越，看望这几位流亡青年，他不仅给李克农他们带来了温暖和关怀，还带来一笔钱，从而解决了经济紧张的问题。由于他有自己的工作，也为避免引起别人的怀疑，在巢县只住了一宿便匆匆返回芜湖。

这一段时间里，由于革命遭受了挫折，政治形势日益恶化，这些流亡者虽然一致决心向前干，但如何干，一时谁也拿不定主意，因此大家陷入极度苦闷之中。特别是李克农，因是回到了自己的老家，顾忌较少，他常常借酒浇愁，喝得酩酊大醉，尔后便独卧风中，时而牢骚满腹，时而嚎啕大哭。阿英等人虽系客居，顾忌较多，但内心也极为苦闷。他们经常到山间林内游览观光，秀美的景色偶尔会给他们带来片刻欢娱，可每一想到革命的前途，个人的生死，不禁茫然。

4月30日，他们在林间召开第二次会议，决定将全部人员分成两组西上，投奔武汉革命。尽管他们在逃亡之中，仍没有忘记“五一”国际劳动节这个伟大的日子。这天上午10时，他们特地在林中召开“五一”国际劳动节纪念会。下午，李克农和阿英等三人乘着毛驴前往巢县县城探听情况。此时，巢县县城已经发生了变化，万辛斋等人已经逃走，一片白色恐怖。在这里，他们不仅了解到巢县城和芜湖的一些情况，还从报纸上看到李大钊在北京就义的消息，这对他们来说无疑是雪上加霜。5月5日，他们返回李克农叔父家后，再一次召开会议，决定将全部人员分为两组，一组由阿英率领，经巢县往湖北投奔武汉革命政府，另一组由李克农率领随后跟进。

阿英等人经过长途跋涉，5月20日抵达汉口。谁知，此时武汉的形势已经非常紧张。不久，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在“宁可错杀一千，不可漏掉一个”的口号声中，无数共产党人和工农群众倒在血泊之中。鉴于此种情况，阿英等人被迫返回芜湖。李克农所率领的第二组人员，因无第一组的消息，便未贸然行动，始终在巢县坚持。在阿英等回到芜湖之前，他们也秘密潜回芜湖。此次分离，时间虽然不长，但置身于白色恐怖之

中，不免有隔日如年之感，所以二人相见，备感亲切。此时芜湖的政治形势仍然十分恶劣，遭国民党当局通缉的阿英和李克农，无法长期呆下去。于是阿英决定前往上海，李克农则流亡南京。

1928年初，李克农到了南京。刚到这里他就发现，不仅芜湖国民党当局通缉他，连南京也到处贴着缉拿他的布告。他被困在了下关。怎么办？不能在此束手就擒。于是，他略加化装，身着长袍，大胆走出了下关。此时乌云蔽日，寒气逼人，李克农原以为这样的天气会安全一些。不料他刚出下关，就被巡逻的国民党兵盯上。李克农见势不妙，拔腿便跑，一伙巡逻兵见状，也立即四面拥来，鸣枪追捕。李克农穿街过巷，试图将敌人甩开，可惜因初来乍到，人地两生，所以始终被后面的追兵紧紧“咬”着。当他刚要停步横穿马路时，正巧撞在一个黄包车夫身上。李克农抬眼一看，使他一惊，一个念头迅即从脑子中闪过：“这下没处可跑了。”车上坐着个国民党军官，正在闭目养神，突然间车身猛一抖动，睁眼一看，原来是一个身着长袍的青年慌忙中撞了车夫。他正想发作，可再一打量，不禁一怔，惊叫：“曼梓（李克农的别名），是你？”在这一瞬间，李克农也认出了车上的那位军官，他朝后努努嘴。那位上校军官顿时明白了一切，连忙把李克农拉上黄包车，命令车夫快跑。后面的七八个追兵，方才还见被追捕者在前面奔跑，转眼之间却不见了踪影，个个面面相觑，不知所措。

那上校军官是谁？正是李克农在民生中学时的同事和下级，李克农为民生中学聘请的体育教师王振武。

王振武，安徽省霍丘县人，出身行武，曾在国民党的党、政、军、财界干过事，还参加过国民党、三番子、理教等。他平素重友情，讲义气，在革命战争时期曾掩护过许多共产党干部，还积极为共产党筹措过经费。解放战争中，他曾策动国民党霍丘县县大队起义，为和平解放霍丘立下了功勋。解放后他作为爱国民主人士在霍丘县人民政府中任职，并被推荐为省政协委员。要说王振武和李克农两人的友谊，还得追溯到1925年。当时王振武为谋事来到安徽省城安庆，适逢李克农和他的一位朋友也在安庆，同住一家旅馆。碰巧一日，李克农的那位朋友不慎把票夹丢失，内有委任状及200元银票，而这个票夹又恰被王振武拾到。视交友胜于金钱的王振武，便写了一纸招领启事，使得物归原主。失主为表示谢忱，要以失而复得的200元银票相赠，被王振武谢绝。为感激王振武的豪爽，失主设宴招待，席间李克农作陪，二人因此相识。

1925年秋，为解决“二五”学潮中退学的学生就学问题，李克农等人创办了民生中学，由宫乔岩担任校长，李克农和阿英作为筹办人，也在学校担任教学管理工作。不久，王振武因在安庆谋不到事，便亦来到芜湖，经李克农等介绍，被聘为民生中学的体育教师。虽然民生中学初创之时，李克农等人还不是中国共产党党员，但他们周围有许多共产党员朋友，受其影响，他们将民生中学办得有声有色。后来，李克农、宫乔岩、齐坚如、莫英等在民生中学相继加入中国共产党，民生中学实际成为芜湖共产党组织的地下机关。为了扩大党的影响，掩护党员的活动，中共芜湖党组织还在民生中学设立了一个党的外围组织——济难会（后改为互济会）。这个组织在反抗封建军阀的黑暗统治、迎接北伐军、为共产党筹集活动经费、营救被捕共产党员和为革命烈士拍照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工作。受李克农等人的影响，作为非共产党的爱国人士，王振武积极参加了这个组织的活动。他还亲自带领十多

名学生直接参加了反军阀的斗争。后来李克农继任校长，王振武又成为他的下属。李克农充分发挥了王振武的军事才能，为民生中学开设了军事训练课程，不仅使学生的精神面貌大为改观，也为党培养了许多有用人材。后来民生中学的许多学生投身革命，并为革命贡献出了自己的生命。1927年“四·一八”政变后，李克农等人受反动派通缉，被迫逃离芜湖，前往巢县。不久，王振武也离开学校，再次从戎。此时他已是国民革命军暂编第6军的政治部主任，此次因公事来南京，没料到在下关遇到了正遭追捕的李克农。

黄包车急行半个小时后来到国民革命军暂编第6军驻南京办事处，王振武和李克农跳下车，大模大样地走进办事处大门，门口两名卫兵毕恭毕敬地持枪敬礼。王振武还礼后，小声对李克农说：“半小时前，拿枪的大兵还在追捕你，现在，拿枪的大兵却给你敬礼，真是太滑稽了。”

李克农看了看王振武，什么也没有说，两人只是会心地一笑。

王振武的卧室宽敞干净，明亮舒适。他们脱去上衣，此时卫兵已端来沏好的热茶，他们品茶抽烟，相互倾诉离别之情。

“振武，你是怎么当上军官的？”李克农惊奇地问。

“自离开芜湖后，我就担任皖军先遣队的中校参谋。后来，国民革命军暂编第六军成立，石室生军长聘我任政治部主任。这次是来南京办事的。”王振武说罢，转问李克农：

“曼梓，他们怎么追捕你？”

“你知道，我在芜湖搞地下活动，后被发觉，遭国民党芜湖当局通缉，芜湖呆不下去，这才到了南京。谁知到处都有抓我的通缉令，困在下关难以出行。今天刚出去，就被巡逻兵发觉，幸亏遇见你！”李克农回答道。

听着李克农的叙述，王振武低头沉思。照他的秉性，即使李克农不说，他也会帮助李克农的，但怎么帮呢？沉思良久，他忽然心中一亮，高兴地说：“这样吧，我任命你为政治部中校秘书。”

不等李克农回答，王振武便喊勤务兵找来一套军服，把他武装起来。看到李克农穿上军服后更显威武英俊，王振武高兴地拍了拍李克农的肩膀说：“这回你就放心吧，不仅出入自由，那些追捕你的王八蛋见到你，还得给你敬礼哩！哈哈……”

接着，王振武又说：“以后的事再商量，过几天一起跟我回霍丘，暂时避避风头再说。”

李克农深知王振武的为人。他这次来南京，一来是想躲避国民党的通缉，二来想找南京地下党组织，参加党的工作，眼前的状况显然不允许他这样，也只有按照王振武所说的去办了。

1928年1月23日，农历正月初一，王振武和李克农在南京搭上北去的火车，经过三天的行程，他们来到了霍丘县城。

此时，王振武除在国民革命军暂编第6军任政治部主任外，还同时担任了国民党霍丘县党部筹委、霍丘县清查委员会主任委员。

一天，县党部和县清党委员会在县城南关天主堂召开群众大会。王振武一身多任，官阶不低，又刚从“首都”南京回来，所以大会主席特别邀请他在大会上发表演讲。他跳上讲台，仰首挺胸，挥动右臂，阵阵有词，扬言：“我们要坚决肃清共产党。谁要是窝藏共产党，那我是一定要严办的……”

王振武一讲便是半个多小时，直把那些军阀官僚们讲得口服心服，点头称是。但他们不知道，王振武从南京带李克农来到霍丘后，为了安全起见，

把他安排在自己家中吃饭。王家就住在县党部后面。就这样，李克农在王振武的掩护下，在霍丘安全度过了三个多月。

但是，时间一久，问题出来了。有一次，县党部的头头对王振武说：“你怎么把红头子（指李克农）带来了？”王振武先是一愣，接着便明白了是怎么回事。他拍着胸脯打保票，担保李克农不是共产党。又有一次，县党部里有一个特务行动大队长跑来对王振武说：“你的朋友是那个点（指共产党）。”王振武闻声把脸色一变、把桌子一拍说：“混蛋！我的朋友难道我不了解吗？你把证据拿出来。”直把这个特务头子骂得灰溜溜地走开。可回到家里，他不禁埋怨李克农：

“曼梓，你怎么又开始活动了？”“这是我的职业嘛！”李克农笑笑说。

无论王振武在外面如何保证，李克农是共产党这一情况已经暴露了。很明显，再在这里呆下去恐怕将会发生不测。怎么办呢？王振武为此事思忖了许久，最后终于下了决心。有一天，他对李克农说：“你得离开霍丘！”“怎么走？”李克农问。“我送你。”王振武斩钉截铁地回答。

为了掩人耳目，王振武早早在县党部里放出空气，说要带家属外出游玩。一切准备就绪后，在一个晴朗的早晨，两乘簇新的小轿从王家抬出来，向霍丘县东城门走去。小轿刚要出东城门，突然被守门的卫兵拦住，说要检查。轿夫正要停下，王振武把轿帘一掀，厉声喝道：“混蛋！连我都不认得了！”

在小小的霍丘县城，谁人不认得王上校、王主任？那卫兵闻声只得连连赔礼道歉，赶忙让路。出了城门后，王振武想，现在正值动荡时期，国民党当局为了搜捕共产党，仅在霍丘县境内就布置有许多道岗哨，所以出了县城门并不算完事，弄不好在别的地方会出事。想到这里，他灵机一动，干脆把轿帘掀开，故意在轿中摆出一副趾高气扬、不可一世的架子，竟然闯过了一道道哨卡，顺利地出了霍丘县境。尔后他们出正阳，抵蚌埠，然后再换乘火车，安全到达上海。在上海，他通过关系将李克农交给阿英所在的春野书店地下党联络点后，才长长舒了口气，一颗悬着的心落了地。

就在王振武和李克农离开霍丘不久，当地的反动分子便发觉李克农确实是共产党，在报告上司并经批准后，即派兵到王振武家中搜查。精明的李克农，岂能给反动派留下半点痕迹。所以尽管他们翻箱倒柜，掏墙掘地，折腾了半日，终无所获。拿不到任何证据，他们对王振武也无可奈何，但王振武在国民党内和军队内的所有官职皆被一抹干净。当王振武从上海回来后，才发现自己已经被降为一介平民。后来经多方奔走，朋友相助，最后他才弄到一个垦务局长的职位。事后，王振武对朋友说：“我毕生视功名富贵如浮云，而视友情如泰山。”

对王振武的舍死相救，李克农终生未忘。安徽刚刚解放，李克农便给霍丘县人民政府写信，证明王振武曾经营救过自己。他还不断给王家汇寄钱物，并将他本人和全家的合影赠给王振武。1957年秋，已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的李克农在合肥视察工作期间，一个偶然的的机会遇到了正在合肥参加安徽省政协会议的王振武。当时，安徽省委为欢迎李克农到合肥视察举行宴会，在这次宴会上，李克农特意将王振武先生请到上席，并向在座诸人介绍了王振武当年救助他的经过。在合肥的日子里，他经常将王振武接到寓所，畅叙旧日情谊。随后，他还利用工作间隙陪王振武一起到杭州西湖等地游览。临别时，李克农诚挚地邀请王老到北京他家作客，王老当然是一口答应下来。但是，由于种种原因，王振武始终未能成行。直到1960年10月，他在弥留

之际，还对家人说：“我最大的憾事，就是未能去北京看望李克农。”

### 把敌特组织“拿过来”

1928年3月，李克农在王振武的护送下来到上海后，很快便和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了联系。在此之前，阿英已由安庆来到上海，并与其皖籍同乡、中国现代著名文学家、政治抒情诗人蒋光慈取得联系。

1928年初，在党的领导和具体安排下，蒋光慈和阿英、孟起、沈端先（即夏衍）、社国庠、刘一梦、冯宪章等共同组织太阳社，创办《太阳月刊》，宣传“革命文学”。1930年“左联”成立后，太阳社的成员集体加入“左联”。

太阳社的同仁们除办杂志外，还创办了春野书店，名义上是书店，实际是上海地下党组织的一个秘密机关。因太阳社的同仁均是共产党员，上海地下党组织即以太阳社为名，专门成立一个党支部，又因该支部主要在春野书店过组织生活，所以又叫春野支部，由瞿秋白直接领导。李克农到上海后，就是通过春野书店与上海地下党组织取得联系的。

李克农因初来乍到，没有固定工作，经阿英和蒋光慈介绍，暂时将组织关系转到春野支部。李克农和阿英从小在一起读书、玩耍，长大后又一起工作。因形势变化，他们几度离散，今又重新聚首，自是欢喜异常。从此以后，他们不仅在一起过组织生活，而且经常在夜深人静之时，一起拿着浆糊、传单，到马路上张贴。

李克农自幼一只眼睛不好，人们开玩笑称他“只眼先生”。年龄稍大之后，他经常戴一副深色眼镜，脸上露着亲切的微笑。当时李克农住在太阳社，但经常到阿英家中吃饭、谈天，有时还一块逛大街。一次，他们一起上街，李克农抱着阿英三岁的孩子钱宏，当他们走到大马路（今南京路）歇脚时，孩子撒尿了。当时租界不许随地大小便，李克农一看，连忙用袍子围着说：“你怎么撒尿也不吱声，你想把老子送到巡捕房啊！”李克农一席话，直逗得阿英一家人哈哈大笑。没想到，就是李克农最喜欢的这个孩子——钱宏，20年后在敌人的刑场上英勇不屈地光荣牺牲了。总之，李克农初到上海后，虽然在白色恐怖下，战斗生活也十分紧张，但其间仍充满着无穷的乐趣。

不久，李克农被调入中共沪中区委，担任宣传委员。1929年底，根据工作需要，又调入中央特科，在周恩来的直接领导下做保卫工作。

中央特科是周恩来主持中央工作期间亲自领导筹建的一个保卫党中央的安全、同敌人进行隐蔽斗争的特别工作组织。它的主要任务是在中共中央直接领导下，依靠党组织，依靠革命群众，深入敌人警宪特务机关，探取敌人破坏我党的阴谋情报，向党的秘密组织报警，保卫党的领导机关和革命活动的安全。

当时，中央特科的主要活动地区就是党中央所在地上海，同时兼及党的长江局、北方局、南方局等机关所在地武汉、平津、香港等重要城市。

党的政治保卫工作，早在武汉时期即已着手建立。过去，中共亦曾处于秘密状态，但因北洋军阀对共产党的秘密工作和斗争方式不了解，所以损失不大。国共合作以后，共产党的秘密工作几乎全被国民党所掌握。蒋介石正是利用这一点，在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时，采取突然袭击手法屠杀共产党人和革命群众，使革命遭到严重损失，中共中央也被迫从上海迁往武汉。

1927年4月下旬，中国共产党在汉口召开第五次全国代表大会，会上周恩来和许多负责中央工作的同志认真总结了革命失败的惨痛教训，认识到情报工作在对敌斗争中的重要作用，并于5月在中央军委下设立了以情报工作为重点的特务工作处。当时军事委员会书记是周恩来、秘书长为王一飞，聂荣臻任参谋长，工作十分繁重。新建立的特务工作处站在国共两党军事、政治斗争的第一线，作出了重要贡献。

当时国民党的军队多次发动叛乱，企图消灭武汉革命力量，特务工作处在这场斗争中充分发挥其情报工作的优势，及时地揭露了敌人的军事阴谋。当时有关国民党反动派的主要阴谋计划，如5月15日夏斗寅在宜昌发动叛变；5月21日许克祥在长沙发动“马日事变”；6月12日汪精卫等同冯玉祥在郑州举行秘密会谈，蒋介石同冯玉祥在徐州商谈联合反共和宁汉合作；7月14日汪精卫等召开秘密会议提出反共等，特务工作处都曾通过公开和秘密的渠道及时获得情报。只是由于当时掌握中央大权的陈独秀坚持右倾机会主义路线，未能根据形势及时采取应有的对策，才使革命事业遭受不应有的损失。

1927年，中共中央在湖北汉口召开“八七”会议后，考虑到上海的群众基础和复杂的环境等条件，中共中央又从武汉迁回上海。不料，此时上海的特务、党内叛徒活动十分嚣张。中央迁回后设在法租界，于是国民党的特务警探同法租界和公共租界巡捕房的巡捕、包探勾结起来，共同缉捕党的负责人、党团员、工人领袖，几乎每星期都有人被捕被杀。面对敌人的白色恐怖和革命形势的低落，一些人被捕后变节投敌，出卖革命者和党的机密。许多著名共产党人如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组织部长郭伯和及江苏省委另一负责人赵世炎，就是因叛徒的出卖而被捕牺牲。因此，一时间，中央的安全问题，成了最为严重的问题。

为了坚决打击叛徒、特务的嚣张气焰，保卫上海党组织的安全，中共中央于1927年11月正式成立中央特科，作为党的政治保卫机构。中央特科成立之后，适应工作的需要，组织机构日臻健全，逐渐建立起四个科，即第一科（总务科）、第二科（情报科）、第三科（行动科）、第四科（交通科）。

第一种，专门负责总务事项，它成立得最早。自从1927年8月中共中央陆续从汉口迁回上海时起，由于在上海要设立各种领导机构，需要采购各种物资设备和布置机关，租赁房屋，供中央领导机关和领导人使用，因此，专门成立了一个“总部”，为中央机关服务。特科成立后，这个“总部”即改为一科。一科的经常性工作包括为中央机关租赁房屋，安排负责同志住处，布置中央开会的场所，营救被捕的中央负责同志，处理善后事宜，租家具，打铺保，做生意，收殓牺牲了的同志的遗骨，料理家属生活等。这些事情看起来十分琐碎，但因与中央机关关系最为密切，因此，稍有疏忽，后果不堪设想。以布置中央开会的会场为例，即可见当时该科工作之艰苦。

每逢中央召开重要会议，必须先由一科从安全着眼选定会场，然后由红队派人携带武器前往护卫，有的骑自行车在附近巡逻；有的化装成小贩在房前、屋后和弄堂口放风；有的在会场警戒，万一发生危险，由外围人员发出报警信号，会场的队员分作两部分，一部分抵抗敌人，一部分保护负责同志转移。如1931年1月召开四中全会时，会场就布置在法租界的一幢公馆里。楼上开会，楼下由一、二科的女同志打牌，开留声机作掩护；三科派红队队员化装成厨师，负责保卫会场安全，随时准备投入战斗。又如1930年中共中

央在上海召开全国苏维埃代表大会时，为保障这次会议的安全，一科与三科配合，在赫德路租下一座四层红楼，临时开设一座医院，一楼为特科工作人员，二、三楼供与会代表住宿，四楼有会议大厅供开会。各地代表到达上海后，先在指定旅馆住下，经初步审查后，作为“病人”逐个送入“医院”，住进预设的“病房”，不许外出，暂时与外界隔绝开来。会前，这里完全按照普通医院的秩序办事，到开会之日，方进入会场。这次会议共开两天，会毕又将代表逐个送出医院，分散住进各个旅馆。几天光景，这座医院便像海市蜃楼一样，倏忽不见，人员也都走得无影无踪。所有这一切，都浸透着一科同志的大量心血和汗水。

第二科，主要负责搜集情报工作，是专门为对付敌人的侦探机关的进攻于1928年4月设立的。科长由陈赓（当时化名王庸）担任。根据周恩来的指示，二科的工作一是打进去：利用各种关系打入敌人的心脏部门。除派遣党员打入敌人内部外，还利用同情我们又为我们所信任的人打入敌特内部，为我党工作。二是拉出来：将国民党特务机关某些人员、帝国主义巡捕房的包探以及能够利用的人，尽量设法拉出来。二科在陈赓的领导下，在这两方面均做得非常出色。其中最成功的打进去的活动，便是派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三人打入敌特机关；拉出来的成功范例是建立杨登瀛反间谍机关。

第三科，亦于1928年4月设立。它的主要工作是领导红队（当时称打狗队）打击特务，镇压叛徒，保护和营救被捕的中央负责人，保障中央机关和中央召开的各种会议能够安全进行。红队成立于1927年秋，它在当时镇压叛徒得心应手，战果辉煌，对保卫党的安全起到了重要作用。

红队成立初期，因未建立起反间谍的情报系统，不能事先制止敌人的破坏，只能在事后查明叛徒的活动，予以镇压。加之初期缺乏经验，在行动中也发生过偏差。1928年特科二科成立后，通过情报工作，红队得以及时从敌人内部得到叛徒奸细活动的情况，因此不必太费周折，便能准确及时地镇压叛徒，有时还能事先发现敌人的阴谋，做到先发制人，防患于未然。

第四科，主要工作是建立和管理党的无线电工作。1928年开始筹建，到1931年，特科不仅自行动手设计制造了收发两用无线电台，培养了大批无线电工作人员，而且筹建了上海、南方局（在九龙）、中央苏区、湘鄂西、鄂豫皖等地的电台，对各根据地的红军作战起到了重要作用。到1931年，中央特科还在上海设立国际电台，与共产国际取得电讯联系。

同时，第四科还同各红色区域及各地党组织建立了水陆交通线，使上海和各红色区域经常保持交通联系，对中央指导全国革命运动起到了重要作用。

1929年李克农调入中央特科后，被安排在第二科，即情报科，任务是打入敌人心脏。早在1927年12月31日中共中央在上海发出的《中央通报》（第二十五号）中就曾规定：经过党支部决议，得派遣一两个忠实的同志，到国民党党部以及某种反动机关，做侦探和破坏工作。但必须限于这两种作用方可派遣。中央特科成立后，根据周恩来的指示，先后派钱壮飞、李克农和胡底三人打进国民党最高特务机关，掌握了国民党全国特务机关的全盘活动。他们深入虎穴，在这场隐蔽斗争中，演出了中国共产党地下斗争史上最最为惊心动魄的一幕。在一年多的时间里，他们给中共中央提供了许多非常重要的情报，对保卫党的中央机关和地下党组织，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受到中央的嘉奖。



当然，要想了解这场斗争的一些情况，还须从国民党特务头子徐恩曾谈起。

徐恩曾，字可均，浙江吴兴人，与国民党特务头子陈立夫是表兄弟。徐幼时住在上海曹家渡，小学和中学均在南洋公学，以后进交通大学电机系读书，后自费赴美国留学，攻电气工程。毕业后曾在电气公司实习，并在美参加国民党。回国后于1928年初开始在陈立夫把持下的建设委员会无线电管理处任职，后调中央组织部调查科任科长，成为特务头子。1934年改任中央组织部秘书，次年当选国民党中央执行委员。不久，改任国民党军事委员会调查统计局第三、第一处处长，并在中央党部任经济计划委员会副主任委员。抗战期间，徐在重庆继续负责中统特务事宜。1943年担任交通次长。抗战胜利前夕，因贪污被蒋介石撤职，后在上海经营台安轮船公司，1949年逃往台湾。

徐是留美学生，崇美思想严重，平时非美国杂志不读，与同学打电话一概用英语。他崇拜蒋介石，称之为“最高领袖”。他受儒家思想熏陶，对孔子和曾国藩也很崇拜，常看《曾文正公家书》，几次想学曾国藩写日记，因无恒心而未能成就。徐平时喜欢钱财，曾大量贪污特务经费，且更迷女色，尽管他有三个妻子和一个姘妇，仍不满足，平时踢破妓院门槛，并和调查科的女特务鬼混。徐恩曾的特殊经历及个性特点，不仅对他本人的特务生涯产生重大影响，而且对李克农等人的地下工作也产生不小的作用。

中央特科情报科当时派人打入敌人心脏时，就是从徐恩曾这里入手的。1928年，徐恩曾在上海开办的无线电训练班招生，一个非常偶然的时机，共产党员钱壮飞考入了这个无线电训练班，并以其卓越的才能，迅速取得了徐恩曾的好感和信任。

钱壮飞，浙江湖州人，1895年出生于一个商人家庭。为其父母中年喜得之子，对他极为疼爱，着意培养，寄以厚望。1915年，钱壮飞从浙江省立三中毕业，考入国立北京医科专门学校。在医专学习期间，他结识了比他大两岁的女同学张振华。张出生于安徽桐城名门望族，家资殷厚，而钱在读中学时父亲病逝，家道中落，故得张经常资助，使他坚持修完学业。1919年10月，钱壮飞与张振华双双毕业，两人情投意合，毕业不久便在北京结为伉俪。

钱壮飞毕业后，先在北京长兴街挂牌行医，后入京绥铁路局附属医院工作。由于收入菲薄，不足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他不得不一边行医，一边在国立美术专科学校执教，晚上到一家小报馆当编辑。

社会的动荡、生活的熬煎和民主思想的熏陶，使钱壮飞的思想逐渐发生变化。同时，其妻弟、中共早期党员张退中的思想和行动，也对他夫妇二人产生了重大影响，使他们逐渐接受了马克思主义。1925年，经张暹中介绍，钱壮飞和张振华先后加入中国共产党。从此，钱壮飞开始了他一生中崭新的、惊心动魄的和充满传奇色彩的革命生涯。

钱壮飞入党后，在中共北方局党委的直接领导下，利用医生的职业为掩护，开始从事党的秘密工作。残酷的地下斗争，使才华横溢的钱壮飞得到锻炼，逐渐积累了从事地下工作的经验，在政治上也更加成熟。加之他博学多才、多谋善断，遇事深藏不露，又长于交际应酬，为日后深入虎穴龙潭创造了得天独厚的条件。

1927年蒋介石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白色恐怖笼罩了全国，北京的反动当局也疯狂搜捕共产党人，中共北方局及其下属各级党组织相继

遭到严重破坏，李大钊等人被残酷杀害，钱壮飞也遭到通缉。白色恐怖使他本来仅能勉强维持的家庭生活更加艰难，在这种情况下，他被迫携全家老小出走上海。

1928年春，钱壮飞来到上海后，一边寻找党的关系，一边谋求可以出头的职业。

这年年终，他在报纸上看到一则上海无线电训练班招考的广告，就去应试，这一考竟考了个第一名。办这个训练班的就是后来成为中统特务头子的徐恩曾。由于钱壮飞多才多艺，又和徐恩曾同乡，爱才之心和乡党之谊使徐恩曾对钱壮飞则另眼看待。同年，徐恩曾升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局长，钱壮飞也因之升任无线电管理局秘书。

1929年春，陈立夫兼任国民党建设委员会主任后，徐恩曾受表兄的提携，一度调任国民党浙江建设厅厅长，钱壮飞也举家迁往杭州。就在这一年，浙江省决定举办西湖博览会，作为建设厅厅长的徐恩曾被委托筹办。徐恩曾当然是乐不可支，这不仅使他有机会大显身手，且可以借此机会大捞一把。尽管他曾留学美国，却是学电机的，对办博览会可以说是一窍不通。不过，他倒也有办法，将此事全权委托给钱壮飞，并在浙江省建设厅为钱壮飞挂了一个秘书的头衔。钱壮飞虽然医专毕业，但对音乐、书法、绘画、电影、演出无所不通，更兼非凡的组织才能。因此，接办之后，从博览会的设计到会务准备，他都安排得有条不紊，把个博览会办得有声有色。

这次博览会使徐恩曾出尽风头。1929年8月20日，陈立夫驱车来到博览会，对前来迎接的徐恩曾大加赞赏，并告诉他，孔祥熙和宋霭龄参观这次博览会后赞不绝口，认为毫不逊色于巴黎博览会，甚至还别具一格。上司的嘉许，加之钱壮飞在博览会结束后给视孔方兄如神灵的徐恩曾送来几大箱金灿灿的“硬通货”，使徐恩曾对钱壮飞更加器重。博览会结束不久，徐恩曾回任上海无线电管理局，钱壮飞则被他委任为私人秘书，视为心腹。

前面提到过，自来到上海后，钱壮飞就一直在寻找党组织，但因当时上海情况复杂，党的组织与活动极为秘密，所以钱壮飞未能如愿。从西湖博览会回来后，生计问题已经基本解决，故除日常工作外，钱壮飞的主要任务就是寻找党组织。

就在此时，发生了一件日后对钱壮飞、对李克农，甚至对中共中央影响非常大的一件事。

1928年2月，蒋介石曾建立起一个特务机构——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这个机构的工作任务，最初主要是侦察国民党内部的派系斗争，特别是反蒋派的活动情况，同时也兼及共产党领导的革命力量的活动。这种情况，到1929年冬开始有所变化。此时，各红色区域红军的军事斗争正成为国内政治斗争的重要因素，红色武装割据政权得到蓬勃发展。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白区的组织和工作经过一年多努力，也得到相当的恢复。革命力量的壮大和恢复，引起了蒋介石反动集团的震惊与不安，蒋介石开始把共产党作为头号敌人，企图全力进攻红军和加紧破坏白区党的组织。时任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陈立夫为了迎合蒋介石“剿共”的需要，乘机扩大自己的势力，积极筹划在这个党务调查科的基础上，建立一个进行秘密侦察、审讯的特务机关。然而陈立夫对此完全是个门外汉，于是便找自己的表弟徐恩曾帮助筹备，而徐恩曾也并不精于此道，他便转而又找钱壮飞帮忙，真是阴差阳错，筹建国民党特务机关的任务，竟然落到了共产党人身上。

一天，徐恩曾在家中宴请钱壮飞，席间他向钱壮飞交了老底，说陈立夫邀他出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党务调查科科长，他已经答应，该机构重点是对付共产党，为了掩人耳目，对外挂总务科的牌子，科址设在南京。他还说，陈立夫要他找一两个最可靠的帮手，他已推荐钱壮飞担任机要秘书，并得到陈立夫的首肯。他希望钱壮飞仔细斟酌，三天后给他一个满意的答复。

1928年陈立夫的亲信杨剑虹找其同乡杨登瀛筹办调查科上海分支机构时，杨登瀛尚且顾虑重重，现在徐恩曾要身为共产党员的钱壮飞到专门对付共产党的特务机关工作，钱壮飞又何能无动于衷？听着徐恩曾的话，钱壮飞的脑子在飞速翻想，此事关系重大，个人无权贸然答应，但在这样的场合也不便断然拒绝。好在徐恩曾没有让他立即表态，所以他灵机一动，一面频频致谢，一面赶快转移话题，称颂徐恩曾步步高升，并畅谈南京的人情风俗。

离开徐公馆后，钱壮飞带着“三天内答复”的要求，心事重重地返回家中。他想，如果要掌握敌人的核心机密，这无疑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可共产党员的任何言行是有原则性的，特别是这样重大的事情，必须有党组织的指示和安排，个人才能决定行止。此时他是多么希望找到党的组织啊！

真是踏破铁鞋无觅处，得来全不费工夫。就在徐恩曾与钱壮飞谈话后的第二天，徐又宴请上海滩的几位名人。钱壮飞为筹办酒席送来迎往，忙得团团转，好不容易到散席，他到柜台前结账，忽然发现柜台那边有一张他非常熟悉的面孔，定睛一看，正是自己多日来一直在寻找的人。

此人姓胡名底，又名北风，是与他同在北京从事秘密工作的好友。胡底系安徽人，1925年入党，当时尚在中国大学读书。他自中国大学毕业后，便长住在钱壮飞家中，和钱壮飞密切配合，共同为劳苦大众的解放而奔波、战斗。胡底年龄不大，但也才华超群，李克农曾经说过：“胡底年纪最小，而文笔才华最高。”蒋介石“四·一二”政变后，在党组织的安排下，他和钱壮飞一家一同南下前往上海。抵沪后为了谋生，他们又几度聚散。此时两人相见，自是分外高兴，特别是钱壮飞得知胡底已和上海党组织取得联系后，更是欣喜异常，情不自禁地连连叫好，并郑重其事地问胡底：“我有急事相告，你能带我去见故乡的亲人吗？”

胡底点点头，递过一张名片。他当时正在一家影业公司拍电影，他们相约第二天在摄影棚相见。

第二天，钱壮飞如约来到摄影棚，胡底将他领到一个角落。一个戴着眼镜、身着长袍、神情庄重、面目慈善的青年迎了上来，他握住钱壮飞的手说：“我叫李克农，老家让我来看你。”钱壮飞握着李克农的手激动不已，稍事寒暄，便将自己的所知全部告诉了李克农，并请李克农尽快向党组织汇报，以求对策。同时，他还谈了自己的看法，并建议李克农也打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他可以介绍李克农到那里去当广播新闻编辑，只不过是经过正式考试手续。

李克农当时尚在中共沪中区委担任宣传委员，得到钱壮飞提供的情报后，他立即通过沪中区委向中共中央作了汇报，并请求批准他打入敌人内部。

中央对李克农的报告极为重视，立即进行研究，特别是当时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周恩来，亲自过问此事。根据多年来白区斗争的经验和对敌斗争的实际情况，他认为，尽管中央特科已经建立了杨登瀛这样的反间谍关系，但在蒋介石、陈立夫肆意扩大特务组织、把重点转向对付共产党之时，钱壮飞已经取得的地位仍是极为重要的。如果能够充分利用这一条件，将大大有利

于改变党在白区工作的被动局面。因此，中央很快便同意钱壮飞担任徐恩曾的机要秘书，并同意将李克农调离沪中区委，打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以加强在敌人内部工作的力量。李克农经过一番认真准备，考试成绩良好，再加上有钱壮飞的推荐，于1929年12月顺利进入上海无线电管理局，并很快站稳了脚跟。

与此同时，陈立夫和徐恩曾也开始推行其扩大特务组织、利用中共叛徒或派奸细打入中共内部进行破坏活动的阴谋。1929年12月初，国民政府公布了《共产党人自首法》和《反省院条件》，12月下旬，又任命徐恩曾担任国民党中央组织部总务科主任，实际上却是担负着党务调查科主任的任务，原调查科主任调到国民党中央工作。徐恩曾上任后，即将着手扩大特务组织的事情告诉钱壮飞，希望获得他的帮助。徐恩曾还透露，陈立夫和他准备对中共动摇分子实行软化，利用中共的叛徒做他们的侦察奸细，潜伏在中共内部进行秘密活动。也就是说，敌人要在党务调查科的基础上，建立一个领导这种罪恶活动的特务组织。李克农和钱壮飞及时将这一情况报告了党中央。

此时，中央特科围绕关于是否打入国民党组织的问题，发生了意见分歧。有人赞成派遣我们的同志打入敌人内部，钻进敌人的心脏，与敌人展开斗争；而另一些人则表示反对打进去。最后，主持中央特科工作的周恩来指示特科：“你们把它拿过来。”这样，特科才决定派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打入敌人的最高特务组织。当时李克农和钱壮飞还在上海，他们的组织关系也还在地方党支部，后经周恩来指示，才转到负责特科第二科的陈赓手上，也就是说，这三个人由情报科直接指挥。

徐恩曾在南京一上任，便立即扩充人员，增加经费，扩大训练机构，充实内部，并派特务打入国民党警宪机关活动。当时，徐恩曾最为关心的大事是：在上海重用杨登瀛，在蒋介石势力所能达到的地区，如长江沿岸各地，准备建立秘密基层机关，进行侦察活动。同时，在南京建立秘密指挥机关和秘密电台，以指挥全国的特务活动。徐恩曾委托钱壮飞以机要秘书名义，组织这个秘密机关，建立各地基层机构。

党务调查科的办公地址原在南京丁家桥国民党中央党部内，徐恩曾感到那里太乱，不容易保密，便选定中山东路五号，建立起一个以他和机要秘书为中心的秘密机关，把这里搞成自己的大本营。实际上，这里虽然是指挥机关，人手却并不多，钱壮飞只配备了少数机要人员管理电台、秘书、会计等事务，并作为李克农和自己联系的秘密交通站（其中就有钱壮飞的女婿刘杞夫等）。徐恩曾是个纨绔子弟，贪迷女色，整天在舞场和妓院里鬼混，他几乎把什么事都推给了自己的“心腹”钱壮飞，由他一手办理。调查科迁入新址后，凡是送给徐恩曾的文件、电报，都由中央党部转送到这里来，而首先看到这些文件的当然是钱壮飞。蒋介石对江西苏区进行第一、第二次“围剿”的时候，钱壮飞曾在这里获得许多重要的军事情报，经李克农转交陈赓。这些情报准确及时，中央转发到苏区后，对红军作战起到了重要作用。

“大本营”不仅建立起秘密电台，还开设工厂制造便于携往外地去的小型收发报机。因为要制造这种收发报机，便在门口挂上“正元实业社”的招牌，作为这个秘密机关的掩护。据曾在中统工作过的祝韵雅说，“正”是指蒋介石（中正），而“元”则是指徐恩曾第二个妻子王书青的妹妹，也是徐的姘妇王书元。将“领袖”与姘妇并重，也只有徐恩曾才做得出来。后来派到汉口、九江、安庆等地的调查员，便都同“大本营”的秘密电台联系。凡

是给徐恩曾的电报、报告和各種情报，都是首先经过钱壮飞，由他审阅并提出处理意见。徐恩曾只在上面签个字，就由钱壮飞处理。所以钱壮飞掌握了这里的全部秘密。

后来，陈立夫、徐恩曾进一步提出不仅要搜集共产党的情报，而且要收集其他党派和政治势力，特别是反蒋派和反陈派的情报。基于此，李克农、钱壮飞、胡底根据中共中央特委和特科二科的指示，“帮助”他们在南京、天津建立起一套以通讯社形式出现的情报机构。这些机构名义上是国民党特务机关的附属组织，实际上自上而下完全掌握在李克农等三人手中。通过筹建这些特务机关，李克农、钱壮飞和胡底进一步取得了徐恩曾的信任。这一套情报机构的指导机关是“长江通讯社”，它设在南京中央饭店四楼（中山东路五号隔壁），由钱壮飞直接负责。同时在南京设立“民智通讯社”，由胡底任社长。后来胡底被派往天津，在那里成立了“长城通讯社”，“民智通讯社”的社长则由钱壮飞兼任。胡底在天津搜集到的各种情报，均由这个通讯社作掩护，用密码发到南京钱壮飞处，由钱壮飞转给李克农，再经陈赓转给周恩来。

从此以后，钱壮飞便主持了国民党全国的最高特务机关，李克农主持了国民党在上海的特务机关，胡底则掌握了北方各省的情报。为了保证党的领导，中央特科派陈赓与李克农经常保持联系，南京一有什么情况，便由李克农及时反映给陈赓。为了便于活动，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人成立了一个党小组，由李克农担任组长。工作的重大问题，由党小组讨论决定，分头执行。

自从有了“长江通讯社”，他们三人的活动更加方便。每次李克农到南京，便在中央饭店住下，三人在这里一块商谈工作，过组织生活。当时国民党特务机关搜集来的我党文件，都汇集到通讯社，钱壮飞只在上面盖一个图章交人收藏起来了事。而国民党需要什么情报，李克农等人便闭门造车，似真非真，似假非假，直把徐恩曾高兴得拍案叫好。如1930年中原大战之后，蒋介石非常想了解张学良的动向，几次派情报人员出关，均被张学良雇用的日本特工搞掉。不得已，只得动用钱壮飞，命他组织一个小组去沈阳。中央特科为了慎重起见，除派胡底一同前往外，还特别派情报科科长陈赓前往辅助钱壮飞。他们拿着国民党的钱，到东北旅行一星期，由于一路上有各当地组织负责保护，所以不会发生什么意外。陈赓利用这次机会，顺便视察了中央特科在东北和华北的工作，并为中央带回许多重要的秘密情报。从东北回来后，李克农和他们在一起，经过研究写成了一份4万字的报告。钱壮飞回到南京后，将报告交给徐恩曾后，徐仅看了一部分便连连称赞“了不起”，“实在了不起”，并惊叹“哪来这么好的材料？！”

作为一个受过高等教育的特务头子，徐恩曾的称赞和惊叹绝非故弄玄虚，而是因为钱壮飞这次东北之行，的确获得不少“情报”。首先，由于东北地区党组织的帮助，特别是李克农、陈赓等人的具体筹划和组织，该报告提供了东北军的详细情况，其中固然有闭门造车的内容，可也有许多实情。更重要的是，他们这次东北之行，还在东北建立了一套能够源源不断地取得东北地区情报的“特务组织”。这个“特务组织”，名义上是国民党的，实际上为共产党服务。这样的成就，若不是东北地区党组织的帮助，若不是陈赓、钱壮飞等人的机智勇敢，若不是李克农的“杜撰”，的确很难取得。徐恩曾、陈立夫拿着这份报告如获至宝，这也难怪，因为它不仅可以让徐恩曾

邀功请赏，也可使陈立夫在蒋介石面前炫耀。在徐恩曾眼中，钱壮飞更成为不可多得的奇才，中统特务组织的创造者。因此他对钱壮飞“佩服之至”，不仅给予嘉奖，从此也更加重用。

李克农在上海除协助钱壮飞筹划特务组织的建设，在陈赓和钱壮飞之间传递情报外，还利用上海无线电管理局为掩护的情报机关，为党和革命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这个机构原来是钱壮飞调到南京之前建立起来的，和国民党在上海的军警机关有一定联系。当钱壮飞还在上海时，有一个国民党公安局的侦缉队长非常反动，抓捕了许多共产党员。李克农和钱壮飞决定搞掉这个家伙。两人商计一番后，便开始依计行事：首先由李克农租下一处房子，布置一些我们的人住在那里，并放置一些已经被国民党搜集到的有关文件，然后故意让这个侦缉队长侦知情况。当这个侦缉队长要去捕人时，李克农使人告诉这个家伙：为了放长线，钓大鱼，暂时不要行动。这样，几天以后这个侦缉队长再去捕人时，我们的人早已转移。虽然搜捕时也捡回一些文件，但都是些不重要的材料，并且是国民党早已弄到手的。当上面质问为什么让共产党“漏网”时，这个家伙哑吧吃黄连，有苦难言。结果这个侦缉队长被国民党考察一段时间后便“锄掉”了。此事干得干净利落，不留任何痕迹。

李克农在上海也利用这个情报机关搜集了大量珍贵情报，然后全部转交陈赓。他给徐恩曾提供的情报，凡属于共产党活动的，大多夸大其词，不着边际。由于徐恩曾认为李克农稳妥可靠，私交“甚好”，所以对李克农提供的情报，从不怀疑，一律照转出去。

李克农为了取信徐恩曾，也的确费了一番功夫，其中最为值得一提的是，为打消徐恩曾的顾虑，他除以自己的工作与各项活动尽量取悦于徐恩曾之外，还特地将夫人和两个儿子从芜湖接到上海一起生活。徐恩曾不仅对李克农提供的情报确信不疑，而且对李克农的为人也颇有好感。徐恩曾贪恋女色，但怯于夫人，他当时在上海的“藏娇金屋”是在法租界甘司东路辣斐德东路新兴里4号，和李克农一家住在同一幢楼上，平日里便托李克农帮助照看。每次来上海，他都要和李克农推杯换盏，互诉“衷肠”，而李克农终生酷嗜饮酒，且脑子反应极快，加之特殊使命在身，所以每次都能把徐恩曾说得心花怒放，灌得头重脚轻。

利用这样有利的条件，李克农为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如当时徐恩曾虽然将钱壮飞视为心腹，非常信任，但有一件东西，却紧紧抓住，不曾放手，即他同国民党高级官员通报用的密码本。这东西就像是徐恩曾的护身符，每次外出，他总是把它带在身上，珍藏在贴身衣服的口袋里。没有这个密码本，国民党最高统治集团的核心机密便无法搞到，钱壮飞早就想把它弄到手，但一直没有机会动作。后来经过与李克农商议，两人决定设一个圈套，让徐恩曾自己往里跳。一次，徐恩曾来上海开会，李克农投其所好，煞有介事地向徐恩曾介绍说某某妓院新近来了一个姑娘，姿色非凡，钱壮飞也在一旁帮腔。徐恩曾一听便心摇神动，当即就要前往，此时李克农故意说：“这可不行，你带着这个东西怎么成。”心急如焚的徐恩曾思索良久，才从小褂兜里掏出密码本，很不情愿地交给李克农。李克农趁机迅速将该密码本复制下来。有了这个密码本，许多极机密、最重要的尖端情报也就很轻易能够搞到。后来顾顺章叛变时，凭着这个密码本，钱壮飞才得以及时了解全部情况，从而使中共中央免遭灭顶之灾。

此外，李克农还利用这个有利条件，护送了党的许多干部，并帮助党组

织输送了许多地下工作者打入敌人内部。当时，中共许多重要干部前往南京时，皆由他护送。一次，刘伯承去南京，就由中央负责同志当面交待他护送。说来也怪，他所护送的干部都是乘头等车，每次他身上都带有多种护照，故从未出过差错。

上海无线电管理局的业务范围很广，李克农除担任新闻编辑外，还管理着全国无线电报务员的登记与考试。每次考试，凡是党组织送来的名单，李克农皆加以录用。

这样，李克农、钱壮飞、胡底三个共产党员在周恩来和中央特科的直接领导下，在敌人最为致命的地方，夺取了极为重要的阵地。从 1929 年底到 1931 年 4 月的一年多时间里，他们活动在敌人的心脏，以自己的机智与勇敢及对党和革命事业的无限忠诚，演出了中共地下工作史上最为壮烈、辉煌的一幕，出色地完成了党交给他们的把国民党特务组织“拿过来”的艰巨任务。

对当时之所以取得这样大成就的原因，李克农后来曾作总结说：当时国民党是统治阶级，是公开暴露的；而我们则是处于地下非法的隐蔽状态，又是进步的，有广大群众的拥护，敌人很难防范，敌人的种种弱点总要暴露在人们面前，这是我们进攻敌人的有利条件。采取正确的策略，就能在这场异常复杂的隐蔽斗争中取得胜利。

事实正是这样，李克农和他的战友，利用国民党在南京、上海等地的特务机关，在一条特殊的战线上，与敌人展开了殊死的搏斗，取得辉煌战果。其中值得大书特书的，是粉碎叛徒顾顺章出卖党中央的罪恶阴谋。

## 处变不惊

顾顺章，宝山县白扬人，原是上海南洋烟草公司制烟厂的一个“拿摩温”——小工头。他个子不大，身体肥胖，鼻梁高耸，眼光凶狠，满口上海腔。此人自幼沾染流氓习气，喜欢舞枪弄棒，能够双手打枪，百发百中；还爱捣捣点儿旁门左道，会耍魔术，曾以“化广奇”的艺名在上海大世界游艺场公开表演，并在斜桥路 22 号开过一个魔术店，专卖一些玩魔术的小玩意。

1925 年，“五卅”运动爆发。时在南洋烟草公司的顾顺章在厂里领导工人闹罢工，还组织纠察队，热心于买枪，搞武器。同时，打叛徒、工贼、流氓，他都参加，表现比较勇敢。“五卅”运动后，被调上海市总工会工作。1926 年，赴苏联学习政治保卫工作，1927 年回国，参加周恩来同志领导的上海武装起义，担任一个武装纠察队的队长，斗争中有过一些成绩，曾受到赞扬，在上海有点小名气。“四·一二”政变后，转往武汉，做过短时期的隐蔽斗争，镇压过叛徒特务。同年“八·七”会议以后，中共中央从武汉迁到上海，顾顺章也随调上海工作。周恩来创建中央特科时，他参加了中央特委，并任中央特科三科（行动科）科长。

“四·一二”反革命政变后，革命运动陷于低潮，白色恐怖笼罩全国。但是，上海是一个具有革命传统的城市，是全国工人阶级力量最集中、最强大的地方。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上海市的工人阶级发动过“五卅”反帝斗争，举行过三次武装起义。直到 1929 年，这里，大革命的影响还在，工人和革命力量还很强大。正因有这样的有利条件，党的隐蔽斗争才进展得比较顺利。

随着形势的逐步发展，顾顺章的思想中日益严重地暴露出了他原有的劣

根性。一时的胜利冲昏了他的头脑，使得他得意忘形，以恐怖行动为乐，自我陶醉。执行党交给的任务时，他忽视秘密工作的政治方向，在具体行动中忘掉党的政策，把严肃的政治斗争，当成是单纯的恐怖行动，因而被人视为“杀人魔王”。这种做法，显然和党的长远利益格格不入，是和党的秘密工作的方针政策根本背离的。任其发展下去，势将造成严重恶果，以致丧失社会各界人士的同情，使党陷于孤立的危险境地。特别是处决叛徒白鑫以后，敌人增加了力量，改变了策略，客观形势的急骤变化，迫使我们必须改弦更张。

此时，顾顺章狂妄的个人野心也更加膨胀。他曾找“星相家”看相算命，吹嘘他有“福相”，将来也许会做皇帝。他自以为是，在党内骄傲蛮横，飞扬跋扈不可一世，同党的关系已发展到不能容忍的程度。党内只有周恩来的话他能够听一些，他的家只有陈赓可以去。陈赓到顾家去过两次，发现此人生活腐化，花天酒地，乱搞女人，抽鸦片烟。陈赓从顾家回来后，曾对柯麟说：“我们两人如果不死的话，准能见到顾顺章叛变！”周恩来曾经多次严厉批评过顾顺章，向他指出：私生活的腐化堕落完全违背了共产主义的道德准则。希望他能较好地把握自己，不能因奢侈享受而给革命造成不良影响。但顾顺章阳奉阴违，仍然是我行我素。

错误的指导思想和恶劣的个人品德决定了顾顺章迟早会走向革命的反面。这于1931年4月变成现实，也正应了陈赓的预言。

1931年3月，沈泽民和张国焘到鄂豫皖根据地红四方面军去工作。中央特科派顾顺章护送他们由上海经武汉前往苏区。顾顺章在返回上海途经武汉时，于汉口法租界的德明饭店下榻，他刚愎自用，不顾党的秘密工作的严格纪律，又用“化广奇”的艺名，到新市场游艺场公开表演魔术小把戏。

当时，武汉有个叛徒叫王竹樵。他叛变后，特务机关命他到街上四处认人抓人，并规定限期内必须找到共产党员。王竹樵原是武汉纱厂工人，曾经参加过工人武装纠察队，和顾顺章相识。这天限期已满，王竹樵正愁无法交差，来到江岸徘徊。中午刚过，顾顺章从武昌乘轮渡回汉口，下船到江汉关门口，被正徘徊于此的叛徒王竹樵一眼认出。王竹樵喜不自胜，总算找到了可以交差的猎物。他十分谨慎地暗中盯梢，一直跟到顾顺章的住处，然后马上报告特务机关，将顾顺章逮捕，时为1931年4月24日，星期五。

带领特务逮捕顾顺章的叛徒王竹樵，属于徐恩曾在汉口新建立的特务机关——武汉绥靖主任公署侦缉处。

顾顺章被捕的当天就叛变投敌，先将武汉的党组织出卖。这个可耻的叛徒还认为，他知道党的许多机密，知道党中央机关和许多中央领导人的住址，知道蒋介石身边有钱壮飞等中共特工人员的内情，以此可以作为他出卖自己灵魂的资本，可以此向蒋介石邀功请赏。因此，当他被押送到武汉行营侦缉处时，便以盛气凌人的口气问道：“你们的处长蔡孟坚呢？”

在一旁的侦缉处长蔡孟坚听到此问，不觉一愣，但他毕竟是搞特务工作的，随即镇静下来，眼睛滴溜一转，狡诈地反问：“你怎么知道这里有蔡孟坚？”

顾顺章为显示出他不同一般的叛徒身份，淡淡一笑：“我何尝只知道蔡孟坚，我还知道各大城市侦缉处长是谁。”

顾顺章如此卖弄，并非毫无凭据，因为当时中统的各大城市侦缉处处长都是经过钱壮飞和李克农安排的，所以中央特科对此了如指掌。顾顺章长期



在特科工作，自然也知道这一详情。

蔡孟坚答道：“我就是蔡孟坚。”

顾顺章居高临下，轻蔑地瞥了蔡孟坚一眼，用鼻子哼了一声，然后说：“你就是蔡孟坚。好，你马上安排飞机，把我送到南京，我有特别紧急的机密情报须当面向蒋介石报告。”他稍微停顿了一下，又接着说：“在我到达南京之前，不要把我被捕之事向南京发电报。”

24岁的蔡孟坚被顾顺章的这种气势镇住了，他也明白顾顺章的身份，所以客气地说：“我可以为你引见行营主任何将军。”

顾顺章断然拒绝：“不必了！见到我也是这几句话。”然后，无论对方如何发问，他皆不再开口。

蔡孟坚将审问情形报告给国民党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濬，并要求火速派人将顾顺章解往南京，面见蒋介石，以便及时采取措施，将上海的共产党一网打尽。

何成濬听了蔡孟坚的汇报后，先是一喜，继而冷静下来，不免担忧。顾顺章是中共要员，这一点他丝毫不怀疑，但顾顺章是否真的投降，他拿不准。如果其中有诈，擅自送到南京去，不仅得不到任何结果，说不定还会闹出什么大乱子来。到那时，且不说他何成濬不可能邀功，弄不好会丢掉乌纱帽，甚至还有性命之忧。所以他将信将疑，迟迟未做出决定。后转念一想，计上心头：武汉地面肯定也有共产党在活动，何不让他先招供出来，这样不就会弄清他的投降是真是假吗？

顾顺章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他见何成濬不急于将他送往南京，反而先让他指出共产党组织在武汉的地址，马上便明白了何成濬的用心。对此，他表示非常理解，所以很轻易地将红二方面军驻汉口办事处和中共中央驻武汉的交通机关全部供出。何成濬立即派兵按图索骥，果然破获了共产党的这两个地下机关，并将这两个机关的数十名工作人员全部逮捕。

因为顾顺章十分清楚中央特科的内情，所以从叛变一开始，就一再警告蔡孟坚不要就此事向南京拍发电报，但又闭口不谈个中原因。他担心如果拍发电报，就有可能落到钱壮飞手里，搜捕共产党中央机关和中央负责人的阴谋便顷刻落空。他如果供出钱壮飞、让何成濬、蔡孟坚知道了这一重要情况，他们必然会抢先一步，抓起钱壮飞来，使他失去向蒋介石邀功请赏的资本。

何成濬、蔡孟坚对顾顺章的吞吞吐吐深为不满，认为顾顺章是故弄玄虚，只不过是抬高自己的身价而已，所以对顾顺章不要向南京拍发电报的一再告诫根本不予理会。为了抢得头功，他们分别向南京拍发了加急电报，向徐恩曾、陈立夫报功，并决定由蔡孟坚押送顾顺章乘兵舰前往南京。

4月26日，顾顺章已经变得极不耐烦，一再询问兵舰是否到来，蔡孟坚还以为他是报功心切，安慰他说：“马上就到，南京方面一接到电报，一定会大喜过望，恭候先生光临。”

顾顺章一听“电报”二字，犹如兜头一盆凉水，继而急得捶胸顿足，颓然哀叹：“这就糟了，抓不住周恩来了。”蔡孟坚见状，不解地问：“为什么？”顾顺章回答：“你们调查科徐恩曾身边有共产党。船太慢了，快换成飞机。”即使在这种情况下，顾顺章依然没有说出钱壮飞的名字，不肯过早地打出这张邀功的“王牌”。

但蔡孟坚还是坚持把顾顺章押上兵舰，只是自己改变计划，先乘飞机到达南京，报告顾顺章被捕经过。上飞机前，他又发出一份密电，告知南京，

徐恩曾左右有共产党，顾顺章叛变之事切勿外传。

然而，一切都已为之晚矣！

当何成濬和武汉特务机关报告顾顺章被捕叛变的电报送达南京的时候，已是4月25日——星期六的晚上，徐恩曾早已到上海找姘头去了。

这天夜里，钱壮飞一直坐在南京中山东路5号徐恩曾的特务机关“大本营”里。他接连收到从武汉发来的六封特急绝密电报，电报上都注明“徐恩曾亲译”的字样。钱壮飞想，是什么事这么急迫呢？前面说过，钱、李已经设法搞到了徐恩曾和国民党高级官员通报用的密码本。钱壮飞想到这儿，就趁徐恩曾此时不在，偷偷地将电报译了出来，方才知顾顺章已经被捕叛变，要和敌人勾结起来破坏我们整个党中央机关。

何成濬的电报，是发给国民党中央党部徐恩曾转秘书长陈立夫的（当时陈任国民党常务委员会秘书长），电报的主要内容是：

第一封说黎明（顾顺章的化名）被捕，并已自首，如能迅速解至南京，三天之内可以将中共中央机关全部肃清；

第二封说将用兵舰将黎明解送南京；

第三封说据黎明供，兵舰太慢改用飞机解送南京。这个电报还讲，无论如何，这个消息不可让徐恩曾左右的人知道。非此，将上海中共中央机关一网打尽的计划必完全落空（实际上，敌人仍用兵舰将顾顺章解至南京）。

.....

钱壮飞译完这些电报，心情异常紧张。他虽然没有见过顾顺章，但清楚地知道顾顺章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中央特科主要负责人之一，对上海的中央机关及中央领导人的住址了如指掌，对中央特科的秘密工作方式也一清二楚。因此顾顺章的叛变，无疑是将党的中央机关和负责人全部暴露在敌人面前。情况万分危急。但钱壮飞还是沉着地看完了电报的内容，记下了电文，又不留任何痕迹地把原电封好。

面对这千钧一发的危局，钱壮飞在考虑该如何去应付。根据电报的内容，敌人将用飞机解送顾顺章来南京，至迟明天晚上（即26日）或后天早上（即27日）即可到达，蒋介石和陈立夫再对此作一番部署，也需一些时间，但不会很长。敌人一旦了解了真情，当然不肯放过这一良机，因而4月27日敌人极有可能在上海进行大搜捕。时间刻不容缓，必须尽早将情报送出去。想到此，他急忙翻出列车时刻表，发现当晚还有一班特别快车，20点开，明早6点25分到上海，这是除坐飞机外，从南京到上海的最快速度了。但派谁去好呢？经过急速的周密思考，决定先派他的女婿刘杞夫连夜坐特别快车到上海，把这一有关党的生命安危的情报交给李克农转报中央。他自己则暂且留下，看看动静再说。因为李克农曾经对他说过：“伍豪（周恩来的化名）一再叮嘱，你这个位置来之不易，不到万不得已，不得暴露。”

由于明天（即4月26日）是星期天，刘杞夫是否在明天一定能找到李克农，他不敢保证，万一不能按时找到，后果将不堪设想。他送走刘杞夫后，曾经考虑自己要不要离开南京的问题。

紧迫的时间已不容他再做更多的考虑，但他又不忍心使自己和战友们在南京、上海茹苦含辛、历尽艰险所创造的这个局面，顷刻间被敌人全部毁掉；加上受当时秘密工作条件的限制，他对顾顺章这个人的整个情况并不十分了解，所以迟迟下不了走的决心。可是经全面的分析、冷静的思考，他最后还是决定赶快离开南京。为了不给徐恩曾留下任何把柄，他迅速做好善后工作，

将银钱账目清理好，放在钱柜里。

天亮以后，他到“民智通讯社”通知他安置在那里的一位同志赶快离开。但没有见到人，他便拿起桌子上的一张地图，用约定好的暗号，在地图中间用刀子划了一道缝，表明今后要“切断”联系。

次日清晨（4月27日），他若无其事地把电报亲自交给徐恩曾，然后像往常一样，装做回家休息的样子，从容不迫地离开了“大本营”，登上返沪的列车。临行前，他在自己的办公桌上给徐恩曾留下一封信，警告对方，如果徐恩曾胆敢加害他的子女，他将把掌握的徐恩曾的所有秘密公布于世。在到上海的途中，为防止出事，他到真如就下了车，然后步行进入市区。

刘杞夫于4月26日清晨到达上海，在一家旅馆里找到李克农，把顾顺章在武汉被捕叛变的情况，详细地做了汇报。由于事情发生得太突然，且事关重大，刘杞夫当时神色极为紧张，李克农虽然也深知此事的分量，但毕竟是在秘密工作战线上工作有年的同志，因此，他极力使刘杞夫冷静下来，劝慰他说：“你为什么这么沉不住气，这么不沉着！”李克农嘴里这么劝着刘杞夫，心里又何尝不热浪翻滚，但他必须沉着、冷静，处变不惊，才能妥善地处理好这一突发事件。

在这一时刻，李克农首先考虑的是党中央及战友的安全。他想到钱壮飞机智地送出情报，自己却仍处于险恶境地，十分担心。因他与钱壮飞的交往已非一日，他相信钱壮飞能够作出正确的判断，采取果敢的措施。但当刘杞夫提出要回南京时，一向果断干练的李克农却十分犹豫起来，钱壮飞还不知是否脱离险境，刘杞夫又再入虎口，怎能不让人忧心忡忡。李克农考虑再三，最后还是同意了刘杞夫的要求，因刘杞夫的妻子钱椒还在南京。分手之时，李克农紧紧握着刘杞夫的手说：“此行可能凶多吉少，遇事要英勇沉着。”送走刘杞夫，他开始考虑怎样把这份十万火急的情报送到中央负责人手里。

这天是星期天（即4月26日），不是他和陈赓接头的日子。但这事绝不容等，晚一秒，党中央及同志们安全就会增加一分危险。他正在想着如何去找陈赓，忽又转念一想，陈赓是一个人，行踪不定，找他肯定要花费较长的时间，而江苏省委总不会随时都在挪动吧？对，去找江苏省委，只要找到江苏省委，就能找到陈赓，找到党中央，找到周恩来。

李克农立即行动起来，急而不乱，想方设法找到江苏省委，通过江苏省委找到周恩来，马上将情况详细向周恩来作了汇报。

时间紧急，周恩来在陈云等人的协助下，以惊人的机智与果敢，领导陈赓、李克农、李强等特科工作人员，抢在敌人前面，跟敌人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搏斗。

周恩来同志当机立断，马上召集有关人员举行紧急会议，采取一系列应急措施，全力粉碎敌人破坏我党的罪恶阴谋：

第一，对党的主要负责人做周密的保卫和转移，把顾顺章所能侦察到的或熟悉的负责同志的秘书迅速调换新手；

第二，对一切可以成为顾顺章侦察目标的干部，尽快地有计划地转移到安全地带或调离上海；

第三，审慎而又果断地处置了顾顺章在上海所能利用的重要关系；

第四，废止顾顺章所知道的一切秘密工作方法，由各部门负责实行紧急改变。

当天夜里，中共中央和江苏省委以及共产国际派驻上海的机关全部搬了

家。同时由陈赓负责从各方面进行调查，以便及时采取措施，准备反击。李克农等在周恩来的直接指挥下，昼夜紧张战斗，迅速妥善地保卫了党中央和江苏省委机关的安全，赢得了宝贵时间，终于抢在了敌人的前头，粉碎了他们的阴谋。

星期一（4月27日），顾顺章才被敌人用兵舰解到南京，蒋介石立即召见他。这个无耻的叛徒，不仅将自己所知有关中共中央的秘密全部供出，而且勾结敌人布置了一个将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一同打尽的大阴谋。徐恩曾当即派调查科情报股总干事张冲、党派组组长顾建中带领大批特务人员，连夜赶往上海，会同上海英法捕房执行这个罪恶计划。

星期二（4月28日）早上，一场疯狂的大搜捕在上海开始了。当时各机关安全搬家后，为了了解敌人的搜捕情况，中央电台留下专门人员在附近观望，看到电台原址被抄了，随后，周恩来同志原来的住处也被搜查。敌人行动虽然很快，但到底还是来迟了一步，在上海的中共中央机关早已转移，中央领导人也早没了踪影。敌人妄想一网打尽我党领导同志的罪恶阴谋彻底破产了。

事实证明：钱壮飞同志提供的情报是正确而及时的，李克农向中共的转达是神速的，党中央的对策是英明、果断的。在关系中国共产党前途命运的紧急关头，钱壮飞、李克农对保卫中央机关和中央领导人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因此他们得到了中央的嘉奖。

钱壮飞安全回到上海后，周恩来让陈赓把他安置在一个同志的家里，对他的家属也作了妥善的安置。星期一晚上，李克农给在天津的胡底发了一封电报，“潮（钱壮飞的别名）病重速返”，暗示局势严重。胡底接到电报，也立即赶回上海。由于李克农平时出面活动较多，许多特务都认识他，所以也暂时隐蔽起来。但是南京的交通机关遭到破坏，刘杞夫、钱椒不幸被捕。或许是钱壮飞离开南京时给徐恩曾留下的那封信起了作用，加之当时国民党特务组织内部不同派别之间互相倾轧，矛盾尖锐，斗争激烈，徐恩曾害怕他的秘密被真的公布，所以将刘杞夫、钱椒关押了三四个月后无罪释放。钱壮飞在上海的家人，由于及时得到李克农的通知，早已做好了准备。星期二敌人开始大搜捕时，国民党当局派了一卡车警、宪到法租界钱壮飞的家里去搜查，其爱人张振华机智地应付了敌人的搜查，家里只剩下钱壮飞的老母亲。敌人只好去纠缠老太太，追问钱壮飞的下落。他们欺骗老人说，钱先生已经回到上海，找他别的事情，只是有一笔很大数目的钱财，只要他签个字就属于他的了。老太太根本不知道钱壮飞已经回到上海，更不清楚他在什么地方。敌人无计可施，只得悻悻而去。

叛徒顾顺章，本想通过出卖中共中央机关、中央领导人及其他革命同志，作为向蒋介石邀功请赏的资本，没想到竹篮打水一场空。但他不甘心他的阴谋破产，狗急跳墙，亲自跑到监狱，将关押在那里的恽代英同志出卖，随后又相继出卖了邓演达和杨登瀛。

恽代英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领导人之一。李克农在芜湖时曾受到过他的很大影响。1930年4月19日，当恽代英带着宣传文件走在马路上时，突然碰上特务搜查，他因回避不及，机智地抓毁自己的面容，化名王某，以致在监狱中一年多未被敌人认出。他先被关进漕河港模范监狱，后被解到苏州军人监狱，以后又转到南京军人监狱。国民党军官中有些是他教过的黄埔军校的学生，他们根据口音谈吐虽然知道是他，但由于过去受过恽代英的教育，

竟互相密誓，决不泄漏。所以他仅被判二年有期徒刑。1930年8月周恩来从国外回来后，曾设法营救。同时，陈已通过高等法院法官的地下关系，讲定提前释放。不料在恽代英行将出狱时，突然被顾顺章认出出卖，第二天（4月29日）即被国民党杀害。

杨登瀛是中央特科发展起来的一个十分重要的反间谍关系，曾在历次重大事件中起过至关重要的作用。1931年4月底也被顾顺章出卖而被捕。但由于杨登瀛始终没有供出他和中共特科的工作往来情况，敌人抓不到把柄，加之他与张道藩的特殊关系，所以被关了半年多，就由张道藩保释出狱。

顾顺章初到南京时，原拟亲自到上海实施破坏党的罪恶计划。周恩来当即指示陈赓在火车站部署力量，准备等顾顺章一下火车，即将其明正典刑，让他措手不及。但顾顺章深知自己对党犯下的滔天大罪，更清楚我们的同志绝不会放过他，所以不敢来上海。

同年12月1日，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临时中央政府主席毛泽东发布通令，通缉顾顺章这个罪大恶极、危害革命的叛徒，号召革命军民将其缉拿归案，给予应得的惩处。

顾顺章叛变后加入了蓝衣社，因为他在国民党内闹派别，拉山头，结果于1935年在特务头子陈立夫的枪下毙命。

在这场与叛徒顾顺章及强大的敌人作斗争的惊涛骇浪里，有赖于大智大勇的钱壮飞、李克农的情报的传送，有赖于党中央的英明果敢，有赖于同志之间互相关怀、团结一致的革命精神，胜利地扑灭了这场灾难，保住了党中央机关，并使我地下党在危局中完整地保存下来，且在短时间内稳定下来，继续在白色恐怖日趋严重的上海进行工作，创造出一个惊人的历史奇迹。

但是，由此引起的内部收缩，还是给党带来了不可估量的损失。三年多冲破重重困难、在敌人内部逐渐建立起来的力量，大部分遭到破坏。许多好不容易打入敌人内部的同志，不仅无法继续工作，而且在上海也难以存身。李克农、钱壮飞等，相继离开上海，转到中央红色区域；胡底则转到鄂豫皖红色区域（后在长征途中因发高烧时流露对张国焘的不满，被张派人秘密杀害），中央特科负责电讯机要工作的李强，由组织决定1931年5月经天津、东北到了莫斯科。陈赓在周恩来的安排下，先赴天津，后又转到鄂豫皖苏区。同年12月上旬，周恩来在妥善安置其他同志后，亦离开上海，进入中央苏区。

## 宋时轮戎马生涯中的辉煌篇章

雷渊深  
宋任远  
穆俊杰

宋时轮（1907～1991）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原名宋际尧。湖南省醴陵县黄村人。1926年考入黄埔军校学习，同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次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萍醴边区游击队队长，湘东南第2纵队政治委员，红军学校第4分校校长，红35军参谋长，独立第3师师长，红21军参谋长兼第61师师长，中央苏区西方军参谋长，红军大学教员，军委干部团教员，红15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红30军军长，红28军军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20师第358旅第716团团团长，雁北支队支队长兼政治委员，第4纵队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津浦前线指挥部参谋长，山东野战军参谋长，北平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执行处处长，渤海军区副司令员兼第7师师长，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司令员，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司令员，淞沪警备区司令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委员会委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9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志愿军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高级步兵学校校长兼政治委员，军事科学院副院长、院长，中央军委教育训练委员会主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总编辑委员会副主任、军事卷编辑委员会主任，中国军事百科全书编审委员会主任，中央军委战史、军史编审委员会副主任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他是中国共产党第八、十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届中央委员。1982年、1987年被选为中共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1年9月17日在上海病逝。

\* \* \* \* \*

宋时轮同志一生经历丰富多彩，是我军一位武文兼备、军政全才的高级将领。他经历过中国革命的各个历史时期。特别是在全国解放战争中，他不仅曾在烽火连天的战场上率领千军万马叱咤风云，而且还在北平参加过尖锐复杂的同美蒋的谈判斗争。本文记述的就是他戎马生涯中的几个辉煌片断。

### 北平谈判 锋芒展露

1945年冬，寒冷的北风呼啸，皑皑的白雪覆盖了北国大地。抗日战争胜利不久，饱经战祸的中国人民又面临严重的内战危机。国民党反动派为了抢夺胜利果实，消灭中国共产党，悍然向我党领导的解放区发动了疯狂的进攻，再次将中国人民推向了战争的深渊。广大群众实在忍无可忍，纷纷发出了要求和平、民主，反对内战、独裁的呼声。中国共产党顺应历史潮流，代表民众意愿，及时发表了《对目前时局的宣言》，提出了和平、民主、团结的口号，获得了全国人民的拥护和支持。此时，国民党发动内战的准备尚不充分，蒋介石被迫同意于1946年1月10日在重庆召开了政治协商会议，并于同日与中国共产党签署公布了《关于停止国内军事冲突办法的协议》和《关于停止国共冲突的命令和声明》。

为了监督和保证停战令的实行，国共双方商定在北平成立有中国共产

党、国民党政府和美国代表参加的军事调处执行部，在重庆“军事三人小组”的领导下进行军事调处工作。军调部由三委员领导。三委员分别是中国共产党代表叶剑英、国民党政府代表郑介民和美国政府代表饶伯森。美国政府代表任三委员会会议的主席、召集人，但无仲裁和决定权。三委员各有表决权，一切问题均需由三委员协商决定。军调部的主要任务是：通过三方谈判，调处国共军事冲突，保证恢复交通，解除敌伪武装，遣返日俘日侨归国，整编国共军队，处理与和平有关的问题。其中，首要任务是军事调处。

确定成立军调部以后，三方立即根据协商达成的决定，迅速选调人员赴北平工作。

1946年1月下旬，当时任山东野战军参谋长的宋时轮，遵照上级的决定，由临沂去徐州，转乘飞机赶赴北平参加军调部的工作。经过长时间夜以继日的紧张战斗，真需要有片刻的宁静和休息。但宋时轮登机后却毫无倦意，他没有合上双眼稍事歇息，而是凝神望着飞机舷窗外的白云向飞机身后飘过。他心潮起伏，憧憬着即将投身的新的斗争环境，心情既紧张，又兴奋，久久难平。他翻想着参加革命20年来的斗争历程，虽然经历过无数次战场上血与火的考验和在国民党牢狱里整整两年的复杂斗争，他没有辱没党的光辉形象，每每均向党交出合格的答卷，只是尚没有与国民党和美国代表进行面对面谈判的经验，此次能否不辜负组织的重托，圆满完成领导赋予的任务，总觉得心里还不是十分有底。这时，他多么希望飞得更快一些，早点赶到北平，聆听叶剑英的指示，熟悉即将投身的新的战斗环境啊！飞抵北平后，他没有休息，立即来到北京饭店2楼112房间，向叶剑英报到并请示工作。叶剑英见宋时轮到来，非常高兴。两人经过简短寒暄，谈话立即转入正题。宋时轮首先向叶剑英谈了组织上委派他来军调部工作的决定，接着根据叶剑英的提问，简要地汇报了山东方面敌我军事斗争的形势。以后，他没等叶剑英开口，便迫不及待地询问军调部的工作情况和自己即将担负的工作。叶剑英微微地笑了，亲切他说：“你真是个急性子啊！一听说有任务，就恨不得立即进入情况，马上投入斗争。”随即向宋时轮介绍了军调部的组织和任务，前段斗争的情况和经验，以及这项工作的重要意义、有利条件和困难。告诉他，领导决定任命他为军调部我方执行处处长，与李聚奎副处长共同负责执行处的工作；为了统一着装，工作方便，授予他少将军衔。并对他说，执行处是协助领导做好军调工作的一个主要部门，组织上希望他全力以赴把这项工作做好。听了叶剑英的话，宋时轮虽然感到面临的斗争十分复杂，自己肩负的担子非常沉重，但同时也进一步了解了军事调处的意义，增强了做好工作的信心。他和往常一样，在艰巨的任务面前，首先想到的不是个人今后可能遇到的艰难危险，而是党的事业和当前斗争的迫切需要。他决心立即全身心地投入斗争，团结全处同志，努力做好工作。他对叶剑英说：“离开临沂时，我曾向陈老总（陈毅）说过，困难我不怕，但是自己缺乏外交谈判的经验，担心做不好工作，影响大局。不过，有党中央、毛主席的正确方针和指示，有‘参座’（叶剑英）的直接领导，有全国人民的大力支持，有同志们齐心协力的工作，我一定努力完成任务，绝不辜负组织的重托。”听完宋时轮的表态，叶剑英高兴他说：“好！我就喜欢你这个痛快劲。你来自前线，熟悉一个战区的情况，对我们解决山东问题有帮助。你是老同志，有文化，懂政策，口才也好，相信你一定能很好地领会党中央、毛主席的指示，团结和带领全处同志，努力做好执行处的工作。”

这次谈话还使宋时轮进一步加深了对叶剑英的认识和仰慕。他感到这位具有“儒将风度的参座”，确是一位才思敏捷、善于总结斗争经验、遇事胸有成竹的好领导。我方代表团在他的领导下，一定能圆满完成党赋予的任务。

谈判桌也是战场，一经投入，便随时都会面临刀光剑影的较量。

1946年2月上旬，宋时轮刚到职不久，便投入了有关我方代表到位时间问题的斗争。

根据三方协商达成的决定，各方代表到位的截止时间均为1946年1月26日，但在此限期届满时，我方的代表尚未全部到齐。美、蒋方面立即抓住这个问题，对我方大肆进行诬蔑、攻击，说我方对停战调处“不积极”，“故意拖延时间”，“别有用心”。针对这一情况，我方决定迅速予以反击。宋时轮根据叶剑英的指示，召集执行处的同志进行研究，确定抓住适当机会，澄清事实真相，揭穿敌人阴谋。在得到领导同意后，他立即多方搜集有关资料，分析研究三方代表到位快慢的主客观原因。他发现，主要原因在于，我方对谈判态度认真，选调代表要求很高，必然花费时间多；国民党方面则是利用现成的特务机构，所需人员大多可以随要随到。他立刻敏锐地感觉到，这正是问题的要害所在。只要抓住这一点，把情况彻底揭开，加以对比，双方对谈判所抱的目的和所持的态度就会不言自明，美、蒋方面也就不敢再利用我方代表到位时间稍慢的问题大做文章。于是，他决定：一面继续深入了解国民党政府代表的政治面貌及其来军调部工作的秘密使命；一面耐心等待，注意寻求战机。这一天终于到来了。在一次三方执行处会议上，宋时轮抓住美方利用这个问题再次对我进行指责的机会，立即给予反击。他首先指出我方选调人员稍慢一点的客观原因：部队比较分散，通信和交通工具缺乏。接着详细对比了国共双方对选调人员的主观态度。他说：我方选调来军调部工作的人员都是各地区、各部队的领导干部，如委员叶剑英是我军的副总参谋长，顾问饶漱石是我华东军区的政治委员，参谋长罗瑞卿是我晋察冀军区的副政委，临汾小组我方代表陈赓是北伐军和八路军的名将……。这说明我方对进行军事调处、争取实现和平是诚心诚意、认真负责的。这样选调人员，自然需要花费较多的时间。而国民党方面选调来军调部工作的人员绝大多数是军统局和军令部二厅的特务。如委员郑介民是军统局的副局长和军令部二厅厅长，是搞特务活动的老手；顾问郭子明是军统局中共研究科科长，也是个老牌特务；其他代表邹陆夫、黄长新、黄维勤、胡屏翰、肖凤岐、董承烈、潘志民、黄新界、涂叙玉、温一和等，也都来自军统。在这样现成的机构里选调人员，当然可以随要随到。但是，选调这样一些人到军调部来工作，对军事调处所持态度，用意何在？恐怕是不言自明的吧！国民党方面没有理由对我方选调人员的速度和对谈判的态度进行攻击，美国方面更没有理由就人员到位时间问题对我方进行指责，更何况我方已在积极克服困难，迅速调齐来军调部工作的全部人员。

这一反击十分有力，说得美、蒋方面人员面红耳赤，哑口无言。“军事三人小组”美方代表马歇尔也不得不承认，蒋介石派出以郑介民为首的大批特务到军调部充当代表，给中共的反击提供了口实，是非常愚蠢的。从此以后，美、蒋方面便再不敢提这一问题了。

在军事调处工作中，国民党政府代表还经常制造一些假情报，诬蔑我军违反停战协议，向他们的部队挑衅、进攻；有时甚至用贼喊捉贼的伎俩，把他们部队挑起的事端转嫁到我军身上。为了在会谈中辨明这些问题的真假是



非，有理有利有节地进行斗争，要求执行处必须及时、准确地掌握有关的情报。这是宋时轮到职后面临的又一项重要任务。

宋时轮十分重视搜集整理情报的工作。他认为，在战场上，情报是指挥员赖以定下决心、作出部署、争取胜利的基本依据；在谈判中，情报是我方代表判断是非、揭露敌人、维护我方利益的有力武器。我方执行处能够及时提供准确的情报，才能为叶剑英委员和罗瑞卿参谋长等领导同志当好助手。他向领导建议，在执行处内设立情报科，任命安东为科长，从以下6个方面开展搜集情报的工作：一是搜集我军各战略区、各部队发来的战报；二是搜集各执行小组我方代表上报的军事调处报告；三是搜集我地下组织和统战工作部门获取的情报；四是利用军调部的合法组织，指派一部分同志进入国民党控制的重要城市，建立通信联络，进行搜集情报的工作；五是搜集国民党报刊上公布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方面的消息和言论；六是多方了解国民党部署在内战前线部队的各种情报以及他们调动部队、偷运军火、构筑工事等方面的最新消息。然后，及时把这些情报集中、分类，进行整理，提供给叶委员、罗参谋长和其他处的代表，供他们使用，同时上报中央。

由于执行处的情报工作做得好，及时掌握了有关军事冲突地区的斗争情况和国民党部署在内战前线部队的动向及其企图，在会谈中，我方代表发言有理有据，斗争十分有力；国民党政府代表处境非常被动，阴谋无法得逞。据不完全统计，1946年从1月中旬到5月31日，我方利用掌握的准确情报，在各次会谈中，先后揭穿了国民党方面捏造的假情报共109件，及时戳穿了他们在军事上和政治上的阴谋；从2月9日到5月22日，在我方向美、蒋代表提出的备忘录和抗议书中，就有351件是有关停战问题的。这不仅有力地揭穿了国民党政府假和平真内战的伪善面目，还促使军调部发出了第六号特别指令，指出了当时存在捏造假情报的问题，并作出了要严惩责任者的规定，为保证谈判顺利进行和我方斗争取胜作出了重要贡献。

国民党“内战灭共”的方针早已确定，答应谈判停战只是企图欺骗民众、转嫁罪责，以达到其反动目的的一种手段。因此，在谈判期间，必然会出现边谈边打的局面。及时向有军事冲突的地区派出由三方代表组成的执行小组，调查争端情况，制定相应协议，保证实现停战，是军调部内国共双方代表经常斗争的一个焦点，也是我方执行处必须做好的一件工作。

根据叶剑英的指示，宋时轮组织执行处的同志多次讨论这一问题，研究并提出解决这一问题的多种方案，分析各种方案的利弊，最后决定向领导建议：不仅要争取向有军事冲突的地区派出执行小组，进行调解，制止冲突，而且应力争向我军力量薄弱的重要地区、敌军有重兵集结和有可能向我发动进攻的地区，尽早派出执行小组，以预防争端的发生；如果出现美方代表偏离中立立场，站在国民党政府代表一边，企图以多数压少数的办法迫我就范的情况，我应按有关协议规定，坚决使用否决权，绝不能让他们的阴谋得逞。这个意见经领导研究同意后，宋时轮立即多方搜集有关资料，认真准备发言提纲。在每次会谈中，他一面以大量的事实和充足的理由，阐明我方要求的合理性、必要性；一面有理有据地驳斥对方的无理要求，揭穿其阴险目的。对美方代表则采取又拉又斗的策略，及时鼓励他们坚持公正立场的点滴表现，对他们偏离中立立场的言行作坚决的斗争。经过半年的努力，我方取得了很大的胜利，促使军调部根据我方的要求，在1946年1~6月期间，先后向赤峰、太原、沁县、广州、汉口、新乡、承德、大同、沈阳等地区派出了

29 个执行小组。这对保证停战令在一段时间内得以贯彻实行发挥了重要作用。

1946 年上半年，东北战场硝烟滚滚，炮火连天，是敌我双方争夺的一个重要地区，也是军事调处的一个重要方向。东北形势的发展直接关系到全国时局的发展。在此期间，宋时轮对东北的军事调处一直十分关注，并积极协助领导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这年 1 月停战令颁布后，国民党坚持东北不在停战范围之内，声称东北只存在接收主权的问题，而无军事调处可言。他们还强调停战令附注中有关于“例外”的规定，说明他们的军事行动是有根据的。为了戳穿国民党政府代表的谬论，宋时轮再次仔细地研究了停战协议、命令及其有关的附注。他很快发现，事情的关键在于所谓的“例外”问题。国民党政府代表有意把附注中规定的停止军队调动的“例外”，说成是停止军事冲突的“例外”，企图混水摸鱼，为其对我军的军事进攻披上合法的外衣，最后达到独霸东北的目的。在三方执行处长会议讨论东北问题时，他根据叶剑英的指示，多次义正词严地驳斥了国民党政府代表的上述谬论，揭露了他们的阴险目的，并清楚地阐明了我党的原则立场。他指出：停战令附注中规定的“例外”，不是指停止军事冲突的“例外”，而是指停止军队调动的“例外”。所有军事冲突都必须一律停止，东北应该执行停战令，派执行小组前往监督停战。国民党政府可以调动军队去原苏军驻地接收主权，但不能以此为借口进攻我军和解放区。而且接收东北的主权是中国人民和一切抗日武装都有的权利，国民党政府也不能独霸。同时，他大力组织执行处的同志和指导各地执行小组的我方代表及时搜集并上报与东北军事调处有关的情报，为东北的军事调处出谋献策，供我方领导参考。他还经常与东北我方代表保持联系，了解当地的斗争情况，及时向叶剑英等领导同志反映，积极为东北我方代表提供力所能及的帮助。

由于我方谈判代表的坚决斗争、东北我军对国民党进犯军的英勇抗击和国内外舆论的强大压力，东北停战问题终于获得了暂时解决。国民党政府被迫于 6 月初宣布了东北实行休战的决定，使东北地区在全面内战爆发后仍保持了一段相对平静的时期。

1946 年上半年，中原地区撤军问题是国民党发动全面内战的导火索。宋时轮也十分关注这一方向的斗争。

宋时轮认真研究了中原问题斗争的情况。他发现，双方长时间争论的一个焦点是停战令公布后中原我军应不应该撤往其他地区。我方为了减少扩大内战的危险，坚持要求将我军部队迅速撤出中原；国民党为了抓住这个扩大内战的口实，坚持不让中原我军撤离，企图伺机借以挑起事端。宋时轮分析了双方在中原问题上争论的根本态度和动机后，决定仔细查阅有关的文件、规定，用以说明我方要求的合理性，戳穿国民党方面的阴险图谋。在准备充分以后，他立即抓住有利时机，在会谈中就中原问题多次发言。他指出：依照国共《双十协定》和整军方案规定的精神，停战令公布后，中原我军应迅速撤往其他地区。但是，国民党政府拒不执行这些协定和规定，不但坚持不让中原我军转移，而且以重兵相包围。这是企图以此为导火索，把战火由关外引向关内。这是破坏停战协议、继续扩大内战的一个十分严重的步骤。国民党政府应立即停止这一阴谋活动。美方代表也应采取有效措施，迅速制止事态扩大。由于这些发言有理有据，触及了国民党方面的要害，迫使他们不得不认真考虑我方的要求。5 月，在三方签订《汉口协议》后，宋时轮又根

据叶剑英的指示，对该协议的实行问题，在军调部内同国民党政府代表和美国代表进行了卓有成效的交涉和磋商，及时消除了国民党政府代表设置的一些障碍，促使他们较快地履行了《协议》的各项规定，从而使中原问题得到部分解决，保证我中原军区于5月中旬安全地转移了2000余名伤病员、非战斗人员和部分地方干部。这对暂时缓和中原地区的形势，推迟全面内战的爆发都具有一定的积极作用，对我军后来的作战也是很有利的。

1946年上半年，军调部内对调处广东东江地区的军事冲突一直存在着激烈的争论。宋时轮到职不久，也很快投入了处理这一重大、困难问题的斗争。

战斗在东江地区的东江纵队，是我军一支远离华北和华中解放区、独立进行艰苦奋斗的部队。停战令公布后，国民党军队不但没有就地停止战斗，反而更加频繁地对他们发动进攻。军调部内的国民党政府代表和国民党进犯部队的头目都声称：广东只有零星“土匪”和伪军残余，没有中共部队，不存在军事调处问题。为了驳斥国民党政府代表的这一造谣、诬蔑，宋时轮四处奔走，搜集资料，为叶剑英委员和罗瑞卿参谋长谈判作准备。在参加这一问题谈判时，他以大量铁的事实，说明东江纵队是我党领导的一支在抗日战争中建立过功勋的部队。他历述这支部队在8年抗战中活跃于广东敌后，在打击日伪军、救授港九同胞、援助香港文化界人士以及支援英美军对日军作战等方面创建的卓越功绩；指出国民党政府代表所谓的“广东无共军”，完全是捏造的谎言，其目的在于以此来掩盖他们消灭东江纵队的罪恶企图。在铁一般的事实面前，国民党代表理亏词拙，嚣张气焰不得有所收敛。

由于我方坚持斗争，3月底，“军事三人小组”终于作出决定，将东江纵队撤出广东，并派一代表团到广州，协助军调部派驻广州的执行小组与国民党政府广州行营的代表会谈。4月1日，达成了关于东江及粤北共产党部队乘美舰去山东烟台的协议。接着，军调部连续举行了两次会议，讨论东江纵队撤离时的安全保障和后勤供应经费等问题。在这两次会谈中，宋时轮又积极协助我方与会领导同志据理力争，使上述问题较快地得到了解决。此后不久，东江纵队便按照指定的位置集中，除复员1700名战士外，其余2500人由曾生司令员带领，于6月底乘美舰去了烟台。东江纵队问题的圆满解决，是我党在谈判斗争中取得的又一个重要胜利，也是宋时轮在军调部工作中值得称道的又一项重要业绩。

军调部的斗争十分尖锐复杂，不仅表现在谈判桌上，而且也反映在谈判前后和谈判会外。每当遇到对方有意制造阴谋，挑起事端的时候，宋时轮总能敏锐地看清问题的实质，有力地给予回击，恰当地作出处置。

1946年3月上旬，在一次三方执行处会议上，当勤务人员送上咖啡，宋时轮刚放糖时，美方代表伊利上校突然恶意进行嘲弄，阴阳怪气地对宋时轮说：“将军，你放那么多糖，不怕把牙齿硌掉吗？”听了伊利的話，美、蒋方面与会人员都哄堂大笑，我方在场人员个个怒不可遏。宋时轮敏锐地觉察到，这又是一次蓄意挑衅，必须给予回击。于是，他马上拍案而起，把盛满咖啡的杯子猛推到伊利面前，然后指着伊利的鼻子大声说：“上校，你的话是对中国人民的侮辱。咖啡我愿喝就喝，糖我愿放就放。喝多少咖啡，放多少糖，都有我的自由，你有什么权力嘲弄我？你要知道，这些咖啡和糖不是你们美国恩施的，而是用庚子赔款、也就是用中国人民的血汗买来的（当时协议军调部的费用由庚子赔款中支付）。现在我不愿喝了，就请你喝吧。但是，我要提醒你，中国人民不可侮。你们现在还想用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时的

蛮横霸道来对待我们，那绝对办不到。”听了宋时轮这番话，美、蒋在场人员顿时大吃一惊，惶惶然不知所措。伊利更是狼狈不堪，只好装出笑脸赔礼道：“将军，我是说笑话的，没有恶意。请原谅！”宋时轮这一大义凛然的反击，表现了伟大中国人民不可侮的凛然正气，立即成为军调部内一桩脍炙人口的美谈。

1946年4月3日凌晨3时，国民党北平地方当局出动200多名武装警察、密探，以查户口为名，闯入宣武门外方壶斋9号和西四三道栅栏41号，将我新华社分社代社长兼《解放报》总编辑钱俊瑞、报社临时发行处经理部副主任马幢民等44人强行带走，然后分别扣押于梁家园警察外二分局和西城警察内四分局。这就是曾经轰动故都北平的“四·三”事件。

事件发生后，宋时轮和李聚奎被分别派到两个警察分局慰问我被捕人员。宋时轮受领任务后，立即带领几名工作人员乘车赶到西城警察内四分局。值勤的警察看到佩戴少将军衔的宋时轮步入分局，不敢阻拦，只好紧随其后观察动静。宋时轮见到我方被捕同志后，立即上前与他们一一握手问好，并说明他是受叶剑英的委派来慰问大家的。接着，他宣读了我方代表团给被捕同志的慰问信，并慷慨激昂地说：“同志们，你们是无辜的。现在就安心呆在这里，等待解决问题。我们要与践踏人权和言论自由的法西斯分子斗争到底，迫使他们赔礼道歉，释放你们。不达目的，绝不罢休！”这时，站在旁边的一名警察嗫嚅地说：“请先生讲话客气一些。”宋时轮听到后立即转过身来，愤怒地说：“你们违反军调部‘三委员’达成的新闻协议，无故把我们的人抓来，戴上手铐，关在这里，这叫什么客气？”那警察听了无言以对，只得灰溜溜地走开了。站在后边的另一名警察也不敢再吭一声，相继离去。这时，我方被捕人员个个义愤填膺，振臂高呼：“反对非法逮捕，取消特务机关！”“反对法西斯暴行，为和平民主奋斗到底！”宋时轮大义凛然的气势，有力地鼓舞了我方被捕人员的斗志。

由于我方代表团的有效斗争、新闻媒体的大力宣传和北平民众的同情声援，“四·三”事件的影响不断扩大，警察分局已无力处理此事，将我方被捕人员转送北平警察总局。

4日下午，宋时轮又随罗瑞卿到警察总局进行交涉。看到我方来人，警察总局出来一些警察，站在一旁进行监视。罗瑞卿转脸望着他们，大声说：“告诉你们局长，军调部中共参谋长和执行处长来了，要他出来讲话。”不一会儿，身穿黑色警服的北平警察总局局长陈焯出来了。他看到面前站着两位将军，立即上前行礼，说：“卑职就是陈焯。”

罗瑞卿当即严词责问：“你们为什么非法逮捕我们的人？”陈焯以检查户口和维护治安为由进行狡辩。

宋时轮没等陈焯讲完，便指着他的脸大声问：“我们的人在北平违犯过治安法规吗？”陈焯答道：“没有。”“那你们为什么要抓他们？”陈焯默然。接着，宋时轮对陈焯斥责道：“你们警察局随便抓人，违背了你们政府在政协会上宣布的‘四项诺言’。”“现在军调部正在调处国共双方的军事冲突，为实现和平、民主、团结而努力。难道你们要做破坏和平、民主、团结的罪人！”宋时轮这番话言之有据，掷地有声，罗瑞卿立即给予肯定，陈焯听了只好连连点头说：“是，我们不做这样的罪人。”

正在这时，叶剑英委员、滕代远副参谋长和北平市市长熊斌会谈结束后一起来到了警察总局。熊斌来后，立即对陈焯说：“快把抓来的人都放了。”

陈焯听了上司的指示，心领神会，马上走到我方被捕人员面前，假装心有愧疚地说：“诸位受委屈了。我曾对叶剑英委员说过，这次检查户口，本来问清情况就可以了，是分局的人办事无能、处置不当，弄成现在这个样子，实在是对不起大家。请诸位原谅！相信以后绝不会再发生此类事件。”

在陈焯赔礼道歉后，我方被捕人员在叶剑英、罗瑞卿、滕代远和宋时轮等陪同下，于4日下午6时乘车离开警察总局，沿途高呼口号，胜利返回翠明庄住地。

不久，军调部中共代表团罗瑞卿、宋时轮等直闯警察局、大义斥责陈焯之事，便在北平迅速传播开了，成了又一桩轰动故都的佳话。

在军事调处过程中，宋时轮坚持党中央“针锋相对，寸土必争”的方针，不断揭露国民党反动派搞假和平真内战的阴谋，使他们一再遭到沉重打击。敌人对他十分恼火，深为痛恨，决定使用特务手段，暗中对行刺。

1946年5月15日下午6时45分，宋时轮外出办完公事后乘车返回北京饭店。途经八面槽南口闹市区，车行较缓，突然遭到预伏在此的国民党特务开始射击。子弹穿过汽车的玻璃窗从宋时轮面前飞过，汽车中弹后出现颠簸。在此瞬间，宋时轮立刻意识到情况有变，迅速指挥司机，加大油门，开足马力，冲出险区。

当时，现场一片惊恐、混乱，人们争相夺路逃走。事后，群众议论纷纷：在国民党军警如麻的北平，有人竟敢在闹市区向军调部中共代表的汽车开枪，此事绝非偶然。

事发后，我方按照军调部三方关于北平地方当局负有保障我方人员安全的规定，立即向北平警备司令部、市政府和市警察总局提出抗议，要求他们迅速对此进行调查，作出处理，并保证今后不再发生类似事件。同时，以备忘录告知美方代表和国民党政府代表，要求他们以军调部名义向北平地方当局交涉，查清事件真相，保证我方人员安全。

宋时轮遇刺的消息传开后，许多同志都为我方领导人的安全担心。但是，宋时轮始终坚定沉着，照常坚持斗争。他意识到，国民党反动派坚持“内战灭共”的方针，决不会真心谈判停战。他们行刺我方领导人，是企图以此迫使我方代表团撤离北平，达到破坏和谈、转嫁罪责的目的。因此，我们决不能上当，必须继续在北平坚持谈判，同他们的阴谋进行斗争，以争取推迟内战爆发的时间，挽救和平。他对大家说：“国民党历来如此，明的斗不过，就在暗中耍这种流氓伎俩，这不足为奇。他们这样做，是企图迫使我们撤出谈判。我们应该照常坚持斗争，绝不能让他们破坏和谈的阴谋得逞。”宋时轮这种遇险不惊，坚持战斗，一心只为党的事业，毫不考虑个人安危的精神，又一次获得了同志们的由衷敬佩。

全面内战爆发后，和平遭到破坏，军事调处已无希望。宋时轮奉命离开军调部，重返山东前线，继续率部与国民党军队作战。1946年1~6月，他在军调部仅仅工作了半年，时间虽然不长，却参与了许多重大问题的斗争，并作出了重要贡献，给同志们留下了很深的印象。当时曾在他领导的执行处任科长的雷英夫同志后来回忆说：“宋时轮不愧是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好代表。他在谈判桌上和谈判会外表现出的高超斗争艺术，永远值得我们好好学习。他在谈判斗争中为捍卫中华民族的尊严、维护中国人民的利益作出的重大贡献，将永远受到人民的感激和崇敬！”

## 指挥阻击 威震敌胆

宋时轮回到部队以后，1947年1月，担任了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司令员。自1947年2月至1948年底，为配合主力歼敌，率部参加了七次较大规模的阻击战。其中，尤为出色的是梁山阻击战、上蔡阻击战、桃林岗阻击战、徐东阻击战。漂亮的阻击战，使国民党部队中流传着“排炮不动，必是十纵”的说法。

1947年5月上、中旬，第10纵队完成孟良崮战役吐丝口阻击牵敌的作战任务之后，在章丘休整了个把月。其间，华东野战军根据中央军委指示，以第3、第8、第10纵队为右翼兵团，即陈（士榘）唐（亮）兵团；以第1、第4纵队为左翼兵团，即叶（飞）陶（勇）兵团。左右两翼统一组成外线兵团，配合刘邓大军的作战行动，揭开解放战争战略进攻的序幕，粉碎蒋介石对山东解放区的进攻。7月上旬，宋时轮遵照作战部署，率部收复大万德、界首一线，西跨津浦路，进入鲁西南地区。接着，连日大雨滂沱，左翼兵团由鲁南向鲁西南转移之中，敌多路逼进，情况异常紧张。这时，宋时轮接到命令：须27日占领位上东南一线牵制阻击敌人，保障左翼兵团安全西进。第10纵队冒雨作战，任务达成后，宋时轮旋即指挥部队在郟城地区摆开坚守防御的架势，牵制吸引敌人，掩护刘邓大军顺利南下。

为了密切配合刘邓大军完成向大别山进军战略部署，右翼兵团陈唐首长向刘邓首长请示部队下一步行动任务，刘伯承司令员指示说：“你们把部队放在陇海路以北，摆成一个‘蛾’牌的态势，即用三个纵队集中歼灭敌人，一个纵队钳制迷惑敌人，以掩护大部队南进。我想我们的十纵队大概就是蛾牌上端的这一个点吧！”与此同时，中央军委指示华东野战军第1、第3、第4、第8、第10纵队组成华东野战军西兵团，粟裕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在鲁西南组织牵制敌整编第5师、整编第84师和第75师于陇海路以北地区。

8月1日，第10纵队参谋长赵俊接到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的电话指示：“你们第10纵队要把敌整编第5、第84师阻击在梁山地区。”陈士榘的语气十分坚决，要求赵俊在作战地图上标明每天阻击的抵抗线，绝不能让敌人越过抵抗线。最后还说：“你们部队的屁股只能向北，不许向南。”放下电话，赵俊立即向司令员宋时轮报告。

宋时轮的处境是很困难的。部队进入鲁西南之后，远离后方，连续作战，减员和弹药消耗都未能及时得到补充，而且这时正在郟城地区大修工事，摆出一副要坚守的样子，吸住了敌3个师8个旅的兵力。当面之敌的武器、粮食、弹药充足，还能得到南京、徐州、济南等地区空军的支援。特别是整编第5师，是蒋介石的“五大主力”之一，全部美械装备。敌我力量对比悬殊，仗怎么打？宋时轮分析认为，纵队阻击作战地区梁山，古称“水泊梁山”，周围都是水，经过千百年的变迁，梁山和东北相邻的二龙山周围已经没有水了，只是在东平附近还有一个方圆几十里的大湖，即东平湖。作战采用逐次防御的办法，从郟城打起，背靠黄河，并且要向黄河与东平湖相交而形成的袋形地域撤退，实际上是平原地区的阻击战。刘邓大军南下虽然吸引了敌人44个旅的兵力，敌人仍认为在梁山有利可图，所以，8个旅被牢牢地吸在这里。敌人是想凭借黄河天险消灭第10纵队。

宋时轮把自己的看法告诉了政委刘培善，并且详尽地阐述了作战的基本设想：

要深入进行政治动员，把这次阻击作战的意义和盘托给全体官兵，使大家一致认识到：刘邓大军南下，是党中央、毛主席的伟大战略决策；战争要引向蒋管区，这样可以减轻根据地人民的负担，人民便可以更好地支援我军作战；全国解放战争是一盘棋，统一在党的领导下，战场上各部要互相配合互相支援，要协同作战；纵队目前是面临着种种困难，而刘邓大军更是远离后方，敌人又前堵后追，困难比我们还要大，在这种情况下，我们要克服困难，承担更大的责任和牺牲；全纵上下要积极行动起来，掀起杀敌立功运动，大量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争取在更长的时间里牵制更多的敌人，从而减轻刘邓大军南下的压力。

要精心组织防御和构筑工事。纵队采取两个师并肩作战，特务团为预备队的部署防御。各师采取梯次配置，交替作战的部署防御。第一梯队作战时，第二梯队除随时准备支援外，还要把第二线阵地构筑好。第一梯队打到一定程度，视情况后撤，第二梯队马上利用既设阵地接替防御。如此交替阻击，依托阵地杀伤敌人，迫使敌人每前进一步都要变更部署，付出高昂代价。无论第一梯队或第二梯队，阵地构筑完成以前均不能休息。阵地选择要避免敌人轰炸，远离村庄，利用有利地形搞支撑点式的防御阵地，各点火力能相互支援，以点制面。各个连队要组成四个组：挖掘组，负责挖掘堑壕交通壕及射击、掩蔽工事的平底坑；器材收集组，负责解决工事的掩盖和障碍设置等问题；工事修砌组，在挖掘组之后负责整修工事；警戒组，负责保障作业人员的安全。要想方设法加强工事防护层的厚度，工事抗力要求达到可抗敌八二迫击炮和飞机扫射的直接命中。

要积极主动运用灵活多变的战术。针对敌人陆空配合、昼攻夜伏、攻击前实施地面炮火准备和航空火力准备，战车引导重点突破和连续冲击逐点争夺等特点，要求阻击部队采取如下措施：第一，部队在敌人火力准备时适时隐蔽，加强工事伪装，设置假阵地吸引敌人火力；第二，各级都要控制强有力的预备力量，实施阵地内和阵地前反冲击；第三，普遍组织反坦克小组，使用炸药包、反坦克手雷和改造地形等手段，同敌坦克作斗争；第四，组织精干小分队，利用夜暗和青纱帐，插入敌驻地，扰乱和消灭敌人。

要认真搞好撤出战斗预案。提前派出联络组去黄河北岸与鲁西南支前司令部取得联系，尽早组织船只，为部队战后撤出阵地作好渡河准备。

宋时轮一古脑儿向刘培善讲完了这次作战的设想。刘培善对宋时轮的基本方案表示完全赞同，觉得这位司令员脑子里装的东西实在太多了，从参谋长报告到基本设想的形成还没有几个小时。

8月1~11日，宋时轮指挥第10纵队在梁山以北、东平湖以西、黄河以南的三角地带，背水实行宽大正面的运动阻击战，使敌整编第5师5个营丧失战斗力，按时胜利完成任务。

1948年5月30日，粟裕率领华东野战军第1、第4、第6、两广和特种兵纵队，由濮阳等地南渡黄河，前出菏泽、巨野一线，与中原野战军第11纵队会合，准备协同由河南东部北上的陈唐兵团，寻歼位于鲁西南地区的国民党邱清泉兵团主力。华东野战军的动作和企图被敌发觉，蒋介石急令刘汝明第4绥靖区收缩，固守菏泽、曹县、金乡等地，再令邱清泉兵团迅速北返堵击，并从苏北急调3个整编师又1个旅增援鲁西南，企图与华东野战军决战。

中央军委鉴于鲁西南地区敌人集中了9~11个整编师的兵力，不易割歼

的情况，于6月3日指示华东野战军要多方调动敌人，创造打运动战的机会，“于运动中歼灭敌人。”6月15日，陈唐兵团主力进至通许、睢县、杞县之间，距开封只有一日行程。此时，华东野战军首长抓住战机，毅然改变决心，命令陈唐兵团就近攻取开封，调动敌人增援，在运动中歼敌。中央军委批准了这个部署，并指示中原野战军主力钳制胡璉兵团，配合华东野战军夺取开封。

6月16日，带领部队位于河南以西叶县、舞阳间休整补充的宋时轮接到命令：陈唐主力是日攻取开封，为确保胜利，10纵迅速东进，务于17日上午赶至平汉路东、上蔡以北布防，把胡璉部阻于洪河以南。宋时轮马上指示第10纵队第28、第29师即刻行动，不得有误。第28、第29师接到纵队命令已经是中午14时，驻地距上蔡180华里，按次日上午9时到达阻击位置计算，剩的时间不足20小时。任务来得这样急切，没有时间组织战前动员，需要做的各项工作全部在行军途中进行。夜间急行军，部队极度疲劳，打瞌睡的越来越多，甚至前边的战士睡意朦胧停下时，后边的战士就会一头碰在前边战士的枪杆上。

蒋介石窥见中原地区开封危在旦夕，急令胡璉亲率驻河南驻马店一带号称国民党军“五大主力”之一的整编第11师星夜兼程北上，经上蔡、渡洪河，驰援开封。

宋时轮和纵队副参谋长工作尧随第29师行动。夜半时，先头侦察分队报告：胡璉兵团已占领上蔡，指挥部设在上蔡城里，整编第11师大部已北渡洪河，向开封方向急进。情况万分危急！能不能完成阻击任务？如何完成阻击任务？已是千钧系于一发，必须当机立断。宋时轮决心：“攻其必救，调动敌人，再打援兵。”因为如果我部继续由东向北追击援敌，既迫不上，还会使部队疲于奔命，消耗体能，达不到作战目的。但是，如果胡璉识破了这一计谋，不上套，就会直接影响到陈唐兵团攻取开封的胜利。胡璉会不会“不听指挥”呢？“不会”，宋时轮脑子里思索过各种可能后得出了结论。第一，胡璉先我一步越过上蔡，直奔开封，但指挥部设在上蔡，我选择上蔡猛虎掏心，端胡璉的窝，要胡璉的命，他不能不顾，不能不救；其二，胡璉援助别人时总是有条件的，他从不会舍生忘死，他用兵的基点就是自保。宋时轮对工作尧和第29师的领导同志说：“胡璉这个人，志大才疏，优柔寡断，生性多疑，只要受到一点惊吓，必然求生自保。”于是，他命令：第29师加快行军速度，直奔上蔡县城；第28师紧紧跟上，做好攻打上蔡县城胡璉兵团指挥部的各种准备。在场的同志心里都明白，司令员这样做的目的，是以进攻上蔡城为手段，迫使胡璉把已经渡过洪河增援开封的主力部队调回来。这是一着险棋。

17日上午9时，宋时轮随第29师按时到达预定地点——上蔡城郊。他指示部队，稍作休息，准备攻城。尔后，他对第29师的领导同志说：“进攻上蔡城只许佯攻，不准真攻，但又必须狠打。”师长肖锋和政委李曼村对“狠打”二字心领神会，但对“不准真攻”的“狠打”，打到什么程度心里还是没有底，就问道：“司令员，狠打打到什么程度？”宋时轮果断地答道：“就是要打到使胡璉感到危在旦夕，指挥部有被打掉的危险。只有打到这种程度，胡璉才会命令他北援的主力部队回师救援上蔡指挥部。”同时，“部队在进攻中要占据有利地形，为打胡璉回援的主力部队作好准备。”肖锋、李曼村的手早就痒痒了，司令员命令的余音尚在回荡，第29师的命令就开始下达



了：第 85 团攻击城北单庄、小集一线，并占领麦仁店、李庄；第 86 团攻占西洪桥、刘桥、葛庄、坡赵村等地；第 87 团进占董庄、圈刘。

胡璉是黄埔军校第四期毕业生，比宋时轮早一期。他长期与我军作战，曾经遭受过几次被歼灭的厄运，积累了相当的经验。这次，他亲自坐阵上蔡县城兵团指挥部，并且已经摸清进攻上蔡的是华东野战军宋时轮纵队。对于宋时轮，胡璉早有耳闻，黄埔的小兄弟，战场上让邱清泉老兄畏惧三分，这一次要让宋栽在他手里。胡璉自恃握有王牌部队，于 17 日夜命令北上的 3 个旅立刻掉头南回，渡洪河，直奔上蔡，吃掉宋时轮纵队。

鱼上钩了。整编第 11 师拥有大量辎重，返回的路线唯有一条，即东起东洪桥、西至麦仁店一线。18 日 8 时，回援的敌人向第 10 纵队第 29 师发起攻击，不惜一切代价反扑。宋时轮指挥第 28、第 29 师，协同作战，打垮了胡璉部署的步兵、炮兵、坦克相互配合下的集团连续冲击。第 10 纵队经过半天一夜的急行军和白天的紧张战斗，每个人都没能吃上一口饭、喝上一口水，随身带的弹药也消耗得所剩无几，但阻击部队仍然以团、营为单位浴血奋战，英勇杀敌。经过 8 小时激战，敌整编第 11 师遭重创，我第 10 纵队也付出了不小的代价。

这时，宋时轮想：毛泽东主席说得好，蒋介石的算盘珠子要靠我们来拨动。为了彻底粉碎敌人北援企图，现在应放弃第一线阻击阵地，向第二线阵地转移，从而调动敌人，牵着敌人的鼻子，进我们下的套。18 日 22 时，他亲自部署纵队指挥部迁常湾，第 28 师转樊庄、罗阁、蒋庄、肖坡一带，第 29 师移王阁、下地关、百尺集、雷庄一带，并与同时担任阻敌任务的中原野战军第 1、第 3 纵队取得联系，严阵以待。经过一个昼夜的激烈战斗，整编第 11 师在第 10 纵队前沿阵地死伤 5000 多人。胡璉胆怯了，他深感这样打下去前途不妙，急忙命令部队停止进攻，于 19 日率部撤退汝南。

1952 年秋天，第 10 纵队的老部下陈焯到南京去探望老首长宋时轮。在回忆解放战争中第 10 纵队的光辉战绩时，宋时轮无限感慨地说：“上蔡一仗打得最好。作战不拘成法，知己知彼，斗智斗勇，当机立断，调动敌人，浴血奋战，以 860 余人的代价，抗击了胡璉兵团的疯狂进攻，毙伤 5000 多敌人，保障了陈唐兵团顺利攻克开封。10 天的任务 1 天就完成，还不好吗？！”

上蔡阻击任务胜利完成后，1948 年 6 月 22 日，宋时轮奉命率部前往鄢陵地区休整待命。

开封失守，引起了蒋介石的恐慌，打乱了他中原地区与我华东野战军、中原野战军决战的部署。为了稳定军心，他曾宣称：“战争能否胜利，全靠中原这次作战。”而现在丢掉省会城市，蒋介石很不甘心，决心重新占领开封，显示实力，挽回脸面。为此，他严令邱清泉兵团和第 4 绥靖区刘汝明部加速攻击前进，夺回开封；命令区寿年兵团经睢县、杞县，位于邱清泉左翼，迂回开封。两路敌人，一左一右地向开封运动。邱清泉手握第 5、第 70、第 83 三个整编师，有精良的装备，战斗力较强。区寿年辖第 72、第 75 两个整编师和新编第 21 旅，是刚组建起来的新的兵团。根据一贯的作战原则，华东野战军首长决定避强击弱，一面主动放弃开封，造成使邱清泉尾追撤离开封的陈唐兵团主力的局面；一面集中兵力，在杞县东、南两个方向消灭区寿年兵团。

6 月 26 日，宋时轮率领第 10 纵队从鄢陵出发，向杞县西南开进，上蔡阻击之后，部队休整才进入第二天，刚刚松弛下来的筋骨马上又紧张起来。

第10纵队的任务是同第3、第8、两广纵队组成阻援集团，隔断邱清泉兵团和区寿年兵团，阻止邱清泉兵团东援。区寿年兵团在前进途中与我突击集团发生接触，不敢贸然前行，就地盘踞在相县东北的蓼堤岭，榆相铺、铁佛寺一带。邱清泉兵团先头一个旅已经进占开封，主力直趋通许方向，尾追陈唐兵团第3、第8纵队。此时，邱清泉、区寿年两兵团相距有40公里间隙，正是分割歼敌的良机。

27日，区寿年受到突击集团的不可抵御的进攻。

28日，宋时轮率第10纵队同第3、第8纵队一起扼守杞太、杞睢两公路，做好了阻击敌东援的准备。

29日拂晓，阻援部队进入指定作战位置时，宋时轮来到阵地前实地勘察，作出部署：第28师坚守土楼至桃林岗一线阵地，担负从正面阻击敌人的任务；第29师防守大魏店至曹屯一线，组织交叉火力，加强侧翼反击，减轻正面阵地的压力；纵队指挥部设在胡吉屯，各师都要及时与纵队保持联系。

桃林岗位于杞县城东南7华里，地处杞太、杞睢两公路要冲，是邱清泉兵团东援区寿年兵团的必经之地。村的四周有高丈余、厚七尺的土围墙，墙外沟网纵横，便于阻击作战，从防御作战的角度看，是相当理想的支撑点阵地。这个阵地交给了第28师第83团第3营。宋时轮离开桃林岗阵地前，握着第83团团长毛会议的手，坚定地说：“邱清泉整编第5师是我们的老对手了。同志们都了解他们的特点。但是，这一次任务非同往常。邱、区两个兵团相距这么近，我们稍有一点疏漏，就会影响到整个战役的胜利。”毛会议立即表示：“请首长放心，我们保证坚决完成这次艰巨光荣的任务。”宋时轮面带笑容，以亲切和信任的口气说：“我们大家都等着你们的胜利消息。”最后，他又再三叮嘱：“千万不能大意。一定要顶住敌人的猛烈攻击，要准备打恶仗。”

是日13时，邱清泉兵团整编第5师第45旅和第200旅在张山头、吴李庄、西桃林岗、徐楼一线与第10纵队警戒部队交火。17时，敌人以凶猛的炮火对第83团第1营第2连程寨阵地进行突袭，敌第599团实施地面进攻。我第9连为协同第2连防御，对敌人侧翼主动出击，虽然杀伤了大量敌人，但是第2连程寨阵地还是被突破了。同时，我第82团土楼、聂庄阵地连续三次遭敌猛攻，该团第1营顽强阻击，屡挫强敌。

30日9时，敌第599团自程寨向张阁攻击，第600团进攻桃林岗。激战一个时辰，两路敌人均被击退。邱清泉兵团进攻受挫，蒋介石大为光火，偕同空军总司令周至柔乘飞机亲临杞县上空督战。邱清泉为挽回面子，便指令第200旅倾全力夺占桃林岗，并下达了“进攻不成，按级斩首”的命令。

17时30分，敌人在强烈炮火掩护下，采用密集队形，向张阁阵地再度发起连续疯狂进攻。我第83团第3连和第2连的指战员子弹打光了，就与敌人白刃格斗，被迫撤出张阁，桃林岗主阵地失去了左翼屏障。敌人继扑屈寨，我因反击不利失守。第83团第2营反击张阁，与敌形成对峙，未能夺回阵地。第82团第3营和第83团特务连强夺屈寨，歼敌一部，收复屈寨。在防御正面不断扩大的紧要关头，坚守桃林岗主阵地的第83团第3营临危不惧。战斗最残酷的时候，也是宋时轮去一线师、团部队了解情况、鼓舞士气、解决问题最多的时候。他嘴里经常念叨着：“到前面去听听、看看，心里更踏实。”一见到第83团团长毛会议，他立即问道：“桃林岗阵地上还有什么困难？”毛会议回答说：“对付敌人的集团冲击，子弹和手榴弹再多一点就更好了。”

话音未落，宋时轮的手已经抓起电话机，要纵队后勤部部长张兰厚“组织力量，把一部分备用弹药送往桃林岗阵地”；要纵队特务团团长江振华“拿出一部分弹药，支援83团主阵地。”

7月1日，是中国共产党的诞辰纪念日。第83团第3营在桃林岗已经打垮敌多次较大规模的进攻。13时，敌第600团的攻击又开始了。炮火轰击，飞机轰炸，桃林岗硝烟弥漫，剧烈震颤。北门围墙被炸开两个大缺口，营长朱福修一面命令用炮火打敌坦克，一面组织部队集中火力打步兵，交叉火力象冰雹一样倾泻到敌第600团头上。敌4辆坦克被击毁，步兵招架不住，纷纷溃退。太阳西斜时，桃林岗才从浓浓的硝烟中露出些模样，满目焦土，这里已是遍地弹坑，围墙矮了半截，树木连根拔起，敌尸横七竖八。我第83团第3营的官兵在阻击作战的阵地上，以特殊的方式和辉煌的战绩向党的27岁生日献了一份厚礼。

这时，区寿年正在狂声呼救，邱清泉告诉区寿年：“明天看我的弹着点。”

宋时轮根据战场情况，再次指示部队：针对敌人火力密集，步炮、步坦、空地合同集团冲锋的特点，第28师应采取正面抗击与阵地内反击、侧翼反击相结合的战术，缩小防御正面，加强两翼配合，阵地要形成纵深梯次有重点的环形防御配系，各级指挥员都要掌握强有力的预备队，小群多路，击敌侧后，抗击敌进攻；第29师要在桃林岗东南野外，依托阵地组织交叉火力，加大侧翼反击，减轻正面压力，策应第28师。

7月2日，华东野战军突击集团向区寿年兵团实施总攻。邱清泉教授心切，又越不过桃林岗，便歇斯底里叫喊：“豁上200旅，消灭83团；施放毒气，坚决东援。”8时，敌第200旅在旅长高吉人亲自指挥下再攻桃林岗。战斗越打越激烈，我第83团已陷入伤亡大、极度疲劳、弹少粮绝的困境。突然，阵地西北部被突破，第9连被分割为两半。关键时刻，第8连指导员戴可文向营长表示：“夺不回阵地，决不回来见你！”便带领18名战士冲入敌阵。第9连阵地上，卫生员、炊事员、伤员齐上阵，霎时间，短兵相接，一场恶战，敌人溃退了，这一切只是发生在几分钟里的情况。

3日夜，第28师第84团第2营接替第83团第3营扼守桃林岗主阵地。

在桃林岗，宋时轮指挥部队顽强阻击五昼夜，坚如磐石，稳如泰山，屹立在邱清泉整编第5师面前岿然不动。区寿年直到当了俘虏，也没有看到邱清泉的“弹着点”。新华社向全世界播发了桃林岗阻击战胜利的消息。

淮海战役第一阶段，主要是歼灭国民党黄百韬部第7兵团。宋时轮奉命指挥3个纵队在徐州以东阻击援敌，保障主力作战。

1948年11月6日，宋时轮率第10纵队沿津浦路急速南下。7日黄昏，向徐州以北的临城、韩庄之敌冯治安部第3绥靖区发起攻击。第29师首先歼灭韩庄守敌，占领运河铁桥。第7纵队在第10纵队左翼相继攻占万年闸。这样，韩庄至台儿庄之间运河上的两座重要桥梁被第7、第10纵队控制，攻击矛头直指贾汪——第3绥靖区冯治安总部。由于地下党的积极策应，第3绥靖区两位副司令官（共产党员）张克侠、何基沣率部2.3万余人在贾汪、台儿庄战场起义，为华东野战军主要突击集团的7个纵队迅速合围黄百韬兵团，个军创造了极其有利的条件。10日傍晚，第10纵队到达不老河北岸，宋时轮部署连夜抢渡。纵队工兵营立即架设浮桥。部队过桥后，迎着枪炮声向徐东疾进，“堵截敌第7兵团退路”的战斗号令激励着指战员喘着粗气向前飞奔。

为解黄百韬之围，蒋介石急电告诫他在前线的将领们：“徐淮会战实为我革命成败、国家存亡最大之关键”，必须“团结苦斗，期在必胜”。

正在积极准备参加围歼黄百韬兵团的第10纵队各师领导，被召来出席纵队临时作战会议。会上，宋时轮兴奋他说：“我们和国民党打了二十多年仗，现在到了进行最后决战的时候了。蒋介石眼看黄百韬被围，着令徐州‘剿总’派遣邱（清泉）、李（弥）兵团拼死东援，以挽救他统治人民的看家本钱。根据中央军委和毛主席的指示，华东野战军前委决定，以8个纵队投入围歼战，以6个纵队在徐州东面、东南面打援”，“我们第10纵队的任务改变了，改为在徐东阻援”，“我们有莱芜战役、鲁南战役、孟良崮战役、豫东战役等历次打阻击的经验，一定能胜利完成阻援的任务”。

会后，各师师长、政委返回部队途中，都在反复思考着宋时轮司令员、刘培善政委的话：“必须正视，不少同志对打阻击有种不正常的情绪”，“一定要深入细致、扎扎实实地做好动员工作，做好思想工作”。是啊，打阻击，代价很大，思想政治工作稍有疏忽，就会出现埋怨情绪。要从整体利益出发，要以在徐东打阻击就是消灭黄百韬兵团的认识来教育部队，统一思想。第二天拂晓，各师分头进行动员、教育。当第28师师长王德贵赶到第83团时，团长毛会义和政委孙乐洵汇报说：部队了解了这次的阻援任务，认识已经得到统一，感到这次作战责任重大；为了吃掉黄百韬兵团，咱就是倾家荡产也在所不惜；挡不住邱、李兵团，就歼灭不了黄百韬兵团。指战员深刻理解这场搏斗的意义、作用，产生了巨大的战斗意志和无穷的抗敌力量，决心把阵地当作敌人的墓地。这是多好的部队啊！

11日，部队进入阵地。经过三天激烈战斗，第10纵队两个师抵挡了李弥兵团第8军第42师、第9军第166师和邱清泉兵团第5军第45师、第200师、第70军第32师的三路多批次的进攻。密切注意战场形势的宋时轮，14日拂晓给坚守解台子阵地的第82团第1营营长宋家烈打电话：“宋家烈同志，你们当面的敌人是第8军。你们这个阵地十分重要。你们的任务是艰巨的，也是光荣的。你们要人在阵地在，坚决与敌人寸上必争。只要还有一个人，只要还有一口气，就不能丢了阵地。”电话中，宋家烈营长当即代表全营指战员向宋时轮司令员庄严保证：“人与阵地共存亡，坚决堵住第8军！”这一保证，顿时成为全营指战员坚守阵地、奋勇杀敌的宏亮的战斗口号和强大的精神支柱。

自11日起，华东野战军担任围歼黄百韬第7兵团的各纵队，受到敌人空中袭击和逐村顽抗，部队由运动中仓促转入村落攻坚，进展缓慢，伤亡较大。为此，华东野战军决定调整部署，改变打法。14日晚，华东野战军命令：以第10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政委刘培善指挥之第7、第10、第11纵队从正面阻击徐州东援之敌。宋时轮接到命令后，与刘培善一起研究了有关阻击作战的具体问题，随即向各纵队发出指示：根据徐东地区特点和几天来的阻援情况，各纵队应注意依托村落构筑必要工事，主要阵地应伸出村外100~200米处构筑，构成品字或梅花形据点，各村落四周构成独立支撑点，各支撑点可以独立防守或相互支援；兵力部署要少摆多屯，指挥员要掌握1/3的兵力作为机动力量；火力配置要实行固定火力与机动火力、正面火力与侧翼火力互补，防御前沿和纵深要成梯次，构成曲直相辅、远近交错、正侧结合的浓密火力网；反敌坦克手段要多样，构筑反坦克壕、设置反坦克雷场、组织反坦克小组等。

按照宋时轮的部署，三个纵队并肩，严阵以待。

解台子阵地上，第82团第1营营长宋家烈指着身上的油渍对第28师政委王若杰说：“坦克从堑壕上压过去，油都滴在身上啦。坦克一过，我们专打步兵。坦克见步兵上不来，掉头想跑，我们回头瞄准坦克，给他一顿手榴弹。有的战士爬上坦克揭开盖子往炮塔里塞手榴弹，看它往哪里跑。”

12~17日，李弥兵团第8军的“荣誉师”，总共向前推进了5华里。邱、李两兵团每日平均向前推进速度不到两公里。

18日，我第11纵队鼓山、王山阵地失守。“竭尽全力，夺回阵地”，该纵队第32旅旅长吴咏湘向纵队首长保证。11时，阵地失而复得。19日3时，敌人再次向鼓山、王山阵地进攻，经过5小时鏖战，阵地再次丢失。第11纵队党委提出：“绝不能让敌人逞凶狂！绝不能让整个战役受影响！”决定投入预备队，再次反击。20日1时，鼓山、王山阵地又一次被夺回。

22日，华东野战军突击集团歼灭残敌，击毙黄百韬。东援的邱、李兵团，损失万余人，被阻于侯集、林佟山一带。

23日，中央军委致电中原野战军、华东野战军首长，庆祝淮海战役第一阶段的伟大胜利。

## 城市攻坚再显雄风

1948年，全国解放战争进入第3年，形势发生了巨大的变化，中国革命已发展到逐步占领城市、夺取全国胜利的新阶段。济南战役，开创了我军夺取国民党军重兵坚守的大城市的先例，并使华北、华东两大解放区连成一片，为华东野战军会同中原野战军举行更大规模的歼灭战创造了有利条件。

济南，是山东首府，是津浦、胶济两铁路的交会点和连接华东、华北的枢纽地带，北靠黄河，南倚泰山，地形险要，国民党守军工事坚固，易守难攻。特别是山东省除几个大、中城市外，广大地区已获解放，济南的战略地位就更为突出。蒋介石令第2绥靖区司令官王耀武率领部队约11万人固守济南，并在徐州及其附近地区集中3个机动兵团17万余人伺机北援济南，以达到来往应援，争取时间，挽回败局的目的。

7月14日，毛泽东指示华东野战军准备攻取济南。在他的日程表里，济南势在必夺，条件已经成熟。华东野战军前委根据中央军委“攻济打援”的方针，集中兵力，以6个半纵队，配属特种兵纵队大部，附地方武装，共约14万人组成攻城兵团；以8个半纵队，配属特种兵纵队一部，附地方武装，共约18万人组成打援兵团。8月，按节气已经过了立秋，可是天气仍热得燥人，俗称秋老虎更是厉害，唯不时落些秋雨还能缓解那燥热。宋时轮身披雨衣在坟上县廖家村的一个院子里来回踱步，思考着第10纵队又要担任“阻援打援”任务的问题。雨水淋透了军帽，顺着面额往下滴。纵队作战参谋田畦前来请示如何起草命令。宋时轮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说：“命令暂时先不下。我找粟司令员去。”他叫来驾驶员，说走就走了。他要代表全纵队指战员的心愿，前去请战，想让第10纵队也饱餐一顿进攻战的滋味。宋时轮在粟裕那里谈了一阵，他驱车回到廖家村时，心情显得格外地好。

8月25日，宋时轮到曲阜参加华东野战军的军事会议，具体研究济南战役的组织和部署。华东野战军参谋长陈士榘宣布各纵队的任务：济南战役攻城兵团，由山东兵团首长许世友、谭震林、王建安统一指挥；攻城西集团以

第3、第10纵队和两广纵队、鲁中南纵队主力组成，由第10纵队司令员宋时轮、政治委员刘培善指挥；攻城东集团以第9纵队、渤海纵队及渤海军区一部组成，由第9纵队司令员聂凤智、政治委员刘浩天指挥；特种兵纵队组成两个炮兵群，分别隶属东、西集团；第13纵队为攻城兵团预备队，……宋时轮仔细地听着，抽上两口已经快烧到头儿的香烟，不时露出了满意的神情，心里已经在进一步盘算具体的打法了。9月9日始，攻城西集团各纵队自济宁、汶上等地区向济南隐蔽开进。

9月14日，王耀武专程飞往南京，在蒋介石面前，他双手垂立，哭丧着脸儿，战战兢兢他说：“济南周围共军重兵逼近，战事在即。望委座能再增加一个师，否则守济南怕是很困难。请将我过去带的74师立即空运济南增防，这样固守济南才有把握。”整编第74师，于张灵甫毙命孟良崮、全师覆灭后重新组建，此时位于徐州“剿总”北援济南的行列里。听完王耀武的陈述，蒋介石感到王耀武缺少不屈不挠的精神，但事出无奈，也只好说：“好吧，俊才，我再把74师邱维达部由徐州空运济南。济南既有坚固工事，再有援兵，死死守住应该是没有问题喽！”最后，他要求济南守城部队在援军与共军打得精疲力竭时，抽出两个师的兵力出击，“南北夹攻，定获胜利。”

15日，王耀武飞回济南。守军的部署是：以黄河北岸的泺口镇至城南马鞍山为分界线，分为东、西两个守备区。西守备区由整编第96军军长吴化文指挥整编第2、第84师，独立旅、保安第8旅、特务旅、青年教导总队等部防守；东守备区由整编第73师师长曹振铎指挥该师和保安第6旅等部防守；以第19、第57旅及由徐州空运来的整编第74师为总预备队。这时，王耀武的判断是对的。他对身边的参谋长和作战处长说：“我以为，共军的主力必置于济南以西。他们必然会首先集中力量攻占西郊飞机场，以截断国军空援”，“传我的命令：长清必须守住。”预备队第19旅调至飞机场以西的古城方向待机，第57旅由张夏、圈山撤入市区，准备转用于西线。

宋时轮在部署攻城作战行动的时候一再强调：济南守敌在我军重围之下，援兵唯一来自空中，飞机场是我攻城西集团夺占的重点，拿下机场，断敌补给，关门打狗。

是日，两广纵队等部扫除长清西南地区的敌保安部队，包围了长清县城。

16日夜，济南战役打响，西线各纵队按时向守敌发动进攻。宋时轮指出，按攻城部队的统一部署，扫清外围、各个击破的时间不能太长。各纵队必须根据敌防御地带据点多、纵深大、空隙大的特点，采用穿插迂回、大胆楔入、打开口子、突入纵深、分割歼敌的战法。“打进济南府，活捉王耀武”的口号，点燃了解放济南的引线。万炮齐鸣，百里硝烟，捷报频传：两广纵队攻占济南西南屏障长清城；济南西北齐河守敌溃逃；第10纵队沿黄河东岸向古城疾进；两广纵队与第10纵队并肩向琵琶山一带攻击；鲁中南纵队向双头等地攻击前进；攻城西集团逼近济南西郊；攻城东集团也一举攻占了茂岭山、砚池山及回龙岭等制高点。

我攻城部队的攻势迅猛，特别是被敌视为济南东郊屏障的茂岭山、砚池山原计划能坚守半个月，却在一夜之间失守，使整夜未眠的王耀武陷入了深深的迷惘。他重新判断我军的主攻方向是东不是西，遂将第19旅、第57旅东调，以整编第73师第15旅会同空运抵济南的整编第74师7个连自七里河向东反击，另以一部增援燕翅山，妄图控制我军的攻势。

我攻城东、西集团的对进钳击，使王耀武首尾难顾。东集团的较大动作，

使敌人西援的两个机动旅又东调。西集团拿下长清，进占齐河，但离济南机场尚有一段距离。因此，宋时轮一再催促第 10 纵队各师加快进攻速度。17 日 8 时，第 28 师攻占古城西北地区；10 时，控制藤屯；14 时，攻克筐李庄、尤里庄，形成对敌玉符河防线要点阵地古城的三面包围。

玉符河是济南守敌西线第一道外围防线。宋时轮站在一个土坎上，玉符河横在他的脚下。“冲过河去，拿下敌核心据点常旗屯”，他向第 29 师师长肖锋下达着命令。第 87 团强渡玉符河。当数门迫击炮带着长杆的炸药包射向敌阵时，守敌被这种“新式武器”吓呆了，纷纷举手缴枪，常旗屯被攻占。第 10 纵队全部横渡玉符河，守敌整编第 2 师第 211 旅、保安第 8 旅近十个团慌乱溃退。第 29 师主力逼近彭家庄、孟王庄、小余庄一线。

18 日，在唐家沟攻城部队指挥部，许世友与宋时轮在通电话。

许世友：“老宋嘛，攻城东集团打得很苦，也打得很好。25 师拿下茂岭山、砚池山后向西挺进；26 师拿下回龙岭、下井庄。25 师又拿下了甸柳庄，但是遭到马家庄敌人顽强抵抗，部队伤亡大。你要加速进攻！华野首长要你们 10 纵、3 纵密切协同，把 19 旅消灭在古城、长清间；要你们大胆向飞机场挺进，打击 84 师，迫其投降。你那里的情况怎么样？”

宋时轮：“西集团越过玉符河以后，10 纵 28 师在古城附近战斗中，俘虏敌 19 旅 55 团副团长以下 700 余人；在占领古城西北尤李庄、杨家庄战斗中，又歼敌 211 旅 633 团一个营。另一部占藤槐庄，歼 19 旅 55 团一部，在于家庄歼 55 团辎重连。到昨天下午，10 纵已经占领四星庄、吴家庄、尤家庄、新庄、藤槐树屯、大刘庄等以北地区。”

许世友：“10 纵的推进不慢，3 纵要赶快打上来。”

宋时轮：“3 纵进展不慢。3 纵 9 师搞了点小名堂，化装成敌军，一开战就占领了琵琶山、孟庄、赵庄、双庙屯、范庄、杨家台等地，俘敌第 2 师 180 余人，昨晚又占领了殷家林东北高地，今天凌晨 3 时占领了仁里庄。8 师一部扫除了宋庄、池子头之敌，歼敌特务旅一部。到今天下午，3 纵已经攻占播村以及 408、365、388 高地和饿狼山。我已经命令 3 纵首先扫清腊山外围，再攻腊山主阵地，把炮兵拉上去，从南面封锁飞机场。我还命令 10 纵 28 师迅速占领古城；29 师一部歼击宋家桥、小金庄，控制狗坡阵地，炮击机场。”

许世友：“老宋啊！你要克服一切困难，派部队直插飞机场，坚决阻敌空援。这不是我老许的话，是粟司令员的话。喂，我这里有好酒啊，给你留着哩！”宋时轮对许世友最后一句话立即风趣地回答说：“算了吧，馋猫嘴里怎么会剩下鱼呢？”

两位自 40 年代初在延安就结下深厚友谊的指挥员，在电话中也不失关怀和幽默。许世友对宋时轮是非常了解和信任的。他想，宋时轮善于独挡一面，指挥大胆、果断，在脾气和酒量上与我也不相上下。西线，就放手让宋时轮浓墨重彩地画上一笔吧。

是日，西集团克古城、玉皇山、簸箕山、党家庄。尔后，按照宋时轮的命令，第 10、第 3 纵队的炮兵部队从西、南两个方向猛烈轰击西郊机场，炮弹划破弥漫着浓烈硝烟的济南西郊上空，在飞机跑道上爆炸。敌机场被我炮火控制，空运中断，援军整编第 74 师的后续部队乘飞机已到达机场上空，转了几个圈，就是无法降落，只好调头飞回徐州。为加速扩大攻城兵团的战果，许世友命令预备队第 13 纵队由济南南郊出发，加入西集团作战。

当王耀武得知“飞机场已经不能再起降飞机”时，要调整部署无论是在

时间上还是在兵力上都已经没有可能了。蒋介石的军队里流传着“三李不如一王”的说法。“三李”指的是李延年、李仙洲、李玉堂，均为黄埔军校第一期学生；“一王”就是指这位黄埔军校第三期毕业生、济南守城部队总指挥王耀武。此时，王耀武才搞清，同他在西线主战场作战的共军指挥员，是小他三岁、低他两期的黄埔同学宋时轮。他的腹内如翻江倒海一般不是滋味，嘴里不停地叨叨着：“准备与共军决一死战。”

在宋时轮的指挥下，强渡玉符河的西线攻城大军，潮水般地向东北方向压去。渐渐地，西集团的速度减慢了。宋时轮敞着怀，手拿电话机，又同许世友通话，只听话机那一边传来：

“老宋，你什么时候才能拿下飞机场啊？”

“我的部队已经强渡玉符河，正在向前推进，但遇到敌人的顽强抵抗。整编第2师调上来了6个团，我得干掉他们才能继续前进。”

“你要注意，乘吴化文起义之机，将部队迅速插上去。”

“你就等着瞧吧！”宋时轮应对着。

放下电话，宋时轮反复思虑，是等是打？孙子说得好：“不战而屈人之兵，善之善者也”，“攻心为上”。起义，吴化文能干吗？干，是最理想的，我宋时轮求之不得。至少可以减少我军两三千人的伤亡，整个战役可以缩短几天。有形的计算已经让人振奋，而无形的力量呢？军心上的影响是无法计算的力量，敌军起义可以激励我军的战斗情绪，产生巨大的战斗力。可是，吴化文部起义，到现在还没有看到动静。

要军政并用，争取吴化文。宋时轮问第10纵队参谋长赵俊：“和吴化文联系上了没有？”参谋长说：“电台联络不通。”“那就派人去联系”，宋时轮立即说。地下交通员调来了，他叫李如刚，宋时轮亲自向他交待任务：“现在电台不通，你必须想尽一切办法，在明天拂晓前，把我的命令传给吴化文，让他在24小时内，把他的部队转移到黄河以北地域集结，让开我军直捣商埠的通道。”交通员表示：“首长放心，我一定完成任务。”宋时轮还是不太放心，要交通员再复诵一遍。年轻人记忆力好，流利地复述了首长的命令。宋时轮放心他说：“好一个精明的小伙子，我记住你的名字——李如刚。但是有一条，你可不能给我死在路上。你要给我下保证，天亮前一定赶到。马上出发！”

李如刚上路了，他牢记宋时轮的命令，觉得全身的血在涌动，这是背负西线攻城部队数万将士的嘱托，多么沉重，又多么光荣，就是牺牲了也值得。不过，要是牺牲也得在圆满完成之后。在敌守军阵地，他时而匍匐，时而跃进，无数颗不长眼的子弹从头顶越过。当他绕到敌堡后面，再次站起身时，有人在喊：“站住，干什么的？”他立即回答：“自己人，不要开枪！”四个端着刺刀枪、子弹上膛的敌军士兵，押着李如刚来到一个大地堡，经过验明谍报证之后，才被放行。

李如刚没有死，他把宋时轮的命令通过李昌言原原本本地传达给了吴化文。数小时之后，吴化文抱着侥幸心理把李昌言叫去，交待说：“你再派人火速去见宋时轮司令，转告他：现在让我调动部队渡河实在有困难，我请贵军避开我的阵地，绕道向商埠攻击。”李昌言提出疑问：“军长，这与宋时轮的……”话没听完，吴化文抢着说：“这你先不要管，现在你只管按我的命令办！”吴化文定下决心向来时轮回话时，仍然是脚踩两只船，为自己留下了退路。他让他的妻弟林世勋作为他的代表，与李如刚同时去见宋时轮。



李如刚身边有吴化文的妻弟，再次穿越两军对垒的战场时还算顺利。宋时轮见到他返回，十分高兴，笑着说：“李如刚，马克思在天有灵，你活着回来了。这位是谁？”李如刚介绍说：“这位是林世勋，吴化文的妻弟，也是吴化文的代表。”宋时轮问：“吴化文什么态度？”李如刚见林世勋不吭声，便说：“他要我向宋司令报告：现在调动部队有困难，让宋司令指挥大军避开吴部阵地，绕道向商埠进攻。”“不行！”宋时轮听完发火了，大声说：“吴化文跟我玩儿老鼠戏猫呢！”宋时轮非常清楚：倘我绕过机场，直扑商埠，吴化文一则可以利用整编第96军、空援部队与城内守敌东西夹击我西线攻城兵团，迟滞进攻，固守待援；二则即使济南失守，吴化文也可以金蝉脱壳，说不是机场失守，而是王耀武无能，在蒋介石面前也算有个交代。看来吴化文思虑已久，战场起义说说而已，并非真心。宋时轮对李如刚、林世勋说：“吴化文的答复办法是绝对不行的！你们马上返回去，向吴化文传达我的命令，他如真心起义，就马上行动，派他的参谋长带一部电台到我的司令部来商谈起义和撤军的有关事项。事不宜迟，你们马上行动！”

李如刚走后，宋时轮想，吴化文要我绕过锅台上炕，我宋时轮就是不信这个邪，我不怕烫，就是要站在锅台上才上炕。吴化文左顾右盼表明他尚存幻想，采取军事手段逼他就范已是势在必行了。宋时轮拿起电话，要通许世友：“许司令，我是宋时轮。吴化文犹豫不定，我不能再等了。我怀疑他的起义诚意，西线部队已经靠近飞机场前沿阵地，我准备即刻推进。”许世友回答：“我同意你的意见，军政并举。我马上以攻城兵团的名义要济南市委发电给吴化文，对他进行最后的规劝。老宋，西线就全部交给你了！”许世友放下了电话。

18日下午17时，吴化文收到我攻城兵团首长的电报。可是，他仍然说：“我整编第96军官兵都在原地集结，请贵军沿大、小金庄一线公路向商埠进攻，为什么不行？”

23时，宋时轮命令位于飞机场周围的第10、第3纵队，向吴化文部的前沿阵地实施猛烈攻击。午夜，吴化文已经损失一个营。

19日，吴化文在我军强大的军事压力和政治攻势面前，面临灭顶之灾时，率3个旅、2万余人起义。17时，根据西线攻、守双方的协议，宋时轮到达西郊机场，代表华东野战军和山东兵团首长欢迎吴化文将军。18时，吴化文正式宣布起义，撤出防区，向宋时轮攻城西集团部队移交阵地。20时，吴化文亲率起义部队向黄河以北集结。守敌西部防线出现了缺口，我西集团占领了机场，即打开了向商埠进攻的通道，乘势疾进。

得知吴化文“变节”，王耀武大惊。他没有忘记三天前的事。9月17日（农历八月十五），他特别吩咐副官备了一份中秋厚礼，送到吴化文军长家里。他曾对副官说：“吴军长家老太爷和吴夫人的老母亲都健在，不是战事紧张，本该亲自登门拜见的。就三天工夫，吴化文竟然背叛我，背叛总统！”王耀武恨得咬牙切齿。

我攻城兵团的迅猛进攻和吴化文的起义，打乱了守敌的部署，动摇了王耀武坚守济南的决心。他向南京和徐州发报，请示“可否一举向北突围？”20日黎明，南京打来电话：“是俊才吗？”“是，总统，我是王耀武。”“吴化文投共我知道了。这个人不可靠，那年我是想杀掉的。可是，他们讲情，还有你也讲情。这是我们养虎贻患。好了，不管他了，要紧的是你要坚定信心。目前，你要收缩阵地，坚守待援。我已令援军星夜驰骋，以解济南之围。”

吃透了蒋介石心思的王耀武很清楚，“突围不是蒋总统的本意，而且会使他觉察我丧失固守的信心。”所以，在南京电话到来之前，他就与参谋长罗辛理商定：缩小阵地，集中兵力，以内城为主，以千佛山、四里山、齐鲁大学、商埠、外城为据点，固守城垣，拖延时间，以待援军。

中央军委根据战况的发展，指示华东野战军：“从各方面布置，勿使漏网。”华东野战军指示西集团要不失时机地向商埠发起攻击。针对商埠守敌的兵力部署、阵地构筑和火力配置的情况，宋时轮的部署是：集中4个纵队的兵力，从北、西、南3个方向，采用多路突击、分割穿插、逐点围歼的战法，对商埠守敌实施攻击。

商埠，是济南工商业集中的地区，也是国民党山东省党部和第2绥靖区司令部所在地，是王耀武防守的重点地区。但是，王耀武明白，商埠危在旦夕。所以他要求：部队必须在拂晓前调整完毕。要整编第74师第172团团长沙炳昆速到“绥区”司令部邮电大楼来见。以“报效党国忠臣”自居的沙炳昆一到，王耀武就对他说：“吴逆叛逃，济南局势更加恶化。我已下令收缩阵地。适才，总统电话，令我守军固守待援。我请你来，赋予你一重任：你率部坚守邮电大楼。我希望你为守城国军做一楷模，战到最后一人，也决不后退一步！”“我刘炳昆决不辜负司令官的多年栽培。”设在邮电大楼里的“绥区”指挥部，是王耀武存在的象征。一旦丢失，他刘炳昆则“不成功，便成仁。”部属的忠心，使王耀武感到振奋。

就在这时，王耀武连续收到3封电报。第一封，南京国防部长何应钦致王耀武，要他“坚决固守”，南京已“令空军助战，投掷弹粮”。第二封，还是何应钦来的，要济南守军效仿“陈明仁守四平街之办法”，坚守济南。第三封是蒋介石来电：

俊才弟鉴：

吴逆叛变，事出非常，闻之痛心。陈明仁守四平街，知不可守而守之，东北数省赖以保全。济南之于华北，亦犹四平之于东北数省，战略要地，务必固守，各路援军已兼程急进矣。

蒋中正

民国37年9月20日

蒋介石的确不想失去济南。他把顾祝同叫到总统官邸，大发雷霆：“我们的失败就在于有些将领大自私了。一方已经陷入与共军苦战，而另一方就是见死不救。不听话，我的话也不听！你们国防部要再下严令：邱清泉的2兵团，李弥的13兵团，孙元良的16兵团，统归社聿明指挥，要他们务必在济南陷落以前到达。”顾祝同遵旨，火速下达了命令。命令归命令，行动归行动，蒋介石部队的悲哀在于旧恶不改，屡屡再犯。王耀武断定“待援”的承诺不易兑现，只得“固守”，便将指挥部移至省政府。

20日黄昏，经过40分钟的火力准备和连续爆破之后，我西集团第10纵队由北向南突击，占领火车站后，向纵深发展；第13纵队和鲁中南纵队由南向东北猛攻，切断了城内外守敌的联系；第3纵队沿横贯商埠东西的主要干道经二路和经三路迅猛向东挺进。

望着人民解放军的步步进逼，王耀武感到已无回天之力，危局难于挽救了。在完成各种部署的调整后，他也来了一个“三十六计，走为上”，于20日夜，经洛中桥北逃，没想到被把济南围得铁桶一般的解放大军堵了回来。这是他在被俘之后自嘲“败军之将，岂敢言勇”时讲述的一段不光彩的经历。

21日，第10纵队第83团第2营攻击普利街，伤亡较大，突破口被封锁。第85团第3营上来后，合力作战，普利街被突破。

22日黎明，刘炳昆在电话里向王耀武报告：他利用钢筋水泥建筑设100多个机枪火力点、1000多个步枪射击孔，分上、中、下三层火力网，构成密集火力，直接封锁周围的每一条街道。这就是他率第172团一部固守“绥靖区司令部”的部署。他要打出个样子给王司令官、蒋总统看看，“让74师的光荣在济南重现！”

对电报大楼，宋时轮要求攻击部队一定要“组织好爆破、火力和突击”。我第10纵队第83团副团长雷英夫和第85团副团长刘竹溪亲自带领突击队，与第3纵队第8师师长王吉文率部一起并肩作战。攻占电报大楼，第10、第3纵队都负出了重大代价。

王耀武在危难之时提升刘炳昆为少将旅长。刘炳昆肩扛空头“少将”军衔又投入了疯狂的厮杀。烟雾中，火光由门窗喷出，电报大楼的大半部只剩下裸露筋骨的架子。我突击队冲入楼内，奋力拼杀，逐层争夺。当刘炳昆腹部、头部带着重伤，满身是血瘫软在椅子上，看见身旁一群我军士兵时，他把冲锋枪扔在地板上，然后自杀了。

时间毫不留情地向前推移，记录着历史的时时刻刻：22日中午，攻城西集团以歼敌2万余人的战绩，完全占领商埠。下午，许世友决定：不给城内敌人喘息的时间，东西攻城部队仍以钳形合击方式会攻外城。

外城，是指济南外城墙与内城墙之间的地带。外城墙高10米、宽3米、局长10多公里，东北有永靖门，正东有永固门，东南有中山门，正南有新建门，西南有永绥门，正西有林祥门、普利门、永镇门，西北有小北门，正北有悬吉门，共10个城门，两侧均设有子母堡。城墙外有宽5米、深2米的护城河和高1.5米的铁丝网及雷区。

按照许世友的决定，宋时轮部署：第13纵队由永绥门及其以北，第10纵队由普利门、永镇门，向外城实施攻击。

龟缩在珍珠泉伪山东省政府内的王耀武，担心的是外城被突破。他叫参谋长罗辛理给坚守普利门、永镇门的特务旅打电话，告诉旅长张尊光，他防守的地段会遇到共军华东野战军第10纵队的攻击，要早做打算。张尊光认为，第10纵队刚刚受到特务旅、第77旅、第213旅和保安第6旅数百具火焰喷射器较大规模报复行动的打击，伤亡很大，已经失去进攻能力。他在电话中说：“参谋长，请转告司令官，我姓张的不是窝囊废。”当我第10纵队向特务旅发起攻击时，他亲自指挥部队反扑。

第10纵队进攻受阻，宋时轮对政委刘培善说：“我去29师。”有刘培善交代在先，任凭宋时轮如何说理由、发火，警卫员们仍然没有让开路。宋时轮的眼光移向刘培善。两人相对而视，刘培善在宋时轮的目光中看到的是攻城西集团部队对指挥员的期待。宋时轮终于来到第29师指挥所。师长肖锋报告说：“我们在攻城炮火急袭后，组织力量强行爆破永镇门。但是，敌人使用了火焰喷射器，……”肖锋的话未说完，宋时轮就吼道：“时间就是兵力，时间就是胜利。当千军万马在同一个时间向敌军猛扑过去的时候，你想想，那是多大的力量啊！而你们就是这样子被王耀武阻住啦？肖锋，我告诉你，仗打完了我要处分你！”

实际上，就在宋时轮来到前沿时，七个爆破组躲过敌人的疯狂火力，连续爆破，最后用150公斤炸药炸塌了永镇门。

肖锋接着报告说：“宋司令，永镇门现在已经牢牢地掌握在29师手中。攻城部队整营整营地拥进城内，战斗向纵深发展。”听到这里，宋时轮紧闭双眼沉思着。第10纵队，这支渤海子弟兵，是他亲手组建并汇入华东野战军序列的。自1947年以来，这支部队进攻打得漂亮，阻击打得顽强。不到两年就升为华东野战军主力部队。他为第10纵队的建设和发展倾注了全部心血。此次作战，由占领机场，到商埠、外城的突破，第10纵队一马当先。作为司令员，他热爱纵队每一位官兵，相信在任何艰难困苦的条件下，第10纵队都会出色完成任务。“肖师长，请你原谅！”战后，宋时轮和刘培善签署命令，授予第29师第85团第2营“永镇门爆破队”的光荣称号。至于给肖锋“处分”，早就不作数了。23日，敌外城防御阵地全部被占领。

内城，济南守敌的核心阵地。城墙高厚为12米，护城河宽5~30米、深2~5米。

18时，在宋时轮的指挥下，第13纵队第109团向城西南的坤顺门突击，第3纵队向西门突击，第10纵队围歼电力公司、面粉公司之敌，后转为预备队。

第109团激战两个时辰，第3和9连突入城内，部队伤亡较大，突破口被封锁。这时，宋时轮分析：内城之敌已是瓮中之鳖，防守既强又脆，极易折断，决定再次攻击。

24日2时25分，我第13纵队第110团在城内第109团两个连队的接应下，突上城墙，牢牢控制突破口，掩护主力部队入城，直逼伪省政府。守敌招架不住，全部被歼，王耀武作了俘虏，济南宣告解放。

原定15~20天的攻城任务，8个昼夜即完成。华东野战军首长在贺电中指出：济南战役“是两年多革命战争发展中给予敌人的最严重的打击之一。”

## 突破天堑横扫万军

1949年暮春，决定中国命运的辽沈、淮海、平津三大战役刚结束不久，当人们还沉浸在欢庆胜利的喜悦中时，我人民解放军广大指战员热烈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将革命进行到底”的号召，开始了新的伟大进军。第三野战军第9兵团的指战员和兄弟部队的同志们一起，冒着仍带寒意的蒙蒙春雨，踏着淮海平原刚开始融化的积雪，日夜兼程，直奔天堑长江。这时，大江两岸正在绽蕾盛开的油菜花一片金黄，随风摇曳，香气四溢，似乎是正在伸开双臂，热情欢迎远道赶来的亲人——中国人民解放军。担任第9兵团司令员的宋时轮来到江边，举目远眺，望着那浩浩荡荡、奔流东去的江水，不禁感慨万千：我军在伟大的全国解放战争中，经过3年浴血奋战，终于打到长江边上来了。我们一定要“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

长江，是我国的第一大江，下游江面宽达2~10余公里，特别是在5月桃花汛期，江水猛涨，浪高可达半米多，历来被称为天堑。

我军胜利进行“三大战役”后，国民党虽是败局已定，但仍困兽犹斗，企图依托长江天堑，阻止我军南进。到1949年4月初，他们在西起宜昌东至上海的1800余公里的长江沿线，部署了115个师、约70万人的兵力和大批海军舰艇、空军战机，准备继续与我军顽抗。同时，故伎重施，打出“和平谈判”的幌子，企图争取时间，再整军力，伺机反扑，卷土重来。

党中央正确分析了当时的国内外形势，为了迅速结束战争，实现和平，

减少人民的痛苦，决定同意与国民党进行和平谈判；同时，针对国民党的反动本质，制定了在和平谈判被其破坏时向长江以南进军的方针。中央军委于1949年2月3日至3月20日先后作出决定：以第二、第三野战军的7个兵团24个军及地方部队共100万人，准备于4月间发起渡江作战，歼灭蒋介石的汤恩伯集团，夺取国民党的政治、经济中心——京（南京）沪杭地区。

1949年3月31日，以邓小平为书记的总前委制定了《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决定以第二、第三两野战军组成东、中、西3个突击集团，采取宽正面、有重点的多路突击的战法，于4月15日18时，在江苏靖江至安徽望江段实施渡江作战。先歼沿江防御之敌，后向南发展，占领苏南、皖南及浙江全省，夺取南京、上海、杭州。以第7兵团和宋时轮指挥的第9兵团共7个军30万人组成中突击集团，由第三野战军副政治委员谭震林指挥，较东、西两突击集团提前一天，在裕溪口至棕阳镇段率先渡江。

宋时轮1926年入学黄埔、参加革命，亲身经历过两次国共合作、两次合作破裂，对国民党的反动本质有深刻的认识。特别是在全国解放战争初期，他直接参加过在北平举行的和平谈判，对国民党搞假和平真内战的伎俩更是洞若观火。因此，在了解了中央军委的上述决定、看到了总前委的战役纲要以后，他立即和兵团其他领导同志一起，认真领会这些决定和纲要的精神，决心立足于打，大力做好渡江作战前的各项准备工作。

宋时轮认为，战前准备工作很多，首先应当思想先行。搞好战前的思想动员教育，是团结和激励部队英勇作战、夺取胜利的中心环节。他积极配合政委郭化若，千方百计把战前的思想动员和教育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他们首先强调提高指战员对渡江作战重大意义的认识，以激励部队积极求战的情绪。宋时轮说：“从军事上看，蒋介石把长江作为一线防御的天然屏障，妄想阻止我军南进；从政治上看，蒋介石妄图把长江作为分界线，造成国共南北分治的局面。其最终目的都是企图争取时间，重振旗鼓，卷土重来。因此，我们一定要高度重视渡江作战的重大意义，充分做好渡江作战的各项准备工作。只要上级一声令下，我们就立即投入战斗，绝不能给敌人以喘息之机。要坚决打过长江去，解放全中国。”他的这番话在全兵团传达以后，很快在部队中进一步掀起了积极备战的新的热潮。他和郭化若还要求部队各级领导，针对指战员对江水和军舰的顾虑，给干部战士介绍江情，组织干部战士到江边“看水”，到群众中“访水”，请老船工到部队“讲水”，请懂得军舰的同志介绍军用舰艇的作战特点和性能。他们指示司、政机关，在部队中广泛宣传我军一些小分队先行渡江的成功事例和经验，指导部队把开展江情教育同进行渡江训练结合起来，努力提高渡江作战的本领，进一步增强渡江作战的胜利信心。

宋时轮认为，战前准备工作很多，重在准确摸清敌情。准确掌握敌情是周密制定作战计划、正确实施作战指挥的重要保证。他在接到第三野战军前线指挥部关于已经明确渡江地段的部队，应积极开展对该段敌情侦察的指示以后，立即指示各军：渡江前应设法派遣小分队过江，与江南游击队取得联络，侦察敌军情况，配合大部队过江。他亲自下到第一梯队军前沿，观察水情和对岸敌军情况，听取汇报，直接了解和掌握实际情况。当第27军党委考虑派一支营级规模的侦察大队渡江进行侦察，感到有些风险，向兵团领导请示时，他立即率先表示支持，并在侦察大队出发前，请兵团首长亲自接见他们，进行动员，给予指示。侦察大队渡江成功后，他又与兵团其他首长

迅速发去嘉奖令，对指战员们表示祝贺，要求他们戒骄戒躁，连续作战，积极与地下党组织和游击队配合，继续圆满完成各项侦察任务。后来，这个侦察大队的任务完成得颇为出色，不仅侦察到许多敌军的重要情况，及时向军里作了汇报，而且有力地配合了第27军的渡江作战行动，还总结了一套偷渡与强渡相结合的经验，在部队中推广。建国后，上海电影制片厂曾以这个侦察大队为原型，创作、拍摄了一部《渡江侦察记》的影片，在全国放映以后，获得极好的效果。

宋时轮认为，战前准备工作很多，必须着力抓好关键。他与兵团其他首长认真研究了渡江作战的主要矛盾，一致认为，渡江准备的关键是要使部队做到“能渡，善战”。在诸多准备工作中，应着力抓好：多方准备船只，大力训练水手；开展军事民主，搞好水上练兵；探索渡江战术，确保“能渡、善战”等几件大事。他亲自率领机关，以主要精力指导部队进行这些工作。他要求所属部队各级领导要“面向连队，深入下层，表扬典型，推动全盘”。在他的直接领导和关怀下，这些工作进展很快。渡江前，第一梯队两个军征集和制做帆船、轮船、木排共1171只（艘），征用船工、水手共2761名，并进行了船只编队、运载各种火器和偷渡、强渡的训练，基本上达到了“人人学会游泳和水中救生”的要求。他尤其重视渡江作战的战术问题，对此更是费尽心力，作了深入的探索，提出并明确了一系列有关的问题和方法：一是偷渡与强渡相结合的问题。对于整个部队来说，既要准备强渡，又要利用一切可能进行偷渡。对于偷渡部队来说，既要力争偷渡，又要准备偷渡不成实施强渡。各部队都要做好偷渡和强渡的两手准备，争取渡江一举成功。二是船舶渡江队形和航速问题。船舶编队要一字形展开，由分队指挥员在前引航与组织联络。航速要先慢，以保持体力和隐蔽，在靠近彼岸或被敌发觉后，要加快航行，以求迅速靠岸登陆。第二梯队跟进，既不要冲扰第一梯队，又能不失时机地到达彼岸，以保证协同第一梯队作战。三是第一梯队登陆位置的选择问题。依据敌江防工事与兵力分布情况，以选择沿江村庄间隙登陆最好；如能适当解决攀登技术问题，则可选择陡岸或很不便于攀登的地方登陆；应避免将登陆地点选在村庄交叉路口或固定码头。四是第一梯队登陆作战的方法问题。在一定的物质条件下，应注意把智、勇、快三者适当结合起来。智，是恰当运用包围、迂回，善于抓住敌人弱点，灵活应付各种情况。勇，是在任何惨烈情况下，都能坚持做到不恐慌、不动摇、不丧气，始终保持顽强的意志和果敢勇猛的行动。快，则是不迟疑、不犹豫、不浪费一分一秒，以快速的动作登陆和解决敌人。渡江登陆作战要改变过去攻坚的一套办法，第一梯队的各分队必须准备并能够独立地解决战斗。对敌军沿江的地堡、工事，必须打开一个缺口，并以适当兵力插入其纵深，以巩固突破口，保证第二梯队登陆。

第9兵团渡江作战准备工作重点突出，抓得全面，效果很好，曾受到上级首长的表扬。

国民党高唱和平谈判，并非顾及人民的利益，真心要求和平，而是为了争得一个喘息的时机，以便重振军力，伺机进行反扑。因此，当和谈一旦触及到他们的反动统治，他们必然会千方百计地进行拖延、破坏，甚至会不顾一切撕毁伪装，继续作垂死挣扎。党中央对此是十分清楚的。中央军委鉴于国共双方和谈代表团可望在4月15日拟就《国内和平协议（最后修正案）》，并可望商定4月20日为最后签字日期，即于15日致电总前委和粟（裕）、

张（震）与刘（伯承）、张（际春）、李（达），指出：南京政府是否愿意签字尚难预料，有可能拒绝签字。因此，你们接电后，应“立即准备好于20日前确实攻占除安庆、两浦以外的（敌）一切北岸及江心据点。”4月16日8时，中央军委又电示总前委和粟、张与刘、张、李，要求他们：要把立足点放在谈判破裂用战斗方法渡江上面，并保证于22日（卯养）一举渡江成功。

宋时轮接到上述电报后，立即与郭化若、覃健等兵团首长进行研究，于4月16日拟就了《本兵团攻占西梁山等江北岸（敌）据点的作战命令》，接着在总前委召开的研究渡江作战的会议上作了汇报。总前委在会上批准了第9兵团上述命令中规定的作战部署，并进一步决定：宋、郭兵团在鲁港到荻港间渡江，于20日晚开始夺取鲫鱼洲、黑沙洲等江心据点，21日（马夜）向鲁港、荻港间以偷渡和强渡相结合的办法，夺取南岸敌军的全部阵地，并继续向南发展；兵团大部于22日登陆完毕，完成对繁昌、南陵之包围并攻占之。

作战任务明确以后，宋时轮兴奋不已，心潮起伏。他一方面憧憬着胜利后的巨大喜悦，一方面思考着指挥上的各种问题。他首先想到的一个问题是：兵团投入作战后，是先占江心据点，再从鲁港、荻港间强渡，还是把这两步并为一步，在打江心据点的同时组织全部参战部队渡江，以保持作战的突然性？他和往常一样，决定带着这个问题到担任第一梯队作战任务的军里走走，听听大家的意见。17日夜，他带着警卫人员来到临江坝附近之神塘河前方，与第25、第27军的军、师领导干部进行了研究。大家一致认为，为获得渡江作战的突然性，保证渡江一举成功，部队可于20日夜打黑沙洲的同时全部渡江。宋时轮立即将此意见通过电话告诉郭化若。郭化若表示完全同意，并于18日15时向总前委作了报告。当日19时，总前委即复电郭化若并第二、第三野战军及第7兵团，指出：第9兵团“提议二十日夜与打黑沙洲同时全部渡江，对于这点只要有可能就可以这样做。总之，整个战役从20日晚开始，就一直打下去。”后来的实践证明，这一建议是正确的。它符合中央军委关于“一举渡江成功”和总前委多次指示渡江“开始之后不可能也不应该再作停顿”的精神，对渡江作战胜利发挥了积极作用。

在渡江战役计划中，关键是中、东两突击集团“实行东西对进，力求迅速会合”，即以第三野战军第7、第9兵团组成的中突击集团和以第8、第10兵团组成的东突击集团，分别于南京东、西两侧的凹部渡江，尔后迅速围歼南逃之国民党军。4月初，宋时轮在与兵团其他领导同志研究《京沪杭战役实施纲要》时，着重指出，应认真领会《纲要》中关于战役关键问题的指示，要看到“此着成功，既可使东线兵团不致孤立，使东线主力作战有必胜之把握，又可做到打乱敌人作战体系，达成割裂包围敌人之目的，故此着实为全战役之关键。”他说：“这是要包敌人的饺子。我们一定要和兄弟部队一起，很好地完成这一光荣而艰巨的任务。”经过研究，兵团领导很快统一了认识，于4月4日下达了《兵团作字第三号命令》，确定兵团在突破敌军江防后，“直趋宜兴、溧阳及其以南地区，集结待机，以策应我第八、第十兵团作战，并堵击京、镇可能南逃之敌，（将其）聚歼于京、镇、句、丹、金、武、溧地区”。

1949年4月20日，国民党政府果然拒绝在和平协议上签字。当夜，我中突击集团即按预定计划发起了渡江战役。

这天，第9兵团第一梯队军各部队的晚饭都开得特别早。各连炊事班都

多做了几个菜，还备了酒。团领导也都下到连队，和指战员及参战的船工一起共饮“齐心酒”，并再次对连队作了简短的战前动员，传达了来司令员和兵团及军、师首长对大家的希望与要求，激励指战员们发扬光荣传统，争取在渡江战役中再立新功。

夜幕降临。从19时20分开始，各连迅速按照预先规定的位置，把各种船只从隐蔽的河汊里，顺着新开挖的渠道，开往或拖进长江。霎时间，成百上千艘各种船只只在长江北岸一字摆开，恰似已经开弓的利箭，随时准备射向长江南岸。炮兵阵地上，所有的大炮也都卸去伪装，脱掉炮衣，黑侗侗的炮口直指前方，随时准备将复仇的炮弹倾向南岸的敌军阵地。

20时20分，先头部队接到了震撼人心的渡江命令：“调好船头，开船！”第9兵团第27军第79师第235团一马当先。战士们先是积极协助船工静悄悄地将船向江心划去，接着便在敌人的炮火下用身体护卫着船工奋力将船划向对岸。船工倒下了，战士们立刻接上去划；前面的船被打沉了，后面的船迅速冲上去；登岸时遇到陡壁，就架起梯子、搭上人梯往上爬；遇到铁丝网挡道，立即冲上去剪开它；敌依托地堡对我阻击，就送上炸药包将它炸掉。指战员们一边奋勇冲击，一边还击敌人，不断向前推进。至21时15分，第235团已全部登上了长江南岸，为第9兵团争得了首批渡江成功的荣誉。

4月22日晨，第9兵团参战部队全部渡过长江，第一梯队军占领了繁昌等地。宋时轮立即向部队通报：“长江天堑已被我征服！”并指示部队：目前任务是断敌退路，配合兄弟兵团歼灭逃敌。当天下午，国民党军开始由南京等江防一线向浙赣路及杭州、上海撤退。17时，第三野战军代司令员粟裕、参谋长张震命令：宋、郭即率第25、第27两军全部以急行军经青弋江、宣城向郎溪、溧阳之线挺进，与东突击集团第10兵团第28军打通联系，完成截断敌向南之退路。接电后，宋时轮、郭化若立即命令第27军由繁昌出发，不分昼夜，不顾疲劳，不为小股敌人所牵制，疾速东进。第27军受命后行动坚决，指战员们不顾连日作战的劳累，克服阴雨连绵、道路泥泞带来的困难，昼夜兼程，向东进击，先后占领了南陵城、宣城、广德城和界牌镇，并歼敌一部。第25军也于23日在湾址歼灭国民党军第20军主力1.3万余人，而后继续向东急进。

4月27日1时40分，宋时轮命令第20、第25、第33和第24军由现地分别向长兴合击，并与第27军取得联系。同日，第27军与第10兵团之第28军在吴兴会师，将由芜湖、南京、镇江地区南撤之敌第4、第28、第45、第51、第66等5个军包围于郎溪、广德地区。

为速歼被我包围于郎溪、广德地区的国民党军这部分主力，粟裕代司令员和张震参谋长电告宋时轮、郭化若统一指挥第9、第10兵团7个军作战，完成此一任务。这时，国民党军已成兵败如山倒之势，被围敌军更是军心涣散，不堪重击。宋时轮洞察形势，立即与郭化若命令部队：不要片刻休息，迅速发起攻击，发扬勇猛战斗作风，注意保持相互协同，迅速歼灭被围之敌。部队接到命令后，指战员们个个无比兴奋，不顾疲劳，连续作战，猛打猛冲，经两日激战，至29日，便全部歼灭了敌5个军、共8万余人。至此，第9兵团圆满完成了上级赋予的渡江作战任务。

宋时轮对此役感触颇深，他深为我“百万雄师过大江”，“横扫千军如卷席”的恢宏气势和英雄壮举所激动，而后他常说：“渡江之战才是我军的战略进攻”！



渡江战役第一阶段——突破江防，占领南京；第二阶段——围歼芜湖、南京、镇江逃敌，占领浙赣铁路的任务完成以后，立即转入第三阶段——攻占上海，歼灭国民党军主力汤恩伯集团。

上海，不仅是国民党重兵防守和有坚固设防的城市，而且是我国当时的工商业中心，同时还驻有许多国家的领事馆和侨民。夺取上海，是一场十分艰巨、极为特殊的战斗。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在解放上海前曾向总前委、华东局和第三野战军发出过一系列指示。中央军委于4月27日指出：“国民党在沪军队有迅速撤走可能……上海和平解决之可能性甚大”，“进攻上海的部队不要过于迫近上海，以免吓跑敌人”；28日指示：“我方对英美侨民（和一切外国侨民）及各国大使、公使、领事等外交人员，首先是美英外交人员，应着重教育部队予以保护”；30日和5月3日先后指示：“总前委除直接领导南京工作外，请迅速抓紧完成占领上海的准备工作……”，应“令军队学习政策和接管城市事项”；5月6日指示：“请粟、张即行部署于五月十日以后，五月十五日以前数日内，先行占领吴淞、嘉兴两点，封锁吴淞口及乍浦海口，断绝上海敌人逃路，使上海物资不致大批从海上运走，……并迫使和平方法解决上海问题成为可能”，“但是你们仍须准备在不可避免的情况下，早日去占领上海。你们的准备工作愈快愈好。”以后，还对这次战役的指导思想作了明确的规定：既要打一场城市攻坚战，又不能把上海打烂，要将上海完整地接管过来，以利今后的建设。

1949年5月9日，第9兵团接到解放上海的作战命令。战役发起前，中央军委还决定上海解放后由第9兵团负责全市的警备工作，宋时轮兼任淞沪警备区司令员，郭化若兼任淞沪警备区政委。宋时轮和郭化若接到这些命令、决定后，立即主持召开兵团党委会，经过充分讨论，作出了“一定要打好、进好、管好上海”的决定。“打好”，就是要既歼灭敌人，又不打烂上海；“进好”，就是要讲政策，守纪律，爱人民；“管好”，就是要肃清匪特，打击敌人的破坏活动，保护上海人民和对上海的军管。决定作出后，立即在浙江南浔驻地召开兵团团以上干部会议传达了党委通过的解放上海的作战决定与部署。

针对上海敌军的防御部署，第三野战军决定夺占上海的总体计划是：以第9、第10两兵团首先采取钳形攻势，从浦东、浦西两翼迂回，进逼吴淞口，先断敌海上退路，尔后围攻市区，分割歼敌。具体部署是：以第10兵团首长指挥之第26、第28、第29、第33军附特种兵纵队炮兵一部，由常熟、苏州地区向昆山、太仓、嘉定地区攻击前进，歼灭该区之敌，直插吴淞、宝山，封锁黄浦江口，截断敌之海上运输及退路，然后由西北向市区进攻；以第9兵团首长指挥之第20、第27、第30、第31军附特种兵纵队炮兵一部，首先以第30、第31军由南浔、吴江等地迂回浦东，向奉贤、南汇、川沙攻击前进，进逼高桥，协同第10兵团确实封锁吴淞口，以第20、第27军由松江以南和嘉兴及其以东地区向松江、青浦攻击前进，尔后该兵团由东、南、西三面与第10兵团会攻上海市区之敌。

根据以上部署和兵团党委的作战决心，宋时轮在南浔会议上指出：兵团在战役前期的关键是浦东作战。他命令第30军必须于5月16日24时前攻占川沙、白龙港地区，进逼高桥，与第10兵团形成夹击吴淞口之势，断敌海上逃跑的道路；第31军以主力担任第30军的第二梯队，尾随第30军之后，随时准备加入浦东作战；第20、第27军从驻地出发，迅速向松江、青浦攻击

前进；尔后，全兵团由东、南、西三面与第10兵团会攻上海市区，歼灭守敌。

各部队受领任务后，立即再次展开了紧张的战前准备：进一步检查、完善作战计划，落实武器、弹药及物资准备；深入学习城市政策、纪律，做到“人人受教育，一个都不漏”；继续开展挑战、应战活动，掀起新的杀敌立功竞赛热潮。

5月12日，我军向上海外围之敌发起进攻。第9兵团部队按照宋时轮的命令，发扬勇猛战斗作风，猛打猛冲，一往直前，至14日，先后攻占了平湖、奉贤、南汇和松江、青浦等地，进逼川沙，威胁上海守敌侧背。敌被迫由市区增调第51军至白龙港、林家码头加强防御。第10兵团也相继攻占了昆山、太仓、嘉定、浏河等地，继续向月浦、杨行、刘行之敌发起猛攻。此时，国民党汤恩伯守军，利用钢筋水泥碉堡群，在海、空军支援下，拼死顽抗，并在坦克、装甲车掩护下连续实施反击，我军进攻暂时受阻。宋时轮得报后，立即根据总前委的指示，结合本兵团的实际，指示部队：要“寻求（敌军）弱点，设法插入，可采取二路突破，然后形成钳击，把敌军分割成块，逐块围歼之。对敌碉堡群攻击时，用兵不要过多，一般用1~2个班攻1个地堡即可，避免兵力多了遭敌杀伤。”根据宋时轮的指示，部队迅速改进战法，采取二路突破，形成钳击，分割围歼，并以小分队为主，实行火力、爆破、突击紧密结合的攻击战术，逐个夺取敌军地堡，很快便打破了僵局，加快了战斗进程。19日，攻占川沙，并在白龙港地区全歼敌第51军，进而将敌第12军压缩于高桥地区。此时，第9兵团与第10兵团形成了夹击吴淞之势。

24日，第9兵团进入市区作战后，残敌继续凭借高楼大厦进行顽抗，以猛烈火力阻止我军前进，一些部队遭到较大伤亡，攻击一度受挫，部队干部战士产生了急躁情绪，要求使用重武器对敌死守的楼房进行轰击。宋时轮得知后，亲自重申兵团决定：在市区作战不得使用重武器，要尽量减少对城市的破坏。他指示部队：在万不得已时，可绕过敌人的火力点，继续发展进攻。部队接到命令后，立即在前沿召开了党委会或常委会，统一思想，要求部队严格执行兵团的命令，千方百计击败敌军的顽抗，继续向前推进。

这时，敌京沪杭警备总司令汤恩伯已逃离上海，其残部也已军心大乱。宋时轮马上抓住这一有利时机，和郭化若一起指示部队：要继续大力加强军事攻势，同时开展强有力的政治攻势，瓦解敌军斗志，促使敌军起义、投诚。这一指示迅速传达后，各部队立即军政攻势并用，很快便促使大批敌军放下了武器。至26日，第9兵团攻入上海市区时，在上海地下党组织的配合下，争取了国民党军官兵约4万人投诚、起义。

27日，上海全市解放。

上海解放、部队入城后，宋时轮和郭化若又立即指示各军：上海是个国际城市，我军的一举一动影响很大，各部队一定要认真贯彻兵团党委关于“进好”上海的决定，严格执行党的城市政策和有关纪律，时刻关心和爱护群众的利益。根据宋时轮、郭化若的指示，第9兵团部队入城后，指战员们都自觉坚持不住民房、不扰民，在没有找到营房时一律睡在马路上，下雨时就在房檐下暂避。第27军军部指挥所设在马路边，从军长到战士全部露宿街头。指战员们都自觉做到不拿群众一钱一物，积极为群众做好事。第20军入城后，一些部队负责看管仓库，库房里罐头堆积如山，始终没有人动过一个。第30和第31军部队在战斗中宁可自己增加伤亡，也要处处注意保护人民群众，在完成作战任务后，又主动参加助民劳动。上海解放后第6天，宋时轮

和郭化若还报请市军管会批准，以淞沪警备司令部的名义发出布告，将作战中缴获的国民党军队强行征用的数千辆汽车发还给原主。上海广大市民从人民解放军的实际行动中认识了我军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无不交口称赞，由衷敬佩。

在抓贯彻“进好”上海决定的同时，宋时轮还十分重视落实“管好”上海的决定。早在指挥部队参加解放上海作战的同时，他就带领参谋人员看地图，查资料，进行精确计算，制定了对上海的警备方案。该方案将上海划分为5个警备区，并给各军具体分配了警备任务。因此，上海刚一解放，担任警备任务的各部队很快就进入了各自的警备区域，在全市共设置了5000多处岗哨，将21万大军迅速展开，投入了警备工作。

为了把公开警备和秘密警备结合起来，进一步加强警备工作和办案力量，同时考虑到上海解放初期政法战线忙于接管和原警察局需“拆屋重建”等情况，宋时轮很快向上级建议，成立淞沪警备司令部军法处，全面负责对匪特的侦破、拘捕、审讯和上报案情及结案处理等工作。军法处成立后，迫切需要解决干部、枪支和交通工具等问题，他又及时从各军选调了几十名干部随带短枪、子弹到军法处任职，调拨了1辆轿车、1辆吉普车和1辆大卡车专供军法处使用，还请求上海市委从地方抽调了一批熟悉城市情况、有办案经验、政治上可靠的干部到军法处工作。

为了集中各方面的力量，密切配合行动，加快社会治安治理的进程，宋时轮还提出把警备部队和地方干部及公安部门的力量统一组织起来使用。他建议，以区为单位成立治安委员会，市成立军警民联合办事处。办事处由他亲任主任，市公安局局长和民政接收处处长任副主任，定期联合办公，一起分析社会治安情况，研究制定加强治安的措施，通力合作，协调行动。

军法处和联合办事处成立以后，进一步提高了办事效率，加强了警备和治安工作，使一些重大社会治安问题迅速获得了解决，特别是一些大案要案迅速得到了侦破。在不到1年的时间里，上海全市共侦破、处理了各类政治、匪特、刑事及经济等案件3626起，抓捕罪犯1.4万余人，从而有力地打击了各处暗藏敌人和犯罪分子的破坏活动，维护了上海的社会治安和秩序，保卫了上海人民生命财产的安全。

在解放上海和保卫上海人民安全的斗争中，宋时轮做了大量工作，作出了很大贡献，他的英名和业绩一直深深铭刻在上海军民的心里。上海警备区在给宋时轮纪念文集撰写的文章里深情地写道：“宋时轮司令员在上海战斗、工作的时间虽然不长，但建树的功勋业绩是永存的。上海军民将永远尊敬他、怀念他！”

## 陈士榘在长征中

刘恩营

陈士榘（1909～1995）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湖北省钟祥县陈家新集人。1927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入中国共产党。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后上井冈山，任中国工农红军第4军排长、副连长、副营长、副大队长。后任红12军第34师参谋处处长、参谋长，红1军团司令部作战科科长、教导营营长，第4师参谋长、随营学校校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15师343旅参谋长，晋西支队司令员，八路军第115师参谋长，滨海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新四军兼山东军区参谋长，华东野战军参谋长兼西线兵团司令员，第三野战军参谋长兼第8兵团司令员，南京警备司令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华东军政大学副校长，军事学院训练部部长、教育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工程兵司令员兼特种工程指挥部司令员、政治委员，中共中央军委顾问。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他是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届中央委员，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顾问。1988年被授予一级红星功勋荣誉章。1995年病逝。

\* \* \* \* \*

1934年，陈士榘同志参加了著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长征中，他大部分时间跟随毛泽东同志，历尽艰难险阻，跨越雪山草地，闯过死亡区域，创造了人间奇迹。24年后，作为军委工程兵司令员的陈士榘上将，奉党和毛泽东主席之命，再次踏上长征路，担负起建设两弹（导弹、原子弹）基地的艰巨任务，踏遍了杳无人迹的瀚海沙漠，建成了壮国威扬军威的两弹基地，迎来了两弹腾飞的时代。

### 一走长征路万里征程创奇迹

陈士榘，原中央军委顾问、军委工程兵司令员，这位荆楚大地的骄子，曾经自豪他说过：“我比曾任新军工兵管带参加过辛亥革命的父亲陈午霆更幸运。我一参加革命便上井冈山踏上一条正确的革命道路，直接受到毛泽东的教导。”在谈到举世闻名的长征时，陈士榘又说：“如果当时毛泽东留在中央苏区，长征的后果就很难设想了，毛泽东参加长征才有了遵义会议的伟大转折，这是中国革命和我们这些长征人的幸运。”

事实正是如此，陈士榘得到毛泽东的直接教导，在井冈山革命摇篮里成长；在充满艰难险阻的长征中，陈士榘再度跟随毛泽东，创造出闻名中外的人间奇迹，常令陈士榘将军无限激动和自豪……

遵义会议结束了“左”倾路线在中央的统治，毛泽东回前方指挥来了，艰难征战的红军将士立刻变了样子。三渡赤水陈士榘茅台架浮桥，毛泽东傲立桥头，充满自信……

这是一个伟大的历史性转折。1935年1月15～17日，党中央在贵州省遵义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会议着重纠正了“左”倾冒险主义在军事上和组织上的错误，结束了左倾路线在党中央的统治，开始了以毛泽东为核心的党中央的新的领导。在最危急的关头，挽救了党和红军，挽救了中国革命。

毛委员回前方指挥来了！消息传来，艰苦征战中的红军将士，欢呼雀跃，

精神振奋，一扫往日的疑虑和愤懑。几万人的红军突然间又变成了随处可见的神兵天将，迂回穿插于敌人之间。敌人以为我西进却又向东，以为我渡江北上却又返途回击。红军处处主动，“调动”敌军，搞得敌人晕头转向，被动挨打。巧攻娄山关、遵义城的激战，老鸦山、乌江边穷追敌兵，捷报频频传来，我军连续歼敌三个多师。

蒋介石的几十万追兵被搞得心惊胆战，无可奈何，这与“左”倾盲动时期我军的惨状，形成了鲜明的对比。

红军三渡赤水，毛泽东傲然挺立桥头，兴奋他说道：“调出滇军就是胜利，这还要有劳蒋委员长哩！”

其时，陈士榘任红一军团教导营营长，柴树藩任党代表。

1935年3月16日，中央红军为“调动”和迷惑敌人，决定三渡赤水河，向川南进发。朱德提出：由陈士榘指挥教导营和军委工兵营联合架桥。毛泽东赞同地点点头：“请总司令决断。”

教导营是长征前夕由部队整编时收编多余的连级军政干部组建的。这些干部士兵既有指挥能力和作战经验，也有许多能工巧匠，个个都很能干，善于单独完成任务。受命后，陈士榘和军委工兵营长谭希林立即进行勘察，选定在赤水河东岸的茅台镇附近架设浮桥。

茅台镇位于川黔交界处的贵州省仁怀县境内，以茅台特有的优质水酿制的茅台酒，醇美香甜，闻名中外。这里原来有座铁索桥。红军到此之前敌军飞机已将连接铁索的船只炸掉。经过发动群众，深入调查，决定用盐船架设浮桥。热情的群众不仅献出盐船，还捧出当地特产茅台名酒为我红军壮行，大家高兴极了。有酒量的痛痛快快地过了个茅台瘾。由于连续行军，许多人的脚都走出了血泡，天气潮湿，雨水较多，血泡破了化脓甚至溃烂，有人提出用茅台酒洗脚消毒。毕竟是茅台酒名贵，真觉得可惜，便想了个节约的办法，即用脸盆盛酒，大家轮流洗泡。正是酒助人兴，指战员们情绪高昂，一连架起两座浮桥，并铺设了一个徒涉场，任务完成得十分漂亮。

中央军委首长首先通过浮桥。毛泽东高大的身影显得格外突出。他傲然立于桥头，审视着浮桥，见到陈士榘等打趣他说道：“你们有办法，喝了茅台酒，架了茅台桥，真的过了茅台瘾啰。”赤水河碧波碧水，流经脚下，引得毛泽东凝神观望，自言自语：“好水啊！”随之，他蓦然抬头，将手中的烟头远远抛去，充满自信他说道：“现在是三渡赤水，要把滇军调出来，调出滇军就是胜利。这还要有劳蒋委员长哩！”

当时，陈士榘尚不完全明白“有劳蒋委员长”的含意，只知道这次行动是按照黎平会议的精神，要向敌人力量薄弱的贵阳前进。

毛泽东突然出现在贵阳的消息，使得亲临贵阳督战的蒋介石坐卧不宁。开始，他将信将疑，嘴里不断地嘀咕：难道毛泽东插了翅膀……。转而即拍案叫骂。夫人宋美龄闻之又惊又怒，一气之下，她将一张十万分之一的军用地图撕得粉碎，向厕所狠狠地甩去。

蒋委员长不知道，红军会三渡赤水，再入川南。他以为我们要北渡长江，调集兵力向我逼近。但红军又由川南突然折回，于天平渡四渡赤水，转而南进，渡过乌江，直逼贵阳。

地处贵州省中心的贵阳市，群山环抱，东、西、北三面有扶风、栖霞、黔灵诸峰。市内虽然只有八九平方公里的平地，但在地无三尺平的贵州省，那是独占风光。时当阳春三月，蓝蓝的天空飘着几朵白云，如丝如玉。秀水

青山，鸟语花香，贵州城恰似一个少女，妆扮得婀娜多姿。

此时，贵阳城郊区则是另一番景象，墙壁上刷满了醒目的大标语：打进贵阳城，活捉蒋介石！嘹亮的《国际歌》声此起彼伏，“打进贵阳城”的口号声慷慨激昂。先期抵达的红1军团的部队，摆出一副立即攻打贵阳城的架势，城里的敌军惊恐万状，惶惶不可终日。

蒋介石心焦如焚，十万火急地命令云南军阀、省主席龙云率部前来保驾，又令薛岳和驻湖南的部队东进来援。这时候，陈士榘才真正明白，毛泽东真是料敌如神，不禁拍案叫绝；蒋介石果真调来滇军几十万追兵，连蒋介石本人也给“调动”起来了！

当时，我红1军团包围贵阳城东南的龙里，那阵势似随时都可能进驻贵阳。而红军大部主力却已穿越湘黔公路直插云南，恰与驰援的滇军相背而行。其间，红军与敌军虽然偶有遭遇，但因龙云手握蒋介石的急援电令不敢怠慢，只是放放空枪，便匆匆而去。毛泽东神机巧算，以我意图“调动”敌人，声东击西，使敌如入五里雾中，真可谓“运用之妙，存乎一心”。

我军前后四渡赤水，这是毛泽东的精心设计。三渡赤水时，蒋介石最为狼狈。他坐镇贵阳督战，一手指挥着湘、桂、川、滇、黔等数省国民党军百万，对我几万红军进行围追堵截。可是，这个拥兵自重，一心使红军变成“石达开第二”的蒋委员长，不仅连红军的影子都难以找到，连他自己也陷身在红军的包围圈里了。这真是天大的讽刺，留下了千古笑谈。这在国民党上层人士中议论纷纷。其中，国民参政员黄炎培先生说得最富情趣。他把蒋介石被围与红军用茅台酒洗脚的事联系起来，说难怪红军这么厉害，原来是用茅台酒洗了脚的缘故，红军将士用茅台酒洗脚之后，一个个都变成了云里来雾中去的神兵天将。

1943年，国民党掀起第三次反共高潮时，沈钧儒先生郁郁不乐，其次子沈叔羊为排解父亲的郁闷，作了一幅画。画面上有一把酒壶，壶上写有“茅台”二字；壶边另置几个杯子。黄炎培先生看到此画后，联想到红军长征中用茅台酒洗脚的传说，便欣然命笔，写了一首七绝：

宣传有客过茅台，酿酒池中洗脚来；

是假是真我不管，天寒同饮两杯。

这首七绝，为画幅平添了几分情趣，更为有趣的是，这幅画竟被毛泽东挂在延安杨家岭住所的会客室里。

1945年7月1日，黄炎培与冷遹、褚辅成、章伯钧、左舜生、傅斯年等6位国民参政员，应毛泽东之邀，赴延安访问。次日，当黄老先生在毛泽东的会客室看到他亲题七绝的画幅时，感到十分惊奇，他万万没想到，这幅画竟挂在共产党领袖的客厅里。顿时，一种少有的知遇之感使他激动不已，不禁侃侃而谈。毛泽东赞赏画作得很好，诗题得亦妙，说黄老心正品正，笔端情浓，黄老先生听罢连连摆手称愧。

上述的一些轶事趣闻，令陈士榘这个当年用茅台酒洗脚的人感慨万端：毛泽东将“茅台”画作视为上品，那么他亲自指挥的渡赤水，运神兵的战例，更应是一篇永载史册杰作。

教导营行军至深夜，部队刚吃过一顿猪肉，便接受攻打定番城的命令。  
陈士榘巧借敌旗，出奇制胜……

1935年4月10日左右，贵阳城外，龙里前后，涟江两岸，激战正酣。天上敌机横冲直撞，狂轰滥炸；地面枪炮声相互交织，如雷似雨。红1军团第1师的战斗打得尤为激烈。看似即将攻打贵阳，鏖战之中，突然间不见了红军踪影，敌军自我相残，胡乱打了起来。

红1军团包围龙里，为掩护主力进军云南，便虚张声势，连克定番（今惠水）、广顺、兴义等数县县城。其中，定番位于贵阳以南，是自贵阳入滇的交通要冲。首克定番，既可以迷惑敌人，又便于监视贵阳之敌的动向。

教导营于4月9日通过龙里至贵阳公路的封锁线后，第二天天色未明，又悄然出发。由于蒋介石急令调兵，各路敌军纷纷赶援贵阳，虽红军一路多与敌遭遇，只是激战一时，虚晃一枪，实际是边打边走，不停地运动。

连续翻过两座大山后，教导营早已把敌军远远地甩在后边。但准备宿营时，却未找到足够的房子，陈士榘只好率队沿着宽宽的山脊继续行进。大约走了30多华里，在距军委机关不远的地方，见到一处房子。房屋虽然破旧，倒也十分宽敞。仔细一看，这里已被军委直属部队先行扎营，连房外的草坪、树下都挤满了人，在无线电充电机的隆隆声中，大部分人已经入睡。见此情景，他心里突然感到不踏实，于是急忙找到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领导的住处，在微弱的灯光下，他们正在一间小房子里研究布置红军的行动计划。陈士榘进门后问道：“首长，你们就住在这个地方？”

几位首长听到话音，先是一齐看了看陈士榘，然后相互对视，接着便都笑了。朱德首先说道：“士榘同志，你莫担心，这房子破旧，目标不明显，反倒安全。”

毛泽东、周恩来动员陈士榘再找宿营地，说道：“为了避免部队露营过度疲劳，又便于找给养，你们就再辛苦一程，另外找房宿营。这里的房子就留给陈赓的干部团吧”。

陈士榘明白了中央军委首长的意图，说了声“是！”即带领部队继续前进。夜幕中，还是情不自禁地不断回头看看那座旧房子。大约午夜过后，终于找到了几间房子。部队多数人宿营休息了，他派出一个班到三里路外的村子去打土豪、筹粮饷。不多时，这一班人高高兴兴地抬回两头大肥猪，忙得炊事员一夜没有合眼，为部队操持一顿晚餐。

第二天，东方刚刚泛起鱼肚白色，就接到总司令部命令：一军团教导营马上出发，经赤城镇向定番前进，占领定番城后宿营。并指示：定番至贵阳百余里，注意向该方向警戒。

部队早饭就吃上了猪肉，这在紧张的战斗生活中是不容易的。战士们一面说土豪的猪肉香，一面称赞辛苦了一夜的炊事员。陈士榘吃着溢油喷香的大肉片，又想起了毛泽东，要是他在这里，至少得吃上一大碗肥肉！

有了战斗任务，又吃上了猪肉，战士们情绪高昂，一口气走了40多华里，到达赤城镇附近。这里地势平坦，人烟稠密，景色十分秀丽。沿河边，古老的水车吱嘎作响，与战士们的歌声恰相配合；两岸的绿柳细枝像一条条姑娘的辫子，在微风中轻轻摇曳，格外动人；青青的麦秧铺掩大地，泛起层层绿波……果然是一派盎然春色和安乐景象，给这些长期紧张行军作战的人增添了几分情趣和欢乐。

骤然间，敌人的飞机隆隆地直飞过来，在他们头顶上急急地转圈子，顿时打破了人们的兴致。按照惯例，敌机一旦发现红军，定会狂轰滥炸，折腾一阵子。可是这次恰恰相反，没有轰炸扫射，却匆匆向西飞去。陈士榘顺着

周围的地形仔细观察，当发现赤城镇区公所飘着的“青天白日”旗帜时，心里顿时豁亮了。原来“青天白日”旗在这时候还可以排上点用场，便当即决定来个隐真示假，让传令兵也打起“青天白日”旗，走在前面。部队加快了行军速度。

在快到定番城时，看见城墙上人头攒动，一些人老远就争先恐后地向他们招手。国民党县党部县政府的头头及其喽啰们，果然把教导营当成中央军来欢迎了。陈士榘心中暗喜，遂令部队迅速接近。当走到城门桥头的时候，还是被敌人识破了。靖街团的哨兵举枪开火，警察急忙关闭城门，登城抵抗，但为时已晚。教导营第1连的一个班已经迅速爬上城墙，当场击毙几个守城的团匪，部队迅速扑了上去。敌人见红军来势迅猛，在一片叫喊声中狼狈地滚坍下去，只有县政府的财政科长，摇摇晃晃地像只肥鸭子，大概是榨取百姓的血汗太多，胖得连路都走不动，乖乖地当了俘虏。

红军占领定番城后，继续开展群众工作，大造“打下贵阳城，活捉蒋介石”的舆论，并于4月11日召开了城乡群众大会，会上历数了伪县政府和恶霸地主的种种罪状，将一批财物还给了贫苦的工农群众。他们看看手中的衣物，望着满身战火硝烟的红军战士，许多人流着眼泪说：共产党领导的红军，才真正是救穷人、救中国的活菩萨！

攻占定番城后，陈士榘专门向总部写了报告。毛泽东看后笑着说：“陈士榘用兵得法嘛，他也跟敌人搞名堂哩！”

长征路上，陈士榘受到一次特殊的处分——走路“关紧闭”，毛泽东、周恩来却有不同看法……

中央红军在毛泽东直接指挥下，如云来雾去，乘滇军主力全部东调之际，向云南急驰，直抵金沙江畔，于5月9日全部渡过金沙江，最终彻底摆脱了几十万敌军的围追堵截，取得了战略转移中具有决定意义的胜利。

部队在会理休息5天，中央军事指挥小组研究了下一步的行动计划，决定继续北上，不久便到达了彝族同胞聚居区。

当时，为贯彻好民族政策，对部队过彝胞居住区要求特别严格。尤其是对领导干部，要求更高，并要首先带头，从毛泽东开始，无一例外。

当毛泽东到达彝民区时，彝族同胞听说是红军的首领，便纷纷下山迎接。为了表达他们的情意，还特意将亲手制作的酪枣送给毛泽东，一定要他尝一尝。毛泽东深知彝民的风俗和情意，便恭恭敬敬地接过酪枣，有滋有味地吃起来，并连称酪枣做得好，很好吃，赢得了彝族同胞的热烈喝彩。还有大家熟知的刘伯承和彝胞首领小叶丹歃血结盟，这两件事迅速传开，深得广大彝民的赞赏，从而有效地平息了由于敌人的反宣传和少数汉人欺骗所造成的汉彝民族的严重对立情绪。他们把红军当作好朋友、亲兄弟，主动组织起来，护送红军很快走出彝民区。

为了贯彻好民族政策，部队还普遍进行了纪律整顿。军团部派陈奇涵下来调查，发现教导营减少了几十个人。陈士榘作为营长，当负首要责任。军团司令员林彪、政治委员聂荣臻找他谈话。

林彪首先指出：部队减员大多，要执行纪律。

陈士榘问道：“怎么执行法？”

林彪说：“禁闭一个月。”



陈士榘糊涂了，急忙问道：“部队天天行军，怎么执行法，我还要走路啊！”

聂荣臻几乎笑了起来，最后讲道：“你还是要走，但不准骑马，警卫员、马夫保留。”

“走路关禁闭”，这处分太新鲜了。随后他紧跟部队行军，不指挥，不查哨，自带干粮袋，警卫员到时候给热饭，每到宿营地，还给他找门板搭睡铺，这处分也太舒服了！陈士榘想，长征中行军作战，部队困难很多，我作为一名领导干部，总不能这样舒舒服服地受处分，得干点实际事啊。

他的一点救护知识这时派上了用场。过雪山经过山岬口时，有些人因身体虚弱，疲劳过度，习惯地你靠我、我靠你地停下来休息。由于山上空气稀薄，停下来后呼吸更加困难，因此，有的人倒在地上就再也没有起来。陈士榘曾在武汉宋庆龄、何香凝、陈雨苍办的救护训练班学习过一些救护知识，便用这一点常识主动向大家作宣传，并搀扶行动困难和体弱有病的同志。通过宣传，后来每过一个岬口，大家都格外地警觉，越走越有经验，使大队人马终于艰难地翻过了雪山。一些战友回首那云雾茫茫、梦幻般的雪山时，无不感慨他说：幸亏营长懂得这点常识，才使我们得以通过雪山。

陈士榘对在长征中受到的这一处分，开始时是有些不理解。他认为，在当时的情况下，部队减员十分普遍，谁也没有更好的办法去抵御大自然的无情和魔力。而在行军途中“走路关禁闭”，简直让人啼笑皆非。但是，作为教导营营长，部队减员大多，理应负主要责任。不过，对于这种独特的处分形式，他是永远不会忘记的。

由于在长征中受处分的不止陈士榘一人，其他如黄克诚、萧劲光等，他们也有些不同的想法。解放后，一次在人民大会堂开会时，就这个问题他曾问过周总理，周总理一笑，说道：“这件事主席讲了，延安‘七大’也有个决定，长征中受到的处分一律不算数！”

陈士榘也笑了，并对总理说：我们教导营减员几十人，就给我这个营长禁闭一个月，长征后苏区 30 万人只剩下几万人，如要关禁闭差不多得 800 多年！周总理听后纵声大笑：“陈士榘‘秋后’算帐了……。”

过草地时，毛泽东来到一军团便说，陈士榘下马受罚表现不错，并提出要陈士榘给他当设营司令，接管赵尔陆的工作……

过了茫茫雪山，前面就是漫漫草地。这时候，毛泽东又来到一兵团兵团部，随兵团机关行动。

正在受处分的陈士榘，见到毛泽东显得特别喜悦和激动。毛泽东微笑着走近陈士榘首先说了话：“你是下马受罚，表现不错嘛！”然后又说道：“你搞的民情调查写得蛮好哩，就给我们当设营司令吧，打前站，搞清民情、政情、路情，画图标路，号房子……。”毛泽东还要陈士榘接任赵尔陆供给部长兼司令部管理科科长的工作，赵尔陆一听高兴极了。因为在当时物资供应严重匮乏的条件下，这项工作是很难做的。赵尔陆笑着主动交代了工作，如释重负。

在艰巨的工作面前，陈士榘从来是无所畏惧，他一向喜欢向艰苦困难挑战。最令陈士榘感慰的是，毛泽东那种求实精神和知遇之情，他笑了。从井冈山时期始，毛泽东对陈士榘的才能和政治的坚定性从来深信不疑，毛泽东

也笑了。在那种充满艰难险阻的环境下，他对自己的选择显然非常满意。

从此，陈士榘便带领副官、侦察员和炊事人员先于部队早行一步，一边搞调查，一边插路线标示牌，在宿营地提前埋锅造饭，划分宿营区域，标定驻地房号。这些工作对陈士榘来说，并不费难。困难的是物资供应。面对漫漫草地，常常是几十里甚至上百里路，连个村庄人影都看不到，何来物资供给？而部队过草地体力消耗很大，官兵们体质普遍下降，部队减员情况仍较严重。根据有关敌情和社会情况调查，陈士榘作了认真分析和思考，最后他提出缩短行军距离、增加休息时间的建议，以便发动大家做群众工作，取得人民群众的帮助和支持。毛泽东非常赞同这一做法，他说：“一边行军，一边休息，还可以半天工作。这样部队就精神了，是个好办法。”

面对物资供应的困难，陈士榘时常想到为整个部队筹措物资的先遣团负责人、毛泽东的胞弟毛泽民。毛泽民曾担任过中央苏区闽粤赣军区后勤部部长、中华苏维埃国家银行行长，在当时财政极端困难的情况下，为了30万部队的给养供给和后勤保障，以及统一苏区货币和财政，作出了重要贡献。长征中的条件和环境更加困难艰险，使得先遣团负责人的担子也就更重，他终于积劳成疾，患了严重的气管炎，经常咳嗽不止。大家怀疑他患的是肺结核，但因为条件有限，也不可能停下检查治疗，毛泽民拖着病弱的身躯，始终顽强地工作，每当部队停下来宿营休息时，他还要四处奔波，格外忙碌，积极组织筹集粮款。凭着他丰富的后勤工作经验和顽强精神，为长征中的经济供应和后勤保障工作作出了出色的贡献。特别是他在身患重病，身体状况越来越差的情况下，仍然坚持吃苦在前，享受在后，把困难留给自己，把方便让给别人，救死扶伤，倾力排忧解难，更加感人至深。

毛泽东的支持和鼓励，毛泽民的崇高品德和顽强精神，使大家更加坚定信心。即使困难再大，陈士榘仍穿行于草地之间，抓住一切线索、想尽一切办法解决给养问题。因此，部队每天行军40华里宿营，休息得好，还能做群众工作，给养跟上了，生活有所改善，进入了良性循环，大家体力逐渐恢复，健康水平不断提高，减员情况大为减少。

噢，嗒嗒嗒……毛泽东笑了，他笑得是那样从容自信，又是那样风趣动人。只见他重重地吸了一口纸烟，长长地吐出一串烟圈儿，那串串烟圈儿一个个飘向空中，越放越大而后散去。毛泽东凝视了好一会儿，然后又看看聂荣臻和林彪，像似讲给他们听，又像是说给陈士榘听：“设营司令有功，我看，这还是比关禁闭强嘛！”

聂、林也都会心地笑了起来。

毛泽东大智大勇，领导和指挥部队，又重视集中群众智慧，关心和爱护部队，使红军翻过雪山，跨过草地，渡过了长征中最为艰难的时期，并锻炼得更加坚强。

过了腊子口，陈士榘一直给毛泽东带路。毛泽东不骑马，爬山如走平地，步履矫健，陈士榘紧随不舍……

1935年9月，红军走出草地，到了腊子口。

腊子口是四川通往甘肃的一道隘口，两面悬崖绝壁，周围崇山峻岭，一条河流从悬崖下面穿越，水深流急，真可谓天堑。河上的一座木桥，是通过腊子口的必经之地，敌人以两个营的兵力部署在木桥和山隘处，并在桥头和

山坡上修筑了坚固的工事。敌人凭险而守，真是连鸟儿也难以飞过去。这时，攻取腊子口的战斗已经打响，战士们屡攻不克。

毛泽东举目看看腊子口方向的险山峻峰，又俯首察看军用地图。沉思片刻，他摆摆手要设营司令走到近前，命令说：“你去了解一下，看看有没有另外可以通行的道路，要尽量减少部队损失。”陈士榘理解毛泽东的心情，他非常爱惜长征过来的每一个战士，想方设法地减少伤亡。陈士榘马上找到一些群众作了调查，并审问了三个俘虏，都证明别无他路。

情况报告后，毛泽东果断他说道：“上山看看，找一个便于观察的地方。”

陈士榘带上聂荣臻政委的望远镜，转身离去，选定了一个既隐蔽安全又便于察看的石头山上，望远镜里，部队的行动一目了然。只见一阵激烈的战斗过后，红军突击队奋勇通过了腊子口，他高兴极了，便火速返回兵团部，不料忙中失手，将望远镜的盖子掉进了深谷。他顾不得这些，马上向毛泽东作了报告，但见毛泽东眼睛一亮，面露微笑，还没等林彪、聂荣臻作出反应，便将右臂用力地一挥说道：“好，赶快走！”

因为毛泽东的坐骑还在兵团机关没有跟上来，要走就得步行。陈士榘犹疑起来。只听毛泽东连连说道：“立即行动，赶快动身，我们一走，机关就走快了。”

说话间，毛泽东迅步疾行，率先来到腊子口。此时，部队刚刚通过。他站立在腊子口上，显得格外平静，环视着险山和急流，目送着即将远去的部队，继而缓步而行。一过木桥，他又大步流星地走起来。陈士榘看见毛泽东走起路来竟那么快，只好跟在他身后紧追。

踏上一座土山，尽管道路坎坷不平，但毛泽东走得更加起劲。原来就听说他喜欢爬山，果然是名不虚传。尽管陈士榘奋力追赶，还是超不过毛泽东。他明白了，爬山走路，不是毛泽东的对手。

太阳下山后，又爬上一个山坡，进入一片草地中间的村子，毛泽东终于停下脚步。这是黄土高原的一块肥美的土地，地势平坦，绿草荫荫，脚下像踩上柔软的地毯。毛泽东静静地凝视着这个村子，好像是要认识和熟悉这个陌生而美丽的地方。原来，他们现在是进入汉回民族杂居的黄土高原，那令人畏惧而又难忘的雪山草地，已经被远远地抛在后边，人们不禁深深地舒了一口长气。

毛泽东静思片刻，点着纸烟深吸一口，用力地挥动一下右臂，在暮色中，火柴的余烬划出了一条淡淡的弧光。将火柴熄灭后他说道：“设营司令，快找房子，我要困觉了。”

说罢，他又伸展懒腰打了个哈欠。陈士榘知道，毛泽东太累了，便急速找好房子，请他休息。

陈士榘躺在铺上，却不能入睡，他想：毛泽东长我十五六岁，已经是40开外的人了，真担心把他累坏了。

第二天，天色未亮，陈士榘就提前起来，静坐在院子的天井里，想让毛泽东多睡一会儿。不料，这时毛泽东已经轻手轻脚地走到他面前，亲切地说：“士榘同志，起得好早啊，你的觉怕没困够吧！”

顿时，一股热流涌上心头。陈士榘正为自己没有照顾好毛泽东而感到不安，同时也为前两天领错了一次路而感到内疚。黄土高原虽是沟壑纵横，但一般不难通过。那一日，为中央机关带路，走在毛泽东前面。用了大半天时间，翻沟越岭，倒也顺利。突然间竟走到一条被洪水冲刷了的深沟边缘。对

面的群众看得清楚，说话都能听到，只见沟底却是污泥烂草，沟壁如削，不知如何通过。急忙向对面的群众打探，一位妇女尖声答道：“沟里尽是烂泥浅滩，不能过人。”听此回答，陈士榘全身血液轰的一下冲上脑门，全然不知所措。但毛泽东并未责备，轻轻地拍拍他的肩膀，向后做了个手势，调头就走。这一绕道不要紧，几乎多走了半天的冤枉路，不仅延误了时间，而且把毛泽东也累苦了。幸亏当时没有敌情，否则，前无出路，后无部队，真的出现点什么情况，后果就不堪设想了。想起这件事，陈士榘就觉得自己这个“设营司令”犯了一个不可原谅的错误。

可是，此刻毛泽东倒关照起自己来了。陈士榘恭敬地站起来，嗓子好像被什么塞住了，用了很大劲才说出一句话：“主席，你太累了，又起得这么早。”毛泽东脸上泛着诙谐的微笑，像在安慰似他说：“昨天那程子路，小事一桩，我这个人一爬山就来精神。”他略停了一下，说：“我是有觉就困，没觉就不困。”然后，他陡转话题，关切地问道：“他们都来了吗？”毛泽东是指军委其他首长和机关的同志。陈士榘马上回答：“主席放心，他们都来了。”

天刚放亮，陈士榘静静地站在毛泽东身旁，看他还有什么吩咐。只见毛泽东还是穿着那身普通红军战士穿的灰色军装，习惯地敞着怀，头发显得更长了，他那双睿智而明亮的眼睛还是那么慈祥，那么动人。左倾路线给他带来的历次磨难，长征中艰苦生活的砥砺，使这位巨人变得更加刚毅和自信了。

陈士榘不禁感慨万端：这被许多人看作是灾难和死亡的两万五千里长征，正是由于有了毛泽东的英明领导和几万名红军将士的英勇奋斗，才创造出了中外历史上的一个伟大奇迹，以至一些惊心动魄的战斗故事，也被看成了神话传奇。

1935年12月，毛泽东在陕北瓦窑堡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讲到长征的意义时说：“十二个月光阴中间，天上每日几十架飞机侦察轰炸，地下几十万大军围追堵截，路上遇着了说不尽的艰难险阻，我们开动了每个人的两只脚，长征二万余里，纵横十一个省”，“自从盘古开天地，三皇五帝到于今，历史上曾有过我们这样的长征么？……没有，从来没有的。”“长征是历史纪录上的第一次，长征是宣言书，长征是宣传队，长征是播种机。”毫无疑问，长征作为空前的举世无双的历史事件，将永载史册，为世人瞩目。

## 再走长征路两弹腾飞扬国威

1958年4月，陈士榘将军开始了他的新使命——建设两弹基地试验工程。从基地勘察定点，到率领部队投入施工；从导弹上天，到原子弹爆炸，用了六年多的时间。其间，他多次出入大漠死海，踏遍戈壁沙滩，以辉煌的业绩走过了他的新长征。

在瀚海无际的沙洲中，随着指挥员的最后一道命令，竖立在发射塔上的白色火箭在一声巨响中，像一条巨龙，喷出淡黄色的浓烟，拖着长长的火舌，画出优美的曲线，穿过淡淡的云层。几十秒钟以后，只听见万里长空中那滚雷般的轰鸣。

这是1987年9月9日，陈士榘在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参观我国第21颗卫星发射的盛况。

火箭是这么动人心魄，瀚海是这么令人流连。曾经是导弹、原子弹基地

建设工程的领导者——特种工程指挥部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的陈士榘，不禁想起 29 年前特种工程部队指战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广大职工，搏击瀚海恶风、建设两弹基地的难忘岁月。从导弹试验基地到原子弹试验基地，从 1958 年 8 月到 1964 年 9 月，近 10 万大军在渺无人烟的戈壁荒滩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第一次建设起我国尖端国防工程，为我国的导弹、原子弹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是两弹基地的奠基者、建设者。然而由于当时的特殊背景和严格的保密制度，这支队伍默默地开进戈壁滩，又默默地撤离戈壁滩，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业绩，从来没有人提起过。在当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只知道从事两弹研制的科技工作者和试验发射部队，而未闻那个特殊的名字即代号为 7169 的特种工程部队。想到这里，将军内心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感慨和怀念。随着基地的对外开放，陈士榘说：现在，该是说给人们知道的时候了！

回到酒泉市，在酒泉公园碧水如镜清澈见底的酒泉旁，将军看到记载汉朝功勋卓著的大将军霍去病倾酒于泉事迹的碑文。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师抵御匈奴，屡建战功、驻兵酒泉时，汉武帝特赐酒遣使犒劳将军，以功全军。因酒少人多，便倾酒入泉，与全军将士共饮。“酒泉”从此得名。

看罢碑文，将军深为霍大将军的业绩所感叹，更为我们今天的壮举所激动，特别是想起为工程献身的数百名烈士，更是不能自持。他怀着崇敬的心情和不尽的恩绪，挥毫题字：

战士壮怀凌云志，热血尽洒戈壁滩，  
化作惊雷震环宇，东风常渡玉门关。

不论是已故的，还是活着的，人们都不应忘记他们。因为他们代表了一个时代，一个艰苦创业的时代；他们也开辟了一个时代，一个巨龙腾飞的时代。

1958 年 5 至 7 月，我国两弹工程建设处在一个关键时刻，导弹基地工程建设已经开始，原子弹基地要不要上马？就在这时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作了历史性的决策。

1956 年 4 月的一天，总参办公大楼里，中央军委会议正在热烈地进行中，当主持会议的周恩来请钱学森谈谈我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时，与会的元帅和将军们先是愕然，继而又兴高彩烈，中国将再也不是小米加步枪的时代了。会后，工程兵司令员陈士榘情不自禁地问钱学森：“发展两弹，工程兵能做些什么？”钱学森对他笑笑，当时并没有说什么。陈士榘自信地想，搞两弹是离不开工程兵的，肯定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1957 年秋，中央军委决定筹建导弹试验靶场。1958 年 4 月，中央军委又决定成立靶场建设的特殊部队，即“特种工程指挥部”，由陈士榘出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同年 5 月 22 日至 7 月 27 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北京隆重举行。毛泽东说：“原子弹嘛，就这么大个东西。没有这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原子弹和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的。”毛泽东幽默地用双手打着比方，以浓重的湘音作出了历史性的决定。于是，两弹工程双双纳入轨道，它在中国军事发展史上，也在工程兵发展史上揭开了崭新的一页！

怀着兴奋的心情，陈士榘把工程兵司令员的工作暂时交给徐德操副司令

员代管，带着 30 多人由北京飞向大西北，这 30 多人中，有二机部、科学物理研究所和工程兵勘察设计部门的专家，还有几位参加核试验基地建设的苏联专家。

飞机穿过一片淡淡的云层，陈士榘思绪如云絮一般翻腾。在那次决定性的会议上，导弹试验基地的建设任务原是交给炮兵的。但炮兵司令员陈锡联说炮兵难以完成这个任务，还是由工程兵来搞最合适。中央军委同意了 this 意见。无独有偶，应由国防科委负责的核基地建设任务也由工程兵承担了下来。陈士榘对二机部副部长李觉说，“你们的科研、制造、试验场地、仓库 4 大任务，后两项我们工程兵可以帮忙。”这样，继导弹基地试验工程任务之后，工程兵的肩上又压上了核试验基地建设任务。

1958 年 5 月，陈士榘同当时的总后勤部部长黄克诚去聂帅那里汇报准备情况。陈士榘提出导弹基地建设由工程兵负责勘察、设计、施工 3 项任务；建筑材料、工程机械及运输加工，请总后负责。黄克诚打趣地对陈士榘说，还是由工程兵统管了吧！这样更有利于工程建设。聂帅同意了黄克诚的意见，特种工程指挥部成立了后勤部（后改为工程兵后勤部）。同年 6 月，中央军委副主席彭德怀元帅召见黄克诚、张爱萍和陈士榘，代表中央明确提出：导弹试验靶场第一期工程一定要在 1959 年 6 月 1 日前完成。

透过飞机弦窗玻璃，两条黄线似的公路连接着银川市的新城和旧城。原来的核试验基地，二机部和苏联专家就定在靠银川一带的沙漠里。但因流沙太大、缺水，黄河障碍多，显然不适宜建设基地，人们便把目光转向由天山和祁连山的雪水溶汇的罗布泊。

在银川上空，陈士榘情不自禁地放眼望去，六盘山隐约可见，那是他当年长征时经过的地方。没想到 22 年后，再次踏进长征路。晚年陈士榘说：我更没想到这次新长征前后长达 6 年时间，他大致估算了一下，勘察国防工程，尤其是两弹工程，乘飞机，坐汽车外加步行至少有十万八千里。

飞机在新疆的哈密机场降落。翌日，他们便分乘两架直升机飞向罗布泊上空，旷无人烟的沙漠，几块绿如玛瑙的湖泊镶嵌其中，做为两弹基地，太理想了。

中央军委一声令下，一支神秘的队伍进入了一个神秘的世界，十万大军卷起瀚海雄风，沉寂了千万年的大漠死海，便立刻充满了勃勃生机。

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以志愿军第 19 兵团机关和志愿军工程兵指挥部为基础，组成特种工程指挥部机关，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中央军委任命：陈士榘为司令员兼政委，曾旭清为副司令，黄文明为副政委，赵东袁为参谋长，姚国民为政治部主任，李基为后勤部部长，王云为器材部部长。

从 1958 年 3 月 30 日军委第一个调令起，先后有 7 个建筑团、5 个工兵团、两个建筑师、两个汽车团、一个工程技术大队、3 个医院、一个通信营、一个勘察队参加施工，配属单位有：步兵某师改建的建筑第 52 师、铁道兵第 10 师、通信兵通信工程团、空军建筑第 6 分部，总共约十万大军。

沉默、冷清了多少个世纪的无垠荒漠，终于迎来了新的一天。十万大军昼夜奋战在戈壁滩，人马喧啸、机车轰鸣。这是一个神秘的世界。炎炎烈日照得沙漠像一个蒸笼，使人透不过气来。阵阵旋风将黄沙卷起一根根擎天的沙柱，此起彼伏，有时狂风骤起、沙尘肆虐，天昏地暗，有些部队的帐篷被

卷上高空，油桶被刮得无影无踪。干部战士们时常吃盖上一层沙子的饭菜。

为了制伏风沙，战士们想了不少办法。如每隔2公里打一眼井，利用施工间隙，挖土栽树种草。盖起半在地下半在地上的房子，顶棚用芨芨草和黄泥密封，很像老祖先在原始社会的建筑，这种房子冬暖夏凉，遮风避沙，战士们可喜欢它呢。他们虽然过着一盆水先洗脸，后洗脚，再洗衣服，最后浇树的极其艰苦的生活，但他们有着从来未曾有过的自豪感。

从飞机上俯视无垠的沙海，在距酒泉市300多公里的地方，有一块一平方多公里大小的深色绿地，像一颗镶嵌在大漠中的绿宝石，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原内蒙古自治区额济纳旗政府所在地，名叫“绿园”。旗政府为了支援国防建设，搬迁他地，这里遂成为特种工程指挥部所在地。

这块绿地，受黑河水的滋润，树绿草茵，显得颇有生机，大家称这块风水宝地为戈壁“绿洲”，大漠“明珠”，指挥部设在这里，也算是独享其优了。陈士榘、黄文明、赵东寰、姚国民被照顾住进有限的几间砖房里，只是房内没有卫生间，大小便要几十米外临时搭起的厕所。机关干部都住在土坯房里，既当办公室，又作宿舍，靠墙擦起土坯，放上铺板，中间是办公桌，没有什么办公椅子和沙发之类的东西，被子一叠，就坐在铺板上办公，被子一铺，便可躺下睡觉，既简单，又方便。指挥部机关还有一座宽敞的大房子，既是食堂，又是礼堂，还是电影院，可谓多功能兼备。一个很不起眼的军人服务社，特别显得热闹，与其说是因为出售香烟、火柴、牙膏、香皂、肥皂、糖果、信封信纸等生活必需品吸引着人们，还不如说是那3位售货员姑娘，更有吸引力。尽管她们相貌平平，没有摩登的装束，但在绿洲清一色的和尚头面前，这3个女性俨然被视为大漠中的凤凰，备受人们的青睐。

在戈壁沙滩上生活和工作，前提条件就是水。被称为绿洲的“绿园”之所以美丽，也是因为有了水。一条黑河将祁连山的雪水缓缓引来，恰在这里形成一个小三角地带。清清流水滋润万物，才显出这块绿洲的盎然生机。但水毕竟是太少了，就在离“绿园”几公里以外的地方，便随处可以看到一片片巨大的枯树林，有的树木虽然还劲拔挺立，却不知道已经死了多少年。可以想象，这里当年因受益于祁连山的雪水，曾经是一片茂密的森林。如今，代替它们的是沙堆上的低矮的沙枣树和骆驼刺，这都是些抗旱能力极强、根系扎得很深的沙漠植物。在沙漠里，水就是生命，水源的枯竭，就是生命的枯竭。所以广大指战员特别珍惜水。在没有水源的地方，想办法收存了些雨雪水，尽管水里有很多子子，大家仍然在食用它。对此，陈士榘就有过切身体验，他开始由于不摸底细，端起杯子就喝，水到口中，总是感到有一些粘乎乎的东西且有异味，仔细一看，那是子子，没有办法，一同进肚吧。这种情况在当时毫不稀奇，尤其是工作在死海罗布泊的部队，由于水源奇缺，一旦水车抛锚，部队常常一两天既没饮水，也吃不上饭，喝带子子的水也就成了常事。

一次，有一个部队的水车没有及时供上，连子子水也没有了，部队紧张施工一整天，喝不上水，饭也没法做，大家饥渴难忍，司务长灵机一动，想了个办法，每人发给一根胡萝卜和3片白菜帮，大家润润嗓子，晚上还开了个娱乐晚会。比较起来，指挥部所在地“绿园”，要算是一方风水宝地了。但是，“绿园”毕竟是沙漠中的一块有限的绿地，周围仍然被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滩包围着，一旦大风刮来，卷起沙暴，整个绿洲也会黯然变色的。有一次，政治部主任姚国民召开部务会议时，突然间一阵狂风骤起，带着漫天黄

沙呼啸而来，顿时天昏地暗，会议室里变得漆黑一团，只好点起蜡烛照明，会议照开不误。等到沙暴过后，大家都感到身上沉甸甸的，仔细一看，人人都披上一层厚厚的黄沙，眼睫毛和头发都是金黄色的。大家打趣他说，把鼻子再垫高一点，那就与洋人无二了，这也算是瀚海沙漠中一大奇观。

大漠自有大漠景，大漠自有大漠情。生活艰苦，甚至是枯燥，但是人们的精神却很充实，情绪十分饱满。大家一谈到毛泽东下令要搞原子弹，党中央要工程兵建设导弹原子弹试验发射基地，想到震国威扬军威的两弹就要在自己建设的基地上试验爆炸腾飞的时候，便有一种强烈的自豪感、使命感和紧迫感。争分夺秒夜以继日地工作，虽苦也甜，身上总感到有一股使不完的劲。这些魂牵华夏尊严，心系祖国安危的工程兵战士，大家只有一个心愿，就是让两弹在自己的拼搏中快快腾飞。

两弹工程紧紧连着北京，也紧紧连着全中国。只要工程建设需要，一切物资、技术、设备便从祖国四面八方源源送入大漠。薄一波将国库仅存的5吨铜线都拿出来。刘亚楼派出飞机驰骋瀚海……

1958年5月，导弹试验工程建设拉开帷幕，原子弹爆炸试验工程即将进入勘察，各项工作都十分紧张而有条不紊。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等党和国家领导人无时不在关注着沸腾的西北大沙漠。有关情况需要随时向北京报告，以便及时准确地听到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声音。当时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大漠中的尖端国防工程与北京连通起来。

陈士榘连夜赶写报告给周恩来，要求尽快解决北京到新疆的专线联络问题，周恩来告诉他，去找财经委员会薄一波主任。薄一波看着报告和周恩来的批示，不禁皱起眉头。他深知，这条全国最长的专用通讯线路，无论是数量要求还是质量要求，均非一般。深恩良久，薄一波以征询的口气对陈士榘说：“现在国库只有5吨铜线，这是我们唯一的存货。你看怎么样？”陈士榘喜出望外，马上答道：“这是最好的线了。”薄一波也高兴地说：“好，5吨铜线，统统归你！”

由北京至兰州，穿越浩瀚的大漠经酒泉21基地、马兰20基地，直达乌鲁木齐，一条金色的线连通了，声音清晰。这是当时全国最长、通话质量最好的专用线路。当陈士榘第一次用这条线路向周恩来报告时，周恩来高兴极了。他说：“要感谢薄一波同志。有了这条好线路，如同你在北京，我也到了你们的第一线！”陈士榘回答说：“我们要感谢主席，感谢总理，感谢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

当时，从中央到地方，不论是政府部门、工厂、农村，还是陆海空三军指战员，只要是两弹工程需要，都把最好的技术人才、物资设备源源送往工地，尤其是新疆军区和自治区政府都给予及时的有力支援。两弹工程，牵动着整个共和国，牵动着各行各业。这既是一种压力，也是极大的鼓舞。

1959年初春，决定要在死亡之海罗布泊这个广阔的区域选择投弹落点。为了尽快探明这个神秘的世界，陈士榘向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提出要一架飞机协助工作，并说越快越好。刘亚楼对修筑地下国防工程曾有不同的看法。说把那么多钱埋在地下，还不如在地面上多盖些房子。尽管如此，他还是对这一要求立即作出了痛快的回答：“请放心，如此大事，不敢怠慢。我把性能最好的值班机交给你！”



陈士榘与万毅和孙继先两位中将乘机飞向南疆，经过阿克苏时，眼前展现出一片银色的世界，原来是大放异彩的杏花开了。这大概是因为天山挡住了西伯利亚的寒风，又得益于阿克苏河水的缘故。当时的北京只是偶见艳阳春色，杏花还没有开放，这里已经是桃红柳绿，颇有“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之感。陈士榘他们满有兴致地议论着。

他们乘兴继续飞行，为了方便观察，陈士榘干脆坐在驾驶员和机械师中间。连续飞行3个小时，看不到一个绿地村庄，只有无垠的荒漠。飞机逐渐靠近天山，天山的那道幽深的大峡谷令陈士榘神往，他开始跟驾驶员商量：能飞进峡谷去吗？驾驶员用不解的目光看看他，撂出一句话：“没飞过。”显然是不同意。“能不能飞一下？”陈士榘试探着动员驾驶员。最后驾驶员对峡谷也产生了神秘感和好奇心，竟答应试飞一次。

这时，大家只觉得座椅在使劲地往上提，接着飞机便直下深谷。陈士榘立即感到峡谷是那么幽深窄狭，飞机像是被装进四面封闭的笼子里，一片阴森灰暗，令人毛骨悚然。几位将军禁不住面面相觑，心里不免有些紧张。眼看着飞机就要撞上山崖，只觉得身体往上一提，飞机猛一抬头，直插一个山蛭口。一出蛭口，便豁然开朗，眼前展现出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塔里木盆地。大家一颗颗提着的心终于放下来，纷纷称赞驾驶员超群的胆量和娴熟的技术。

飞越天山峡谷，驰骋瀚海，穿越群山，完成了各项预定的勘察任务，陈士榘他们高兴极了。

曾给我们大力支援的苏联老大哥，单方面撕毁了中苏核技术研究协定，国内又处在严重的经济困难时期。陈士榘说，历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将自己的命运依附在另一个强国的庇护下是断然没有前途的。中国人果然唱响了一曲志气歌。

1958年9月27日，新华社发布了一条消息：建在北京郊外的我国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正式移交生产。第一批中国自制的放射性同位素已经从这座反应堆中产生。从而开始了中国核物理研究。这条简短的消息，几乎像原子弹爆炸一样，使奋战在瀚海的十万大军格外兴奋和激动。中国人能够创造奇迹。

这是一种力量，它使人们焕发出巨大的智慧。工程速度一再加快，从1958年5月到1959年1月，部队的发明创造和技术革新就有2950多项，提出各种科学建议52000多条。如0215部队发明的“外部装药爆破法”弥补了机械操作的不足，提高工效数倍，节约经费53万多元；7439部队创造的“万能工具台”代替了十分缺乏的9种电工机具；7348部队改造成功的超平板振动器比原平板振动器提高工效5~8倍。

1959年6月，中国和苏联签订的核技术协定，墨迹未干，苏联就单方面撕毁了。苏方称“中国可以依靠苏联的核武器，不必自己搞。”陈士榘气愤地说：“中国近代史告诉我们一个国家将自己的命运依附在另一个强国的庇护下是断然没有前途的。中国人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建设两弹基地，掌握核武器。”广大指战员豪迈地说道：“想卡我们脖子的人应该知道，中国人就是要唱响这曲志气歌！”

首期工程，分布在1.3万平方公里面积的41个场区，共2555个建筑物，

包括特种营房、机场、铁路、公路、电力、通信、给排水、设备安装等项工程，一项项地保质保量地完成了。

1960年8月，总参、国防科委组织质量检验，专家们对我国的导弹试验工程作了令人鼓舞的评价：“这项工程不仅速度快，而且质量好。”全部工程被评为优良以上。我们提前3年完成了工程任务，恰好赶在苏联撕毁合同之前，苏方不得不按合同规定将全套设备交付我国。聂帅十分兴奋地对陈士榘说：“你们不仅搞出了质量和速度，也抢回了设备，意义重大！”

1960年9月10日，即苏联专家撤走后的第7天，我国用国产燃料发射的第一枚弹道导弹获得成功。它证明，中国建设的工程、设备完全符合要求，经受住了实弹考验。

同年11月5日，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傲然竖立在发射塔上。聂帅专程赶来参加发射试验。上午9点，随着指挥所发出的“点火”命令，霎时火光骤起、惊雷轰鸣，国产导弹呼啸着落到预定目标！喜讯传来，聂帅笑了，笑得泪流满面，张爱萍高兴地跳起来，陈士榘更是抑制不住自己激动的心情，竟放声喊了起来“我们的工程建设没有问题！”

1964年10月16日14时59分40秒，寂静的罗布泊上空突然出现了令人炫目的闪光，一团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紧接着便是一声震人心魄的巨响，不一会便形成一朵美丽的蘑菇云。

爆炸中心向人们展示了一幅惨烈而又奇特的景象：那座巍峨的铁塔顷刻间化为一条细细的麻花，机群化作一具具骷髅，坦克像被回炉的一块块赤色毛铁，火炮阵地、通讯中心宛如一堆堆塑料玩具。被用作试验的猴子、兔子和狗等，有的被烧得面貌全非，有的半身或头上、屁股上被烧得斑斑点点，好像不同颜色的梅花鹿。那些局部烧伤或一息尚存的动物，不时发出阵阵刺人心肺的惨叫。只有被摄氏几千度的高温烧化后又重新凝结的沙砾，变成了一颗颗玫瑰色的玻璃球，流光闪烁，煞是好看。埋在地下的钢筋混凝土坑道或瘫塌断裂，或横竖裂纹，一些设备线路像被撕乱了的蜘蛛网。这使来自工程兵防护研究所的工程师和专家们格外兴奋，他们怀着丰收般的喜悦，忙碌地记录着首次核试验的效果。

两个小时后，毛泽东、周恩来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大型音乐舞蹈史诗《东方红》全体演出人员时，周恩来庄严宣布：“今天下午3时，我国在西部地区爆炸了一颗原子弹，成功地进行了第一次核试验！”

喜讯传开，全中国沸腾了，全世界震惊了。

两弹基地的建设，是在极其艰苦的条件下，背着巨大的压力，用自己的智慧和血汗浇灌出来的我国第一个国防尖端科技工程，它是工程兵的骄傲，也是中国人民的骄傲！

1964年，首都军民新年联欢晚会上，毛泽东健步走进人民大会堂，频频向欢呼的人群抬手致意，向全国军民祝贺新年。毛泽东特意来到首都驻军领导人中间，紧握住陈士榘的手，笑着说道：“祝贺你们，你们做窝（建成两弹基地），他们下蛋（指站立一旁的张爱萍和国防科工委的领导），我们中国人说话算数了！你们都立了大功。”看得出来，两弹腾飞的喜悦仍然挂在毛泽东神采奕奕的脸上。同时，一股巨大的暖流从陈士榘全身流过。

## 驰骋抗日疆场的陈明仁将军

陈利明

陈明仁（1903～1974）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号子良。生于湖南醴陵洪源冲。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学习。1925年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第一、二次东征。1928年起，在国民党军队中任第10师第28旅团长、旅长，第80师、第2预备师师长，第71军军长。1944年起率部作为中国远征军一部，参加滇西、缅（甸）北对日军反击作战。解放战争时期，历任国民党军第7兵团司令，南京总统府参军，华中“剿匪”副总司令兼武汉警备司令和第29军军长，第1兵团司令。1949年到湖南长沙，先后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长沙警备司令和湖南省政府主席、省“绥靖”总司令。8月，在人民解放军向中南地区进军时，与程潜等率部起义。12月加入人民解放军，任湖南军区副司令员，第21兵团司令员，第55军军长。先后兼任湖南省临时人民政府主席，中南军政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届全国政协委员，第三、四届全国政协常务委员，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74年5月21日病逝于北京。

\* \* \* \* \*

陈明仁在解放军上将中，是一位有着特殊经历和特殊贡献的将领。他是黄埔军校的第一期毕业生。1925年参加讨伐军阀陈炯明的两次东征，作战勇敢，由排长升任连长、营长。后在国民党军队中历任团长、旅长、师长、军长。1949年任国民党军第一兵团司令官。由于他作战机智勇敢、带兵有方，曾受到蒋介石的器重，与蒋结下了特殊关系。日军投降后，蒋介石不承认共产党部队在东北的地位，以“接收主权”为名，向东北大量增兵，他受命与人民解放军在四平血战18昼夜，造成双方伤亡惨重的悲剧。当他知道受了蒋介石欺骗、玩弄后，又敢于同蒋介石据理力争。1949年8月，他在任华中军政长官公署副长官兼湖南省政府主席时，与程潜以巧妙的策略避开军警、特务的耳目，在长沙举行了起义。本文记述的是他率部在九江、湘桂和中缅边境与日军作战的艰难、壮观的场面及他的作战指挥才能。

### 血战昆仑

陈明仁深深热爱着自己的祖国。眼见日本帝国主义武装侵略和殖民奴役我半壁河山，造成赤地千里，饿殍载道，哀鸿遍野之惨状，他的心中无比悲愤，决心为中华民族雪此奇耻大辱。因此，他在指挥抗日的战斗中，英勇果敢，出师必胜，累建战功。

1940年11月15日，日本侵略军以3个师团的兵力，于广西钦州、防城登陆，陷南宁后，沿南宁至桂林的公路向柳州袭扰，并派出得力部队占据昆仑关要隘，作为其继续侵略我西南的战略基地，企图切断湘、桂、黔的交通线，对湘、粤、桂形成战略包围。

昆仑关位于广西巨（南宁）宾（宾阳）公路的中段，从此地向西南，经八塘、六塘至南宁约40公里，向东北经思龙、芦圩至宾阳约30余公里。邕宾公路两端的南宁和宾阳，地势平坦，海拔在300米以下。但愈近昆仑关，地势则愈高，在五塘与芦圩之间，海拔在600米左右。沿途群山叠嶂，绵延

不绝，且多悬崖深谷。昆仑关雄踞于两山之间，不但有高屋建瓴之势，而且仅有一条由数百年前的旧式驿道加宽改建成的巨崑公路通过，果有“一夫当关，万人莫敌”之势。

这个地势险要的昆仑关，从古到今乃皆兵家必争之地。大凡若守南宁，必先守住昆仑关；若攻南宁，也必先取昆仑关，能得昆仑关，则下南宁就易如反掌。

宋朝名将狄青，于仁宗皇佑五年（1053）借元宵节日，率精锐冒雨取捷径袭占昆仑关，大破于西南称帝的部族首领侬智高，乘胜直下邕州。侬智高逃大理，广西从此平定。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昆仑关大战，昆仑关亦以此扬名。

是年，昆仑关守敌是日寇最精锐的坂垣第5师团。该师团非常狡黠，是最能打硬仗的劲旅。原师团长坂垣征四郎，到昆仑关会战时已升调，继任师团长为今村均。

这个师团参加侵华战争，可谓“战功显赫”。自夺占万里长城之八达岭始，继而察南，再晋北，直至平型关诸战役，均为主攻。平型关遭败未伤元气，遂又攻山西忻口，夺太原。而后，他们曾转战河北，渡过黄河，侵略山东，在台儿庄和徐州西江会战中，被我击败。整军后驱南粤侵占广东佛山一带，以后又调回山东整训。不久，又奉调来桂南，这次是经过整编后，重新走上战场的精锐部队。

敌人进侵桂南，即开始执行他们自称的“对大陆最后的攻击”，所以决心与我军决一死战。

争夺昆仑关是关系整个西南战局的一次重大战役行动，担任攻城任务的是国民党第5军。军长杜幸明接到命令后，自12月12日起作攻夺昆仑关的战役部署，率部陆续向指定地区挺进，准备阻击敌人北进。17日，在昆仑关附近地区，与日军遭遇开火，揭开昆仑关战役的序幕。

第5军是一个拥有最新机械化装备的部队，由战车部队、重炮兵部队、山野炮部队、快速搜索部队、装甲汽车部队等组成，有新式有线电、无线电空地通信装备，还有数百辆汽车、摩托车。该军共辖3个师，即荣誉师（师长郑洞国）、22师（师长邱清泉）和200师（师长戴安澜），另外还有军部直属各种部队。第5军原欲凭借自己的优势兵力夺回南宁，不料经几昼夜激战，进进退退，无大作为，昆仑关被敌人占领。敌军以占据昆仑关右面的一座高峰为主阵地，构筑有半永久性的坚固工事，明碉暗堡，纵横遍布，火力配置齐备，防守十分严密。在主阵地前沿两侧，左翼的“441”高地与中汉村，右翼的廖家村与湾塘，分别建有侧面辅助阵地，互为犄角，互相支持。作战时，日寇有飞机助战，狂轰滥炸，第5军伤亡惨重，只好转攻为守。双方形成对峙局面。

在此关键时刻，国民党军令部急电陆军第2预备师师长陈明仁率部驰援昆仑关。此时，陈明仁正率部在鄂南枝江、松滋、公安一带沿江驻防，防止日寇由武汉溯长江而上，西犯宜昌或南犯常德。全师布于200余华里的江防线上，一面构筑工事，向武汉方向警戒；一面加紧训练，准备迎战日军。陈明仁接命令后，心如火急，连夜令所属各团组织敢死队，由各连挑选精锐官兵一个排，每四个排（称分队）组成一个敢死队。8月7日，陈明仁在枝江召开各团敢死队官兵誓师大会。会上，陈明仁激昂慷慨，痛述了日本帝国主义者妄图灭我中华，欲使国民做亡国奴的祸心，激励众官兵发扬革命军人的

爱国精神，用自己的鲜血和生命，保卫中华民族的生存。最后，他举右臂一挥，斩钉截铁地说：“每个官兵都要在战斗中杀敌立功，日寇不除，何以家还？！”敢死队官兵更是群情激愤，个个无不斗志昂扬，他们一致表示：坚决服从指挥，为抗日救国，赴汤蹈火，在所不辞。

8月9日，陈明仁命令第5、第6三个步兵团，以团为单位，克日出发，强行军到衡阳转乘火车至郴州。陈明仁亲率师部及敢死队官兵从枝江出发，强行军至禄口，然后转乘火车至郴州。于是各部队日夜兼程，一昼夜行军一百五六十华里，7天7夜行程千余里，分别到达禄口和衡阳乘火车，急驶柳州，在柳州下车后，又急行军向宾阳思龙进发。由于陈明仁一贯严以治军，行军途中，部队无论休息或进餐，均不入民家，受到当地民众夹道欢迎。战斗之前，陈明仁对军队的要求更加严格，他号召全师官兵在抗击民族敌人日寇的战场上，要勇猛当先，果敢冲杀，有功者奖，畏缩者罚，逃跑者以军纪论处。他按照国民党桂林行营的指示和所得知的昆仑关的战报，在行军途中，即同有关作战人员对着地形图研究了周密的作战计划，决定从昆仑关左右翼增援陆军第5军第200师，首先攻打昆仑关324高地，以取得有利的制高点和立足点。

当预备第2师向宾阳思龙开进时，陈明仁利用空隙时间，召集各步兵团长、炮兵和工兵营长以上及有关作战人员在前沿阵地上，对敌情、地形进行反复周密的侦察和判断。当时发现在324高地及其左侧一带高地，约有敌军一个联队，其防卫重点似在324高地主峰。该阵地障碍物只有一层屋顶形铁丝网，这是敌人凭借324高地地形险峻而加强设置的；敌人火力点的布置虽然十分隐蔽，但仔细观察，仍然可以发现其有利于我方对火力的压制和突击。经过详细研究，一贯不苟言笑的陈明仁，点燃一支香烟，猛吸两口，吐出烟雾，然后用锐利的双目环视一下全场，胸有成竹地说：“324高地山高坡陡，工事建筑坚固，火力封锁严密，正面强攻，势必难于奏效；但不拔除这个据点，就不利全线反击敌人。因此，我们只得将攻击的重点指向324高地。”

陈明仁沉默片刻，似乎有意让大家再思考一下。室内很静，连手表的“嘀嗒”声也清晰可闻。一会儿，陈明仁下达命令：本师决定向当面之敌发起攻击，重点指向324高地，由两翼包围歼敌；第4团团团长洪行率部由左翼首先投入战斗，进行佯攻，将敌兵力火力吸引到左翼，保障主攻方向得胜后，向敌纵深攻击前进；第5团团团长戴坚率部主攻324高地，选骁勇善战的官兵组成敢死队，由工兵支援，实行主要突击；第6团为师预备队，暂在师部附近待命……

陈明仁师长的命令，坚决果断，切合实际；大家决心身体力行，与敌决一死战。会后，各步兵团分别组织营、连、排干部对各自的攻击目标、前进路线，进行更细致的侦察；对于敌人的每个火力点，由各重机关枪连进行了严密分工，哪几挺机枪压制哪几个火力点，都明确了各自的攻击任务，以保证对敌实施有效的火力压制，掩护步兵进行攻击。陈明仁还亲自检阅了敢死队，对这些士气高昂的官兵，他只讲了一句话：“看到你们这样威武雄壮的队伍，我相信一定能打胜仗！”敢死队的官兵受到鼓舞，齐声回答：“听从指挥，坚决消灭日本鬼子！服从命令，誓死杀敌立功！”

一切准备就绪，预备第2师敢死队向昆仑关日寇全面进攻即将展开。第5团敢死队担任正面攻击，第4团敢死队担任右翼攻击，第6团敢死队担任左翼攻击。陈明仁命令：进攻战斗均在夜间进行，白天只派少数官兵潜行侦

察敌情，一至夜幕降临及拂晓之前，我军即出动攻击，此为“打黑不打白”。

敌人知道预备第2师增援部队采取夜袭战法，他们便在晓间龟缩在碉堡内防守。我敢死队官兵冒死攻坚，一连三晚不断地向敌碉堡猛烈攻击，摧毁敌堡多处，大部敌人被迫退到第二线，但仍有少数顽敌坚守不退，从堡内枪眼向外扫射，敢死队官兵伤亡甚众。在一连三晚的战斗中，陈明仁亲临前线指挥。敢死队攻占敌阵地，敌不甘失守，增援反扑，预备第2师官兵坚守阵地，寸土不让。敌人冲上来，我官兵即出阵与之肉搏，双方亮出明晃晃的刺刀和战刀，兵对兵、将对将地厮杀在一起。日军短小精悍，尤善拼搏，闪转腾挪，机敏灵活；敢死队官兵身强体壮，威武慍悍，训练有素，出手强劲，绝不示弱。一时间，只见刀枪交错，杀声震天，血流遍地。在陈明仁的直接指挥下，预备第2师打败了敌人一次又一次的进攻。

一日拂晓，桂南天空雾气濛濛，晨星依稀可辨，炮兵隆隆的炮声首先打破了黎明前的沉寂，担任佯攻的第4团的枪声也跟着噼啪啪地一阵紧似一阵。敌人见我军首攻左翼，急忙将兵力向左翼转移，妄图阻止第4团进攻。这时担任主攻的第5团与工兵，在戴坚团长带领下，早已趁夜黑接近敌人，将敌铁丝网剪开几十米的缺口。敢死队惜炮火和各种人力掩护，将炸药和柴禾压入敌人堡垒，炸毁的敌堡火光冲天，我官兵强攻入敌阵，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格斗。这些敢死队员都是由营、连精选的身材高大、骁勇敢打的强兵悍将，他们斗志昂扬，奋勇冲杀，直杀得日本鬼子尸陈山头，嚎叫逃窜。敌人虽几次组织反扑，并以强大炮火力轰击我前方指挥哨所，待我第二梯队加入战斗后，终于被歼，324高地遂为预备第2师占领。这是昆仑关战我从敌人手中夺回的第一个制高点。

在此期间，昆仑关后路五塘、六塘的敌军，曾两次共派出一个联队以上的兵力前来增援，预备第2师与其他兄弟部队全力抵抗，致使敌军伤亡惨重，退回原地。敌之陆上增援失败，便用飞机空投三四百名精锐士兵，助威打气。经过连续几天战斗，敌人虽在我强大炮火不断打击下，遭到惨败，但仍凭借地道暗堡工事，利用山头死角，进行顽强阻击，特别是从地下工事射出的机枪火力，还相当厉害，使我冲锋部队的进攻连连受阻。陈明仁师长立即命令改变打法，指示各团、营精选身强力壮、作战勇敢之官兵，组成小股突击队、敢死队，与友军密切配合，同敌人进行逐地、逐点的争夺。在拼搏过程中，有时为了夺占一个山头据点，双方几上几下，几进几退，伤亡累累；有时在一个地道工事内，麇集着几十个敌兵负隅顽抗，敢死队员们不怕牺牲，前仆后继地把炸药包、集束手榴弹投掷下去，将其全部炸毙烧死；有时当敌军作垂死挣扎进行反扑时，勇士们即亮出刺刀与之白刃肉搏。陈明仁通观战役全局，对每一战斗进程都能体察入微，及时指挥。在一次战斗中，第5团团部被日寇包围，形势十分危急。团长戴坚将重要公文等烧毁，准备与阵地共存亡。此时，陈明仁突然出现在阵地上，命令5团2营4连连长彭德率全连官兵投入战斗，以解团部之围。彭德立即组织全连9挺轻机枪集中火力向敌人薄弱方面发动猛烈进攻。同时，另组织一个排的兵力上好刺刀，在步兵掩护下，冲入敌阵与敌展开肉搏战。彭德负伤，但仍指挥官兵继续与敌人白刃格斗。全连付出伤亡过半的代价，终于解了团部之围。陈明仁当即嘉奖彭德，提升他为2营营长，并嘱咐说：“你是有功之臣，部队就是需要你这样有勇有谋的人带兵打仗，你可随师野战医院治伤，不必转到后方医院去。”彭德见师长对他如此关心、鼓励，作战更是英勇无畏，身先士卒，屡建战功。

陈明仁率部队夺取 324 高地后，继续指挥第 4 团向九塘进攻。第 5 团则由 324 高地尾追敌人，向前推进。由于地形复杂，情况不明，第 5 团主力进入一无名山谷中，受到日军的反包围，情况十分危急。团长戴坚沉着勇敢，毫不畏缩，立即组织反击。陈明仁见状，当机立断，立即命令师预备队第 6 团一个营进攻敌之侧翼。敌人腹背遭围，向九塘退却，第 5 团主力继续向九塘追击。第 4 团切断九塘至昆仑关的公路，由东面进攻；第 5 团则由北面向九塘进攻。正当九塘之敌欲退五塘之际，陈明仁抓住战机，遂命第 6 团向五塘进攻，断绝敌人归路。敌人四面被我堵截，乱作一团。陈明仁当即命第 4、第 5 团发起猛攻，合击敌人，并协同友军部队将退至九塘之敌歼灭。

这时，五塘之敌退守四塘，陈明仁指挥全师乘胜向四塘进攻，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迅速占领了石登岭高地。日军从南宁以一个联队增援四塘，企图夺回五塘。预备第 2 师利用石登岭有利地形，重新部署兵力：6 团居中阻击敌人反攻；4 团、5 团由左右两翼包围敌人。日军前进运动，完全暴露在我军火力之下，经一天激战，大部被歼，残敌退守南宁城，战斗结束。预备第 2 师受到国民党桂林行营的嘉奖。全体官兵在昆仑关大战的胜利声中，在四塘、五塘战场上度过了 1940 年春节。

昆仑关东南隅的高峰岩，是昆仑关之屏障，若保柳州，则必取高峰岩。

预备第 2 师夺下高峰岩后，陈明仁将师指挥所移到前沿阵地，他已是几天几夜没有合眼了。这时，敌人极为猖獗，不断来犯。一天黄昏，戴坚 5 团阵地突然吃紧，敌人已从那里冲破防线，逼近师部指挥所，情况十分危急。陈明仁情急生智，命令输送营全体官兵丢下担子，取出手榴弹，举起扁担当枪使，投入战斗。陈明仁自持左轮枪，亲自督战。全营官兵一齐冲向山头，对敌还击，手榴弹炸处霎时火光冲天，喊杀声震地。陈明仁的左轮枪点射极好，百发百中，一连撂倒数名鬼子。日军见此攻势如此猛烈，加上夜色渐浓，不明虚实，已慌乱不堪，纷纷逃命。输送营乘胜追击，敌人伤亡惨重。事后广西民众还编了一首歌谣，传颂陈明仁的战绩。歌曰：“陈明仁，好将军，带兵作战真英勇。昆仑关，古战场，日寇休想来侵犯。”

昆仑关战役，预备第 2 师取得了胜利，先后夺回了 324 高地和九塘、五塘、四塘、高峰岩等要地，歼灭日军 2000 余人。但也付出了极大代价，伤亡甚众，其中壮烈牺牲的有副参谋长吕旃蒙上校（后埋葬于桂林七星岩）、营长张得奎（黄埔第四期）、易强等 4 人，连、排干部数十人，士兵数千人。

在整个昆仑关战役中，预备第 2 师与友军一道，歼灭了敌军第 5 师团之 41 师和 42 联队以及一个炮兵大队。旅团长中村中雄在昆仑关与九塘之间被击毙，41 联队队长杉木及 42 联队队长坂田元一阵亡。敌军官毙命者在 85% 以上，士兵被歼灭者约 5000 余人，其残部狼狈逃窜。遗弃的武器，有战车防御炮弹数千发，大炮弹二三千发，步枪千余支，轻重机枪、山炮及迫击炮百余门（挺），步枪弹十余万发。这是抗日战争开始 4 年来国民党军在南宁第一次大仗，其胜利也是空前的。

## 腾冲告捷

1941 年底和 1942 年初，日军相继占领香港、新加坡，同时向驻缅甸等地的英军发动进攻。开始，英国政府要求中国军队协助防守香港，并派部队入缅作战。美国担心日本占领缅甸，控制滇缅路，完全切断中国与其他盟国

的交通运输，所以也积极赞助中国出兵作战。1941年12月19日，中、英、美三国在重庆召开军事会议，讨论联合作战问题。但由于英美矛盾，英军太平洋战场总司令魏菲尔将军拒绝了蒋介石关于中国军队入缅作战的提议。而且，此时适有一批中国“租借物资”过缅，被当地英军截走，中英关系一度紧张。

1942年1月1日，中、英、美、苏、荷等26国在华盛顿签署宣言，共同对德、日、意轴心国作战，决不单独与敌媾和。1月2日，蒋介石担任了中国战区盟军统帅，负责指挥包括中国、越南、泰国在内的全部盟军。继而美国派史迪威将军到中国任中国战区参谋长。英国在危急的情况下，退还了截夺的“租借物资”表示“欢迎”中国军队入缅。1月21日，日军第15军团由马来西亚进攻缅甸，并向我国西南边陲云南省西部进犯。第33军团的一个师团沿滇缅公路占领我国腾冲和龙陵，从惠通桥渡过怒江，企图侵占我滇西重镇——保山。保山是一个南北长75华里、东西宽25华里的平坝，四周群山耸立，相传诸葛亮南征时曾到这里，有点将台、诸葛营等遗址。国民党军急调陈明仁部第71军及所属第2预备师等部队阻击日军，将日寇压迫退至怒江西岸。两军对峙于高黎贡山西南麓的腾冲和怒江两岸的龙陵、保山一带，拉开了滇西抗日战斗的序幕。

这时，缅甸全境和滇西边境的一部分地区已被日军占领，中印交通被截断，美援物资无法运入。2月，以驻云南省之中国第5军、第6军两军为骨干，编成远征军（辖第5、第6两军及暂编第66军）。1942年3月，蒋介石已委任卫立煌担任中国远征军第1路司令长官，带兵进入缅甸；第2路准备进入越南。由于袁某叛变告密，戴笠去洛阳，得悉卫立煌涉嫌亲共，蒋介石遂免了对卫立煌委任，远征军第1路司令长官改由第5军军长杜聿明代理。

1942年4月，罗卓英接任远征军第1路司令长官，杜聿明为副司令长官，并辖驻印缅境内的新1军、新6军和滇西前线的第11集团军之第71军（陈明仁为副军长）、预备第2师以及滇东南的第20集团军等约20余万大军。这些军队，由罗、杜与盟军中国战区参谋长美国人约瑟夫·史迪威共同指挥，配合英缅军总司令亚历山大所率领的英缅军，抵抗在仰光登陆、向中国云南边境进犯的日军。经商定，以仰光至曼德勒铁路以东为中国远征军作战地区。经过多次战斗，首先是英缅军被打垮，继之是中国军队受到严重损失。北缅山高水深，地理条件极为恶劣，军队在雨季中穿过莽莽原始森林，热湿难耐，再加上虫蚊叮咬，传染病流行，官兵们不死于战斗和落伍也会因瘴病困扰而葬身异国他乡。在日军追逐之下，西路史迪威和罗卓英带两个师向北退入印度国境，中路杜聿明率军向北由孟拱、葡萄返回云南，东路也由滇南景栋返回。此次入缅的中国军队共10万，丧生6万，生还者仅4万。

日军先头部队第56师团攻占腊戍后，即组成了一个以装甲车为先导并用汽车百余辆载运步兵的快速部队，沿着滇缅公路迅进，经碗町、芒市、龙陵到腾冲，5月5日直抵怒江上游的惠通桥。怒江两岸，山势陡峻，两岸公路顺山势上下蜿蜒曲折。怒江江面不宽，但水流湍急，奔腾咆哮，犹如发怒的长龙。惠通桥跨江而立，敌军已有一部分渡过了怒江。此时滇西局势危急，连昔日被称为大后方最安全的城市昆明也震动了，人心惶惶。驻云南的美国援华空军指挥官陈纳德于5月4日写给蒋介石的报告中说：“根据美空军的侦察报告，在滇缅路上的中国军队零零落落，溃不成军，对于日军的前进，完全没有抵抗，若再不设法挽救，依照敌人几天来前进的速度计算，大约10



天左右即可到达昆明。”此时，陈明仁所部 71 军 36 师驻在西昌一带，受命迅速开进至滇西的祥云附近集结，整装待发。

当时，日本军队占领中国所有的海口，截断了中国接受国际援华物资的运输路线。对于中国整个抗战来说，是一个最严重的问题。只剩下一条滇缅公路还算畅通，能够从国外运来必要的物资。如今这一条路也被截断，中国抗战的困难就更加严重了。当时，滇西前线的第 71 军是宋希濂第 11 集团军（以 71 军、66 军两个军为基干组成）的主力，是首先用美式装备武装起来的 12 个军之一，军长为钟彬，副军长是陈明仁。该部队奉命进驻保山后，当即部署两个师建立江防阵地，坚守三个险要渡口。5 月 28 日，陈明仁直接指挥第 88 师第 264 团在龙松公路上打击日军，击毙了一个敌军大队长，截获其图囊中敌第 56 师团的一份作战计划及一张地图，得知敌军第 56 师团全部集结在腾龙地区，分为腾北、腾冲、龙陵、腊猛（松山）、芒市、新浓六个守备区，其师团部及直属部队驻在芒市，判断其兵力约为 1.5~2 万人左右。陈明仁将此项文件速交第 11 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并转呈驻滇参谋团团长林蔚，林蔚立即电告军令部。蒋介石随即于 31 日下令停止攻击，将主力部队撤回，固守怒江，留置一部分在西岸从事游击。这样，滇缅路上的战争，遂演变成对峙怒江的局面，这个局势一直相持到 1944 年 5 月反攻为止，时达两年，使日军未敢越怒江一步。

缅甸全境及滇缅边境的一部分被日军侵占后，中印交通被切断，美援物资无法运入，重庆国民党政府大为焦急。美国顾问史迪威于 1942 年 7 月 18 日向蒋介石送交备忘录，提出反攻缅甸的意见和计划。蒋介石随即批交参谋总长何应钦及军令部核议。军令部立即提出“中英美联合反攻缅甸方案大纲”。此大纲要点是中国陆军以 15~20 个精锐师的主力出滇西反击，英美陆军以 5~7 个师与中国留印部队联合，从印度和仰光攻击敌人。以英美联合空军、舰队控制制海权，掩护陆军作战。此计划由蒋介石和美国总统罗斯福的特使威尔基议妥，后又由军令部次长林蔚、刘斐及第一厅厅长张秉均同史迪威进行具体研究。研究后的会谈纪要交蒋介石审阅，蒋介石作了如下批示：“可照谈话结果积极准备进行，但留守滇省与昆明防守部队必须增派一军，尤其要增强昆明的实力，必须要有三个军防守昆明，应即筹划在第六战区或第九战区再抽一个军限明年二月以前到达昆明。”11 月 28 日，军令部颁发了《部署联合英美反攻缅甸的作战计划》的训令，此计划定于 1943 年夏季实施，其兵团部署以第 11 集团军为进攻部队主力。

1943 年 8 月，英美政府首脑在魁北克会议上决定成立东南亚司令部，任命英国路易斯·蒙巴顿勋爵为总司令，史迪威为副总司令，直接受英美参谋长联合委员会指挥。10 月，蒙巴顿勋爵到重庆向国民党政府说明，魁北克会议商定反攻缅甸将以攻缅北为主，作战军队以驻印军和云南的远征军为主，英印军为辅，美国每月空运一万吨军用物资由印度飞越驼峰，运来装备中国军队。

退到印度的中国军队，经过一再空运、补充兵员，集中训练，后来即郑洞国的新 1 军和廖耀湘的新 6 军。这两支部队后来即为蒋介石的嫡系，他们在印度训练时获得了最齐全的美式装备，士兵也是自国内精选空运去的。这时，蒋介石听信史迪威指控罗卓英无能，罗则被免职。中国驻印军总指挥由史迪威兼任，副总指挥为郑洞国。

当时蒋介石对于反攻缅北非常重视，其主要原因，一是打通国际通道，

获得必要的国际援助物资，抗战的困难就稍能减轻；二是美国要中国出人，中国就可能得到美国的武器装备；三是过去国民党中央军开进云南，须得到龙云的同意，因为那里是龙云的势力范围。现在为了挽救云南边防的急难，部队开进云南可以名正言顺，为以后收拾龙云打下基础。为此，1943年4月，蒋介石命令成立“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并调陈诚为远征军司令长官。司令长官部设于昆明以西百余公里的楚雄。抗日战争开始以后，陈诚历任军委会政治部长、三青团书记长等要职、现任第六战区司令长官兼湖北省主席。他原本木肯屈驾前来偏远贫瘠的云南边陲，但他看到最新式的美国装备运到这里，这里的队伍将变成中国最精锐有实力的队伍，以此与蒋介石讨价还价，有利可图，也就欣然前往。

蒋介石之所以要陈诚去云南掌管远征军司令部，亦是想培植亲信为他抓实权。陈诚于1929年任中央军第11师师长，1930年任第18军军长，从此就开始抓权，于1946年升任国防部参谋总长。在将近20年的时间里，他依仗蒋介石对他的信任，使用种种手段，排斥异己，推行所谓“十八军化”，积极扩大陈诚系的力量。蒋介石通过史迪威和美国方面洽商，美国可以给予国民党部队以12个军（36个师）的美式装备。当时拟定要装备的军队，大多在云南。陈诚当然不会放过这一良机，蒋介石任用陈诚为远征军司令长官还有一宗用心，即控制龙云。蒋介石和龙云间的积怨与矛盾很深，他欲制龙云以防其图谋不轨，必用亲信代劳。在楚雄设立这样一个长官部，可将楚雄以西所有军队的指挥权从昆明行营系统分割出来，就可削弱龙云的势力，进而控制龙云。

但是，在中国多年的史迪威，根本下把陈诚放在眼里。史迪威跑遍中国南北各省，说得一口流利的汉语，被称为“中国通”。抗日战争爆发前，他在北平任美国驻华大使馆武官。自那时起，他对中国所有重要将领的历史及生平事迹都作了记录并写了评语。他在记录本上对陈诚的评价是：一个专打败仗的无能之辈，是靠同乡和派系的关系，加上能够专投蒋介石之所好而升迁的。陈诚来到远征军后，史迪威从一开始就对他大加指摘，使他难堪。加上陈诚向来专横跋扈，到了远征军司令长官部以后，与他所指挥的集团军总司令、军长等闹矛盾，不得人心，陈明仁对他更是敬而远之，黄埔系的军人都对他不服。他对于作战更是胸无点墨拿不出主意，只好称病要求疗养，到任远征军司令长官只半年，便离开了远征军。蒋介石不得已于1943年深秋，重新起用卫立煌任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恢复他上将军衔，并任命黄琪翔为副司令长官，肖毅肃为参谋长。

此时远征军司令长官部统率的部队主要为两个集团军，即宋希濂所领第11集团军和霍揆彰所领第20集团军，外加司令长官部直辖何绍周所领第8军。何绍周是何应钦的侄子，何应钦无子，视何绍周同若亲子。驻印中国军队由史迪威指挥，史迪威派其副参谋长囊恩准将长期驻在远征军司令部做联络工作。

远征军司令长官部原先设在楚雄，离昆明很近，离前线较远，卫立煌到远征军不久，即将司令长官部推进到保山县马王屯，距怒江前线仅有70公里，以便于指挥作战。

陈明仁接受任务后，便立即作消灭侵入滇西边界的日寇、进军缅甸、打通中印公路的准备。他首先着力作好鼓舞官兵士气的工作，深入各师、团、营，和各级军官逐一谈话，使他们明确肩负的重任，团结一致抗日。同时迅

速更换武器，日夜训练官兵，使他们尽快掌握新武器的使用技能。反攻之前，陈明仁与卫立煌一道，缜密地研究和选择了进攻的路线，其中有一条由怒江岸边某处通往腾冲的山路，军用地图未能标出，这份图是在多年以前绘制的，不可能精确无误。陈明仁得知美国的军用地图都是用飞机照相制成，便找到卫立煌司令官，希望冀恩准将从中帮忙，派飞机重新照相。冀恩将此情况汇报后，遂指示美国飞机在怒江到腾冲这一段线路上进行航拍，再根据照片提供的资料制成地图。在这份图上可以隐约看到山间有条羊肠小道。陈明仁征得卫立煌的支持，即速派遣参谋长带人作实地踏勘，询问当地老乡和少数民族老人，他们都说已有几辈人不曾走过这条路，传说是条神路。从地图上分析，这条路所通过的地方，并无阻隔不通的绝地。陈明仁便派工兵去侦巡、修整。到了反攻开始之日，中国军队有一部分由这一条山路直插日军背后，打它一个措手不及，日军仓促应战，难于支撑，纷纷窜逃。

1944年5月初，中国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指挥中国远征军开始反攻。他召集霍揆彰、宋希濂及各军师长在马王屯开会，派第11集团军总司令宋希濂，指挥以第71军为主力的战斗部队，从泸水、双虹桥、惠通桥渡过汹涌的怒江，沿固东街南下，围攻腾冲城日军。

腾冲，是明末遗民修建的抗清石城。腾冲守敌为日军一个联队，它于城郊构筑了来凤山、飞凤山、辉凤山、凤凰山等4个坚固阵地，且互有交通壕沟通，能以火力相互支持。阵地前还设置多层铁丝网，居高临下，能以强大人力压制我军进攻。其主力则利用坚固的腾冲城墙和坚固的房舍，步步设防，其炮兵则隐蔽布置在城内，城内城外，互相策应。

陈明仁率部越过黎贡山岭，俯瞰腾冲田园楼舍，历历在目，顿生一种不消灭侵略者，收复国土，无以对炎黄先圣和后世子孙的亢奋。于是，陈明仁立即召集各师、团、营指挥官开会，研究敌情、地形，部署任务，命令预备第2师首先攻打制高点来凤之敌。两军交火，由于山高坡陡，且无荫蔽，难于接近敌阵地。加之城墙坚固，用野炮轰击，炸在花岗岩石块上，仅留下深不过10厘米、直径20多厘米的一个弹痕。围攻数日未能奏效，陈明仁便报请卫立煌要求航空兵支援。

一日正午，我航空兵双身飞机3架，在对空联络信号指示下，对来凤山顶敌据点进行轰炸扫射。重磅炸弹（500磅）命中率很高，摧毁日军地堡和阵地。敌寇4架战斗机起飞迎击。空战中先后中弹坠毁。激战20分钟左右，敌20架运输机也全部被击中坠毁。当此之时，陈明仁抓住战机，乘轰炸成功的瞬间，令第5团配合友军，向敌发起冲锋。日寇被炸弹震得晕头转向，猝不及防，悉数被歼，来凤山遂被第5团占领。

与此同时，阙汉骞军攻击凤凰山，由于空军配合，攻击进行顺利。这两个敌阵左右侧高地被攻下后，残敌即退至飞凤山等地。在攻飞凤山时，炮兵、步兵密切配合，充分发挥了威力，敌寇伤亡惨重，被迫狼狈地向腾冲城内溃退，企图关门固守。狡猾的敌寇，当外围山头据点失守后，便在南门城口外约150米处，筑起了一座暗堡，暗堡地下挖了一条隧道通入城内。当我军进击接近城墙时，敌在暗堡中以火力阻击，阻我前进。于是，陈明仁报请卫立煌司令官，希望派空军协同，炸毁腾冲城墙，以便一举歼灭敌寇。远征军部很快来电通知：次日10时，巨型轰炸机将轮番炸城。果然，第二日，空军轰炸机隆隆掠过，一声巨响，一颗吨级炸弹落在南门靠西的一段城墙上，约摸1丈多高、5尺多宽的长条麻石砌成的城墙，被崩开几丈长的大缺口，东边北

边的城墙同样也炸开了几个大缺口。

城内敌寇，惊恐万状，但仍作垂死挣扎，他们用蛇腹形铁丝网和机枪的火封锁炸开的缺口，阻断了我步兵的冲锋，先冲上去的战士大部壮烈牺牲。陈明仁心焦如焚，命部队于黄昏后采取小分队轮番进攻。于是，空前惨烈的巷战开始了。

巷战，大兵力不易展开，敌我近距离战斗，航空兵不能参加。步兵则以战车防御炮、火箭筒、火焰喷射器等对守城日寇逐屋攻击。日寇则死守一房一屋，以手榴弹、冷枪、冷炮向我还击。受武士道精神影响的鬼子兵虽被击打得丧魂落魄，仍硬撑着死不投降。对中国军队宣布的优待俘虏政策，他们都充耳不闻，顽抗到底。因此，我军只能逐屋逐舍追歼，经过激烈巷战，除战场被击毙、或切腹自杀而死者外，生俘仅 20 余人。另外，还俘获了 20 多名军妓。她们多系朝鲜姑娘，受到中国军队的优待，发给她们服装费、膳食费，让她们洗温泉澡，鼓励她们在获得解救后写信回家向家人报喜。她们欣喜之情溢于言表，非常感激中国人民厚待她们的恩德，礼赞中国自古以来就是“忠恕仁义之邦”。

在腾冲，经过 45 天的激烈战斗，71 军预备第 2 师协同友军一道，全歼日寇一个联队以及经外围战斗退入城内之敌约计 4000 余人。9 月 10 日收复腾冲，取得了滇西反攻的第一个胜利。陈明仁被誉为“能战之将”。

## 围攻松山

不久，陈明仁奉命率部围攻松山日军守敌。

松山，它是矗立在惠通桥畔的一座高峰，巍峨峻拔，形势险要。是滇缅公路的天然屏障，日军在这座山上筑有坚固完整的工事，凭险顽抗固守，山路蜿蜒，峰回路转，多处都在松山敌人的射击目标之内，日军驻这里的指挥官，是号称“战争之花”的松井少将旅团长。他手中掌握着一支相当战斗实力的部队，还有炮兵协同。日军居高临下，炮火所及既可封锁惠通桥两岸的通道，又能控制怒江上下游广大正面的射界；还配属有一个工兵大队，从地面到地下，构筑了纵横交叉的坚固工事，自称为“攻不破的堡垒”。因此，敌军把松山作为全线的可靠屏障，而我军则视其为前进道路上必须拔除的钉子，它已成为敌我必争、血战不让的战略重点。

当时敌人的兵力部署是：以一支战斗力极强的部队占据松山，作为全线的坚固支撑点与屏障；另以一支较小的精锐，进驻离龙陵 30 华里的镇安街，卡住滇缅公路通道的要点；以斋滕中将为师团长的 38 师团主力驻守龙陵县城，指挥全局，策应各方。亦即以滇缅公路为中心构成一道三角形形势的纵交战线。

我军针对敌人之兵力部署态势，制定了一个作战方案：先打松山后面的镇安街，截断敌援，孤立松山；再回头集中优势兵力，围攻松山，歼灭守敌，然后乘胜直下，夺取龙陵。

作战方案报请宋希濂批准后，陈明仁亲率第 71 军主力从保山出发，绕过松山守敌，翻越高山峻岭，到达怒江渡口，随即指挥第 87、88 两个师从渡口渡过怒江，进入高黎贡山原始森林，分两路向镇安街前进。第 87 师先以迅猛之攻势，出敌下意一举击溃守敌，占领了镇安街。龙陵敌指挥部获知该地失守，即派出一支部队，汇合溃逃守敌向镇安街猛扑，企图夺回这个公路重点。

在此紧急关头，陈明仁连夜找来两个师的师长，共同研究联合作战的方案。随后，他命令两个师长率部紧密配合，奋起反击。经过两天的激战，敌军伤亡累累，终于溃败，缩回龙陵坚守。松山变成孤山。欲夺松山，确非易事。陈明仁与卫立煌、宋希濂、何绍周等同美国准将莫恩一道，亲往山前去勘察研究，另有美国记者跟随。当时，日军侦察机看见桥这边有人走动，便疯狂进行扫射，陈明仁以岳飞攻打鄂州时炮石正中座位前仍泰然自若的精神，镇定自如地用望远镜仔细地观察并同那几位将军认真研究，最后，军部制定出精密的作战计划。卫立煌命令第8军前来参战，组织了一个非常坚强的攻坚兵团。他们由师长暂时担任团长，由团长暂时担任营长，各级军官逐级下降任职，充实基层第一线的力量，集中火力攻坚。临战以前，陈明仁派得力部队掩护工兵，抢修恢复了被炸烂的惠通桥，以利进军。同时，他考虑到攻占镇安街的第87、88两个师，经过战斗，消耗很大，且处敌后，给养供应困难，便请空军派运输机空运粮弹补充。当第一次空军6架运输机空投时，突遭敌16架战斗机截击，被打落2架。陈明仁得知这一情况，要求空运时均派战斗机护航，敌机则不敢轻易起飞拦截。

围攻松山的战斗打响以后，我军集中所有的重炮、榴弹炮、山炮、迫击炮等各类炮群，在不同距离位置上，一齐指向松山敌阵，昼夜不停地猛烈轰击，炮弹爆炸声震颤大地，惊心动魄，只见松山敌阵在我军强大炮火的轰击下，山石横飞，一片火海，地面上的所有工事与树木杂草，均被夷平烧光。

紧接着，陈明仁指挥围攻部队的步兵分成几路向敌阵发起连续冲锋。部队攻到山腰时，敌军即凭借地下来被摧毁的工事，利用地面上的残存堡垒与山崖死角，进行阻击顽抗，特别是从地道中射出的交叉火力，使我冲锋部队遭到重大伤亡，攻势受挫，不得不停顿下来。

在攻夺松山之战打响不久，日军将腾冲方面的部队集中攻夺龙陵，以解松山之围。当时，71军的87师作战不力，节节败退，已至黄草坝。师长张少勋率队抵挡乏术，要求变换阵地，放开公路。陈明仁认为此举正合敌意，让开大路日寇松山之围可解，松山围解，敌人则可打过怒江，直指昆明。这不仅第一战役前功尽弃，且威胁大后方的安全，绝不可取。陈明仁遂严令87师必须坚守，不准再退。张师长接到陈明仁不得再退的电话后，心急如焚，背着陈明仁直接打电话给总司令宋希濂，报告伤亡惨重，坚守不住，要求撤退。恰逢这时陈明仁也要打电话给宋，接线员告诉他话线已占，是张师长与宋总司令正在讲话。陈明仁当即要接线员将塞子插上，监听他们的谈话。他清晰地听到张师长在电话里叫苦不迭；同时又听到宋希濂答复张说：万一守不住，可以变换阵地，放开公路。这时，陈明仁按捺不住愤怒，对着话筒高声吼道：“张少勋，你必须给我守住，绝不可后退，这关系整个战役大局。今天71军是归我指挥，我的命令不算数吗？”接着他又对宋希濂高声喊道：“总座，作为总司令，你不可以不与我商量直接处理这个问题。”最后，他以严厉的口气警告张师长：“张少勋，你要知道，军人违抗军令是什么罪过！阵地守不住就别来见我！”张少勋自讨没趣，并且也知道违反军令最后会是怎样的结果。挂断电话后不多时，自知这仗不好打，也无颜再见陈明仁，便开枪自杀。宋希濂将此消息告诉陈明仁时，陈问道：“张少勋死了没有？”宋希濂回答：“还没有死，来打中要害，还不致于死，我去看了他。”陈明仁更是火冒三丈说：“张少勋战场自毙是为了逃避责任，咎由自取，他不死，我也得枪崩了他！”并义正严辞地对宋希濂说：“总座，你去看他，不是等

于纵容他吗？！”宋希濂瞠目结舌，无言以答。

陈明仁遂另派师长接替张少勋之职，指挥松山作战。不久，宋希濂和第71军军长钟彬均被调走，第11集团军总司令和第71军军长分别由黄杰和陈明仁接任。

在攻打松山最激烈的危急时刻，陈明仁与其他前线指挥官一道，及时研究改变战法，命令各部选出一批身强力壮、射击优良、作战勇敢的士兵，组成小股的突击队、敢死队，从各个方面与敌进行逐个山头、逐个地堡暗洞的争夺战。相隔稍远的即以轻重机枪和掷弹筒、六炮扫射轰击，距离较近的则投掷手榴弹和展开白刃肉搏。在有的地堡、山洞内，糜集着数十名敌兵，因弹尽粮绝而无力还击。我军用日语喊话，促其投降。鬼子兵虽毙命在即，却顽抗到底，至死不降，直至我军用集束手榴弹和火焰喷射器猛烈轰击，阵地方才复归我手。经过几昼夜的反复冲杀拼搏，终于全歼守敌，占领了整个松山阵地，两个联队的日本兵尽皆战死，混战中侥幸逃回龙陵的二三十敌兵，也被日军师团长以作战不力而全部处死。在山崖下的一座小屋内，发现了剖腹自尽的松山守将松井的尸体。这个罪恶累累的日本军国主义狂徒死有余辜。另外在一个很深的杂草丛生的坑内，发现了14具女尸，后经查得知，这是日本的随营军妓，鬼子兵发泄兽欲后将她们击毙，真是惨绝人寰，令人发指。

在这次围攻松山的激烈战斗中，我军也伤亡惨重，如第71军指挥的某团第3营参战时600多名官兵，战斗结束时仅仅剩下18名勇士，其中有1名排长、1名班长和16名战士，营、连长全部为国壮烈捐躯。战士的鲜血染遍了松山阵地的每寸土地，连从不轻弹热泪的陈明仁，也禁不住泪流满面地感慨道：真是一寸山河一腔热血呵！

## 出击龙陵

1944年夏，远征军司令长官卫立煌命令陈明仁指挥第71军4个师为主力，越过怒江，进攻龙陵方面之日军，以打通滇缅公路。当时担任龙陵一线防守的日军为斋藤中将师团长指挥的第38师团，这是一支附有大量飞机、坦克、大炮，战斗力很强的精锐部队。

陈明仁指挥的第71军从攀枝花、惠通桥渡过怒江，从滇缅公路主攻龙陵。这是陈明仁将军指挥的一场重要的反击战。

龙陵城位于怒江西岸约30余公里，向西北60公里是腾冲县城。向西南120公里经芒市、遮放至碗叮与缅甸的南坎交界。龙陵城群山环抱，中央有较小的长形平坝，滇缅公路穿城而过。怒江以西的日军，盘踞在高黎贡山脉的崇山峻岭之间。日军有惯于丛林作战的第56师团全部、第2师团和第33师团一部，在腾冲、松山、龙陵三大据点筑有钢筋水泥坚固工事，还有第18师团在密支那及其西北地区作后援。在战线长而又有纵深的丛林间作战，对日军固守是有利的。当时，日寇第33军的一个师团防守于怒江西岸的松山、龙陵一带，主力扼守龙陵。由日寇少将旅团长指挥构筑坚固的前进阵地。龙陵城外一个个山头上，日寇都构筑有堡垒式的环形工事，形成一个个独立的支撑点和堡垒群，火力互相交叉，组成严密的火网。其炮兵则部署在堡垒群后方，可以火力支援各支撑点的战斗。

6月1日，第71军同第66军等友军一道陆续过江，进攻龙陵。陈明仁

将军率领的第 71 军辖陆军第 36、87 和第 88 师，从惠通桥、攀枝花一线渡过怒江后，以第 36 师攻打松山日军前进阵地；主力由左翼迂回龙陵城，将龙陵城郊各高地敌据点团团包围，各个击破，然后攻城。

为尽量减少我军伤亡，陈明仁急电卫立煌和史迪威，要求协同作战的盟国航空兵施行空中支援，对日军一个个据点先以重磅炸弹俯冲轰炸，摧毁其堡垒工事和有生力量，然后以炮兵火力进行弹幕射击，掩护步兵冲锋；对敌残存碉堡，以火焰喷射器喷火灭之。依照这样的安排进行战斗，日军的堡垒群一个个地被清除。

在扫除龙陵城外围敌人的战斗中，陈明仁特别注意情报的收集，以及时掌握敌人的动态。一日，陈明仁得报，驻缅日军将于次日 12 时派运输机三架向龙陵城内日军空投弹药和食品。陈明仁凝神望着桌子上铺开的地图，一晌，手臂抱在胸前在屋子里来回踱步思忖着，他来到窗前，拉开遮掩很严的窗帘。遥望茫茫夜空，似乎要窥视清楚敌机空投的位置。这时夜色深沉，繁星闪烁，他双眉紧锁，锐眼闪光，又沉思片刻，顾不得与卫立煌和史迪威联系，直接叫通盟国空军联络官的电话，不容商量地厉声说道：“我是陈明仁，明日日军空军要来龙陵空投，请你们务必派航空兵于明日 12 时来龙陵上空截击空投敌机。”对方未置可否便撂下了电话。

12 时正，日机三架果然从缅甸方向进入龙陵上空盘旋，准备向城内敌人空投。这时，盟国航空兵 9 架歼击机适时地从龙陵上空掠过，居高临下，出其不意，俯冲攻击敌运输机。一阵枪炮声后，日本一架飞机，尾部喷出浓烟，一头栽向龙陵城北山坡上，之后便是爆炸的轰响和冲天的火光。另外两架敌机见势不妙，企图仓皇遁逃，也未得到什么好结果，同样在歼击机的一阵炮火后，吃了倒栽葱。围城官兵目击苍穹的一场空战，全歼敌机三架，无不欢欣鼓舞。71 军在友军部队的协同下，将松山、龙陵城外围之敌大部肃清。但敌之主力退守龙陵一隅和回龙山、三台山阵地，拼死顽抗。

在重炮轰城之后，陈明仁抓住战机，以两个师的兵力由友邻部队配合，组成突击队，分别从东北、东南方向同时攻城。日军逐屋扼守，负隅顽抗，我军攻城推进十分缓慢。

陈明仁心急如焚，希能尽快结束战斗，便亲临第一线督战，他详细分析我军兵力火力的绝对优势和敌军死守无援的困兽斗，决定各师组织敢死队，采取昼夜轮番攻击的战斗部署，使敌疲于应战。在攻击老东坡制高点时，久攻不克。这里敌人构筑堡垒坚固，地势险要，与龙陵城有交通沟壕相连的滇缅公路从这山西边的垭口通过，下坝子以后，转一个弯就到龙陵城。在龙陵城西南还有一座更突出的制高点，名叫回龙山，敌寇堡垒工事尤为坚固。我军攻击龙陵，这两个大的制高点是不易啃的骨头，攻不下这两个制高点就难于打通滇缅公路。此正值滇西雨季，不时大雨倾盆，更给我攻城造成困难。官兵冒雨进攻，忍饥挨饿，奋勇争先，与日寇苦战，无一退缩逃亡，但部队损失也不小。此时，陈明仁与攻城的第 88 师副师长熊新民（师长因病请假）共同商量，重新研究了敌情、地形，作了新的部署，组成三个突击队，由炮兵协同，梯次轮番冲击，直到深夜。敌阵地上已是敌尸横陈，血肉狼藉。我军官兵虽疲惫万分，但人人奋勇争先，连电话兵都带着电话机跟至前线追击敌人，直推进到山脚下的龙陵城边。我军连续作战，经过七八天的激烈进攻，将日龙陵守军 2000 多人大部歼灭。一小股约百十人乘夜突围，窜入龙川与大盈江之间的崇山峻岭的原始森林中。陈明仁当即派出一个步兵营跟踪追击，

经过十多天的追击搜捕，将逃敌逼于汹涌的大盈江边，有的被击毙，有的由于连日无粮饿得躺在地上不能动弹，被我军生俘。

在攻击龙陵的战斗中，第71军官兵在陈明仁率领下，连续突击，展开了阵地白刃战和扫荡战。喊杀声、兵器的撞击声、手榴弹的爆炸声以及急促的手提机枪的射击声，交织在一起，战斗空前惨烈。当时观战的美国联络参谋组组长吴德上校对宋希濂说：“中国军队耐受困苦精神和作战的勇敢都是世界上少有的。”

第71军在友军的配合下，终于攻占了龙陵城。当灿烂的朝阳从东方冉冉升起的时候，我军在龙陵高高地升起了中国的国旗，这些为民族独立自由而浴血奋战的官兵们眼里噙满了泪花。

## 驰名中外

1944年11月，陈明仁担任第71军军长以后，率领部队作战更是勇猛顽强，正如他在自传中称：“当时凡属任何部队攻克不下的地方都是由71军来担任。例如芒市附近的三台山、襄佐寺、畹町附近的回龙山等，都是71军攻克的；而攻克回龙山一役，不但挽回了当时的整个战局，而且增加了我个人在国内乃至国际上的声誉，我自己也公然认为是我生平的又一得意之作。”

龙陵战役结束后，陈明仁立即挥师南进。这时，日军另一个残缺的联队以回龙山为核心，在三台山一带构筑坚固的工事，组成环形防御阵地，控制滇缅公路，阻止我军前进。1945年1月，一场惊心动魄的山地攻击战斗开始了。

回龙山是畹町的门户，要取得滇西抗日的最后的胜利，夺取回龙山十分关键。围攻任务先由新增的第200师和第9师担任，由美国飞机掩护，两个师围攻一个星期之久，伤亡惨重，未能攻下回龙山。司令部非常着急。最后，卫立煌电召陈明仁速来远征军司令部议事。陈明仁到时，卫立煌正在办公室里踱来踱去，表情严肃，室内几个人静坐着，没有人言语，空气异常紧张。还是11集团军总司令黄杰打破这凝固的氛围，首先开腔。黄杰与陈明仁是黄埔一期的同学，他拍着陈明仁的肩膀显得很亲切，仍不失上司的威严，语音凝重地说道：“子良啊，我们两个师围打回龙山久久不克，我与卫立煌司令长官思谋良久，非请你出马不可了，攻打回龙山的战役交你统一指挥。”

上司的信赖，同窗的重托，使心强好胜的陈明仁激动异常，心想，如今能战之将的殊荣，我陈明仁受之无愧；恶战在即，由我统领千军万马，自然当仁不让。未及他启齿，站立一旁的美国联络官和几个指挥官正通过翻译向黄杰传达：他们已经收到美军指挥部的指示，由于中国军队作战不力，美国空中支援也无济于事。自明日始，美国空军将停止对攻击回龙山的部队作支援飞行，空运物资亦暂停。黄杰没有理会美国联络官的话，却将风尘仆仆的陈明仁介绍给美国人：“这就是陈明仁将军，我们已将攻占回龙山的任务交给这位战将。希望你们的支援飞行能继续下去，不要气馁，会有好消息的。”对于第71军在整个滇西战役中的赫赫战功，美国人早有所闻。一位高个子美国联络官望着身板挺直、浓眉紧皱、军容严整的陈明仁，用中国话问道：“你们哪一天可以拿下回龙山？”

陈明仁用锐利的双眼瞟了一下黄杰，然后将视线转移到美国联络官身上，斩钉截铁地说：“我的部队明天到达，后天接防，第三天攻下。”陈明



仁的气魄和语调使在场的人无不为之惊愕，大家用诧异的目光一齐射向陈明仁。美国联络官不无疑虑地追问：“你一天能攻下回龙山，根据何在？”

陈明仁虽深信自己的队伍是能打硬仗的队伍，敢打敢拼，勇往直前。现在虽对敌情尚不完全了解，胜负尚无绝对把握，但在美国人面前，他表现了高度的自信心，用醴陵家乡话高声回答：“我是中国军人，中国的将军，中国有句老话，叫军中无戏言，你们知道吗？”

“三天攻不下来怎么办？”联络官的嗓门也不小，步步逼问。

“山河为证，三日拿不下，就去回龙山去收我的尸首，我与回龙山共存亡。”陈明仁当即立下军令状，誓死攻下回龙山。

在场的卫立煌、黄杰和其他高级指挥员无不为之豪言与壮举赞叹兴奋，但也为他担心，纷纷问他，部队行动还有什么要求。

陈明仁沉思片刻，蓦地眉头一皱，眼睫毛颤动了一下，声音铿锵地回答：“要打好这一仗，除了我的部队英勇作战而外，陆空紧密配合，步炮协同一致十分重要。因此，攻击起时，助战的盟国航空兵和协同作战的炮兵应同时行动，必须归我直接统一指挥。那么，联络官先生，你就只能收回成命，令美国空军继续助战飞行。除此之外，别无他求。”

卫立煌、黄杰和盟国空军联络官当即表示同意，并报何应钦批准。远征军副司令长官黄琪翔与几个美国高级指挥官被派往前线观战。总司令黄杰、炮兵指挥官邵伯冒都以观战者的姿态，亲往前线欣赏陈明仁指挥的这场威武雄壮的战斗。会后，陈明仁回到部队作了紧急调动、部署。

黄杰也来到第71军前线指挥所。当时第71军辖陆军第36师、87师和88师。陈明仁召集各师团长、炮兵指挥官、空军联络官、通讯营长等，研究部署歼灭回龙山敌人的作战计划。他详尽地分析了敌我态势，然后语调铿锵地向大家指出：“日本侵略者的战术是僵硬的、傲慢的、笨拙的，只知死守，同时受日本武士道精神的教化，宁死不放下武器。因此，我军唯一的办法是：整体包围，各个击破，予以全部歼灭。”他说到这里，猛抽了一口烟，似乎要一口吞掉日本侵略军。

“时下正值深冬，滇西进入旱季，天气晴朗，万里无云，这对陆空联络，步炮协同作战都十分有利。为了充分发挥我军火力优势，我们要首先集中全军和由黄总司令调来的友军的山炮、野炮、榴弹炮、轻重迫击炮计百余门，以凶猛的火力轰击敌阵地，把回龙山炸成焦土，并大量杀伤敌人的有生力量，而后由步兵在航空兵、炮兵掩护下奋勇冲击，消灭敌人。”他指着地图对各师长命令说：“为了使敌军不能进入缅甸，以一个师沿左侧山丘地带迅速迂回前进，切断敌人退路；第88师由滇缅公路两侧主攻回龙山敌主阵地；另一个师为预备队，以一个团佯攻三台山。为迷惑敌人，要调动步兵向三台山方面汇集，航空兵的飞机袭扰三台山上空，造成其我欲主攻三台山的错误判断。”各师长点头称是，打心眼里佩服军长的战略战术。陈明仁最后强调说：“我已立下军令状，把脑袋押在总指挥部了，各位务必严督部队死力拼杀，打不下回龙山，誓不回头。”他将右手一挥：“各自回去作战斗准备！”

战斗打响的前夜，山野万籁俱寂。陈明仁特地来到第88师师长熊新民驻地，鼓励他说：“友军攻回龙山久而不克，88师虽然伤亡颇大，但士气旺盛，又有攻坚作战经验。主攻回龙山主阵地的任务交给了你们，非攻下不可，就看你这个湖南老乡了。”他一巴掌拍在熊师长的肩上，熊师长感到了千钧的重量，全身微微一颤，随即镇定下来，用常德口音坚定地回答：“上级命令，

坚决服从，为国家赴汤蹈火，与回龙山共存亡！”接着，陈明仁将指挥所设在第88师的前沿，他亲自督战，鼓舞士气。

夜深人静，陈明仁在前线指挥所用电话检查各部队的准备情况，特别是炮弹储备补充情况，直至一切准备就绪，他才抓空休息一时。

滇西的夜空，一片静谧，天际的繁星眨着眼似在注视着地面将要发生的一切，战士们枕戈待旦。

翌日拂晓，6时10分，陈明仁亲自命令以三分之二的火力猛轰回龙山主阵地，另以三分之一的火力指向敌之后方和三台山，截断其机动增援。敌人把主要兵力迅速转移到三台山方面，以阻止我军进攻。8时许，陈明仁命令航空兵出击，轰炸机三架一批轮番俯冲扫射轰炸回龙山高地。霎时间，回龙山浓烟滚滚，烈焰腾空，天昏地暗，隆隆的爆炸声震天动地。三批航空兵轰炸之后，陈明仁命令炮兵转向回龙山轰击，掩护步兵冲锋。

守卫回龙山的日军拼死顽抗。战斗持续到下午3时，回龙山岿然不动。这时，观战的美国军官冷嘲热讽地说：“陈将军，现在是3时正，离天黑只有二三个小时了，回龙山依然如故，但愿上帝将太阳拖住，不要让它溜下山去，否则，陈军长的嘴巴就不好再张了啊。”在场的黄琪翔、黄杰也在暗暗为他焦急，但不露声色。陈明仁仍沉着泰然，指挥若定，用剪形望远镜观察阵地，亲自指挥督战。他想：人世间，战争是相当可怕和残酷的，但它有正义和非正义之分。现在，日本帝国主义为称霸东方，肆无忌惮地欺侮被其军国主义铁蹄蹂躏践踏的土地上的民族，它可能逞雄得势一时，但它是非正义的。我们是为摆脱奴役，为争取民族独立自由而战，尽管可能遇到暂时的困难与挫折。但我们是正义的，得到世界各民族人民的支持，胜利最终是我们的，这个历史事实绝不会改变。因此，陈将军显得格外镇静、沉着。他立正挺胸，军威猎猎，恰似一尊雕塑，他用灼灼逼人的目光射向美国军官，深沉地说：“成功与失败往往仅一步之距，人们不是常说‘谁笑到最后才笑得最好’吗？！现在离天黑还有几个小时，先生们，难道等不及了吗？”

说罢，陈明仁要通三个团长的电话，同他们一一通话，他的语气坚毅果敢：“时间就是胜利，刻不容缓，我们的身家性命就决定在这两三个小时了，你们要把握住时机。”三个团长都在电话里不约而同地回答：“攻不下回龙山，决不回来见军长。”隆隆的炮声响彻山谷，喊杀声震天，密集的枪声不绝，硝烟弥漫，我敌双方攻守的阵地被血与火映得通红。第88师士兵在陈明仁、熊新民及各位团长的率领下，连续发起猛烈冲锋。下午4时许，回龙山主峰在一片喊杀声中被我军占领。当胜利的旗帜在山头迎风飘扬时，几个美国军官发狂似地把陈明仁抬了起来，连声说：“verygood, verygood, 不愧中国名将，难得之将才啊！”美国随军记者将此次战役写了长篇通讯报道，“陈明仁”的威名从此传扬海内外。

陈明仁当即命令部队向左右扩大战果。战斗持续到黄昏，回龙山、三台山之敌，约800余人被歼，残部约百余人向畹町方向逃窜，也被迂回至此的部队拦阻歼灭。第71军乘胜前进，与在大黑山战斗的友军同时攻击中缅边界上的畹町。畹町位于瑞丽江边的中缅边界我国一侧，附近为五六百米高的山丘地带，林木葱茏茂密，小镇上的居民，不堪日寇的骚扰，早已逃入山中，已是十室九空。经过几场激烈战斗，我军进占了畹町。至此，盘踞在祖国滇西土地上的日本侵略军全部被扫荡干净。少数遁入深山老林中的日本兵，也被我边民截获。这时，陈明仁来到一个山丘上，从畹町南望缅甸，尽收眼底

的莽莽原始森林，黑压压一望无际，但隆隆的炮声仍不绝于耳，已知入缅远征军仍在鏖战，日本侵略军的末日已经不远了。陈明仁兴奋不已，投步往西北侧走去，突见一块日军墓地，新冢累累，木制的碑牌上写着一个个战死的日寇的军阶和姓名，密密麻麻，不下数百。这就是侵略者的下场。陈明仁不禁哼起两句唐诗讽刺道：“可邻无定河边骨，犹是春闺梦里人。”

不久，陈明仁率第 71 军与驻印远征军新 6 军、新 1 军在中国畹町和缅甸芒友胜利会师。至此，中国远征军和中国驻印军歼灭了日军第 18 师团和第 56 师团的大部分，击溃其第 2 师团和第 33 师团，对于日军在缅甸的占领起到了瓦解作用，为英印军的胜利创造了有利条件，减轻了麦克阿瑟进攻太平洋的侧面压力。中国与海外的通道——中印公路（又称史迪威公路）重被打通。我军在这多次艰苦的战斗中，也付出了惨重的代价，单是远征军的死亡人数就达 4 万余人。

在芒友会师时，人们可见到中国出国远征军，穿着美制军装，手持新式武器，配备有坦克、吉普车、十轮大卡车，个个精神抖擞，好不高兴。一纵列绵延十数公里的十轮大卡车队，满载作战物资和兵士，如长龙般沿着滇缅公路，经畹町、芒市、龙陵回国，沿途群众扶老携幼，夹道欢迎，热烈欢呼我军取得消灭日寇、打通滇缅国际交通线的胜利。

滇西抗战至此胜利结束，陈明仁因抗战功勋卓著而蜚声中外。

## 杨成武将军在“文革”中的磨难与抗争

叶运均

杨成武（1914～）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生于福建长汀张屋铺。1928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1929年参加红军，先后任秘书、宣传队中队长。1930年5月转入中国共产党。曾任红4军连政治委员、教导大队政治委员、第11师第32团政治委员。参加了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长征中任红2师第4团政治委员。到陕北后，任红4军第1师政治委员。1936年入抗日红军大学学习，后任红4军第1师师长。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独立团团团长。1937年冬任八路军独立第1师师长，晋察冀军区第1分区司令员，后兼政治委员和中共地委书记。1944年任冀中军区司令员。抗日战争胜利后，任晋察冀军区第3纵队司令员，晋察冀野战军第二政治委员。1948年8月任华北军区第3兵团司令员，后任第20兵团司令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天津警备区司令员、京津卫戍区副司令员。1951年参加抗美援朝，任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0兵团司令员。1952年回国后，任华北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京津卫戍区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北京军区司令员，防空军司令员，代理总参谋长，中共中央军委常委、副秘书长。1978年任副总参谋长兼福州军区司令员。是中共第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十一、十二届中央委员，第六届全国政协副主席，第一至第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曾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 \* \* \* \*

### 三·二二之夜怒斥邱会作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1955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衔制，杨成武被第一批授予上将军衔，并且身居要职。

然而，将军之衔和所有要职也未能使他在“文化大革命”中免遭劫难。

不仅他本人受到残酷的迫害，而且他的母亲、妻子、妹妹、妻舅、子女、部属和亲朋好友均受到株连。

1968年夏一个闷热的黑夜，一架军用飞机从湖北孝感机场进入跑道后，随着一声尖厉的呼啸，腾空而起，继而消失在茫茫的夜空。杨成武就在这架飞机上。机舱里除了嗡嗡的引擎声，没有人语和走动。他将要被带到哪里？不得而知。几个彪形大汉端坐四周。他们或许也不知道使命的目的所在。

快半年了，杨成武一直被关在湖北的一个偏僻之处。他无时不为国家和党的命运忧虑，也时时牵挂着不知落脚何方的妻子、老母和儿女们。

机舱外一片漆黑。将军的思绪万千，不禁又滞留在1968年的3月，那是一个动乱的全国都在沸腾的3月。在北京城里，反击“二月逆流”的高音喇叭声吵得人们无法入眠，铺天盖地的大字报、大标语令人眼花缭乱，叶剑英、聂荣臻、陈毅元帅和国务院副总理谭震林等，正在受着“文化大革命”的冲击。

杨成武压根儿也没想到，斗争的矛头竟指向了他一向敬重的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他焦急，他忧虑……

就在22日这天晚上，又发生了他更想象不到的事情。那是和今天同样漆

黑的一个夜晚，他正生病在家。12点半左右，门卫报告说：“林副主席的秘书来了。”

张秘书忙出去迎接他们。两位来者单刀直入地说：“一零一（林彪的代号）要我们来看看杨代总长。他的病情怎么样？”

张秘书说：“已经吃过药，睡着了。”

“我们来了，总得要见一见。”林彪派人来探病，并且执意要见，张秘书只好领他们走进杨成武的卧室。

杨成武在安眠药的作用下，已经睡熟了。张秘书把他叫醒。

林彪的两个秘书走到杨成武床边，一个说：“一零一对首长的病情很关心，特让我俩来探望。”

杨成武说：“不要紧的，休息休息会好的。”

那两个秘书又说了几句安心养病之类的话，就起身告辞了。

送走他们，张秘书回到办公室，想起晚饭后不久吴法宪来过，当时他正要向杨成武通报，吴法宪嘿嘿一笑，说：“杨代总长休息了，就不要打扰他。我先到人民大会堂开会，开完会再来汇报。”说完，他就走了。

张秘书将这一情况向杨成武报告后，杨成武说：“你打个电话告诉他，我身体不好，不要让他来了。”

电话打到人民大会堂，接电话的是吴法宪的警卫员小刘。他说：“吴司令员正在开会，交代过，不能找人。”

张秘书刚刚打了个盹儿，空军政委余立金的秘书就打来电话说：“刚才吴法宪带人把余政委铐起来了，请问问杨代总长，是怎么回事？”

“是不是吴法宪搞政变？”

“是吗？”

“这是怎么回事？”

杨成武的夫人赵志珍听到报告后很吃惊。

凌晨2时许，驻杨成武家附近的卫戍部队接到紧急集合的命令。不许开灯，不许喧哗，由来人带领一口气拉到了景山。与此同时，新调来了全副武装的军人。他们包围了杨成武的住宅，几十个人冲进了楼里。

“咚咚咚”的敲门声，“出来！不许动！”的喊声，“跟我走！快！”的喝斥声充斥整个楼道、客厅和各个房间。一片吵嚷声划破了宁静的夜空，使赵志珍警觉起来。她刚推开房门去看个究竟，几个人上来就把她扭住了。她愤怒地质问这是干什么？无人应答。

杨成武的家人像犯人一样被驱赶着，还没弄清楚是怎么回事，就被连推带搽地赶到楼下的客厅里。

赵志珍要回过身去叫杨成武，但客厅门口站着几个荷枪实弹的彪形大汉回答说：“不行！”这时，邱会作和李作鹏带人冲到楼上，闯入杨成武的卧室。杨成武被惊醒后，穿着一身睡衣，走了过来。

邱会作说：“林副主席请你去开会。”

李作鹏站在后边，眼睛被那副变色镜挡得严严实实。他身后的士兵手持短枪，如临大敌。

杨成武问：“开什么会？有劳你们两个来请，啊？你们搞什么名堂！”

邱会作说：“去了你就知道了。”

杨成武觉得事情不对，转身拿起红色电话机的话筒，想问问总理是怎么回事。电话线已被林彪下令切断，一点声音也没有。“怎么回事？”他火了。

邱会作很有几分得意地笑着；李作鹏仍旧在一旁不动声色。“走吧！”随他们来的人催促道。

杨成武心想：莫非发生政变了？是吴法宪搞的？

他转身拿了件警卫员的棉大衣，披在身上，抬脚迈出房门。邱会作带来的“警卫”寸步不离地跟着他，甚至跟进厕所。

这些情况足以表明，外面发生了大的变故。他情绪激忿地对邱会作说：“你们到底搞的什么名堂？开会，开什么会？不要搞欺骗！要有党性！没有党性还应该有人性，要有良心！”

邱会作并不回答，几个人拥着杨成武走下楼梯。杨成武的这几句话震慑了邱会作，直到粉碎“四人帮”后审判邱会作时，他还说：“想起杨成武的那句话，至今我还心惊肉跳。”

### 她陷入了沉思这到底是为了什么

杨成武走下楼梯的时候，心情很不平静。

两天前，他的父亲在这里去世，刚刚火化。他由于劳累，患了植物神经失调症，不能亲自将父亲的遗体送去火化场，只能在父亲的遗体前肃立默哀，深深地鞠了三个躬。他对父亲的感情极深，至今他每每想起父亲，眼眶里总含着深情的泪花。

是啊，在很久很久以前，杨成武的家是在福建省长汀县宣成区畚乡张屋铺村，那是一个风景秀丽却贫穷落后的山乡。他家境贫寒，无钱上学。在那艰难岁月里，父亲为了让唯一的儿子上学，整天“泡”在造纸坊造纸，冬天没有衣服，就用纸缠裹在身上取暖，家里什么都卖了，钱还是凑不够。他又找并不富裕的兄弟想办法，给点接济，这才使杨成武有了继续学下去的可能。

在学校里，杨成武因为受到了中共地下党员张赤男老师的教诲，逐渐懂得了许多革命道理。不久，他秘密加入了共青团。转年，也就是1929年，他才15岁便在这位老师的带领下，参加了闽西农民暴动，很快就被编入朱毛红军即红4军。当时由于情况紧急，也是为了家里的安全，杨成武没有和家里人告别。可是后来，国民党当局知道了，那帮家伙恼羞成怒，将杨成武的父母抓走了。是全村人签名盖手印作保，他的父母才免于死。但房子被烧了，锅也被砸了。为了安全，老人逃进了闽西的原始森林……

杨成武这时随部队转战在赣、湘、闽等革命根据地。他参加革命后，长期和家里音信不通，更没有机会回家看望父母，总觉得对父母十分愧疚。

1934年10月，部队接到战略转移命令要撤离苏区时，一个偶然的机，张屋铺村的乡亲们听说红军的一支队伍就在闽西连城附近，便推选杨成武的父亲和其他十几位乡亲当代表，带着猪肉、鸡蛋和当地土特产，赶到部队驻地——钟屋村慰劳子弟兵，杨成武这才和日夜思念的父亲匆匆见了一面。

杨成武的父亲和家人在敌人的白色恐怖下东躲西藏，直到当地解放才彻底翻身。

1950年夏秋之际，中共福建省委书记兼省政府主席张鼎丞受托将杨成武的父母从福建老家接到天津，他的一家才得以团聚。

杨成武深知，在他参加革命的几十年里，父母为他受到了国民党当局的迫害，吃了不少苦。世界上哪有父母不疼爱自己孩子的呢，双亲日夜思念儿子的骨肉之情，使他们时时刻刻都在为孩子的安危担惊受怕啊。在那漫长的

战斗岁月里，即使在紧张、激烈的战斗之余，杨成武也常常在挂念着为革命忍辱负重的两位老人。

的确，他多么希望能在父母身边孝敬两位老人啊！为使两位老人心情舒畅，生活愉快，在晚年享受到天伦之乐，他不仅教育孩子要孝敬爷爷和奶奶，而且自己经常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陪父母亲聊天唠家常，有时还陪他们看电影、看戏，尽力使他们不感到孤独和寂寞。

但是不久，朝鲜战争爆发。1951年6月，杨成武奉命率领志愿军第20兵团赴朝作战。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他不得不再一次告别年近花甲的父母、年轻善良的妻子和那些天真烂漫的孩子。也就在这时，他的父母提出愿意回老家过山村生活。杨成武和赵志珍尊重两位老人的意见，派人把父母送回了老家，直到1956年才又把两位老人接出山乡来到北京。

杨成武入朝后，赵志珍承担了全部家务。她不仅要照顾孩子，还要孝敬远方的父母，关照丈夫的伯母和婶娘，经常惦记着他们，每年分别给他们寄些钱，以使他们生活得更好，更幸福。

如今，父亲谢世去了，这是多么令人伤心的事啊！母亲77岁了，正在生病，能经得住这个打击吗？遭受病魔折磨的白发苍苍的母亲也被闯进来的那些人从房间里抬出来，放在客厅里的乒乓球台上。

杨成武感到，自己此去凶多吉少，需要和母亲说两句话。母亲失去老伴，身体又有病，儿子若再有个三长两短，她能承受得了吗？便说：“我要跟我的妈妈说几句话。”

“不行！”一个小头目态度十分粗暴，当即拒绝道。

杨成武气得脸色青紫。他晃动着魁梧的身躯，用肩膀把讲话的人扛到一边——没想到他还有那么大的劲儿，竟把那人撞了个趔趄。他在客厅的门口，隔着卫兵，望着白发苍苍的母亲坐在绿色的乒乓球台上，一时不知该说什么好。老人受苦受难一辈子，到晚年只希望儿子为她养老送终啊！

杨成武毕竟是久经沙场的战将，他稍稍稳定了一下情绪，平静地说：“妈妈，你们不用害怕，我没有问题，要相信共产党，相信毛主席。事情是可以搞清楚的。”

这时，老妈妈已是老泪纵横，她还是坚强地点了点头，她听懂了儿子的话。

杨成武又对赵志珍和孩子们说：“要相信毛主席、共产党，事情会搞清楚的。”赵志珍深情地望着丈夫，泪如泉涌，显然有很多话要说，却什么也没说。她紧紧咬住嘴唇，陷入了沉思：这到底是为什么呢？简直是飞来之横祸呀！但是，她坚信：丈夫没有做什么错事，对党、对人民是赤胆忠心的。我们党历来是实事求是的，不怕！

“快走，快走！”那个小头目嚷道。这吼声打断了赵志珍的思绪。年逾七旬的老母如从梦中惊醒，扑过来大声呼嚎：“我儿子从小就跟着毛主席干革命，不反对毛主席啊！”

杨成武被带出房门，儿女们大声哭喊：“爸爸保重身体！”杨成武一阵心酸，但却猛然转身把头昂起，大声说：“相信我！毛主席了解我！我绝不会反对毛主席！”

是啊，杨成武戎马一生，南征北战，深深懂得革命胜利来之不易，而要保卫革命胜利果实更难。为了革命后继有人，将军和夫人十分重视对年轻一代的教育。平时不管多忙，他俩总要抽出时间对子女进行革命传统教育，检

查和督促他们的学习。他俩经常给孩子们讲红军长征和战斗故事，使他们懂得人民的江山是无数革命先烈用鲜血和生命换来的。每到寒暑假，学校寄来通知书，他俩都要亲自过目，对孩子们的学习成绩和在校表现，好的进行表扬、鼓励，不足之处进行批评、教育，并帮助他们制定假期学习计划。长期以来，杨成武和赵志珍把对孩子们的爱完全倾注到对孩子们的教育之中。他俩一直教育着自己的子女，要听党的话，努力学习毛泽东思想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学习为人民服务的本领，做一个有益于人民的人。

眼下，将军对儿女们还能说什么呢，他那气宇轩昂的话语，正体现了他勇于坚持真理的坚定信念，也告诉了孩子们要对毛泽东思想坚信不移。

杨成武走出屋门，见有辆黑色的吉姆车停在楼门口，车门开着，里面黑洞洞的。邱会作捷足先登，钻了进去。李作鹏伸伸手，示意要杨成武进去。等杨成武走进去后，他也紧跟着钻了进去。邱会作和李作鹏一左一右给他“保驾”。

这时，屋里的赵志珍和孩子们哭出了声儿。赵志珍唤着将军的名字；孩子们喊着爸爸……

尽管在硝烟滚滚的战争年代里，在炮火纷飞的战场上，赵志珍和杨成武分开的时候要比在一起的时候多得多，可哪一次告别时也不像今天晚上这样……

天，是那样黑！夜，是那样静！那哭喊声简直使人心碎！

“走！”铁石心肠的邱会作从吉姆车里发出阴森短促的口令。随着汽车的一阵马达轰响，杨成武被押走了！

### 事情来得突然但并非是偶然发生

第二天，北京城里铺天盖地地响起了“打倒杨（成武）、余（立金）、傅（崇碧）”的口号声。事情发生得这么突然，真是令人费解。然而，“不理解也要执行”的“副统帅”的指示，促使那些不明真相的狂热的人们涌上了街头……从此，在“打倒刘（少奇）、邓（小平）、陶（铸）”、“打倒彭（真）、陆（定一）、罗（瑞卿）、杨（尚昆）”的口号后边，又增加了“打倒杨、余、傅”。这一系列口号也就成了当时开会和游行所必狂喊的。

其实，“打倒杨、余、傅”这个口号是林彪一伙首先带头喊起来的。杨成武披逮捕的那天晚上，他被押到人民大会堂的福建厅。那

里灯火通明，里面坐着二三十人，除了周恩来、汪东兴、李天佑、王新亭等同志以外，主要是林彪、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康生、江青、陈伯达、姚文元、叶群等他们那伙人。

会议由林彪主持。当时厅内还空着一个位子，显然那是专门留给杨成武的。杨成武刚一走进福建厅，就只听见林彪声嘶力竭地说：“现在开会。我来宣布中央的决定：一、杨成武搞山头主义、宗派主义。二、杨成武勾结余立金，想夺吴法宪的权；勾结傅崇碧，想夺谢富治的权。三、杨成武整了江青的黑专案黑材料，杨成武三次下命令给傅崇碧冲击钓鱼台到中央文革去抓人，还打了江青。”说到这里，林彪恶狠狠地盯了杨成武一眼，接着又说：“杨成武你不是代总长了，由黄永胜接任。我再说一遍，他不是代总长，是总长！”

林彪的话音刚落，江青就跳了起来，连喊带吼：“杨成武，你胆大包天，



敢整我的黑材料！你要老实交代！”

紧接着，吴法宪也厉声喝斥：“杨成武，你必须交代你的‘三反’罪行！必须交代你的黑后台！”

康生阴阳怪气地说：“这是‘二月逆流’的新反扑！杨成武你要交代同那几个老家伙的关系，交代出你的黑后台！你和彭真什么关系？和罗瑞卿什么关系？”

陈伯达把架在鼻梁上的眼镜往上一推，生怕自己被漏掉，急忙操着浓重的闽南口音故意栽赃说：“杨成武反对马克思主义，写大树特树的文章，受到毛主席的严厉批评，这帐是赖不掉的！”

叶群扯着公鸭嗓拼命叫道：“杨成武三次命令傅崇碧冲击中央文革的驻地，带了枪，带了子弹，还打了江青同志一皮包！这还得了吗！中央文革还有没有安全？毛主席还有没有安全！”说着说着，她带头呼起口号来：“誓死保卫毛主席！誓死保卫中央文革！打倒杨成武！打倒晋察冀山头主义！”

刚开始，杨成武还拿了支铅笔，在纸上记着。可他越听越有气，越听越听不下去。这完全是诬蔑、造谣、栽赃……他把手里的铅笔往桌子上重重地一扔，举起手来：“我说几句……”江青挥着手，说：“不要说了！散了！散了！”人们纷纷站起来。

周恩来总理摆摆双手示意大家坐下，并说：“毛主席那里来电话讲，不要揪斗杨成武，杨成武有病，要他去休息。有错误可以检查。”江青再次跳起来：“不开了！散了！散了！”参加会议的人，陆续离开福建厅。杨成武问周恩来总理：“这是怎么回事？”周总理站起来，对他说：“不要着急，有病就好好休息。你的问题，是林副主席检举的，会搞清楚的。”

康生转过头来，面对着杨成武，等周恩来说完，他手指杨成武，说：“不管你交代不交代，你为‘二月逆流’翻案，你的黑后台就是叶（剑英）、聂（荣臻）、陈（毅）、谭（震林）！”

杨成武没有再说什么，事情已经很明白了。林彪、江青他们批斗杨成武，所谓的罪名是“三反”、“为‘二月逆流’翻案”；所谓的罪证是“支持傅崇碧冲击钓鱼台”，“打了江青”；扣的帽子是“野心家、阴谋家”。

钓鱼台，当时是“中央文革”所在地。冲击“中央文革”，非同小可。然而，事实的真相却是“莫须有”。

原来，杨成武曾接到周恩来总理的电话，要他帮助找一下鲁迅的手搞。经过一段时间调查，据了解手稿在钓鱼台。杨成武把这个任务交给了北京卫戍区司令员傅崇碧，为此傅崇碧曾去钓鱼台找过。作为北京卫戍区司令员，钓鱼台应该是可以自由出入的，所谓“冲”，只能是编造的谎言，用来欺骗不明真相的群众罢了。

在福建厅的这个批斗会上，林彪、江青他们根本就不准杨成武申辩，他们完全剥夺了一个共产党员说话的基本权利，肆无忌惮地践踏了党的原则……。杨成武眼见了他们的丑恶表演，尤其是林彪当面宣布杨成武的所谓“罪行”的情景，他至今都记得清清楚楚。可这一切在当时却都是秘密进行的。

消息的传开，是由于两天之后，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一个万人大会。当时主席台上除了坐着林彪，还有“中央文革”的头目。林彪宣布开会后，发表了长篇讲话。他声嘶力竭、上气不接下气地历数了所谓“杨成武勾结余立金、傅崇碧，要夺吴法宪的权，要夺谢富治的权”等等“罪行”，宣布了杨

成武“反对毛主席、反对党中央、反对中央文革、反对文化大革命”的所谓“罪状”，带头高叫“打倒阴谋家、野心家杨成武……”江青还一把鼻涕一把眼泪地“控诉”了杨、余、傅对她的“迫害”，说什么“杨成武指使傅崇碧带领部队三次冲击钓鱼台，杨成武的警卫员打了老娘一拳，老娘的腰到现在还疼”。其实，这简直是无稽之谈，根本没有的事。江青无中生有，信口雌黄，还硬说杨、余、傅是“五·一六的黑后台”。当恶魔统治世界的时候，谎言也成了真理，何况人们正处在入魔之时。

杨成武被当场宣布撤销代总参谋长的职务，余立金的空军政委职务和傅崇碧的北京卫戍区司令员的职务也都被罢免。他们一时间便成了林彪、“四人帮”的阶下囚。而接替他们这些职务的则是林彪的死党黄永胜、吴法宪等人。事情来得突然，但并非是偶然发生。杨成武不禁回想起多年来同林彪、江青一伙的矛盾和斗争……

1965年底，中央在上海召开了所谓解决罗瑞卿问题的会议。在这个会上，林彪一伙发难，对罗瑞卿搞突然袭击，毛泽东偏听偏信，做出了错误的决定。此后，由刘少奇、周恩来、朱德、邓小平、贺龙、刘伯承、陈毅、徐向前、叶剑英等同志参加的中央军委会议，决定杨成武担任代总参谋长。会上，杨成武很诚恳地说：“我的能力不够，难以胜任。最好由叶帅兼任。”中央领导同志说：“就这样定了，主席已经同意了，不变了。”杨成武说：“如果非要我来代，那就把我原先分管的一摊子交给王尚荣同志，建议提他当副总长。”刘少奇表示原则上同意，命令以后再下。

杨成武回到北京后，还是觉得自己不适宜担任代总长，又给军委和中央写了报告，希望叶剑英同志兼任总参谋长，自己给叶帅当个助手。这个报告送到军委副主席兼秘书长叶剑英手里便被扣住了。叶剑英元帅把杨成武找去，对他说：“你的报告，我不同意送，叫你当代总长，这是中央决定的，你就不要再推辞了。”于是，杨成武觉得既然主席、中央让我当代总长，我就要尽力干好。可是“文化大革命”开始后，他发现了许多不正常的事情。特别是随着时间的推移，林彪、江青一伙同各位老师的矛盾日益公开化，他作为代总长，经常处在“夹缝”之中。周恩来总理、各位元帅指示要这样干，林彪、“中央文革”却指示那样干。这叫他这位做具体工作的人无所适从，百思不解。

赵志珍这时担任了代总参谋长办公室主任，对此深有感触。为什么会这样？她很想弄明白，可在当时无法搞清楚。

1967年夏，毛泽东主席指定杨成武陪他去视察大江南北。周恩来总理告诉杨成武，他的任务是切实保证主席的安全，当好总理与主席的联络员。就在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途中，毛泽东和杨成武说了许多事情，作了很多重要指示。杨成武用保密电话原原本本地全部向在北京的周恩来总理作了传达。后来杨成武回到北京，叶群大概已经嗅到了什么，问他：“主席最近讲到林总什么事了没有？”杨成武马上想起主席说的：“谁封我四个官啊……什么永远健康？还有不死的人吗……”可这些，能对叶群讲吗？杨成武只好摇摇头说：“主席没有讲什么。”他因此不仅得罪了林彪的这位联络员，而且也得罪了林彪本人。特别是在那个讲完话都要呼口号的年代，杨成武作为总参党委书记，在一次会上讲完话，呼了“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之后，只呼“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缺少了关键的“永远”两个字。没想到散会后，叶群快步走到他跟前，说：“杨代总长，你不喊永远健康，他的内脏也是好的，

他的身体也没病。”说完，便气哼哼地走了。

### 将军同林彪一伙面对面的较量

不久，江青听说上海搜集了一批她在 30 年代的材料，此事已被杨成武知道。由于她心中有鬼，非说是杨成武整了她的黑材料不可，一直纠缠不休。

到了 1968 年 3 月初，当傅崇碧他们打听到鲁迅的手稿已被江青取走，并且就放在钓鱼台“中央文革”的保密室里之后，即驱车前往询问。可是当他们走进“中央文革”的会议室还没站定，已经知道中央在找鲁迅手稿的江青却突然推门进来，怒吼道：“傅崇碧，你到这里来干什么？是来抓人吗？这是中央文革所在地，谁让你们来的？”当证实鲁迅的四箱手稿就在楼上保密室时，江青更是恼羞成怒，大发其火。

没几天，江青又把杨成武找到钓鱼台，她无中生有地捏造事实，并且恶狠狠地说：“傅崇碧带两辆汽车，全副武装冲钓鱼台。军队也这么干，简直是无法无天。中央文革都敢冲，将来还不知道要冲哪里哩。你是代总长，你要负责。要批卫戍区，要批傅崇碧。”杨成武反驳江青：“我不能负责，我没有下命令冲。我又不是北京军区司令员，怎么能随便越级去批卫戍区的领导干部呢。”一贯骄横的江青哪里容得杨成武顶撞，她站起身来，瞪着眼睛对杨成武说：“你是代总长，老娘就要你负责。”

事隔不久，有一天，杨成武被突然召到毛家湾林彪的住宅。刚开始，林彪夫妇显得格外热情。当杨成武在客厅坐下后，林彪对他说：“今天请你来不是什么大事，因为最近有人写信，说叶群是假党员。现在不少同志都写了材料，证明叶群无问题。但因这些同志在党内外影响不大，所以想请你写一个证明。”杨成武不语，因为他现在还没有想好该怎样回答林彪这突如其来的问题。

解放前他根本就不认识叶群。1960 年他们才第一次见面，叫他证明，岂不是天大的笑话吗！林彪瞅了叶群一眼，接着又说：“你是军委常委、副秘书长，又是代总长、军委办公厅主任，你的证明影响当然大罗，你觉得怎样？叶群入党是在 1936 年，你只要证明这一点就够了。”杨成武经过一阵沉默，说：“林总，1936 年我们在陕北保安；她在天津、北平，当时又不认识，怎么能证明呢？”林彪站起来说：“吴法宪同志已经写了，你也写一个吧！”林彪说这话时完全是摊牌的口气。杨成武此时进退两难。他知道叶群这个婆娘得罪不起，但是如果出了证明，那就是昧着良心说假话，完全丧失了一个共产党员的品德。于是，他急中生智，对林彪说：“谁说她有问题，有什么问题，我都不知道，是不是先把材料给我看看！”这话分明是推托之辞，林彪、叶群听了很不高兴，脸一下变得十分难看，一言不发。高度的党性原则使杨成武拒绝了林彪的无理要求，随后他便起身告辞了。

杨成武知道得罪了江青和叶群等于捅了马蜂窝，肯定要遭至报复，但他并没有想到这股“黑风暴雨”会来得这么快、这么猛。就在他被捕的那天晚上，当福建厅的人们散去之后，3 辆小汽车把杨成武押解到机场，那里停着一架伊尔 18 型飞机。机上坐了一个班的战士全都抱着冲锋枪。这些战士倒很客气。他们问登上飞机的杨成武：“您喝水吗？这里有水。”杨成武摇摇头。其中一个长得很结实的干部说：“不要着急，能休息就休息一下。”飞机起飞后，径直飞到了湖北的山坡机场。此后，杨成武便与世隔绝了。

## 全家落难香山寺

年复一年，杨成武又被转场。飞机落地了，轮子在跑道上吱吱作响。这是什么地方？不容杨成武细想，旋即被押上一辆小汽车，开始了几个小时的颠簸，车里鸦雀无声。当车停门开，他被押下汽车时，看见的却是一座灰色小楼。

天放亮了。杨成武看到了龙门石窟的轮廓。“啊，这是洛阳。”他本能地反应出自己的所在地。尽管他还从未到过龙门，但几十年的军旅生活，使他对全国各地的地形地物了如指掌。的确，这是洛阳，是中国九朝古都。她山青水秀，尤其是那牡丹盛开的季节，花如海，人如潮，吸引着不少游客。凡到过这里的人们，无不为那龙门石窟的古代精美艺术所倾倒。然而，此刻杨成武才发现，这闪烁古代文明光辉的龙门，这风景秀美如画的香山寺，竟成了一座监狱。可是，他坚信，正义必定战胜邪恶。

这位对党、对革命事业忠心耿耿、功勋卓著的将军就这样被秘密地关押在这里。他全家老小，三代共 12 口人，最老的是杨母，78 岁，最小的是女儿杨扬，才 12 岁，也都先后被秘密地押送到这里。在这里，他们失去了自由，遭到林彪、“四人帮”的迫害，他们的心在流血。那邪恶的魔手刻在心中的斑斑印迹，是永远也无法抹去的。门外看守紧张地来回踱步。

他们大概已经知道屋里关着的是人民解放军的代总参谋长。杨成武到底是个什么样子？看守按捺不住自己的好奇心，趁踱过小屋时，向敞开门的室内匆匆一瞥。嚯，竟有如此魁伟的身材。尤其是那双炯炯有神的眼睛，让人见了就能感到全身得到一种力量。他就是解放军鼎鼎有名的战将啊！

杨成武打量了室内的摆设，一张旧木床，其他什么也没有。他苦笑一声，摇起了手中的扇子，不禁想起在湖北山坡机场时那个看守他的班长。这把扇子就是他送给的呀，那时天气热得不得了，班长见杨成武关在房子里，汗流侠背，便跑了 5 里路专门从集上买来了这把大蒲扇。将军怕连累班长，不肯接。班长像是看出了他的心事，便讲了自己的家史。原来那个班长是烟台人。旧社会，祖祖辈辈在三座大山的压迫下，过着非人的生活，是共产党、毛主席领导人民翻身闹革命才有了今天。班长对革命前辈非常敬重。他说：“不要紧，就说我借给您的。何况我不怕，不行，我就回家。”多么可爱的战士啊！

干部也一样。临别时，见杨成武没带衣服，武汉军区空军一位姓刘的副参谋长还悄悄地把他自己的一条蓝军裤送了过来。他们这样做，当时要冒多大的风险啊！

天大亮了，杨成武被带进一间办公室。他一眼便看到了赵志珍、老母、妹妹和儿女。他不由一阵惊喜。孩子们扑了过来，抽泣着，喊叫着爸爸；妻子用一双泪眼望着他，悲喜交加；老母则点着头，伸出了颤巍巍的双手。常言道，男儿有泪不轻弹，但此刻，将军的眼角湿润了。可是杨成武并不知道，就在这盛夏季节，一天，毛泽东主席忽然想起了他，问周恩来总理：“杨成武现在在哪里？”当毛主席听到周总理说的一些情况之后说：“为什么不让杨成武和他全家人在一起？”他这才得以和家人团聚。

更不知道就在昨天，河南省军区政委王新带着两个秘书，从郑州机场将他押到这里时，正为手中掌握着这么一个“要犯”而暗暗高兴，他准备以迫

害以前的上级作为一个升官的筹码，开始了他的计划。他把杨成武押到龙门之后，就一头扎进“专案组”的屋子里，和“专案组”组长彭铎密谋起来。

也就在那个可怕的“三·二二”之夜后，赵志珍同样失去了自由。她被带到总参地下室里关押、批斗，整整折腾了6天。在那无日光的暗室里，一天两顿窝窝头加上精神上的折磨，是她所料想不到的。然而，她坚信：正义必定战胜邪恶，乌云遮不住和暖的太阳，事情终究会搞清楚的。孩子们从那以后也都成了“罪人”，被关押、殴打、揪斗，被整得天各一方。

6天过去了，某副总长的办公室主任突然恶狠狠地通知赵志珍：“地主婆，你不是想去看孩子吗？走吧。”

“去秦城监狱吗？”赵志珍问，因为那里通常是关押高级政治犯的地方。

“到时你就知道了。”那个主任大声说。

赵志珍被押上汽车，汽车急急忙忙开到西郊机场。在那里，她见婆母、小姑、孩子们都坐在地上。她明白了，这是要把她们全家押到外地去，但她又发现大女儿杨毅不在人群中。杨毅当时已是空军报社的编辑，她被吴法宪视为杨成武在空军的钉子，而作为要犯被林立果的“小舰队”关押，并遭到严刑拷打，后来又被押到四川。这些情况，赵志珍当时不可能知道。

不一会儿，他们就登机了。经过一个多小时的飞行，飞机徐徐在郑州机场降落，他们刚下飞机就被塞进汽车，押到一个宾馆的地下室。天黑之后，他们被转押到洛阳的香山寺。亲人的团聚，使将军稍觉宽慰。

旋即，一家人又被分开。杨成武和赵志珍住那间有大木床的小屋，其余人分别住进另外三间小屋。将军有7个儿女，但今天只见到6个，大女儿还未见到。杨成武和赵志珍不由得心头上又蒙上了阴云。他们知道，大女儿杨毅性格最倔强，很可能也受苦最大（几个月后，杨毅被人从四川押来）。

赵志珍悄声问杨成武，到底因何获罪，一家人落得如此惨状？杨成武沉吟良久，喟然长叹：“欲加之罪，何患无辞？这是他们蓄意已久的！”

的确，十年动乱开始时，杨成武因身居要位，成了各方注目的人物。当年林彪、“四人帮”猖獗一时，把个好端端的国家搞得内乱四起，怨声载道。杨成武看不惯他们一伙的所作所为，每每暗中掣肘，因此越来越被他们视为眼中钉、肉中刺。当时，风云一时的王力、关锋、戚本禹，接连在报刊上发表文章，又四下里煽风点火，制造动乱，引起周恩来总理深深忧虑。总理密令杨成武到上海向毛泽东主席如实报告。主席听取汇报后断然下令：“把王、关、戚抓起来！”杨成武回京后坚决执行了主席的命令。

事隔不久，也就是杨成武陪着毛主席视察大江南北的时候，一贯搞大树特树的林彪为了进一步实现“名曰树人，实为树己”的阴谋，组织了一个班子写了一篇文章，派人送到上海，说是给总参起草的，让杨成武看。杨成武看了两遍，感到文章里面尽是一些理论问题，没有把握，而主席就在身边，便在上面写了几个字，大意是：呈主席，此文章是否可用，请阅示。然后把它送给了毛主席。

过了三四天，在毛主席身边做保健工作的护士长吴旭君将这篇文章递给杨成武，说是主席让她送来的。杨成武一看，上面有毛主席的批示：我不看了！请伯达、文元酌处。这时，吴旭君又说，主席随便翻了翻，说：“尽是吹我的！”于是那篇文章转到了北京。

后来，陈伯达秉承林彪的旨意，对文章作了修改，并且与林彪合计，加了个“大树特树……”的题目，又亲自出面要杨成武以他个人的名义发表，

说他是代总长，以他的名义发表影响大。杨成武觉得文章非自己所写，又有那么多理论，不同意用自己的名义发表，给了陈伯达一个软钉子。陈伯达被杨成武顶了一下之后，又与林彪、叶群商量。接着，叶群出面劝说，要杨成武署名。杨成武仍坚持说他署名不妥，又顶了叶群。随后，林彪便出面了。他通过叶群打电话，三次要杨成武署名，完全是命令式的口气，并以党的历史上的某些例子作证，说：“组织上有权决定用某个党员的名义发表文章，就这么定了。”杨成武只好违心从命。

不料，完全知道这篇文章来历的林彪、江青及其同伙转眼竟把发表这篇文章作为所谓“杨、余、傅事件”的一条罪状，扣在杨成武的头上……

杨成武一家被关押在香山寺这座小楼上。负责看守杨成武的头头是“专案组”组长彭铎。此人原来是河南省军区的保卫处副处长，林彪、“四人帮”委任他充当这个角色，使他受宠若惊，变得更是面冷心狠。此外，还从空军派来一个叫刘金阁的人和一个叫谢家权的所谓“女医生”进行监督。这几个人忠实执行林彪、“四人帮”有关迫害杨成武一家的指令，订出种种“让你死不了，也活不成”的清规戒律：第一，不准出房门，更不准下楼（杨成武、赵志珍被关押此处两年多，没有下过一次楼）；不论春夏秋冬，各处房门均不得关闭。第二，饭食定量，不够不添；一星期两次“忆苦饭”，每人必吃。

在这座楼上，夏天热得像蒸笼，楼上却只有一把扇子，那还是在湖北一个看守给杨成武的，此刻他只好把它让给母亲用。衣服被汗水浸透了也没有换的，因为他们被抓的时候，什么也不让带。背心破了，就东拼西凑找块布补一补，裤衩坏了，找根线连一连。

冬天寒风刺骨，楼下炉火熊熊，楼上的杨成武一家人冻得发抖。其他人还能煎熬，而从福建来的杨母却实在是受不住，加上她正在患病，咳嗽不止，不能入眠，有时胃疼得忍不住在床上打滚。看着可怜的老人，孩子们含泪向“专案组”提出，要求给老人生一个炉子，得到的却是彭铎冷冷的回答：“洛阳没有取暖规定。”

不管是盛夏还是严冬，在楼上连开水也是限量的。12口人一天只供应3瓶开水，为了首先保证奶奶、父母亲和姑姑的饮用，孩子们只好喝生水。按当时的有关规定，杨成武夫妇的伙食标准每人每天1元，其他人6角。但彭铎连一人3角的标准也没给用上，拿来的剩饭剩菜都不给吃饱。那些发了霉的窝窝头，头天没吃完，第二天又照样送来。吃忆苦饭是“文革”中的时髦，难以下咽也必须吃。

尽管彭铎自己大鱼大肉地吃着，却也没有忘记给楼上的人准备忆苦饭。他们把烂菜叶、红薯叶、南瓜叶拌上糠用开水一煮，就端了上来。杨成武和他的家人一星期得“享受”好几次。

在彭铎看来，楼上这些人都不应该活在世上。他常常训斥道：“你们的问题是铁板钉钉，有一口饭给你们吃就不错了！”就像《红岩》里的白公馆、渣滓洞，彭铎把这座小楼变成了人间地狱，却仍旧给它冠以一个时髦的名称——毛泽东思想学习班。这是一切善良的人们所想象不到的，人们更不会想到革命一生的将军、狼牙山女八路，为党和人民洒血流汗在所不惜，此时此刻竟落得这样一个境地！

时间一天天过去。一日三餐，剩饭凉菜；活动之地，以尺论方；更不敢生病，因为派来的“女医生”谢家权既不会看病，又不肯给药。杨成武的母亲由于当时身患重病，更是备受煎熬，天长日久，变得骨瘦如柴。尤其是那

连续不断的咳嗽声揪着每个亲人的心，连一些看守也都觉得这样下去不行，其中一个班长向楼上的“医生”提出，应给老太太看看病，那个微胖的谢家权却操着四川女高音说：“是气管炎犯了，不用看，过几天就好了。”有一次，老人胃疼得在地上打滚，经过苦苦哀求，“医生”才给了几片胃舒平，并再三强调：“吃完就没有了。”

长久失去自由的生活，从精神上更是一种折磨。13岁的小儿子东成实在受不住了，偷偷地溜到走廊上，爬到堵塞物上向外眺望：啊！多美的景色，鸟儿在蓝天上翔飞，汽车在公路上驰骋。突然“吧嗒”一声，他胸前的一支钢笔从楼梯上掉了下去。那是唯一的钢笔啊。他向四周看了看，见没有人，便从堵在楼梯上的家具杂物中扒开一个洞，悄悄溜下去，把钢笔捡回来，又小心地把堵塞物恢复原状。孩子毕竟是幼稚的。

看守他们的头头彭铎从一溜脚印上发现有人下楼，便立即追查。他怒气冲冲地来到4个男孩（杨成武的3个儿子和1个侄子）的房间，冷笑道：“好大的胆子！谁下楼了？”一个男孩站了起来。彭铎见是东成，气得两眼发着蓝光，下令把他带走，说：“好好教训这个小子！”接着又是一顿训斥，继而逼着东成非写检查不可，还要孩子的母亲检讨，承认她是他的后台。

春节快到了，天下着大雪，楼上的栏杆也都积满了一层雪花，东成扒在栏杆上看着楼下的战士们杀猪，好动的孩子无意中在雪上划了一个猪字，不巧被人发现，报告给彭铎。彭铎认为孩子在骂他，刚开始以为是杨成武的侄子东海写的，便千方百计要整东海。东成知道后，便主动找彭铎说不是东海写的，是自己写的。于是彭铎禁不住对东成又骂又揍，赵志珍当然又逃不了后台的责任，她连着检讨了几次也过不了关。

若说彭铎还有点自知之明的话，那就是他除了交代警卫对杨成武严加看管外，从来不敢直接与杨成武交锋。事实上，他即使与杨成武的二儿子杨东明交锋也一败涂地。那是一次学习时，杨东明拿一个小凳子背对着毛主席像读毛主席著作，彭铎顿时大发淫威：“你为什么屁股对着毛主席，真是反动透顶！”

东明不禁轻蔑一笑：“你没有到过北京人民大会堂，每次开大会时，主席台上的人都是屁股对着毛主席像的，难道都反动吗？”一句话把这个头头顶得暴跳起来：“你想造反……”

事后，他把几个孩子分别叫出来，一一进行训斥，命令他们：“只许老老实实，不许乱说乱动！”杨成武听到看管他的头头对战士们训话：“杨成武是铁板钉钉的反革命，永世不得翻身了……”他不禁怒火中烧，真想一拳砸碎这如铁的牢笼，向天下人倾诉自己的冤屈。他要来了纸和笔，眼里噙着热泪写道：“毛主席，我有心里话要同你讲。如果不方便，可派个可靠的同志来，我同他讲……”信写完了，他停立门前，仰望北方，不禁对党和国家的命运忧心忡忡。良久，他又提笔在信尾加上了一句：“路遥知马力，日久见人心！”

他多么希望毛主席能收到他的信，能从他的信中看出他的心思，能派人来让他把心里话说出来啊。然而，这时只有赵志珍理解将军的心思，并且产生了共鸣。

日月如梭。一封又一封的去信，竟如石沉大海。他哪里知道，20多封去

信会全部卡在途中，并被命令“焚毁”呢。

杨成武终日无语，但并不低下高昂的头。因为从1968年3月22日他被抓起来起，除了林彪在23日宣布了他的“罪行”之后，再没有人来问过他什么，也从没有一个人来要他交代过什么东西。是啊，他们不敢直接问他，因为他历史清楚，他完全是无辜的。他知道林彪、“四人帮”的蛇蝎心肠，已做好准备，以应付可能随时到来的不测。（1969年，康生等人确曾建议成立特别军事法庭审判杨成武，但被毛主席拒绝了。）他曾对赵志珍说：“奸臣当权，忠良遭难，自古就有。要相信党和人民群众。只要主义真，掉了头也不要紧！”

可笑的是，彭铎却死气白赖责令警卫对杨成武要严加看管，动不动便训导说：“我们的任务重大，党中央信任我们，把这个重任交给我们，要防止夜里被人抢跑、要防止被害、要防止自杀。”他规定杨成武的房门不准关，晚上战士背枪到楼上站岗，清晨再撤下来。被人抢跑，这在当时的洛阳根本不可能。因为人们只知道这里有一个学习班，并不知道在这里禁锢了一位人民解放军的上将。防止被害，这岂不是贼喊捉贼？除了彭铎自己在用慢慢折磨的办法加害于杨成武之外，谁还能做出如此丧尽天良的勾当呢？防止自杀，这更是无稽之谈。

彭铎也太不了解这位身经百战的将军了。

杨成武指挥部队去夺泸定桥没有叫过苦，杨成武面对侵华日军的残酷“扫荡”坚持敌后抗战八年，条件那么艰苦也从未叫过屈；杨成武在华北数十万国民党军队面前没有半点胆怯。今天，这些对他来说，又算得了什么呢？他只不过把它当作是一个考验，从不气馁。他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20多封信，表达了他对党的忠诚。虽然这些信件一封也没有转到毛主席手里，都被林彪在河南的走狗王新扣了下来，他得不到回音，可他那颗对党赤诚的心始终未变。他是决不会自杀的。杨成武默默地计算着时间，每天看着日落日出，等待着正常时日的到来。

1970年的冬天来到了。两年多的监禁生活，使78岁高龄的杨母身体日渐垮了下去。她已经生命垂危，知道自己将不久于人世。一天，她躺在床上呼唤着：“孩子，我真想吃……吃一个鸡蛋啊！”母亲这个微不足道的要求，却使杨成武和赵志珍为难了。孩子们掏出被押时兜里的几分钱，凑到一起，好不容易凑够几毛钱，央求看守人员满足一次老人的愿望。可是，彭铎又来了。他声色俱厉地说：“洛阳没有鸡蛋卖！有病就看病，吃什么鸡蛋！”战士们不忍心看着老人受此虐待，对“专案组”的头头侧目而视。待彭铎离开，炊事班长悄悄端来一碗面条说：“吃吧，出了事有我兜着。”

就在这天夜里，杨成武、赵志珍和孩子们含着眼泪听着老人说：“旧社会杀人还有人喊刀下留人呢，怎么现在没有人喊了？看来人世间是没理可讲了，我要到阴间去讲理。我要到阴间去告状，用棍子敲也要把那些吃人的魔鬼敲死。”大概彭铎感到老人死在楼上不好交代，便把杨母抬上了汽车，拉出了香山寺。谢家权随车前往，说是送医院诊治，但不允许杨成武、赵志珍和他们的孩子随同。

一连七八天过去，杨成武一家人日夜惦念着老人家的病情。想不到有一天汽车回来了，车上的人搬下一个木盒，谢家权冷冷地对杨成武说：“这是



她的骨灰。”人都是血肉之躯。一听到这，杨成武似感五雷轰顶。一生戎马，不能侍奉老人；临到分手，也不能见上一面。他悲愤不已，想起两年多来，老母因受牵连，和自己一样失去自由，有病不能治疗，临死连个鸡蛋也没能吃上，眼泪便止不住往下掉。

事后得知，老人是被秘密送入 132 陆军医院的。当天夜里，送老人的汽车停在医院门口，直等到病房走廊里的灯全部关灭，才将她送进 51 号病房。病房门口站着岗，既没作病情检查，也没医治。去送的人对院方规定：不准任何人打探和接近病人，以致整个医院在传着来了个“神秘的老太太”，但谁也不知这个老太太叫什么，是什么人。至于老人患的什么病，何时去世，也没有任何记录和报告，直至今日仍是个谜。

后来杨成武和赵志珍到洛阳，来到母亲去世之地。他们走进病房，眼睛里饱含着泪水。将军愤怒地对周围同志说：“那个时候，若林彪、‘四人帮’一伙还有点人性的话，我母亲是不会这样快这样悲惨地离开人世的。冬天，在不能关门的房间里生活，如同冰窟啊。孩子们的手脚和耳朵冻坏了，到今天还留有后遗症。我曾要求给母亲生火，但回答却是：‘按规定不能生火。’夏天，山上蚊虫成群，人人身上都被咬了个遍。一年四季，解手有人跟，睡觉有人看。可恶啊，林彪、‘四人帮’一伙太可恶了！”

的确，更可恶的是，林彪、“四人帮”在迫害着杨成武及其家人的时候，连赵志珍的六弟——北京军区 262 医院的医生赵晶溪也不肯放过。他们的爪牙硬逼着这位工作一贯勤勤恳恳、任劳任怨的医务工作者，揭发杨成武的所谓问题。当遭到严词拒绝后，便将他装进麻袋一顿毒打，打得他死去活来，在地上打滚。继而又又不准他上厕所，逼得他只好以绝食抗争。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林彪、“四人帮”的爪牙，竟又以强迫进食为名，以极其残忍的手段，将赵晶溪排出的粪便从口中灌回去，一直迫害致死。可这一切，杨成武、赵志珍及其孩子们由于被关在香山寺，当时是无法知道的。

“22 日”，这对杨成武一家似乎是个特别不吉利的日子。

1971 年 1 月 22 日，在漫漫的冬日里来临了。这是一个特别黑、特别冷的夜晚。王新带着一群大汉突然闯上楼来，把正在睡觉的孩子们一个个从床上拉了下来。

彭铎点名，“杨毅！”立即围上几个人，把她拉走了。“杨俊生！”……他们被一个个拉出房门，俊生此时还发着高烧。姐弟们哭着叫爸爸、妈妈。杨成武和赵志珍被哭喊声惊醒，知道不好，急忙披衣起床，待要出房门，门却早已被人把守住，出不去。

赵志珍挨着个呼唤儿女的名字，杨成武噙着眼泪，望着几个拼命挣扎的孩子。“你们要听党的话！不管环境多么艰苦，都不能做对不起党和人民的事！不能自杀！你们要在斗争中百炼成钢！”

杨成武反复地对儿女们喊，这是一个共产党员送别儿女时最珍贵的留言。“爸爸，我们走了，您要坚强些！”杨成武坚定地点点头，而后说：“你们也要保重身体！”

“爸爸……”“妈妈……”儿女们凄惨的呼叫声越来越远，突然一声惨叫过后，只听俊生喊了一声“我的胳膊”，便没了声息。原来，俊生在挣扎中胳膊摔成了重伤。孩子们被一个个推上了汽车，撕心裂肺的呼叫声终于被汽车的轰鸣声所淹没。不一会儿，汽车便消失在山后的一条便道上。一切又都沉寂了下来。

杨成武和赵志珍忧心如焚。孩子们会遭何命运，他们心中无数。两年多来，虽然凄苦，但与孩子们同在一处，还能得到许多的宽慰，因为孩子们眼见着懂事了。如每次吃饭，孩子们总是自己尽量少吃，把饭菜留给父亲和奶奶，他们把这说成是“重点保护”。孩子们热爱自己的父母，相信自己的父母。想到这里，杨成武和赵志珍感到宽慰。可他们觉得，这次孩子们被带走，肯定又是凶多吉少。

几天后的一个深夜，又有几名大汉上了楼。杨成武、赵志珍就在这天晚上又被秘密地从洛阳押送到开封，关押在曾经关押刘少奇主席的那间房子里。

前不久，刘主席从那间房子里离开了人世，那里比龙门旁的香山寺更隐蔽、更阴暗。然而，也就在开封，在那暗无天日的牢房里，杨成武和赵志珍备受折磨，过着最苦的日子的时候，他俩看到了黎明的曙光。有一天，一个战士悄悄地告诉他俩：“林彪摔死了！”

世上事往往有惊人的巧合。

又是一个22日——1974年5月22日，杨成武和赵志珍从山西侯马回到了北京。但这却是吉祥日——他俩被解放了。周恩来总理在明亮的客厅里会见了杨成武。

周总理第一句便说：“你回来不容易啊，成武！”周总理的话外音，杨成武听出来了：林彪虽然已死，但“四人帮”仍在台上，他们对杨成武的复出曾竭尽阻挠之能事。周总理稍停又说：“如果不是毛主席，可能没有你了！”杨成武点点头。是啊，若是康生一伙开设特别军事法庭的企图得逞，他必死无疑。

1974年，国内政治形势发生了很大变化，毛泽东主席对林彪过去所揭发的那些人的问题，已有新的看法。毛主席多次口头指示和文字批示：杨、余、傅案的性质应重新考虑，并说他“可能偏听偏信了”，后来又明确表示“搞错了，要翻案，要平反”。随即，杨成武与赵志珍及其亲属被周总理派来的人接到北京。受尽折磨的杨成武和赵志珍终于以坚定的共产主义信念迎来了春天。

### 担任两帅联络员为粉碎“四人帮”立新功

1974年，杨成武重新回到总参谋部，担任了常务副总长、党委书记，主管总参的日常工作。

赵志珍这时在北京卫戍区政治部工作，不仅要照顾杨成武的衣食住行，还要教育孩子们。她最操心的一件事，就是孩子们的学业。是啊，一晃儿6年多，学业荒废了许多。要不，孩子们在学校里能学多少东西啊！哪有母亲不疼孩子的呢？赵志珍觉得，真正疼孩子，就应当想方设法让孩子掌握知识，学到为人民服务的本领，树立革命的人生观与世界观。她常对孩子说：“鲁迅先生说得好，‘横眉冷对千夫指，俯首甘为孺子牛。’你们要听党的话，长大了做人民的公仆。”

1975年总参谋长邓小平再次落难，杨成武所处的位置显得更加重要，担子也更重了。

此时，“四人帮”仍在横行，许多人都在为国家与民族的命运担忧。曾被毛泽东比作“吕端大事不糊涂”的叶剑英元帅和德高望重的聂荣臻元帅更

是如此。他俩同住在北京的西山，由杨成武陪伴，经常于盘山路上边走边谈，谈论国家大事。

此时，王洪文似乎嗅到了什么，也搬到了西山，就住在他们附近。两位老帅和杨成武已觉察到王洪文的来意不善。他们三人一起研究后，决定叶剑英元帅继续住在山上，为了防止万一，聂荣臻元帅马上搬回城里住，由杨成武在两地走动，担任“联络员”。

1976年9月9日，毛泽东主席逝世。“四人帮”加快了窃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步伐。眼看“四人帮”要摊牌了，也就在9月21日晚上，聂荣臻元帅把杨成武找来，谈完“四人帮”的倒行逆施和军队面临的形势之后，让他马上到叶剑英元帅那里去，向叶剑英转告：“‘四人帮’一伙是反革命，是什么坏事都干得出来的，要有所警惕，防止他们先下手，如果他们把小平暗害了，把叶帅软禁了，把华国锋搞掉了，那就麻烦了。‘四人帮’依靠江青的特殊身份，经常在会上耍赖，蛮横不讲理，采取党内斗争的正常途径来解决他们的问题已不现实，只有我们先下手，采取断然措施，才能防止意外。”

杨成武当即赶往西山。十分警觉的叶剑英元帅看到杨成武来了，知道他有话要说，故意把收音机的声音调得很大，室内只听到“哇啦哇啦”的，别的什么也听不见。叶帅说：“不行啊，听不到。”随后，他努努嘴说：“成武，咱们到外面去。”

在房前的小花园听完汇报，叶剑英元帅高兴地说：“听明白了，明白了。”他让杨成武回告：“我与聂总有同感，我想的和聂总想的一样，完全同意他的意见。我马上找有关同志商量，采取行动，并立即搬家，以防意外。聂总自己也要注意安全。”

叶帅又询问了总参和军队战备的情况，要求杨成武保证军队不出问题。杨成武信心十足地回答：“请放心，军队永远听党的话，听军委指挥。”

那几天，赵志珍只感到杨成武很忙，一天到晚往外跑，但究竟在忙些什么呢？她也不清楚。但她坚信，是忙国家的大事、军队的大事、人民的大事。在“四人帮”磨刀霍霍，妄图篡夺党和国家最高权力的日子里，赵志珍也确实为杨成武的安全担过心。可她明白，国家，国家，没有国哪有家呢。在战争年代里，他曾为丈夫的胆略和指挥艺术而感到自豪；如今，她又为丈夫的机智、果敢和能全身心地投入党的事业，时时刻刻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而骄傲。她对林彪、“四人帮”恨之入骨。然而她知道，狗急了也会跳墙，对那帮家伙不能不防，必须提高警惕。

长期的军旅生涯，使她养成了自觉遵守保密纪律的习惯。杨成武不说的，她从来不问。可她心里明白：如今“四人帮”要同人民较量，那只不过是鸡蛋击石。

不几天，杨成武又到了叶剑英元帅那里，叶帅要他转告聂帅，说：“昨天，李先念到了我这里。我问李先念：‘是什么风把你吹来的呀？’李先念回答：‘当然是东风喽。’我又问李先念：‘你来，有何贵干呀？’李先念说：‘无事不登三宝殿嘛！’……话虽没挑明，但已心心相印了。”

很快，叶剑英元帅便沟通了与华国锋的联系，并得到一些老同志的支持，一致同意采取果断行动。

10月5日，叶剑英元帅又要杨成武告诉聂帅：“已经商量好了，请聂总放心。”

尽管这时“四人帮”也在紧锣密鼓，加紧行动，但就在10月6日这天晚

上，党中央一举粉碎了“四人帮”，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中国革命又出现了历史性的伟大转折。

当晚，杨成武奉叶剑英元帅指示，专门到城里给徐向前元帅和聂荣臻元帅传达了这一振奋人心的消息。

聂荣臻元帅听到这个消息之后，异常兴奋，激动地说：“中国共产党得救了！中国人民得救了！中国人民解放军得救了！”徐帅听了高兴得不得了，连声说：“好得很，好得很！”大家心里乐开了花。

1986年5月30日，天空格外蓝，阳光格外好。杨成武和赵志珍在阔别15年后又来到了洛阳的香山寺。他俩神情严肃，面色安详，迈步登上小楼。在楼上远眺，绿水青山尽收眼底。将军脱口道：“变了，变化太大了！”赵志珍深有同感，频频点头。将军心底回荡着一股激流：“江山尽为人民有，触目万物才是情。”赵志珍眼睛湿润了，也许是想起了15年前在这里的情景，也许是为这里的变化而激动。

在香山宾馆为将军准备的便餐上，她感动了。她感到了人民群众对革命老干部的敬重和爱戴。

将军说：“老汉今年71，但还能为人民做些工作。”他把面前的酒杯高高举起，庄重地、响亮地向在座的同志提议：“为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路线的胜利，干杯！”

## 铁甲车队队长周士第

杨弘

周士第（1900～1979）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又名周士悌。海南省琼海县（原广东省乐会县）新昌村人。1924年入黄埔军校第一期，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自黄埔军校毕业后任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见习官、副队长、队长。大革命时期，任国民革命军第4军叶挺独立团营长，叶挺独立团参谋长、代理团长，国民革命军第25师第73团团长，第25师师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军大学军事教员，军委干部团上级干部队科长、队长，红15军团参谋长，红二方面军参谋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20师参谋长兼晋西北军区参谋长，抗日军政大学第7分校校长，晋绥军区参谋长、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军区副司令员兼晋绥军政干部学校副校长，晋北野战军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华北军区第1兵团副司令员兼副政治委员，第18兵团司令员兼政治委员，太原前线指挥部副司令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川西军区司令员兼成都市市长，西南军区副司令员，中国人民解放军防空部队（后改称防空军）司令员，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兼军外训练部部长。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四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第五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第八届中央监察委员会委员。1978年任总参谋部顾问。1979年6月30日在北京病逝。

\* \* \* \* \*

20世纪20年代，青少年时期的周士第生活在一个伟大的变革时代，即中国从旧民主主义走向新民主主义的时代，一个以武装斗争为主要手段，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建立人民共和国的时代。他的经历，反映了这段历史的一个侧面。在新与旧伟大革命斗争中，周士第追随中国共产党，转战南北，为中国无产阶级革命，为建立新中国，贡献了自己全部的光和热。

本篇所述“铁甲车队”是中国共产党直接掌握的第一支革命武装，铁甲车队队长周士第是在党直接领导下从事革命武装斗争的一位最早的优秀军事指挥员。

“铁甲车队”，全称是孙中山“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1924年，国共合作正式形成，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开办了黄埔陆军军官学校。为建立革命武装，时任军校政治部主任的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长兼军事部长周恩来与孙中山商议，决定组建“铁甲车队”。组建时，孙中山在冯玉祥、段祺瑞、张作霖的邀请下，已北上“共商国是”。“铁甲车队”即由周恩来负责组建。组建“铁甲车队”时，正值黄埔军校第1期学生将要毕业之时，周恩来便从军校中挑选了已是中共党员又有实际军事工作经验的徐成章任队长，从第1期毕业学员中挑选了周士第、赵自选任见习官，另从校外调中共党员廖乾五任党代表，曹汝谦任政治教官，一共5个人负责进行筹建“铁甲车队”的具体组织工作。“铁甲车队”的队员，主要是从各地挑选来的进步工人、农民和青年学生，也有少数是来自大元帅府卫士队的卫士。

“铁甲车队”名义上是元帅府属下，实际上是一支由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的革命武装。周恩来对掌握革命武装的问题历来十分重视。1922年12

月15日他在《少年》上发表的一篇文章中就说过：“真正革命非要有极坚强极有组织的革命军不可。没有革命军，军阀是打不倒的。”“铁甲车队”队长徐成章是中共广东区委委员，“铁甲车队”的调动，都是由中共广东区委直接指挥；“铁甲车队”的人员编配和工作中的一切问题，都是直接到文明路75—81号请示中共广东区委军事部部长周恩来解决的。

当时中共广东区委曾设想，建立“铁甲车队”，除了自己可以直接掌握一支革命武装外，还可以由“铁甲车队”，培养训练革命军事干部，派往各地去开展革命军事工作。因此，“铁甲车队”队员中，有不少来自广州、海南岛、东江以至南洋。不少人经过训练后，调到省港罢工委员会和海南岛等地去做革命军事工作。

“铁甲车队”编制142人，队部有队长、党代表、副队长、政治教官、军事教官、军医、差遣、司书、军需上士各1人，加上通讯员、号兵、勤务兵各两人，卫生兵、炊事班正副班长各1人，炊事员10人，共计28人；队下设3个排，每排有正副排长各1人。每排有3个班，每班有正副班长各1人、队员10人。3个排共计114人。中共广东区委经常临时派一些人来受训，全队人数经常有一百五六十人。

“铁甲车队”驻在广州大沙头。那时大沙头一带杂草丛生，没有街道，十分荒凉。营区是一座院子，院内建有一幢四层楼的洋房，队部和3个排全部驻在楼房里。外面大门上挂着一块引人注目的大牌子，上面写着：“建国陆海军大元帅府铁甲车队队部”。

“铁甲车队”的装备当时是比较先进的，装备有铁甲列车及部分其他车辆。其中有一个加了铁甲的火车头，拖挂着四五辆铁甲车。有一辆顶端装有旋转炮塔，炮塔上装有一挺机关枪。车厢部装有铁甲，车厢两侧厢壁上都开了几排有高有低长条形的射击窗孔，在车厢内可用立式或跪式不同姿势射击以及向外观察等，车内两边有板凳可以乘坐。铁甲车平时停放在大沙头火车站（现在广州火车站），外出作战或执行巡逻等任务时，多用装甲火车头牵引，驰骋在广州到九龙、广州到韶关段的火车铁路线上。班长、队员一律配备长枪，排长以上干部都配有驳壳枪，每排还有一挺手提机关枪。枪械都是从苏联援助黄埔军校的武器中领来的。“铁甲车队”的主要任务是保卫革命政府、保卫广州、保卫铁路线，协助各地开展农民运动。

战时“铁甲车队”官兵统一着装，平时戴黄色大沿帽，着黄色斜纹布中山装军服，打绑腿；军官穿黑皮鞋或黑色长筒马靴。

“铁甲车队”建有中国共产党党小组。最初有党员5人，即廖乾五、徐成章、周士第、赵自选、曹汝谦。后来又发展了一些。党小组组长廖乾五。党小组生活会每周一次，每次除传达上面指示精神、讨论工作外，都有批评与自我批评的内容。“铁甲车队”的党组织直接归中共广东区委领导。

“铁甲车队”的军政训练，一直抓得很紧。实行每日“三操两讲”制度。三操：出早操，上、下午各进行一次训练，叫做三上操场；两讲：上午或下午安排两小时政治教育，晚上进行一次全队讨论或晚点名，叫做两进课堂。

在政治训练方面，主要由政治教官曹汝谦协助党代表廖乾五负责，每天上政治课两小时，晚上组织讨论。政治课讲授三民主义、社会发展史、工农运动情况、目前国内外形势等。曹汝谦负责讲授三民主义课，着重讲民主主义部分，并有意识地联系讲解阶级斗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社会发展史等内容。徐成章、周士第、赵自选亦分别担任政治课教官，主要是讲国内外

革命斗争形势，分析帝国主义、军阀压迫剥削中国人民的罪恶，资本家、封建地主压迫剥削工人农民的事实，也联系实际解决“铁甲车队”内部发生的问题，还经常请外面的人来作报告，如请彭湃到“铁甲车队”作关于农民运动问题的报告等。

在军事训练方面，主要由周士第、赵自选协助徐成章负责施教。每日操练科目也很紧张。主要训练内容有射击、投弹、刺杀、利用地形地物、单个动作、夜间动作以及班、排、连演习等。平时训练在驻地附近进行，实弹射击要到北门外的观音山以北的山头上进行。除在本队进行训练外，“铁甲车队”还和黄埔军校学生一起演习，以提高“铁甲车队”的军事素质。

“铁甲车队”军事、政治训练，特别注意因人施教，根据不同对象、不同程度进行具体帮助。

“铁甲车队”对干部、队员的政治思想工作抓得很紧，对组织纪律、军容风纪要求很严。廖乾五、徐成章、周士第等经常同队员进行个别谈话，对一些思想有问题或犯有错误的队员，进行耐心的启发与帮助教育。

“铁甲车队”队员，经过教育，大大提高了阶级觉悟。如有一名叫符福明的队员，家里很穷，原是一个从南洋回到“铁甲车队”受训的工人。他撰文在《工人之路》第140期上发表，他说，我经过在“铁甲车队”一个时期的训练后，“思想日益进步，革命精神更加焕发”，“我深知工人是反对帝国主义的主力军，力量非常伟大，实为国民革命的根本势力。所以我们军人保护工人，就是拥护革命。”“我们须有武装直接与帝国主义军阀决一死战，才为痛快！”“死不足悲，不做革命而死斯悲尔！”象符福明这样的又岂止一人。

“铁甲车队”的生活，虽然非常严肃紧张，但同时又是非常团结活泼。队员们经常开展文体活动，如唱歌、打球、演戏等。最常唱的是《国际歌》、《少年先锋队歌》、《国民革命歌》、《工农兵联合歌》等。经常举行娱乐晚会，在晚会上有时干部、队员一起表演节目。队里还有阅览室，有《向导》、《少年先锋》等革命进步刊物供大家阅读。“铁甲车队”完全废除了打骂体罚制度，建立了平等友爱关系，干部与队员上下之间，队员与队员互相之间，一直都是十分融洽，十分团结。大家的革命奋斗目标一致，工作上严肃紧张，生活上平等体贴，财政上帐目公开。如伙食费、办公费、杂费用的开支帐目，每月都定期公布一次。干部和队员伙食标准一样，都是每月5~6元钱。每月伙食费节余，大家平均分到“伙食尾子”。所有这些都与旧军队完全不同，因为这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支新型的革命军队。

周士第为“铁甲车队”的组建和成长做出了贡献。与此同时，他的思想水平也有了较大的提高，阶级意识、民族意识和革命观点日趋成熟。1924年12月，经徐成章、廖乾五介绍，周士第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 帮助广宁农运

1924年12月上旬，应彭湃的要求，中共广东区委决定派“铁甲车队”到广州西北西江山区广宁去镇压反动地主，帮助开展农民运动。

这时，广东的农民运动，在彭湃的领导下已有了相当的发展。1924年初广宁的农民运动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不久成立了农会。5月，彭湃以国民党中央农民部秘书和特派员的身分到达广宁，与周其鉴等在农会里建立了广

宁第一个中国共产党支部，周其鉴任支部书记。

这时，国民党内部发生了分化，左右派之间的矛盾和冲突日益明显，刚刚显露出来国共合作的革命曙光，因此又蒙上了一层阴影。广东西江广宁一带反动地主收买“神打”（大刀会）、土匪，勾结反动军队纠集数千武装反对农会。刚发展起来的农民运动，很快就被反动地主武装镇压了下去。下半年，当农民运动再次发展起来的时候，反动地主进行了更为疯狂的反抗。他们组织反动武装攻打农会，屠杀农民。10月，广宁县农会成立，同时，为了对抗反动地主武装，成立了农民自卫军。彭湃说：“地主依仗民团武力进攻农会，焚村杀人，农民实行武装自卫，这是理所当然”。11月，广宁农会决定实行减租，当地豪绅地主妄图“武力绞杀”。12月，谭圩地主江汉英、江淮英纠集十三乡民团300余人，袭击广宁社岗等地农会。

广宁农运，当时在广东开展得比较红火，对整个农运均具有相当影响。如果广宁农运听任反动派镇压下去，对广东农运将产生不好的影响。于是，彭湃、周其鉴将这一紧急情况向中共广东区委报告，要求尽快派军队前来支援。

中共广东区委接到彭湃等人的报告后，立即找廖乾五，研究支援广宁农运问题，要求“铁甲车队”驰援广宁农运。考虑到“铁甲车队”组建才1个月，所以要廖乾五和徐成章、周士第带两个排前去支援，由赵自选和曹汝谦留广州继续训练部队。

廖乾五回到“铁甲车队”召集中共党小组开会，传达讨论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赵自选、曹汝谦也要求去广宁支援农民阶级弟兄，最后报请中共广东区委同意，赵自选也去广宁。留下曹汝谦负责掌握广州的部队训练工作。

1924年12月11日，“铁甲车队”队长徐成章、党代表廖乾五和周士第、赵自选带两个排80多人赶到广宁，驻在社岗。“铁甲车队”的到来，给农民群众很大鼓舞，他们成群结队跑到十数里以外去欢迎。“铁甲车队”到社岗的当夜，即同农运领袖彭湃等商量，召开了有“铁甲车队”和广宁农运、农民自卫军领导参加的军事联席会议。会议认为在中共广东区委的正确领导下，在斗争中迅速发展进步势力，多方争取中间势力，坚决打击反动势力，依靠和发挥广大农民的力量一定能打垮敌人，取得胜利；对于中小和开明地主，要采取争取其中立，使那些反动地主更加孤立；对于反动势力也要采取各个击破的方法。会议决定先由农民自卫军进攻潭圩反动据点。

第二天清晨，陈伯忠率领广宁农民自卫军六七十人出击敌人，在潭圩据点附近与反动地主武装发生战斗。激战两个多小时未果，农民自卫军难以取胜。“铁甲车队”随即前去支援，声势大振。敌人抵挡不住，放弃据点，纷纷退入潭圩江姓大炮楼内，负隅顽抗。这个大炮楼易守难攻。“铁甲车队”和农民自卫军遂仍回社岗整训待机。

12月12日，彭湃等领导广宁农会组织各区农民代表500多人，举行了声势浩大的示威游行，向县署请愿，并宣布广宁农民自卫军专攻封建反动地主堡垒潭圩，专拿反革命首要分子江汉英、江淮英、江鬼绅三人。这样做，既鼓舞了农民，也分化瓦解了敌人，把中小和开明地主同反动地主区别开来，有利于集中力量打一儆百。

“铁甲车队”和农民自卫军对付地主武装打了不少胜仗。

潭圩有两座反动地主的大炮楼，一座是江家的，一座是黄家的。江家炮楼规模大，五层楼高，围墙是用石头和砖、水泥砌成的，很厚，七五生地炮



的炮弹都打不透，非常坚固；四周有水壕，门口出入用吊桥，平时把吊桥拉起，人出入时才放下来。炮楼内可屯兵数百人，且储备有大量粮食、武器、弹药。江、黄两家炮楼相距几里路，成犄角之势。

12月15日，粤军第3师师长郑润琦以广宁是他第3师驻防地需要“保护地方治安”为由，派其副官长詹学新和第3营营长李汉魂带领两个连的士兵，开到广宁潭圩，以与“铁甲车队”相对抗，影响了攻打炮楼。

詹学新到潭圩的第二天，即找徐成章要“铁甲车队”“制止农军的越轨行动”，指责农会不该减租，侵害地主的利益。徐成章当即义正词严地阐明农民运动的意义，指出减租是广大农民的合理要求，“铁甲车队”应对农民的减租正义行动给予支持。

粤军第3师驻广宁部队在潭圩面对来自两个方面的情况：一个方面是大地主江汉英等杀猪宰羊，大摆宴席，并每人每月发银元两块，进行收买拉拢；一个方面是“铁甲车队”和农会力劝其执行国民党中央关于扶助农工政策，并发动农民慰劳第3师官兵，举行农兵大联欢，向他们宣传农兵是一家人，揭露地主压迫农民的罪恶，宣传革命军人应当支持农民解除痛苦的道理。经过填密争取工作，第3师驻广宁部队李汉魂的两个连和封建武装“神打”保持了中立，并表示要“实现农兵联合，保国护民之道”，支持农民的革命斗争，孤立了反动地主武装。

12月16日，大元帅府电报命令：由廖乾五、彭湃、广宁县长蔡鹤鹏以及詹学新四人组成“广宁绥缉善后委员会”，负责处理广宁问题。蔡鹤鹏是个老右派，处处维护地主利益，“绥缉善后委员会”几次开会，他都进行阻挠。

12月29日，广宁团保总局传，说局长谭侣松与蔡鹤鹏设宴，“宴请”“铁甲车队”领导。彭湃、廖乾五等人商议，正好利用这个机会，由“铁甲车队”逮捕谭侣松。入夜20时，廖乾五、徐成章和彭湃身藏短枪随带警卫去“赴宴”。周士第、赵自选则带“铁甲车队”队员到民团驻地。酒过三巡，“宴会”内外同时行动：“宴席”外，周士第、赵自选带队突然袭击民团驻地，一冲而进，一枪未发就收缴了民团40多条枪；“宴席”上，谭、蔡未及动作，彭、徐、廖等已将谭侣松抓住，押回“铁甲车队”驻地。

为了宣传教育农民、发动农民运动，“铁甲车队”还派出一部分队员组成宣传队，深入乡村做宣传工作。12月19日，由“铁甲车队”、农民协会等单位共同举行“农兵联欢大会”，周士第、赵自选、周其鉴、陈伯忠等组织人员在联欢会上演出反映农村阶级斗争的活报剧。20日，由彭湃、周士第、赵自选主编出版《广宁日刊》，向广大群众宣传革命道理。春节大年初一和初二，又举行了“农兵新春同乐会”，舞狮子，放鞭炮，载歌载舞，互相拜年。

1925年1月21日，“铁甲车队”、农民自卫军和附近农民500多人，在广宁社岗，隆重举行纪念列宁逝世1周年大会。通过这些活动，加深了农民与“铁甲车队”官兵的革命感情，农民群众的阶级觉悟更加提高，“铁甲车队”官兵直接接触到农民的疾苦，进一步增强了革命斗志。

在这期间，“铁甲车队”和农民自卫军，组织了几次攻打潭圩反动地主江家大炮楼的行动，但始终未果。在逮捕谭侣松的当晚，“铁甲车队”派赵自选去广州，请来了大元帅府卫士队队长卢振柳率领的卫士队并带一门“七五生的”大炮来支援。卢振柳是个国民党的右派，他来广宁竟违背帅令，假

打真勾结地主，假支持真压迫农运。由于卢振柳的破坏，江家炮楼迟迟没能打下来，反动地主气焰更加嚣张。彭湃将卢振柳破坏农运的行径报告廖仲恺后，卢被撤职查办。

1925年2月1日，“铁甲车队”和农民自卫军赶走了卢振柳，在争取“神打”三四万人不为反动地主利用后，更加孤立了反动地主，决心再次攻打江家炮楼。分析几次攻击不成的原因主要是由于我们没有攻坚的炮火，摧不开炮楼。看来硬攻是攻不下的，要想办法挖地道埋炸药炸毁炮楼才能取胜。于是由周士第等12人组成的工程爆破队，在“铁甲车队”和农民自卫军的掩护下，利用炮楼背后的死角，在距炮楼不远处，开始向炮楼底下挖地道埋炸药。第二天敌人有所发觉，派出数十名反动武装，向工程爆破队和掩护部队猛冲，被打了回去。敌人在围墙上开了3个小洞，架上土炮，向我地道口抛掷火药包。一次火药包落在彭湃和周士第身旁不到1.5米的地方，被周士第用脚踢走爆炸，砂石纷飞，烟尘蔽眼，彭湃和周士第都被落了一身砂石土块，他们却都镇定自若，置生死于不顾。

中午时分，有一股反动地主武装约五六百人，从外地赶来救援江家炮楼。徐成章同周士第立即带领“铁甲车队”队员和农民自卫军迎击，将1个排分作两路向敌人占据的山头猛烈攻击，将来援敌人打退。下午2时，又有一股敌人约600人前来救援，又被我击溃。

第三天，经过三天两夜，地道挖好了，150磅黄色炸药也埋好了。下午6时炸药炸响了，但由于炮楼坚固和经验不足，炮楼只炸开了一道裂缝，没有被炸毁。以后即采用了围困的办法。过了几天，炮楼里面没水了，要经常出来担水吃，“铁甲车队”和农民自卫军设法打击出来挑水的人，断绝了敌人的水源，并向敌人展开宣传攻势。一天夜里，敌人派了200多人，冲出炮楼，企图夺取水源，被封锁水源的部队打了回去。

正当“铁甲车队”和农军士兵正为久攻炮楼不下十分焦急之时，恰好一阵东风拂吹，一下提醒了彭湃和周士第，根据地形和气候条件，他们决定改用火攻。“铁甲车队”和农民自卫军将炮楼团团围住，农民群众纷纷出动向炮楼四周搬运柴草，家中柴草搬光了，就又到山上割柴草搬来。农民群众对攻击江家炮楼积极性很高，他们说：反动地主吸血鬼把我们的血快吸干了，江家炮楼就是那些吸血鬼的巢穴，摆在那里不攻下来，就像一把刀子插在我们心窝一样，我们实在活不下去了。农民群众，甚至连妇女、孩子们，都争着搬运柴草，不顾枪弹威胁，向炮楼四边周围堆积柴草。

由于我们近两个月的围困，炮楼里反动地主武装的弹药、柴薪、吃喝等日益困难，水源又被切断，援兵被击退，面临“内无粮草，外无救兵”的境地，更畏于火攻，遂派人出来同“铁甲车队”和农民自卫军谈判投降，表示愿意解除武装，赔偿损失，承认减租。2月13日，“铁甲车队”和农民自卫军占领了江家炮楼。14日，黄家炮楼见大势已去，也跟着出来投降。在攻取这两座炮楼的战斗中，共歼敌800多人，收缴六七百条枪。16日，“铁甲车队”乘胜前进，收复了螺岗，再次收缴了反动武装的大批武器弹药，并将缴获的武器弹药全部武装了广宁农民自卫军。

江、黄两家大炮楼放下武器后，广宁各地反动地主也都相继解除武装，赔偿损失，承认减租，广宁农民运动遂获得很大发展。

“铁甲车队”在广宁两个多月，肃清了反动武装，收缴各种枪支5000多条，均交给中共地方党组织，武装了西江农会，西江的农民运动更加发展。

“铁甲车队”在广宁帮助农运，讨伐反动武装取得胜利后，周士第被提升为“铁甲车队”副队长。

此时，广州革命军东征陈炯明，敌人乘广州空虚，大肆造谣破坏，广州形势紧张。在此情况下，中共广东区委决定，调“铁甲车队”迅速赶回广州。1925年2月19日，“铁甲车队”离开广宁，20日返抵广州。中共广东区委以“铁甲车队”帮助广宁农运取得很大成绩，给予表扬。23日，广州各界人民、团体在广州第一公园举行庆祝“铁甲车队”凯旋大会，表彰“铁甲车队”的功绩。开会之日，人山人海，盛极一时。人民给予“铁甲车队”很高评价，更加鼓舞和教育了“铁甲车队”，使“铁甲车队”更加明确了今后努力的方向。

### 改造飞机掩护队

徐成章、廖乾五、周士第率“铁甲车队”第1、第2两排去广宁支援农民运动时，由政治教官曹汝谦和第3排排长高超率第3排留在广州，归中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

孙中山北上前后，广东革命政府并不巩固，当时最大的威胁之一，就是占据东江惠州、潮汕一带的军阀陈炯明。

1925年初，陈炯明乘孙中山在北京病危之机，自封为“救粤军总司令”，号称指挥10万兵，依仗英、美、法等帝国主义及段祺瑞政府的支持，与被英帝香港总督金文泰以金钱、武器收买的粤南军阀邓本殷和滇、桂军阀杨希闵、刘震寰相勾结，并联络闽、湘、赣军阀以为呼应，策划大举进攻广州，妄图推翻广东革命政府。广州形势十分紧张。

在这复杂、紧张的形势下，中共广东区委促使广东革命政府作出决定，于2月1日开始第一次东征。在东征军出师之前，中共广东区委即指示“铁甲车队”第3排参加东征，沿广九铁路前进，作为完锋部队，协同友军攻击石龙、樟木头、平湖、深圳等处敌人防线。第3排英勇作战，所向皆克，并迅速将敌人破坏的铁路、桥梁、车站修复，完全控制了广九铁路，保证了东征军后方交通运输的安全，使东征军顺利完成打败陈炯明的任务。

“铁甲车队”第1、第2两排从广宁迅速赶回广州，保卫广东革命政府。“铁甲车队”驻地大沙头附近，驻有航空局所属的一个飞机掩护队。飞机掩护队原队长林某，暗中与帝国主义和反革命派相勾结，进行反革命活动。考虑到反革命派可能利用飞机掩护队占据飞机场，威胁“铁甲车队”的安全，对广州局势带来很大的危害，中共广东区委认为，必须把这支部队掌握在自己手中，将它改造过来，以扩大革命力量。于是决定，通过广东革命政府和航空局局长李糜（苏联人），于1925年3、4月间，将飞机掩护队的这个队长调走，派周士第兼任航空局飞机掩护队队长，赵自选任党代表，接管改造飞机掩护队。原队长在离开飞机掩护队时，曾召集他的亲信部下作了布置，说了“铁甲车队”的一些坏话，声称他是暂时离开，日后还要回来，飞机掩护队还得听他的。中共广东区委指示周士第、赵自选，到飞机掩护队后，要和平接管改造这支部队，不要引起武装冲突。“铁甲车队”党代表廖乾五还专门召开中共“铁甲车队”党小组会，研究了如何接管改造飞机掩护队的问题。

周士第和赵自选上任后，立刻召集飞机掩护队原来的排长们开会。开始

由于他们不明周、赵来意，都很不安，面色阴沉，心情紧张地坐在一旁。经过周、赵和蔼热情地讲明情况，说飞机掩护队担负的任务很重要，现驻大沙头的飞机，主要靠大家来共同掩护好，我们是来帮助大家一道做好工作的，要他们仍然当排长，并请他们多负责任，多提建议，共同把工作做好等等，并同大家一起座谈、交心，使他们的心慢慢放了下来。该队第1排排长，原来腰中插了一把驳壳枪，子弹上了膛，准备如果势头不对，即拔枪出来对打，然后跑到杨希闵部队那边去。当他听了周、赵两人心平气和的讲话后，面带愧色地说：“我想错了，以为你们是来武力下我们枪的，先换队长，后换排长。如果真是那样，我就把你们打死。现在我才明白是受了欺骗。”边说边从腰间拔出了那支子弹上膛、机头张开的驳壳枪，双手交给了周士第。周士第以更加信任的态度，将枪还给了他，亲切地慰勉他放手做好1排排长工作。通过多方面工作，排长们都消除了顾虑安下心来，打开了在飞机掩护队立住脚跟和取得官兵信任的局面。

随后，周、赵两人工作继续深入，找排长、班长和战士们谈心，主动和他们接近，在生活上打成一片，关心他们的疾苦，并进一步

了解情况。中共广东区委又从“铁甲车队”抽调了一些队员到飞机掩护队帮助工作。经过一段时间的了解，得知原队长林某有严重贪污腐化行为，吃空额，克扣军饷，士兵伙食很差，生活很苦。周、赵抓住时机，发动士兵们起来揭发林某的贪污腐化问题，进行革命教育，提高了士兵们的阶级觉悟。在掌握确实情况之后，调出了一些坏分子，补充了一些工农革命青年，逐步建立起革命部队的一套规章制度，如不打人，不骂人，不体罚，互相尊重，发扬政治、军事、经济民主，提倡官兵平等，以及定期公布办公、杂支、伙食帐目，得到士兵们的拥护。第1排排长经过教育后一直表现很好，在讨伐刘震寰、杨希闵阴谋叛乱中表现勇敢，继续留任。另两名排长表现不好，予以调离。中共广东区委又派来两名中共党员来担任排长，建立了中共飞机掩护队党小组，赵自选任中共党小组组长。周士第还给士兵们上课，宣传国内外革命形势，揭露帝国主义和封建军阀压迫人民的罪行，提高了士兵们的民族意识和阶级觉悟，很快将飞机掩护队改造成了一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革命部队，将大沙头完全控制在我们手里，对稳定广州局势起了很好的作用。

在改造飞机掩护队的时候，英、美帝国主义者极力收买军阀，策动反革命武装叛乱。1925年2月，正值广东革命政府东征陈炯明之时，东征军中的滇军总司令杨希闵和桂军总司令刘震寰却与陈炯明暗通款曲，并同云南军阀唐继尧、北京军阀段祺瑞和香港英帝国主义者相勾结，进行颠覆广东革命政府的阴谋叛乱。从4月起，杨、刘即陆续将滇、桂军从东江撤回广州，伺机行动。

当时国民党胡汉民等人欲与杨、刘妥协，中共广东区委认为那是“养虎贻患”，坚决主张消灭杨、刘。中共广东区委和国民党左派廖仲恺等说服胡汉民，坚决将东征军调回并组织广州附近革命军、工人、农民消灭杨、刘。

在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下，“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已经做好准备，在大沙头的桥头（广州市与河南之间的小岛，有座木桥通市内）堆放沙包，构筑工事，加强警戒，随时准备还击杨、刘叛乱。倘杨、刘行动，“铁甲车队”先要及时掩护广州各党政机关与苏联顾问团向广州河南撤退，随后即转到广州河南土敏土厂一带，担任警戒，保卫党政机关安全，抵御敌人的进攻。

5月，杨、刘公开叛乱，占据了广东北江、西江一带。“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守在大沙头，掩护广东革命政府党政机关与苏联顾问团向广州河南撤退。

6月初，杨、刘军队占领广州省长公署、财政部、电报局、火车站和部分政府机关，广州危急。6月7日，胡汉民以代理大元帅名义通电宣布杨、刘罪状，免去其滇、桂军总司令职务。12日东征军回师讨伐杨、刘。

中共广东区委指示“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统一归徐成章、廖乾五、周士第指挥，配合东征军、黄埔军校学生军和市区工人、农民军勇敢作战。当东征军回师广州时，“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从顺德附近渡河，迅速插入敌人纵深，向石牌、瘦狗岭方面的敌人背后攻击，切断了石牌、瘦狗岭、龙眼洞方面之敌与广州的联系，有力地配合了东征军作战。

6月20日下午，革命军占领广州。敌1个师趁革命军疏于戒备，忽从广州北面来援，进攻广州，打到了北校场附近。广州市内的部队及人民群众一时措手不及，有些惊慌。这时，“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正由瘦狗岭方面返回广州途中，发现这一紧急情况，立即在广州东北方面投入战斗，抵抗敌人，掩护革命军争取时间，集中兵力，向敌人反击，最后消灭了敌人这个师。

由于滇、桂军自1923年1月进驻广州后军纪败坏，鱼肉乡里，作恶多端，广大人民恨之入骨，群起反对。因此，战斗仅一天半，杨、刘叛军两万多人即全部被缴械，滇军1名师长被击毙，桂军1名师长被俘获，杨、刘逃亡香港。至此，杨、刘叛乱被平定，广东革命政府转危为安。

在这次讨伐杨、刘的作战中，“铁甲车队”和飞机掩护队连续作战十几个小时没有吃饭，人人都忘记了饥渴劳累，个个精神振奋，负伤不下火线，勇敢冲锋，不怕牺牲，表现了革命军人的英雄气概。“铁甲车队”在这次战斗中，共俘敌数百人，缴获长短枪数百支，得到了中共广东区委的表扬。

1925年6月，周士第升任“铁甲车队”队长之后，飞机掩护队队长一职由赵自选继任。

平定杨、刘叛乱后，在中国共产党的倡议下，广州革命政府“大元帅府”于7月1日改组为“国民政府”。“大元帅府铁甲车队”，也随之改为“国民政府铁甲车队”（以下仍简称“铁甲车队”）。

这时的广州，真是“多事之秋”。在仅仅一年的时间里，粉碎了商团叛乱，粉碎了陈炯明叛乱，接着又粉碎了杨、刘的叛乱。但帝国主义和一伙反革命派仍不甘心，又收买了国民党右派郑润琦等，阴谋颠覆广东国民政府，破坏省港大罢工。这一伙反革命派，完全秉承帝国主义的旨意，进行各种反革命活动，8月20日暗杀了国民党左派领袖廖仲恺。这是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右派反革命势力，以恐怖手段企图阻挠革命发展的一次严重政治事件。帝国主义和反动派的罪行，更加激起了广大革命人民的无比愤慨。中共广东区委坚决主张解除反动军队的武装，缉拿并严惩杀害廖仲恺的凶手。广东国民政府也采取了一些镇压反动武装的措施。

帝国主义和国内反动派颠覆广东革命政府的阴谋连连受挫，但他们并不甘心失败，继续支持广东军阀陈炯明进行反扑。趁第一次东征军回师广州讨伐杨、刘叛乱之机，陈炯明重新抢占了东江一带，盘踞在广东南部的军阀邓本殷也调兵遣将，与陈炯明军队对广州形成夹击之势。

为了彻底消灭这些反革命军队，统一广东，国民革命军于10月1日开始了第二次东征。

根据中共广东区委的指示，“铁甲车队”在周士第、廖乾五指挥下，参加了解除郑润倚等反革命武装的战斗，并派部队再次控制了广九铁路，为第二次东征陈炯明开辟道路，保证后方交通运输的安全。

## 支援省港大罢工

1925年4、5月，帝国主义强盗在中国各地以凶残的屠杀镇压中国人民对其侵略与掠夺的反抗。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就发生了三起大惨案：一是“四·八”惨案，即4月8日，福州学生为反抗美国文化侵略而向省政府请愿，美帝国主义指使福建军阀屠杀学生的惨案；二是“五·二八”惨案，即5月28日，在青岛发生的日本帝国主义指使奉系军阀屠杀罢工工人的惨案；三是“五卅”惨案，即5月30日，在上海发生的帝国主义动手屠杀爱国群众的惨案。特别是“五卅”惨案，震动了全国各地，民众纷纷起来，支援上海工人阶级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斗争。

“五卅”惨案的消息传到广州后，立即引起了广州、香港工人的大罢工。6月3日广州各界举行大规模示威游行表示支援。6月19日香港海员等工会首先罢工支援上海工人斗争。香港罢工人数15天内即发展到25万人，有13万人回到广州。6月21日广州沙面租界的中国工人发动罢工。省港大罢工，坚持了16个月之久，波及全国各地，是“五卅”反帝斗争高潮中规模最大、时间最长、影响最深、涉及各个阶层的一次大罢工。

1925年5月1日，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第三次全国劳动大会在广州召开，决定在广州越秀南路93号成立中华全国总工会，选举林伟民、刘少奇、苏兆征、邓中夏等25人为执行委员，领导全国工人进行革命斗争。

省港大罢工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进行的。中华全国总工会在广州东堤东园横路成立了省港罢工委员会，设立了罢工工人纠察队。罢工工人纠察队总队长为黄金源，训育长为邓中夏。中共两广区委选调“铁甲车队”队长徐成章任罢工委员会常务委员兼工人纠察队总教练，赵自选任大队教练，第一排排长莫奇标等任纠察队教练，队员符福明、周朝奎等任纠察小队长，担任维护社会秩序、缉拿走狗、镇压工贼和封锁香港的任务。

6月23日，在中共广东区委领导下，举行了广州工农兵人民群众反对帝国主义的示威游行。这天天气晴朗，万里无云，省港罢工工人、郊区农民、各校学生、黄埔军校、“铁甲车队”以及广州各界人民团体、机关、部队等共10万人，先后到广州东校场集合，召开大会。会后，大会主席宣布，游行队伍按工、农、学、商、兵的次序行进，并说打反革命派上火线时，是军人打前锋，游行是文明的示威，军人当为民众的后盾。当日游行队伍出发。4人一排，在广州市沿着惠爱东路、永汉路，出长堤，至沙基、黄沙等主要街道游行示威，拟到西瓜园散队。示威者沿途振臂高呼：“打倒帝国主义！”“取消不平等条约！”“为死难者报仇！”等口号。

周士第率领“铁甲车队”，走在群众游行队伍后面，一方面是声援游行示威群众的革命行动，一方面严密监视周围情况，以防坏人破坏和敌人袭击，万一发生武斗情况，“铁甲车队”，当立即驰援。

当日下午15时10分，游行群众有秩序地经过沙面租界对岸的中国属地沙基时，看到沙面租界里的英、法、葡等国人员住地事先早已布置好了，沙面沿河各要道口均堆积有沙包，构筑有工事，就连洋房阳台上也堆有沙包，

架着步枪、机关枪。

当赤手空拳的游行群众到达沙基西桥口时，噼噼叭叭响起了枪声，随之步枪、机关枪开始扫射，停在白鹅潭的帝国主义军舰也向游行队伍开炮。游行群众对这一突然袭击，不及防备，纷纷中弹倒地。

周士第亲眼看见一个学生中了两弹，头炸掉了，肚子炸开了；路上堆着人们的尸体，有的血肉横飞，鲜血顺马路流进排水沟里，其景惨不忍睹。当场受难工人、农民、军人、学生、市民、红十字会会员等有 200 多人，死 52 人，重伤 170 多人，轻伤无数。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残暴的帝国主义分子向手无寸铁的游行群众射击时，竟使用了当时国际公约禁止使用的“达姆弹”及毒弹。“达姆弹”爆炸力大、杀伤范围广；毒弹使受伤者麻木，不易医治，即使经医治保住性命也会终生残废。似此惨无人道的残暴恶行，为世界罕见。帝国主义者口讲“文明”、“人道”，实际没有半点人性。

惨无人道的帝国主义者们的暴行，激起了游行群众万分的愤怒，他们高喊着“打倒帝国主义”，“冲进沙面去”的口号，向沙面桥冲去，捣坏了第一道铁门。

在帝国主义者用枪炮向游行群众疯狂扫射时，“铁甲车队”的官兵们正行走在大新公司（即现在的南方大厦）附近，当看到帝国主义这样凶残地屠杀我无辜同胞，个个怒火中烧，都想冲上去与帝国主义者拼个你死我活。周士第虽也悲痛万分，但他是一队之长，不能蛮干，忍痛做队员们的工作，说：“我们是军队，上面没命令，不能蛮干，先抢救伤员要紧。”在队长周士第的指挥下，队员们迅速赶到沙基街，抢救遇难游行群众。沙基街西临沙面，南靠珠江，只有东面店铺可以躲避。“铁甲车队”奋不顾身地掩护群众疏散。但因事起突然，地处路狭人稠之处，枪炮一响，游行队伍前面之工农商学群众，皆仓皇拥挤成团，马路上毫无隐蔽之处。周士第指挥“铁甲车队”队员们，不顾自身的安危，帮助游行群众躲到店铺口骑楼下的石柱后面，或叫开店铺门，或找安全地方，疏导游行群众进去躲避，从而避免了更大的伤亡。

下午 4 时，本来是晴朗的天空，却突然下起大雨，好象人怨天亦怨，愤怒的雨水如注，沙面的帝国主义者被大雨所迫，停止了射击。“铁甲车队”在队长周士第的指挥下，在这场救援游行群众的行动中，表现得十分英勇，使群众深受感动。经过这次惨案，又一次暴露了帝国主义的野蛮、凶恶、毒辣、残酷的狰狞面目，更加激起了中国人民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决心。

这就是著名的“沙基惨案”。为纪念 6 月 23 日这次反对帝国主义侵略的群众斗争行动，当年即将此惨案的发生地沙基街改名为“六二三路”，并在沙面东桥头竖立起一方石碑，镌刻着“毋忘此日”四个大字。

### 参加封锁香港

香港大罢工爆发后，罢工委员会运用罢工、抵制英货、封锁香港三种有力的手段，同英帝国主义进行斗争。为了更有效地打击英帝国主义，中共广东区委、香港罢工委员会于 7 月 10 日决定：全面封锁香港及新界口岸。在省港罢工委员会的领导下，组织了 2000 多人的工人纠察队，协同广大群众在东起汕头，西至北海、雷州、海口，从香港、九龙边界和广东沿海各港口以及海南岛，蜿蜒数千里的海岸线上，担任封锁香港的任务。为了加强这次封锁行动，中共广东区委决定，增派周士第、廖乾五率领“铁甲车队”到与香港、

九龙交界处，在西起南头、中经深圳、东至沙头角的百里防线上日夜巡查，协同罢工工人纠察队的斗争。

深圳（原宝安县）与香港新界毗连，其福田、黄岗、沙角、莲坑、沙头角一带，与香港仅有一深圳河相隔，河面宽约丈余，涉水可渡。这一带虽有罢工工人纠察队百余人日夜巡查，但防线间距太宽，偷渡偷运极为容易，防不胜防，且西边南头与宝安城、东边沙头角与莲坑，均有反动军队和劣绅暗中庇护英人偷偷过来购买蔬菜、食物等。因此，增派纠察力量势在必为。

8月初，“铁甲车队”到达深圳后，队部驻在靠近深圳河边的蔡屋围村的一所学校里，一部分队员住在铁甲车上。“铁甲车队”经常派部队到沙头角、莲坑、罗坊、黄贝岭、福田、黄村、南头等处协同罢工工人纠察队，对香港组成“旌旗相望、金鼓相闻”的封锁线。

但是，英帝国主义并不甘于于此，采取了各种破坏手段反封锁。英帝国主义加派了大批军警到香港、九龙边界，在深圳南面的山上架起大炮，炮口指向“铁甲车队”驻地。英国军舰时常驶到沙头角海面，舰上炮口指向我方，夜间用按照灯向我方照射，示威恫吓。英军还不断向我进行武装挑衅。8月15日，英兵在罗坊一带非法越界捉去我在河边巡查的工人纠察队第9支队一名队员，解去英警帮办处讯问我方纠察队及军队人数和枪支数量。该队员坚不肯言，只以自己是新来的伙夫，不知底细予以搪塞。英警无法，遍搜其身，无所得，又多方恐吓利诱，亦无济于事。在我纠察队员严词斥责及坚决斗争下，敌人阴谋未能得逞。经我方多次交涉，英警才被迫放人。

15日下午，驻沙头角田心村附近的罢工工人纠察队发现两艘走私船，满载粮食，正拟私运出口去香港，便前往检查。忽然有两艘英军巡逻舰驶来，向纠察队开枪射击，企图掩护走私船逃走。纠察队恐受其包围，即将队伍散开后退，那两英舰仍继续向我追击，纠察队无法躲避，为自卫，迫不得已，以水机关枪还击。枪战约50分钟，英舰始离去，我方无伤亡，走私船被我截留。“铁甲车队”闻讯后，16日晨，周士第及廖乾五率队伍前来勘察，一面严守阵界，一面急派人回省报告。

不料英人愈闹愈凶，8月28日中午，我工人纠察队队员陈锡，在行至罗坊封峙之山地方，突遭山上英兵用含毒枪弹射击。下午3时，毒弹热毒攻心，施治无效身亡。

有一次，有一不法商人从沙头角偷运200头生猪去香港，被工人纠察队发觉，在“铁甲车队”协助下，缉拿了这个商人，将全部生猪没收，还罚了他5万元。“铁甲车队”和罢工工人纠察队截留出口粮食，扣押走私货物，厉行抵制英货，使香港交通运输中断，肉食蔬菜供应断绝，商店货源枯竭，街道垃圾粪便堆积如山，蚊蝇成群，臭气熏天，豪华的香港变成了“臭港”、“死港”。封锁香港的斗争，在政治上、经济上都给英帝国主义以沉重的打击，大灭了英帝国主义的威风。

在封锁香港期间，中共广东区委和省港罢工委员会还制定了“特许证”制度，实行“凡不是英国货及英国船不经过香港者可准其直接来广州”的政策。这不仅解决了广东的经济困难，稳定了金融，增加了收入，使广东商人保持中立，繁荣了广东经济，而且拆散了帝国主义列强一致对付广州的联合阵线，集中打击了英帝国主义。

周士第、廖乾五领导“铁甲车队”和罢工工人纠察队，坚定不移地执行着封锁香港的政策规定。敌人的野蛮行径，吓不倒；敌人的利诱，不上当。



相反，这更加激起革命军人和革命工人的义愤。他们坚决执行上级指示：不打第一枪。如果敌人敢于首先动武，就坚决进行自卫还击。

敌我之间仅一河之隔，相距不到 10 米，敌人巡逻队在深圳河的南岸巡逻。“铁甲车队”和罢工工人纠察队组成的巡查队则在深圳河的北岸巡逻，他们个个枪上膛、刀出鞘，雄赳赳、气昂昂，用愤怒的目光注视着敌人，当时队员们称这是“眼睛射击”。

由于实行了封锁，香港供应困难，万物腾贵，有些贪图小利不明大义的人，有时从河这边带一些鸡蛋、蔬菜之类的副食品，过河越界到香港、九龙那边去出卖，便可赚大钱。对这样的人，一般是采取教育，晓以大义，不扣人，东西也不没收的政策。但对那些大宗走私的不法商人则采取坚决打击，严厉惩办的政策。

周士第、廖乾五在指挥“铁甲车队”协同罢工工人纠察队封锁香港的时候，还经常派人到深圳一带农村进行宣传、演讲。人们看到“铁甲车队”与其他军队不同，说话和气、买卖公平、爱护人民，讲的都是爱国反霸的革命道理，即给“铁甲车队”送茶送水。当地恶霸地主“四大天王”“八大毒”知道后，利用权势，制止群众同“铁甲车队”接触。当地农运工作者郑社兰、黄学增（时任省农运南路办事处主任）帮助“铁甲车队”开展工作，很快即冲破了地主恶霸们的专横，打开了局面，群众和“铁甲车队”、工人纠察队亲如一家。当国民党左派廖仲恺先生 8 月 20 日不幸遇害后，9 月，深圳各界，以追悼廖仲恺先生为中心，发起了一个大规模的宣传活动，各界一致推举“铁甲车队”队长周士第为宣传部主任，党代表廖乾五为宣传部副主任。宣传部特别重视在农村宣传省港大罢工和封锁香港的重大意义。

周士第、廖乾五还带领“铁甲车队”配合宝安县中共党组织，帮助开展农民运动，组织农民协会。到 8 月底，深圳一带农村便组织起许多农会，在此基础上，成立了深圳区农民协会。深圳区农会成立，又影响 40 多个乡陆续成立了农会。

周士第、廖乾五在驻地蔡屋围村，直接培养了一批骨干，发展十多名中共党员，建立了中共党组织，开展减租减息和反对苛捐杂税的斗争，并酝酿组织农会。

蔡屋围乡农会成立大会于 9 月 1 日举行。这一天，蔡屋围乡热闹非常。周士第和罢工工人纠察队第 9 支队队长陈剑夫率领的“铁甲车队”和罢工工人纠察队，以及各乡农民协会的代表和许多农民，大约三四百人参加了大会。“铁甲车队”队长周士第和班长范捷、队员范（沈）振元、马维楚、罢工工人纠察队第 9 支队队长陈剑夫、第 11 支队队长罗光华、训育员潘岳南、农民代表蔡廷民、任芝舒、文季彬以及中共深圳区党部代表郑庭芳等在大会发表了讲话。大家在讲话中都一致指出，帝国主义、军阀、官僚、政客、土豪、劣绅

等反动派给中国人民带来灾难与痛苦；一切被压迫民族应当迅速

觉醒、团结、组织起来，联合一致，打倒帝国主义和一切反动派，谋取自身的解放。大家在讲话中，都着重宣传了省港大罢工和封锁香港的重大意义，号召农民兄弟起来支援工人罢工，协助封锁香港，置帝国主义于死地。大会还严厉声讨国民党右派暗杀廖仲恺先生的卑劣行径，一致要求严惩凶手和幕后策划者，为廖仲恺先生报仇。大会自始至终进行得很热烈，“铁甲车队”还在大会上高唱《国际歌》、《国民革命歌》、《工农兵联合歌》等革

命歌曲。到会群众情绪十分高涨，“蔡屋围乡农会万岁！”“工农兵大联合万岁！”“中华民族解放万岁！”“世界农民解放万岁！”“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军阀！”的口号声此起彼伏。

由于农民群众普遍迅速地提高了觉悟，他们纷纷组织起来并积极地投入到封锁香港的斗争中，封锁香港的力量大大加强了。在周士第、廖乾五的领导下，“铁甲车队”、工人纠察队和广大农民群众互相支持，互相配合，结成了—道工农兵封锁香港的铜墙铁壁，不法奸商走私活动也就不能得逞，贪图小利越界私卖鸡蛋、蔬菜的小贩也没有了，使得香港更加陷入了“饿港”、“臭港”、“死港”的凄凉境地。香港商店倒闭与日俱增，仅 11、12 两个月就有 3000 多家。香港总督金文泰在四面楚歌中，窘态百出，惶恐万状。

—年以后，中央军事政治学校《拥护省港罢工专号》等文告中写道：“严密封锁沿海，制香港帝国主义者之死命”，“不仅使香港变成荒岛，更是令凌轹—世之英帝国主义者之远东殖民地从此发轫崩溃。”“不独使繁华的香港殖民地——每年贸易额在十五万万以上的商港变成荒岛——每月损失—万万二千万。”“使香港变成荒岛，这是谁的功劳呢？——是工人封锁海口所致。”由此可见，“铁甲车队”在周士第、廖乾五的领导下，同罢工工人纠察队共同封锁香港使英帝国主义遭受了重大打击。

### 激战沙鱼涌

1925 年 10 月，国民革命军第二次东征陈炯明，“铁甲车队”第 3 排担任的任务是进攻石龙—带的反革命军队。他们由广州出发，沿途很快修复了被敌破坏了的铁路，迅速进攻石龙。得手后，又迅速攻占深圳车站，并配合主力解决了敌司徒非旅。“铁甲车队”肃清了广九铁路沿线之敌，为第二次东征扫清了前进的道路，保证了后方运输安全，对东征军消灭陈炯明起到了重要作用。

英帝国主义支持落荒为匪的陈炯明、郑润琦、莫雄等残部三四百人，在深圳大鹏湾—带进行反革命骚扰破坏活动。10 月 28 日，有农民前来沙鱼涌王母墟罢工工人纠察队驻地，请求派人保护。30 日，“铁甲车队”队长周士第得到急报，说陈炯明残部罗坤、邓文烈率部队 200 余人，包围了驻沙鱼涌的罢工工人纠察队。周士第、廖乾五当即率领“铁甲车队”4 个班，由深圳前往沙鱼涌救援。

沙鱼涌是个十几户人家的小村庄，座落在—条小涌河的东面，北面有个小山头，村东有座小石拱桥，东北连着一片小丘陵地带，西面是大海海滩，南面有—小山包高地。

“铁甲车队”到达沙鱼涌时，敌人已向东山方向退去。周士第又闻南澳东山为敌占去，即派人前去侦察。侦察人员回来说，驻东山纠察队被莫雄残部捉去十多名队员。周士第旋即找沙鱼涌商会会长朱旺彪及王母墟民团团团长李国雄，令其代为营救被敌人抓去的人，并说明“铁甲车队”此来就是救纠察队员，绝无他图，希望能见到纠察队员早日归队。

11 月 4 日午夜，朱旺彪、李国雄回来，说没有见到匪首罗坤、邓文烈等人。周士第觉察到敌人—定另有阴谋。同时，他还连续接到农民报告，说在香港与大鹏之间，不断有轮船来往，每次均载运很多人员登岸，并运有棺材（后来才知道棺材内藏有枪支）等物，并且敌人已经知道我们在沙鱼涌的部

队番号、人数，有意由大鹏前来围攻，且有英舰助战，等等。

周士第听到这些消息后，判断敌人是在作开战的准备，并有英军舰船运输人员、枪弹来接济、支持，可能将有大的事变发生。于是周士第指挥“铁甲车队”40多人和罢工工人纠察队100多人（没有武装）一道，多派出步哨，每路10人，加强了警戒。果然，4日晨5时，敌人向我沙鱼涌南端高地发动进攻，步哨誓死抵抗。

周士第判断敌人的进攻不止一路，可能采取多路进攻。沙鱼涌南、东、北三面环山，西面是一片海滩。周士第命令班长黄华然率领1个班坚守南山上的小高地，进行抵抗，同时布置部队分东、北、西三路迎击敌人，自己则在战斗最激烈的南山小高地上指挥。

当夜，形势险恶，且天黑如漆，伸手不见五指。及至天将放明，东面、北面山上也发现有敌人。周士第指挥部队分路进行抵抗。天亮后，只见敌军如蚁，布满在东、南、北三面山头，并向我们包围过来；另有英舰3艘，拖着4只民船，满载敌人驶来。敌人登陆后即蜂拥向“铁甲车队”和工人纠察队扑来。

周士第指挥“铁甲车队”和工人纠察队，英勇地抗击着10倍于我的各方面的敌人，冲锋肉搏多次，打退了敌人的进攻，坚守住了沙鱼涌阵地。7时30分左右，忽然又有3艘英兵舰从香港驶来，两挺机关枪向我阵地猛烈扫射，还有一架英军飞机在我们头顶上盘旋助战，掩护敌人进攻。

驻守沙鱼涌的罢工工人纠察队第10支队队长蔡林蒸此时不顾身患重病在床，也提枪杀向敌人，在弹雨中，他身负重伤，而后牺牲在战场上。

“铁甲车队”黄华然这个班，在沙鱼涌南端滩头小高地与敌对峙的前锋阵地上，顽强地抗击着数百敌人，一次又一次地打退了敌人的进攻。黄华然负伤了，仍然在坚持指挥全班作战；子弹和手榴弹打光了，带头率领全班跃出阵地前沿，与敌人拼刺刀。他们毫不畏惧，杀伤了大量敌人。最后，全班壮烈牺牲。

到了上午8时许，敌人越聚越多，所有高地都为敌人占领，沙鱼涌街口也落在敌人之手，形势十分严峻。敌众我寡，悬殊太大，且被敌四面包围，我料难取胜。

于是，周士第决定由“铁甲车队”掩护工人纠察队，夺路冲杀，突出重围。他们开始向西面突围，由于英国兵舰以密集的火力封锁了开阔的海滩，冲击3次，在弹雨中无处隐蔽，不得不又折回。后来只好向东平（坪）山方向突围。东面是敌主力所在，此时敌人已占领了东面的街口，要突出去也非常困难。但除此已别无出路。于是，周士第决定：由他自己带领勤务兵蔡文锋及部分“铁甲车队”队员打前锋开路；廖乾五带领工人纠察队队员居中；排长李振森率部分“铁甲车队”队员断后。宝安县第三区指派农民为其作向导，抱着九死一生的希望，掩护工人纠察队队员们向东面冲杀出去。

周士第首先端起上了刺刀的枪，带领部队打垮了占领沙鱼涌街口的敌人，杀开了一条血路。此时，山上的敌人发现我向东突围后，便集中火力向这边猛烈射击。担任断后的李振森排长，在枪林弹雨之下，英勇地往返冲杀多次，掩护赤手空拳的工人纠察队队员们突围，毫不顾及自己的安危，最后，在冲出沙鱼涌街口时，中弹牺牲。

两军相遇勇者胜。周士第身先士卒带队边打边走，终于突围冲出火线。他身上已7处负伤，加上几夜未曾睡觉，又打了大半夜的仗，实在劳累困乏

不堪，体力不支，看见前面有一块大青石板，一下子即瘫坐在上面。勤务兵蔡文锋已走在前面十数米远，回头看见周士第倒下来，以为是负伤，便急忙冒着生命危险又转回来，要背起周士第冲出去。周士第一下子又站了起来，说：“我还能走。”再次指挥大家坚持且战且走，继续突围。

在街口转弯处，发现前面有一道桥，有很多敌人把守着，挡住了我们的去路。周士第指挥前锋勇猛地打垮了敌人，冲过了这座桥。在队长周士第的顽强战斗、不怕牺牲的精神鼓舞激励下，战士们最后终于突破了敌人的重围。

周士第等突围出来之后，在沙鱼涌东北五六里地的虎地排附近的一个小山坡上集合、清点人员，仅存周士第、廖乾五、勤务兵蔡文锋及“铁甲车队”队员12人，工人纠察队队员2人，总共17人。一些“铁甲车队”战士和工人纠察队员永远地留在了这片血染的土地上，周士第心里难过至极。

此时还有一些尚未突围出来的战友们，周士第已经有20几个小时米未粘牙，水没入口，喉咙里干得说不出话来，只好用手势表示，要打回去营救尚未突围出来的阶级兄弟。向回走了一段路后，已听不到沙鱼涌方向的枪声。周士第判断敌人可能已经占领了沙鱼涌，再打回去会造成无谓的牺牲。

周士第和廖乾五随即商量了一个智救战友的办法。他们找到了一个胆大的农民，动员他快步跑去沙鱼涌，就说是淡水方面的黄埔学生军打过来了。那个农民按周士第的布置向沙鱼涌方向跑去。周士第也朝沙鱼涌方向打了几枪，佯装学生军真的向这边打来。这时，沙鱼涌的敌人正在煮饭，一听说是黄埔学生军打来了，乱了阵脚，扔下饭锅，纷纷向海上逃散。一些原来躲藏起来的、受伤的或被敌人掳去的“铁甲车队”战士和工人纠察队员百余人便乘机奔了出来。

周士第等突围出来之后，绕道回深圳。走到坪山又遇敌人堵截，不能通过，于是又绕道淡水、龙岗。由于路程远，当天没能回到深圳。那些从沙鱼涌脱险出来的“铁甲车队”和工人纠察队队员们，当天即返回到深圳。他们没有看见周士第等回来，猜测着他们的队长是否会遭到不幸，也没心思吃饭。

周士第等日夜兼程百余里，直到5日早晨才回到深圳。队员和农民群众看见周士第、廖乾五等回来了，非常高兴。附近农民携带慰劳品前来慰问，铁甲车上都站满了人，热烈欢呼“铁甲车队”和罢工工人纠察队胜利归来。

同日，东征军收复潮汕，陈炯明在广东的势力全部崩溃，第二次东征取得完全胜利。

“铁甲车队”离开封锁香港的第一线时，其驻防由黄埔军校学生军开去的一个营接替。

这次敌人袭击沙鱼涌，完全是英帝国主义一手策划。敌军出动1000多人，由英帝国主义分子直接指挥，向我进攻。在我“铁甲车队”和罢工工人纠察队的英勇抗击下，给敌人以重大杀伤，沉重地打击了敌人。这一仗共击毙敌参谋长、营长各1人，连长5人，士兵200余人。我“铁甲车队”牺牲15人（其中排长1人），重伤8人，轻伤5人。罢工工人纠察队伤亡10多人。

沙鱼涌战斗是“铁甲车队”和罢工工人纠察队，在封锁香港的斗争中，武装反击英帝的一场最激烈的战斗。这场激战，再一次挫败了英帝国主义者企图破坏封锁的阴谋，有力地保卫了省港大罢工。

“铁甲车队”和省港罢工工人纠察队，在取得沙鱼涌抗击英帝国主义的进攻胜利之后，省港罢工委员会和广州各革命团体组织了盛大的慰劳活动。

12月10日，省港罢工委员会及国民政府各机关、各社团组织及广大市民群众，在广州广东大学礼堂隆重举行“铁甲车队”和工人纠察队在沙鱼涌战斗中阵亡烈士追悼大会，沉痛悼念为民族、为人民解放事业而牺牲的烈士们。

“铁甲车队”和罢工工人纠察队，受到省港罢工委员会领导的表扬，受到广大革命人民的称赞。其顽强不屈的革命斗志和前仆后继，不怕牺牲的动人事迹，对当时的罢工斗争和反帝反封建的国民革命运动，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为此省港罢工委员会决定派干事局备办物品前往慰劳，还为沙鱼涌战斗专门组织了报告会，请“铁甲车队”队长周士第报告悲壮的沙鱼涌战斗经过和卓著的战绩。中华全国总工会、省港罢工委员会主办的报纸《工人之路》，在1925年11月14日、15日两日刊登了周士第的演说。周士第演说中讲述了沙鱼涌战斗的前后经过，战斗的残酷，以及我以寡敌众，英勇战斗的情形。大会主持人号召人们学习“铁甲车队”英勇顽强战斗的革命精神。

以下是《工人之路》1925年11月14日、15日特号第一版上，登载的演说的全文：

各位亲爱的工友们：兄弟今日报告英兵同陈军残部在沙鱼涌包围我们的情形。十月卅日，我们得到急报，说罗坤、邓文烈（陈军残部）包围沙鱼涌纠察队，即率甲车队五十人来援，遭到敌人已遁。又闻南澳东山为敌占去，又即派人前去。未几回来，说驻东山纠察队被捉十余人，后即商诸该处商团长代为设法，并说明我们此来不过救我们的纠察队，并非同他们开仗，望即将纠察放回。当时已得农民报告，连日英人用舰私运枪械接济他们，知他们有预备，而商团长三日晚十二时回来，说没有见他们。我们知道必定别有缘故，即增加步哨，每路十人。迨三点钟光景敌人来击，我们的步哨至死抵抗。及晨，他们蜂拥而至，遍山皆是。我们在此四面八方包围之中，只有夺路而出，死力冲锋。当时有英国兵舰三艘来援，枪弹由江边飞来，又有飞机一架，在空中飞翔。至八时，连沙鱼涌最近之山顶亦为敌人占领。我们已死十余人。当时只有掩护工友，向敌人冲出。但敌人在四山扫射，弹如雨下，工人甚为害怕，不得不折回，如是者三次，李排长遂阵亡。卒之为我们冲出，只剩十七人。当时我想我们百余人，现在俱已星散，如何对得工友住？即刻折回，但已听不见枪声，知敌已散。当地有李军医昔日在陈军部下的，据他说，我们走后，敌即进沙鱼涌。罗、邓及练演雄统统都来，并有英兵数名。蔡支队长林蒸死后，还被击数枪，可谓惨矣。后我们只好由淡水回来。这次战争，可说是对陈炯明战争，也即是对港英战争。

这次战争我有两个感想。第一我们担任保护工友，但是工友及队伍已被敌人打散，而我反偷生，这是我对工友不住的，从此我更应当为工友奋斗！

我们知道这次工友罢工是反对帝国主义，故人人都应该帮助，但是陈炯明是中国人，为什么去帮助帝国主义来破坏我们？这就因军阀与帝国主义互相勾结在一起。北方军阀也是如此，我们应该努力打倒它们。同时我们知道现在帝国主义是联合在一起，我们要想打倒它，一定要联合世界上弱小民族及帝国主义国家的无产阶级一齐革命，才能成功！

我们知道当俄国革命时，自己孤单一国。帝国主义者把他们封锁，开兵去打他，但是，卒因他们努力，现在可说完全成功了。我们现在又有俄国同志帮忙，弱小民族援助，如果我们再加努力，一定可以成功的！

我们知道工人是革命先锋队，我们应该团结起来，与世界无产阶级及弱小民族一齐奋斗，革命成功很快了，大家奋斗！

《工人之路》1925年11月7日特号，登载《铁甲车队与土匪激战情形》，原文如下：

逆军千余围攻！

英帝国主义者之飞机战舰！

甲车队死十五人！

深圳沙鱼涌莫雄散军围攻纠察队，铁甲车队前往解围一事，已志前报。兹查铁甲车队党代表廖乾五同志昨晚由深圳回来，兹探得当时激战情形如下。铁甲车队出驻深圳各地，帮助纠察截粮食，数月来著卓成效。自莫雄被国民政府派党军缴械后，一部分队伍流为土匪，啸聚山林与香港[英]帝国主义者结成一气，骚扰地方，农民极苦。二十八日农民前来请派人保护，纠察队即派十余人前去巡逻，及回至中途，为土匪捕去。沙鱼涌甲车队闻讯，即派五十人前去救援，而上匪向东山方面退却，形影毫无。乃转找沙鱼涌商会会长朱旺彪及王母墟民团长李国雄，代为营救。三日晚十二时朱李两人回来报称，匪首罗绅、邓文烈俱未得见云云。同时闻得上匪大队由大鹏山前来围攻，并闻英人派舰助战，于是加派步哨，至夜深五时，闻各处步哨枪声，知敌人已至，即分三路应战。乃该处地方甚小，形势又恶天又黑，对面不能见物，直至天明，则见敌人如蚁，四面蜂拥而来，并有英国兵舰三艘及飞机一架助战。至四日七时，见众寡悬殊，料难胜敌，即率队向平[坪]山方面冲出，死伤甚重。计此役我军死十五人，其中连长一人，重伤八人，轻伤五人。损失步枪卅五枝，驳壳枪八枝，手机关一枝。敌方死参谋长、营长各一人，连长五人，土匪二百余人云。

以下为《工人之路》刊登的《慰劳铁甲队》原文：

铁甲车队及孙先生大元帅首创之军队，训练纪律均极优良，自罢工迄今，时经数月，对于罢工截留粮食，及封锁港澳各工作，均蒙该队之保护，纠察队得以执行职务，不料沙鱼涌一役，陈逆部下黄福芝及反革命派莫雄等，串合帝国主义破坏罢工，谋倾覆国民政府，遂在沙鱼涌围困纠察队，队员告急，驻防深圳之铁甲车队遂派队救援工友，致死者十五人，伤者八人，辎重一概损失，现被伤人员，在公医就医，罢工工人代表大会决议慰劳，罢工委员会决定派干事局主理其事，备办品物前往慰劳，以表工兵联合情谊云。

中共广东区委陈延年、周恩来十分赞扬周士第指挥的“铁甲车队”在沙鱼涌战斗中的顽强英勇的表现，并给予很高的评价。毛泽东在农民运动讲习所讲课时，曾表扬过“铁甲车队”的英勇斗争事迹。这是“铁甲车队”的最大荣誉，也是对“铁甲车队”历史的一个很重要的评价。

“铁甲车队”从1924年11月建立，到1925年11月，作为骨干基础组建叶挺独立团。在这整整1年的时间里，经历了帮助广宁农民运动、讨伐杨希闵、刘震寰判乱、肃清郑润珣、参加东征陈炯明、改造飞机掩护队、支援罢工、封锁香港等斗争。在斗争中，都做出了很大成绩，受到中共领导和人民群众的赞扬，自身也在经受战斗洗礼的同时成长壮大。

## 红二方面军中的一员勇将贺炳炎

何念选

贺炳炎（1913～1960）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原名贺明言。湖北省松滋县刘家场人。1929年参加中国工农红军，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4军排长、连长、连政治委员，红3军手枪大队大队长、营长，湖北独立团团团长，湘鄂川黔独立师师长，红二方面军第5师、第6师师长，红2军团新编第5师师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20师第358旅第716团团长，独立第3支队司令员，358旅副旅长兼晋绥军区第3军分区副司令员，鄂豫皖湘赣军区第3军分区司令员，江汉军区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任晋绥野战军独立第5旅旅长，晋绥野战军第3纵队副司令员兼5旅旅长，晋绥军区副司令员，晋北野战军副司令员，西北野战军第1纵队副司令员、司令员。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1兵团军长兼青海军区司令员，西南军区副司令员，四川军区司令员，成都军区司令员。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获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一、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三届全国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七、八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1960年7月1日在成都病逝。

\* \* \* \* \*

贺炳炎是全军闻名的独臂将军，而且是从一个目不识丁的小铁匠锻炼成为威震敌胆的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他性格豪爽，说话风趣，作风扎实，平易近人。他作战英勇顽强，机智果断，屡建战功。这里记述的是他在红军时期，率部队不畏艰难险阻英勇作战，伤残不足惜，粗衣粝食的战斗生活故事。

### 为活命父子先后当红军

1929年春，积雪初融，大地复苏。在湖北渔洋河一带的渔洋关、松木坪、江家湾等地，有一位身体瘦弱、衣着褴褛、可怜巴巴的少年，跟随一位面黄肌瘦的兄长，走村串户，为人打铁器活，换一些吃食维持生命。少年无论走到哪里，头一件事就是打听村子里驻没驻红军。这少年正是贺炳炎。

贺炳炎6岁丧母，姐姐被迫给人当了童养媳，哥哥过继给他人。他小小年纪就给人放牛，破竹蔑，背煤块，处处受人欺凌。他看到村里来了红军，事事为穷人，自己从内心里也想当一名红军战士。他9岁那年，有一天跟着父亲干活，突然停下手，抬起头，恳切地望着父亲说：“让我也去当红军，打坏人去吧！”

他父亲眼含热泪，望着儿子许久说不出话，只是一个劲儿地抚摸着儿子的小脑袋，连连摇头叹气说：“你还小，长大以后再说。”父亲知道，儿子这么小，哪能吃得起走南闯北的苦，如何能在枪林弹雨中度日呢？

贺炳炎见父亲只摇头，一个小孩子哪能拗过父亲，便努着小嘴，在一旁默默地掉眼泪。贺炳炎哪里知道父亲的心事啊！他父亲早就想当红军，寻一条活路。不久，父亲将儿子托付给一个亲戚，教他学打铁手艺，自己投奔红军去了。

眼下，贺炳炎到处打听红军，既为了寻已经当了红军的父亲，也为了自己参加红军。

有一天，贺炳炎跟内兄来到一个叫胡家台子的村庄打铁活，从一位小孩子那里听到村里驻有红军部队的消息，并得知红军晚上就开拔。

贺炳炎虽然心中乐不可支，但表面仍神色自若。到了深夜，他趁内兄熟睡之机，悄悄地溜出了门，乘着月光一路小跑去追赶红军。他一鼓作气追出20多里，跑得上气不接下气，汗流浹背。他没有白跑，终于追赶上了部队。还真是巧，竟找到了父亲。这样，父子双双当了红军。此事，一时在部队传为佳话。

### 带领群众脱险

贺炳炎参加红军后，从战士、班长、排长到连长，带部队战斗进步很快，18岁就当上了团长。

1932年秋天的一个晚上，襄河上空有几颗不太亮的星星，在灰蒙蒙的天空里若隐若现地闪烁。贺炳炎走在河岸上急匆匆地赶路。他边走边回想几天来的艰苦奋战，红军周旋在十多万围攻的敌人之间，虽多次给敌人以沉重打击，可是在大兵压境、根据地遭到破坏的情况下，眼看难以立脚。他心焦如焚，怎么办？……他想：这个时候贺老总指挥忽然叫去，一定有什么紧急任务，是接受新的战斗，还是去偷袭敌人的什么地方？他一口气跑进指挥所，只见贺老总指挥和关向应政委等首长正俯身在一张桌子上看地图，这意味着马上就要行动，他心里暗自高兴。突然贺老总直起身来说：“好吧！转移的路线就这样定了！”他说完，一转身便看见了刚进来的贺炳炎，沉重而严肃他说：“贺炳炎你来得正好，叫你来有新任务。决定主力转移到外线，开辟新的根据地，给你留下3个县的游击队，由你带着去襄北打游击，继续拉队伍……洪湖三四千革命干部和群众，被敌人逼得走投无路，你负责把他们带到襄北安置下来，搞饭给他们吃。”就这样，年龄还不到20岁、军龄仅4年的贺炳炎和年轻的原少共省委书记宋盘铭，将3个县的200多名游击队员组成襄北独立团，掩护三四千被敌人逼迫的洪湖地方干部和群众往襄北安置，并拖住围追红军主力之敌的后腿。贺炳炎率领大家在敌人合围的缝隙中迂回穿行，经过两天一夜惊险的急行军，抵达了预定集中的马良渡口。贺炳炎组织队伍渡过襄河后，绕城镇，走小道，宿松林，摆脱了敌人的追堵围截，终于将这批干部和群众妥善安置在大洪山区。

### 瓮中捉鳖

贺炳炎带领襄北独立团，将群众安置好后，如释重负。部队机动灵活了，战斗力大大提高。为了既拖住一部分追赶红军主力的敌人，又避开与敌人对抗，免遭损失，贺炳炎指挥部队勇猛果敢地活动，有时袭击敌人据点和后勤运输线，有时伏击行进中的小股敌人。

有一天，他们侦悉一股敌人要从客店坡经过，贺炳炎立即组织部队连夜急行军，提前赶到客店坡附近选点设伏。这里有一条狭长的山谷，一条路沿山脚下通过，是天然的打伏击的好地段。贺炳炎将指挥所设在半山腰的一个小村里，部队隐蔽在松林中休息，派出前哨，等待时机。到下午4点多钟，预计敌人通过的时间要到了，贺炳炎部署好部队，规定了战斗打响的信号和战斗结束后的集合地点，便亲自去观察敌情。他靠在一块大石头边，用望远



镜往远处一望，见大路上空荡荡的。正当他疑惑时，侦察员抓来一个掉队的国民党军士兵。经审讯，才知道国民党大部队已在前一天通过，后面只剩下第85师辎重营。贺炳炎高兴地对身边人员说：“我就是要他们。”说完，他立即命令部队进入出击位置。他又伏在岩石边静静地观察，不到一刻钟，大路远处果然出现了敌人，军官骑马，士兵倒背着枪，吆喝着走过来。只见敌人押着一批民夫，有挑的，有背的，还有不少骡马驮着重载。也许走了一天，太累了，队伍乱糟糟的，行军速度很慢。伏击的红军战士抑制着焦急的心情等着，等着。当敌军七八百人的队伍完全进入伏击圈内时，一个军官模样的家伙突然停下来用望远镜朝两边山上搜索。贺炳炎看到敌人的举动，又看了一眼自己的部队，干部战士均严阵以待。他认为时机已到，便举起手枪“砰砰”两枪，撂倒了敌人指挥官。拦头和断尾的部队听到这清脆的两声枪响，随即动了手。

贺炳炎登上一块石头一看，看到攻击的行动恰到好处，心里暗自高兴。

敌人在这险要地段突然遭到红军的猛烈攻击，队伍顿时大乱，有的被打懵了，瘫倒路旁，引颈受戮；有的干脆丢了自己的武器，坐以待毙；大部分敌人丢下辎重、物资，也不管民夫了，乱哄哄地向一处稍宽的小沟里拥挤。

民夫们知道是红军打伏击，在几位有经验的老者招呼下，迅速离开了国民党的队伍，以便红军发扬火力，更有效地打击敌人。

埋伏在山腰的红军战士以泰山压顶之势扑向敌人，如瓮中捉鳖，将敌人全歼。这一仗，独立团得到了足够的枪支弹药、粮食、药品、服装和一批骡马，不仅有了装备，还有一些愿意参军的民夫补充了部队。

### 利用群众的悲惨遭遇教育部队

当大部分国民党军队跟踪红军主力西去后，贺炳炎看到敌人后方空虚，决定趁机打回洪湖根据地坚持斗争。

漆黑的夜空，尚有点点星光闪烁，周围的一切已看不太清楚，只有远处黑黝黝的峰峦还能望见些许轮廓。就在这静悄悄的夜晚，贺炳炎率领独立团千余人的队伍，迎着初春的凛冽寒风，渡过汉水，沿着一条堤岸疾速行进。贺炳炎很熟悉这一带地形，走了3个多小时，部队来到侦察员小王家乡的村庄附近。他打算带部队到村里宿营，搞一点吃的，部队已一天没有吃上饭了。他立即派小王先回村里侦察。

不久，小王侦察回来，哭丧着脸站在贺炳炎面前，低着头不说话。

贺炳炎不知怎么一回事，便问：“怎么样？村子里有敌情吗？”

小王像是没有听到，仍未答腔。

贺炳炎又问了一句：“你父亲在家吗？”

小王听了团长这么一问，再也憋不住了，扑在贺炳炎的身上痛哭起来。

贺炳炎抚着小王双肩，急切地问道：“小王，坚强点儿，快讲，究竟怎么了，出了什么事呀！”

小王哽咽着说：“村子已经被敌人毁了，父亲……父亲被敌人杀了……”

大家听了小王的述说很悲痛，更是切齿痛恨敌人，却不知怎么办才好。

贺炳炎决定天亮后到村子里看个究竟。

战士们边焦躁地跺着脚，边不时地望望东方。东方天空的黑云散去，渐渐泛出鱼肚白色。贺炳炎带着队伍到了村边，看到村子已是一片废墟，到处

是断壁残垣，方圆半里找不到一间完好的房子。有的废墟里一些余烬还在燃烧，断断续续地冒着丝丝缕缕的青烟。

小王将贺团长带到一个席棚口，小声地唤着他婶娘的名字。

开始棚内没有一点动静，小王叫了几声后，一个妇女伸出头来审视了一下，看清楚是自己的侄儿小王后，哇地一声哭了起来。随之，棚子里的一个小孩子也跟着哭了起来。凄凉、悲惨袭击着战士们的心，更刺疼着贺炳炎的心。

贺炳炎和小王的二婶交谈了一会儿后，招呼战士们坐在半截子墙上，听小王二婶介绍村子遭敌人破坏的经过。

这位饱受苦难的农村大婶禁不住满心痛恨地说：“红军撤离洪湖后，敌人像过筛子一样，来了一伙又一伙，粮食、衣物、家畜被抢得一干二净。最后来的一伙人，到各家各户搜了几遍，吃的、用的什么也没有捞到，更加穷凶极恶，杀气腾腾地将村庄的房子统统放火烧了，谁家稍有反抗，就打死谁。有的老人、小孩骂了他们几句，就被丧心病狂地打死。村子里有许多人被敌人杀害，党的组织被破坏了，没有撤出的共产党员都被敌人杀了。”小王的二婶指着小王对战士们说：“他爹就是被敌人吊在村子前面一棵大树上活活烧死的。前几天，反动地主全都回来反攻倒算，疯狂报复……”

小王的二婶对敌人的血泪控诉，更激起了红军战士的悲愤，使全团干部战士受到了深刻教育，纷纷向贺炳炎团长表决心，一定要狠狠打击敌人，革命到底！

### 手持菜刀激励战士奋勇杀敌

1934年7月，在湘鄂西军民反“围剿”的一次战斗中，当敌人突然袭来时，使参战军民受到极大激励和鼓舞的是一名红军指挥员。他手持一把大菜刀，浑身是胆，指挥一队手持短枪的战士，奋不顾身地杀入敌阵。只见他冲在前头，左砍右杀，一连砍倒几个敌人。他身后持短枪的战士，举枪猛烈射击，打得敌军晕头转向，不知所措，死伤一片。持菜刀的指挥员，在大声叫喊指挥部队杀敌的同时，从敌人手中夺过一挺机关枪，而后一阵猛烈扫射，终于打退了敌人的进攻。这时，大家才看清，这位手持菜刀的指挥员正是贺炳炎。

这次，蒋介石调集50万兵力，向各革命根据地发动第四次“围剿”。其中用10多万兵力，采用多路合围、步步为营的战术，向湘鄂西中央分局所在地新沟嘴进攻。为保存实力，粉碎敌人的“围剿”，红军主力转移到外线作战，腹地只留下一个警卫团和一些地方武装。这时，贺炳炎正在洪湖军校受训，并任区队长。在敌人偷袭、形势万分危急之中，贺龙急令段德昌率领红9师两个团昼夜兼程赶回保卫根据地，同时命令军校学员参战。当时人多枪少，贺炳炎将枪让给战友，自己找了一把菜刀杀向敌阵，打出了红军的威风。他的行动受到了上级表扬，并教育和鼓舞了全校人员。

### 委屈抛一边 打完仗再说

1935年6月初，红2、6军团转向鄂西，在咸丰县忠堡包围住了敌纵队司令兼41师师长张振汉的部队。在战斗中，红4师政委方理明和红6师第

18 团团团长高利国、政委朱绍田负重伤。这时贺龙总指挥正生病发高烧。一天，军团任弼时、关向应政委把贺炳炎叫到指挥所。任弼时政委下达命令，要贺炳炎去第 18 团当团长。

贺炳炎说：“我是‘自首分子’，不能当团长嘛。”

任弼时很严肃地说：“这是党的安排。你是共产党员，在党处于困难的时候，作为革命军人，你应该采取什么态度？”听任政委这么一说，贺炳炎把大腿一拍说：“好，我去！打完仗再回来。”

贺炳炎一向服从命令听指挥，叫干什么，坚决完成任务，这次怎么有些不痛快呢？

原来，1933 年搞“肃反”过了头，扩大化，一些革命同志无端遭到诬陷。他也被当作所谓“改组派”抓了起来，险些遭杀害。那时红 3 军经过改编后进入湘鄂边区，部队处于非常艰难的环境中。有一天，贺炳炎等几个师、团干部突然被抓了起来。这些被抓被关的人，在广大战士们眼里都是平时敢作敢为、敢打敢拼的好指挥员。他们在战场上端着枪，挥着大刀，冲锋陷阵，向敌人勇猛冲杀，毫不畏惧，怎么忽然一下子都成了反革命呢？

贺炳炎等人被关起来后，部队干部战士纷纷议论并提出质问：“为什么把贺炳炎抓起来？”

贺炳炎自己也困惑不解，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为什么被抓起来。

这时敌人实行严密封锁，妄图困死、饿死红军。红 3 军人员补充、物资供应都非常困难。国民党军占据着一些大的村庄和城镇，红军被追赶到深山老林，风餐露宿，经常断粮，以山果、野菜充饥。在天寒地冻的环境中，大部分指战员仍身着单衣，脚穿草鞋。白天可以晒晒太阳，到了夜间就十分难过，大家只好挤在一起互相靠体温御寒，真是度夜如年。在这种情况下，贺炳炎等被关押的人生活就更艰难了。但这丝毫没有动摇他对共产党的信念，他相信问题总会搞清楚。在被关押中，他想到自己失去了为党工作的自由；想到自己不能在战场上拼杀；想到自己的家境贫寒，姐姐、哥哥被迫给了人；想到在红军担任司务长的父亲不久前在一次战斗中牺牲了。想到这一切，他常常痛苦地背着人流泪……

发生这种事，是执行“左”倾路线的领导者捕风捉影，怀疑一切，主观臆断地认为，既然在其他苏区有“改组派”，湘鄂西苏区也必不会少。于是，“肃反”被扩大化，将敢于直言的贺炳炎等一批人也当作“改组派”抓了起来。贺炳炎被关押 29 天，险些被杀掉。

后来，贺炳炎被抓的事，被总指挥贺龙知道了，他气愤地质问那些执行“左”倾路线的领导人：“贺炳炎打起仗来不要命，与反动派是死对头，难道有这样的反革命吗？”

在贺龙未发现问题前，一些被怀疑是“改组派”的人，不分青红皂白地惨遭处决。这种无端的肃反运动，搞得大家人人自危。由于贺龙出来讲了话，贺炳炎才得到解救。

贺炳炎获释后，被任命为新兵大队队长。这支部队是新收编的一支地方武装，队伍中有浓厚的封建迷信意识，许多人相信在打仗前吞朱砂、念符可以刀枪不入。由于贺炳炎努力工作，不断给士兵们讲革命道理，因势利导，言传身教，很快将这支部队改造成了一支勇于战斗、敢打敢拼的劲旅，打了许多胜仗。后来，贺龙以贺炳炎的事迹为例，对搞肃反扩大化的人说：“改组派”中哪有这样的好指挥员！

眼前，贺炳炎听到首长又要他去当团长，不由自主地谈了自己的态度。

关向应政委在一旁听到贺炳炎对“肃反”扩大化仍心有余悸，便严肃地指出：“过去抓你的‘改组派’搞错了，可以给你道歉嘛。你是共产党员，现在党和红军处在困难时刻，党需要你出来工作。”

贺炳炎听后，二话没说，愉快地服从了组织的决定。

长期与贺炳炎搭档合作的廖汉生后来回忆说：“贺炳炎就是这样一个耿直的人，有些倔脾气的人。当你错整了他，他心里有气，有气就要发出来，他才不管你是谁呢。但是一旦你给他讲清楚，一切都会烟消云散，坚决服从党的需要，他会把个人的冤屈统统抛到一边，毫无顾忌，勇敢地完成任务，就是掉脑袋他都干！”

### 只要一声令 再难也敢冲

1932年2月间，在湘鄂川黔革命根据地，红军又遭到超过自己10倍的国民党军围攻。在后坪战斗中，敌人凭着人多武器好，地形又十分有利，使红军攻击部队几次受阻。为了夺取制高点，红军先后派出几个突击小组伺机攻取，均因敌人占据着有利地形、火力猛而未能拿下来。如果再夺不下制高点，歼敌计划就要落空。在危急中，贺龙一声令下：“贺炳炎上！”蹲在贺龙后面严阵以待的贺炳炎说一声“是”，一跃而起，匍匐着不断变换位置，在强大的火力掩护下，迅速接近了制高点。正在关键时刻，贺炳炎突然中弹趴下了。大家的心紧缩了一下，忽见贺炳炎又直起身来，迅速地掷出几颗手榴弹，手榴弹在敌群中爆炸。他趁机跃上制高点，强忍着伤口的剧痛，夺过敌人的机枪猛烈扫射，为红军反击敌人创造了战机。红军在贺龙的号令下，如奔涌的铁流，很快打垮了敌人。

非常了解贺龙和贺炳炎的18团政委廖汉生说：“贺炳炎是贺龙最喜爱的一员战将。打仗时碰到别人拔不掉的硬钉子，贺龙就大喊一声‘贺炳炎上’，贺炳炎绝无二话，冲锋在前。他经常被指派担负最危险、最艰巨的任务。”

贺炳炎不仅打仗勇猛异常，而且平时也调皮得出奇，不是跟这个摔，就是跟那个逗，闹急了还常与对方厮打起来，从不服输，闹得常有人告他的状。为此，贺龙总指挥没少批他，就差用烟袋杆儿敲他的脑壳了。

有一天，贺炳炎刚走进贺龙的办公室，发现总指挥的脸色有些不对头，“报告”还没喊出口，贺龙劈头就问：“贺炳炎，这像什么红军？”

贺炳炎一下子愣住了，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只听贺总指挥又问道：“你们部队违犯了纪律，你知道不知道？”

这时，贺炳炎才明白首长为什么发这么大的火。原来，部队因连续行军作战，战士们两天没有吃上饭，有几个战士饿极了，跑到老乡地里挖了几个红苕吃，因为找不到原主，没有付钱。

贺龙严肃地指出：“粮食是老乡的命根子，我们把它挖了，老乡吃什么？还有，我们的部队，特别是那些年轻的、刚入伍不久的战士，行军时爱抄近道，常常从老乡的庄稼地里穿过去，这是损害群众利益的行为。作为一个干部，必须时刻注意群众利益，必须时刻注意维护部队纪律。没有这一条，我们部队就不能打胜仗……”

贺炳炎良好的组织纪律观念和顽强的战斗作风，就是这样在贺龙等领导同志严格要求和耐心培养教育下形成的。

## 围攻龙山县城

忠堡战斗结束后，红军押着抓获的敌纵队司令兼第41师师长张振汉等俘虏，抬着缴获的山炮，移军南下。一部休整，一部包围了湖南省西北边界有“万宝山”之称的龙山县城。这座县城西、北两面是高山，东、南两面则是一片平地。城内有上万居民，驻有国民党正规军和保安部队各一个团。

贺龙总指挥交给围城部队的任务是：肃清外围，长期围困，相机夺取县城。

贺炳炎指挥的第18团负责城北。这里碉堡林立，敌人组成一道严密的火力网，封锁了红军的前进道路。敌人的飞机也不时飞行搜寻红军目标，一发现骡马的影子，立时投炸弹，或用机枪扫射。红军不得不在远离城墙的地方挖交通壕，而且只能在夜间作业，任务相当艰难。

从围城开始以来，又偏偏连日降雨，整天淅淅沥沥地下个不停。战士们被雨水淋着，坚持作业，直到一个星期后才将交通壕挖到敌人碉堡跟前。有的战士露出头来向敌人喊话：“喂，碉堡里的弟兄们，想活的趁早缴枪，不缴枪，小心你们被一锅熬！”

贺炳炎始终没有离开阵地，不断地招呼战士注意隐蔽。

起初敌人还朝壕沟里打枪，子弹落在壕沟的土堆上；后来见周围都是红军的交通壕，慌张起来了；加上被围困一个多星期，断粮断水，不断有人走出地堡缴械投降。但主堡里的一连敌人还企图顽抗到底，听到红军战士喊话，甚至大声嚷嚷着叫阵：“有种的打呀！”

贺炳炎一听，火了。他认为不把这个碉堡敲掉，其他碉堡就不好解决。于是，下令把山炮拖了过来。贺炳炎指挥炮手，“轰轰轰”几声巨响，就将碉堡掀掉了半边。里面的敌人大部被炸死，只有少数几个逃进城去了。其余碉堡里的敌人见主堡已遭此“厄运”，加之没吃没喝，退路已绝，便无心恋战，只得投降。一个多星期的时期，城外的碉堡全部被解决了。

贺炳炎等率部扫清外围逼近城下，却发现敌人已用大块的石头把城门堵死，以石堆作掩体，用火力封锁，部队很难攻进去。双方对峙起来，并且隔得很近，连对方说话声都听得很清楚。更有甚者，时间长了，我军战士们竟同敌人士兵聊起天来，红军战士趁机宣传共产党的政策。贺炳炎鼓励战士们发扬红军政治工作的威力。宣传工作取得了很好的效果，晚上陆陆续续有敌人士兵偷偷爬过来投降。贺炳炎亲自我几个降兵谈话，知道城内粮草已尽，全靠空投。后来，敌人当官的发现了士兵投降的情况，便采取了严密的监视措施。

围困了30多天，仍没有攻下龙山县城，红军指挥部决定利用暗夜把装满黑色火药的棺材埋在城墙根下，爆破城墙。轰隆一声巨响，城墙外层被炸塌了一截，可里面的土墙还没有倒，守敌马上组织火力顽强地封锁了缺口。红军攻城仍无果，甚至牺牲了一些战士。

此时，总指挥部得知敌人从江西等地调来新的部队，全力解救龙山。

敌情有了新的变化，贺龙总指挥及时调整部署，命令红军主力撤离龙山。由贺炳炎率一部连夜向北转移至沙道沟，在那里休息了一天。这时总指挥部得悉新调来的敌第85师谢彬部正由北向南朝板栗园开进，遂决定迎击并消灭这股敌人。

## 板栗园伏击战

贺炳炎率部经过一夜急行军，于拂晓时到达板栗园附近隐蔽。这时传令兵疾速赶来，通知贺炳炎上山看地形。

贺炳炎爬到半山腰，看到山头上已有好几个人在指指画画谈论什么。贺炳炎赶紧走近一看，原来是贺龙总指挥手提马鞭指点着向大家交代任务。贺龙看到贺炳炎赶来，便幽默他说：“贺炳炎，我要你做个瓶塞子，喏！”他用鞭子指向东西两条山之间一条狭窄的口子说，“就是塞住那个‘瓶口’。”

贺炳炎抬头望去，那是一条大冲，南经李家河直通龙山城，两侧都是高山，敌人一旦进入大沟，只要前后一堵，就成了瓮中之鳖。

各部指挥员都明确了自己的任务，贺龙又郑重地交代说：“敌人是85师谢彬部，我认识这个人，他还是有两下子的，大家不可掉以轻心。敌人的装备比我们强，要尽量避开他们的火力。两侧的伏击部队一定要隐蔽好，不要暴露，都以贺炳炎的18团枪声为号，一齐出动，狠狠打击敌人，争取全胜。”

贺龙顿了顿，转过头对贺炳炎说：“你赶快回去布置战士构筑工事，发扬连续作战不怕苦的精神，要赶在敌人中午到来以前完成。”

贺炳炎说了一声“是”，遂纵身上马，飞奔而去。

贺炳炎回到部队，太阳刚刚升起，朝霞映红了群山。他感到连日来焦急的郁闷心情，好像随着夜色的退散而消失殆尽。

贺炳炎指挥的第18团共2000人，这时正在板栗园南口东侧山上紧张地构筑工事。战士们听说马上就有仗打，疲劳、饥饿统统忘在脑后，憋着的那股要消灭敌人的劲头儿又上来了。

在兵力部署上，贺炳炎把能打善攻的第3营放在正面，第1营、第2营置于两侧，团指挥所和警卫连随在第3营后。

构筑好工事，战士们翘首引颈，急切地等待敌人到来后聚而歼之。贺炳炎要求大家隐蔽好，作好战前准备。

刚过11点钟，远处一片烟尘，人喊马嘶，敌人果然来了。从敌人的行动看，既没有派出警戒，也不进行搜索，他们一定以为红军仍在围攻龙山，径直向山沟里开进。

贺炳炎举起望远镜，看到敌军队伍中有一架滑竿，前后有四五十个背短枪的兵护着。他判断这不是别人，肯定是敌师长或其他什么大官，绝不能让他跑掉。

这时，第18团的战士们隐伏在伪装的工事里，操着枪瞄准敌人。敌人全部进入伏击圈后，贺炳炎朝一直盯着他的司号员做了个手势，司号员的号声顿时响彻山谷。通信员同时朝各营打出旗语，第3营猛烈地向敌人开了火。

敌先头部队听到号声和枪声，突然停止前进。第3营立即以机枪猛烈扫射。敌人队伍大乱，受惊的骡马嘶叫着。敌军官狂喊着，妄图阻止其士兵向两边树丛、草堆里乱跑，并用指挥刀驱赶士兵占领小山包、土坎，一边抵抗，一边挖工事。

贺炳炎想：若是让敌人挖好工事，解决战斗就困难了。于是他朝部队大声喊道：“同志们，瞄准敌人狠狠打，不能让他们得手！”

这时两边山头上的冲锋号吹响了，手榴弹一颗颗甩入敌阵，火光闪亮，尘烟腾飞，敌军人仰马翻。冲锋的战士呼喊着一浪接一浪地冲向敌人。双方一

接触，即展开了激烈的肉搏战。敌人前进的路被封住，来路也被堵死，犹如钻进了一个瓶子。贺炳炎带领部队紧紧塞住了瓶口。这时，一部分敌人拼命向两侧山上跑，抢占了一些小山头、土堆、岩石，同向下冲的红军顽抗。

贺炳炎指挥的第18团是由沟底向对面山上进攻，地形不利，敌人的火力又很猛，因此我军伤亡很大，第1营营长和第2营营长都牺牲了，连排干部也大部伤亡。贺炳炎从这个营跑到那个营，组织火力，指派干部，调整兵力。敌人的反冲击被一次次打退。贺炳炎鼓励战士们说：“谁能坚持，谁就能胜利！”在他的指挥下，部队同敌人进行力量与意志的决斗。敌人几次攻不动，火力有所减弱。贺炳炎抓住战机，立即组织部队再一次发起猛攻。他一声号令，战士们一个个跳出工事，勇猛地扑向敌人。贺炳炎又命令部队向前压，双方投入了白刃格斗。激战正酣，兄弟部队从两侧来援，战场上一片厮杀声。

敌人十分顽固，虽然已经死伤遍地，但活着的仍不肯投降。

在混战中，敌师长谢彬和他的警卫营爬到西侧的半山上占领了一个土围子，敌人便以土围子为中心，逐渐聚集起来，同红军对峙。贺炳炎发现这一情况后，趁敌人还未及重组兵力时，即命令部队进行猛烈打击，使敌人继续陷于混乱。不幸的是，这时第4师师长卢冬生负重伤，部队干部伤亡很大。经过一场混战后，部队建制已不整。在这种情况下，红军无法组织有力的攻击。

贺炳炎正在考虑如何整顿调动部队时，忽见总指挥部的传令兵骑马奔来。传令兵跑到贺炳炎跟前，边勒马边大声报告说：“贺团长，总指挥命令你指挥4师，坚决歼灭敌人！”

贺炳炎一听贺总下了命令，立刻指挥第18团再次向敌人冲击，并命令第4师各团占领周围阵地，防备敌人突围。他对身边曾庆云营长喊道：“你带预备队，准备后续接应。”

战斗进行了大半晌，第18团的伤亡已近一半，战士们个个都打红了眼。敌人被压缩于一处。红军战士急速冲击，左刺，右杀，枪击，刀劈，很快就把敌人冲散了。第4师部队乘机杀入敌阵，敌人叫爹喊娘，四处溃散。红军也付出相当大的损失，许多战士浑身是血。

最后，敌人只剩下那个土围子。

曾庆云带领第3营预备队来了，一见到贺炳炎就大声说：“团长，那土围子就交给我们了，你就等着好消息吧！”说着他便带领部队冲了上去。这是最后的战斗，战士们不顾一切地朝上冲。

谢彬的警卫营一字形排在土围子上，向红军射击。

贺炳炎命令用重机枪压住敌人，一次又一次地将敢于顽抗的敌人撂倒。经过几个回合的较量，敌人再也组织不起有力的回击，一些人只能伏在五六尺高的土围墙后面胡乱放枪。

战士们冲到土墙前，向里面掷去一排排手榴弹，终于消灭了土围子内的敌人。

激烈的战斗结束了，贺炳炎沿着山冲的一条山路走去，只见沿途到处都是敌人的尸体和被丢弃的枪支、弹药。他身边的参谋立即通知部队：粮袋可以丢下，枪炮弹药要统统带走，不能丢掉。

在打扫战场时，一位战士急急忙忙跑过来向贺炳炎报告：“团长，我们抓住敌人的师长了。他像头死猪一样。”

“哦！去看看这头死猪。”贺炳炎说完笑了，大家也都笑了。

## 右臂锯了 坐担架指挥作战

红 2、6 军团在贺龙指挥下，于 1935 年 11 月 19 日，从桑植县刘家坪地区出发，开始长征。贺炳炎已任红 2 军团第 5 师师长。部队沿雪峰山西侧，经花园市直奔云南瓦屋塘，拟由此翻山越岭进入贵州。担任前卫的贺炳炎红 5 师第 15 团在翻越瓦屋塘的东山时，遭到敌人的阻击，乱弹如雨。为了尽快消灭敌人，保障红军主力通过，贺炳炎命令该团团长速向贺龙报告，并命机枪掩护，提枪高喊：“同志们，跟我来！”带头冲了过去。指战员见师长冲锋在前，也跟着冲向山头，与敌人激战。不幸，贺师长第 6 次负伤。说起来有点神，过去他曾多次负伤，包好绷带，又照样冲锋杀敌，像没事一样，伤口也好得快。为此，战友们常风趣他说他血性好。可是这次却不一样，他的右臂被炸成肉泥状，骨头全碎了，只留下一点皮连着肩膀，并且流血不止。医务人员感到无法包扎。这时贺龙赶到，看见这情形非常难过，问医生怎么办？医生说：“师长的右臂完全断了，看来保不住。如果不立即截肢抢救，迟了有生命危险。”可是，医疗器械已驮运转移了，一时无法取回。救人要紧，战场上医生敢作敢为，没有手术锯，就从老乡那里找来一把锯木头的锯子，决定用它来锯掉贺炳炎受了重伤的右臂。

就要动手锯臂了，医务人员将药箱翻遍了，却找不到麻醉药。

怎么办？大家正十分焦急时，有人提出用吗啡，并说多吃一些吗啡可以起麻醉作用，这是没有办法的办法。……

贺龙来到贺炳炎床前，轻声说：“炳炎，你的右胳膊要锯掉，可是没有麻药，本想找些麻药后再做，可伤势等不了哇！”贺炳炎一笑说：“老总，你放心，那吗啡我是绝不吃。关云长还能刮骨疗毒，何况我是共产党员。”随后，医生找来 4 个力大的战士，要他们按住贺炳炎。贺炳炎对医生说：“不用他们，我挺得住。”说着，便把一块毛巾塞到嘴里。医生开始用木锯锯贺炳炎的胳膊，人们明显看出医生的手在轻轻地发抖。贺炳炎忙鼓励说：“我自己都不怕，你还怕什么？来吧！”医生鼓着劲锯，那血水顺着锯条流淌下来。人们咬着牙关看医生为贺炳炎锯臂，不禁都掉下了眼泪。

贺炳炎忍住剧痛，紧紧咬着嘴里的毛巾，用没有受伤的左手死命地扼着床边，熬过那艰难的一刻……

医生将他的残臂锯下后，又用钢锉锉平骨面。贺炳炎的汗像雨水一样流，湿透了全身，他仍强忍着。

做完手术，贺炳炎见到贺龙总指挥，含着眼泪问：“总指挥，我以后还能打仗吗？”

贺龙亲切地紧紧握住贺炳炎的左手，擦去他脸颊上的泪水，深情地慰勉说：“怎么不能打仗？你还有一只手嘛！我们共产党人，不怕任何艰难困苦。”

因战况紧急，部队要继续长征。贺炳炎伤口未痊愈，便坚持在担架上指挥部队行军、作战。

## 反对搞分裂

1936 年 7 月 1 日，红 2、6 军团翻过三座大雪山，到达甘孜与红四方面军会师。红 2、6 两个军团和红 32 军合编为红二方面军。贺炳炎任红 6 师师



长。

贺炳炎看到部队合编后出现了一些怪现象，有些人鼓吹要跟以总政委张国焘为首的什么新“中央”南下。后来，他看到风头越来越不对劲，便有些坐不住了，脑子里考虑了许多问题：张国焘为什么要另立以他为头头的“中央”，欺骗、拉拢红二方面军一些不明真相的人跟他一起反对党中央、反对北上抗日呢？

当有关领导向贺炳炎打了招呼后，他坚决反对并揭露张国焘搞分裂党的活动。为了稳住部队，他深入连队宣传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正确路线，要求部队服从朱德、贺龙、任弼时的领导与指挥，跟着他们行动，拥护以毛泽东为首的党中央。

有一天，贺炳炎召集全师干部开会，向大家揭露张国焘搞的许多不正常的活动，提出了一些疑问，要求大家认真思考，不要盲从。他明确提出要烧掉张国焘下发的以分裂党、反对党为内容的小册子，指出党中央只有一个，就是毛泽东同志领导的党中央。他号召大家要坚决贯彻党中央在两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的决议精神，执行集中主力北进、在运动战中消灭敌人、创造川陕苏区根据地战略方针。

由于贺炳炎深入细致的工作，使全师指战员很快就明白了事实真相，明确了前进的方向。

### 一只胳膊难平衡 跌跤更多

贺炳炎率领红6师从甘孜出发，向哈达铺前进，一路上担任全军后卫，既要同追赶的敌人作战，又要收容整个方面军部队因伤病而掉队的人员。

部队翻越麻尔柯山时，刚到山上，天气突变，下起了大雨，继而又是大雪。战士着衣单薄，不少人冻倒了。天黑后，师部和两个团下了山，但担任后卫的第16团及部分收客人员还没有下山。师长贺炳炎和政委廖汉生立即带人转回去接应，经过几次努力都没有摸上山，直到天亮后才奋力将大部分人接应下来。这一次，全师有174人连病带冻而永远留在茫茫雪山。

部队进入大草地后，一路上经常阴雨连绵，道路泥泞，十分难走。人不小心踏上沼泽泥滩陷进去，别想再拔腿。夜里行军更是不易，谁要是不跌跤，倒成了稀罕事。贺炳炎缺一只胳膊，走起路来难以平衡，跌跤的次数就更多了。

草地上的气候多变，遇上寒流袭击，汗湿的衣服一下子就变得硬梆梆的，走路时刷刷作响，磨得两腿生疼。贺炳炎的伤肢磨得更是难以忍受，他强忍着，左手拄着一根木棍，同战士们艰难地前行。

部队带的干粮吃光了，草地上已经几次过往大部队，能吃的野菜也都被前面的部队吃光了。一天傍晚，贺炳炎带着卫生员、通信员、炊事员等七八个人，想在一个小土坡上找些可以充饥的东西。只见贺炳炎一只手这里挖一下，拾起来放进嘴里咂巴咂巴；又那里掏一下，捡起来放入嘴里嚼一嚼。他在为战士们寻找能吃的野菜和草根。

碰到谁也不认识的野菜，师长贺炳炎和政委廖汉生都要先尝尝，证实无毒可食后，再向全师推广。据说，为了部队生存，贺炳炎尝过四五十种野菜和野草。

有一次，几个战士因为实在找不到可以吃的野菜而赌气干脆坐在地上不

找了，贺炳炎鼓励大家说：“同志们，我们活着走出草地就是胜利。为了活着，为了革命的将来，再努一把力吧！”

为了挽救全师人的生命，为了走出草地，贺炳炎和廖汉生动员指战员捡牛皮，拾马骨，挖野菜，把一切可以吃的东西都找来充饥。这时候，大家已面黄肌瘦，弱不禁风。

在漫无边际的草地上行军，因疲劳、伤病、饥饿而掉队的人越来越多，战士们互相搀扶着艰难地行进。贺炳炎和政委发动全师党团员和各级干部都参加搞收容。党团员的肩上都背起了“双枪”。

贺炳炎是一师之长，又是重伤员，他的马自己很少骑，经常用来驮伤病战士。战士们看到师长让重伤病员骑在马上，轻伤员拽着马尾巴，自己却拖着伤残之身，把缰绳套在断臂上，为伤病员引缰牵马，无不深受感动和鼓舞。

红6师随军团主力渡过牙磨河后，由红32军接替后卫任务。在交接时，贺炳炎和廖汉生送给红32军罗炳辉军长50发手枪子弹，罗军长送给他俩二两盐巴。这二两盐在当时可谓弥足珍贵。时隔很多年，贺炳炎仍难以忘怀这特殊的礼物。

1936年9月，贺炳炎、廖汉生率红6师走出草地，奉命进击康县，红6师于9月19日攻占了康县县城，10月抢渡渭水，在会宁东北的将台堡与红一方面军会师。随后，红6师参加了歼灭胡宗南部1个旅的山城堡战役。

贺炳炎以他压倒一切敌人的英雄气概，以他身先士卒、敢打硬仗的战斗作风，成为红二方面军中的一员骁将。

## 彭绍辉在红军中的岁月

纪学  
吴也

彭绍辉（1906～1978）是中国人民解放军高级将领，湖南省湘潭县韶山冲瓦子坪人。1926年参加农民赤卫军。1928年参加平江起义，同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土地革命战争时期，任红5军第3团分队长、随营学校大队长、第1师第1团团长，红5军第4师、第1师参谋长，第1师师长，兴国模范师师长，少共国际师师长，红1军团司令部教育科科长，红四方面军第30军参谋长，红四方面军红军大学上级政治科科长，红二方面军第6军团参谋长，红二方面军教导团团长。抗日战争时期，任八路军第120师教导团团长，第358旅旅长，独立第2旅旅长，晋西北军区第2军分区司令员，抗日军政大学教育长、副校长，抗大第7分校校长。解放战争时期，任吕梁军区副司令员、司令员，晋绥野战军第2纵队副司令员，西北野战军第7纵队司令员，第一野战军7军军长。1949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第一野战军参谋长，西北军区副司令员兼参谋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兼训练总监部副部长，军事科学院副院长兼战术研究部部长，中国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1933年荣获二等红星奖章。1955年被授予上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是第一、二、三届国防委员会委员，第二、三、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委员，中国共产党第九、十、十一届中央委员。1978年在北京病逝。

\* \* \* \* \*

### 深夜离家

1927年。

7、8月间的湖南，天气十分炎热，可彭绍辉的心里却冷冷的。这个20岁的年轻人，既怀念不久前火红热烈、扬眉吐气的日子，又为眼前的出路而焦虑不安。

彭绍辉出生在湘潭县上七都瓦子坪一个贫苦的农民家庭，全家十七八口人，仅有8亩水田和5片柴山。为了生活，父兄们租种地主的田地，还要经常外出打工。一年忙到头，仍然难以维持生计，只好将田地和房屋典押给地主。兄长们当长工，嫂子们做帮工。他先是给人家放牛，16岁时就给地主刘福庭当长工。当农民运动兴起时，到处是“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土豪劣绅”、“打倒军阀”的口号声，各地成立农民协会和自卫军，建立乡村革命政权。彭绍辉的四哥绍松当上了乡农协委员长，二哥子牧、三哥子溪参加了农民自卫军。彭绍辉也参加了农民运动，当上了农民自卫军的战士，游行示威，张贴标语，高呼口号，斗争地主……那是多么舒心的日日夜夜啊！当时他想，这回真要出头了！

可是，时间不长，形势就发生了变化。1927年5月，湖南发生“马日事变”，军阀许克祥的部队镇压农民运动。湘潭、湘乡、宁乡等地的中国共产党组织将农民自卫军集中起来，共10万人，攻打长沙，最后被打散。农民运动转入低潮，“团防局”、“挨户团”四处清乡，枪杀农协会员。彭绍辉是农民自卫军成员，参加过打长沙，也被当成“暴徒分子”。他虽然没有被抓

到，可心里非常难过，怀念着遭害和被捕的农友们。他不愿意再去地主家当长工，就对母亲说：“我要离开这个鬼地方，到外边革命去。在没有别的什么办法时，只有去当兵。”

母亲看着面前这个最小的儿子，心里酸楚楚的。外边再好，也不如家里呀！因此她不同意儿子走，怕他出去受苦。

彭绍辉到农民协会把这一想法告诉了当农协委员长的四哥，四哥很支持他，说：“我们家有四五个兄弟，出去一两个没有什么，如果你走了，母亲由我赡养。”……

就这样，彭绍辉下定了决心——走，就在当天夜晚。此时，他正朝家里走去。

进了家门，彭绍辉看到母亲正在干活，心里很不是滋味。这位普通的农村妇女，共生11个孩子，4个活了下来，在7个男孩子当中，彭绍辉最小。三年前父亲去世，兄弟分家，妹妹出嫁，只有彭绍辉和母亲生活在一起……

想到这些，彭绍辉又有些犹豫了。走吧，真舍不得离开疼爱自己的母亲；不走吧，又没有出路。他低头默默地帮母亲干活，却不敢看母亲，害怕看到那慈祥的目光，自己会改变主意，动摇已经下定的决心。他真希望天早一点黑下来。

终于到了吃晚饭的时候。这一顿饭，彭绍辉吃得很慢，甚至有时停下筷子愣神，仿佛有意识品味母亲做的饭菜。此一去究竟会怎样，他不敢细想，也想不清楚。说不定这是最后一次吃母亲做的饭菜呢。

的确，彭绍辉离家后就再也没有见到过母亲。这位勤劳善良的农村妇女，1939年就告别了人世。一年后，彭绍辉才从四哥的来信中得知母亲去世的消息。

也许是因为天黑了，母亲没有看到儿子不安的神色，也许是知道儿子近来心情不好，她只是不停地催促：“满孩，多吃一些。吃好了，就早些歇息吧！”

吃完饭，彭绍辉想帮着母亲收拾碗筷，被母亲拦住了：“还是我弄吧，看你毛手毛脚的，什么时候娶个堂客回来就好了。”

彭绍辉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没有说出来。他觉得，在这样的时候，什么话也不能说，一不小心就会露出马脚来，那就真的不好走了。

他坐在桌旁，默默地看着母亲。

母亲似乎发觉儿子有点异常，还以为他是累了或有什么不开心的事，便说：“干了一天活儿，累了就早点歇着去吧。”

“知道了！”彭绍辉答应着慢慢站起身，走进自己睡觉的屋子。

躺在床上，彭绍辉怎么也不敢入睡。他想休息一会儿，又害怕睡过了时间，只得眼睁睁地看着窗外漆黑的夜空，想着怎样离开家，想着到哪里去……

不知又过多长时间，夜深了，母亲的屋里也没有了动静。彭绍辉咬咬牙，从床上下来，轻手轻脚走进母亲的屋子，悄悄打开柜子，摸到一套衣服和五百铜钱，这是他白天就看好了的。大概是听到了响声，也许是根本就没有睡着，母亲问：“满孩，你干什么？”彭绍辉没敢吭声，也没敢停留，急忙几步走到了门外，屏住呼吸，站住不动了。

“满孩，你不要走！”母亲喊着哭了起来。

这哭喊声，使彭绍辉难受极了。在短短的时间里，他的脑海里想了很多，可最后还是在心里默默他说：这也是没有办法呀！他真想大喊一声：妈，我

走了！但叫不出声来，眼里却湿了。他擦一把泪水，猛一转身，迈开双脚，离开了家门……

## 痛苦追寻

夜色漆黑，道路崎岖。彭绍辉顶着夜色，加快脚步，他要到韶山冲去。他的心里很着急，恨不得一步就赶到那里，马上见到毛泽东。

几个月前，毛泽东考察湘潭农民运动时到了瓦子坪，在集会上讲述农民协会的事情。彭绍辉凝神静听，面带喜色，心里不住地叫好：讲的对呀！农民就是要团结起来，和地主老财斗争，才能不再受欺负。毛泽东在考察中还和彭绍辉单独交谈过，听了彭绍辉讲的情况和看法，称他为“放牛娃”，鼓励他好好干。如今他觉得在家里没法待了，首先想到的就是去找毛泽东。他想，找到毛泽东就有办法了。

心情急，脚步更急。不一会儿，彭绍辉的身上和脸上就淌满了汗水。他抬手抹了一把脸上的汗，两只脚却没有停，心里想着毛泽东说过的话，还想象着见到毛泽东的情景……

瓦子坪离韶山冲仅十多里路，天明时分彭绍辉就赶到了。令他失望的是，到处也找不到毛泽东。有人说毛泽东已经离开了韶山，到哪里去了，谁也不知道。

不过，彭绍辉没有灰心，他离开韶山后到了湘潭县城，又到了长沙，都没有找到毛泽东。在长沙，彭绍辉打听到毛泽东可能在武昌，便爬上了一列开往武昌的火车。他身上只剩下几十个铜板了，买不起火车票，被列车员训斥了一顿。他心里不满，但也只能忍气吞声地受着。

当时的武汉，正是汪精卫叛变革命之后，到处一片混乱，大街小巷，人心惶惶，彭绍辉一到武汉就到处打听，可怎么也打听不到毛泽东在何处。彭绍辉哪里知道，这时毛泽东已经离开武汉，前往湘赣边界领导秋收起义去了。这样的行踪，彭绍辉怎么可能打听得到呢？

找不到毛泽东，彭绍辉心里着急。从韶山到湘潭，从长沙到武汉，满怀的希望得不到实现。他看着陌生的城市，望着匆匆过往的人群，举目无亲，感到又累又饿。他一时没了主意，沿着滚滚东去的长江边慢慢地走着。

彭绍辉来到武昌江边码头，捏了捏口袋里仅有的几个铜板，走向一家饭店，想买一点东西吃，他实在大饿了。远远地，他就看到饭店门前挤了很多人，还挂着一面旗。上前一打听，才知道是招兵的。

看着飘扬的招兵旗子，彭绍辉心里思量着。自己已经到了流落街头的地步，找不到毛泽东，又不能回家，这样下去也不是个办法呀！眼下还有几个铜板，以后连吃饭的钱也没有了，总呆在这地方怎么办呢？想着想着，他下定了决心：先报名当兵，一是能渡过目前的难关，再就是可以学点本领，等有机会再去找毛泽东。

彭绍辉这样想着，按了按贴身珍藏着的农民协会袖标，走到了招兵的旗子下，挤到前边的桌子旁，说：“我报名当兵！”

“叫什么名字？”

“彭绍辉。”

“多大了？”

“20岁。”

“哪里人？”

“湖南。”

那人把这些都写在一张表格上说：“好吧，你到3营12连去。”

这12连，属国民革命军第35军第1师第1团第3营，是个新兵连，连排班长及大部分士兵都是湖南湘乡人，其中不少新兵在家时是农协会员和农军战士。彭绍辉到了连里，和大家相处得很好，也能够谈得来。

连队住在武昌的两湖书院，每天都进行军事训练，一日三操两讲，要求非常严格。官长们常常开口骂人，动手打人，训斥体罚更是家常便饭。彭绍辉对此很不满意，却不敢说，只是默默地忍受着，要他怎么做就怎么做，被看成是个守规矩的新兵，所以没有挨打。

尽管如此，彭绍辉的心里还是非常苦闷。原以为当兵是个出路，没想到更痛苦。他想过开小差，可又一想，到处人地生疏，手里又没有钱，跑出去怎么度日呀？再说，回到家乡日子也不好过，土豪劣绅的仇也没有报，目的达不到，怎能就此罢休呢？他思前想后，在心里对自己说：还是暂时先干下去，等将来有了机会再说吧。

一天晚上，班长无意间发现彭绍辉藏着农民协会的红色袖标，低声严肃他说：“你怎么还保存这个？赶快把它烧掉，免得上面发现了砍脑袋！”

彭绍辉没有动，心想：别看土豪劣绅现在这样猖狂，将来总有一天，毛泽东会领着穷人干起来，我烧掉红袖标，以后拿什么去见毛泽东呢？

“你听到我的话没有？”班长严厉地问。

彭绍辉看看班长，发现他并无恶意，才说：“听到了，把它烧掉就是了。”

班长走后，彭绍辉没有烧袖标，而是把它更严严实实地藏了起来。

不久，这支部队开到湖南华容、益阳、南县一带驻防。已是上等兵的彭绍辉，经常上街采买，有时还到鲢鱼须、藕池等地筹款、催粮。在这过程中，他发现了许多官长欺上压下、克扣军饷、互相倾轧、贪污腐败的事情，眼里看不过去，心里十分气愤。

更让他气愤的是各地反动势力相互勾结屠杀革命志士与共产党人的卑劣行径。在南县，他亲眼看到县公署警察杀害4个女共产党员的情景。行刑前，她们昂首挺胸，高呼：“共产党万岁”、“打倒贪官污吏”、“打倒土豪劣绅”等口号，誓死不屈。这使他极为难过，那血淋淋的场景，总在眼前闪现。彭绍辉越来越感到，他所在的这支军阀部队是压迫群众、坑害士兵的队伍，打算一有机会定要离开它。

## 参加起义

1928年春天，第35军第1师改编为湘军独立第5师，师长是周磐。彭德怀任第1团团长，彭绍辉所在的第12连就是第1团的一个连队。

这时的彭德怀，已经是中国共产党党员，由他和邓萍、张荣生、李光等人领导，在团里建立了秘密的共产党支部及其领导下的士兵委员会，组织了“闹饷运动”。彭绍辉虽然积极参加了这一运动，但还不太了解这里的真实情况。

彭德怀打算在团里办一个学兵连，培养骨干，推动士兵委员会的工作。周磐听说后，也想办一个随营学校。在彭德怀的帮助下，随营学校办起来了，彭绍辉被送到学校去学习。

随营学校校长是黄公略，教育长是贺国中，大队长是黄纯一。这三个人都是党派到独立第5师的共产党员。黄公略给学员们秘密讲授农民运动和广州农民运动讲习所的情况。在家时就是农协会会员和农军战士的彭绍辉，每次都去认真地听讲。有些革命道理，他虽然还不完全懂，但总觉得听了以后很受鼓舞，胸怀宽了，目光远了，看到了前途和希望。

一天，彭绍辉与同学陈家时、郭炳生两人聚在一起闲谈，从学校说到社会，从学习说到形势，谈得很投机。

彭绍辉说：“九都水的共产党很活跃。”

陈家时问：“你看共产党怎么样？”

彭绍辉想了想说：“从‘共产’这两个字琢磨，对穷人总是好的。”

“黄校长讲的你都赞成吗？”郭炳生问。

彭绍辉想到黄公略讲的农民运动和关于革命和革命人生观的话，说：“那些道理我不全懂，可我相信。”

“咱们学校也有共产党。”陈家时说。

彭绍辉惊喜地问：“是嘛，他们是谁？”

陈家时和郭炳生相视而笑，马上转变了话题。彭绍辉见他们不愿说，也就没有再问。

这次谈话以后，彭绍辉的目光就开始注意观察周围的人和事，似乎感觉到了什么。是什么呢？他一时又说不清楚。

后来，黄公略、黄纯一相继调走，学校由贺国中主持。学校一如既往，彭绍辉仍然认真学习。

进入炎热的7月，随营学校照常上课和训练。7月23日这天，贺国中突然把学员们集合起来，说是要开到平江县城去。部队到达鱼口的时候，贺国中在队前讲话，说：“我们从今天开始起义了！脱离独立第5师，接受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站在队列中的彭绍辉，眼睛猛然一亮，此时他不但明白了随营学校里也有共产党，而且知道了谁是共产党。

贺国中继续说：“彭德怀团长已在平江城里起义了，我们现在就赶去与他会合，出发！”

随营学校的百余名学员继续朝平江开进。他们顶着炎炎烈日，急速行军，午后就进到平江城内。此时，平江城呈现在学员们眼前的是，街道两旁红旗招展，墙上刷满了“打倒新军阀”、“打倒土豪劣绅”和“中国共产党万岁”等标语，一群群男女学生在演讲宣传，一些店铺、商店照常营业。彭绍辉看着这欢腾的景象，既感到新奇，又抑制不住心头的激动。

随后，贺国中陪同彭德怀和滕代远来到随营学校学员的队列前。贺国中大声宣布：“我们随营学校现在就结业，从1团来的学员回原单位；从2团3团来的学员，愿意留下的就编入起义军，不愿留下的可以发给路费回家！”

接着是彭德怀讲话。他揭露了国民党反革命的罪行，说明起义的性质和今后的任务，最后强调说：“从现在起，我们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红军了。共产党是为穷人求解放的党，红军是无产阶级的军队，不但要解放自己，而且要解放中国的无产阶级和四万万五千万人民。我希望你们勇敢地站起来，参加革命队伍，为夺取工农革命的最后胜利而斗争！”

滕代远也讲了话。他说：“红军是完全新型的人民军队。在军阀部队里，官长欺压士兵，克扣军饷。在红军里，官兵平等，经济公开，建立士兵委员

会，废除打骂制度……”

贺国中带头喊口号：“打倒国民党政府！打倒土豪劣绅！”“建立工农政府，没收地主土地！”“拥护中国共产党，为工农大众利益而奋斗！”……

这些话，这些口号，有的彭绍辉懂了，有的不完全明白，但他听得十分认真，而且真正感到一切都变了。后来他回忆说：“这些宣传教育打动了我的心，过去对共产党的印象为今天的事实所证明。我认为这才是真正的革命行动，到底还是有我们穷人的天下啊！此时，我对革命才有了初步的认识。”

学员结业了，随营学校也解散了。彭绍辉回到黄纯一任团长、贺国中任副团长的第7团任班长。这时，他心情舒畅，欣喜自己成了一名红军战士。

平江城里的枪声，令国民党反动派极为震惊。他们立即出动军队，对平江城构成半月形大包围，发动猛烈进攻。由起义部队编成的红5军，在彭德怀、滕代远等人的领导下，撤出了平江城，在修水、万载、铜鼓之间与敌周旋。战斗中，彭绍辉沉着勇敢，无所畏惧，在艰难的处境中不动摇不退缩，很快被任命为分队长，并由黄公略介绍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 在人民中

平江起义的部队在黄金洞、修水一带与当地工农游击队合编，组成3个纵队。接着，彭德怀和滕代远率第1、第3纵队向南进发，准备与红4军取得联系；黄公略率2纵队留在湘鄂赣边界，坚持游击战争。

已经升任中队长的彭绍辉，在大队长李实行的领导下，经常带人深入到偏远山区，白天写标语、印传单，夜间到交通要道和重要场所张贴、散发，拂晓前返回宿营地。他还经常率队在平江、浏阳、万载地区发动群众打土豪、分田地，组织农民自卫军，发展党组织，建立苏维埃政权，扩大红军的影响。在实际斗争中，他的组织指挥能力也得到了提高。

一次，第2大队由长寿街转到芦洞宿营时被敌人包围，拂晓时遭到猛烈攻击。在紧急情况下，彭绍辉迅速集合部队，抢占了芦洞东侧的高地，造成敌人错觉，将敌全部火力吸引过来。在据险顽强抵抗中，通信员陈梓吃惊地说：“中队长，你挂彩啦！”

“在哪里？”彭绍辉问。

“看你右腿上流的血。”陈梓说。

彭绍辉低头一看，见裤子上有两个枪眼，原来子弹打中了右胯骨。但他并不在意，仍带伤指挥部队坚守阵地，阻击敌人，保障了大队主力安全转移。

撤出战斗后，彭绍辉在两个战士的搀扶下，随队翻越了由芦洞到浏阳的30余里山路。因流血太多，到达宿营地后他已处于昏迷状态。

当时敌情十分严重，驻地附近的古港镇就有国民党的民团，部队当晚必须转移。由于彭绍辉的伤势很重，行动困难，为了使他早日养好伤，组织上通过秘密的农民协会，将他留在赵家冲一位姓刘的老板家里，并派了通信员陈梓跟随照顾他。

部队当夜转移，第二天拂晓敌人就来搜查。刘老板悄悄将彭绍辉背到后山，藏在一个草堆里。敌人走后，刘老板将他背回家，熬稀粥，泡姜汤；姓李的农会委员长用草药为他的伤口止住流血，减轻了疼痛。

赵家冲离古港镇只有三四十里路，区公所有几十名团丁驻守，经常出来活动，纸商也常来这里买竹子。为防止走漏消息，群众白天将彭绍辉藏在后



山草丛中，晚上再背回来，并派可靠群众放瞭望哨，发现民团搜山就鸣锣告警，还弄好吃的东西，使他的伤情有了好转。

第六天晚上，当发现民团奔赵家冲而来时，乡亲们立即把彭绍辉扶上担架，老板娘送上煮好的猪肉和鸡蛋。乡亲们沿着山路把彭绍辉转移到附近的一个村子，委托刘老汉照应。

刘老汉单身一人，也是农民协会会员，对彭绍辉照顾得非常周到。刘老汉用草药为他敷伤口，做好饭给他吃，使他的身体恢复很快，不久就能由陈梓扶着下地走路了。

时间一长，彭绍辉在这里养伤的风声还是传出去了。敌人来搜山，地方党组织又把彭绍辉转移到西山鸡婆尖脚下唐老板家中养伤。

彭绍辉离开不到一顿饭功夫，30多名团丁就闯进村子，到处搜查，并问刘老汉：“挂了彩的游击队长呢？”

刘老汉说：“三天前就走了。”

“到哪里去了？”团丁问。

“到一区去啦。”刘老汉说。

团丁气愤地推了刘老汉一个跟头，踢了一脚，抢上三只鸡走了。

团丁走后，刘老汉去看彭绍辉，说：“彭队长，好险哪！你可真万幸，你不该死啊！”

彭绍辉抱歉他说：“连累你老人家受惊了。”

刘老汉说：“你这样说就见外了，你挂彩还不是为了我们穷人？只要你平安无事，我就放心了！”

团丁们没有找到彭绍辉，总是不甘心，经常来骚扰搜查。一天深夜，团丁们突然闯进鸡婆尖脚下。唐老板急忙将生病的陈梓安顿好，背起彭绍辉从后门直奔后山，穿过竹林将他藏在一个山洞里，再一次躲过了搜查。

直到中午，团丁们走了，唐老板又急忙给彭绍辉送来饭菜。

地方党组织认为彭绍辉已引起敌人的注意，不宜再住下去，就在一个黑夜把他转移到了萤和洞。

一次又一次的转移，每到一地都受到党组织和人民群众的掩护和照顾，使彭绍辉进一步懂得了红军依靠人民、为了人民的深刻意义，坚定了为人民解放而奋斗到底的决心。他伤还未痊愈就归队了，决心用自己的行动回报人民群众的深情。

归队后，彭绍辉任红5军第2纵队第2大队教导队长，担负起为红军培养干部的重任。

## 受处分后

彭绍辉和他指挥的一团人马，到达葛坳南的赖村地区时，还沉浸在胜利的喜悦之中。

两个月之前，国民党军10万人，以分进合击的战法，长驱直入，向中央根据地进行了第一次大规模的“围剿”。朱德、毛泽东指挥红军采用诱敌深入、各个歼敌的战略方针，反击敌人的“围剿”。在打第一仗时，彭绍辉率领一个团在上固方向担负牵制永丰、乐安方向进犯之敌的任务，仗打得很出色，有力地配合红军主力全歼了张辉瓒师，活捉了敌师长张辉瓒。第二仗打敌谭道源师时，彭绍辉率团又圆满地完成了追歼向洛口、广昌方向退走的残

敌的任务，重创谭道源师，共歼敌 1.6 万余多人，缴获各种枪支 1.3 万余支，为反“围剿”的胜利作出了贡献。

第一次反“围剿”胜利之后，彭绍辉率领全团开赴三都、七保、上下谢、葛坳地区，进行反地主武装的斗争。战士们奋勇向前，攻开了上下谢的土围子，接着消灭了蔡家凹的地主武装……如今来到赖村一带进行休整，作为团长的彭绍辉，喜悦之情溢于言表。

这时，正是春节来临之际。打了胜仗，又过春节，真是双喜临门。怎样过好中华民族的传统节日呢？彭绍辉一问，团里还积存有八九百块钱，便召集团委扩大会议讨论，决定给每个战士发两毛钱的过年费。

团委扩大会的决定刚公布，钱也刚发到战士手里，就传来了总指挥部给战士发两毛钱过年聚餐费的通令。团里这两毛钱还发不发？彭绍辉和政委、副团长等人商量，最后的意见是，两毛钱还是发给战士，每人打一双草鞋。

因为团里这次过年费的发放，事前没有请示，事后也未报告，师领导得知后，认为他们的做法有违领导原则，并进行了追查。彭绍辉团长因此受到撤职和留党察看三个月的处分，调到第 4 师任副官长。

对这样的处理，彭绍辉思想不通。他认为，多发两毛钱给战士打草鞋，又是在过春节的时候，不是什么了不起的错误，对他的处分太重了，他怀疑这是有意打击报复。彭德怀听说这件事以后，亲自找彭绍辉谈话，指出虽然这是经费处理上的不慎重，却是组织纪律观念不强的表现，要求他从思想上提高认识，接受教训，今后更好地为党工作。

尽管彭德怀亲自出面做思想工作，但彭绍辉还是不能接受这样的处分，带着沉重的思想包袱到第 4 师当了副官长。彭德怀放心不下，又亲笔给彭绍辉写了一封信，一方面教育，一方面鼓励，要他放下包袱，轻装前进，用实际行动表明自己的态度。读了这封信，彭绍辉深受感动，情绪也有了好转。

就在彭绍辉到第 4 师当副官长不久，蒋介石又调集 20 万兵力，以“稳扎稳打、步步为营”的战略，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第二次“围剿”。在这次反“围剿”中，彭绍辉担负第 4 师的战勤保障工作。他随部队由东固出发，自西向东，直到福建建宁。一路上，他组织护理伤员，收容俘虏，处理战利品，克服重重困难，积极认真负责地做好担负的每项工作。

人们都以赞扬的目光看着彭绍辉，说他不像是受了处分的人。彭绍辉心如明镜：我犯错误，可以给予处分，但我对革命事业不会灰心，更不会以消极的态度对待革命工作。

时间考验了彭绍辉，处分锻炼了彭绍辉。鉴于他在反“围剿”中战勤保障任务完成得出色，留党察看期满即恢复为正式党员，继而又被提升为第 4 师参谋长。

在随后开始的第三次反“围剿”中的莲塘战斗中，第 4 师第 3 团团团长负伤，彭绍辉奉命代理团长指挥战斗。拂晓前突破敌人阵地时，他右肩中弹负伤，仍带伤指挥战斗。

十多年后，彭绍辉在回顾自己走过的道路时，详细地写下了当时的情况和对处分的思想认识过程。他说“那件事给了我很大的警惕，组织纪律性进一步得到加强，对经费问题的处理便特别慎重了。”

## 失去左臂

1932年底，蒋介石又调集50万兵力，分左、中、右三路向中央革命根据地发动大规模“围剿”。此前的三次“围剿”，都被红军粉碎，这是第四次。以陈诚为总指挥的敌中路军12个师16万人担任主攻，企图分进合击，一举歼灭中央红军主力于黎川、建宁地区，摧毁中央根据地。

面对敌人的又一次来攻，红一方面军以一部分兵力留驻黎川，主力转移到东韶、洛口地区待机歼敌。师长彭绍辉奉命率红3军团第1师迅速赶到北线，向“围剿”之敌发动进攻。战斗开始以后打得很顺利，连续攻克了宜黄、乐安两县，并配合主力围困了南丰之敌；继而又转战东线，参加了黄狮渡战斗、邵武战斗和浒湾丰山铺战斗，均出色地完成了任务。

1933年2月，初春的鄂东大地仍笼罩着十分阴冷的寒气。穿着单薄衣裳的红军官兵，在细雨依雾之中隐蔽行进到黄陂、大龙坪地区，将敌行军纵队拦腰切断，随即发起猛攻。这个漂亮的伏击战，将两个师的敌人全部歼灭，生俘敌师长李明、陈时骥以下万余人。在这次战斗中，彭绍辉率领全师，乘着迷漫的大雾，从右翼绕到敌后，攻打敌第59师的背侧，歼其1个旅，缴获各种枪1400余支，俘敌2000多人。

一个月后，即3月中旬，不甘失败的敌人又纠集6个师的兵力，由宜黄经东肢直扑广昌。红军以一部分兵力进至广昌西北地区吸引敌人南进，主力则向西北移动，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首先消灭了草台岗、徐庄地域之敌，尔后突击东陂、五里排之敌。彭绍辉所在的红3军团负责正面攻击。他接到军团长彭德怀下达的“1师担任草台岗主攻任务”的命令后，立即对部队作了战斗动员，星夜率部向霹雳山急奔。

山路崎岖，夜黑更加难行。彭绍辉根据彭德怀的指示，派出1个连带上游击队的袖标，于夜晚出击打上几枪，然后丢下一些杂物和袖标，佯装逃跑的样子；他自己则率主力疾速前进，披荆斩棘，克服重重困难，先于敌人到达霹雳山下。

霹雳山是草台岗的制高点，地势险要，只有占领主峰控制住隘口，才有胜利的希望。彭绍辉指挥部队连续发动三次进攻，仍不能攻上主峰。

这时，彭德怀来到前沿阵地，他在电话中说：“彭绍辉，我在看你们行动，要特别冷静，一定组织好火力，利用一切机会猛攻。”

彭绍辉报告了前一天先头部队疏忽，在与敌接触时使用了机枪，暴露了目标。

彭德怀一听就火了，事前他就指示这个师要伪装成游击队，不打机枪，他们还是没有遵照指示行动。彭德怀严厉地批评了彭绍辉，还骂了娘，看来是真的动了肝火。他最后强调说：“必须拿下制高点霹雳山，这是取得反‘围剿’胜利的关键之一。”

彭德怀放下电话，爬上山头，让身边司号长田长江吹号，命彭绍辉迅速坚决拿下主峰。

听到号声，彭绍辉奋不顾身指挥战士，一鼓作气地冲上了霹雳山的主峰。

主峰东侧3个小山头上的敌军不甘示弱，疯狂向霹雳山主峰发起攻击。彭绍辉冒着敌人的枪弹，赶到最前沿阵地，指挥部队阻击敌人，坚守主峰阵地。战斗间隙，他与一线部队研究确定了凭借有利地形，阻止敌人进攻，并把敌人占领的几个山头夺下来的战斗部署。

这时，敌军出动了飞机，在霹雳山上空狂轰滥炸，敌官兵纷纷后撤隐蔽。彭绍辉看到这是个好时机，命令部队采取分散隐蔽的办法，迅速接近敌人，

为进攻作好准备。

深夜 10 时，突破霹雳山敌阵地的战斗打响了，彭绍辉指挥部队发起冲锋。敌机为配合其地面部队，进行俯冲投弹。因两军相距很近，飞机投弹不准，有的炸弹甚至落到敌军阵地上。敌军官兵喊叫声、咒骂声乱作一团，慌慌张张后撤躲藏，连机枪都扔在阵地上不管了。

见此情景，彭绍辉当机立断，第一个跳出战壕，率部向敌人发起猛烈攻击，俘获大批敌人，并将敌前沿阵地撕开了一个大口子。为了扩大突破口，彭绍辉又带头冲锋，猛攻敌人主阵地。警卫员急忙上前劝阻：“师长，注意安全！靠前太危险！”

两军相逢勇者胜，而主要指挥员的模范行动，更是无声的命令。深知这一点的彭绍辉，不顾警卫员的劝阻，继续往前冲。在他的带领下，指战员们如下山猛虎，奋勇向前，势不可挡，不到 20 分钟，就占领了敌军主阵地，重伤敌师长肖乾，歼灭了大量敌人。

剩余的残敌仓皇向山下逃跑。彭绍辉随即命令战士们勇猛追击，他自己则顺手从地上捡起一支敌兵丢弃的三八式步枪，和战士们一起向山下冲击。刚到半山腰，两粒子弹连续射中了彭绍辉的左臂，击碎了骨头。他咬紧牙关，用绷带扎住伤口，继续率部追击。当第 3 师投入战斗后，彭绍辉才被抢救下来，送进了红军医院。

彭绍辉的伤势很重，医护人员千方百计做了三次手术，都没有成功，最后决定截去他的左臂。当征求本人意见的时候，彭绍辉坚决不同意。他心神不宁，非常痛苦，以至产生了难以抑制的悲观情绪。他想，这不仅给以后继续参加战斗带来困难，个人的前途也会受到影响，自己还年轻，不能没有胳膊呀！

军团领导彭德怀、滕代远和一些战友听到这个情况后，都到医院去探望，安慰他服从医院的救治，鼓励他振作起精神，早日重返前线。于是，他才从悲观和痛苦的情绪中跳出来，同意截去左臂。在医院的七八个月中，他除了治伤养伤外，就是阅读报刊，利用这难得的机会，坚持学习了《共产主义 ABC》、《列宁主义概论》等马列主义著作；还以惊人的毅力，为重返前线进行顽强的锻炼，学会了独臂打绑腿、骑马等军事动作。

由于彭绍辉在霹雳山战斗中指挥得力，身先士卒，机智勇敢，为粉碎敌人第四次“围剿”立下了卓越战功，中央军委于 1933 年 8 月授予他二级红星奖章。

当彭绍辉出院后，组织上为了照顾他，安排他到地方去工作。彭绍辉坚决地表示：“我虽然没有左臂了，还有右臂，还能指挥战斗。只要反动派不消灭，我就不离开战场！”

这个要求，被当时掌握大权的李德拒绝了。可彭绍辉不罢休，又去找周恩来，提出自己的请求。周恩来看他态度这么坚决，就同意了他的要求，鼓励说：“绍辉同志，你虽身残，却志坚，这种不怕流血牺牲的精神值得我们大家学习。好吧，我同意你继续留在部队，为革命战争的胜利勇敢地战斗。”

就这样，彭绍辉带着一只右臂，又回到了红军的战斗行列。

## 一师人马

艳艳的秋光里，农民们正在收割晚稻，田野上一片繁忙景象，偶尔有山

歌飘过，婉转而动听。彭绍辉怀着十分兴奋的心情向兴国县走去，和他走在一起的是一名男护士和一个警卫员。在弯弯曲曲的山路上，他们边走边交谈。

护士说：“彭师长，你的身体没有完全恢复，还得注意啊！”

“我现在还不是师长，等招到兵买到马才算师长呢。”彭绍辉笑着说，“不过从医院出来就不一样了。在医院，我得听你们的；出来后，你们就得听我的了。”

警卫员却不同意这个说法，提醒道：“你别忘了，是争取好久才回到野战部队来的，弄坏了身体可就没法再争了啊！”

彭绍辉说：“你就放心好了，我会注意的，不过咱们首先得完成招兵任务才行！”

彭绍辉截肢出院后，正值国民党军准备对中央根据地第五次“围剿”，红军急需补充人员，他就是在这种情况下奉命到兴国县扩红，组建一个补充师的。他没有了左臂，身体还没有完全恢复，因此医院派一名护士携带药品和警卫员一起随同前往。

已经在根据地生活和战斗了几年的彭绍辉对兴国县是很熟悉的。他知道，毛泽东曾到这里作过调查，对这个县的工作给予了很高的评价。“苏区干部好作风，自带干粮去办公”的歌谣，最早就是从这里唱起的。彭绍辉一到兴国，地方党组织和有关部门就详细介绍情况，问他有什么要求，使他亲身感受到人民群众对红军的深厚感情和无私支援。

白天，彭绍辉深入到农村和圩场的群众中去，宣传扩大红军、保卫苏区的意义，号召青年人拿起枪参加红军。他还找赤卫军和少先队的同志们谈话，听取他们的看法，征求他们的意见。到了晚上，他或者在灯下召开会议，分析研究情况，或者一个人伏在地图和花名册上边看边思索。

这天深夜，已有寒意的秋风，从门窗的缝隙吹进屋内。护士几次催他休息，他嘴里总是说：“这就休息，这就休息！”可护士一走，他就又边用仅有一只右手扶着蜡烛，边凝神地工作。烛焰烧了他的头发和眉毛，警卫员发现后赶忙跑过来把蜡烛移开，自责地说：“你一只手不方便，怪我没照顾好你！”

彭绍辉笑了，风趣地说：“怪你管得太多了。”

彭绍辉伸手去接警卫员手中的蜡烛，说：“还是我拿着吧。以后你的任务，第一是好好学习，第二是做好保卫工作，第三才是适当照顾我的生活。”

“可你只有一只手呀！”警卫员说。

彭绍辉挥动一下右手，指着左边的断臂说：“别看这边少一个，剩下的一个还很好用哩！”

警卫员没有办法，只得把蜡烛交给彭绍辉……

在地方政府的组织和配合下，许多青年纷纷报名参加红军，很快就有了支不小的队伍。彭绍辉根据情况，把兴国县的赤卫军、少先队所属的模范营集中起来，再加上新参军的人，整编成了一个师，开始叫补充师，共5000多人，分3个团和1个独立营，后改为兴国模范师，彭绍辉任师长。

有了师的架子，也有了战士，可是基层的连、排干部很缺。这时，彭绍辉想到了随营学校和教导队。因为他当兵后进过先是黄公略后是贺国中负责的随营学校。在那里，他不但提高了思想觉悟，也增长了军事指挥才能。后来，他在红5军的随营学校当过教导队长，在红军学校当过队长，深知这是尽快培养人才的好办法。于是，他临时抽调一批优秀分子，组成一个教导队，

并且亲自领导，亲自制订计划，亲自组织训练，既教怎样做思想政治工作，又教军事知识和指挥。这样一来，彭绍辉更加忙碌了。

眼看彭绍辉一天天消瘦下去，护士对警卫员说：“你看首长这么累，吃饭也不正规，咱们得想个办法呀！”

警卫员说：“我真没有什么好办法，说他就是不听嘛！”

护士说：“咱们就给他补充些营养。”

“那也得找个机会。”警卫员说。

机会终于来了。一次出去打土豪，任务完成得很好，回来后部队改善生活，有个老乡送来一只鸡，指名要给彭师长补补身子。警卫员知道一报告就办不成了，便自作主张，悄悄把鸡炖好，然后端到彭绍辉的面前。

“这是怎么回事？”彭绍辉一看到鸡，马上严肃地问。

警卫员不敢隐瞒，说：“是老乡送给你补身子的。”

彭绍辉问：“为什么事先不向我报告？”

警卫员说：“怕你不同意。”

“这样我就同意了？乱弹琴！”彭绍辉说，“我不吃，你把鸡给我送回去！”

“活鸡已变成了熟鸡，叫我怎么送回去呀？”警卫员苦着脸，又央求说，“首长，你先把鸡吃了，我把钱给老乡送回去不行吗？”

彭绍辉看到警卫员为难的样子，无可奈何他说：“这样吧，大家分着把鸡吃了，你用我的钱给老乡送去。”

警卫员说：“你的钱也不比我们多呀！”

“老乡的鸡是送给我吃的嘛！”彭绍辉说。

看着说不过彭绍辉，警卫员只得点头照办。

彭绍辉组建教导队，果然起了大作用，培养了一批连排干部，加强了兴国模范师的建设。

一个月后，彭绍辉接到回前方工作的电令，他立即率领 1 个团回到第 3 军团，投入了第五次反“围剿”的战斗。

## 长征路上

1934 年，中央红军第五次反“围剿”失利。10 月，红军含悲忍痛，恋恋不舍地离开了多年发展和壮大的中央革命根据地，开始艰苦卓绝的长征。

彭绍辉从兴国回到前方，根据朱德、周恩来的命令，任第 34 师师长，率部在建宁、将乐之间的光明山之间阻击敌 88 师。战斗中，他下颌中弹负伤，住进医院。在手术器械简陋、麻醉药奇缺的情况下，他忍痛做了手术，取出了弹头。彭绍辉出院后即到红 15 师（即少共国际师）任师长。他就是和师政委萧华率领这个师踏上长征之路的。

长征一开始，彭绍辉就和萧华一起指挥红 15 师担负了艰巨的掩护任务。在石城、大脑寨一带，彭绍辉指挥红 15 师打退阻截红军的敌军一次又一次进攻，有力地掩护了红军主力的转移。不久，红 15 师改编为红 1 军团第 3 师，补充新兵，发放棉衣，补充弹药，担任掩护军委纵队的任务。彭绍辉和萧华带领这个师，昼夜兼程，沿粤、桂、湘边境行进，越过苗岭山脉，强渡乌江天险，经过一次次战斗，终于突破了敌人设置的四道封锁线。到达遵义时，第 3 师由 5000 人减少到 2700 人。

1935年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在遵义举行扩大会议，确定了毛泽东在中央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自从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彭绍辉看到红军费了很大力气构筑的“坚固工事”抵不住敌人的飞机大炮，“短促出击”的战术既消灭不了敌人的有生力量，又不能制止敌人前进。他率领的红15师在北线作战，一个月就损失2000多人。对此，他百思不得其解，也感觉到了战略指导上有问题。现在，思想疙瘩解开了，他愉快地投入了新的战斗。

当抵达贵州桐梓时，红军部队进行了整编，决定将第3师撤销，人员分别编入第1、第2两个师，以加强主力。彭绍辉则调任红1军团司令部当教育科长。

当教育科长和当师长不一样，彭绍辉自然知道，也早已作好了思想准备。他认为，部队整编是为了打胜仗，只要对战争胜利有好处，个人得失算不了什么。

可是，到了实际工作之中，他却遇到许多具体问题。比如，警卫员被取消了，行军中不配乘马。这对一个四肢健全的人来说也许没有什么，但彭绍辉是失去左臂的人，工作和生活上的困难可想而知。在这种情况下，彭绍辉确实处处感到艰难，但他没有丝毫怨言，更不向组织述说自己的困难，仍然一如既往地积极完成所担负的任务。不论白天黑夜，也不论是行军还是宿营，他都坚持值班，管理军团直属队，组织侦察、警戒、行军教育等。人们看到一个原来当过师长的独臂人跑来跑去地忙碌着，而且连一匹马也没有，都投出敬佩的目光：多么不容易啊！

2月，遵义战役后，彭绍辉被调回红3军团。因为他当过师长，彭德怀见面就说：“你回来了好，可是没有适当的工作岗位。”

看着自己熟悉的老领导，彭绍辉说：“我参加红军是来革命的，不是为了当官的。”

过了一会儿，彭德怀用征询的口气问：“你去搞教导营怎么样？”

“好！”彭绍辉立即说，“只要是干革命，什么工作都行！”

这是红3军团的教导营，有3个连队，1个营部。彭绍辉担任教导营长后，就和营政委李志民一起率领教导营奋勇行进在长征路上。他们渡赤水，袭金沙，翻雪山，和红四方面军会合后，进驻四川的松潘、黑水地区。

一天，彭绍辉接到一份电报。电报是周恩来发的，上面说，毛泽东、朱德等中央领导同志第二天经过黑水、芦花，要在教导营吃午饭。

读过电报之后，彭绍辉很兴奋，毛泽东、周恩来、朱德都是他尊敬的领导人，他要好好招待一下他们。可查遍全营什么好吃的东西都没有。怎么办？他亲自带人到附近东山村找到了两羊皮口袋青稞和一只羊，准备为中央领导做些好吃的饭菜。他知道，这些领导人一路上也是够苦的了。

彭绍辉等人带着弄到的青稞和羊刚刚下山，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人就到了教导营。彭绍辉见磨青稞面已来不及了，就对炊事班说：“快煮青稞稀饭，炖羊肉块，放些辣子。”

说完，彭绍辉就会见中央领导。周恩来见面就问：“搞到青稞和羊，给老乡钱了吗？”

彭绍辉看着周恩来，心想：他想得真细啊！在纪律方面，我可是反面、正面的经验都有呀！便说：“请周副主席放心，每一羊皮口袋青稞给了一块白洋，一只羊给了两块白洋。”

周恩来满意地点点头，说：“在少数民族地区，要特别注意民族政策。”

说话间，饭菜做好了，毛泽东、周恩来、朱德等中央领导和教导营的指战员们一起吃午饭。

毛泽东边吃边用筷子指着饭和菜，风趣他说：“今天是彭绍辉同志请客啊！”

彭绍辉说：“很惭愧，没有什么好吃的。”

“这不是很好吗？”毛泽东说。

吃饭时，毛泽东、朱德、周恩来等人边吃边和战士亲切交谈，询问部队情况，鼓舞官兵士气。

饭后，周恩来单独找彭绍辉谈话，说：“中央已确定北上建立陕甘宁革命根据地的战略方针，决定从一方面军调几个当过师长的同志去四方面军当军参谋长，准备派你去30军工作。你到那里后，要谦虚谨慎，注意团结，按照毛主席的指示把工作做好。”……

遵照中央的决定，彭绍辉到红四方面军第30军担任了参谋长的职务。



